大国研究丛书

任东来 等著

DANGDAI
MEIGUO

dangdaimeiguo

当代美国

——一个超级大国的成长

世界不是大国的
但是没有大国
世界绝不精彩
新世纪之光已经照亮
世界的和平与进步
痛苦与欢乐
发展与繁荣
无不与大国的作为休戚相关
关注大国——它们过去是
今天是
将来也是历史星空中的最亮点

贵州人民出版社

当代美国

——一个超级大国的成长

任东来　王　波　张振江
戴超武　钱　皓　张业亮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任东来／等著

MEIGUO



美国

——一个超级大国的成长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程亦赤
封面设计：曹琼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美国/任东来等著.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9
(大国研究丛书)
ISBN 7-221-05239-5
Ⅰ. 当… Ⅱ. 任… Ⅲ. 美国-概况-20世纪
Ⅳ. K9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0)第50099号

当代美国——一个超级大国的成长

任东来　王　波　张振江
戴超武　钱　皓　张业亮　著

出　版	贵州人民出版社(贵阳市中华北路289号)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贵阳宝莲彩印厂印刷
规　格	850×1168mm
开　本	32
印　张	17.5
字　数	439(千字)
版　别	2000年9月第1版
版　次	2000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7-221-05239-5/D·203
定　价	32.00元

前　言

《当代美国》一书按经济、政治、外交、军事、社会和文化六个专题，比较全面地描述了美国在本世纪的发展变化，探讨了这个超级大国由富到强的成长过程。

本书由任东来拟订编写大纲和体例并组织编写。负责参加本书编写工作的有任东来教授（第一编 1－6 章）、王波博士（第二编和第五编）、张振江博士（第三编）、戴超武副教授（第四编）、钱皓副教授（第六编）和张业亮副研究员（第一编第七章）。任东来对书稿进行了修改和定稿。

作为一个科研项目，本书曾得到南京大学世川良一优秀青年奖教金的资助。在本书写作过程中，任东来作为驻所学者曾前往洛克菲勒基金会在意大利贝拉矶的国际会议和学术中心，在这个学者所梦想的世外桃源里对书稿进行了修改。在此，对这两个机构表示最诚挚的感谢。

本书作者任东来、王波、张振江和钱皓曾经是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的学员。正是在那里为期一年的严格训练和刻苦学习，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他们的学术基础，决定了他们学术旨趣。戴超武在南大历史系从事博士后研究期间也深深地得益于中美文化研究中心的学术资源。在本书写作过程中，中美文化研究中心的图书馆一如既往地为他们提供国内最好的服务和最新的资料。本书的责任编辑程亦赤先生曾是该中心的学生。因此，他们愿意把本书献给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感谢它多年来为他们的学术进步所给予的帮助。

由于编者水平所限，恐多失误，尚希读者不吝赐教。

编　者

1999 年 7 月 19 日

目 录

第二编 社会运动与政治生活

第三编 超级大国的兴盛

第四编 战争与军事力量的崛起

第五编　移民国家与大众社会

第六编 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与丰富多采的文化

第一编

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

原书空白页

第一章　美国经济的转型和发展：1900—1919

由于国内和国际市场高需求的带动，美国经济在1897—1929年间处于一个普遍繁荣的时期，尤以1897年到1907年的10年间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最为突出。技术的进步使得农业和制造业得到了持续的发展。1897年时，美国的农业机械主要靠马拉动力，到1919年，内燃机代替了马力。工业开始广泛地利用电力，并尝试进行标准化和利用生产线的生产。包括通讯技术在内的技术进步使规模经济有了可能，规模效益最佳的企业不断增加。在运输方面铁路进入了它的黄金时代后，开始出现走下坡路的迹象。新兴的汽车工业蓬勃向上，小汽车、卡车和大客车开始与火车抢夺市场。

与此同时，美国在国际经济舞台上的地位也出现了微妙的变化。美国经济不再受制于欧洲特别是英国的经济和金融形势，相反，欧洲对美国这一新的经济巨人的反应日益敏感。1897年前，美国的投资者和企业家主要是利用国内的经济机会赚钱，欧洲的资本和企业也涌入美国。到了20世纪，美国企业家开始主动地寻找海外的商业机会，对外投资迅速增加。美国政府也积极地兼并领土以保证两洋贸易的战略需要。

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加速了美国在国际经济格局中地位的转变过程。美国从一个净债务国一跃而成为净债权国，拥有70亿美元的债权。在国际市场上，欧洲在美洲和亚洲失

去的份额被美国和正在兴起的日本所获得。欧洲的经济一蹶不振。美国一方面努力增加自己的出口,另一方面却一直维持着1860年以来的高关税,只有1913年恩德伍德关税法(Underwood Tariff Of 1913)是个例外。这使欧洲对美国的出口相当困难,最终损害了欧洲偿还美国债务的能力。

到1919年,美国完全成为一个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社会,并成为国际经济格局中举足轻重的角色。在这一基础上,美国经历了20年代前所未有的繁荣。

农业的繁荣

1893年的经济萧条到1897年就结束了,美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农业在经历了30年的徘徊和不景气之后,开始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并持续20年之久。与其他经济领域的价格和收入相比较,农产品的价格和农场的收入相对较高,市场上的贸易条件对农业有利。农业总产值从1899年的30亿美元上升到1909年的50亿美元,接着又上升到1924年的60亿美元。[①]这是美国农业的"黄金时代"。以后的农场主不仅怀念这一时期,而且常常把它作为理想的标准来抱怨他们现实的处境。

繁荣的原因在于当时的供求关系。19世纪的最后10年美国西部的边疆消失了,土地供应大为减少,新农场的增幅减缓,导致农产品供应的增长速度急剧下降。以小麦生产为例,1900年到1910年间的种植面积甚至出现了减少。与此同时,对农业的需求却在继续增加。美国的人口和世界的人口都在增加,特别是国内的需求因为外来移民的大量涌入和农村人口流向城市而大为提高。美国人口从1900年的7 600万猛增到1920年的1.06亿。

① H N 沙伊贝等著:《近百年美国经济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79页。

1900—1910年10年间，总共有900万移民来到美国。只是由于战争的原因，1911—1920年的移民数量才减到600万。尽管粮食作物在1897年到1914年每年只增加了0.6%，肉类增加了0.7%，但附加值较高的经济作物和水果增长较快，加利福尼亚和佛罗里达就在这一时期成为美国最重要的水果和蔬菜生产基地。由于可以利用先进的冷藏运输条件，消费者能够享用更多的鸡蛋和乳制品，家禽和鸡蛋的产量每年增加了3.1%。

农业的繁荣势头一直持续到1913年。1914年美国经济出现了短暂的衰退，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立即增加了欧洲对美国农产品的需求。农产品价格再次飚升，农业重现繁荣景象。1917年美国最终参加了世界大战，巩固了农业生产中的高产出、高价格和高收入。战争结束到1920年的欧洲战后复苏和重建进一步维持了对美国农产品的较高需求。农场主们竭力满足战时和战后的需求。农业机械被广泛使用，以代替那些离开农村涌入城市的劳工。拖拉机的普及带来了双重后果：它大大提高原来马拉机械的生产效率，同时原来用于饲养马匹所需要的土地（每匹马一般需要2英亩土地）可以用来生产市场所需要的作物。农业机械化的实现、农作物和家畜家禽品种的改良、优质化肥和农药的应用都有助于农业生产率的提高。1900年，生产100蒲式耳的小麦需要108个工时，1920年则只需要87个工时，生产同样数量的玉米所需要的工时则从147个减少到113个。

与农业繁荣相伴的是政府对农业的关注一如既往。通过土地赠与大学② 拨款，政府广泛资助农业教育和研究，建立各种试验站和技术推广站，从而形成世界上最发达的农业教育、科研和推广体系。在这里美国农业部的作用功不可没，它不仅继续致力于指

② 186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莫里尔土地赠与法》（Morill Land Grant Act of 1962）。据此，按每一国会议员3万英亩，联邦政府向各州赠地，用于建立一所农业和工学院。此法开了联邦政府资助高等教育的的先河。今天，美国许多著名的州立大学都是由这些赠地学院发展起来的。

导和帮助农场主提高产量,而且开始向他们提供更多的市场信息和帮助他们推销产品。农业部为农场主提供的服务越来越广泛,这也可以从它预算的增加中看出来,1920 年的预算是 1890 年的 30 倍。

由于边疆的消失、土地供给的减少以及农产品市场的兴旺,美国农场的土地价格开始猛涨,从 1910 年的 28.4 亿美元增加到 1920 年的 57 亿美元以上,这就使农场主为扩大再生产而获得的土地抵押贷款也大量增加。高额的抵押贷款和盲目的扩大生产在 20 年代当市场发生波动时遇到了很大的麻烦,甚至出现了灾难性的后果。

1890—1920 年美国农业主要指标

	1890	1900	1910	1920
农场数(千)	4565	5737	6406	6518
可耕地面积(百万英亩)	623	838	879	956
玉米种植面积(百万英亩)	75	95	102	101
小麦种植面积(百万英亩)	37	49	46	62
农业劳动力(百万)	9.9	10.9	11.6	11 4
拖拉机数量(千)	—	—	1	256
马匹数量(千)	153	170	192	198
土地价值(百万美元)	—	13048	28469	54825
抵押贷款额((百万美元)	—	—	3207	8449

资料来源: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lonial Times to 1970, Part 1 (Washington, D. 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5), pp 449~525.

制造业的迅猛发展

从 1897 年到 1920 年,美国的制造业取得了惊人的发展。制

造业的从业人数几乎增加了1倍，实际产出则翻了一番多(参见表格)。如果就表面的货币价值来算，产值几乎增加了600%，工资增加了500%。这两者之间的差距也说明企业的利润增加了。工业增长的速度两倍于人口的增长速度，人均的社会财富因此增加。这一发展成果与以前迅猛发展的时期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过，这一时期的通货膨胀也较为严重，特别是在1914—1919年物价高涨的几年。适当的通货膨胀刺激了经济发展。价格的提高鼓励了企业界对投资高回报的期望，由此促进了投资的扩大和新企业的建立。当然，这一进程只有在所生产的产品价格增长超过成本的增长时才会发生。

制造业的迅猛发展使它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开始超过了农业。1900年，在劳动力市场上，制造业和农业平分天下，各占30%。但到了1920年，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只占劳动力市场的25%的份额，制造业则上升到42%。

1899—1919年美国制造业生产指数

统计年份	生产指数(1899=100)
1899	100
1904	122
1909	159
1914	169
1919	214

资料来源：Edmund E. Day & Thomas Woodlief, The Growth of Manufactures, 1899-1923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28, pp.32-33.

就整体而言，1897—1920年美国经济发展的原因与前一个时期大同小异：技术进步以及相随而来的生产率的提高，移民的大量涌入和人口的自然增长扩大了劳动力大军，人口增长和收入的提

高使得需求迅速增加。值得注意的是新兴工业和新技术对整个经济的带动作用，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汽车工业的兴起，以及电力和装配线的充分应用。

工厂制度的发展吞噬了家庭及小规模的手工业作坊。比如，缝纫机的的普遍使用促进了成衣工业的建立，抢夺了裁缝的饭碗，也改变了家庭自己做衣服的传统习惯。1904—1909 年间东欧和南欧的移民大量涌入美国的城市，劳动力剧增。同样重要的是劳动力技术的提高和管理水平的改善。1880 年代泰勒(Frederick W. Taylor)发明的科学管理方法——用科学的方法来分析研究生产过程中的具体的管理和劳动环节——得到广泛的推广。对工作流程的这种注意在发展生产装配线和其他大批量生产技术方面尤为有用。

国际贸易的变化也刺激了制造业的发展。美国出口当中的农产品数量下降了，半制成品和制成品的增长显著。1896 到 1900 年间，美国出口产品中只有 21% 是非农业的制成品，到 1917 年这个数字增加到 44%。

这一时期发展的最重要的特点是生产设备的投资(生产基金)的水平居高不下，1897—1920 年间平均占到了 20% 左右的产值。有人估计，1901—1913 年间，美国生产基金的年增长率在 5%，而同期的消费基金的增长率只有 2.6%。

纺织业、家具业和谷物等农林产品的加工业发展相对缓慢。而制造业所需的原材料工业如钢铁、化工和石油加工则发展迅速。这一时期制造业迅速发展的另一特点是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的趋势。1869 年制造业每个单位的平均产值只有 13429 美元，1919 年时达到了 215157 美元，工人的平均数从 1869 年的 9.34 人增加到 1899 年的 20.49 人，再增加到 1919 年的 31.36 人。

除了企业的平均规模增加外，从统计上看，超大型企业控制了制造业的很多部门。1919 年，产值在 120 万美元的企业只占企业

总数的 3.6%，其产值却占这个行业总产值的 67%，所雇佣的工人数则占整个行业工人数的 56%。

企业规模扩大有两个原因。其一，通过合并组成较大的公司可以减少竞争，提高价格，增加利润。其二，技术进步带来的规模经济鼓励了更大公司的出现，以降低生产成本。企业之所以能够获得规模效益主要与生产成本和它们的市场份额有关。从需求方面来看，由市场的扩大带来的需求增加创造了利用新的生产技术和专业化生产的机会；从供给方面来看，是通讯和交通运输的改进。装配线等新技术需要更多的机器和设备，高产出需要充分利用新技术。还有，泰勒科学管理方法的推广减少了劳动成本的增加，最后，那些需要较大规模的工业诸如钢铁、汽车和石油的增长率高于其他行业，而且其生产成本也降低到最低点，从而在整体上扩大了企业的平均规模。一方面，由于技术进步要求更大的工厂设备，规模经济扩大了每一个工厂的规模；另一方面，由于市场的扩大、通讯的改善和管理的进步，企业的规模因为新工厂数量的增加而扩大。

几乎所有工业部门的技术都继续得到改进。以钢铁工业为例，1900 年每一工人平均生产 85 吨钢，到了 1920 年达到了 114 吨。从 1900 到 1914 年，制造业的产出增加了 76%，而工人数只增加了 36%。

尽管制造业在地理上的分布有所变化，但东北部仍占主导。1899—1910 年间，新英格兰和大西洋沿岸中部诸州（the Middle Atlantic states）的劳工数在全美制造业劳工总数的比重从 52.2% 下降到 46.5%。中部东北诸州的比重从 22.8 增加到 26.3，西部和中部西南诸州的比重从 5.9% 增加到 9.1%。这些增幅虽然不大，但却预示着美国未来发展的地理趋势。美国经济区域的划分参见美国经济统计区域地图。

到 1897 年，电力及电力应用技术方面的发明家们诸如爱迪

生、威斯汀豪斯给人类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便利。电力可以非常廉价地输送到遥远的地方，并很容易地变成动力的来源。美国著名经济史学者福克纳曾对电力的发展有过简洁的概括："1897 年以前出现了重大发明，经历了一个世纪的研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普遍开花结果。这 20 年(1897—1919 年)主要是扩展、应用和改进的时期。"

由于电力的广泛应用，工业中每个工人平均所拥有的马力数大为增加，从 1899 年的 2.11 增加到 1919 年 3.24。1909—1919 年间，农业和采矿业人均马力数增加得更快。1899 年，制造业中的动力来源中只有 5%来自电动马达，到 1919 年这个数字增加到 55%，到 1925 年又增加到 73%。

电力的优势是多方面的。一旦电力能够廉价地输送到各地，众多的工厂就不须建在某种动力源的地方。比如，利用水力的工厂必须建在河流旁，利用蒸汽机的工厂最好建在离煤矿不远的地方。现在，这些限制由于电力而不复存在，工厂随处可建。电力特别有助于轻工业的发展，它无需再建立配套的动力工厂。装配线生产也可以称为大规模生产(mass production)，它是本世纪头 20 年一项最著名的技术发明。福特汽车公司是这项技术的先驱者。它的创始者亨利·福特在为《不列颠百科全书》(1926 年第 13 版)撰写的《大规模生产》一文中指出，"大规模生产就是把动力、准确性、经济性、系统性、连续性和高速运转等原则运用到制造一种产品的生产上面……其正常结果就是这样一种生产组织，即用最低的成本，大量生产出按标准化设计：标准化工艺和标准化材料制成的有用商品。"

这种生产方式实际上是 19 世纪最早源于机械业的被称为美国系统(American System)的标准化生产的继续和发展。本世纪初高转速电机的问世，大大提高了机械制造业产品的精确度，标准化生产的水平大为提高。泰勒科学管理法全面分解了工人工作的

各种流程，从而促进了装配线生产技术的改进和完善。电动工具的可移动性使装配线的每一部分都可以有独立操作的工具。到1913年，福特进一步把静止的装配线变为流动的装配线。这样一来，不再需要用人力把产品运给下一道工序的工人，而直接由电动传输带按标准速度运送。生产效率因此提高，成本下降。1909年福特T型车售价950美元，1914年降低到只有400美元。

当然，没有广泛的市场需求，大规模生产是不可能持久的。这一时期，美国的城市化方兴未艾，人口的集中和收入的增加使社会的购买力旺盛，消费者愿意使用标准化的廉价产品，以便把自己的购买力扩大到极限。市场于是为从事大规模生产的制造业提供了繁荣发展的坚实基础。

交通运输的发展

铁路在这一时期达到其辉煌的顶点并开始走下坡路。1906年是美国历史上铁路建设最多的一年，共铺设6262英里铁路。此后，新开工的铁路越来越少。1917年以后放弃的铁路比新建的还要多。此外，铁路货运量的增幅在1906—1916年的10年内减少了60%，客运里程的增幅下降了至少2/3。铁路的竞争对手主要是汽车。大小客车夺走了乘客，卡车则进入了货运市场。1920年后这种竞争尤为激烈。对私营铁路公司的考验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联邦政府认为铁路运输不能满足战时经济的运输需要，遂于1917年12月宣布接管了铁路。到1919年战争结束时，联邦政府才把它还给私人。

铁路加速社会人口的流动，推动了城市化的进程，出现了很多因铁路建设而兴起的铁路城市。但这些城市内的公共交通则主要依靠有轨街车(street rail car)。最初，这些街车由马匹牵引，在马路上铺设的轨道中行驶。90年代初，电车代替了马拉街车，速度也大为提高。最后，有轨电车和轻轨铁路在主要城市中迅速发展，

并通向郊区，大大缩短了城市与郊区的距离，第一次使人们能够在郊区生活，在城里上班。

汽车工业的发展令人眩目。1895年汽车刚发明时，美国全国一共只有4辆，但到了1916年它的数量就超过了500万辆。1919年时汽车工业的投资达10亿美元。它在20年代的增长还要快。规模经济在汽车业最为明显。1903—1926年，一共有181家汽车制造厂商，1926年只有44家还在生产。1914年仅福特公司的产量占全美汽车产量的45%。它的竞争对手通用汽车公司1908年才成立。

汽车业对美国经济影响巨大。福特的装配线技术和通用部件标准化技术不仅被汽车业所采纳，而且被广泛应用到其他工业部门。汽车大大扩展了人们生活的空间距离，加速了人口向郊区移动的速度。它打破了乡村的封闭和隔离，使农民能够容易地相互交往和进入城市。特别是在20年代以后，它刺激了其他工业，尤其是石油工业的发展。它还创造了美国特有的汽车文化，使美国人成为一个生活在汽车轮子上的民族。

此时，美国的水上运输业有兴有衰。沿海和大湖区的运输在扩展，而运河和内河的运输则在收缩。其原因就在于竞争和机会成本的关系。美国的沿海贸易从殖民地时代起就拥有比较优势，一直持续发展。1897年时运输量已达400万吨，1918年上升到600万吨。远距离、大吨位的大湖区的水上运输在价格上比铁路更有优势。1900年时，从芝加哥到纽约的每蒲式耳的水上运费仅及铁路的一半。1910年时大湖区的船队吨位比英国和德国以外的任何国家的船队都大。与大湖区水路不相连的运河和内河运输由于铁路的竞争而衰落。19世纪最重要的伊利运河（The Erie Canal）的运输吨位从1880年的460万吨减少到1906年的240万吨。

与内湖运输蓬勃发展形成对照的是远洋运输的不景气。1898

年美国登记在册的船队吨位只有75万吨左右。1901年时美国对外贸易中美国商船运输的货物只占总货物的8%。美国内战后远洋船队吨位下降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其机会成本太高，利润远不及西部开发；二是外国政府给予其商船队的补贴远高于美国政府支付的补贴。远洋运输船队的短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带来了一些麻烦。美国政府不得不在1917年建立紧急船运公司（the Emergency Fleet Corporation）来建造商船。不过，直到战争结束，第一艘船还尚未建成。战后政府继续推行它的造船计划，这样，到1920年美国的商船队扩大很多。

竞争、垄断与政府干预

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在20世纪最初的20年，美国垄断财团开始控制美国的经济生活。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些大的垄断财团形成之前，美国经济生活中处处可见垄断的现象。在美国全国铁路网建成以前，高昂的运输费用使全国各地的市场相对独立，在这些较小的市场中，不大的企业和公司就可以享受一定的垄断地位。1897年全国铁路网的建成打破了各地市场的封闭状态，扩大了市场的规模，进而形成了现代的全国性市场，从另一个侧面，促进了更广泛的竞争。此外，汽车业的发展，卡车运输的增长，进一步促进了市场的整合与成长，削弱了一些公司对市场的控制权。一些学者常常用某一行业内部企业数量的减少来说明垄断的加强和竞争的衰落。但是，新近的研究表明，这种指标不够完善。与不同行业的产品相互竞争密切相关的跨行业的指标可能更有意义，比如在建筑业中，钢铁、水泥和铝材等建材间的竞争状况。

尽管企业的规模和影响力在1897年以前就开始扩大了，但是1897—1920年间大企业的这种发展最为引人注目。可以说，合并

运动[①] 发轫于19世纪70年代后期，展开于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最终在1897—1904年间达到顶点。随后，势头开始减弱，20年代再次兴盛。

1904年以前，合并主要集中在铁路、重工业和原材料工业。1904—1920年合并更多地在公共事业和新兴工业（汽车、电影和某些化工行业），20年代合并又转向零售业和银行业。比如，美国钢铁公司（U.S. Steel）成立于1901年，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开始于1908年（1916年重组），派拉蒙制片厂（Paramount Studios）建立于1916年。到1903年，工业企业合并的总资产达60亿美元，包括铁路在内的公共事业合并的总资产达200亿美元。到1910年美国的6个财团控制了80%的铁路。这一时期大公司的产生或者是通过控股公司（即建立以购买和控制某一行业的股票为目标的公司），或者是以集中合并（consolidation 即若干个企业合并组成一个较大的新企业）的形式产生的。

促进企业合并的惟一原因是追求更多的利润。不过，对利润的这种追求可以通过两个方面来实现。首先是规模经济。企业通过合并达到较佳规模，从而降低生产成本，增加产出，这对整个社会经济都有好处；其次是确立垄断。企业合并可以减少竞争，由此形成某种垄断，进而维持较高的价格，获得更多的利润。

这一时期的技术进步是导致企业规模扩大的重要原因。新技术的广泛应用使钢铁业和石油加工业都需要更多的投资和更大的规模，火力发电厂的出现也要较大的厂房和设施。全国范围内铁路网和电话网的建成为许多商品带来了全国性的市场。需求因市场扩大而增加，企业便扩大再生产，规模效益非常显著。另外，扩大了的市场也需要相应的销售网络，自然也推动公司规模的扩大。

---

① 合并运动（the combination movement）过去一般译为兼并运动，兼并常常带有大鱼吃小鱼的意思。但从美国经济史来看，不仅有大鱼吃小鱼的现象，也有数个规模相当的公司合并组成一个较大公司的情况。因此，译为合并运动可能更符合美国历史的实际。

泰勒的科学管理法也解决了公司企业扩大所带来的诸种管理方面的问题。证券市场的进一步成熟和投资银行的兴起发展了大公司的融资渠道，获得了资金的保证。铁路在这一方面成为先行者，制造业纷纷效仿。

政府的政策也有助于大企业的兴起。内战后，美国一直维持着高关税，并在 1897 年的丁格利关税法(Dingley Tariff of 1897)中创历史最高水平。高关税提高了进口商品的价格，从而减弱了外国产品的竞争力。美国的专利制度也鼓励垄断的形成，因为它给予专利使用者长达 16 年(需要还可以再延长 16 年)的专用权。以联合制鞋机械公司(The United Shoe Machinery Company)为例，它在 1900 年通过控制 6000 项专利而拥有行业的垄断地位。1890 年西屋(Westinghouse)和通用电气(General Electric)两大电气公司通过分享专利的协议实际上垄断了电气设备制造业。一方面，合并运动在不断发展，另一方面；反对合并垄断的力量也在增长。它指责合并削弱了竞争，造成了垄断，提高了商品的价格，最终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虽然反对合并运动的呼声很高，但仍无法阻止合并的进程。这主要是由于它缺少理性分析，更多的是情绪化的反应，忽视了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企业规模的扩大未必会形成垄断(即控制价格的能力)，因为存在着很多的限制因素，如企业无法控制消费者的需求量，同行业内以及其他行业所生产的替代产品的竞争，为较高利润所吸引的新企业的建立，最后还有公众和政府的抵制和反对。合并可能会减少经济机会，造成小公司数量的锐减，由此出现的财富集中也会影响社会的流动性。但另一方面，大型公司都实现了规模经营，因此它的效益远远高于小企业。后者的存在的确有助于社会的稳定，但却以低效率为代价。

经济史学者哈罗德·福克纳曾把 1897—1917 年的美国经济概括为“自由放任的衰落”(the decline of laissez - faire)。他不仅是指合并运动导致垄断的形成，而且也是指联邦政府对市场甚至是工

商业活动的干预。到 1920 年,政府对经济生活不同领域的调节已成为美国经济当中的既成事实。

铁路是美国经济中最早出现大规模垄断的行业,因此也是政府最早干预的对象。1887 年联邦政府根据国会的《州际贸易法》建立了专门管理铁路公司的州际贸易委员会(the Interstate Commerce Commission, ICC),它的任务就是禁止各种回扣和特殊优惠,保证铁路运费对所有客户“公平合理”。由于铁路公司的反对,加上最高法院作出了一系列不利于该委员会管理铁路的判决,州际贸易委员会在 1897 年时已经是有名无实。但是,在 20 世纪的最初 10 年中,美国国会又通过了一系列的法律来加强州际贸易委员会的权力。到 1920 年,对铁路的调控已经牢牢地建立起来。最高法院也承认了州际贸易委员会确定铁路运输价格的权力,并宣布回扣、短途运输费高于长途运输费等明显的歧视行为非法。

对于州际贸易委员会在管理铁路运输上的作用,美国学者意见不一,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的认为管理得不够,铁路已经形成垄断,而委员会其根据这些垄断公司提出的价格来确定运价已无助于竞争。有的强调,政府的干预妨碍了铁路行业中市场的作用,导致资源配置不当,出现高成本高价格。当 20 年代运输业中出现了汽车以及后来的航空业的竞争后,才改变了这种状况,出现了充分竞争的运输市场。也有人认为,由于铁路运价固定统一,实际上减少了价格上的竞争,州际贸易委员会做了大铁路公司想做的事。同样根据价格固定这一点,有的学者却指出,不许涨价的规定使铁路公司没有足够的利润去维护和更新铁路设备,成为一战中铁路运输问题较大的原因之一,结果联邦政府在 1917 年不得不接管铁路。

如果说《州际贸易法》只是想对铁路这一个行业进行调控的话,那么,1890 年国会通过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the Sherman

Antitrust Act of 1890)则是美国联邦政府全面干预市场的开始。[1]它的提出者约翰·谢尔曼参议员(来自俄亥俄州的共和党人)表示,如果不能够通过这个法律,美国人将发现自己面对"一个控制了一切生产的托拉斯和一个决定了一切生活必需品价格的主人"。福克纳称赞这个法律"是美国政治经济历史上最伟大的里程碑之一"。它实际上宣布了维持市场竞争是美国的基本国策。[2]

《谢尔曼法》共有 7 条,其中最主要的内容是第 1 和第 2 条。第 1 条规定:"以限制各州间或与外国间商业和贸易为目的的一切契约、托拉斯及其他形式的企业联合或阴谋垄断,均属非法。"第 2 条称:"凡垄断、或企图垄断、或与其他人联合或阴谋垄断任何各州间或与外国间商业与贸易的人都将被认定犯有轻罪。"

像美国所有的重要法律一样,《谢尔曼法》在执行过程中常常大打折扣。它并没有能够阻止托拉斯合并运动的势头,在它通过之后,合并运动反而有了更多的发展。一方面是大公司老板根本就不在乎这个法律,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面对国会的有关调查,不屑一顾地说:"在我的记忆中,没有人跟我提起过这个法律。"[3]另一方面是最高法院通过它的判决对《谢尔曼法》作出有利于大公司的解释。《谢尔曼法》执行初期最重要的一个案例是"美国诉 E. C. 奈特公司"(U. S. vs. E. C. Knight Co.)。当时该公司与美国糖业公司合并,从而使后者控制了全国 98% 的砂糖生产能力。最高法院则以 8:1 的票数判决说,这是在宾夕法尼亚一州内制造业的合并,没有涉及州际贸易,因此不受

---

① 托拉斯是英文 trust(信托)的音译。它是一种工商业组合形式,加入这一组合的公司把它们的股权交由一个专门成立的董事会来管理。这个词后来泛指所有有垄断倾向的大规模公司组合。

② H·N·沙伊贝等著:《近百年美国经济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年版,第 279 页。

③ 引自 Robert Heilbroner & Aaron Singer, Th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 1600 to the Present, Third Edition, NY: Harcourt Brace College Publishers, 1994, p 216

《谢尔曼法》的限制。至于这个大公司是否只在宾州一州内销售它的产品,则不关最高法院的事。一位幽默作家讽刺道:《谢尔曼法》“对百姓来说是堵石墙,对于公司律师来说,则是座凯旋门”。

在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任期和他的继任者威廉·塔夫托总统时期,联邦政府加强了反托拉斯的力度,反托拉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1902 年罗斯福命令他的司法部长向摩根财团控制的北方证券公司(Northern Securities Company)开刀,因为这一个控股公司④ 几乎垄断了美国西北部的铁路运输。1904 年联邦法院下令解散这一公司,罗斯福因此赢得了“托拉斯杀手”的美名。他还起诉美孚石油公司(Standard Oil Trust),但这一案件直到 1911 年塔夫脱政府任期才解决。美孚石油公司虽然解散了,但它重组成为一个控股公司,直接控制了受反托拉斯判决影响的 70 多家公司。

由于《谢尔曼法》第 2 条不够明确,在威尔逊政府期间,国会又通过《克莱顿法》(Clayton Act of 1914)对其进行修正和补充,它包括 3 项内容,(1)公司的行为。为排斥竞争对手而进行的地方性的削价、专卖和专租以及其他形式的价格歧视皆属非法;禁止为减少竞争而进行的控股和在相关行业中互兼董事(interlocking Directorates)。(2)补偿措施。个人可以控告公司非法行为造成的损害,而且该公司的董事或经理将对此负责。(3)工会和农民组织不属于政府的反托拉斯范围。美国的反托拉斯法后来又有过多次修正和补充,成为一个相当复杂的法律。历史学家常常争论这一法律的成败得失,经济学家则怀疑这一法律的有效性。但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在本世纪的最初 20 年中,既形成了大的垄断集团和强有力的工会组织,也存在过联邦政府反托拉斯的重要举措。需要注意的是,从长远的历史眼光来看,反托拉斯法最重要的意义是政

④ 控股公司英文为 stock holding company。它是一种金字塔式的公司结构,母公司只要掌握子公司一定比例的股权,就可以获得对它的控制权。子公司也可据此来控制它自己的子公司。在经营管理上,下级公司仍保持相对独立。

府为自己增加了一项新的责任，那就是干预经济生活，保护竞争，反对垄断。美国民主党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甚至认为，如果政府任凭垄断发展，其最终会损害美国的民主制。因此，打破和限制垄断也为美国政治的民主所需要。

联邦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既源于对竞争减少的担忧，也出于对美国金融市场，特别是银行业现状的认识。美国当时的银行业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各州的州立银行，二是根据 1863 年《国民银行法》(National Banking Act)建立的国民银行。后者必须认购相当于其资本数量 1/3 的政府公债，并可以发行相当于公债票面价值的货币。这些银行常常在金融市场上进行投机。当经济紧缩时，银行利率就会下降，公债价格则会上扬，银行于是出售手中的公债以牟利。这样一来，它发行的货币就会减少。货币流通量的减少导致价格的下跌，给经济带来更大的压力。1907 年美国出现了一次由于过度投机引起的金融恐慌，一些国民银行开始拒绝兑付它所发行的纸币，短期贷款利息高达 125%。只是在摩根财团的带领下，一些私人投资银行对市场进行了干预，才避免了金融崩溃。这场恐慌使政府和投资者认识到某种形式的中央银行存在的必要性。

经过几年的研究讨论，1913 年国会通过了《联邦储备法》(Federal Reserve Act)(该法以后又经过多次补充和修正)，建立了联邦储备银行系统，以克服原有银行体系的弱点。这一法律，也反映了自杰克逊总统 1832 年否决美国第二银行以来美国人反对建立一个中央银行的政治哲学。它没有建立一个中央银行，而是把全国划分成 12 个经济区域，在区域的中心城市各建一个联邦储备银行。它也只要求国民银行加入这一系统，办法是认购其所在地联邦储备银行的资本股份，所购额度应为该行资本和盈余的 6%。各州的银行则有权选择是否加入。到 1917 年时，只有 37 个州的银行加入到联邦储备系统。

12 个联邦储备银行的建立表明,美国人开始认识到至少在经济上美国是由几个大的区域而非各个州组成的联合体。联邦储备银行的管理委员会成员(一般通称联邦储备委员会,简称美联储,Board of Governors)由总统任命并经参议院批准,因而在政治上拥有相当的权威。尽管对于联邦储备银行应该如何发挥作用以及它的成效如何存在着种种争议,但是几乎没有人否认,美国需要有一个这样的银行来调节货币的供给关系并在危急关头作为最后的借贷者来保护银行体系。虽然在它的初创时期,联邦储备银行的作用不是非常明显,但是,随着美国经济在国内外的迅猛发展,它最终演变成为联邦政府控制美国商业银行行为,调控宏观经济的重要工具。

第二章　从20年代的经济繁荣到30年代的大萧条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20年代通常被称为"正常年代。"这一时期经济空前繁荣，于是20年代又成为繁荣的代名词。引导这次经济繁荣的是汽车业，美国人开始创造出一种在汽车轮子上的生活方式。第一次世界大战也使美国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金融大国，美国人开始初尝作为世界经济领袖的滋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20年代的繁荣是继1921年的衰退而来，并伴随着1929年的股票市场的崩溃而结束。这次股票崩盘成为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的序曲。

战后初期的泡沫经济和短暂萧条

一战结束后，美国经历了一个从战时经济恢复到正常生产的短暂的调整期。随后，美国经济开始继续扩展。庞大的政府开支刺激了市场，它需要支付退伍军人巨额的复员费，并要继续战时开始的商船队建造计划。出口需求非常旺盛，因为欧洲尚在战后恢复时期，需要大量的美国农产品和工业品。国内需求同样旺盛，1917—1918年间，因美国参战而被压制的购买力一下子爆发出来。老百姓通过战时储蓄和购买政府公债积累了不少的钱。在供给方面也是同样的情形，受战时影响的基本建设（房地产、工业设备的投资）重新活跃起来。货币的供应量不断增加。

需求的持续扩大和供给的相对不足引发了通货膨胀，几乎在

所有的领域内都出现了投机浪潮。商品价格的增长超过了囤积商品所要付出的利息,因此工商企业的采购活动往往不是为了正常的商业利润,而是为了囤积居奇,牟取暴利。20年代的商品库存超过了正常的商业需要。这种投机活动不仅进一步增加了需求,而且使整个经济更容易受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

到了1920年底,政府的军费开支减少了,商船队的建造也完成了,战时的合同不再有效。美国的出口由于欧洲重建的结束而下降,投机所出现的泡沫经济破灭了。1920年底,经济开始紧缩,次年便出现了短暂但却严重的萧条。国民总产值下降了6%,失业率上升到12%,几乎有50万人失业。1921年底,工业生产指数从1919年9月的最高点下降了18%。经济紧缩最明显的标志是价格的猛跌,商品的批发价指数从1920年的227跌到1921年的150(1913年为100)。

农产品价格几乎降到了战前的水平。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农业中的竞争非常激烈,而农民无论作为个体还是作为集体,都不能减少生产来减缓价格的下跌。战时和战后初期的需求导致农业生产过度,超出了实际的需求。此外,美国对欧洲的农产品出口遇到了澳大利亚和阿根廷等国的竞争。

1921年的萧条非常短暂。因对消费品和投资的基本需求仍很旺盛,美国经济在1922年初重现扩张的活力,并且一直持续到1929年。国民总产值从1921年的695亿美元增加到1929年的1031亿美元,失业率则从1921的11.7%下降到1929年的3.2%。物价水平变化不大,从1921年的53.6(1967年为100)降低到51.3。

汽车业在20年代经济繁荣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由于汽车生产成本的降低以及分期付款的盛行,越来越多的人购买了汽车。1920年,26%的美国家庭拥有汽车,10年后,这个数字上升到60%。1921年,美国制造了150万辆载人客车,而登记在册的汽

车已达1050万辆。到1929年,这两个数字分别增加了300%,上升到450万辆和2670万辆。当时汽车工业的产值已占到整个美国制造业产值的13%,它所雇佣的工人占整个制造业工人的7%。

汽车的普及所带来的直接和间接的影响有力地推动了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其作用将像铁路在1865—1893年间起的作用一样。它带动了上游工业(创建了汽车的修理和服务业、石油加工业、公路建设)和下游工业(为汽车制造提供原材料的行业如钢铁和橡胶业)同步发展。

很难确切估计汽车工业对整个美国经济的深刻影响。它推动了地方和州政府的公路建设计划,甚至联邦政府也开始考虑全国高速公路网的建设;它带来了一项新的服务业:汽油零售业。私人汽车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方式,越来越多的家庭从市区搬到了郊外,创建了一种新的社区生活。

除了汽车外,这一时期其他耐用消费品的生产也蓬勃发展。它们包括收音机、冰箱、洗衣机和其他电气产品。电气产品的普及又促进了电力工业的进一步发展。10年间拥有电气产品的美国家庭翻了1倍,从35%增加到68%。洗衣机的拥有量则翻了3倍,从8%增加到24%。拥有抽水马桶的家庭从20%发展到51%。

居民购买力的提高,生产效率的改善所带来的电气产品价格的下降,食品消费在家庭开支中比重的减少,都推动了这一时期旺盛的需求。另外,分期付款的消费方式开始从购买汽车推广到其他的耐用消费品。1925年这种信用消费估计在47亿美元,1929年则达到了71亿美元。1929年时,消费者购买的食品以外商品,15%是信用消费。

这种超前消费所维持的较高的消费水平有其内在的弱点,会给商业活动带来额外的不稳定因素。只要收入稳定增长,人们对未来充满信心,消费扩展就会继续。但是,一旦收入减少,或者对

未来经济前途失去信心，消费者的购买力就会锐减，他们不得不偿付累积下来的消费信贷，而无钱进行新的消费。

建筑业是另一个欣欣向荣的产业，甚至没有受到1921年萧条的影响。1919—1925年间，有120个城市的建筑业产值增加了300%。1926年，整个建筑业的产值达到了126亿美元，其中54亿美元是住宅建筑。地方、州和联邦三级政府加大了公路建设的力度，到1929年，公路建设占了整个建筑业的7%。

1922—1929年的经济繁荣一方面是是旺盛的需求（消费、投资和建筑）促成的，另一方面也是劳动生产率（每个单位劳动力的产出）和资本生产率（每个单位资本的产出）持续提高的结果。

制造业的生产指数从1921年的100增加到1929年的188。人均国民产值从1921年的375美元（以1913年的美元币值）增加到1929年的500美元。每个劳动力每小时的产值增加了28%。1919—1929年10年间，劳动生产率一直以2%的速度提高。而在制造业，则达到了5.6%的惊人速度。

劳动生产率，特别是制造业中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生产过程中电力的普遍使用。其次是装配线和批量生产技术得到广泛应用。再次是科学的发现和发明迅速地被应用于生产，尤以化工业最为突出。最后是泰勒科学管理方法的普遍推广，使许多生产者无需扩大企业规模就可提高产出。此外，战时移民的减少和战后新移民法对外来移民的限制进一步刺激劳动生产率，特别是非技术工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这些促进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因素都是密切相关的，某一领域的变化可以为另一领域效率的提高提供机会。动力系统的改进和电动马达的使用极大地促进了装配线技术的普及，后者则推动新的管理技术的发展，而消费者不断扩大的需求又为大批量的产品提供了市场。当产出和市场同时扩大时，生产和销售的专业化程度便得以提高。

那么,什么人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中获益呢?因为这直接涉及到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原因,因此很有探讨的意义。1921—1929年间,价格指数只有轻微下跌,因此消费者获益不多;20年代雇员的实际收入增加了30%,但这不能完全归功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1921年以后高就业、普遍加班、物价微跌也是其中的原因。考虑到同期劳动生产率提高了40%,显然,生产者并没有让雇员和消费者充分分享生产率提高带来的利益。

由于生产者对未来的预期很好,大量的利润被用来进行新的投资,因此20年代的投资水平一直很高。但这也不能说明收入分配不均所造成的"消费不足"是20年代繁荣崩溃的原因这一观点。因为耐用消费品的普及和房屋建设的扩大远非"消费不足"可以解释的。1925—1929年消费品生产的增长仍像20年代上半期一样强劲。

在20年代,并不是所有的行业都欣欣向荣,某些产业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它们包括农业、煤矿、铁路和新英格兰的纺织业。

1897—1920年的农业繁荣在1921年的萧条中结束,并且再也没有恢复过来。战时膨胀的农业生产能力和战后缩小的国际市场给农民带来很大的困难。他们不能像制造商那样根据市场的变动来调整自己的生产。恰恰相反,在农产品价格下跌时,农民为了保持总收入,往往更加辛勤地劳作,增加产量。这样一来,反而加重供过于求的情况。衡量农民状况的一个指数是农产品的价格和农用产品的价格比。以1910—1914年为100的话,1921年时这个指数下跌到80,也就是说1921年时农民每1美元的产出只相当于他们在1910—1914年时0.8美元的购买力。整个20年代,这个指数从未达到过100。农业的不景气导致农场价值的下跌。由于农民一般把所有的积蓄都投入到农场中,因此这种下跌对农民来说是致命的打击　1920年农业固定资产是780亿美元,1927年下跌到560亿美元。1921年经济萧条时的农业固定资产只相

当于1910—1914年的57%。1920年农民的毛收入指数是209(1910—1914年为100),1921年狂跌到39,虽然后来有所上升,但在1929年仍然只有82。

煤炭业也没有能分享20年代的繁荣。除了1926年以外,整个20年代的煤炭价格从来没有超过1920年的价格水平。1920年每一短吨的煤价是3.75美元,1929年只卖到1.78美元。就业人数从63.9万下降到50.28万。在全国劳动力市场中的比重从2.6%萎缩到1.2%。煤炭业的萎缩主要是供过于求。由于采矿成本较低,小煤矿很容易生存,因此产量很难控制住。加上,电力和燃油开始与煤炭竞争燃料市场。

在1916年以后,铁路总的营运里程数就开始减少。20年代尽管对铁路的投资有较大的增加,从1920年的198亿美元增加到1929年的255亿美元,但客运的营运收入却从13亿美元减少到9亿美元,好在货运收入有所增加,弥补了客运收入的减少。投资的增加,以及效率的相应提高,减少了铁路行业的就业人数,从1920年的200万减到1929年的170万。铁路在美国经济中地位的相对衰落,一方面是由于汽车等新兴交通工具的竞争,另一方面则是州际贸易委员会对铁路控制得过多,管理过死的结果。

纺织业在20年代的情况也不妙。1923年棉花和羊毛制品的产值达到了顶点,为39亿美元,1929年减到36亿美元。产值的下跌主要是价格下跌造成的,实际产量是增加的。1921年的产量指数是64,1929年则是100。像农业和煤炭业一样,纺织业是夕阳工业,竞争激烈,它迅速增长的时期已经过去。为了保持竞争力,新英格兰的纺织业开始向北卡罗莱纳、弗吉尼亚、乔治亚等南方州转移,以利用那里的廉价劳力和丰富的棉花资源。

一战后美国的国际收支地位大为改观。1919年时美国私人拥有的海外净资产大约为30亿美元。政府还拥有96亿美元的债权,主要是协约国欠美国的贷款。为了偿付这些贷款,协约国则向

战败国索要巨额赔款。1921—1925年间，德国需要向协约国每年支付3.75亿美元的赔款，此后，每年要支付9亿美元。

美国的国际收支表　(10亿美元为单位)

	1914	1919	1929
私人资产			
证券	0.9	2.6	7.9
直接投资	2.6	3.9	7.6
短期贷款	-	0.5	1.6
	……	……	……
合计	3.5	7.0	17.1
债权			
证券	5.4	1.6	4.3
直接投资	1.3	0.9	1.4
缴没财产和证券	-	0.7	0.2
短期贷款	0.5	0.8	3.1
……		……	……
合计	7.2	4.0	9.0
私人持有的净资产	-3.7	3.0	8.1
政府持有的净资产	DD	9.6	11.7
……		……	……
合计	-3.7	12.6	19.8

Cleona Lewis, America's Stake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e), 1938, pp.447～450

对协约国来说，尝还美国贷款的办法是向美国出口货物和提供服务。但美国的高关税使欧洲很难增加其对美国的出口。同时，美国对欧洲的出口却没有减少。美国与欧洲的无形贸易也继续处于顺差的地位，美国人在欧洲各种投资的回报远远超过了美国人在欧洲的旅游支出。协约国对德国也采取了类似的政策，结果德国根本不可能获得足够的贸易盈余来支付赔款。

当时曾有人建议美国和协约国同时取消后者欠美国的战时债

务和德国欠协约国的赔款。早在1921年英国就意识到战债和赔款问题的复杂性，表示愿意取消德国的赔款和其他协约国对它的欠款，如果美国也取消英国欠它的战债的话。但美国坚持要协约国偿付战债。1924年道威斯计划执行后，德国的赔款数目减少，美国同意把协约国所欠的战债利息从5%调低到3%，并减免了英国30%、意大利70%的战债。但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实际上，在美国处于贸易顺差国地位的情况下，美国公司和私人也很难获得它们在欧洲各种投资的全部回报。

为了使欧洲有偿还能力，美国加强了它在欧洲的投资。1919年到1929年10年间，美国私人的海外净资产从30亿美元跃到了81亿美元。他们的直接投资从39亿美元增加到76亿美元，证券方面的投资增加得更快，从26亿美元增加到79亿美元。德国吸纳了大部分的美国投资。德国利用美国的私人投资来偿付赔款，协约国则用这赔款来还美国的战债，因此，国际上的债务关系并未改变，只是在政府间的债务关系中增加了私人资本的因素，转为私人债务。

只要这种关系能够增加生产能力，进而偿付外来投资，它并不会威胁到国际经济的稳定。但是，美国的很多证券投资并没有用于生产目的，投资商更多想的是如何从证券价格的波动中获益。直接投资要比证券投资更有积极的意义，它主要是由大公司进行的，为美国生产原料和半制成品，以及跳过很多国家的关税壁垒。

从1928年中期开始，华尔街的美国公司的证券价格上扬，相比之下，很多的海外投资获益甚微，美国人对海外证券的投资开始减少。不过，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掩盖了证券投资的减少。随着1929年6月的紧缩和10月股票市场的崩溃，美国的海外投资以及从欧洲的进口锐减，不仅原来的资本流动不复存在，而且私人债务的国际偿付手段也严重受损。

30 年代的大萧条

20 年代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上市股票价格节节攀高，整个社会出现了炒股的热潮。上市股票的总值从 1923 年的 40 亿美元飚升到 1929 年初的 67 亿美元。股票价格上升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公司利润的增加，1916—1925 年间大型工业制造公司每年的利润总计在 7.3 亿美元左右，1926—1929 年则上升到 14 亿美元。1920 年到 1929 年间公司的利润实际上翻 3 倍。利润的增加自然加强了股民对红利的预期，10 年间红利也的确翻了 3 倍，股民们为此更加积极地投身于股市。

其次，银行和证券公司一再鼓动人们购买股票，并向他们提供资金。从 1920 年到 1928 年，证券公司借给股民的贷款从 10 亿美元增加到 60 亿美元，通常相当于股民购买股票资金的一半。几乎没有人能够抵制这种通过贷款购买股票来发财致富的诱惑。股民人数创历史最高，多达 150 万，28% 的美国家庭拥有股票。1923 年纽约证交所的交易数是 2.36 亿股，1928 年达到了 11 亿股。

最后，社会上存在着购买股票定会赚钱的心态和诱惑。许多人购买股票是因为他们听信了他们所信任的人。1928 年通用汽车公司的一位经理在《太太居家杂志》发表了“人人都能致富”的文章，指出：“如果一个人一周攒 15 元钱，然后投资股票，20 年后他至少能挣 8 万元，每个月都能从投资中获得 400 元。”纽约市的一块广告牌提醒着来往的行人：“你应该在 30 岁时有 1 万美元；在 40 岁时有 2.5 万美元；50 岁时有 5 万美元。”

当股民沉醉于发财美梦时，在没有任何迹象的情况下，1929 年 10 月 24 日股市突然下跌。抛售股票的人远远多于想购买的人。一直受股民欢迎的 Montgomery Ward 股，开盘价是每股 83 美元，到中午便跌到 50 美元，通用电气的股票从 315 点跌到 283 点。这一天的交易额是 12894650 股。面对股市的恐慌，华尔街的

银行家赶忙商议救市，宣传"股市情况良好。"26日胡佛总统也表示，"国家的基本商业活动商品的生产和流通有着结实和繁荣的基础。"但是，这些都无法制止股市在29日的最后崩溃。《纽约时报》以极简单的通栏标题报道了这次股灾："股市崩盘：一天内16410030股易手。"50种主要股票的价格下泻了40%。

这场股灾只不过是整个经济衰退的一个开端。衰退一直持续到30年代初，股票价格也在1933年7月跌到了低谷。亲身经历了这场灾难的纽约花旗银行前总裁范德里普写到："1929年9月1日纽约证券交易所股票的市价是89668276854美元，到了1932年7月1日，仅为15，633479577美元。股民整整损失了740亿美元。这相当于每个美国人损失了616美元，大概3倍于美国参加一战的费用。在股市泡沫破灭的时候，所有股票的价格仅相当于1929年9月1日价格的17%。不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世界其他地方，从未有过如此巨大的票面价值的损失。"[①]

纽约股市的崩溃与当时已经出现的经济萧条密切相关。在股灾发生之前，经济已经开始紧缩。到1929年2月对汽车和一般工业品的需求开始减少。该买汽车的人大都买了汽车，他们尚无更新换代的要求。住宅建设和商用建设分别在1926年和1927年达到了顶峰，到1929年6月已经明显地供大于求。与此同时，纽约的股市却急速攀高。《纽约时报》工业平均指数从1928年初的245点涨到1929年9月3日的452点，完全背离了实际的收益，因此股市下跌在所难免。由于人们通常把股市看作是经济好坏的晴雨表，股市的崩溃必然从心理上严重地打击了人们对未来投资的信心，从而使发展中的经济衰退极大地恶化了。

股灾的另一个结果是进一步减少了可以用来进行生产投资的资本。股票交易所的主要功能是减低公司获得资本的成本，现在

① Saturday Evening Post, Nov 5, 1932, pp 3~4

这一功能因为股市的持续下跌，无人问津而难以发挥作用。股灾还直接影响到消费市场。股民财富的突然减少削弱了他们的购买力，大大减少了消费。股灾也对美国的国际收支产生影响。美国的海外投资在1929年初已开始下降，股灾之后海外投资实际上停止了。没有了美国的投资，德国就无法支付赔款，协约国也就无法偿还美国的战债。国际贸易和投资随即萎缩，美国的出口从1929年的52亿美元减少到1932年的6亿美元，进口则从44亿美元下降到13亿美元。

大萧条

30年代的大萧条不仅与20年代的繁荣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而且就萧条的规模、深刻程度和持续时间而言，在美国历史上也是空前绝后的。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从1929年的1044亿美元下跌到1933年的556亿美元。即便是剔除价格变化的因素，美国的实际产出也下降了25%，直到1937年美国的经济才恢复到1929年的水平，失业率从1929年的3.2%上升到1933年的25%。此外，1933年时至少还有25%的劳动力处于部分就业的状况。甚至在美国1941年底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失业率仍高达10%。

私人投资是市场经济的主要动力之一。投资额的多少直接决定了生产能力的提高和产出的增加。大萧条也由投资的急剧减少体现出来：1929年为83亿美元，1933年仅为56亿美元。30年代中有7年的时间投资实际上处于负增长，这意味着不仅没有扩大再生产，而且连更新设备的投入都没有。（参见附表）

1929—1939 年的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及其他相关指标

（10 亿美元单位）

	国民生产总值	个人消费	私人国内投资
1929	103.1	77.2	16.2
1930	90.4	69.9	10.1
1931	75.8	60.5	5.6
1932	58.0	48.6	1.0
1933	55.6	45.8	1.4
1934	65.1	51.3	3.3
1935	72.2	55.7	6.4
1936	82.5	61.9	8.5
1937	97.4	66.5	11.8
1938	84.7	63.9	6.5
1939	90.5	66.8	9.3

U 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lonial Times to 1970, Part 1 (Washington, D 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5), Tables, F32, F48, F52, pp 228～229.

经济学家对于大萧条的原因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解释。不过，一些基本的原因无需经济学的理论也能够理解。首先，20 年代的金融商业活动存在着致命的弱点。迅速致富的思想不仅影响着普通的股民，而且也控制了工商界。金融操纵、股票投机和草率经营是这一时期商业活动的一大特点。这些活动导致层层控股的金字塔结构，结果只要其中的一部分出现了问题，整个结构就会坍塌。以芝加哥的金融家英索尔控制的一家巨型公用事业公司为例，此人在下属各级各类公司中拥有 65 个董事长、85 个经理和 7 个总裁的位置。在银行业中，银行不仅贷款给股民炒股，而且更糟的

是，一些银行自身也从事股票投机。因此一旦股市崩溃，贷款就无法收回，银行资本也损失殆尽。到1932年，已有4835家银行倒闭，储户损失惨重。1929—1933年间，储户损失了900亿美元，更有无数的商号因此而破产。

其次，广大的农村一直困难重重。20年代在美国3000万家庭中有700万生活在乡村。90%的农庄没有冰箱和其他电气产品，有的甚至没有电灯。与城市工人的收入相比，农民变得越来越穷。1910年农民的平均收入相当于工人的40%，1930年时则不到30%。1919年农民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16%，1929年则只有9%。因还不起抵押贷款，越来越多的农民沦为佃农，1929年时，10个农民中有4个是佃农。贫穷的农村自然无法为工业品提供广阔的市场。

第三，工资和利润的严重分配不均。20年代工人的工资有所增长，但远不如公司利润的增长。据统计，20年代一个家庭维持基本的生活水准需要每年收入2000美元，但当时60%的美国家庭的收入达不到这个数字。贫富的差距极为严重，1.5万个收入在10万美元以上的家庭的收入总和超过了其他五六百万处于社会底层的家庭收入总和。1929年时，80%的美国家庭(大约是215万个)没有任何储蓄，而最富有的2.3%的美国家庭则拥有全国总储蓄的2/3。收入的分配有着重要的经济意义。钱到了普通百姓家，他们就会购买能够刺激工业生产的生活必需品，而到了富人手中，却会用来购买奢侈品和进行投资。

最富有的人在美国国民收入中的份额

	占人口1%的富人	占人口5%的富人
1919	12.21	24.27
1923	13.08	27.05
1929	18.92	33.49

partment of Commerce,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lonial Times to

1970, Part 1 (Washington, D. 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5), Tables G～341, G～342, p.302

总之,在20年代繁荣表象背后存在着很多不稳定的因素。在一定程度上,繁荣是建立在投机、信贷消费和开支不当的基础上的。

经济学家至今对大萧条的原因没有达成一致的看法。其中凯恩斯的理论得到了较多的注意。在他看来,没有人花钱就意味着老板没法赚钱,雇员收入减少,因此市场经济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开支,它是推动就业和收入的关键。在开支中,又分成消费开支和企业投资。除非消费者的收入大起大落,消费开支一般比较稳定。但企业的投资却不同。公司是否建立新的工厂或更新设备,并不完全取决于目前的收入状况,而是考虑到未来的销售前景。如果一个企业对未来的预期很好,即使目前的收入不高,它也可能投资扩大再生产。同样,即使目前的销售良好,但是如果预计未来情况不妙,它就可能减少投资。

根据这一理论,如果某一国民经济的开支不足以维持较高的就业或收入水平的话,就会导致萧条。从经济统计的数据来看,30年代的大萧条印证了这一理论。股灾导致企业界对未来失去了信心,减少甚至是停止了扩大生产的投资。1929—1933年间,各种投资实际上锐减了88%,有1/3的失业是由主要的工业部门生产萎缩造成的。失业率的提高以及在岗工人工资的下跌直接导致消费的减少。反过来,社会消费的减少又迫使生产销售服装、食品和其他生活用品的厂家解雇员工、降低工资。因此,投资的锐减造成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在传统的经济理论中,市场最终能够摆脱萧条,这不仅仅是因为企业界会恢复对未来的信心,而且市场本身会生产出重新扩展的动力。在经济紧缩时,投资减少,未动用的银行储蓄就会增加,

银行不得不降低利率,企业界为低利率所吸引,就会贷款进行投资,市场又开始活跃起来,进行新一轮的扩展。因此,当时的胡佛政府虽然采取了一定的反萧条政策,但基本上还是寄希望于市场自身的恢复作用。

但凯恩斯对这一传统理论持怀疑态度。在他看来,在萧条持续发展时,将不会有多少没有动用的储蓄。相反,当经济陷入低谷时,储蓄会和投资一起减少。而且,只要企业界对未来没有信心,即便利率下调,他们也不会进行投资。经济因此处于一种缺乏内在动力的困境中,尽管存在着大量失业的工人和开工不足的企业和设备。凯恩斯理论的自然结果是,要摆脱危机克服萧条光靠市场是不够的,必须要靠外来的力量——这就是政府的干预。只有通过政府扩大开支,才能重新启动市场,挽救整个经济。1933 年上任的民主党人富兰克林·罗斯福政府实行的新政改革大体上符合这一思路。

第三章　罗斯福新政和战争

1933年3月4日前纽约州州长罗斯福就任美国总统。他在就职讲话中表示:"我向你们保证,我向我自己保证,为美国人民实行新政。"他的许诺得到了美国选民的积极响应,白宫收到了4.5万份支持电函。

美国的确需要一个新政。在罗斯福就任总统的前4个月,美国经济更加恶化,每天都有银行倒闭。罗斯福在就任的最初100天(3月9日~6月16日),雷厉风行,推动国会通过了20项重要的新政经济立法。新政史专家小施莱辛格写到:"这些都是美国历史上全新的观念和方案"。其主要目的有三个:救济、恢复和改革。救济和恢复的目的是把美国人民从萧条的灾难中拯救出来,过上正常的生活。改革的目的是通过国家的力量来补救私人市场经济的缺陷。

新政一直延续到1941年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止。在此期间,根据新政重点的不同,又可以区分为第一期新政(1933—1934年)和第二期新政(1935年以后)。在第一期新政期间,政府试图通过与私人企业的密切合作来恢复经济,其办法是刺激物价上涨以增加利润,并以提高工资的形式增加消费者的购买力来促进经济恢复。在第二期新政期间,政府转向长期干预和改革,其重点是把购买力集中到工薪阶层,并且通过社会保险来最低限度地保证他们的经济安全。

新政措施

罗斯福上台后面对的首要问题是金融危机。甚至在国会召开紧急会议之前，他就通过行政命令下令全国银行“放假”。他的助手在5天内准备好《紧急银行法》，因此3月9日国会紧急开会时，就能够迅速通过这一法律，批准罗斯福已经采取的让全国银行暂时歇业的行动。《紧急银行法》明确授予总统控制黄金和货币流动的全权，规定囤积黄金非法，禁止发行新的联邦储备银行行券，建立银行重新开业以及重组的程序。几天后，美国人又从收音机中聆听了罗斯福总统语调亲切的“炉边谈话”(fireside chat)，他用人人都能听懂的语言描述了美国银行的结构，保证即将重新开业的银行安全可靠。他的谈话稳定了人心，银行重新开业时没有再出现挤兑的现象。到3月份结束时，有12.5亿美元重新回到了银行。罗斯福的一位新政智囊不无夸张地说：“资本主义在8天得到了挽救”。[①]

为了保证储户的利益，罗斯福又通过新的立法建立了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提供存款保险，把投资银行与商业银行分开，让联邦储备银行的保险部门与总行脱离，扩大联邦储备银行委员会的权力。新政的金融立法大大加强了联邦政府控制经济的权力，改善了对银行的监督，结束了储户一遇金融危机便向银行挤兑的传统习惯，缓和了公众对银行和银行家怀疑和敌视的态度。在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恩看来，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是最重要的一项新政金融立法，在美国历史上政府第一次担当起最后还款者的责任。没有其他任何稳定金融和安定民心的政府措施比它更有影响。

与银行重组密切相关的是，罗斯福决心遏制证券市场上的金融舞弊和混乱。他在1933年3月29日写信给国会说：“我们所寻

① Raymond Moley, After Seven Years (1939), p.155

求的是恢复对一项古老真理的更为明确的理解：那些管理银行、公司和其他处理或使用他人金钱的人是为他人工作的受托人。”[②]在国会立法授权下，证券交易委员会建立起来，它的广泛的权力包括监督证券发行，要求证券商必须公开所有发行证券的真实情况，并派代表监督股票交易。虽然不能说紧急银行法、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和证券交易委员会解决了美国银行体系的全部问题，阻止了未来的金融舞弊，但这些立法和《公用事业公司法》(Public Utility Holding Company Act)一起，阻止了过去那种金字塔式公用事业公司的形成，有效地去除了造成金融危机的最糟糕的因素。

尽管罗斯福政府比它的前任更努力地与失业进行斗争，改善失业者的生活，但总的来说，在失业的问题上，新政没有取得完全的成功。这在一定程度上与罗斯福的指导思想有关，他是政府预算平衡理论坚定的信奉者，因此不愿意过度扩大政府开支，造成财政赤字。1933 年 4 月 5 日，罗斯福创建了民间保护资源团，为 18～25 岁的青年提供植树造林和环境保护的工作。大约有 250 万青年人参加了这一工作，他们穿着深绿色的统一制服，植树 2 亿株，不仅美化了环境，而且还有助于防止水土流失。接着，罗斯福在 5 月份又建立了由其最得力的亲密助手哈里·霍普金斯领导的联邦紧急救济署。该署有 5 亿美元的资金可以拨给州和地方的救济机构。但霍普金斯说服罗斯福相信，能够恢复失业者信心的是工作而不是救济款。为此，罗斯福批准了大规模的民用工程建筑计划，用以工代赈的形式组织工人修建公路、学校、体育场和飞机场等公用设施。它为 400 万人提供了工作的机会，耗资 9.5 亿美元。由于开支庞大，1934 年底罗斯福停止了这一计划。不过，霍普金斯在 1935 年又说服罗斯福建立了工程发展署。到 1943 年，该署先后雇佣了 850 万名工人，总共开支 110 亿美元。

---

② The Public Papers and Addresses of Franklin D Roosevelt (1938), 2: 11ff

考虑到当时美国人还没有放弃自由放任的传统市场哲学，这些计划的实施严重偏离了政府的传统角色，可以说是一项相当大胆的尝试。不过，当时对这些计划的反对声音并不多，和罗斯福一样，美国人也知道，舍此之外别无他途。人们已经无法再忍受长期的失业和漫长的萧条。

新政的工业政策主要体现在1933年的《国家工业复兴法》(National Industrial Recovery Act)和它的执行机构国家复兴署上。该法的目的是通过工商业的自行调整、减少生产过剩、增加工人工资、缩短劳动时间和提高物价来促进工业的复兴。为此目的，它授权总统可以动用33亿美元的巨额资金来资助公共工程的建设。这一法律的影响非常明显，它开创了政府规范最低工资和工作时间的先例，建立了一系列控制物价和过度竞争的公平竞争法规。罗斯福政府希望通过这一内容广泛的法律，一方面避免同一行业内部厂家间的自相残杀，推动停滞不前的工业生产，另一方面确定新的劳资关系，把罢工及罢工威胁降低到最低限度。

《国家工业复兴法》没能获得圆满的成功。它保护劳工的努力和限制竞争的做法得罪了很多人，带来了不少的法律诉讼。1935年5月，最高法院在谢科特诉美国一案中，一致判决国会把制订工业法规的权力转移给总统违反美国宪法，因此该法无效。虽然国家复兴署只存在了两年，但它在很多领域内恢复了正常的市场秩序，而它保护劳工的内容在随后新的立法(《公平劳动标准法》Fair Labor Standards Act)中得以继续有效。1935年国会又通过了保护工人集体谈判权和组织工会权的《瓦格纳法》(Wagner Act of 1935)。罗斯福的传记作者伯恩斯指出，该法“是新政期间通过的最激进的立法”，因为它帮助建立起“强有力的工会，它为以后的自由派同盟提供了选票、金钱和组织”。为执行《瓦格纳法》，联邦政府建立了国家劳工关系局，其任务是负责工会选举和解决纠纷。

工会会员数从1932年的32万增加到1938年的83万。[3]

新政农业政策的主要目的是恢复农民的购买力和他们在本世纪最初20年享有的经济地位。其办法一方面是提高农产品的价格,另一方面是调整农业生产以适应市场的需要。1933年的《农业调整法》(Agricultural Adjustment Act)就是要保证农民采取统一行动来限制产量,推动农产品价格的上扬。

在农业调整署的统一领导下,农民确定各种作物的减耕面积和家畜的减产数量,政府则给予相应的补尝。另外,政府还帮助农民建立更有效的农产品营销体系,适应市场的变化。由于该法通过时,很多农产品已丰收在望,农业调整署为向农民说明减产保价的重要性,毁掉了1000万英亩的作物,屠宰600万头猪崽和20万头怀孕的母猪,政府则支付1亿美元作为补偿。美国政府采取这一行动时,其国内有数百万失业者正在忍饥挨饿,处于营养不良的状态! 政府对退耕毁耕减产的补偿来自农产品的加工税。农业调整署希望通过产量的减少和税收的增加来提高农产品的价格。

不过,1933年的农业产出并没有比1932年减少多少。良好的年景,肥料使用的增加,耕作最肥沃的土地以及对限耕面积的突破,导致农业产出居高不下。但随后几年情况有些好转。农产品和农用物资的价格比从1933年的55增加到1936年的73,这意味着农产品的价格要比农用物资的价格上升得更快。

1936年最高法院以滥用征税权宣布《农业调整法》违宪。但罗斯福在再次当选为总统后,又促使国会在1938年通过第二个《农业调整法》,它所确立的调整农业生产的机制在经过若干补充修正后一直延续至今。政府旨在通过控制农产品和农用物资的价格比来增加农产品的购买力。据此,只要某种作物的2/3生产者同意,就可确定产量限额和价格。如果市场价格跌破了既定价格,

---

③ James MacGregor Burns, Roosevelt: The lion and the Fox (1956), pp 218-219

农民就可以按既定的价格把农产品卖给政府。如果农业产出超出了规定的限额，每英亩的补贴就会减少。

福克纳曾精辟地概括了新政农业的特点和影响。首先，农业方面实行的经济计划比其他任何经济领域都更为深入。其次，这一计划是以牺牲消费者的利益来实现的。“农业已成为一个受偏爱的行业，由纳税人和消费者来付帐”。第三，政府及其代理机构成为农业金融的主宰，控制了全国农业中一半的长期债务。[④]

对美国农村，特别是对落后的田纳西河流域来说，另一个极有意义的新政项目是1935年建立的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它以建造水坝和发电站等水力工程为龙头，形成了洪水控制、水力发电、水土保持、植树造林和化肥生产等综合开发和全面服务的区域经济体系，彻底改变了这一地区一穷二白的面貌，成为新政中最持久的一项成果。依靠它所提供的充足而廉价的电力，联邦政府又建立了农村电气化局，负责农村的电力普及。由于它的努力，农场的电气化率从1935年以前的10%上升到1950年的90%，极大地改变了农村的生活。

新政的另一个重大成就是联邦政府承担起社会保障的责任。1935年8月15日罗斯福在签署《社会保障法》(Social Security Act of 1935)时意味深长地指出：“即使参众两院在这漫长和艰辛的会议期间只是通过了这一个法律，这次会议也将永垂史册”。[①]这一法律建立起全国范围的老人保障体制。一旦工人年届65岁，他们就将获得一定的退休金，此款来自对他们工资和雇主的课税。它也建立了联邦和州的失业保险制度，向一无所有的穷人、失去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和没有收入的母亲和儿童提供帮助。这一法律受到保守派的猛烈攻击，一位众议员夸张地批评说：“在世界历史上，还

④ 《近百年美国经济史》，第398页。

① The Public Papers and Addresses of Franklin D. Roosevelt (1938), 4: 325

没有哪项措施像它一样如此偷偷摸摸地想阻止工商界的复兴，奴役工人，阻止雇主向人们提供工作机会"。[②]

在看到《社会保障法》对穷人和老人的积极意义的同时，也该注意到它的一些问题和不足。首先，它的确没有直接有助于经济复兴。尽管这个法律的受益人会提高他们的购买力，但由于需要时间来确定那些人应该得到帮助，因此这个效果不会立即显示出来。而税收增加则不需要时间，它立即限制了可以自由支配的收入。其次，它只适用于工商界的工人，要等很多年以后它才适用于绝大多数人。第三，社会保障税是一项退进税(regressive tax)，主要落在了低收入阶层的人身上，对富人的影响不大，因此就提出了税收平等这一美国社会至今都未解决的难题。第四，该法的保障金额，特别是对退休者的保障金很少，光靠它很难生存。

新政的经济成就和历史意义

新政的成就可以从美国国民总产值的变化中体现出来。国民总产值从 1933 年的 556 亿美元上升到 1937 年的 904 亿美元。1937 年 5 月到 1938 年 6 月经济再次紧缩，1938 年的总产值仅为 847 亿美元。不过，1939 年又恢复到 905 亿美元的水平。由于国民总产值没有排除价格变化的因素，因此并不是衡量经济发展的最佳指标。排除了价格变化因素的国民生产净值(Real GNP)是项更有意义的指标。1929 年以后，物价下跌很多，从国民生产净值来看，经济恢复更为明显。它从 1929 年的 1040 亿美元下降到 1933 年的 744 亿美元，接着回升到 1937 年的 1091 亿美元，已经超过了 1929 年的水平。1937—1938 年的衰退使国民生产净值下跌到 1032 亿美元，1939 年便回升到 1110 亿美元。

因此，到 1939 年时就美国经济的产出而言，它已经恢复到了

---

② 引自 Arthur Schlesinger, Jr., The Coming of New Deal (1958), p 311

大萧条前的水平。但是,失业问题却没有很好地解决。1933 年失业率达到了 25.2%,1937 年下降到 14.3%。1937—1938 年又攀升到 19.1%,第二年才回落到 17.2%。需要注意的是,失业率的统计中没有去除那些在政府公共工程项目工作的人。新政期间 20%的政府支出用在了帮助失业者的项目上。经济学家因此认为,30 年代是美国历史上就业水平最糟的时期。

尽管在恢复经济减少失业方面,新政的成就并不大,甚至非常有限。但是,它的种种努力——有些是不自觉的——却从以下三个方面逐渐地改变了美国的社会经济观念和结构。

首先,新政力图通过修复市场经济体制中失败的部分来维持这一体制运转。无止境的萧条使人们不再相信市场本身能够克服萧条,他们已经等待了太长的时间了。如果市场本身无法自我调整,那么他们只能期望政府来调整它。这就是新政所作的,尽管它并没有取得全面的成功。新政绝非像它的批评者所指责的那样是一种社会主义,相反,它的目的和意图在本质上是保守的。正像《紧急银行法》的提出者表示的那样,它并不想用一个完全不同的制度来代替现存的制度,它只想改善它使之更有效和更成功。

其次,新政试图在经济生活中建立一种政府与民众之间全新的关系。在美国整个经济发展进程中,一个根深蒂固的信念是一个四肢健全的人应该完全依靠自己,这构成自由放任哲学的不可缺少的内容。当胡佛拒绝建立联邦政府的救济机构、拒绝向退休者提供社会保险,强调"美国坚定的个人主义制度"时,他实际上代表了美国工商界大多数人的看法。但是,他们并没有认识到美国的工业化已经侵蚀这一"坚定的个人主义。"1890 年时,乡村居民的人数两倍于城市居民。当城市出现经济紧缩失业人数增加时,一些受害家庭至少可以搬到农村的亲戚家。而在 30 年代,城市人口已占总人口的 60%,他们无法依靠越来越少的乡下亲戚。新政并不是要人们在经济困难的时候一味依赖政府,这只是特殊情况

下没有办法的办法。

最后,新政推动经济增长的努力不仅是修补国家金融和农业领域中的缺陷,而且还利用扩大政府开支作为补充私人投资不足的手段。这一做法实际上并不符合罗斯福坚持的“平衡预算”论,他和保守的工商界一样,并不习惯甚至也不喜欢开展雄心勃勃和庞大的公共工程计划来复兴经济。但与保守派人士不同的是,罗斯福对失业者的痛苦怀有深深的理解与同情,认为失业者是他们无法控制更不应负责的经济灾难的牺牲品。因此,政府必须帮助他们,给他们工作的机会。

庞大的以工代赈计划迅速扩大了政府的开支。联邦紧急救济署的开支从1933年的600万增加到1935年的1.15亿美元,民间资源保护团在1933年时的开支是1.41亿美元,两年内就增加到3.32亿美元。在今天的标准看来,数字并不大。但是,当时美国正常年份的军费开支不过是7亿美元,相比而言,以工代赈的开支实在不是一个小数目。胡佛政府最后一年(1932)用在教育、公路、国防、邮政和救济等项目上的总开支为46亿美元,1935年这个数字上升到65亿美元,1936年又上升到84亿美元。在政府开支的带动下,私人投资从1932年的9亿美元增加到1937年的110亿美元。消费开支也同步增加:从1933年的460亿美元增加到1937年670亿美元。

第二次世界大战与美国经济

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特别是1941年12月美国最终卷入战争完全彻底地结束了30年代的经济萧条。战时经济不仅消灭了一直困扰罗斯福政府的失业问题,而且极大地加强了美国的整体经济实力。

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美国经济恢复的速度因此加快。对很多的美国人来说,一战期间的通货膨胀依然记

忆犹新。为此，出于对战时物价上涨的担忧，美国国内的社会需求明显增加，一时间出现了抢购风，很多商人囤积居奇。比国内需求影响更大的则是英法等欧洲国家订货的增加。出口从 1939 年的 31 亿美元迅速增加到 1941 年的 52 亿美元。1941 年 3 月著名的《租借法》实施后，罗斯福政府开始以"租借"记账的形式源源不断地向反法西斯国家提供各种物资援助。由于罗斯福政府估计到美国最终很可能也会卷入到战争之中，政府的各项开支，特别是国防开支急剧增加，1940 年政府在物资和服务方面的开支为 60 亿美元，次年飚升到 170 亿美元。

社会总需求的增加产生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政府开支的扩大提高了社会的购买力，进一步促进了社会需求，从而刺激了公用设施的建设和私人投资，经济总量随之扩大。国民生产总值从 1939 年的 905 亿美元增加到 1941 年的 1245 亿美元。由于 30 年代的萧条造成大量工人失业和大批工厂设备闲置，因此社会供给相对充分且富有弹性，消费物价指数在 1940—1941 年间只增加了 5%。

1941 年 12 月美国参战以后，美国经济以惊人的速度奇迹般地转成战时经济体制。为了打赢这场反法西斯战争，美国政府的战争开支增长迅猛，1941 年为 170 亿美元，1942 年为 520 亿美元，1943 年为 810 亿美元，1944 年为 890 亿美元，1945 年战争结束时 740 亿美元。同时非军事开支则有所下降，从 1941 年的 30 亿美元减到 1945 年的 7 亿美元。随着政府需求的猛增，国民生产总值从 1941 年的 1245 亿美元增加到 1945 年的 2120 亿美元。

美国刚卷入战争时，经济的扩大主要靠 10% 的失业大军和大量闲置的工厂设备。到 1942 年 9 月，美国经济达到了充分就业。随着大批男性入伍参军，他们留下的工作岗位空缺由广大的妇女所顶替。成千上万的美国妇女第一次走出家庭，成为劳动力大军的一部分，极大地增强了女性的自立能力和独立意识。

二战时期联邦政府经济计划的范围和程度远远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美国参战前后，紧急管理办公室和战时生产局先后建立起来，统一计划、控制和管理从原料加工到物资生产直至运输分配等所有国民经济生产环节的优先次序。这样一来，围绕着战争这一目的，各种资源得到了非常有效的配置。美国社会内部对战争的普遍支持使劳资双方密切合作相互配合，罢工极少发生，并且属违法行为。

对于消费者来说，战争的机会成本很快就体现在日常生活用品的供给上。一方面由于充分就业，消费需求有所增加，另一方面却是很多消费品不再生产或生产得很少。一切生产和投资都首先用来满足于战争的需要。以汽车工业为例，整个行业几乎全部转向军用卡车、吉普车、坦克和飞机的生产。

面对日用品的短缺和物价可能的上涨，1942 年初，罗斯福政府根据《1942 年稳定法》(Stabilization Act of 1942)，建立了物价署，统一确定物价、工资和房租，同时它还建立起一些基本生活用品诸如糖、黄油、轮胎和汽油等的定量配给制。1942 年底虽然出现了短缺商品，特别是汽油和轮胎的黑市和相应的“地下经济”，但并不严重。战争使美国人也开始过紧日子，但比起其他反法西斯盟国的人民来说，美国人的生活仍然是最好的。

美国人在过紧日子的同时，以积极的爱国热情响应政府的号召，把一时因商品短缺而无法花掉的钱用来购买战争公债。从 1941 年 5 月 1 日罗斯福总统购买第一张公债这天起，到 1946 年 1 月最后一张胜利公债售出，美国财政部共向个人和团体法人发行了 7 次战时公债和一次胜利公债，共筹集资金 1569 亿美元。公债的出售极大增加了银行的储备(1941—1945 年间货币供应量几乎增加了 2.5 倍)，积累了一大笔将会推动战后需求膨胀的潜在流动资金。战争公债于国于民都有利，它在大大地增加人民的金融资产的同时，弥补了政府巨额开支所带来的财政赤字，吸纳了大部分

的战时购买力，减缓了通货膨胀的压力。

战时公债大体只能弥补战时财政的赤字，其他增加的政府开支则需要通过征税来实现。1940—1945年间，美国国内的税收增加了8倍之多。由于所得税开征的水平从1939年的1000美元减到1940年的800美元，再减到1941年的750美元，直至减到1942年的500美元，数百万的低收入者被列入了征税的对象。纳税单位（纳税人、房地产和公司）的数目从1939年的760万增加到1943年的4300万美元。1941—1945年间，税收总金额达到了1385亿美元。税收和政府的其他非借贷资金大体上占到了战时政府开支的43%，一战时这个数字只有30%左右。这意味着二战的战争经费主要靠对当时人的税收，而不是靠增加下一代人的财政负担。

通过公债出售和增加税收，政府获得了打赢战争所需要的经费，同时也大大降低社会购买力。加上物价署的努力，战时控制通货膨胀的努力获得了惊人的成功，1942—1945年间物价的上涨平均每年只有4%左右，相当温和，为纳税人节约了几十亿美元。

战争的影响

作为反法西斯同盟事实上的领袖，美国不仅要发展和维持庞大的军事力量，而且还要向反法西斯盟国提供500多亿美元的物质援助。政府的开支火箭般上升，再也没有人怀疑政府庞大开支的必要性。正如凯恩斯在1940年所指出的那样："从政治上讲，一个资本主义的民主政府不可能把开支扩大到这样的程度，即可以作为一次宏大的试验来证明我的理论的正确与否，除非是在战争条件下。"[①]仅在1942年的上半年，政府采购的合同价值就达1000亿美元。国民总产值随之猛增。附表可以清楚地看出政府战时开

① 引自 Richard Hofstadter, The Age of Reform (1955), p 309

支对经济的刺激作用。

战时政府开支的影响（以当时美元价格计算）(10 亿美元为单位)

	联邦政府的采购	联邦政府赤字	国民产总值(百万)	失业人数(十万)
1940	6.0	-2.7	99.7	8.12
1941	16.9	-4.8	124.5	5.56
1942	51.9	-19.4	157.9	2.66
1943	81.1	-53.8	191.6	1.01
1944	89.0	-46.1	210.1	0.67
1945	74.2	-45.0	211.9	1.04

资料来源：Historical Statistics, Tables F67, F47, D85, p 230, 229, 135.

当然，巨大的军事开支也导致了通货膨胀。1945 年的消费品价格要比 1940 年的价格高出 28%。但即使扣除通货膨胀的因素，经济的增长也十分惊人。图表非常清楚地显示了这一变化。战时开支所带来的经济繁荣说明，在促进经济扩展中，像过去私人投资一样，政府的开支可以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战时的特殊环境排除了任何批评政府开支的言论。福克纳赞扬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比我们历史上的任何其他战争都进行得更有效率，而且使积极计划效率达到了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和平和顶点"。[②] 但问题是，在战争结束之后，政府开支恢复到正常水平时，经济增长能否继续。这一问题在战后美国的经济发展中一再被提出，并有各种不同的答案。

② 《近百年美国经济史》，第 481 页。

第四章　从战后经济景气到战后通货膨胀

战时的经济扩张一直延续到战后初期。受大萧条和战争长期压抑的国内消费和投资需求的迅速扩大，加上欧洲重建的巨大需求，使战后初期的经济得以持续扩张。1949 年出现了一次轻微的衰退，但 1950 年朝鲜战争的爆发以及美国的卷入所带来的军事和消费需求的增长加快了经济复苏，经济增长一直持续到 1954 年。1954 年朝鲜战争结束时，又出现了一次轻微的衰退，但 1955—1957 年间出现的对耐用消费品和对耐用品生产设备需求的增加推动了新一轮的经济高潮。1958 年经济一下子紧缩，但在 1959 年又很快在相当程度上得以恢复。

进入 60 年代以后，美国经济继续在 50 年代的基础上发展。1961—1964 年是低速增长的年份，同时通货膨胀也不严重。但在 1965—1969 年间，约翰逊政府的 3 年减税计划、"伟大社会"计划和卷入越南战争所增加的军费开支刺激了经济快速增长，同时也加速了通货膨胀。

60 年代持续的经济增长在 1970—1971 年的衰退中结束，同时也标志着战后长达 1/4 世纪的经济繁荣的结束。美国经济进入了一个不稳定的时期。石油危机的影响，越南战争的包袱和美国国际经济竞争力的相对削弱使得这一时期经常是低增长率、高通货膨胀率和高失业率三者同时并存。

美国战后 20 多年的经济发展有赖于一系列有利的因素。对外投资迅速增加，美国的跨国公司开始在国际经济中发挥重要作

用。新政期间开始加强的工会组织在 50 年代有了进一步发展，工人的工资随着经济发展而稳步增长。为新政和二战所扩大和加强的联邦政府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有增无减。政府与工商界的关系日益成为关注和争论的问题。政府认为私人经济无法向人民提供必要的生活和福利保障，它的调控范围因此扩大到包括价格、医疗卫生和消费者权益等众多的经济领域。为此建立起来了的管理机构如此庞大，以至于到了 70 年代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这种调控的成本和利益。

经济发展的模式有了新的变化。城市化——美国内战后美国国内最重要的发展——开始减缓，搬往郊区成为中产阶级的选择。不仅农业人口继续下降，连制造业的就业人数也开始减少，服务业则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为大量妇女加入到劳动力市场提供了方便。比起战前的经济萧条，战后的衰退显得非常温和。通货膨胀代替了 30 年代的失业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

战后快速增长

二战结束后，美国平稳而又顺利地从战时国防经济回复到正常的国民经济，显示了美国经济内在的活力和调整能力。尽管政府的支出从 1945 年的 830 亿美元减少到第 2 年的 310 亿美元，但是，一下子爆发出来的消费者和企业的开支抵销了政府开支减少所带来的影响，国民生产总值只下跌了不过 1%。此外，国防工业的迅速转向以及生产进程的加快，使市场的供给立即追上了需求，战争刚结束时的通货膨胀很快消失。充足的供给使物价在 1948 年就稳定下来，直到 1950 年朝鲜战争爆发。战后最紧迫的任务——数百万军人的复员工作进展顺利，没有遇到太多的麻烦。有关政府机构曾估计 1946 年春天可能会有 800 万人没有工作，而事实上，战后的失业人数从未超过 270 万。

1945 年 4 月哈里·杜鲁门接替去世的罗斯福成为美国总统。

不久，战争结束。在国内经济政策上，杜鲁门面临着两难的选择。一方面他想尽可能地取消战时的各种管制，促进私人开支。另一方面，他又担心过快地取消战时管制，将会使压抑多年的购买力一下子释放出来，导致通货膨胀和社会不平等加剧。美国公众的情绪使杜鲁门的难题更为复杂。他们已经受够了勒紧裤带的日子，很想用掉他们的战时积蓄。此外，战时全民团结一致努力奋斗的目标在战后不复存在，各个社会集团首先想的是各自的利益。工会要求增加工人工资，反对取消物价管制；企业家希望提高物价，要求政府继续控制工资水平；农场主要求继续控制农用产品价格，但反对任何控制农产品价格的措施。

杜鲁门试图调和各个利益集团的要求，提出了公平施政的国内改革方案，进一步加强了在社会保障和最低工资、农产品价格支持和公共房屋规划等方面的新政立法，同时推动国会通过了新的立法，建立健康保险体制，明确了政府对充分就业的责任。不过，杜鲁门没能说服国会继续实施战时物价管制的措施。为了满足经济自由化的普遍要求，他先是取消汽油等短缺物资的配给制，接着减税 60 亿，最后在 1946 年 6 月取消了所有的物价控制。

结果是可以想象的。战时压抑的购买力如决堤的洪水喷涌而出，人们蜂拥上街大肆采购，物价竞相上涨。1945—1947 年间，食品价格涨了 25%，1946 年的通货膨胀率高达 18.2%。更糟的是，物价上涨加强了增加工资的呼声。当企业主拒绝满足工人的要求时，罢工浪潮席卷全国，仅 1946 年一年，就有将近 5000 起罢工，参加者达 450 万人。由于工会组织强大，企业主只好与工人谈判解决纠纷，并将增加的工资打入生产成本，转嫁到消费者身上。于是，工资和物价便轮番螺旋上涨，构成战后美国通货膨胀的主要机制。

空前繁荣

与很多人的担心相反，战后美国经济非但没有回到30年代的萧条，而且出现了空前未有的繁荣景象，成为美国历史上经济繁荣持续时间最长和发展最为成功的时期。1945—1975年间，排除通货膨胀的因素，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翻了一番。1970年中等收入的家庭比战后初期增加了1/3，他们的年收入达到了1万美元，平均用在商品和服务上的消费相当于1947年水平的两倍。1970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突破了1万亿美元大关，这是以前根本不可想象的。1946—1950年间，人均净收入增长了5.9%，50年代这个数字为15.2%，60年代又上升到31.7%。

经济的繁荣把美国大众因战争胜利的瞬间狂喜变成了生活安定舒适的长期欣慰与喜悦。以前不为大家熟悉的“经济增长”一语现在成为一种全民的共识。美国的政治家和报刊评论员给人们描绘了一幅美丽的图景，经济增长趋势将继续下去。

战后25年的经济繁荣有赖于两股力量。其一是战后迸发出来的私人开支浪潮。其二是政府开支的扩大。战争刚结束时，虽然政府开支锐减，但由于私人开支的猛增，美国得以避免了一次经济紧缩。几年后，政府开支重新扩大，主要是满足各州和地方上建立、建设学校、公路、医院和消防设施的迫切需求，和战时私人开支受到压制一样，战时这些公共项目的建设也被推迟了。另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是政府军费开支的上升。冷战的进行，特别是朝鲜战争的爆发，增加了军费的开支，成为国民经济的主要刺激因素。1947年时军费开支大体在90亿美元左右，1949年国防部建立后，军费开支攀升到130亿美元。4年后又蹿到500亿美元，1970年时已经是740亿美元了。

军费开支是战后初期经济增长浪潮无可争议的源泉，但它并不是战后长期繁荣的惟一动力。实际上，从50年代的中期开始，

国防开支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呈稳步下降的趋势，代之而起的是另一项政府的主要开支——福利开支的不断扩大。1950年时这项开支为230亿美元，不到国民生产总值的9%，到1970年时增加到1460亿美元，占当时国民生产总值的15%。这样，在战时开支停止后，福利开支成为经济的主要推动力。

社会福利开支的增加并不意味着新政"救济"任务的重现。它现在包含的内容很广，涉及到经济生活中不同的人群和领域。较早的一项立法是《退伍军人法》(GI Bill of Rights)，它向退伍军人提供贷款从事工商业，也资助他们上大学进一步深造。大概有100万人在这项法律的帮助下进入大学学习，还有100万人获得贷款开始了自己的创业历程。1956年这项法律停止实施时，政府总共花费145亿美元。战后美国社会中的一代精英几乎都在不同程度上受惠于这一法律，因此在1996年纪念这一法律通过50周年时，美国的媒体把它与林肯《解放黑奴宣言》等美国的历史性文件相提并论，称之为"美国历史上一项最伟大的法律"。联邦政府对从小学到大学各级教育的资助也是有增无减。虽然医疗卫生方面的政府资助增长不快，但在60年代末也形成了较完备的医疗保障(Medicare)和医疗援助(Medicaid)体系。[①] 在社会保障方面，最重要的还是社会保险事业的扩大和加强。在杜鲁门时期，这方面的开支每年只有20亿美元，如果平摊到每个人身上，这个数字比30年代末大不了多少。艾森豪威尔时期有了较大的进步，大约有1000万个从前没有享受社会保险的家庭现在受惠于这一计划，政府每年的相关开支增加到了110亿美元的水平。

---

① 医疗保障是美国社会保险署给符合条件的65岁以上的老人保险，为他们报销看病住院的费用。医疗援助是联邦和各州政府联合替无钱支付医疗费用的人付这笔钱。在美国，这两项社会福利项目常常引起很大的争议。

新的经济结构

在50～60年代,美国联邦、州和地方各级政府在国防、社会保障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开支构成了战后长期繁荣不可缺少的坚实基础。1929年时各级政府的所有开支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10%,其中联邦政府的各项开支仅占2.55%。1970年时联邦政府用在国防和社会福利的开支已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0%,如果加上州和地方政府的各项开支,这个数字几乎构成国民生产总值的1/3。换个角度说,1929年时私人的投资开支大体上比所有的政府开支高50%,而在70年代,它比政府的开支少了50%。

所以,政府的开支构成了长期繁荣的主要因素。但这并不是长达25年基本没有间断的经济增长的惟一原因。政府开支的增加也带来了政府与企业之间关系的变化,以及与此相应的社会观念的变化,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人们普遍认识到联邦政府为经济提供基本保障的必要性。这种保障包括向农业提供各种形式的补贴,维持最低工资标准,扩大社会保险使失业者可以享受更多和更长时间的保险金,资助各州的福利计划以及开办职业培训项目。由于政府在相当程度上保障了个人的收入和基本生活,减缓了工人反对雇主的愤怒情绪,阻止了失业者因绝望而产生的过激行动,保证了社会的稳定,从而为私人资本的投资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其二,工商界逐渐地接受了政府作为经济稳定的最终捍卫者的角色。洛克菲勒基金会在1958年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用于支持经济增长的公共开支是我们经济的基本组成部分。它们非但没有阻碍进步,而且为我们经济的向前发展提供了良好环境。"①

---

① 转引自 Heilbroner, Robert, & Singer, Aaron, Th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 1600 to the Present, Third Edition, NY: Harcourt Brace College Publishers, 1994, p 327

经济结构的变化除了体现在政府开支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方面外，还表现在美国经济从产业占主导的经济转变为服务业占主导的经济。[①] 人类的经济活动领域通常可以分成三个主要的部分，即包括农业、林业和采矿业在内的第一产业，原料加工和制造的第二产业，涉及服务和专业知识的第三产业。传统经济学常常没有估计到，工业发展会带来第三产业需求的增加以及因此发生的结构性变化。

从美国劳动力就业领域的变化中，可以充分地感受到这一变化。1900 年时，38%的劳动力集中在农业，而 1981 年时这个数字不到 3%。同期，技术、专业、管理、行政和销售人员从占劳动力人数的 13%增加到了 47%。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这一劳动力结构的变化主要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 1950 年以后。二是这一变化是建立在第一和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巨大提高(1981 年比 1900 年提高了 4 倍)之上的。这种提高极大地改善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改变了他们的需求模式和习惯，促进了服务经济的兴起。因此，有人认为美国在 60 年代以后，进入了“后工业社会”。

服务业的兴起与妇女加入到劳动力市场密切相关。1900 年时，妇女只占劳动力市场的 18%，而 1980 年时已经超过了 37%。根据 1984 年的统计，18 岁以上的美国妇女一半以上参加工作，其中 85%供职于服务业。由于家用电器和方便食品的普及减少了家务劳动时间，加上女权主义的兴起，劳动力市场上妇女劳动力的供给的扩大，正好满足了新兴的第三产业对劳动力需求。

---

① 所谓服务业是一个范围相当广泛的经济领域。80 年代初，美国大约有 8 500 百万人属于服务业，大体可分成以下几个范畴，首先是内容庞杂的各种不同工作职业，从医疗卫生到饭店宾馆，从科学技术人员到教会神职人员，人数最多，2 800 万；其次是零售业，1 900 万；再次是州和地方政府的雇员，1500 万；第四是金融保险和房地产业，700 万，接下来是批发商业，600 万，最后是联邦政府 300 万雇员。

政府作用的变化

二战后美国经济日趋成为一种混合经济(a mixed economy),即庞大的政府开支和广泛的政府干预与私人市场经济混合并存。1946 年的《就业法》(Employment Act of 1946)是战后美国政府直接干预经济的第一个重要立法。它要求政府通过财政(税收和预算)和货币政策来促进"最大限度的就业、生产和购买力"。它还要求总统每年向国会提交经济报告,并建立一个由 3 人组成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来协助总统工作。

1946 年的《就业法》标志着政府在经济生活中角色演变进程中的一个新阶段。在 19 世纪的上半叶,政府是企业的"促进者"(promoter),着重于国内环境的改善,向铁路公司提供土地,帮助初生的工业立足。到了下半叶,政府变成了经济的调节者(regulator),利用权力来保证私人市场和工业的有序运作,建立了州际贸易委员会,制订反托拉斯立法。现在,《就业法》把政府的作用发展到了作为经济保障者(guarantor)的第三阶段,它的主要目标是维持被社会所接受的增长率和就业水平。福克纳称 1946 年《就业法》"也许是 20 世纪一项最富历史意义的经济立法"。[1]

在 50 年代艾森豪威尔共和党政府时期,尽管国会为保守的共和党人所控制,但政府转变为经济增长保障者的进程并没有中断。艾森豪威尔试图在 20 年代共和党的保守政策和 30 年代新政自由主义之间保持平衡,但终究还是背离了保守派希望的方向。他的计划是尽可能多地把联邦的项目转移给各州政府。同时他还打算解散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重组为私人企业,因为他一度认为该局象征着"不知不觉的社会主义"。他在第一任总统就职演说中称:

① 《近百年美国经济史》,第 497 页。

"如果我想有所作为的话，那就是较少政府干预，没有政府干预。"[1]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不得不放弃自己许多保守的观念，扩大新政式的社会福利计划。1954年他签署了有关社会保障的法案，使700多万美国人享受了社会保险的好处，同时享受失业保险的人数增加了400万，并把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到每小时1美元。另一项立法是《土地银行法》(Soil Bank Act of 1956)，规定向为减少产量而休耕自己部分土地的农民提供补偿。结果，在丰收时节，农民和农业合作社的每6个美元的收入当中，有1元不是来自出售农产品所得，而是来自政府对休耕作物的补助。

在他的任期内，第一次经济衰退(1953—1954)出现时，他告诫他的内阁说，共和党必须利用所有的力量来防止"另一个1929年"。于是，尽管共和党政府非常想削减政府开支，但联邦政府的开支从1952年艾森豪威尔当选总统时的680亿美元增加到1960年他离开政府时的920亿美元，并面对着美国历史上和平期间最大的财政赤字。

60年代更多的干预

在约翰·肯尼迪的民主党政府时期，推行一种混合经济的想法更为明显。可以说，在肯尼迪那里政府必须干预经济已是一种先入之见。此时，政府所进入的经济活动领域远比艾森豪威尔时期更为广泛。政府开始启动工资"指导线"，以帮助遏止工资和物价的轮番上涨。最低工资标准又一次提高，社会保险进一步扩大。联邦政府还向国内的落后地区提供发展援助。

肯尼迪政府最惊人的举动发生在1963年1月。当时的经济看来处于潜在的严重衰退的边缘，失业率开始上升。在自由派经济顾问的推动下，肯尼迪向国会提出了在不减少政府开支的情况

---

[1] 引自 Herbert Parmet, Eisenhower (1972), p 174

下，减税135亿美元的计划。由于美国政府的岁入主要靠税收收入，这意味着，他要求国会同意实行赤字财政，用借来的钱来应付政府的开支。他解释说，这样做的结果有助于刺激经济，因为消费者可以有更多的钱用于支出。在国民总产值上升后，政府的税收也会增加。因此，政府的预算最终会在更高的国民生产总值水平上得到平衡。这一做法可以说是完全彻底背离了传统上收支必须平衡的经济思想和财政政策。①

肯尼迪实行财政赤字的建议引发了国会内和社会上普遍的不安情绪。他的减税计划直到约翰逊政府期间才得以实现，那时，这一思想已经开始为不少的工商界人士所接受。总统经济顾问赫伯特·斯坦因曾评论说，这一减税法律"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能象征着财政政策的革命"。②

约翰逊还在其他方面推广混合经济。他的伟大社会的计划给政府增添了新的责任，包括直接资助全国的中小学，以及向65岁以上的老人提供医疗保险这一影响深远的计划。约翰逊最为雄心勃勃的计划是旨在向贫穷开战的1964年《经济机会法》(Economic Opportunity Act of 1964)。他希望通过改善穷人的劳动技能来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具体做法是拨专款来培训失学和辍学儿童以及建立成人教育项目，为此，1965—1970年5年间共花费100亿美元。

收入分配

经过共和党和民主党几届政府的努力，美国国民收入的分配

---

① 政府财政赤字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问题的关键是政府财政赤字的"国内"特性。它意味着政府的赤字是欠它自己的人民的。因为政府有征税权，所以在政府债券到期时，它总是可以征收到必要的资金来偿还本金和支付利息。与私人公司不同，不论这个公司有多大，它都没有办法强迫人民购买它的产品以偿付它的债务。征税权使政府的债务完全不同于私人债务。所以说，其国民拥有的政府债券实际上是一个国家自己欠自己的钱。

② Herbert Stein, The Fiscal Revolution in America (1969), p 372

呈现出不同于战前的变化。下面的表格显示了美国各社会阶层收入在国民总收入中份额的变化。

家庭收入的分配(纳税前)

	在总收入中的份额	
	1929 年	1971 年
40%最低收入的家庭	12.5	17.4
40%次低收入的家庭	33.1	41.1
20%次高收入的家庭	54.4	41.6
5%最高收入的家庭	30.0	14.4

资料来源:Historical Statistics; Tables G 319~324, p. 301.

这一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一时期社会福利项目的直接结果。1959—1969 年的 10 年间,其收入在官方划定的"贫困"或"接近"线的人口从 3900 万减少到 2400 万,低收入阶层的比例从人口的 22.4%下降到 12.1%。到 80 年代为止,贫穷的人口都一直在缓慢地下降。里根上台后,由于社会福利项目的削减,情况才开始逆转。

联邦政府作用的扩大同时也意味着联邦政府官僚机构的膨胀。19 世纪联邦政府的雇员增长缓慢,到 1900 年时只有 9.5 万人。随后的 30 年增长加快,1930 年时达到了 56.5 万。随着政府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加强了对经济生活的干预,联邦机构急剧膨胀,1940 年的雇员人数达到了 99.6 万,1950 年为 193 万,1960 年为 227 万,1977 年为 273 万。

他们的活动渗透到经济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仅联邦部一级机构涉及的领域就包括农业、商业、劳工、住房、卫生、教育和社会福利。它们主要是一些调节机构诸如州际贸易委员会、联邦贸易委

员会、证券交易委员会、食品和药品管理署、联邦通讯委员会和环境保护署。此外,还有国防部和国内岁入署。

联邦官僚机构的膨胀促使美国人提出了这样的疑问,这些由纳税人供养的机构究竟服务于谁的利益?又有谁来控制这些机构的膨胀?经济学家通常给予三种解释。全社会的利益可能是推动机构膨胀的首要因素。政府建立这些机构的目的是试图调节和平衡不同社会集团相互冲突的利益,以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协调发展。

第二个因素是不同的官僚机构所负责的某一经济部门的特殊利益。农业部考虑的是农场主的利益,劳工部想的是劳工的要求,如此等等。换句话说,每一个管制机构都成为它所负责的特殊社会集团利益的代言人。有人称之为"美国政府的巴尔干化"(意为分裂化)。

第三个因素是政府和企业中技术专家利益的一体化。不论是政府,还是企业,实际上它们都是由相互关联交叉的技术专家集团管理着。社会需要这些技术官僚,因为现代社会如此复杂,很多问题除了专家外一般难以理解。这些专家形成了自己特殊的利益,他们控制管理着这个社会,并且不断扩大这种管理。因此,官僚机构有着自我膨胀的内在机制。

官僚机构的这种膨胀使美国人感到深深的忧虑。从理论上讲,美国的总统和国会有责任来监督和控制官僚机构,但它们未必尽职。于是,选民们只能利用手中的选票来影响总统和国会,表达他们的不满,社会思潮开始趋向保守。甚至在卡特政府的末期,就出现了放松和减少政府调控的现象,国会通过立法减少了除安全问题以外对航空公司的各种管制。里根时期则开始大规模放松和减少政府的干预和调控。

经济增长促进了战后的繁荣,同时也带来了通货膨胀。60年代通货膨胀初见端倪,开始成为社会关注的一个问题。1950—1960年间,美国每年的通货膨胀率平均在2%左右。但在60年代

的最后5年里，通货膨胀率上升到4%，70年代开始的5年又上升到6%，在接着的5年里飚升到9%。1980年以后，通货膨胀率超过了10%，达到了2位数。

通货膨胀的成因及后果

70年代开始通货膨胀的直接诱因是石油价格的上涨。1973年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在第6次中东战争之后成功地提高了油价，油价在几个月内涨了4倍。“石油冲击”像潮汐一样打击了所有工业化国家，几乎人人都认为油价的上涨极大地推动了通货膨胀。

那么，石油价格的上涨又何以会带来通货膨胀的后果呢？这里需要一个假定的历史类比来加以说明。假定100年前的1873年美国的煤矿业组成了一个统一定价的卡特尔，把燃煤的价格提高了4倍，这会导致通货膨胀吗？回答基本上是否定的，它只会造成严重的衰退。家庭主妇不再买煤，厂矿将减少生产，煤矿也会纷纷关门。这一“逆事实”假设提出一个新的问题，为什么1873年和1973年类似的冲击——能源价格的上涨——会造成如此不同的结果呢？答案应该从战后美国经济的结构性变化中去寻找。如果煤炭价格在1873年飚升，消费者不会有额外的购买力来维持原来的煤炭消费水平，于是，不论是煤炭生产者还是其他商品的生产者都会因为需求锐减而纷纷减产关门。但在70年代情况却正好相反。当石油价格上扬时，政府很快会创造出额外的购买力来保证所需要的美元到位。工资收入会随着物价的上涨而相应提高，由物价指数决定的社会保险金也会增加。面对生产成本的提高，企业要银行提供更多的信用贷款，在政府的赞许下银行会满足企业的信贷要求。这样，油价的上涨，非但没有约束购买力，反而通过混合经济和福利国家的机制，成为创造出额外购买力的刺激因素。

这一机制当然不是通货膨胀发生和持续的惟一原因。耗资巨

大的越南战争是通货膨胀最早的推动力;企业和工会权力的不断集中进一步恶化了通货膨胀,因为一些关键的工业部门与工会达成共识,工人的工资稳步提高,由此增加的生产成本则通过提高产品价格来转嫁给消费者;另外,美国还利用它在国际经济中的特殊地位,通过美元与黄金脱钩方式使美元贬值,从而把通货膨胀转移给欧洲。

同样糟糕的是工商界和公众对价格波动的预期出现了可怕的变化。20 年代经济繁荣时,人们的信念是“有涨必有落”,这多少约束了大部分人的投机心理。而在 70 年代,物价以不可遏止之势上涨时,人们的信念转变为“明天会比今天涨得还凶”。这种对通货膨胀日益加重的预期成为一种有力心理机制,造成了会导致通货膨胀加速的消费行为。

可见,通货膨胀有很多特殊的原因。但把欧佩克与想象中的煤炭卡特尔进行对比,才触及了问题的关键。正是那些推动并维持了战后持久繁荣的制度性变化本身构成了通货膨胀的内在基础。如果把混合经济和福利国家从 20 世纪中期的资本主义中排除,那么这一制度中的通货膨胀趋势肯定会立即消失。当然,它的惊人的繁荣也将不复存在。

通货膨胀最终演变成为一项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并经历了相当的一段时间。艾森豪威尔政府专注于预防和缓解几次不大的衰退,无意控制物价的上涨。肯尼迪及后来的约翰逊政府先是集中精力通过减税来刺激经济,接着又在不增加税收的情况下进行耗资巨大、不得人心的越南战争。因此,通货膨胀也没有成为社会政治生活的焦点。直到尼克松政府上台,通货膨胀才为人们所普遍关注。从 1969 年 1 月到 1971 年 8 月,生活费用上涨了 14.5%,8 月中旬尼克松不得不宣布在 3 个月内冻结物价和工资,11 月又建立了物价和工资的管制制度。

这一管制取得了一时的成功。但背后的压力却在不断地增

加,就像不断积蓄的洪水一样。当尼克松1972年再次当选为总统,宣布放弃物价和工资管制后,物价的上涨如洪水般喷涌而出不可遏制,通货膨胀率一下子从管制时的3.4%蹿到1973年的9%,第二年又达到12%。

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辞职后,福特接任总统。他从思想上坚决反对重新实施物价和工资的管制,代之而起的办法是减少联邦开支,鼓励联邦储备委员会紧缩信贷。虽然这会导致失业率的上升,但福特希望以此来限制劳资双方继续进行工资和物价轮番上涨的竞争。这一做法的结果却是出现了继1937—1938年衰退之后最糟糕的经济滑坡。1975年中期,失业率上升到9%。次年,尽管通货膨胀率降到了不足5%,但国会和公众不想忍受过高的失业率,福特只好不情愿地同意减税以刺激经济。1976年初,经济获得了相应的复苏,福特宣布衰退已经过去。不幸的是,通货膨胀只是短暂地平息下来,马上就会开始新的一轮攀升。

停滞不前的美国经济

70年代以来,美国决策者和西方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一样,面临着通货膨胀和高失业率之间的两难选择。为了控制通货膨胀,西方各国政府不得不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限制银行的贷款能力)和财政紧缩的措施,减缓经济增长幅度。结果却导致无法忍受的高失业率。于是,紧缩政策的红灯赶紧让位于从松的货币政策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其结果是,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都显现了走走停停、停停走走的病态:上升的失业率抵销了控制通货膨胀带来的好处,减少失业率的结果则是通货膨胀重新抬头。

1977年民主党吉米·卡特政府上台时,经济上的这一困境进入了一个死胡同。卡特下决心控制通货膨胀,为此挑选主张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的保罗·沃尔科出任联邦储备委员会的主席。后者立即采取了到那时为止还没有人敢采取过的严厉措施来减少货

币的供应。他不再允许银行像过去那样快速地扩充自己的储备,从而导致信贷锐减,并稳步地提高了利率。优惠利率——即银行贷给最信任的商业客户的利率——一下子从不到7%上升到12.5%以上。在卡特政府的最后一年(1980),优惠利率到达了15%的空前高度,但消费者物价指数的年增长率仍然飚升到18.2%,创美国历史上的最高纪录。

可以想见这一紧缩政策的痛苦结果。工商业,特别是中小型公司无法获得新的贷款来盘活存量,或偿付正常的借贷,纷纷减少生产和营业。失业率从1979年的5.8%上升到1980年的7.1%。为了医治通货膨胀,美国的经济在1980年实际上走进了死胡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人的购买力第一次出现了下降。美国人1980年时的收入要比1970年时少5%。甚至经济状况的这种恶化都无法遏制通货膨胀的内在动力,因为社会福利保险金和工资都已经指数化了,每年都待加以调整以赶上通货膨胀的步伐。尽管施行了二战后最严厉的货币政策,出现了二战后人数最多的失业大军,但1980年的通货膨胀率仍然达到了12.4%的水平。

就这样,了不起的繁荣在前所未有的通货膨胀中结束了。这不仅仅是美国一国的困境。虽然不如美国突出,其他西方国家,特别是西欧也同样以这种令人失望的结局结束了战后繁荣。

第五章　保守主义时代的美国经济

在1980年总统大选中，共和党人、加利福尼亚州前州长罗纳德·里根战胜了在任民主党总统卡特。里根的胜利标志着美国进入了一个新的保守主义时期。这一时期延续了12年之久，直到1992年总统大选中民主党人、前阿肯色州州长克林顿战胜在任共和党总统乔治·布什为止。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评价里根—布什时期复杂的经济政治形势和社会发展尚为时过早，但仍可以对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和经济政策作一个简要的回顾和初步的分析。

保守主义的经济哲学和政策

里根—布什年代信奉的经济哲学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那就是"保守主义。"其首要的和最重要的目标就是减少政府在经济领域中的作用。在里根的就职演说中，他指出："在目前的危机中，政府不是解决我们各项难题的良药；政府本身就是需要解决的问题……"著名历史学家达莱克评论说："在美国历史上，没有哪一位总统走进白宫时，怀着像里根那样减少政府作用和政府规模的强烈信念。"[①]里根搬进白宫的第一件事是把托马斯·杰佛逊的画像从白宫移走，取而代之的是加尔文·柯立芝的画像。后者以偏爱大企业主张自由放任而闻名于世。里根盛赞柯立芝任期内4次减税的大胆做法，并称"在柯立芝任期里，我们可能取得了迄今所知的最

① 1 Robert Dallek, The Politics of Symbolism (1984), p.63

了不起的增长和繁荣”。②

里根认为政府对工商活动的众多行政管制和反企业的立法扼杀了私人企业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因此决心在自己的任期内通过取消这些约束和限制,释放私人企业多年来被压抑的能量。利用社会上对民主党政府“只会征税和开支”的普遍不满情绪,里根一方面指责民主党人应对政府管得过多负责,另一方面开始大规模地削减福利项目,努力取消政府对企业的各种限制性规定,并在国防以外的所有领域内减少政府的开支。

里根一上台就要求国会削减实行已久相当完备的社会保障项目,诸如医疗保险、对没有工作穷人的福利补助、低收入家庭的免费食品券和学校的免费午餐等。1981 年 7 月,国会同意了里根的大部分要求,削减的福利项目总额在几十亿美元以上。随后,里根在 9 月里又提出了新一轮的削减国内开支的计划。

里根削减联邦社会保障开支的另一目的是推动建立他所提倡的“新联邦主义”(New Federalism),把过去联邦资助和监督的社会服务项目转移给各州。在他看来,地方政府及其官员远比高高在上的华盛顿官僚机构更了解民情,知道该如何最有效地满足民众的需要。

在减轻了政府开支之后,里根政府又成功地让国会批准了他提出的美国历史上数目最大的减税计划,这就是通常讲的《1981 年经济振兴法》(Economic Recovery Act of 1981)。据此,美国政府在 3 年内将减少个人所得税 25%,并将最高的财产税从 70% 降到 50%;此外,它还将给予新投资者税收减免的优惠,并提高折旧费,以降低投资成本,促进私人投资。

里根的保守经济哲学和政策最明显不过地体现在向富人倾斜的减税措施上。美国全国 3170 万年收入在 1.5 万及 1.5 万美元

---

②* 2 Robert McElvaine, The Great Depression (1984), p. 14

以下的家庭只获得了8.5%的税收减免，同时1260万个收入在5万及5万美元以上家庭却获得了35%的税收减免。只占人口1%的最富有的社会阶层受惠最多，1977年时这一集团年平均收入为35万美元，其中36%需纳所得税，而到1983年他们的平均收入上升到40万美元，纳税额却减到了22%。

里根的经济谋士曾预计说，这一减税措施将会刺激储蓄、投资和增长。尽管这一措施主要是对上层社会有利，但他们强调，正是这些富人的积极性被认为是决定经济生活至关重要的因素。这种哲学就是所谓的“供应学派”(supply - side)经济学，它与主张依靠政府开支来增加产出的“需求学派”(demand side)经济学截然相反。根据供应学派的观点，富人会把因税收减免获得的钱财或者用于消费，使经济摆脱停滞不前的状况，或者投资于新的企业，刺激生产，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在生产扩大红利增加后，市场繁荣的好处也会一点一点地外溢给(trickle down)其他社会阶层。

这一政策在实践中并不很成功。一是政府并没有能够像它所大胆宣称的那样减少开支。以医疗援助为例，里根上台时是320亿美元，在他离任时已上升到1320亿美元，同期社会保险的开支从1180亿增加到3000亿美元以上。此外，里根重整军备重振国威的战略使国防开支翻了一番，从1300亿美元增加到2600亿美元，成为美国历史上和平时期里规模最大的军备建设。

就税收而言，尽管富人的赋税负担减轻不少，但中产阶级和劳工阶层的赋税负担却由于个人工资所得税的增加而提高。1978—1990年间，工资中的社会保险税增加了30%。[①] 1981年时整个联

① 为什么工薪阶层所缴纳社会保险税在收入中的比重超过了富人了呢？这部分地是因为社会保险税是一种封顶税，即超过一定数额后就无需再交。以1993年1月为例，年收入57600美元者只交7 65%，超过这个基数77400美元的话，只需再交1.45%。另外，这一税种不适用于投资收入如债券利息和股票分红，因此这是一种对富人而非低收入阶层的税收减免。再加上州和地方的税收，到80年代中期，中等收入的纳税人比高收入者承担更重的税赋。

邦的税收收入为5990亿美元,12年后,提高到10910亿美元的空前高度。所以,共和党执政的12年既没有大幅度地减少联邦政府的开支,也没能大规模地减税。所谓的供给优先与其说是一个现实,不如说是一个口号。

二是里根的经济计划牢牢地依靠紧缩银根来降低通货膨胀。这直接与供应学派所希望的结果相矛盾。供应优先的政策旨在刺激经济升温,而紧缩货币意在给经济降温。在这一目标的冲突中,紧缩银根占了上风。通货膨胀率从1980年的12.4%降到了1982年的不到7%,贴现率——联邦储备银行贷给其会员银行的利率从1981年21.5%的历史高度下降到1982年夏天的10.5%。

银根紧缩也意味着贷款不易,生产资本不足。企业家只好降低生产成本,工会不情愿地同意减少工资,生产和消费者的开支随物价一同下降。1981年第四季度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了5.3%,失业率达到了8%,为6年来的最高。是年底,全国工业生产能力的1/3处于闲置状态,工人的实际收入比10年前还低;由于农场抵押、拍卖和破产的增加,农民的收入下降得更为可怕。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美国人比1979年增加了60%,供应学派的希望成为萧条的现实。

1984年总统大选前,美国经济迅速好转。当年的国民生产总值上升了6.8%,是1951年以来增长最快的一年;失业率下降到7.1%,为4年来最低;通货膨胀率降到了1967年以来的最低点,只有4%。这大大有助于共和党竞选,加上里根的个人魅力,里根大胜民主党候选人蒙代尔,夺得了50个州当中的49个州的选票。

在里根的第二任期内,美国出现了一股公司企业合并的浪潮。在此之前美国历史上出现过两次工业合并的高潮,较强的一次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较弱的一次在20世纪50～60年代,此后,合并运动开始稳定下来(参见附表)。

80年代中期出现的兼并浪潮相当突然,且规模宏大,远远超

过了历史上的前两次。在这次浪潮出现前相对平静的年代，最大公司之间每年兼并的数量不超过 100 起，所涉及的总资产仅在 50 亿美元左右。而现在，数量多得惊人，1984 年有 2999 起大的兼并，涉及的总资产达到 1240 亿美元。次年的兼并数目更高，其中 5 起最大的兼并案所涉及的资产数量超过了兼并浪潮出现前 10 年的兼并案的总资产。

美国最大制造业公司的在整个行业中的资产份额

	1948	1960	1970	1981	1982	1983
100 家最大的公司	40.2	46.4	48.5	46.8	47.7	48.3
200 家最大的公司	48.2	56.3	60.4	60.0	60.8	60.8

材料来源：Statistics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Table # 866。

造成这次兼并热潮有两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一是高利率和高通货膨胀率结合所产生的金融动力。高利率和高通货膨胀率压低了上市公司在股票市场上的价格，以致许多公司拥有的资产的现金价大大超过了市场对这些公司本身的估价(股票价)。于是，金融家和雄心勃勃的竞争者便纷纷购买这些价值被低估了的公司，然后以远高于公司本身的价格出售它们的资产，从中牟取暴利。

二是政府态度的变化。司法部对兼并活动的友善态度排除了以前曾经阻碍兼并活动的种种法律和行政障碍。结果，在尽可能多的工业部门中放松管制的政策取向为这些部门的竞争性兼并奠定了基础。以航空公司为例，由于联邦航空署逐步放宽了监管，航空公司竞相鲸吞，极大地减少了航空公司的数量，改变了这一行业中的航线和价格构成。

80 年代的兼并热潮与以前的兼并活动在目标上有所不同。以前的兼并主要是出于减少竞争的考虑，兼并的各方都急切地相互合作，以达到目的。在 80 年代的兼并中，唱主角的是那些虎视眈眈的股票大炒家，特别是那些金融大鳄。他们想的只是从股票

投机中赚钱，而无意于创建一种更为稳定的工业发展模式。

出现这一变化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与以前公司的所有者和经营者往往是一人（诸如洛克菲勒或福特）不同，现在绝大多数公司的经营者不再为股票持有者所熟悉。结果，当股市大炒家向这些持有者开出的股票价格远高于市场现价时，经营者根本没有能力来阻止股民出售他们手中的股票。同样地，一些大的法人投资者如退休基金和人寿保险公司，赞赏金融大鳄的做法，因为为争夺某一公司控制权而展开的竞价战有助于股票价格飚升。

其次，这些股市大炒家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银行愿意向他们提供大量资金，且无需必要的担保。大炒家利用这笔钱收购散户手中的股票，达到控股和兼并的目的，随后大炒家再把银行的债务转到所收购的公司上。公司遂发行高利润高风险的"垃圾债券"。为了吸引散户购买，这些债券往往附带诱惑性的优惠。而由此募集到的资金，则被用以偿还银行最初的贷款。虽然联邦储备委员会后来禁止了这种一本万利的集资方式，但一时间这一方式成为推动兼并进程的巨额购买资金的来源。

这种兼并的结果不像其原因那样一目了然。有人支持这一兼并热潮，也有人反对。支持者相信，这种兼并虽然有些残酷，但不失为医治某些松懈臃肿行业的良药。他们说，作为兼并的结果，现存的公司变得节俭而有效率，如果它们想在日益激烈的全球范围内的市场竞争中立足的话，它们只能如此。反对者则强调，迫使公司用它的净资产去冲抵债务——即用没有法律义务，必须支付股民红利的股票去交换必须偿付利息的债券——的做法损害许多公司的利益。总的来说，由于兼并热潮，美国公司平添了2000亿美元的债务。因此，它们在能够赚钱盈利以前，首先必须偿付这笔巨额债务。

保守的共和党政府只注意到了兼并可能会提高美国公司国际竞争力的积极一面，忽略了这种兼并的潜在危机，许多公司在最初

成功之后因无力解决众多的新增债务而失败。衡量保守派的观点是否可信，不应该看成功的公司，而应该看失败的公司重新回到商界的能力。正是这一在兼并运动中被严重忽略的一面的成功与否决定了成千上万的工人和中层管理人员的经济命运，他们并不是因为自己的过错而离开自己原有的工作岗位。

布什时期美国经济中的新难题

布什任期(1989—1992)的4年间，世界发生了巨变。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冷战以美国的胜利和苏联的解体而结束。美国人不仅憧憬和平的世界新秩序的建立，而且希望能在国内享受到“和平的红利”——军费开支减少所带来的财政节余转用到更需要的国内开支上。但结果却令他们非常失望。冷战的结束并没有带来美国经济的振兴，这一时期美国国内遇到了严重的经济问题。布什任期四年间，美国人的平均收入实际上没有增加。并且，在他任期的后两年还出现了一次经济衰退，其严重程度与80年代初紧缩银根所造成的衰退不相上下。

布什政府期间的美国经济困难在很大程度上是多年累积而成的。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美国基础设施建设在数量和质量方面呈连年下降的趋势。所谓基础设施是指一个国家拥有的生产资本，如公路和水坝，港口和机场，公立研究和教育机构，等等。这种公共资本并不生产通常意义上的商品，但它在极大的程度上决定了私人经济部门生产商品的效率。与有赖于私人实物资本一样，工商界的兴旺与否也同样有赖于完善的交通系统，充足水力和电力的供应以及良好的邮政服务。简单地说，基础设施就像铁路的路基，决定了经济列车通行的速度。

在里根—布什时期，美国的基础设施衰败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据统计，1976—1990年间，联邦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减少了1/3，教育和培训方面的投入减少40％，研究和发展的费用减少

了30%。专门研究这一问题的美国经济学家阿施纳甚至认为，80年代联邦政府在国防领域以外的公共投资仅相当于前10年的一半，仅及50～60年代的1/4的水平。

忽略公共投资的做法是基于这样一种保守的经济观念：私人活动应该是经济增长和社会福祉的源泉。实际上，保守主义所信奉的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却不这样认为。在《国富论》中，斯密强调政府对其公民有三项责任，其中前两项与保守派总统的政策目标相吻合：国防和法制。但第三责任却是他们所忽视的：它是"建立和维护一定的公共工程和一定的公共机构，这些都不是任何个人或团体有兴趣为之的，因为它们所带来的利益不足以获得可以抵销开支的回报，尽管对一个伟大社会来说，通常其意义远大于具体的利益回报。"

在这里，斯密非常明确指出了政府在公共工程和公共教育方面的责任对经济所产生的积极作用。尽管里根和布什的助手们常常引用斯密的自由经济的论点来为共和党的政策辩护，看来他们未必全面了解了他的思想。

这一时期出现的第二个严重问题是金融危机，其影响之大为1930年以来之最。这次的金融危机主要集中在美国西南部的信用合作社(savings and loan institutions, S&Ls)。80年代后期，信用合作社纷纷破产，影响恶劣。与基础设施建设问题一样，其灾难的根源是在里根时期埋下的。传统上，信用合作社只从事小规模存款和房屋抵押贷款业务。它是一种由存款人共同拥有的非盈利性的互助社，存户的利息很有限。里根时期，政府减少了对经济活动的监管，信用合作社乘机游说国会同意它们扩大业务范围。不久它们便转变成盈利性的股份制金融机构，利用高利率来吸引储户，并且以不拘形式的抵押贷款来争取客户。里根政府寄希望于企业自我约束，国会也因为其很多议员得到信用合作社的竞选资助而不愿意通过监督其活动的有关议案。结果出现几十亿美元的

呆账和坏账，这笔巨额资金通常被用于不适合银行进行投资的高风险的投机活动，有些交易甚至与20年代金融操纵与舞弊相仲伯。信用合作社的大批破产不久便影响到了从事正常业务的主要银行。好在由政府出面偿还了储户们那些由联邦政府保险的帐户。政府的救急措施代价昂贵，信用合作社的所有呆账和坏账在30年内才能结清，最后的总金额将超过500亿美元。

美国的财政赤字

里根—布什时期政府的财政赤字猛增，达到了难以控制的程度。美国的财政赤字是指联邦政府以发行公债的形式向公众借钱。[①] 里根上台的1981年，联邦政府的赤字为740亿美元，不到国民生产总值的3%，到1992年布什离开白宫时，赤字上升到3400亿美元，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5.7%。在同一时期里，国家所有未偿付的债务从6290亿美元上升到4万亿美元，即从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23%增加到68%。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政府财政赤字和债务如此惊人的增长呢？首先是里根—布什两任政府都没有能够控制住联邦的开支。国防和社会保障的开支一直在增加，美国总统和国会对此都力不从心。国防开支降不下来有两个具体的原因，一是削减国防开支意味着减少国防订货，这必将导致相关工业部门工人的失业，从而增加各州和地方政府的就业压力；二是国会和总统都不想削弱美国作为超级军事大国的实力，这一实力在1991年初的海湾战争中得到充分的显示。

社会保障方面开支增长的原因较为复杂，这方面的巨大社会需求除了联邦政府外没有其他任何机构可以给予满足。尽管如

---

① 美国政府财政部一般发行三种债券，一种是短期公债（bill），通常以30、60和90天为期，另一种是一年期的公债（note），最后一种是长期公债（bond），期限最长可达30年。

此,美国依然有3500万左右的人享受不了卫生保健的好处,1500万人营养不良,还有1000万人只有部分的医疗保障。但另一方面,美国花在医疗保健方面的费用却高得惊人,1992年达到了8385亿美元水平,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4%,为世界各国之最。

其次是美国政府的税收不高。美国人对征税有着根深蒂固的反感,一直认为自己税赋过重,常常利用自己手中的投票权来惩罚那些胆敢同意征税的政客和议员。事实上,在所有工业化国家中,美国几乎是税赋最低的国家。据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统计,德国的税收相当于其国民生产总值的38%,法国为44%,而荷兰和比利时则是50%,美国仅有28%。因此,如果像其他工业化国家那样征税的话,美国的财政赤字会小得多。美国的税收达到法国的水平的话,其1992年的财政收入就可增加1500亿美元,相当于当年赤字的40%。

税收不足的原因之一是美国税收结构不尽合理,过多地依赖最令人反感的税种。美国税收的36%来自收入所得税,相比之下,德国只有30%,法国还不到12%。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收入所得税是最公平的税种,因为通常是按收入所得的多少来征收。但纳税人往往不这样看,他们常常认为政府把自己辛辛苦苦挣来的钱拿走一部分是一种强迫行为,远不像汽油税和一般的消费税那样公平合理。

由于上述两个原因,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居高不下。政府赤字意味着借贷,借贷的结果则是利弊兼具。政府借钱偿付以前的债务或支付其雇员的工资是滥用自己的举债能力,就像一个公司借了新债还旧债,或借钱发工资一样糟糕。但是,如果政府举债是为了基础设施的建设,就很有意义,就像一个公司借钱开办新的生产企业,或像一个家庭借钱供孩子上大学一样。

对于公司和个人来说,很容易判定他们借钱的目的,因此也好判定他们的债务是一种包袱还是发展的源泉。但对于政府来说,

就很难作出这种明确的判断。美国联邦政府的统计制度只把税收作为收入(不计算借贷),而在计算支出时则分成了正常开支和公共资本开支。这样人们就无法知道政府借来的钱具体用在了什么地方。

里根—布什政府期间,新政以来美国社会贫富差距缩小的趋势出现了逆转。在保守主义的旗帜下,美国对企业家们的鼓励和奖励比起其他国家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下表比较了美国公司主管与其他西方国家同行的收入。

公司总裁的年平均收入(包括公司奖励的现金和股票)

	最大的30家公司	所有公司
美国	320(万美元)	74.7(万美元)
英国	110	39.96
法国	80	44.85
德国	80	36.45
日本	50	37.18

资料来源:New York Times, Jan. 10, 1992.

1990年,美国公司的总裁(chief executive officers, CEOs)的收入119倍于他们属下的普通工人的工资,相比之下,日本公司总裁的收入则只有其工人的18倍左右。尽管80年代经济有所发展,但社会财富集中到越来越少的人的手中。就整个美国而言,在80年代,最富有的20%美国家庭的收入增加了17%,他们在全国收入中的份额从41.6%增加到了44%,同期最穷的20%美国家庭的收入却减少了9%,60%的中间阶层家庭的收入也略有减少。这真可谓富者逾富穷者逾穷。80年代成为30年代以来第一个大部分美国人实际生活水准下降的10年。

贫富差距的扩大加之一些社会福利项目的减少甚至是取消,导致美国的某些社会问题日趋严重。美国无家可归的人达到了

100 万人之多，他们踯躅各城市的街头，靠人们的施舍度日，成为令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强大国家难堪的一景。全国性的毒品和枪支泛滥以及犯罪不断增加的现象前所未有地严重，成为一时难以解决的棘手问题。

美国成为净债务国

里根—布什时期，美国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从一个净债权国转变为一个净债务国。随着欧洲和日本的经济复兴及发展，美国经济实力一时呈现相对下降的趋势。

除了个别年份例外，20 世纪以来，美国一直享有作为世界主要生产者而拥有的种种好处。二战后美国的经济实力和优越的国际经济地位更是达到了无与伦比的程度。美国的这一经济优势不仅仅来源于其远离战火的独一无二的地理位置，而且也同样来源于其在工业生产方面超群不凡的技术创新和科学管理的能力。正是在这两个条件的作用下，在战后 25 年里，美国平均每年的出口额比进口额超出 100 亿美元左右。一时间，美国作为国际主要工业生产者的地位似乎变得牢不可破。

但情况并非永远如此。从 80 年代开始，美国长期以来拥有的国际贸易出超地位出现了逆转。1982 年，美国的商品和服务贸易出现了 206 亿美元的赤字，即美国从世界其他国家购买的商品和服务超过了它对这些国家出售的商品和服务。第 2 年，这个赤字翻了一番，1984 年又比前一年翻了一番，达到了 1027 亿美元。次年，更增加到 1431 亿美元的空前程度。美国从一个贸易出超国转眼之间成为了贸易入超国，真可谓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

从 1988 年开始，美国贸易地位恶化的趋势得到控制，情况开始有所好转。到 1991 年，美国贸易赤字下降到 218 亿美元。最糟的危机虽然过去了，但美国仍然处于贸易赤字严重的处境，国会内外常常响起贸易保护主义的呼声。

美国贸易地位的这一变化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历史的原因。二战刚一结束,美国决策者就认识到战争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将会威胁到资本主义世界的稳定,进而可能影响到美国国内的繁荣和稳定。在欧洲,有3000万人死于战争,在亚洲,也有2000万以上的人死于战争。农田荒芜,工厂关门,基础设施破坏严重,很多工商业城市夷为平地。在绝望的人们中,革命的情绪在增长,共产党的影响在扩大。为了保证和促进资本主义世界的稳定,维持一个对美国工商业"门户开放"的国际市场,美国设计建立了战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三大支柱: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税和贸易总协定,并开始帮助重建欧洲和日本。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帮助欧洲复兴的马歇尔计划(1947—1952年),为此,美国向西欧投入了130亿美元的巨额资金。

随着国际贸易和金融秩序的重建和正常,欧洲和日本医治了战争的创伤,迅速地恢复了经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工业生产国和产品输出国,美国也相应地得到了持续的繁荣。国际贸易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各国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成为战后世界经济繁荣的一个主要推动力。仅70年代,世界贸易增加了7倍,远远快于同期各国经济的增长。尽管美国依然是世界上经济最强大和最富有的国家,但它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绝对优势地位不可能长期维持。过去只有美国才能生产的产品现在到处都可以生产,各国农业生产的恢复和提高减少了它们对美国农产品的依赖。同时,美国人迟钝地发现,欧洲和日本开始生产出各种物美价廉的新产品。结果,1960—1983年间在美国的工业品出口扩大了10倍的同时,它所进口的工业品则增加了25倍;二是较为复杂的财政上的原因。从卡特时期开始,通过出售美元债券的政策,美国先是从欧洲,然后又从日本和盛产石油的阿拉伯国家获得了巨额美元现金,用来弥补它的财政赤字。这一做法产生了两个后果:首先,它提高了国际外汇市场上美元的汇价,因为欧洲各国都非常愿意用它们跟美

国兴盛的贸易中所赚得的美元来购买高利息的美国政府债券。由于美元汇价的坚挺，外国的商品和服务就显得极为便宜。因此，美国人在海外的旅行费用非常低廉，导致旅游业的兴旺发达。事实上，70 年代以后旅游业已经成为世界上重大的一项单一行业。在坚挺的美元使外国商品变得便宜的同时，对外国人来说，美国的商品则显得昂贵，美国的出口能力因而大受影响。制造业以及相关的利益集团向政府施加压力，希望压低美元在国际市场上的汇价。1985 年政府满足了它们的要求，执行了美元贬值的政策，短短两年间，美元对日元和德国马克的汇价跌落了几乎 50%。美国成为西方各国消费者购物和旅游的天堂。外汇价格这一剧烈波动有助于说明美国在世界贸易市场上地位的大起大落。这种变化也产生了一个没有预料到的变化。美元汇价的大跌不仅增加了海外进口美国商品的能力，而且也刺激了外国拥有美国资本的胃口，即收购美国的股票、债券、房地产和工厂企业。1980 年时外国只拥有美国制造业中 3% 的资产，1988 年时德国、英国和日本等海外投资者已拥有美国制造业中 12% 的资产。90 年代初，日本资本大举进军美国，先后收购了许多极具象征意义的美国公司，如纽约著名的摩天高楼——洛克菲勒大厦，加州好莱坞的电影制片公司，从未有过如此经验的美国人大呼："日本在收购美国"。引起了阵阵反日浪潮。

美国贸易地位以及美元本身出现的这些巨大变化不仅带来这些直接的问题，而且也预示着未来可能出现的新的经济发展潮流，那就是美国的经济生活日益融入到全球的经济生活之中，换句话说，在一个全球经济的新时代中，美国经济很难再处于绝对优势的地位。

第六章　重振雄风:90 年代的美国经济

1992 年大选,美国民主党候选人克林顿当选为美国第 42 任总统。克林顿是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之一,也是美国第一个二战后出生的总统和冷战后当选的第一位美国总统。克林顿执政后,将振兴美国经济当作首要任务,提出了"恢复美国经济活力"的一揽子计划。在克林顿第一任期内(1993—1996 年),美国经济状况明显好转,从而使其能在 1996 年总统大选中再次当选。

克林顿当政以来,美国经济长期快速稳定地增长,年增长率平均在 2% ~3% 之间,消费物价指数控制在 3% 以内,失业率从 1992 年的 7.4% 降至 1998 年的 4.2%,呈现出"两低一高"(低通胀、低失业、高增长)的良好发展态势。直至 90 年代末,美国经济基本健康,尚未出现衰退的征兆。80 年代以来一直困扰美国经济的痼疾——联邦财政赤字大幅下降,并在 1997—1998 财政年度出现了 30 年来第一次财政盈余。美国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明显提高,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投资和股市高涨,拉大了美国和其他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90 年代美国经济出现的一些新现象,使美国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美国已进入"新经济"时代。

90 年代美国经济发展的国内外环境

克林顿执政之初,美国经济虽已从 1990 年 7 月至 1991 年 3 月持续 8 个月的衰退中复苏,但形势依然十分严峻:经济增长缓

慢,失业率高达7.8%,并且存在许多结构性的问题,主要是“双高赤字”和产品缺乏国际竞争力。

首先是巨额的联邦财政赤字和国债。1979年美国联邦赤字仅为402亿美元。80年代初里根上台后,实行减税和削减财政开支的财政政策,使联邦财政赤字大增。1981年美国的财政赤字为579亿美元,1982年就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达到1106亿美元,1983年又增加到1954亿美元。1984年由于美国经济增长强劲,赤字有所下降,但仍高达1750亿美元。1985年,美国国会通过《拉格姆—拉德曼平衡预算法》。它规定了1986—1990年每个财政年度赤字的最高限额,提出在1991年度消灭财政赤字。然而该法执行的头一年,联邦赤字创下2219亿美元的新高,1986年仍高达2207亿美元。里根执政8年,美国累计财政赤字超过1.6万亿美元,为以前历任总统在204年中累计赤字的1.8倍。布什总统上台后,一方面继续大规模增加军事开支,以求巩固美国在世界的霸主地位;一方面实行减税政策,以求刺激国内经济增长,从而导致联邦财政赤字扶摇直上。1990年赤字额为2214亿美元,1992年为2904亿美元。巨额的赤字只好通过举债弥补,使美国长期利率居高不下,严重地阻碍了美国的经济增长,同时也削弱了财政的资源分配、收入分配和调整经济周期的职能,限制了政府调控宏观经济的手段。在经济面临衰退时,联邦政府已无法再运用大规模的预算赤字政策来刺激经济的复苏。

其次是巨额的贸易赤字。1971年美国的外贸出现战后的第一次逆差,到80年代情况进一步恶化,贸易赤字由1980年的253亿美元增加到1986年的1700亿美元。1988年这个数字达到了1373亿美元,相当于该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2.9%。里根执政时留下的巨额贸易赤字到布什时虽有所减少,但每年仍超过1000亿美元。

最后是产业竞争力每况愈下。70～80年代,美国商品出口开

始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在传统产业方面,80 年代美国在钢铁、机械、化工等称雄一时的领域受到日本巨大的挑战。直到 90 年代初,美国最大的企业——通用汽车公司仍处于严重的亏损阶段。接着,在美国人引以自豪的电视、激光、录像机以及半导体、集成电路、计算机等新兴产业中,美国的优势也逐渐丧失。甚至在信息技术产品方面,美国的优势一度也受到严峻的挑战。80 年代中期,日本半导体芯片在世界市场所占比重超过了美国。从 1983 年到 1990 年,美国在世界半导体制造设备市场的份额从 66% 下降到 44%,日本跃居第一位。

上述因素,加上美国社会贫富差距拉大、人民生活未见改善等社会经济问题,加深了美国公众对现政府的不满,迫使克林顿政府把振兴美国经济放在政府各项工作的首位,并根据国内经济形势来调整美国宏观经济政策。

与此同时,美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国外经济环境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大大有利于克林顿政府的政策调整。冷战的终结既使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大为改观,也使美国政府经济政策的主要任务和目标发生变化。首先,冷战时期,在美苏直接对抗的两极国际政治格局下,美国把遏制苏联作为国家安全政策的核心内容,政府经济政策的目标是为其"遏制政策"提供必要的和有效的经济支持。冷战结束后,随着苏联的解体和俄罗斯对外政策的变化,美国的全球战略环境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美国可以也必须对其经济政策的目标进行修订。其次,伴随着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世界经济格局也发生了新的巨大的变化,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进一步突出,以经济为基础、高技术为先导的综合国力竞争成为国际竞争的重点。这两大因素迫使克林顿政府把繁荣和振兴美国经济提升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中心目标。第三,在克林顿当政时期,世界经济作为一个整体,呈现了许多新的特点,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集团化的趋势进一步发展;以信息技术为主要内容的新

技术革命在90年代迅猛发展,经济信息化进程加快,成为引导当今世界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的一大潮流和趋势;全球金融流动速度加快和金融交易量大增也增加了各国经济发展中的金融风险,地区性金融危机不断出现;跨国公司在全球生产、投资和贸易中的作用越来越大,等等,这些新变化和新特点,在促使美国企业加紧产业和企业结构调整的同时,也迫使美国政府加强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并根据形势变化调整经济政策。最后,世界上不同类型国家的经济在进入90年代后都遇到不同的困难和问题:西欧经济长期深受"两高一低"(高失业率、高财政赤字和低经济增长)的困扰,日本经济在90年代初泡沫经济崩溃后长期低迷不振,东亚一些国家在90年代前半期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后于1997年10月后发生了金融危机,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经济由于转轨而严重下滑。在全球经济相互依赖进一步加深的今天,这些都对克林顿政府经济政策的制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克林顿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及其目标

1993年2月17日,克林顿在向国会提出的第一篇国情咨文中指出,美国所面临的各种挑战和机遇中,经济问题比其他任何问题都重要。他明确提出美国政府国内政策的中心是"恢复美国经济"。克林顿入主白宫后,马上组织成立国家经济委员会,作为政府最高经济决策机构,负责协调政府各部门之间的经济工作。在1994年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克林顿政府强调,美国首要的经济目标是"扭转美国国际竞争力的下降趋势",因为竞争力下降是10多年来美国在国际经济活动中陷于困境的根源。

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克林顿政府加强了对经济政策的宏观调节,其核心是削减赤字,实现预算平衡。在1993年提出的《振兴经济计划》中,克林顿政府提出了增税和削减开支的财政政策,具体措施有:(1)在增税方面,一是调整税率。《经济振兴计划》将个人

收入所得税平均税率从原来的 31% 提高到 36%，将公司收入税从 34% 提高到 35%，使联邦政府在 5 年时间内增税 2460 亿美元。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增税计划之一。二是增收新能源税，4 年内增收 714 亿美元。(2)在削减政府开支方面，通过裁减联邦政府雇员和减少军费预算来削减财政赤字。《经济振兴计划》规定在 4 年内减少政府开支至少 350 亿美元，减少国防开支 760 亿美元，加上其他项目的削减，计划在 4 年内使联邦政府财政赤字的规模，从每年的 3000 亿美元减少至 1000 亿美元。克林顿第一任期结束时，财政赤字已由 1992 年度的 2 904 亿美元降至 1997 年度的 226 亿美元，年均削减 66.6%。1997 年 5 月，克林顿政府与国会达成 5 年实现财政预算平衡的协议。新一届国会要求到 2002 年实现财政预算赢余，从根本上消除困扰美国经济健康发展的财政赤字问题。根据这一协议通过的《财政预算平衡法案》和《减税法案》规定，1998—2002 年度，老年医疗保险开支和穷人医疗补助开支分别削减 1150 亿美元和 130 亿美元；对没有医疗保险的 1000 万儿童中的一半提供 240 亿美元的医疗保险开支；对 35 万合法移民支付 120 亿美元的医疗保险；净减税收约 950 亿美元。

由于巨额的财政赤字，财政政策在刺激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受到较大的限制。因此，克林顿政府还通过实行稳健和灵活的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进行调节。美联储一方面仍以控制通货膨胀为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另一方面又通过灵活的货币政策工具，主要是利率工具的作用，刺激经济发展，使失业率保持在较低的水平。

除了财政和货币政策外，克林顿政府还对美国的贸易政策作了较大的调整，实施了以新贸易主义为核心的国际贸易政策，即“战略性贸易政策”。这一政策是自由贸易和新贸易理论的混合产物，其特点是一方面仍然强调维持开放的贸易体系，另一方面积极帮助美国企业在国内外市场上竞争。其目的主要在于强化美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通过扩大出口，带动美国经济进一步增长，并创

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为此,美国国会在1992年专门通过《出口促进法》,制定了国家出口战略。其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对出口的干预,积极倡导展开国际经济外交;二是改革机构设置,为出口商提供全方位的优质服务。商务部、小企业管理局、进出口银行等政府机构采取联合办公方式,为企业提供优质一条龙服务;三是积极为出口商提供出口市场经贸政策、法规、市场特征、出口战略方面的咨询服务。此外,政府还帮助企业扩大出口融资预算,拓宽融资渠道,强化对出口的金融支持;最后是放宽对高技术产品的出口管制,增强美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在积极采取鼓励出口措施的同时,克林顿政府还努力推动双边、区域经贸合作及贸易、投资的自由化。美国通过双边贸易谈判对贸易伙伴施压,迫使其对美国开放市场。如要求日本开放大米、汽车零部件、银行与保险业、航空服务等市场,以减少日美贸易逆差。在积极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方面,美国也不遗余力。它一方面积极推动亚太经合组织内部18个成员的贸易、投资自由化进程;另一方面,努力扩大"北美自由贸易区"的范围,力图将"南锥体共同市场"4国拉入到北美自由贸易区,并积极推动由30多个国家参加的"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以此来维持较为稳定的出口市场。

在推动双边贸易和区域经济合作的基础上,美国努力维护世界多边贸易体制的权威,推动乌拉圭回合谈判结果的实施。美国商务部在1994年的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乌拉圭回合协议如能全部实施,美国每年将收益1000～2000亿美元,而且将增加几十万个就业机会。为了使潜在的贸易利益变为现实,美国政府一是为有贸易竞争力的产业提供进入市场的机会;二是积极推动《服务贸易总协定》框架下服务分部门协议的贸易自由化。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服务业,因此,将扩大服务业视为减少其贸易逆差的关键环节,努力在服务业实现自由化。在美国的积极推动下,各

国就基础电讯、金融服务、信息技术协议、自然人移动服务、海运服务、专业服务自由化的谈判进程加快。三是在世界贸易组织内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维持较大的技术贸易顺差。据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材料,1997 年 1～10 月,美国平均每月高技术产品出口达 150 亿美元以上,贸易顺差 37 亿美元。

80 年代,美国在国际竞争力下降,经济面临一系列结构性问题的情况下着手进行产业和企业结构的调整。进入 90 年代以来,美国加大了经济结构调整的力度:一是为适应信息技术和信息时代对产业和企业结构的要求,适应美国经济由工业经济向信息经济转变的需要,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二是为应付国际经济领域的新挑战,努力增强美国企业的竞争力和防范金融风险的能力,保持 90 年代以来美国经济在低通货膨胀下强劲增长的势头,争取开创"新经济"。美国经济这一轮结构性调整是在产业结构以及企业的组织结构和经营管理方式两个层次上展开的。

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

90 年代以来,美国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优先发展信息产业,以促进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进一步提升产业结构。其主要措施有:

(一)增加研究与开发的投入,尤其是计算机硬件和软件的研究与开发。90 年代头 4 年,美国研究与开发的费用分别为 1500 亿美元、1516 亿美元、1619 亿美元和 1846 亿美元,比上年分别增长 5.6%、1.1%、6.8%和 14%。美国研究与开发投入占其 GNP 的比重由 1980 年的 2.3%提高到 1993 年的 2.9%。为继续保持其在高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1994 年美国政府提出把研究与开发投资增加到 2000 亿美元左右,占 GNP 的 3%,这个数字超过日本和德国两国研究与开发投资的总和。对高技术研究与开发的重视

改变了 80 年代美国在一些高技术领域竞争力相对下降的局面，提高和保持了美国在半导体、信息、航天航空、新材料等技术密集型产业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

（二）增加对高技术设备的投资。80 年代美国企业在计算机和通信领域的投资年均增长率高达 20% 以上。1990 年美国在这一产业的投资首次超过对其他产业的投资。1991—1995 年美国与信息有关的设备投资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 14.4%，其中与计算机有关的投资的增速高达 29.7%，1995 年和 1996 年的增长速度分别为 32% 和 45%。1996 年美国用于计算机等信息处理及其相关设备的投资达 2060 亿美元，是对其他工业设备投资的 1.6 倍，占美国企业固定资本投资总额的 35.7%，占世界同类投资的 40%。美国企业对高技术设备的投资一方面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使企业利润大幅增加；另一方面，由于运用计算机系统对订货、交货和存货进行即时控制和管理，大大缓解了以往商业周期中经常出现的生产能力无法适应市场需求变化的现象，成为 90 年代美国经济良性循环的重要因素。此外，美国企业对信息技术产业的投资，还使美国在电脑关键部件和软件方面在世界上占绝对优势。以 1993 年为例，美国占世界微处理机市场的 90%。到 1995 年 8 月，美国上网电脑已超过 440 万台，占世界总数的 63%，而西欧、日本则分别仅有 146 万台和 25 万台。在信息技术领域，美国比日本领先 10 年左右，而西欧与美国的差距还要大。信息技术产业已成为美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先导产业。据估计，在 90 年代美国经济的增长中，技术因素导致的增长占 50%。90 年代美国经济状况良好，主要归功于高技术信息产业的发展和电脑普及后生产成本的大幅下降。

在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同时，美国还加强对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主要是运用电子技术改造传统工业部门中落后的生产工艺，用计算机和网络化进行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从而给一些

“夕阳产业”带来生机和活力。此外，美国还有计划地把一部分淘汰的、丧失竞争优势的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甚至技术密集型产业向海外转移。

企业结构以及经营战略和管理方式的调整

与产业结构调整、高新技术发展相适应的是以增强竞争力为中心的美国企业结构的调整。90 年代美国企业结构的调整，既包括企业组织结构的重组，也包括企业内部管理结构的“再造”或“重新设计”和企业经营战略的调整。

美国企业结构的调整主要表现为并购与缩减规模这两种并存而又相反的趋势。80 年代中期，美国企业掀起了本世纪第四次并购风潮。1993 年以后，企业并购再次席卷美国各地。这次并购的特点一是规模空前大。在美国已宣布的并购案中，交易额达 10 亿美元或超过 10 亿美元的有 100 多起；1995 年并购资产额为 5180 亿美元，1996 年又达到 5370 亿美元。1998 年上半年，仅 220 亿美元以上的合并案就有 9 起。二是并购活动涉及各个行业，不仅发生在飞机制造、钢铁、汽车、化工等传统产业，而且波及金融、保险、电信、交通、旅游、电脑及软件、商业零售等第三产业，并以后者为主。三是大企业间的强强联合和兼并，尤其是跨国横向联合或兼并成为主要形式。80 年代的企业并购以跨行业的纵向并购为主要形式。90 年代的企业并购主要是在同行业或相近行业中横向进行，并且并购的对象多为行业中在竞争中占优势的企业，有不少企业是把自己在行业中的最大竞争对手作为并购对象。而这些被并购的企业也愿与从前的对手携手，通过横向强强联合，扩大经营规模，降低经营成本，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提高在国际市场上的占有份额。如波音和麦道公司合并后组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飞机制造公司，在世界市场上的占有份额上升为 65%。美国克莱斯勒公司与德国戴姆勒－奔驰公司合并使其稳坐全球汽车行业老三的

位置。而1999年5月埃克森石油公司与美孚石油公司高达800亿美元的合并使之成为国际石油业的巨无霸。

同样是为了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一些企业(包括并购企业)也采取缩减规模(downsizing)的重组方式,其中最常见的方式就是下岗或裁员。70年代美国制造业生产率的增长仅为1.4%,而其他发达国家约为4%。80年代美国制造业生产率提高较快,约为3.6%,其原因之一就是裁员。进入90年代以来,美国大型制造业公司再次大刮“裁员风”,大批工人和中层管理人员被解雇,从而使下岗和裁员成为1992年和1996年美国总统选举的一个重要问题。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后,为减轻危机造成的不利影响,美国各大公司连续进行较大规模裁员。美国电报电话公司宣布裁员1.66万人,并且裁减最高管理层人员25%,在90年代,企业缩减规模既是为降低公司劳动成本,提高办事效率,也是用高新技术对企业进行技术改造的结果。

与企业组织结构调整相伴的是企业管理结构以及经营和管理战略的调整。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知识经济时代的日益临近,美国企业经营和管理的内涵也发生了迅速而根本的改变。工业时代基本的商业原理已不再起作用,一种全新的经营和管理战略与理念正在出现,以知识为基础组织生产和经营已成为新型企业的象征以及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这首先表现在企业管理结构和管理方式的调整。90年代“新企业管理革命”的核心是“企业重新构建”,或“企业再造”。它是继60～70年代全面质量管理之后的第二次工商管理革命。所谓“企业重建”,是指对公司和公司经营过程进行根本性的设计以达到成本、生产时间的节省和质量的改进。其主要内容:一是企业组织结构从“金字塔型”向“网络型”转变。在计算机化和网络化的基础上,对企业原有的管理结构进行大规模改组,变纵向管理为横向管理,减少中间环节,精简管理机构,并在不同层次扩大职工参与决

策;二是使企业的组织机构具有“可重塑性”,使企业的组织机构在任何条件下都能及时地作出相应的变化以适应市场迅速发展需要的变化;三是建设智能基础设施,运用信息技术进行管理。信息技术越来越多地用于公司的管理、生产和销售等各个环节,为提高公司的竞争力发挥了重要作用。计算机和互联网络的普及使企业能够更快地掌握市场信息,管理库存,也使生产流程越来越趋于合理,提高了生产的稳定性;四是管理的重点放在企业的核心领域,如产品的研制与开发、生产流程、材料的采购以及如何成功地将产品推向市场。五是重视研究学习别国的成功经验。在经营管理上,美国公司还非常重视研究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取长补短。美国汽车和半导体工业就借鉴了日本公司的不少做法。

其次表现在企业经营战略的调整。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由于新兴市场不断出现,产品的需求变化越来越快,竞争日益加剧,这必然要求调整企业的经营战略。90 年代以来,美国企业在以下几个方面调整了自己的经营战略:(1)着眼于国际市场。在经济全球化趋势日趋明显的情况下,企业仅仅在国内市场获得成功已远远不够,必须成为世界市场的领导者,始终站在世界该行业的前列,才能保证企业未来的生存。(2)收缩业务,重点经营传统产品。与 60～80 年代大力拓展业务种类,经营多元化不同,90 年代,随着科技的进步和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分散化经营的弊端日趋明显。要想加强国际竞争力,只有强化科技竞争力和企业核心竞争力。正因为如此,美国一些企业主动把非核心的企业分离出去。1996 年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把生产电信设备的朗讯公司和生产计算机的 NCR 公司分离开来,腾出资金专门经营电话业务。美国通用汽车公司 1985 年兼并了以生产卫星通讯设备和军用通讯产品为主的休斯公司,此外公司还经营数据设备、租车等多种业务。业务结构过于繁杂成为通用公司利润减少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从 1997 初开始,通用公司着力调整经营战略。首先是将休斯

公司所属占销售额41%的军用产品部分出售给专营军用品的富声公司,把当时约占销售额38%的汽车电子设备生产收归生产部门,让休斯公司专营卫星通讯设备;又让租车业务另立门户。公司朝着专营汽车的方向迈出一大步。(3)分散经营,即把企业分成能够各自对经营结果负责的自我管理单位。这样能在企业内部产生"内部市场",这种市场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对环境变化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能够共同组成一个效率高的整体。(4)增强协作,使知识作为一种资源和经营战略构想在更大范围内得以交换和共享,从而提高商业活动的效率。走联合开发的道路,使双方优势能得以发挥。通用汽车公司与日本丰田汽车公司达成协议,将在环境技术方面相互合作,联合开发新型低公害车。

美国企业结构以及企业经营和管理方式的调整,改善了美国经济的微观基础,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不仅使一些新兴产业的优势更加显著,也使半导体、汽车、钢铁、金融等80年代竞争力下降的行业重新获得活力。据统计,美国目前是工业化国家中生产者成本最低的,约比日本多10美元/小时的成本优势,比德国多20美元/小时的成本优势。

新经济的出现

克林顿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美国企业的大规模重组以及高新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加上外来资本的大量流入和国内投资旺盛,使90年代的美国经济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从而推动了"新经济"的形成和发展。

(一)经济持续稳定增长。进入90年代,美国经济在世界经济周期性衰退中率先复苏并一直保持低通货膨胀下的强劲增长。从1992年至1996年,美国GDP的年增长率分别为2.6%、3%、4.1%、2.9%和2.5%,年平均增长率为3.02%,居西方七国之首,远高于同期日本和欧盟的经济增长速度。1997年美国经济增长率

高达3.9%，为9年来之最。1991年以来，美国经济持续增长。到1999年6月，美国经济已持续增长94个月，创造了和平时期最长的经济扩张期。

（二）联邦预算赤字大幅度削减，出现财政赢余。克林顿入主白宫以来，长期困扰美国经济的财政和预算赤字逐年削减，最终得到解决。在克林顿第一任期内，财政赤字即由1992财政年度的2893亿美元降至1996财政年度的1073亿美元，4年时间里将预算赤字削减了63%，实现了他在1992年总统竞选时做出的"任期内将预算赤字削减一半"的诺言。从1998年起，在经历了30年的财政赤字后美国首次开始出现财政赢余，且增长的势头不减。据1999年2月1日克林顿总统向国会递交的美国2000年财政年度联邦预算报告预计，1999年财政年度的赢余可达800亿美元，2000年的赢余可达1173亿美元，未来10年累计将达2.41万亿美元。克林顿削减财政赤字的成功，主要得益于美国经济的多年持续增长、税收增加。此外，克林顿政府实施的削减赤字的一整套计划也起了相当的作用。

（三）就业人口大幅度增加，失业率不断下降。80年代以来，美国失去了4400万个工作机会，同时增加了7300万工作机会，净增2900万，因此目前工作岗位中55%是新岗位。克林顿上台以来，美国经济所创造的就业机会超过了1000万个。非农业部门每月就业人数增加近26万，是布什政府时期（1988—1992）的两倍。美国就业人口的持续增加使美国失业率节节下滑，从1993年年初的7.2%左右降至1996年的5.4%，1998年又进一步降至4.5%，是自1969年以来的最低记录。

（四）通货膨胀得到有效的控制。与以往经济增长所不同的是，1992年以来的持续增长和就业大幅度增加并没有带来通货膨胀的升高，相反，通货膨胀率一直在稳定地下降，1990年至1996年分别为4.3%、3.9%、2.9%、2.5%、2.7%、3.2%和2.5%，1997

年仅为1.7%。通货膨胀为30年来最低,并且仍在持续下降。

战后美国经济的一个经常现象是,如果GDP的年增长率超过2.5%,同时年失业率低于5%,将会有通货膨胀的危险。但90年代以来,在经济持续增长的情况下,美国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却同时在下降。以1997年为例,经济增长率超过3%,失业率降到5%以下,同时通货膨胀也下降到2%以下,出现了与70年代"滞涨"完全相反的情形,因此,美国许多经济学家认为,美国已出现了与以往不同的"新经济。"

(五)出口增长势头强劲。1993—1995年间,美国的商品和服务出口连续3年呈现迅速增长的势头。出口额从6180亿美元增至7870亿美元。90年代美国出口增长的特点是:第一,出口大幅增长是在美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美元贬值而不是美元升值的时期;第二,出口增长最快的领域是美国占优势的领域,主要是先进的半导体,计算机网络服务器,个人计算机,软件及其服务,娱乐业,金融和电讯。

1997年后,受东亚金融危机和全球性金融动荡的影响,美国出口有所下降。由于各国对美国农产品和制造业产品需求的大幅度降低,1998年美国商品出口比上年减少了83亿美元,降至6711亿美元,为过去13年的首次下降。同时由于到美国旅游的外国人数减少,美国的服务贸易赢余也从1997年的877亿美元降至789亿美元。出口减少,进口增加过快导致贸易赤字攀升。1998年美国贸易赤字总额高达1686亿美元,比1997年的1102亿美元高出了53%,也比历史上最高的1987年多出553亿美元。美国贸易赤字虽然增幅惊人,但主要是受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影响。从走势看,仍存在不少积极的方面。一是1987年贸易赤字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3.3%,而1998年则为2.2%。二是尽管美国产品的出口在下降,但其金融、商务、技术等行业的出口却在增长,与1997年相比,这些行业的出口增加了20亿美元。三是美国的预算实现

了平衡，在吸引外资方面也不存在问题。此外，从总体上看，美国产品出口仍存在不少优势，诸如出口市场多元化；高附加值产品为主等等。

（六）企业利润大幅度增加。美国银行业赢利持续5年创新了历史记录。美国最大银行大通曼哈顿银行1996年赢利比上年增长20%。同期，花旗银行赢利上升9%。美国第三大银行美洲银行的赢利在此期间也增长了6%。1998年第二季度，美国福特汽车公司的赢利比前年同期上升33%，达到创记录的25.3亿美元。1990—1994年，美国航空业曾连续5年亏损。1995年开始赢利，次年纯利润额就增加到28亿美元，1997年达到45亿美元。

（七）美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得以加强，在一些重要的战略性产业部门的领先地位得到恢复和加强。美国80年代在传统产业方面竞争力下降的局面得到扭转。1993年后，美国通用、福特、克莱斯勒三大汽车公司均先后扭亏为盈，销量大增。美国汽车的产量在1979年曾被日本超过，到1994年美国重新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生产国。80年代，美国企业进入世界500强的比例连年下降，日本则高居榜首。9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入围世界500强的企业在1995至1997年间减少了23家，而美国增加了11家，并且位次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多年雄居冠军的日本“三菱商事”和“三井物产”，在1996年终于让位于美国的通用汽车公司和福特公司。在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对世界各国的竞争力排名表上，美国连续3年位居第1，而日本则由1993年以前的连续8年第1，退居第3～4名。

在美国的优势一度受到挑战的信息技术产品方面，局面也大为改观。从1983年到1990年，美国占世界半导体制造设备市场的份额从66%下降到44%，日本占据第1位。经过90年代的调整，美国的比例上升到51%，日本则下降到42%。1992年美国英特尔公司取代日本公司成为世界最大的半导体制造商。在个人电

脑方面，美国的优势更加明显，1992年美国产品所占市场份额已达70%。总之，从1994年起，美国在新一代计算机芯片、软件、各种新型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移动通讯技术、高清晰度电视技术以及生物技术等高新技术领域的国际市场上已占全面优势。

在服务业出口方面，美国大力调整三大产业的有机构成，着重发展服务贸易。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1995年全球服务贸易总额为1.2万亿美元，美国出口占其中的16.5%。最后，美国的整体科技实力居于世界首位，在世界27个关键领域中，美国的信息、通信技术大大领先，生物、医学、农业等领域占有优势。与日本相比，美国在10个关键领域大大领先，11个领域占有优势，6个领域持平。与欧洲相比，1个领域大大领先，18个领域暂时领先，7个领域处于相持状态。

（八）信息技术及其产业成为主导产业，产业结构又上一个层次。90年代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促进了美国产业结构的进一步优化或“软化”。首先，经过这次调整，在工业结构内，高技术产业已成为美国最重要的经济发展先导和支柱产业。1993年高新技术工业占美国制造业出口总数的37.7%，1994年占制造业增加值的24.2%。高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技术及其产业的快速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的经济，成为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战后，推动美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是住房建筑业和汽车业。90年代中期以来，高技术产业在美国GDP中的贡献率为27%，而传统的住房建筑业和汽车业的贡献率分别为14%和4%。信息技术产业对美国经济的带动作用不仅比传统产业作用大，而且也比其他高技术产业的作用要大。1993年以来，在美国工业增长中，约45%是由电脑和半导体发展带动的。90年代末，美国与信息产业直接有关的部门在GDP中所占比重已达80%。信息产业正在成为美国最大的产业以及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其次，以计算机及应用软件、通讯为代表的信息产业迅猛发展

进一步带动了美国产业加速向知识密集型、信息服务型方向发展，促进了美国经济的增长方式向内涵和效益型转变并改变了就业结构。1992 年以来，美国的经济增长和就业主要不是靠大量投资。以 1993 年为例，净投资占 GDP 的比重在美国为 3.4%，而在德国和日本分别为 5.7%、15.4%。高技术产业为美国创造了许多就业的机会。1996 年，美国高技术行业共雇佣了 430 万员工，是美国制造业中雇员最多的行业，其中新增就业机会达 24 万个。在进行过“重建”或“再造”的企业中，土地、厂房、存货等传统要素的重要性相对下降，职工的专业知识和文化素质成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在每 10 个新创造的就业机会中，有 8 个属于信息型的。

高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技术和产业有力地推动了美国的出口，以信息技术为主的知识密集型服务的出口已相当于美国产品出口额的 40%。1996 年美国出口的计算机系统设计、商业软件和程序编制等高新技术服务就达 48 亿美元，比 1990 年增长了 2.6 倍。

（九）股市高涨，股指连创新高。由于美国经济持续强劲增长，没有通货膨胀的压力，大公司经营状况良好，老百姓对经济和股市的信心增强，外资大量流入，使道－琼斯股票指数连创新高。1993 年克林顿初任总统之日，道－琼斯工业股票指数仅为 3241.95 点。此后，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公司利润的增加，以及联邦储备委员会低利率的刺激，美国股票市场逐渐活跃起来。尤其是进入 1995 年后，股市呈现出异常繁荣的景象。1995 年 2 月 23 日，道－琼斯指数突破 4000 点。9 个月后，突破 5000 点。1999 年 4 月突破 10000 点大关，5 月 3 日超过 11000 点，创下了道指千点增长的最快记录。

新经济中的问题

在 90 年代美国经济的普遍繁荣中，也存在着泡沫经济的隐

患。同时普遍的繁荣并没能改善长期存在于美国社会中的贫困问题,而且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

早在1996年,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就指出美国股市为“非理性的狂热”。从1991年以来,道-琼斯指数已从3000点飚升到11000点,其年增长率为17%,同期,美国经济的年增长率为3%,企业的盈利增长率为10%,前者的增长率远远超过了后两者,其中的泡沫成分显而易见。

美国股市的泡沫成分很大程度上是大量涌入的外来资本撑起来的。为了减少欧洲统一货币可能的风险,欧洲的金融财富的持有者看好美元,纷纷投资美国的股市和债券,造成欧洲的金融资本大规模地流入美国。1997年开始的亚洲金融危机也导致大量资本逃离亚洲,涌入美国。正是这些外来资本的涌入抬高了美国股市及其资产价值,成为美国经济和股市异常繁荣的一股重要的推动力。

由于美国居民预期投资股市将获得可观的收益,故不断扩大个人信用(举债)消费,导致美国国民储蓄率的大幅下降。1998年10月美国的储蓄率第一次出现负值,为负0.2%,1999年3月进一步降至负0.6%,反映出股市泡沫所导致的不理性的高消费。由于美国经济保持强劲增长势头的原因之一是来自股市为主的服务业的增长,以及股市飚升所带来的居民消费的增长,因此,股市的任何波动都会影响到美国经济的增长。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警告说,他“又闻到了1929年的气息”。

除了泡沫经济的隐患外,90年代美国经济繁荣的社会后果之一是贫富差距越拉越大,财富分配严重不公。美国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1975年,美国的贫困人口占其总人口的12%,1991年上升到13.5%,1994年为14.5%。到1997年,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美国人仍多达3580万,占美国人口总数的13.3%,即每6.5个美国人中就有1个穷人。90年代中期,在美国全部人口

中,收入最低的20%的家庭,其人均收入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1%,而美国最富有的5%的家庭的年收入占整个社会收入的比重则高达19.1%。这一状况到90年代末仍没有改变,1998年这20%低收入家庭的年收入与10年前持平,按1997年美元价值计算为12250美元,仍然低于20年前的13009美元。在贫富差距拉大的过程中,处于最不利地位的是新移民。1980年,处于贫困线以下的新移民比例为14.7%,14年之后,这一比例上升为21.3%,其中受教育程度最低的移民景况最差,有36%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第二编

社会运动与政治生活

第一章　从三权分立到一权独重：20世纪美国政治的发展趋势

三权分立是美国立国的基本政治和宪法原则之一。顾名思义，三权分立就是政府的行政、司法、立法3个部门三足鼎立，彼此分工明确，但又相互制衡。20世纪一系列重大内政外交事件给美国联邦政府扩大权力提供了契机。这些事件迫切要求联邦政府作出快速反应，以解决危机，渡过难关。反映到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上，就是总统行政权力的不断扩大；虽然国会的立法功能和联邦最高法院的司法功能也在不断完善，但相形见绌，常常表现得被动和滞后。三权分立，一权独重成为20世纪美国政治最显著的特征。

现代美国政治制度的建立与联邦政府权力的加强

20世纪初，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完成，美国人越来越感受到现代文明的种种好处；但是另一方面，现代社会也出现了一系列特有的弊病。失业、萧条、贫民窟、街头犯罪、环境污染等等，都是传统以农业为主体的社会所没有出现过的。工业时代特有的这些社会问题需要政府制订一系列政策法规，对人们生活进行某种形式的干预和管理才能解决。三权分立制度虽然在美国历史早期保障了美国民主制度的发展，但是现代社会的发展则呼唤更强有力的政府领导，需要联邦政府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发挥更积极主动的作用。在政府3个分权部门中，国会由于人数众多，背景复杂，受党派、地区、经济、人事等各种因

素制约较大，遇到利益冲突的事情往往意见纷纷、莫衷一是。即便能够形成多数意见，也不是一两天内能够讨论通过形成一项具有法律效力的文本，往往需要长时间的开会、表决等程序才能得以最后实现。即便通过了某项法规，由于国会自己无法执行，必须依赖行政部门的配合，因此行政部门往往更直接地担负起对选民的责任。至于最高法院，如果不是有关案件上诉到它那里，它一般无权对内政外交进行干涉或发表意见。

相比较而言，行政部门则更易适应现代美国的各种需求。总统拥有相当数量的官僚机构，其属下的各个部、局等机构完全围绕总统的意图和目的在运作。联邦政府的许多高级职位都是由总统任命，总统可以通过这些政治任命很好地控制他的官僚机构。遇到大的危机或棘手问题，总统往往可以在其内阁或白宫助理们的建议下，迅速作出判断和抉择。

三权分立中的三极出现真正不平衡是从罗斯福新政开始的。大萧条使传统政治体制中的权力分配关系难以解决现存问题，美国人需要他们的总统有更多的独立权力去承担国会、最高法院无法承担的管理社会经济和公共生活的责任。于是，“国会连同它的繁琐的决定批准程序一并向总统投降了”。[①]按照美国宪法，只有国会才有权制订法律，由总统加以实行。但是事实上，罗斯福藉同经济萧条斗争为名，制订并提出了大量法律，在“百日新政”时，参众两院甚至连看都不看一下这些法案就投票批准了。国会在民众的压力下，对于政府的改革措施积极响应，通过一系列立法，授权总统去管理社会经济事务。正是通过新政措施，罗斯福确立了现代美国社会的各种管理体制，也确立了总统在三权分立中一权独重的地位。

---

① 托马斯·戴伊、哈蒙·齐格勒 著，孙占平等译，《民主的嘲讽》，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 年 8 月第 1 版，第 338 页。

随着联邦法律大量增加，行政部门越来越被授予各种权力去实施这些法律。总统权力的扩大在所难免。作为宪法守护神的最高法院在这些问题上显得比较被动，保守的大法官们往往显得无可奈何。罗斯福时代给人们留下的最大遗产就是让人们接受了这样一种观念：最好的政府不是管得最少的政府。政府应该对老百姓的事务作出积极反应，并且在各种社会经济事务中发挥积极的协调作用。民主党的这种自由主义传统一直延续至今，并成为共和党也不得不接受的模式。

联邦政府权力的加强也反映在州权转向联邦，继而又集中于总统。州权和联邦权力的斗争早在制订联邦宪法时就开始了。作为妥协，美国宪法修正案第10条规定："本宪法所未授予合众国或未禁止各州行使之权力，均由各州或人民保留之。"20世纪以前，州权和联邦权力的斗争时隐时现，内战成为州向联邦权威挑战最激烈的事件。北方的胜利奠定了联邦权力大于州权的坚实基础。20世纪，随着经济的巨大发展和新社会问题的产生，各州应付新局势的力量日益捉襟见肘，如果再各自为政，没有联邦政府统一协调、资助，根本无法应付。从60年代开始，联邦政府的权力已经扩展到以前完全属于州、地方和私人管辖的领域，拥有比以前多得多的对国内事务的控制权力。比如保健、性行为的管理、犯罪控制、历史建筑物的保护、对艺术的扶持、对残疾人的照顾。几乎所有全国性问题，最后都要由华盛顿拍板。1962年秋天，肯尼迪总统在詹姆斯·梅雷迪斯事件[①] 中表现出来的勇气再次显示了联邦政府捍卫其权威的决心，表明联邦宪法的权力高于州权。

---

① 1962年秋天，黑人学生詹姆斯·梅雷迪斯申请进入密西西比州州立大学上学，联邦第五上诉法院的判决支持他的要求。但是这一合理合法的要求却遭到以州长罗斯·巴尼特为首的白人种族主义分子强烈反对。肯尼迪总统为了捍卫联邦和宪法权威，毫不迟疑地派出联邦军队保护詹姆斯·梅雷迪斯入学。该事件被当时的舆论界认为是"内战结束以来州同联邦当局发生的一次最严重的冲突。"西奥多·索伦森 著《肯尼迪》，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2月第1版，第319页。

集各种联邦大权于一身的美国总统，一届比一届更具帝王色彩。为总统特制的座机，价值高达数亿美元。一方面，联邦政府大谈裁员，缩小规模，另一方面，政府年度预算逐年剧增，从60年代初不满1000亿美元一直上升到90年代的上万亿美元。这些都表明，政府管理和干涉的范围越来越广，总统作用与日俱增。尼克松和里根时代为了缩小政府开支，提出"新联邦主义"，减轻联邦政府负担，加强州和地方政府在某些领域作为联邦政府代理机构的职能。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联邦权力尾大不掉的现实。州权的减少，联邦权力的加强，总统权力的扩张已经成为当代美国政治难以逆转的潮流。

现代传媒技术的发展，客观上也"强化了总统作为党的领袖和公众舆论对象的作用"。[1]新政时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炉边谈话"就是鼓动民心、获取人们支持的重要手段。到肯尼迪时代，随着电视的发展，总统越来越成为国家安全感、自信心的象征。现在，总统动辄在电视上发表公开讲话、解释政策动机，以此鼓动人心、争取支持。

世界战争、外交危机与总统权力扩大

与19世纪相比，20世纪的美国全面深入地卷入了国际事务中的各个领域，以致有些美国人不无骄傲地称"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对外卷入导致军事和外交政策在国家政治中重要性的不断提高，联邦政府行政职能的不断扩大。20世纪是人类面临战争威胁最严重的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美苏冷战都扩大和加强了美国政府行政部门的权力。一战未能扭转美国建国以来就一直存在的强烈的孤立主义思想，战争结束后美国重新关注国内事务。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给各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地跨

① 《民主的嘲讽》，第269页。

两洋的美国也难以幸免。孤立主义并未能使美国免于二战的战祸,美国加入了反法西斯同盟的行列。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美国人民自觉地赋予了总统更多的权力。作为三军总司令和战时国家元首,罗斯福总统不断地扩大联邦政府管辖和干涉的领域,而他所做的一切都被认为是为打败法西斯所必须的。国会和最高法院也只有顺理成章顺应历史潮流和民众呼声,对总统的决定百般听从。二战的胜利使美国从此摆脱了孤立主义的影响,朝野上下达成了对世界事务进行干涉和管理的共识,美国人认为上帝已经把世界改造成山巅之城的重任托付给美国。而拥有战后世界近一半财富的经济实力和独占原子弹的军事实力增加了美国人领导世界事务的信心,美国总统成为世界政治舞台上的中心人物。冷战岁月更是总统权力进一步膨胀的岁月,也最终酿成了越战、水门事件、伊朗门等一系列美国总统权威的信任危机。

50 年代初猖獗一时的麦卡锡主义虽然给美国人民带来了心灵上的创伤,但它帮助了美国上下形成并加强了冷战共识。冷战使美国的民主党政府和共和党政府在对外事务中采用一个喉舌说话。两党政府都需要更多的处理外交事务的特权。总统在国防和外交事务中的巨大的权力,来源于美国宪法。美国的宪法起草者意识到,"在国防和外交方面,能否采取迅速、果断的行动,事关国家存亡,这种事情不能依靠立法机构惯常采用的耗费时日的辩论来解决"。[②]由于外交问题较少存在各种利益冲突,不像国内政策那样容易引发国会辩论,而且外交问题经常会变成单一的爱国问题,因此如果谁反对总统的决定,谁就会背上不忠于国家的罪名。于是,总统派往国外的大使往往成了总统本人的代表。但是,总统在对外问题上有时走得 太远了,不得人心的越南战争便是一个可怕的先例,它促使国会于 1973 年通过了《战争权力法》,限制总统

---

② 希尔斯曼著:《美国是如何治理的》,商务印书馆,1986 年 4 月第 1 版,第 111 页。

的战争权力。国会限制总统权力的做法似乎有些为时已晚,终于发生了尼克松的水门事件。总统为所欲为、权倾朝野,甚至到了置宪法于不顾的程度。结果面对弹劾的难堪结局,尼克松最后不得已自愿下野,总统权力一时受到国会和最高法院的压制,但是总统享有某种特权已是大势所趋。《战争权力法》虽然让国会控制了宣战权,但是总统毕竟是名义上和事实上的总司令,因此总统经常无视国会的这一权利。1986 年里根总统为了报复恐怖分子活动,对利比亚进行了两次空袭,除了事先给国会一个象征性的通知外,他并未和国会商榷。此后,也只是在派遣美军入侵格林纳达成为事实后,他才报告给国会。由于宪法规定总统有权把军队派往他所希望去的地区,国会又无权指挥军队,双方分歧是必然的。从二战以来,历届美国总统都认为当国家安全处于紧急状态时,总统有权动员军队,向海外派兵,采取战争行动,并把它看作是总统固有的权力。国会也认识到宪法规定的模棱两可,当总统的对外军事行动迅速地取得决定性胜利后,也不去追究。因此,迅速取得战争胜利成为 70 年代以后历任总统抵制《战争权力法》最有效的办法。除非再次出现旷日持久的、不成功的和不得人心的战争,美国国会可能才会在国家安全事务方面重新维护自己的权利。

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

20 世纪的美国社会,经历了从自由放任的传统资本主义到国家管理经济和社会事务的现代资本主义的转变。政府的职能不断加强,对社会福利、公民权利等开始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新政确立了美国总统在国内事务中的主导地位,奠定了现代美国政治制度,确立了新自由主义政府管理模式,并统治美国达半个世纪之久。战后 50~60 年代,由于美国经济空前增长,新自由主义赢得了最大的成功。首先是最高法院一反保守主义传统,积极干预社会经济领域。1954 年,联邦最高法院在《布朗诉托皮卡地方

教育局案》中判定种族间“隔离但平等的教育设施是违宪的”的判决，成为本世纪最高法院最具影响的一项判决。这一最初只是针对教育领域中的种族隔离问题的判决，后来几乎适用于所有的社会公共领域。为执行最高法院的裁决，联邦政府被赋予了更多的责任和权力。60 年代，随着黑人追求平等权利时代的开始，政府更是以行政命令的手段，强制扭转数百年来存在于美国社会的各种不公正现象。民权成为联邦政府干预的新领域。此时，自由主义行动达到了颠峰，渐而开始衰弱，保守主义粉墨登场，它是对 50～60 年代美国社会面临的一系列道德、经济、政治危机的反省，是作为对新自由主义的批评而发展起来的。

但是，现代美国社会并未回复到自由放任的时代。80 年代有“里根革命”之称的保守主义并未否定整个自由主义的政治模式，相反，保守派加强了政府管理内政外交事务的职能，同时提倡用传统新教伦理道德来重建美国的价值观，因此这场保守主义运动也被冠以“新”的特征。无论是新自由主义还是新保守主义，在现代社会的稳定与发展的首要目标方面，它们是一致的。这包括：为公民提供人身安全和物质福利；在活动目标上尽可能鼓励个人选择。①

新保守主义政策，主要呼唤的是个人传统美德，要求把工作看作是“自立的个人为自己和家人的利益从事的一项经济活动”，因此它把“建立一个能够为所有美国人提供平等机会的健康的、生机勃勃的、不断增长的经济”作为美国人民的目标，把“保卫自立的个人得以自由地去追求其主要为经济的目标所必需的和平和安全”作为美国政府的首要目标。②它对内主张减税、刺激消费、扩大再

---

① 贝拉等著，翟宏彪等译：《心灵的习性：美国人生活中的个人主义和公共责任》，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1991 年 12 月第 1 版，第 398 页。

② 贝拉等著，翟宏彪等译：《心灵的习性：美国人生活中的个人主义和公共责任》，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1991 年 12 月第 1 版，第 398 页。

生产，对外实行扩军，增强美国势力，把干涉看作是维护美国安全的必要行为。新保守主义政策，特别是其经济政策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遇到重重困难，其赤字财政和减税政策加剧了政府的财政危机。90年代执政的民主党克林顿政府对新政以来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和里根的保守主义政策进行了批判吸收，采取中间道路，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就，为美国步入21世纪在社会、政治、经济领域做了有益的尝试。

第二章　进步运动与社会改良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美国完成了工业化、城市化。正如当时的一位英国观察家所言，这时候的美国“使来访者印象最深的是它惊人的物质发展”。[①]工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发展，城市不断膨胀，财富不断积累。相对而言，美国人原有的农村生活方式和心态依然如故。他们的思维和心态还不能适应工业化城市化时代文化和社会的变化。特别是原有的法律、行政管理方法远远落后于现实，无法应付现代社会中的种种问题，也无法调整日益激烈的阶级、或者说阶层间紧张的关系。同时，《独立宣言》所倡导的平等、民主、自由的原则在以物质竞争为主流的现实生活中受到严重的损害。在社会不满情绪加剧的同时，以改良社会为己任的进步主义的使命感也在增强。

经济飞跃带来的最大好处就是使人人都有了一个更光明的前景，但是由于一些人先实现了美国梦，而另一些人则暂时落伍，彼此间的差距感在增强。美国历史学家认为，正是由于“对这种对比的认识、由于物质进步带来的压力和由于对国家使命的意识，产生了要进行调整改革的种种努力”，[②]形成了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进步主义运动。这场运动实质上是美国进入工业化时代之后的“第一次大规模社会改革运动，是对工业社会的种种新的难题和挑

① 转引自 J·布卢姆 等著：《美国的历程》下册，商务印书馆，1988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82 页。
② 《美国的历程》下册，第 182 页。

战的社会性反响”。[①]

进步主义运动的兴起

1900年,美国人口接近7600万,到1920年,已经剧增到1.06亿。其中,一半以上的人居住在人口超过2500人的市镇里。在这20年里,资本投资增加了250%,工业产品总价值增加了222%。在经济进步的同时,财富却向少数人集中,全国2%最富有的人占有了全国60%的财富。[②]一些公司纷纷合并成大企业、大财团。财富急剧地积累到这些大型产业联合体中。这种财富的集中和垄断受到社会舆论的不断指责。内战刚刚结束时,拥有数万美元已经是很了不起的大亨了,但是到20世纪初,没有上百万美元的家财根本不能列入富翁的行列。工业化使美国产生了第一代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从前的富翁都是些农场主,如今的富翁都是制造业、商业和铁路业的大王。一方面,许多富翁是靠勤劳、拼搏的传统美国精神获得事业的成功,另一方面,他们又大肆挥霍、享受。而且为了获取权力,他们往往不择手段利用手中的金钱。

与富人相比,穷人的生活相当悲惨。大工业使得一些原先的自由手工业者沦为现代工厂工人,成为机器的奴隶。由于缺乏合理的权利保护组织,公司老板大肆剥削这些工人。工人劳动时间过长,工资太低,劳动条件很差,缺乏起码的社会保障。一旦失业、工伤或病故,没有相应的社会机构照料他们和他们的家人。剥削女工、童工的现象比比皆是。1910年,全国共有工业劳动力近4000万,其中1/3到1/2的人生活贫困。[③]随着工业发展迅速建立起来的城市,缺少良好的市政管理,成了罪恶和贫困的中心,出现

---

① 张友伦、李剑鸣主编:《美国历史上的社会运动和政府改革》,天津教育出版社,1992年1月第1版,第177页。

② 《美国的历程》下册,第183页。

③ 《美国的历程》下册,第184页。

了前所未有的贫民窟。

社会的不公平激起了人们的不满。富有同情心和使命感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对美国社会的现状焦虑不安，为美国的前途担心。他们倡导改良，呼吁消除生活中最令人不安的不公平现象，主张通过改革现有的政治体制来维护和发展美国的民主制度，适应工业时代的社会生活。

随着工业化的发展，美国出现了一个中等收入的阶级，并逐渐得到社会的注意和承认。这就是白领阶层，他们主要包括了企业的各类管理人员，比如经理、推销员、办公室文员、会计等各种企业专门人员和一些专业人员，如教师、律师、医生、新闻记者。这些人虽然没有百万富翁那么有钱，但是他们的生活舒适而又稳定。这个新兴的阶级受教育程度较高，通常也是虔诚的基督徒，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与同情心。作为工业化时代产儿，他们完全用工业社会的新视野来看待工业化时代美国的社会问题。他们认为，工业化使得西进时代的美国梦得以继续。工业时代带来的种种好处，比如各种廉价的大众商品、方便的交通和通讯都是传统农业社会所不具有的。尤其是随着教育设施的完善，人们获得了更多的教育机会，增加了未来成功的可能性。但是他们也看到，工业化的实现也让美国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特别是造成了社会的两极分化，富人越来越富，下层工人越来越穷。他们担心这样下去的话，自己的生活也将会受到影响和破坏。特别是在目睹了 1886 年芝加哥草秣广场惨案和 19 世纪 90 年代波澜壮阔的工人罢工运动之后，中产阶级深感不安。他们的良知和利益敦促他们发动一场社会改革运动，消除工业社会的种种弊端，帮助那些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们，同时也维护自己安定的生活。

中产阶级文人、艺术家利用文学、艺术等形式揭露了现有的不公正现象。他们的现实主义文艺作品感动了千千万万有正义感的美国人，敦促他们投身社会改良的洪流。西奥多·德莱塞的小说

《嘉莉妹妹》(1901)、《金融家》(1912)、《巨人》(1914)用朴实的语言描写了穷人的生活,揭露了工资微薄、朝不保夕、希望渺茫、生活呆板的人间悲剧。同时描绘了几个为了跻身上流社会,不择手段出卖色相、采取暴行的人物。弗兰克·诺里斯的小说《章鱼》(1901)则揭露了南方太平洋铁路公司惨无人道的剥削方法。厄普顿·辛克莱的《屠场》(1906)则用犀利的笔触揭露了芝加哥肉类加工厂极不卫生的劳动环境和劳资双方之间的仇恨。不仅小说采取现实主义的手法,画家们也开始采用新的绘画技巧和造型关系,创造了一系列现实主义题材的优秀作品,把小人物生活的肮脏小巷、阴湿酒店、污秽的经济公寓搬上了艺术舞台,出现了约翰·斯隆、罗伯特·亨利、威廉·格拉肯斯、乔治·卢克斯等优秀的现实主义画家。这时候的社会学家、社会工作者和经济学家也开始用数据和事实,说明贫穷的根源并不完全是因为怠惰懒散和道德败坏等个人原因。

与此同时,美国社会中出现了被人们称之为"黑幕揭发者"(Muckraker)的新闻工作者。他们对一些大公司采取的不人道的经营方式,对一些政客在选举中的营私舞弊行为,以及对劳工、外来移民、少数种族的歧视、剥削和欺诈等都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揭露。比如,亨利·劳埃德的《反共和国的财富》(1894)一书揭露了美孚石油公司的罪恶,而艾达·塔贝尔发表的《美孚石油公司史》(1904 年),更是通过大量调查数据,剖析了美孚石油公司掠夺自然资源、贿赂权势人物、排斥竞争对手等种种卑劣的手段。从 1902 年 10 月起《麦克卢尔杂志》刊登了新闻记者林肯·斯蒂芬斯的系列报道,揭露道貌岸然的实业家与政治大亨之间腐败的同盟。这些赤裸裸的现实使得中产阶级日益感到良心上的不安,坚信改良的必要。

19 世纪末美国社会对种种社会弊病和丑恶现象的漠视和容忍很大程度上与当时根深蒂固的美国主流思想有关。它过于强调市场机制的自动调节作用,主张小政府,把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看

作是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这种自由放任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想成为进步主义改革运动的障碍。为克服这一障碍，作为进步运动领导力量的美国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提出要用科学的原则和方法来指导社会行动，变革美国的传统主流思想，抛弃自由放任的政治哲学和管理原则，运用国家权力大规模地调节和干涉人们的社会经济生活。他们强调要不断地对原有的、认为理所当然的观念进行检验，并在经验的基础上修正它们。实用主义奠基人威廉·詹姆斯和约翰·杜威正是在这一前提下抨击了盛行一时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虽然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进步运动中起了主导的作用，但整个运动的参加者是由千差万别的集团构成的。他们的运动是由一些彼此相似但又各自独立的各种运动连结在一起的。这些进步派人士信奉民主、平等、自由的理想，反对工业化带来私人财富和权力的集中与垄断，深信通过公共管理提高政府效率。进步运动的改革也影响到农村，但是在农村主要是借鉴平民主义[①]，强调保持传统的农业中产阶级的情趣。

19 世纪末的市政改革可以看作是进步运动的开端。市政改革的目标是废除政党机器控制城市管理的弊端，尝试新的市政管理机制。纽约、波士顿等大城市基本上实行的是市长制，类似今天的总统制。委员会制是由得克萨斯州加尔维斯顿在 1900 年成功地应付洪涝灾害时首创的，它通过选出的委员分管各个部门而实施对城市的管理。城市经理制是指由市参议会选出各主要部门的行政官员，在参议会的领导下工作。这些行政官员往往是某些方面的管理人才或训练有素的专家。所以，这种模式体现了美国的精英模式。1908 年弗吉尼亚州的汤顿市率先采用了这一制度。

① 平民主义是美国内战后第三党运动的一部分，它主要因农民不满现状而兴起。平民党于 1891 年正式成立，由一部分农民、工人和小商人组成，主张自由而不加限制地铸造银币，废除国家银行，对铁路、轮船公司、电话和电报国有化，直接选举国会参议员，实行累进所得税。

因这种管理颇有成效，为其他城市仿效，代替了原来的委员会制。

市政改革不断地冲击着州政府的改革。1900年，进步派共和党人罗伯特·拉福莱特当选为威斯康星州州长，在他和他的支持者的努力下，威斯康星州通过了一系列法律，采取了直接预选、文官制度、限制院外集团活动、保护自然资源、由州政府管理铁路和银行、提高所有公司应交纳的税额和征收所得税（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征收所得税的州）等改革措施。同时，他加强了州政府和州立大学之间的联系，聘用专家担任州政府政策顾问。在他的努力下，威斯康星州政府成为效率卓著、廉洁奉公的典范。威斯康星州的政府改革又逐步扩大到其他州。许多州的进步派政府以不同的方式制订出拉福莱特式的进步主义纲领。1910年，新泽西州选出了一位民主党州长伍德罗·威尔逊，在他卓有成效的领导下，该州民主共和两大党内的进步派实现了改革的新思想。伍德罗·威尔逊也因为其进步主义改革措施而声名远扬。最后他又高举进步主义旗帜，成为进步派总统。

西奥多·罗斯福的"公平交易"(square deal)

1901年9月，共和党麦金利总统被暗杀，副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继任总统。罗斯福是一位资深政治家，曾经担任过州议员、警察局长、海军部次长、纽约州州长等职。他精力过人，勇于进取，锐意革新，出任总统后，他的改革思想很快变成为各种政策。美国人对罗斯福评价很高。在他们心目中，他既是警察、西部牛仔、战斗英雄，又是为永恒正义而奋斗的战士。罗斯福本人不仅博学多才，而且网罗了大批专家学者到政府任职，为其出谋划策。

1901年12月，罗斯福向国会提交了一批关于建立有效管理制度的立法建议。他认为，为了公共利益，必须由联邦政府对各种公众事务实行管理，既要鼓励工商业发展生产，又要防止工商业种种掠夺行为。为了打击托拉斯，他在1902年命令司法部长控告北

方证券公司违犯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这家控股公司当年的竞争行为引起华尔街金融恐慌，给公众投资行为带来了巨大损失。当时已有好几个州都准备采取法律行动反对这家控股公司。联邦政府的行动一宣布，华尔街为之愕然。最后，联邦政府胜诉。这场官司表明，权力已部分从工业集团转移到华盛顿。虽然罗斯福并不认为小企业是最佳的生产形式，但是他觉得必须维持自由竞争的市场，打击垄断行为。最高法院在这场争斗中维护了联邦政府的立场，使罗斯福得以把他的政策继续贯彻到底。

1903 年，国会通过了罗斯福提出的处理反托拉斯诉讼的法律。罗斯福得以建立一个新的商务与劳工部，下设公司管理局，负责收集和发表工业情报资料。新法律授权公司管理局调查各种重大公共问题。在经济纠纷中，联邦政府担任了劳资双方的调解人和仲裁人。罗斯福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召集劳资双方到白宫解决争端的总统，也是以接管煤矿相威胁而迫使一个重要工业部门的资本家就范的第一个总统。在无烟煤矿罢工期间，正是由于罗斯福的仲裁，保护了双方的利益，比如裁定工人工资提高 80%，工作时间减为 9 小时（某些时候为 8 小时），准许雇主将煤价提高 10%。[①]他反对激进的工联主义，[②]认为工人有不加入工会的权利，同时强调政府部门在雇佣人员时，可以自由雇佣工会会员和非工会会员。在 1904 年竞选期间，罗斯福进一步解释了他称之为给劳资双方以“公平交易”的观点，这四个字成为罗斯福政府以及他要废除特权、扩大个人机会的显著标志。同时也反映了罗斯福的态度，进步而不激进，谨慎而不胆怯。这实际上代表了大多数进步派的观点。

“公平交易”成为罗斯福 1904 年竞选的纲领。他的政绩和个

① 《美国的历程》下册，第 208 页

② 英文为 unionism，也称工会主义，是工人运动中的改良主义思潮。

人魅力为他赢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连任总统后,罗斯福加快了改革的步伐,推动联邦和各州的改革。罗斯福此时改革的首要目标是铁路。在他努力下,国会于1906年通过了《赫伯恩法》,授权州际商务委员会可根据货主的申诉,废除现行运费率,另行规定新运费率,但这须由法院来复审。这项法律成为罗斯福建立联邦政府有效工业管理体制的基石。在他的努力下,国会还通过了一系列监管工业的法案。比如,针对辛克莱小说中的芝加哥肉类加工厂的状况,通过了《联邦肉类检验法》。

罗斯福的进步主义思想也反映到自然资源的保护上。罗斯福本人是热爱自然的典范,他积极推动保护自然资源,强调人类的思想与意志有改变和改善环境的能力,而保护自然资源则为试验这种信念是否正确提供了机会。为此,他建立了美国第一批国家公园,建立了国家森林服务局。1902年,罗斯福促使国会通过新土地法,规定从出售公共土地的收入中留出一部分作为修建水坝和垦荒的经费。罗斯福认为,为了利用自然资源,首先必须保护自然。1908年,他建立了各州保护自然资源委员会,成功地使保护自然资源成为千百万美国人的头等大事。

威尔逊与进步主义运动的鼎盛

1912年的总统大选中,共和党出现分裂。罗斯福的继任者威廉·塔夫脱相对比较保守,他的保守政策引起了罗斯福的极大不满。为此,老罗斯福另立山头,成立了进步党,提出了新国家主义改革纲领。进步派州长、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威尔逊则提出新自由主义纲领。就本质而言,罗斯福和威尔逊都属于改革派。两人都主张国家干预,建立社会正义,使资本主义更人道。但罗斯福更主张把社会的整体利益放在第一位,强调社会各阶级要服从这一整体利益,因此他的进步主义观点带有爱国主义色彩。

威尔逊则不同,他认为垄断企业已经控制了美国的经济和政

治,只有摧毁垄断,才能回到自由企业时代,才能让大小企业公平竞争。双方的分歧集中在是管理垄断,还是管理竞争。

竞选结果表明,改革派受到欢迎,选民鄙弃了保守的塔夫脱政府。由于共和党的分裂,罗斯福未能再度入主白宫,威尔逊赢得大选。开始了民主党政府的进步主义时代,把进步运动推向了新高潮。无论是罗斯福的新国家主义还是威尔逊的新自由主义,管理垄断与管理竞争实际上是国家干预经济活动的两个方面,国家往往根据经济的具体形势来调整重点,或同时干预这两个方面。[①]

威尔逊担任公职前是位政治学者,他的学术研究经历了一个与时代发展同步的演进过程。早在1885年,威尔逊就出版第一部学术著作《国会政府:美国政治研究》。在这部著作中,威尔逊认为美国宪法虽历经百年之久,但仍然拥有生命力。因此,美国的政治体制只要进行改革就能适应时代的要求。为此,他提出应加强联邦政府对国内事务的控制。他的观点反映了当时的进步主义改革观。在他看来,改革的目的就是"保存美国的社会体制与价值观念",改革的主要方向和目标则是要对"社会实行控制,要实行有序竞争,垄断公司不能因为拥有巨大财产而随心所欲;要加强政府的职能,用强大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来对社会弊病及不公正现象实行改革"。[②]担任公职后,威尔逊开始实践他的政治哲学观。

作为行政领导,威尔逊很有个性。他亲自向国会发表演说,这是自从杰斐逊时代以来还没有哪位总统做过的事情。在他不遗余力的努力下,国会通过了《1913年关税法》,降低了很多对工业巨头有利的高关税,减少了原先过于庞杂的细目表。虽然这个税法没有废除贸易保护制度,但把部分负担转嫁给那些最有能力承担的人,改变了联邦税收结构。为了扩大战果,威尔逊又敦促国会特

---

① 李庆余等著:《美国现代化道路》,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第203页。

② 韩莉:"威尔逊的社会政治观、历史观及其外交政策",《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7年1期,第94页,

别会议修改不合时宜的货币和银行系统，通过了《联邦储备法》。依据该法所建立的联邦储备委员会和地区储备银行使美国自安德鲁·杰克逊总统以来第一次有了富有效率的银行系统。联邦储备委员会享有的管理权保证了国家比以往更能有效控制银行业。对这一新法律和威尔逊引导国会通过这项法律中所表现出的非凡的领导才能，美国选民大为赞许。

在促进工商业稳定发展的同时，威尔逊也努力执行开明的社会政策。他深信政府能够在促进进步派的事业中发挥作用。正是在其任内，路易斯·布兰代斯成为最高法院第一位犹太人法官。在他的直接干预下，1916 年国会通过《亚当森法》，建立了铁路工人工作 8 小时便可以得到 10 小时工资的制度。为此，他博得了劳工的支持。此外，他还推动国会通过了联邦农场贷款条例和禁止童工法。

在对外政策上，威尔逊也发扬光大进步主义的精神。他主张外交应遵守道义的原则，并接受道义的指导。在他看来，美国的力量就是道义原则的力量。为此，威尔逊频频展开外交活动，和国务卿威廉·布赖恩一起与英、法、意以及其他许多国家签订条约，规定要把彼此的争端交付给有关国际调查委员会解决。正是在威尔逊任职期间，美国成为第一个承认中华民国政府的大国。他的进步主义外交思想最集中地体现在一战结束时提出的《十四点原则》上。在《十四点原则》中，威尔逊表明了自己对自由贸易、民主制度和人民自由等原则的笃信和虔诚，并提出了建立国际联盟的设想。然而，这些进步主义的愿望因为欧洲列强的反对以及国会的不合作而显得曲高合寡，不合时宜。威尔逊最终未能说服美国人民同意美国参加新建立的国际联盟。威尔逊的这一失败也表明，进步主义的势头已经开始衰弱。当美国人暂时解决了工业化城市化时代的危机，缓和社会矛盾后，他们又开始留恋自由放任的传统。

进步主义的衰退

美国拒绝参加国际联盟的行动标志着美国积极卷入欧洲事务的暂时结束。一战期间煽起的对德国的仇恨在战后转移到了移民身上，特别是那些战时表现出不归化姿态的德国移民身上，他们被美国人看作是激进分子，而所谓赤色活动的耸人听闻的报道更加深了这种信念。当时美国国内的一系列爆炸事件实际上并不是共产党人所为，但是因为那些激进派曾经坚决反对美国参加战争，于是，受“爱国主义”感情支配的普通美国人对他们耿耿于怀，并把一切都怪罪于共产主义。全国上下都支持司法部长米切尔·帕尔默指挥的对激进派的政治迫害行动。这场被称为“帕尔默大搜捕”的行动侵犯了成千上万美国人的宪法权利，结果数以百计的无辜人士被驱逐出境。

“赤色恐惧”留下了丑恶的伤疤，将进步运动的热情一扫而光。美国人希望重新回到寻求欢乐与消遣、追求物质享受的稳定的生活中去。在 1920 年的选举中，民主党出现了分裂。对进步主义失去了热情的人转而选举保守的共和党候选人沃伦·哈定做总统。就在同一年，经过进步人士长期努力，《禁酒法》以宪法第 18 条修正案的形式通过。事实证明，当进步主义改革以禁酒形式出现时，改革失去了往日的大部分魅力。改革者被描绘成清心寡欲不会享受生活，但又不让他的同胞享受生活乐趣的人。《禁酒法》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不得人心的法律，因为它企图改变千百万人的个人习惯。出于对酿酒商与腐败政治之间密切联系和不法行为的憎恨，进步主义改革者认为禁止出售酒类饮料会推进良好政府的事业。但是事与愿违，禁酒反而助长了有组织的犯罪活动，政府官员、酿酒私商相互勾结以谋求巨额利润。对于普通人来说，喝酒成了一件冒险和兴奋的事情，成为“抗议对个人自由不能容忍的干涉的一

种姿态"。[1]虽然禁酒在政治上一直有支持者，但是得不到广大群众的认同。原来赞成禁酒的人后来也认识到禁酒反而带来了更大的社会问题。1933 年 12 月 5 日，宪法修正案第 21 条的通过，结束了《禁酒法》。

尽管进步主义的许多成就只是短暂的，但它的精神遗产影响深远。凭借着他们的乐观主义情绪，进步派纠正了工业社会中最紧迫和最危险的社会弊病。他们认识到建立强大政府的重要性，强调政府应承担起对公民的福利和穷人的广泛和全面的责任。因此，进步主义运动不仅是一场社会改良运动，也是美国道德观念的更新运动。虽然对进步的认识不尽相同，但是罗斯福和威尔逊政府已经用行动初步展示了联邦政府在工业时代管理人们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作用和职能，部分地解决了工业时代社会的弊病和矛盾。从这个意义上讲，进步运动也是政府在管理国家方面进行的初步改革尝试。

---

① 纳尔逊·曼弗雷德·布莱克著:《美国社会生活与思想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97 年 11 月第 1 版，第 303 页。

第三章　新政与现代美国的出现

1929—1932 年的经济大萧条给美国人民造成了深重灾难。当人们正在为工业社会的种种文明津津乐道之际，大萧条却骤然而至，这让刚从农业社会过渡到工业社会的美国人感到无所适从、束手无策。赫伯特·胡佛当政的几年(1928—1932 年)是社会静止的几年，美国政治如一潭死水。原来习以为常的自由放任传统此时非但无助于经济的恢复，反而使危机日益恶化。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改变了联邦政府的传统职能，政府被赋予了全面干预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责任。虽然新政的成败得失尚是学者们有争议的话题，但是毫无疑问，新政的一系列立法和措施，为美国从传统资本主义过渡到现代资本主义奠定了基础。正是由于新政及其持久不衰的影响，一个与以往不同的现代美国出现了。

罗斯福与新政

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名字与新政和二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作为美国历史上惟一任四届的总统，罗斯福以他独特的处理危机的方法和一系列改革举措帮助美国人民战胜恐惧、恢复自信心，顺利地度过了大萧条、法西斯主义威胁等重大历史关头。同时，深受进步主义影响的罗斯福，给美国人民留下了新自由主义的传统。正是在其任内，现代美国社会体制得以建立、发展和完善。

1929 年的经济大萧条是从纽约股票市场的崩溃开始的。大萧条给美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物质损失。从 10 月 24 日到 11 月

中旬，有30亿美元的股票值变得无影无踪。到1933年，全国形势依然非常严峻，并在一步步恶化。纽约股票交易所上市的股票价值从1929年的870亿美元暴跌到1933年的190亿美元。这场灾难造成了1000万人失业，2500万人没有任何收入。[①] 农民收入锐减，现金收入从1929年的162美元下降到1933年的48美元，农民购买力只有1929年的60%左右。[②] 经济萧条也造成社会动荡。在衣阿华州，一些农民曾闯入一名法官家里，试图将他私刑处死。

如果说经济上的损失尚且可估量，精神上的损失则是无法挽回。成千上万的人失业，损害了美利坚民族的活力和生机。美国梦的前景消逝殆尽，每个人都忧心忡忡。一对学者夫妇在对大萧条中的一个美国城市进行研究后得出了几乎适用于所有城市的结论："……大萧条这把利剑已不偏不倚地向全市居民砍了下来，将富人和穷人的生活和希望都拦腰砍断。与该市近代史上任何一次长期的荡人心魄的事件相比，大萧条具有更大的普遍性。它产生的惊天动地的影响接近于一场生死存亡的大搏斗。"[③] 精神消沉比经济萧条后果更为严重。失业者已完全失去了活力和斗志。年轻人变得麻木不仁、无所适从。人们迫切需要一个救世主把他们从这场精神危机中解救出来。历史经验表明，严峻的环境往往能够造就英雄人物。

1932年的总统选举，就其本质而言，是一场主张与反对国家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斗争。竞选的结果是以罗斯福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和进步主义者打败了赫伯特·胡佛为代表的保守派。这表明美国人民对自由放任的传统资本主义经济方式已经感到厌倦和失望，迫切希望政府担起某种责任和义务，帮助老百姓度过大萧

① 卡尔·戴格勒著，王尚胜、马立恩、樊玲译：《一个民族的足迹》，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7月第1版，第426页。

② 《美国的历程》下册，第386页。

③ 《一个民族的足迹》，第430页。

条。但是胡佛不愿意改变现存的社会经济体制，主张自救，强调自由放任、地方责任和邻里互助等老调。结果一方面生产大量过剩，一方面千千万万的人饥寒交迫。在这种形势下，胡佛的失败在所难免。

1933年3月4日，罗斯福发表了就职演说。就在他就职前，美国所有的银行都关闭了，这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心脏——金融暂停了跳动，全国人心惶惶。他们都把眼睛盯在新当选的总统身上，围在收音机旁收听新总统的演说。罗斯福深谙老百姓的心态，上来就为他们打气鼓劲："首先让我表示我的坚定信念：我们惟一必须畏惧的就是畏惧本身……无可名状、毫无道理、决不应有的恐惧，它将瓦解人们变退却为前进所需要的努力……"在演说的最后，他号召全国立即采取行动，要求国会授予他"广泛的行政权力，这种权力之大应当像我们真正遭到外敌入侵时所赋予我的权力那么大"。①

罗斯福总统上任后立即开始了被称为"新政"的改革。在思想上，罗斯福继承了进步主义的传统，特别是威尔逊新自由主义的思想让罗斯福更深刻地理解了美国金融势力及其对国家权力的控制。新政的前期和后期始终致力于经济复苏和社会改革，特别是强调联邦政府在管理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新政的前两年主要是在经济领域进行大刀阔斧的政府干预，集中控制。1935年以后，罗斯福接受了市场理论，既强调竞争性的市场，也强调更平均地分配财富、收入和私人权力。同时，他希望建立某种社会救济和保障制度，帮助大规模的失业者和农民。因此，新政在前期主要是强调经济复兴，真正意义上的改革是从第二阶段开始的。在整个新政时期，对失业者的救济一直贯穿始终。正是新政的这一

① 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 著《罗斯福传——狮子与狐狸》，商务印书馆，1987年2月第1版，第225页，第226页。

救济传统，开创了现代美国社会保障体制。

从1933年罗斯福上任到1934年底这段时间，是新政的第一个时期。罗斯福上任头100天，被称为百日新政，“行政首脑就是立法首脑”，[1]他制订并推动国会通过了一系列重要法案。一开始国会对于政府如此广泛地干预人们的经济和社会生活还犹豫不决，但是形势刻不容缓，国会不得不通过罗斯福的立法建议，成为典型的“橡皮图章”。

罗斯福上任第一周内主要是着手解决银行危机，恢复银行信任度。接着，他在广泛的领域提出了一系列立法要求。他要求通过农业立法，授权组织民间资源队，批准各州直接进行失业救济。国会以前所未有的姿态配合罗斯福提出的各项法案，议员们“拥护新政的情绪甚至超过了罗斯福原意实行的程度”。[2] 衣阿华州的一位众议员给罗斯福的信中说，“你要求我做什么事我都会做。你就是我的领袖。”[3]罗斯福富有感染力的干劲和热情也直接影响着他的幕僚。政府官员们积极配合。有位官员曾说，“同总统在一起呆一个小时以后，叫我把钉子当饭，我都吃得下去。”[4]

5月12日，国会通过了罗斯福政府提出的《农业调整法》。政府根据此法设立了农业调整管理署，它依据“物缺则贵”的原则，大肆减少农业耕地和农业生产。随着农业生产的下降，农产品的价格开始回升，农民收入增加。在工业领域，政府制订了《全国工业复兴法》，控制竞争，规范市场，并根据《全国工业复兴法》的精神建立了全国工业复兴总署和公共工程署。公共工程署对美国的基础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从1933年到1939年，它帮助建造了全国近70%的新校舍，65%的县政府办公楼、市政厅和污水处理工厂，

---

① 《罗斯福传——狮子与狐狸》，第238页。
② 同上，第239页。
③ 同上。
④ 同上。

35%的医院和公共卫生设施。[1]此外，它还帮助修建了一些交通设施，包括铁路、桥梁和港口等等。

1934年底开始，新政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问题。一方面，要求深入改革的呼声很大，但是另一方面，保守派势力也在增强，他们日益不满新政第一阶段社会控制与经济管理措施。最高法院也跃跃欲试，考虑用自己的司法审查权来废除新政立法。

为了进一步扩大新政已有的成果，罗斯福根据1935年4月8日通过的《紧急救济拨款法》发布了第7034号总统行政命令，建立了工程振兴局和相关的联合机构，由其亲密助手哈里·霍普金斯担任局长。这个局的主要任务是让350万可以参加就业的人参加由联邦组织的小型工程项目，其他无力工作的200多万人则交由各州承担他们的救济任务。这是个以工代赈的项目，参加者的工资虽然比在私人企业中少，但能暂时解决温饱问题。短短数年内，这个局主办了25万个工程项目，修建飞机场近1000个，运动场1.3万个，医院2500多座，学校5900所，以及许多大型的灌溉工程等等。[2] 由于青年人失业人数相当可观，罗斯福在工程振兴局中专设了一个全国青年处，给予全国的大学生半工半读的机会。这个局甚至举办了戏剧晚会和音乐会，出版地图和旅游指南，使得有一技之长的人保持自己的特长，振奋精神。

新政第二阶段最重要的立法是1935年通过的《社会保障法》。它使美国从此走上了全面福利国家的道路。《社会保障法》旨在建立失业保障制度和对老年人以及妇女儿童承担某种形式的照顾义务和责任。根据这一法律，政府成立了专门的社会保障局，负责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和管理。虽然当时社会保障范围很小，但意义重大，联邦政府终于承担起保障社会上弱势集团未来安全的责任。

---

① 数据引自刘绪贻、杨生茂主编：《富兰克林·D·罗斯福时代1929—1945》，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第101页。

② 数据引自《富兰克林·D·罗斯福时代1929—1945》，第125页。

新政使总统的权力前所未有地扩大，一些保守派深感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立国原则受到威胁。他们终于从古老的宪法中找出了反对新政的依据。新政不到两年，最高法院以5∶4的1票多数宣布《联邦铁路员工退休金法》无效。最高法院强调说，虽然国会有权控制州际贸易，但是无权干涉劳资关系，而且政府强迫铁路公司支付其雇员的养老金，实际上是不经法律程序肆意剥夺公司财产。1935年5月27日，是新政历史上著名的“黑暗星期一”，这一天，最高法院以三个多数票宣布整个《工业复兴法》违宪。从1936年开始，最高法院继续不顾总统和国会意见，扼杀新政立法。1936年1月6日《农业调整法》被宣布违宪。6月1日，又判定州政府无权规定最低工资和管理工时。最高法院这一不合作的顽固态度致使新政工作陷入困境。罗斯福一方面加强领导，另一方面致力于新的立法，诸如《紧急救济拨款法》和《瓦格纳劳工关系法》。根据后一法令，成立了全国劳工关系委员会，保障工人集体谈判的权利。

由于担心最高法院很有可能会宣布《社会保障法》和《瓦格纳劳工关系法》违宪，罗斯福决定向最高法院开刀。1937年2月，罗斯福向国会提出一份改革最高法院的议案。他认为现有法官年龄偏大(1936年时，法官平均年龄是71岁)，缺乏效率，难以胜任工作。因此，他建议把法官的人数从现有的9人增加到15人。由于总统有权提名最高法官的人选，此举意味着罗斯福可以用“掺砂子”的形式增加自由派法官的数量。罗斯福辩护说，“由美国人民选举的国会正在致力于公正地针对现在的社会和经济情况采取行动，使美国免于灾难，但是最高法院却怀疑国会的能力”，作为总统，他的责任就是“把宪法从法院中拯救出来，同时把法院从它自身拯救出来”。[1]

---

① 《美国的历程》下册，第407页。

这一建议引起轩然大波。一些憎恨新政的人攻击罗斯福正在摧毁美国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民主党内部也存在分歧,许多保守的民主党成员反对罗斯福这一过于极端的自由主义做法。不过,最高法院在这场争斗中首先转变了态度。1937 年 3 月 29 日,最高法院撤消了 1936 年的一项裁决,确认有关最低工资的一项法律符合宪法。不久,它又支持了《瓦格纳法》。6 月份,一位保守的大法官退休,罗斯福顺理成章地任命了一位新法官。不过,他 2 月份提交的改组最高法院的议案在国会遭到了惨败,议员们对宪法守护神的敬畏超过了他们对罗斯福的崇拜。罗斯福和最高法院的斗争,实际上是扩大与反对国家直接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斗争。大萧条使美国人民别无选择,自愿或被动地接受了罗斯福新政的各种措施。这就加强了罗斯福与保守派势力斗争的砝码。此外,虽然罗斯福输了这场改组最高法院的局部"战役",但却赢得了维护新政成果这一"战争"的胜利,从这个意义上讲,这场斗争加强了总统权力,奠定了总统在三权分立中独特的地位和作用。

新政的成就

即便是在罗斯福当政的年代里,新政就经常受到批评。但是比较一下新政前后美国社会的变化,不难发现,新政使美国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变化。新政以前,联邦政府很少直接影响人民生活。那时侯,没有养老金,没有联邦对失业者、妇女、儿童的救助,没有联邦对证券市场的管理,没有联邦对农业的宏观调控,没有最低工资限度,没有福利。但是新政直接挑战了这些传统。政府通过各种形式的干预,对老百姓的生活发挥影响。与此同时,新政带来的政府膨胀扩大了总统权力,罗斯福创立了白宫行政办公室,打破了传统的行政办事惯例。他广泛吸收受过大学训练的人担任行政官员,建立众多的管理机构,加强了对货币供应的控制,注视着华尔街的活动,拯救了为债务所迫的农民和房客,建设了示范社区。

大萧条曾经削弱了有组织劳工的士气和力量。但是，罗斯福无意中却成为“劳工运动再生的产婆”①。由于新政中的劳工立法，特别是1935年的《瓦格纳法》，使得劳工有了通过自己选择的工会进行劳资谈判的权利，劳工地位空前提高。他们成立了有组织的工会，结束了传统公司的专制暴行，扫除了许多血汗工厂，规定了最低限度劳动标准和工资标准。与此同时，工会力量的加强，又为罗斯福总统和以后的民主党政府提供了更广泛的政治基础。

1937年开始实行的《社会保障法》让美国走上了福利国家的道路。这一保障制度为最需要帮助的人提供失业救济、保险、补助。新政设立的一些公共工程局，使得成千上万的人找到了工作。它创设的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给美国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由于新政的重要立法，确立了现代美国社会的基本模式，既创立了现代福利制度，也使政府承担起管理社会经济的一定责任。

新政也鼓励了艺术的发展，资助了大量小说家、作曲家、画家、舞蹈家，建立了美国第一个国家剧院；而吸引了众多青年参加的民间资源保护队成为日后肯尼迪总统时期和平队的先声。罗斯福鼓励妇女参与政治，妇女地位空前提高，他的夫人埃莉诺·罗斯福就是一位积极的妇女活动家，担任罗斯福总统劳工部长的弗朗西丝·珀金斯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内阁部长。黑人过去一向是共和党的支持者，由于罗斯福的新政措施在一定程度改善了黑人的经济处境，黑人转而成了民主党的支持者。新政使得千千万万被遗忘和忽视的人受到重视，改变了美国的社会结构。新政使美国人民恢复了自信心，弥合了大萧条给人们心灵带来的创伤。

新政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政府对经济生活是否有权进行有限的干预。它表明，以罗斯福为首的民主党人摈弃了传统的自由放任主义，同时也拒绝了当时欧洲流行的法西斯主义诱惑，而是

① 《罗斯福传——狮子与狐狸》，第285页。

走了一条中间道路。罗斯福从内心里认为受控制的资本主义秩序可以同时保证个人自由和经济增长，因此无需保守主义革命和激进主义革命。实际上，罗斯福已经成为一个“实用主义者、机会主义者和实验者”。[①] 在新政刚开始的时候，眼花缭乱的立法使一些人感到迷惑不解。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有记者问罗斯福，你一开始的行动完全是紧缩通货的，但是后来的一些法案，如《农业调整法》却增加了政府的开支，造成通货膨胀，罗斯福的回答是，“你总不能让人家挨饿。”这充分说明，罗斯福不为固定的原则所左右，而是完全从实用主义出发。正如他经常对记者所说的那样，他是橄榄球队的四分卫，看了前一场的比赛结果，他就会发令改换新的打法。[②]形势的需要和罗斯福娴熟的政治技巧，使新政时代成为检验各种原则并制订出一系列完整和连贯政治纲领的时代。政府发挥安抚、协调和统一各种主要利益的作用。由于美国社会的主体是中产阶级，新政的一系列措施保护了中产阶级权益和美国社会的主体。

总统成为新政中最关键的人物。“只有在总统办公室这一级，才对党派利益、纵横交错的立法集团和忙忙碌碌的官僚们提供统一的措施，以便应付全国性的问题。”特别是在罗斯福任期前两年，他既是国父，又是两党领袖，也是全国人民的总统。这两年中，他几乎“凌驾于政党和集团之上”，成为一个“拥有政治权力的立宪君主”。[③]罗斯福“以首席立法者的角色改变了白宫和国会之间的平衡”[④]，成为国会制订法律时的顾问和倡议者。在与最高法院的争斗中，最高法院的最终让步标志着总统权力扩大已成为不可逆转

---

① 《罗斯福传——狮子与狐狸》，第218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威廉·E·勒奇坦布格：《新政的成就》(上)，李融译，《美国研究参考资料》1990年第10期，第9页。

的潮流，罗斯福总统对和平时期美国经济已经拥有空前未有的控制权。事实上，在多数情况下，罗斯福本人并未完全追求这些权力，相反，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国会山的议员们意见不一分歧太大，才造成白宫渔翁得利的后果。于是，总统被赋予越来越多的责任管理人们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从罗斯福第二个任期开始，政府虽然没有直接控制工业生产，但是工业必须接受有关生活与劳动最低标准的基本原则已成为人们的共识。政府有限度的干预正是为了让工业更自由、健康地竞争。但是在一些特殊经济领域，比如银行、交通运输、农业、石油以及公用事业内，政府则加强了控制。各种形式的社会保险保障了人民的福利。最低工资、失业补助、养老补贴、农产品价格补贴等等，成为有效的保护人们权益的工具，人们再也不用担心1929年那样的大灾难了。

第四章　麦卡锡主义与美国冷战共识的形成

约瑟夫·麦卡锡，这个美国历史上最臭名昭著、寡廉鲜耻的政客，在50年代上半叶的美国却是一个人人惧怕的人物。麦卡锡的小人得势和当时美国社会上弥漫的反共情绪有着密切关系。这股反共气氛构成了一种文化氛围，使得麦卡锡主义得以滋生和发展。如果没有美苏冷战，没有共产主义影响的存在，麦卡锡决不会在美国历史上造成如此巨大的影响。麦卡锡主义的兴起又加强和巩固了美国人的冷战意识，由于和美国政府推行的冷战战略不谋而合，它得以有机会在美国政坛嚣张数载，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不光彩的一段插曲。

冷战与反共

二战结束后不久，美苏便开始了长达40多年的冷战。美国国内反共反苏高潮迭起，并在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时期达到顶点。这股反共高潮的兴起有着深刻的国际和国内背景。战后，苏联按照雅尔塔协定将东欧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成为这一地区新的主宰。西方开始担心，斯大林的苏联将利用东欧作为跳板，进而支配陷于各种困难之中的中欧和西欧，乃至整个西方世界。在美国人看来，斯大林咄咄逼人的行径和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无异。由于斯大林在国内采取极端残暴和具有镇压性的清洗政策，而且从表面看他似乎对全世界的共产党人拥有控制权，于是，美国人把共产

主义完全等同于斯大林主义，把它看作是西方世界的最大威胁。美国决心要承担起捍卫自由世界安全的责任。

西方的冷战在东方则成为一场热战。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在联合国军的旗帜下迅速卷入。朝鲜战争极大地影响到美国经济。美国的国防开支从1948年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上升到1953年的13%以上。[①]战争对于美国人的心理影响更大。人们原先对于自己国家的强大毫不怀疑，对于国家安全环境持满意的态度，但是转眼间，美国安全就受到威胁。人们在忧虑之余找到了简单化的答案，那就是无所不在的共产主义阴谋。他们认为，共产党已经渗透到美国的政府部门、劳工运动和知识界内部，特别是前国务院官员阿尔杰·希斯被揭露出是个共产党间谍后尤为如此。人们感到恐惧不安，这样体面的人都可能是共产党，那么谁又可能不是呢？1951年，罗森堡夫妇又被指控为原子间谍，最后被以战时进行间谍罪处决，成为第一例和平时期因间谍罪被处死的美国人。本来共产主义不应该是美国的内政问题，但是经历这么多的事件之后，"在国内搜寻共产党、在国外抵制它的威胁，已经成为美国的一个政治问题"。[②]

舆论的大肆宣传，使美国的普通老百姓时刻感受到所谓的共产主义威胁，形成了反共思想的广泛群众基础。接着反共思潮便转变成具体的反共政策和措施。一位研究者指出，它实际上是由"国会带头、由司法部门执行，所有宣传工具一起鼓噪的意欲一举消灭美国共产党和进步人士的扫荡战"。[③] 国会在这场运动中何以能够成为领头羊？从新政以来，更由于二战的爆发，总统权力与日俱增，加深了一些保守派议员的不满。因此，这股反共高潮的兴

---

① 《美国的历程》下册，第528页。

② 张红路：《麦卡锡主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9页。

③ 行健："美国历史上的反共歇斯底里(一)——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时期的反共高潮"，《美国研究参考资料》，1989年第11期，第4页。

起，不仅是为了加强和统一美国人的反共意识和冷战意识，而且也为国会提供了削弱总统势力、加强国会对国内外事务的影响机会。于是，国会借机通过了一系列的反共立法并进行了一系列反共活动。反共成为国会向总统权力挑战的强有力的舆论工具。

众议院早在 1945 年就成立了“非美活动委员会”。这个委员会调查了许多美国的共产党人、进步人士和一些少数种族权利倡导人士。从 1945 年到 1957 年，有 3000 多人受到这个委员会的盘问和调查。[①] 1946 年，众议院文职官员委员会又设立了一个分组委员会，专门调查联邦雇员的忠诚与否。同年，国会中期选举中共和党的获胜又逼迫民主党总统杜鲁门不得不在政府中也设立了“审查雇员忠诚性的临时委员会”。客观上，由于杜鲁门本人正在推行反苏冷战战略，对苏实行遏制政策，迫切希望打扫后院，巩固后方。正如他所言：“不忠诚分子和颠覆分子必须从政府岗位上清洗出去。但在尚无确凿证据足以做出这种结论之前，我们也不能允许联邦政府工作人员被扣以不忠诚的帽子。”[②] 1950 年，美国国会通过了《麦卡伦国内安全法》。杜鲁门总统虽然持反对态度，但是由于国会牢牢地控制在共和党人手中，国会最后以多数票推翻了杜鲁门的否决，强行通过了该法。这一法律要求共产党的组织登记，并加强了对移民的管制，强调了紧急状态下的拘留权。美国的共产党组织把国会的这一法律付之诉讼，直到 1965 年最高法院才宣布强制性的登记制度违宪。参议院也不甘落后。1951 年，参院司法委员会下设了一个内部安全分组委员会，调查共产党的影响。1953 年 4 月 27 日，共和党总统艾森豪威尔发布第 10450 号总统令，以“安全计划”取代了杜鲁门时期的“忠诚甄别计划”，进一步扩大了对政府雇员进行审查的范围。国会还于 1954 年通过了

① 数据引自“美国历史上的反共歇斯底里(一)——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时期的反共高潮”，第 5 页。

② 转引自《美国的历程》下册，第 527 页。

《共产党控制法》。国会、政府的所有这些举措，既迎合了当时弥漫在社会上的反共情绪，又进一步掀起了反共高潮。麦卡锡正是凭借这股反共之风粉墨登场，进而在一段时期控制了美国政坛的舆论导向。

麦卡锡主义的兴起

约瑟夫·麦卡锡于1908年11月出生在威斯康星州北部一个爱尔兰裔小农场主家庭里，1946年被选为国会共和党参议员(正是在这次选举中，共和党利用反共问题重新夺回了对国会的控制权)。从竞选一开始，麦卡锡就开始了他欺骗性的政治生涯。比如明明是在办公室度过了二战时期，他却向选民吹嘘他参加过太平洋作战并光荣负伤。选民们为他的夸夸其谈所迷惑，竟然轻率地相信了他的鬼话。在麦卡锡担任参议员之后，这个流氓政客深谙政治之道，非常敏感地捕捉到了当时的反共情绪并加以利用，成为他抬高自己的手段。在1950年2月的一次演说中，他宣称手上有一份国务院中共产党分子的名单，一共是205名，[①]并且说国务卿是知道这些共产党分子的，但却仍然对他们委以重任。1949年中国的"陷落"和1950年开始的朝鲜战争，使人们对"阴谋"、"叛国"、"政府部门的共产主义渗透"等问题非常敏感。从这次演说之后，麦卡锡开始了他短暂却可怕的政治生涯。尽管后来参议院的小组调查委员会的调查证明麦卡锡的指控完全是一场骗局，但是麦卡锡的影响已经扩展开来。麦卡锡正是惯用他这种错综复杂、玄而又玄的弥天大谎，让人们听信于他。他利用美国民众"恐共"的心理，乱扣"亲共"的帽子，以谋取政治利益和政治资本。调查麦卡锡指控一案的参议员米勒德·泰丁斯就因为得罪了麦卡锡，在竞选连任时，因麦卡锡向选民暗示他可能是亲共分子，而导致竞选失败。

① 《美国的历程》下册，第528页。

从 50 年代初开始，麦卡锡成为参议院内既举足轻重又令人望而生畏的人物。

1952 年，麦卡锡被任命为参议院政府行动委员会主席，他又自命为下属的调查分组委员会主席，这个调查分组就是历史上臭名昭卓著的麦卡锡委员会。从此开始了美国政治史上最可悲的一幕。麦卡锡滥用权力，利用这个委员会在政府各个部门中追踪所谓的共产党人和他们的同路人。对于他的夸大其辞、恫吓利诱的卑鄙手段，一时间竟然无人敢站出来反对。他声称，"共产主义已经渗透了美国的学校、毒害了大学的教师，充满在教材之中"，为了消除这种影响，他鼓吹美国的老百姓"为了美国的生存，清除共产主义"。[①]

在相当程度上，麦卡锡主义实际上是美国统治阶级之间的冲突，是一种党派政治。[②]麦卡锡大肆攻击罗斯福以来民主党政府的外交政策，甚至指责朝鲜战争的爆发是因为杜鲁门总统不愿意和美国国内的共产主义作斗争，转而通过这场战争来向美国人证明他愿意和国际共产主义作斗争。麦卡锡肆意地指责美国帮助中国共产党，以至于最后丢掉了中国。麦卡锡对民主党的攻击可以说是民主党丢掉 1952 年总统大选的一个重要原因。正因如此，艾森豪威尔对麦卡锡一开始一直姑息迁就，以"适应冷战形势和党派斗争需要"。[③]

麦卡锡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国务院。他派人调查"美国之音"的人事任命和宣传内容，并一度控制了这个广播机构。不仅如此，他打着清除共产党分子的牌子，任意调查美国的情报机关。他曾旋

① McCarthy, Joseph, McCarthyism: The Fight for America, New York: Devin - Adair Company, 1952, p 101.

② 丁夏林，"美国民主的代价：试论麦卡锡主义的实质"，《理解与沟通——中美文化研究论文集(1)》，沈宗美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 年 11 月第 1 版，第 228 页。

③ 刘绪贻主编：《战后美国史：1945—1986》，人民出版社，1989 年 6 月第 1 版，第 136 页。

风式地前往欧洲调查美国驻欧情报机关，把这个情报机关工作人员书架上不合他心意的书籍统统清除殆尽，艾森豪威尔时期的国务卿杜勒斯也经常满足麦卡锡的过分要求，甚至安排麦卡锡的一名亲信担任国务院人事部门的负责人。麦卡锡对国务院系统的图书馆实行了全面清查，演了一幕美国历史上罕见的“焚书”丑剧。像《托马斯·潘恩选集》这类经典之作都被冠以“明显追随共产党路线”，而像达希尔·哈米特的惊险小说则因为作者被认为有“参加共产党外围组织”之嫌而遭到清除。[①] 大批图书被付之一炬。这股禁书之风随即席卷了全美各地，搞得人心惶惶。最后艾森豪威尔总统不得不出面干预，他说，“不要加入到焚书者的行列中去。不要以为你们掩盖了谬误曾经存在过的证据就可以把谬误本身也掩盖起来。”[②]

但是麦卡锡的影响已经铺开，各种鼓吹麦卡锡主义的组织在美国各地纷纷成立。对激进主义的恐惧，对共产主义威胁的夸大，以及不择手段的党派斗争，或多或少都助长了麦卡锡主义。这场原先以维护国家安全为宗旨的活动演变成讨伐异端的运动，成为美国民主历史上最可悲、最黑暗的一幕。麦卡锡的追随者为了达到迫害异己的目的，不惜采用株连、忠诚宣誓、由告密者作证、开列黑名单、压制言论和集会自由、通过各种立法机关委员会等种种手段，对美国公民进行肆意询问和恐吓。一时间，美国全国上下人心惶惶。许多知名人士成为这场运动的牺牲品。美国原子弹之父罗伯特·奥本海默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他因为曾经和左派人士有过交往而被吊销了绝密工作许可证，饮恨离任。进步作家埃德加·斯诺则因受到迫害而迁居瑞士，著名电影演员卓别林则因被认为是亲共分子而背井离乡。在麦卡锡横行的 1950 年到 1954 年

① 《美国的历程》下册，第 537 页。
② 转引自《美国的历程》下册，第 537～538 页。

间，全国处于一片恐怖气氛中。成千上万的进步人士遭到迫害，他们的朋友、亲属遭到株连，人们一听到共产主义就胆颤心惊。但是事实上，麦卡锡主义已经让人们感到，正是这些美国民主的所谓捍卫者在威胁和破坏美国的民主。

麦卡锡的垮台

美国总统林肯曾有句名言，“你可以在某一时刻欺骗所有的人，也可以在所有的时刻欺骗某一些人，但你无法在所有的时刻欺骗所有的人。”这句话用在麦卡锡身上再恰当不过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美国人看清了他的丑恶嘴脸，与他进行斗争。法官勒尼德·汉德表达了当时许多美国人的想法：“我相信，当社会中的每个成员都开始把他的邻居视为潜在敌人的时候；当不遵守普遍接受的政治或宗教信条被视作背叛国家标志的时候；当不加解释、毫无根据的攻击取代了证据的时候，这个社会就已经在走向解体了。”[①]正是这种对麦卡锡主义可能造成的可怕后果的深深担忧，美国的朝野人士开始起来揭穿他的骗术。

出于现实的需要，杜鲁门总统虽然也主张对政府雇员实行忠诚甄别审查。但是他对麦卡锡主义过分的行径强烈不满。他有一次对美国退伍军人团说，“造谣诽谤，进行人身攻击，这些行径对我国各地每个公民都是一种威胁。当一个甚至没干过任何错事的美国人由于恐惧而被迫封闭自己的心扉缄口不言时，所有的美国人便都处于危险之中。我们所有的人，每一个热爱自己的国家和自由的美国人，都应当挺身而出，制止这种可怕的事情。”[②]

朝鲜战争结束之际是麦卡锡开始走向垮台之时。战争的结束，加上战争给人们带来的沮丧情绪，使得麦卡锡不可一世、咄咄

---

① 转引自《美国的历程》下册，第538页。
② 转引自《美国的历程》下册，第529页。

逼人的气焰不再那么具有诱惑力了。几年来，麦卡锡委员会对所谓共产主义渗透的调查已经扰得美国朝野上下不安。而且麦卡锡的手越伸越长，竟然粗暴地干涉到美国的行政、外交和军队内部事务。他的行为越来越荒唐，公然和陆军作对，对包括声名卓著的马歇尔将军在内的一些军队将领无理谩骂。陆军忍无可忍，开始反击。1954 年 3 月 11 日，陆军向参议院常设调查小组委员会递交了有关指控麦卡锡的材料。从 1954 年 4 月 22 日到 6 月 17 日，在陆军和麦卡锡之间举行了一系列电视听证会。听证会上，麦卡锡的丑恶嘴脸一览无余。他总是无理地打断别人的讲话，进行毫无事实根据的指控，而且表现得像一位歇斯底里的精神病患者。这直接造成了他的惨败。参议院内部对麦卡锡日渐不满，因为他已经严重损害了参议院的形象。1954 年 12 月 2 日，参议院以 67 票对 22 票通过了谴责麦卡锡的决议。从此麦卡锡一蹶不振，在美国政坛销声匿迹。因饮酒过度，麦卡锡死于 1957 年。

麦卡锡主义的影响

麦卡锡主义的兴起决不是孤立的偶然的事件。虽然麦卡锡横行的时间不长，但是他的全盛时代被称之为美国历史上的麦卡锡时代，足见其影响之大。麦卡锡主义的兴起和美国政府推行的冷战政策息息相关。美国政府反共反苏的宣传为麦卡锡主义的兴起培养了合适的政治土壤。虽然杜鲁门总统和艾森豪威尔总统都对麦卡锡的所作所为不满，但是麦卡锡的积极反共，还是美国政府愿意看到的。而且，麦卡锡得到了共和党保守派人士的大力支持。在杜鲁门时代，共和党国会需要麦卡锡这样的炮手来攻击民主党政府；而在艾森豪威尔时代，他们又需要麦卡锡这样的人物压制政府的权力过于膨胀。因此，许多反共组织和右翼势力以及共和党保守派都从财力、物力上支持麦卡锡，这也是麦卡锡主义得以在美国猖獗数年之久的原因。

麦卡锡主义虽然给美国社会造成了极端的恐共症，损害了很多美国人的个人民权，但是，麦卡锡主义却给美国鼓吹冷战的鹰派带来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好处。首先，它通过在全国范围内追查共产党人进一步加强了美国人的冷战意识。由于舆论导向，共产主义是民主的威胁这一观念广为人们接受，因此，人们对于政府的冷战政策和战略持支持态度。这正是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推行冷战外交政策的有力后盾。在这个意义上讲，麦卡锡的行径和总统推行的外交政策是相辅相成、互相呼应的。

不过，尽管在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任内，反共达到了高潮，但即便是这两位总统也极其反感麦卡锡的做法。这不仅是出于个人的好恶，也是出于对来自国会压力的日益不满。麦卡锡虽然意在把国会特别是他个人的势力渗透到政府部门去，但是，由于总统强有力的态度，麦卡锡的企图没有得逞。尽管在一定程度上，以艾森豪威尔为首的共和党得益于麦卡锡积极的反共立场，在大选中获胜。但当艾森豪威尔作为行政部门的首脑面对以麦卡锡为首的国会议员咄咄逼人的权力要求时，他还是毫不客气地站在行政部门一边，维护行政部门的权威。麦卡锡曾经要求查阅国防部的档案，艾森豪威尔总统认为这个要求太过分，于是直截了当地拒绝了他的要求，并宣布，作为总统，他拥有拒绝提供任何行政部门情况的“无限权力”，这是总统就拥有拒绝向国会提供有关情报这一权力问题所作的最强硬的一次声明。出于对麦卡锡的憎恨，美国人都支持艾森豪威尔的这一做法。而艾森豪威尔声明的这一权力，后来也被人们称之为“行政特权”。国会中以麦卡锡为首的势力试图压制总统权力的企图遭到了挫折，结果反而加强了总统的权力。这是麦卡锡等人始料未及的。

麦卡锡主义注定是要失败的。因为它所采用的手段，代表着一种美国社会和民众难以接受的反动和倒退，如果听之任之，美国在政治上必然走向法西斯主义，从而破坏社会稳定，这和战后 50

年代美国社会相对稳定的时代特征不符。麦卡锡主义的主要内容就是反共,这使得麦卡锡本人被认同为“反共英雄”。但是如果这种反共牺牲了公民的人权、自由以及其他一些宪法权利,就无法为美国社会主流所接受。因麦卡锡主义而弥漫在美国社会上的恐惧、怀疑与不负责任的情绪注定了麦卡锡最后自己要成为这种“非理性的牺牲品”。[①]

在麦卡锡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之后,反共的歇斯底里仍然在继续。不过在1953年,保守的最高法院首席法官文森去世,颇有自由主义思想的沃伦成为首席大法官。沃伦法官在50年代后期进行的一系列裁决,消除了麦卡锡主义的残留影响,维护了公民的自由和权利,对于修复美国资产阶级民主与法律秩序、稳定政局、巩固资本主义制度起到了作用,人人自危、充满恐怖气氛的麦卡锡时代因此基本结束。

① 丁夏林:《美国民主的代价:试论麦卡锡主义的实质》,载《理解与沟通——中美文化研究论文集(1)》,沈宗美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11月第1版,第225页。

第五章 民权运动与联邦政府权力的扩大

自19世纪60年代美国内战以来，虽然黑人获得了名义上的宪法权利，但是由于种族主义阴魂一直不散，联邦政府在保障黑人等少数种族的权利问题上一直唯唯诺诺、踌躇不前。本世纪60年代的黑人民权运动猛烈地冲击了种族歧视制度和政策，联邦政府很好地利用了这一运动潮流，通过管理公众社会生活扩大了联邦政府的权力。

民主的讽刺

从1619年起，黑人就是戴着枷锁的移民。[①] 从那时起，黑人作为一个种族，一直是受压制和迫害的对象。内战结束后的重建期让黑人获得了一定的权利，特别是宪法第14、15条修正案赋予黑人公民权，可这些权利一直都停留在口头上，没有真正的实现。

1776年的《独立宣言》称：人生来平等，但是黑人却是被排斥在外的。黑人是奴隶，奴隶是没有自由、民主、平等可言的。他们完全被剥夺了人权。他们是一群会说话的工具，和主人交流的语言也仅限于"是，主人！"这样的话语。然而正是这些黑人构建了内战前南方欣欣向荣的种植园经济，而他们自己却一再被作为商品转让、出售、贩卖。

① 在1619年8月下旬，第一批（共20名）黑人被荷兰殖民主义者贩运到今天美国的詹姆斯敦。

虽然美国的建国者们是一群政治天才，他们在美国经济尚处于落后、政治尚未定型时期奠定了美国的宪政制度，但在奴隶问题上却从一开始就一筹莫展。也有人认为，是“白人的贪婪和恐惧”[①]阻止了这些开国元勋们去解决这个给美国社会的发展带来隐患和危机的问题。

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奴隶制在南方不仅让白人易于统治，而且也使得他们有廉价的劳动力来进行资本原始积累。因此，奴隶制一直得不到解决。

直到1865年内战结束，黑人才获得名义上的公民资格。宪法第14条修正案规定：“凡在合众国出生或归化合众国而受其管辖之人，皆为合众国及其居住州之公民。各州皆不得制定或施行剥夺合众国公民之特权或豁免权之法律；也不得未经正当之法律手续，即行剥夺任何人之生命、自由或财产；并在其辖境内，也不得拒绝任何人享受法律之同等保护……”第15条修正案也规定：“合众国或其任何一州对于合众国公民之投票权，不得因种族、肤色或曾为奴隶而取消或剥夺之……”。但是这种公民资格是不完整的。南方白人总是想方设法剥夺黑人的正当权利。比如内战后南方各州制订的法律规定，只有在1867年1月1日有选举权的人或他们的子孙才有选举权，同时各州把纳税、财产所有权和受教育状况作为取得选举权的条件。就是这项人们称之为“祖孙条款”的南方法律明目张胆地剥夺了黑人的投票权。在现实生活中，黑人仍然生活在与世隔绝的状态中，在南方法典的控制下黑人遭受不公平的待遇与歧视。大部分黑人从事着繁重的农业劳动，生活在贫困线下，生活艰难。列宁曾经指出，“除了名义上的解放，资本家是不会让黑人在现实生活中获得真正的平等的。”[②]

---

① Low, W Augustus & Clift, Virgil A , Encyclopedia of Black America New York: Da Capo Press, 1981, p 53

② 列宁：《俄罗斯人和黑人》（1913年1月），《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541－542页。

1877年以后的最高法院在几乎所有的有关黑人民权的判决中，都是站在白人的立场上。1883年，最高法院宣布，重建时期国会通过的《1875年民权法》中关于黑人可以使用白人公共场所的条款是违宪的。1896年，最高法院在《普拉色诉费格森案》(Plessy. v. Ferguson)的判决中判决“平等但是隔离的教育设施是符合宪法的”。这个原则成为继续实行种族隔离的南方诸州的法律准则。正是种种表面上合理合宪的措施，使黑人的正当权利得不到保证，种族主义情绪根深蒂固。一个著名的白人种族主义者，密西西比州的詹姆斯·范德门曾经叫嚣，认为黑人是人，并因此能够自我完善的观点是美国“最操蛋和最危险的想法”。[1]

布朗判决案与黑人民权时代的开始

战后黑人民权运动的高涨既是多年来黑人民权运动发展的结果，也是战时战后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产物。黑人广泛地参加反法西斯战争，大大提高了他们的自我意识和谋取平等权利的意识。而沃伦法官的自由主义倾向改变了最高法院多年来在民权问题上的保守立场，它的有关判决否定了种族隔离政策的合法性，使黑人民权运动的参加者得以合法地谋取种族平等。

战后50～60年代，黑人受益于社会的普遍繁荣，经济收入有较大提高，但与白人相比差距依然惊人。在1947年，有80.6%的美国黑人家庭的年平均收入在平均线以下，与此同时，仅有46.2%的白人家庭收入在社会的平均线以下。[2]到1965年，这个数字下降到了77.2%，但是同期仅有37.8%的白人家庭收入在平均线以下。[3]黑人的失业率也比白人要高两倍以上。造成黑人高

① Encyclopedia of Black America　p 85

②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 S : from Colonial Times to 1970, p 297

③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S , 1970, p 322

失业率低收入的直接原因是教育机会不均等。虽然黑人受普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人数与比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与白人相比，无论是在校平均时间，还是上高中和大学的比例，黑人都远远落在了后面。[5]美国学校一直实行黑人和白人隔离的教育政策，黑人学校的措施和师资远远不如白人学校，毕业生因此很难与白人竞争。而社会上存在的对黑人的普遍歧视更妨碍了黑人的进步与发展。美国社会学家雷诺德·李斯曼在其1976年发表的《美国社会的不平等》一书中曾经对此作过概括。他说，“在美国，作为一个黑人就意味着你继承了先辈在生活的各个方面所遭受的不平等待遇。生活在美国的墨西哥族人、波多黎各人、印第安人，情况和黑人也差不多。”[6]

黑人民权运动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产生的。民权运动的目的就是要争取黑人的平等权利。但是这些愿望的实现却遇到了“隔离但平等”这一现实的法律障碍。在一定程度上，扫除这一障碍是黑人争取平等权利的首要条件。1953年，保守的大法官文森去世，对黑人非常有同情心的厄尔·沃伦当选为首席大法官。他的当选为黑人带来了希望和契机。1954年，以沃伦为首的最高法院在《布朗诉托皮卡地方教育局案》（以下简称布朗案）中作出判决：在教育问题上，任何平等但是隔离的教育设施都是违宪的。这项决议就像一颗原子弹，在法律上彻底摧毁了任何歧视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不公平政策。在内战后长达100年的时间，黑人孩子一直在隔离的学校上学。这种“隔离的二流的设施决定了黑人在公共教育、医疗保健和公共住房等各个领域的悲惨命运”。[7]以南卡

⑤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 S , 1970, p 110

⑥ 转引自乔恩·谢泼德和哈文·沃斯 著《美国社会问题》，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第1版，第71页。

⑦ Weisbrot, Robert, Freedom Bound: A History of America's Civil Rights Movement, New York: Norton, 1990, p.5

罗来纳州为例，1915 年该州在公共教育中平均每年为每个白人孩子花费 24 个美元，与此同时，黑人孩子仅有 3 个美元。[①]提倡种族平等的口号首先从教育领域开始。倡导与寻求平等的权利并不意味着黑人要和白人平分社会财富，而是追求平等机会的保障，消除任何现存的不利于实行平等机会的各种歧视性政策和社会观念。布朗案为黑人组织起来争取平等权利提供了法律的保障，同时美国政治文化中宣扬的人人平等的民主思想则为斗争提供了合理性。正是这些合法性与合理性促使罗莎·派克斯太太[②]在公共汽车上拒绝给白人让座。这一事件演变成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一场抵制公共汽车的运动。并成为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美国全国性黑人民权运动的契机。

布朗案判决后，最高法院在其他领域也坚持新的平等原则。它先后宣布在州际运输中实行种族隔离为非法，支持保证黑人投票权的法案，推翻了对民权运动领导人的判决，还经常以法院命令保护民权示威。虽然这些裁决引起了保守派对沃伦的不满，甚至要弹劾他。但是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在最高法院精神的鼓励下，已经一发不可收拾，要求政府采取行动全面废除种族歧视。如果在 1954 年布朗案判决后，各州能够坚决贯彻最高法院的精神的话，那么民权运动的风波也许就不会成为现实。但是，最高法院的决定遭到了白人南方保守派的强烈抗议和反对。已经习惯于种族隔离制的南方各州积极抵制布朗案的精神，不仅一如既往地坚持隔离的教育方式(如在布朗案之后，在南部 17 州的 6000 所白人学校

---

① Lewis, Anthony and the New York Times, Portrait of A Decade: The Second American Revolution New York: A National General Company, 1964, p 17

② 1955 年 12 月 1 日，罗莎·派克斯太太，一个 42 岁的黑人女裁缝，经过一整天的工作，又上街买了东西，然后登上公共汽车回家。车里很挤，派克斯太太在黑人席的前排找到一个座位。到了下一站，上来不少白人。司机下令派克斯太太把座位让给一个白人，这意味着派克斯得一直站到家。据她后来说，她简直累坏了，双腿酸疼。于是她拒绝让座。司机就把警察找来，警察逮捕了她，把她送到法院。

中，仅有741所学校允许黑人学生入学)，而且在阿肯色州甚至发生了州长下令用武力来阻止黑人学生入学的事件，以致艾森豪威尔总统不得不动用军队来保证黑人学生的合法权利，这就是著名的小石城事件。残酷的现实终于使黑人明白，仅仅依赖法院是很难取得正义的，要尽快取得自由，只有采取更直接的行动。

民权运动终于轰轰烈烈地开始了。这是一场以"追求政治平等和社会、经济条件的改善为目标"[①]的运动。民权运动分裂为两派。一派主张用非暴力手段，通过静坐示威、游行请愿，向政府施加压力的方式来赢得政府的同情，争取国会和最高法院的支持，其代表人物以小马丁·路德·金为代表。另一派则主张通过暴力手段，通过黑人革命来取得黑人的平等权利。这一派以马尔科姆·艾克斯为首。暴力派和非暴力派一起推动了民权运动的发展，吸引了大批有同情心的其他种族的人和妇女的参加。民权运动表明"人民的思想和习俗近乎奇迹般地从看来是根深蒂固的种族隔离的传统惯例中解放出来了"。[②]内战后实行了一个世纪之久的种族隔离政策被迅速废除，民权问题前所未有地影响着这个时代的美国人。

肯尼迪总统与黑人民权

民权问题并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公民权利问题，它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政治问题，直接关系到美国黑人等少数种族(到后来包括妇女等文化弱势集团)权利的爆炸性社会问题。民权成了民主党参议员约翰·肯尼迪1960年竞选总统中最微妙的政治问题之一，后来也成为肯尼迪政府倍加重视的领域，并成为联邦政府扩大权

① Button, James W , Blacks And Social Change: Impact of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in Southern Communiti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New Jersey, 1989, p 3

② 戴维·伯纳著:《约翰·F·肯尼迪和新的一代》，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第115页。

力卓有成效的突破口。

肯尼迪总统上任之际,正是黑人民权运动如火如荼展开的时候。民权问题从竞选开始就成为一个重要的国内问题。1960 年,民权运动发生了一系列大事:

1) 国会通过了《1960 年民权法》;

2) 北卡罗来纳州格林斯伯勒市的静坐运动开始;

3) 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市的小学在法院强制性规定下开始打破隔离;

4) 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SNCC)成立;

5) 最高法院在《博尔顿诉弗吉尼亚案》(Boynton v. Virginia)中宣布铁路和公共汽车上的隔离违宪;

6) 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市静坐运动开始;

7) 佛罗里达州塔拉哈西市静坐运动开始。

1960 年时,肯尼迪与尼克松的总统竞选相当激烈,难分伯仲。由于肯尼迪对马丁·路德·金的被捕表示关切,赢得了黑人的选票,[①]最终以极微弱的多数战胜了尼克松。肯尼迪担任总统后,民权成为他国内政策最重要的内容,而其中的公平就业成为优先考虑的问题。[②] 1961 年 3 月 6 日,肯尼迪发布了第 10925 号总统令,成立了总统就业机会均等委员会(the President's Committee on 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任命副总统约翰逊为主席。肯尼

① 小马丁·路德·金这时候被捕入狱,金夫人正好又身怀六甲。作为参议员和总统候选人的肯尼迪觉得应该打个电话给金夫人,以示安慰,同时他表示将全力帮助金博士出狱。当肯尼迪和他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出面干涉时,金博士终于被保释了。他的父亲激动地宣称:"在当晚举行的群众大会上,原先准备选尼克松的金爹爹对听众说:'如果我有一只装满选票的皮包,我就要把这些选票都拿着,倒在参议员肯尼迪的脚跟前。'"详见珂蕾达·史科特·金 著《自由之梦——小马丁·路德·金的奋斗》,新华出版社,1987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19 页。

② 见肯尼迪总统的第五次公开记者招待会上答记者的第十个问题,他谈到有许多问题要被考虑和采取行动,比如教育领域和住房问题,但是首要的是在就业领域采取行动。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 S : John F Kennedy, 1961,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1962, p 137

迪试图通过这个加强了的总统机构来"保证所有的人不论肤色、信仰在政府部门内和在那些拥有政府合同的企业内有平等的机会"。他希望通过这项行政措施可以对在政府内"每一个部、局、办公室工作的少数种族成员有个全面的调查",从而对民权领域的现状有个"正确的评估",并由此"建立一个尺度来衡量进一步的进步"。肯尼迪告诉公众,他已经把他的这届政府"投身于在政府内和与政府有商业合同的企业内建立起平等机制的事业",他认为政府对这项命令"积极"的执行将"意味着结束这种歧视。"他说,他已经命令政府的各个部"立刻采取措施",致力于"扩大"政府内少数种族成员的就业机会。①

总统就业机会均等委员会的工作不久初见成效。5 月 25 日,洛克希德飞机公司(Lockheed)和总统就业机会均等委员会发表一份称之为"进步计划"(Plan for Progress)的联合声明,洛克希德飞机公司将在自愿原则的基础上扩大少数种族的平等就业机会。肯尼迪总统赞扬洛克希德飞机公司的这一举动是"这个国家民权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②。以此开端,仅 1961 年,先后有 9 家与政府有业务关系的大企业自愿与政府签定了平等就业协议。1962 年后也有很多大企业效尤。肯尼迪总统对民权领域取得的这一成就非常满意,指出在参加这一运动的公司的努力下,从事手工、技术和管理以及各个层面的少数种族比率都有了很大提高,给人以"极其深刻的印象"。③

肯尼迪在民权问题上的积极主动姿态是他的前任们所没有的。他任命的黑人官员超过了以前任何一个时期。当参加自由乘

---

① 见肯尼迪总统签署第 10925 号总统令后第二天的公开声明,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 S : John F Kennedy, 1961, p 150

②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 S : John F Kennedy, 1961, p 396

③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 S : John F Kennedy, 1962,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1963, pp 117~118

车运动的乘客受到种族主义分子阻拦时，肯尼迪采取措施取消了州际公路长途汽车站实行的种族歧视制度。当密西西比大学拒绝黑人学生詹姆斯·梅雷迪斯入学，抗拒联邦法院的判决时，肯尼迪毫不犹豫地派出联邦法警保护黑人学生的合法权益，这一事件也因此被认为是“内战结束以来州同联邦当局发生的一次最严重的冲突。”[①]

1963 年 6 月，州和联邦再度发生冲突。亚拉巴马州州长华莱士亲自阻挠两名黑人学生进入州立大学学习。他的举措遭到了肯尼迪政府毫不客气的打击，肯尼迪依据《美国惩治国内暴乱法》(the United States Code relating to the suppression of domestic violence)第一段第 333 款的第 10 条[②]毫不犹豫地派出了联邦军队，维护了联邦政府的权威，显示了总统在处理内政问题上具有的无比巨大的权力。他在这个问题上的主动性是他的前任总统无法比拟的。[③] 1962 年的梅雷迪斯事件和 1963 年的亚拉巴马州事件的妥善解决表明，联邦权力至高无上，必要时总统甚至可以动用联邦军队来捍卫联邦尊严，强迫州的管理机构接受联邦法律的制约。

民权立法和联邦政府权力的进一步扩大

亚拉巴马州事件发生后，肯尼迪深感需要呼吁全国民众来关心民权、改善民权、促进民权立法。1963 年 6 月 19 日，肯尼迪总统向第 88 届国会递交了一份内容全面、影响深远的民权法案。这

① 《肯尼迪》，第 319 页。

②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 S : John F Kennedy, 1963,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1964, p.398

③ 肯尼迪政府两次动用联邦军队干涉州事务也可以说是遵循了艾森豪威尔时期的先例。1957 年，阿肯色州州长奥瓦尔·福布斯动用国民警卫队阻止黑人学生去该州的小石城市中心中学上学，公开对抗联邦法院判决。艾森豪威尔总统虽然认为法律和强迫手段难以改变人们对种族隔离问题的一贯看法，但出于维护联邦权威的考虑，最后还是派军队前往小石城去恢复秩序。与艾森豪威尔总统相比，肯尼迪总统信奉积极使用总统行政权力(包括必要时动用军队)可以改善美国的民权状况。

个法案把他任期内的行政活动以法规的形式确定下来,并加以扩充。这项法案提出了两个主要原则:1)禁止在公共服务行业场所实行种族歧视;2)授权司法部长主动采取措施取消某种形式的种族隔离。可惜的是,肯尼迪未能在其任内使他的民权立法成为现实就被暗杀了。肯尼迪的英年早逝似乎感动了一部分保守势力,顺利促成了《1964 年民权法》的通过。该法不仅禁止在公共场所基于种族的歧视,也禁止基于宗教、原籍的歧视。黑人的斗争终于赢得了法律的支持。伴随着民权运动的逐步深入,黑人迫切希望法律的保障能够成为现实,能够真正为全社会所接受。但是,长期形成的社会习俗和社会传统不可能在一朝一夕内改变。保守势力竭力阻碍黑人实现自己的合法权益,一些黑人开始以暴力对抗白人的歧视。种族冲突事件时有发生,美国社会一时陷入了严重的分裂危机。

1965 年美国各大城市发生严重的种族骚乱。肯尼迪的继任者林登·约翰逊总统决心采取强有力的姿态,保证黑人等少数族裔的合法权益得以实现。经过深思熟虑后,1965 年 9 月 24 日,约翰逊总统发布第 11246 号行政命令,实施"肯定性行动计划"(affirmative action)。它要求联邦政府的承包商和接受联邦资助的机构优先考虑雇佣妇女和少数族裔。肯定性行动计划这一称呼最初来自肯尼迪总统签署的第 10925 号行政命令。该命令主要是要求美国公司雇佣更多的少数族裔。肯尼迪也因此成为美国历史第一位在劳务政策上用行政命令的方式要求雇主在雇佣劳工时注意雇佣少数族裔的总统。不过在肯尼迪时代,肯定性行动主要是基于自愿的原则。约翰逊总统进一步推进了肯尼迪的主张,推行强制性的肯定性行动。

肯定性行动计划实际上也是约翰逊总统提出的"伟大社会"、向贫穷开战的社会改革整体计划的一部分。肯定性行动计划禁止在就业、教育、住房方面对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进行歧视。政府设

立了“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负责监督工商企业，一旦发现某个企业在少数族裔雇佣、付酬、提升机会等方面有歧视行为，它将起诉这个企业。为了反对教育领域的歧视，推行黑人与白人同校，政府还决定用班车将黑人学生越区送到白人学校上学，同时相应地把白人学生运到黑人学校去上学。为了对付一些极端歧视黑人的白人，政府有时还不得不动用警察和军队对黑人学生进行保护。为了贯彻肯定性行动计划，一些大学对入学名额规定了配额制度，给予黑人等少数族裔与他们人口比例相一致的名额。在房屋买卖方面，政府制定了公平房屋法。这些举措都在客观上帮助了黑人等少数族裔。肯定性行动计划的实施，加大了联邦政府对老百姓日常生活的管理，在更大范围内拓展了政府权力，使得联邦政府在反对歧视、维护种族平等等原则的旗帜下发挥更积极、主动的作用。

从 60 年代开始，民权领域成为联邦政府对社会经济生活施加影响和发挥作用的一个典型窗口。直到 1980 年共和党人里根上台，美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可以看到联邦政府的管理作用，从汽车座位的安全带和警报汽笛，到设立治疗高血压、血友病的诊治中心，从妇婴保健措施，残疾儿童服务设施、地方上为离家出走青少年服务的设施，到公共图书馆、普及公制度量衡的教育、固体废物的处理和噪音控制，甚至包括城市灭鼠计划等等，[1] 联邦政府的影响已经无所不在。

① 西奥多·怀特：《美国的自我探索：总统的诞生(1956 年至 1980 年)》，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 年 8 月第 1 版，第 147 页。

第六章　反战运动与政府信任危机

60 年代,美国国内社会运动风起潮涌,黑人民权运动、妇女解放运动、新左派运动、反主流文化的青年运动波澜壮阔。随着美国在越南的军事干涉越陷越深,反战呼声也一浪高过一浪,并在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达到颠峰。在这场反战运动中,发生了五角大楼文件严重泄密事件。接着,尼克松政府又深陷水门事件的讨伐声中,帝王般的总统权威岌岌可危,政府的信任度受到严重挑战。最终,声名狼藉的尼克松总统被迫辞职。从肯尼迪开始,总统通过越南战争,事实上拥有了国会才有的宣战权。五角大楼文件案和水门事件给了国会一个反击的机会。国会向总统权力挑战,试图重新恢复国会的尊严和权威。即便是总统职位受到水门事件的影响而一度发生信任危机,总统权力的扩大依然是不可扭转的历史趋势。

反对越南战争

越南战争长期悬而不决,是美国的决策者始料不及的。1964 年 8 月 2 日和 5 日,借口美国军舰在东京湾受到越南北方两次“无缘无故”的进攻,约翰逊政府推动国会通过《东京湾决议》,授权总统“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包括使用武装力量”支持南越和制止侵略。从此,美国在越南的军事行动逐步升级,越战最终成了美国人的一场战争。约翰逊政府从前几届政府那里继承下来一种假设,那就是保卫越南使之不落入共产党之手对于美国的安全是至关重

要的。美国决策者和外交精英认为，美国在越南作战的成败将成为对美国在世界其他地区的意志和信义的考验。民意测验表明，在1968年以前大多数人还是支持越南战争的。这给好战的鹰派以借口。美国的卷入步步加深，战争规模一再扩大。

在美国卷入战争的同时，美国人民反战呼声和运动也日趋高涨。从1964年开始，先是各个大学校园展开战争问题的辩论，随之而来的就是各个城市爆发反战运动。在加州大学的伯克利校区，学生们在校园内摆上桌子进行反战争宣传。学校当局扮演着反派角色，开除了一些抗议学生。1964年12月2日，有1000多名学生聚集在一座行政楼里，他们静坐、发表讲演、唱歌，并拒绝了当局让他们撤离的命令。于是，州、县警察出动，逮捕了数百名学生。但是伯克利的学生一如既往地展开非暴力的言论自由运动。伯克利激励着其他学校的反战派，不满的学生纷纷行动起来显示他们的力量。

一开始，中产阶级的父母对战争满不在乎，但是当战争需要他们的儿子去服役，并且越来越多中产阶级的子弟丢掉性命时，他们开始怀疑战争。在大学的校园里，学生们拒绝服兵役，焚烧了征兵卡，有的甚至逃往国外以躲避兵役。据估计，当时有3～4万美国青年因为躲避服兵役逃亡国外。[①] 学校的反战派举行了“暂时停课”运动，第一个月1天，第二个月2天，第三个月3天，以此类推。1969年10月15日的暂时停课运动，吸引了全国大量学生停课。11月14日～15日的暂时停课运动规模最大。近25万反战者聚集在华盛顿，他们从阿灵顿国家公墓出发，最后行军到白宫前，游行持续了近40个小时。1970年4月30日，尼克松命令美军进入柬埔寨，除掉靠近南越边界的北越庇护所。美国的反战人士把这一军事行动看作是美国卷入另一个国家战争的开始。于是，学生

---

① 《美国的历程》下册，第620页。

的抗议运动再起,并和政府发生了冲突。5 月 4 日,派往俄亥俄州东北部肯特州立大学的国民警卫队队员向一群抗议学生开枪,打死 4 人,打伤 9 人,没有证据说明被打死的学生采取了暴力行为。[①] 这是在所谓的“法律与秩序”的名义下,州政府残酷使用武力镇压非暴力学生运动的例子。肯特血案迅速传遍全美。全国有 400 多所高校的学生罢课,举行抗议活动。成千上万的大学生和其他反战人士聚集在白宫附近举行了隆重的群众大会。

已经应征入伍的青年人则把反战思想带入了军营,带到越南战场上。一些战士佩戴象征和平的标志,并且拒绝参战。大麻成为越战士兵麻醉自己的日用品,为数不少的人甚至吸食海洛因。一些战士因为长期处于生与死的紧张环境中,精神崩溃,自杀事件屡有发生,还出现了一些厌战士兵用手榴弹炸死军官的事件。

从肯尼迪时代开始得到普及的电视在反战运动中起了极大的作用。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电视报导来了解国内外大事。随着记者把注意力转向这场隔洋战争,战争来到了美国普通百姓的起居室。人们忐忑不安地注视着战争的野蛮场面,特别是看到美军用凝固汽油弹焚烧越南村庄时,人们感到万分震惊。1968 年 3 月,新闻界披露了由小威廉·卡利中尉指挥的一个小分队屠杀越南美莱村 100 多名手无寸铁平民的事件,一下子引起了全国性的抗议和谴责声。人们开始有越来越多的理由怀疑这场战争的目的。美军在越南的兽行和由此造成的破坏已经到了与美国利益和它追求的目标极不相称的地步。

正是在印度支那人民的坚决抵抗及美国人民轰轰烈烈的国内反战运动的压力下,1969 年新上台的尼克松政府不得不开始寻求结束印度支那战争的办法。1973 年,根据解决印度支那战争的《巴黎协定》,美国军队最终撤出了越南。

---

① 《美国社会生活与思想史》下册,第 520~521 页。

五角大楼文件泄密事件

1968年共和党人尼克松竞选总统时，曾信誓旦旦地向美国人民保证，他上任后将收缩美国在越南战场上的军事力量，并最终结束战争。他的保证迎合了当时已经非常强烈的反战呼声，因而得以战胜在任副总统民主党候选人汉弗莱，赢得大选。

尼克松上任后确实试图改变战争“美国化”的现实，使越战“越南化”，也就是说，用南越军队取代美军。问题在于，南越政权一直依赖美国的扶持，如果美国完全撤出，南越政府必将一触即溃。因此，美国虽然降低了在越南的陆军人数，却不得不加强空军和海军力量。美国在越南战场上投放了大量炸弹，其数量超过了二战期间盟军对轴心国的投弹总量。它不仅严重破坏了印度支那的生命财产，也使美国的军费大大增加，越战的战争费用高昂，它的直接战费达到1500亿美元，总的费用大约在3500亿到6760亿之间，是仅次于二战的一场高费用的战争。[①]

1970年4月30日，美国开始入侵柬埔寨。反战派认为，尼克松违背了他要使越南战争逐步降级的诺言，不仅如此，他还把军事行动扩大到另一个国家。美国政府内部也就战争何去何从的问题产生了极大的分歧。美国朝野上下一片抗议声。国会也强烈反对总统不经过他们授权就私自扩大战争，国会再也无法容忍总统权力的无限度扩大，决心限制总统的战争权力。正在这时，“五角大楼文件事件”的出现加强了国会的决心。

1971年6月，《纽约时报》和其他一些报纸披露了一批美国卷入越南战争的国防部绝密文件。在文件公布之前，美国政府曾试图以“国家安全”为由阻止文件的发表，但未果。这就是美国政治史和新闻史上著名的“五角大楼文件事件”。这批国防部的绝密档

① 《美国的历程》下册，第623页。

案表明,美国在战争早期就采取了蒙蔽、欺骗公众的行径以获取人们对越战的支持。这些文件是由一个颇有正义感的国防部官员丹尼尔·艾尔斯伯格[①] 透露给外界的。

艾尔斯伯格博士是1964年作为哈佛校友被助理国防部长约翰·麦克诺顿先生选中担任其特别助理的,为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和麦克诺顿撰写演讲稿。1965年,艾尔斯伯格去越南实地调查。在越南南方的经历改变了艾尔斯伯格对战争的一贯看法。1967年返回美国时,他已变成了一位主和派。与此同时,他受命参与编写一部有关美国入侵印度支那战争始末的多卷本五角大楼《秘史》,这使他有机会接触了许多绝密档案和有时间思考美国的越南教训。1968年,艾尔斯伯格开始公开发表反战言论。为此,他辞掉了华盛顿的工作。从1970年开始,艾尔斯伯格试图说服国会反战派议员,向尼克松政府挑战,以期早日结束越战。但是他的努力四处碰壁。正像当时的主和派头面人物乔治·麦戈文参议员一样,这些议员虽然反对战争,但是他们想"要进的是白宫,而不是监狱"。[②]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艾尔斯伯格不得不铤而走险,向新闻媒介揭露真相。为此,美国政府以"泄露国家机密"等罪名起诉他,但艾尔斯伯格最终在言论自由的宪法保护下被法院判定无罪。

尼克松自己也未料到,作为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竟连一个小小的艾尔斯伯格也对付不了。在最高法院这个宪法守护神面前,尼克松政府败诉。这对帝王般的总统权力是个沉重打击。"五角大楼文件事件"闹得沸沸扬扬,严重损害尼克松总统和他的政府信誉。不过,对尼克松来说,这只是一个开始,而非结束。接踵而来

---

① 笔者于1994年有幸在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见到了这位至今仍有争议的人物。此时他已是花甲之年,满头白发。在给笔者签名留念时,写下了"For Peace!"(为了和平!)两个字。这似乎表明了他当年作出选择的考虑。

② 张海涛著:《尼克松在白宫——祸起萧墙》,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10月第1版,第169页。

的水门事件险些使他成为美国第一位被弹劾的总统。

水门事件

美国宪法虽然有弹劾总统一说，但是真正被弹劾的美国总统是没有的。美国内战后安德鲁·约翰逊总统因为处处与国会作对，加上他对南方白人的偏爱，激怒了国会，引发了国会对他的弹劾。但到最后关头他幸运地以一票之差死里逃生，弹劾未能生效。到了本世纪70年代，尼克松成为另一位面临弹劾的总统，这一切都是缘于水门事件。

1972年6月17日，5名携带照相机和电子窃听装备的人在华盛顿水门大厦的民主党总部办公室被捕。有一位叫詹姆士·麦科德。他是尼克松争取连任委员会安全工作的负责人。该委员会的主席约翰·米切尔立刻出面否认该委员会与此事有牵连。但后来揭露出来的事实却说明，这一窃听事件有着相当复杂的背景，直接涉及到白宫。

早在1970年，尼克松就批准了白宫助理提出的"休斯顿计划"。它要求以维护国家安全的名义进行盗窃、电子窃听、邮检等非法活动。虽然在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的反对下，尼克松被迫撤消了这项计划，但是到1971年，被"五角大楼文件事件"搅得心烦意乱的尼克松又建立了一个叫"管子工"的白宫秘密小组来实施休斯顿计划。1972年5月，他们第一次潜入水门大厦，在一些电话上安装了窃听器，并给一些文件照相。这一秘密活动进行了多次，直到6月17日凌晨在撤离水门大厦时才东窗事发。

1973年1月，法官约翰·赛里卡开始审理水门案件。2月2日，赛里卡表示他对案件披露的状况不满意。于是，国会开始亲自行动。2月7日，参议院表决通过设立一个特别委员会来调查1972年大选中的舞弊问题。参议员萨姆·欧文担任了这个委员会的主席。3月21日，水门事件中被捕的詹姆士·麦科德第一个招

供。他承认在审讯中作了伪证，说他们受到承重的政治压力，让他们这些被告承认有罪后必须保持沉默。于是水门事件的阴谋开始败露。

5 月 17 日，欧文特别委员会开始举行公众听证会，全国电视网加以实况转播。随后，在参议院的压力下，司法部任命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阿奇博尔德·考克斯为独立起诉人（independent prosecutor）。[1] 欧文和考克斯竞相展开对水门事件的调查。

早在 1971 年 2 月，为了未来撰写回忆录方便，尼克松总统就在白宫安装了声控录音系统。因此，他对水门事件所作的反应就成为强有力的调查证据。当水门事件越来越成为爆炸性的新闻，尼克松越来越深地陷入可能被起诉的境地时，他抹去了录音带中许多对他不利的内容。1973 年 7 月 16 日，一位尼克松的助理在参议院委员会作证说，自 1970 年以来尼克松把所有在他办公室里进行的谈话都秘密地录了音。于是，欧文委员会第一次得知录音带的存在，强烈要求尼克松交出来。但是尼克松以行政特权为理由，拒绝合作。从这时起到 1974 年 7 月中旬整整一年内，双方围绕白宫是否应该交出录音带的问题进行了决斗。

就在欧文和考克斯追着尼克松要求他交出录音带的同时，尼克松政府又遭受另一沉重打击。他的副总统斯皮罗·阿格纽因为被调查出在担任州长和副总统期间接受贿赂，被迫辞职。众议院议长杰拉尔德·福特继任。阿格纽最后被罚款 1 万美元，缓刑 3 年。阿格纽丑闻让人们愈加不信任尼克松政府。

联邦上诉法院要求尼克松把有关的 9 盘录音带交给法官赛里卡，但被尼克松拒绝。不仅如此，尼克松还命令司法部长理查森撤掉独立起诉人考克斯，因为考克斯事事都要刨根问底的做法越来越让尼克松难以忍受。理查森拒绝照办，并和司法部副部长一起

---

[1] 它不同于下面将提到的独立检察官（independent council）。

辞职。司法部的其他官员根据尼克松的指示，撤掉了考克斯。这个被称为“星期六晚上大屠杀”的事件激起了全国性的抗议和不满。美国国内各大报纸、杂志纷纷载文要求尼克松辞职，各种批评信件也蜂涌而至白宫。参议院开始着手弹劾案。尼克松在国内压力下，被迫交出了部分录音带。但是面对公众的不信任和国会弹劾呼声，尼克松继续采取对抗姿态，拒绝合作。1974 年 1 月 30 日，尼克松在其国情咨文中再次强调他拥有行政特权，表示他“将遵循从乔治·华盛顿到林登·约翰逊的历届总统所遵循与捍卫的先例，决不做任何可削弱总统职位的事情”。[①]

有关大陪审团开始对水门事件中的其他一些人提出起诉。国会众议院也着手讨论弹劾问题。2 月初，众议院表决，以 410 票对 4 票授权司法委员会传讯任何人物，包括总统在内。到 4 月底，尼克松面临着司法委员会和参议院特别委员会的双重传讯，以行政特权为由的挡箭牌再也不灵了。1974 年 7 月 24 日，最高法院以 8 票对 0 票一致裁决尼克松必须交出全部录音带。尼克松看到大势已去，主动交出了录音带。他原以为交出录音带人们便会原谅他，但是事与愿违。录音带中的录音显示出尼克松的自私卑劣、固执己见。于是要求他辞职甚至是弹劾他的呼声达到了高潮。

1974 年 7 月中旬美国众议院通过 3 项弹劾理由：指控尼克松在水门事件中阻挠司法部门的工作；在一系列具体问题上滥用总统权力；违背宪法，拒不服从调查委员会的传票。最高法院也裁决尼克松必须交出可能提供罪证的录音带。录音带表明，在水门事件发生 6 天后，尼克松和其办公厅主任霍尔德曼德一手策划有关的掩盖活动。这让参议院内原先对尼克松尚存一丝同情的共和党议员改变了立场。美国历史上最可能实现的弹劾案马上将要成为

---

① 阿瑟·林克等著：《1900 年以来的美国史》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年版，第 300 页。

现实。8 月 9 日，尼克松被迫辞职。福特就任美国总统，成为美国历史上惟一一位未经人民选举而担任副总统和总统的人。9 月 8 日，在对水门事件的调查尚未结束之前，福特宣布他以总统身份对尼克松可能犯有的任何罪过予以全部赦免，此举救了尼克松，但部分地毁掉了福特自己的政治前途。

政府信任危机

水门事件决不是偶然的过失。一位美国学者指出，其深刻的根源"在于前几届政府的错误行为，但由于尼克松和他的亲密顾问为了败坏他们政敌的名誉和保持他们长期追求的对美国命运的控制，所使用的极权主义方法的范围和程度，使这个事件前所未有"。[①] 对水门事件的调查表明，尼克松政府是美国历史上最腐败的政府。他的政府阁员中相继有数十位官员受到指控，这些人中为首的就是副总统阿格纽。另一方面，虽然对水门事件的调查让美国人民对政府和总统职位产生怀疑，但是这个丑闻使美国人民重温了"一切自由都有赖于言论和新闻自由"这一传统真理。[②] 很多美国人认为新闻监督对于维护美国民主制度有着重要意义。

尼克松的所作所为把二战后总统权力的扩张发展到了顶点，国会的权力越来越软弱，最高法院也越来越被动。但物极必反，水门事件给国会和最高法院以反击总统权力扩张的最好机会。最高法院裁定尼克松必须无条件交出录音带，否定了他可以行政特权为由阻挠司法程序的做法，明确三权分立原则并未授予总统保护秘密通讯的绝对权力。最高法院的裁决压制了总统的行政权力，提高了最高法院的威望。[③]但总的来说，60 年代以来，人民对包括

① 埃德温·埃默里、迈克尔·埃默里：《美国新闻史》，新华出版社，1982 年 12 月第 1 版，第 736～737 页。

② 《美国新闻史》，第 746 页。

③ 转引自刘其杰："《〈华盛顿邮报〉与水门事件》，《世界历史》，1995 年 2 期，第 103 页。

法院和国会在内的美国政府信任呈下降趋势，反映出人民与政府间的隔阂在加深（见下表）。

公众对政府机构信任程度表

	1966	1976－1978	1986－1988
行政系统	41%	17%	18%
国　会	42%	12%	19%
最高法院	50%	29%	31%
军　界	61%	26%	35%

资料来源：路易斯·哈利斯："因对白宫信任急剧衰退而导致对政府机构信任的下降。"载《哈利斯民意测验》，第37期，1988年5月8日，第2页。

不信任政府的最直接原因是政府丑闻不断。在尼克松之前的半个世纪，很少有联邦政府高级官员被指控犯有渎职罪，但是自尼克松入主白宫以后，从副总统阿格纽开始，高级官员被判犯有伪证、受贿、权钱交易以及其他各类渎职罪的案件司空见惯。1970年，有9名联邦政府高级官员因为贪污而受指控。到了1980年，这个数字已经达到123人。这说明，许多打着政治家招牌的政府官员以权谋私，或以权谋权，以获得更高的政治地位。

许多具有改革和公正思想的政治家决心公开政府的工作，同时致力于完善对总统和其他各级官员的监督机制。1978年，《独立检察官法》（Independent Council Stature）应运而生。[①] 根据该法之规定，在联邦政府高级官员被确认有违反公众利益的行为或被指控有刑事犯罪行为时，就可启用独立检查官。这项制度在90年

① 1978年，根据《独立检察官法》，建立了独立检察官办公室（Office of Independent Council）。以后每相隔5年，国会重新延长该法。根据这一法律规定，总统、副总统、内阁成员、国会或总检察长都有权任命独立检察官。独立检察官可以动用无限财政资源，以无限时间调查案件，直到查明真相为止。他的任期长短由总检察长或由最高法院任命的三人法官小组委员会决定。1994年的这项《独立检察官法》已于1999年6月30日到期后失效。

代克林顿总统的性丑闻调查案中发挥了最大的功用。同时各州也相继通过了“阳光法”，增加政府的透明度，同时要求各政党候选人公布收入来源。国会也对政府内最隐秘的中央情报局和司法部所属的联邦调查局都进行调查，发现了它们许多不未人所知的肮脏丑事和滥施权力的不法行为。

在和尼克松政府斗争的同时，国会不顾尼克松的否决于1973年通过了《战争权力法》。这一法律规定，只有在正式宣战、依法授权、美国本土或美国领地受到攻击造成全国紧急状态的情况下，总统才能把美国的武装力量投入对敌行动。法律要求总统在调动军队前48小时内向国会报告；除非国会同意继续使用武装部队，否则总统必须在60天内撤回军队。但它准许总统在军事需要的情况下可再延长使用军队30天。在此期间，国会两院共同作出的决定可以终止军队的使用。《战争权力法》大大削弱了二战以来总统在战争问题上的权力，表明国会对总统权力膨胀的不满和抗议。国会还于1974年通过一项《国会控制预算与搁置法》，规定了一些程序以限制尼克松时期不受限制搁置国会法案的做法。同年通过的《联邦竞选法》，规定了资助总统竞选的经费限额。这些举措对于恢复人们对政府的信任有一定积极意义。但是人们对政府和领导人的信任再也恢复不到以前的水准了。越战和水门事件一起摧毁了战后华盛顿和谐一致的气氛。

第七章　新保守主义的崛起

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使60～70年代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为色彩斑斓的岁月。在社会运动最激烈的时代，保守主义就已经在酝酿和发展中，最后得以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发展成为美国社会中的主流思潮。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看起来互不相关，其实彼此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自由主义的衰弱

20世纪的美国，目睹了现代自由主义的胜利、繁荣、衰败和新保守主义的兴起、繁荣。现代自由主义产生于罗斯福新政，受命于美国危难之际，挽救了亟亟可危的美国资本主义。自由主义建立起一种和美国传统的放任自流的价值观相冲突的观念，即政府有责任管理人们的社会生活，让福利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有责任干预经济和市场，保持经济的增长；有责任保障社会公正、平等，以保持社会的稳定。

本世纪60年代，肯尼迪政府提出的"新边疆"和约翰逊政府提出的"伟大社会"标志着"自由主义达到了顶峰"。[①] 这也成为自由主义从此衰弱的分水岭。自由主义衰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现代自由主义和传统美国中产阶级的价值观有激烈冲突的一面。中产阶级传统价值观注重工作、自立、家庭、秩序稳定。但是

① 《美国现代化道路》，第409页。

现代自由主义却宣扬福利、强调义务，把吸毒、堕胎等有悖于传统观念的社会现象视为合理。他们认为，正是在自由主义的鼓励下，出现了一系列社会问题。比如，越来越多的妇女随意堕胎、越来越多的人依赖福利生活（并视其为理所当然），越来越多的人安心于乌托邦式的生活（团伙吸毒、共妻）等等。这些严重背离传统的行为，使许多自由派对现代自由主义都感到怀疑。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1968 年持保守主义的观点的人只有 31%，但是到 1980 年，已经达到 60%。[①] 这表明，60～70 年代反叛的人越来越反省过去，思想和行动趋于保守。

其次，美国社会的主体是中产阶级。但是从 60 年代开始，政府自由主义政策的主要受益人却不是中产阶级，因此引起他们强烈的不满。二战以来，美苏冷战，美国的军事开支越来越庞大。随着对下层美国人，特别是对美国的少数族裔权利的重视，政府采取越来越多福利政策。福利加上军费开支，造成政府财政赤字不断上升，通货膨胀严重，这一切到头来都转嫁于中产阶级头上。因此，曾经让这些中产阶级富裕起来的新政自由主义政策，如今不再受到他们的欢迎。他们认为，自由主义政策过分重视富人和穷人，忽视了他们这些自由主义政策的真正台柱。而且政府在推行自由主义政策时，往往使用强制性手段和行政命令（尤其是在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时期）。虽然动机不错，但效果往往适得其反。比如政府推行的对少数种族的肯定性行动计划，就被白人中产阶级认为是一种反向歧视。由于自由主义对平等比对自由更为关注，因此很多美国人干脆把它看作是一种社会主义的信条。

新保守主义的崛起

在现代自由主义衰弱的同时，美国的新保守主义开始崛起。

① 《美国现代化道路》，第 411 页。

说它是新保守主义，是因为这种保守主义在对传统的保守主义（即自由放任）继承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一方面，它强调私人企业的活力与市场的完美，另一方面，它又主张政府有责任指导社会向传统法则或与其他公共利益相一致的方向发展。因此可以说，在经济政策上它是保守的，在社会政策上则是开明的。

新保守主义思潮早在70年代就初露端倪。它是对60～70年代社会激烈动荡的一种反思。那些曾接受福利国家、赞成权力分散、主张政府干预私营经济、倡导政治多元论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亲眼目睹了60～70年代的社会动荡，以及社会和谐的丧失。自由派内部开始分裂。一些自由派分子依旧抨击大公司滥用权力，同情和支持反战运动、女权运动。但是也有许多过去的自由派分子，放弃自由派立场，变成新保守派。由丹尼尔·贝尔和欧文·克里斯托尔主编的《公共利益》成为新保守派的喉舌。他们通过各种媒体宣传他们的保守主义，影响社会舆论。《公共利益》1975年秋季号关于《美利坚合众国——1976年展望》的专辑，勾画出了一篇新保守主义宣言的轮廓。他们断定自由主义统治美国的40年是失败的，自由主义使美国的民主政治受到了严重的威胁。这种威胁来自美国的下层阶级，他们越来越要求得到平等的结果和平等的生活水准。当政府无法解决这些矛盾时，他们就怀疑宪政制度本身的合法性。新保守主义的纲领主要有3方面内容：1）维持按价值取酬的市场制度。美国的平等观念是政治上的平等，保证人人有平等的机会，决不是在社会上和经济上的平等；2）主张在一个能够自由运转的私人市场中维持机会均等，反对大政府；3）不要像自由派那样对人们的要求过分热情，不要鼓励群众参与政治，因为这样往往会导致异化和社会动荡。从新保守主义的纲领可以看出，新保守主义鼓吹恢复自由平等、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传统资本主义法则，同时不否认政府有责任进行有限的干预。但是这种干预是为

了保障基本政治原则。[①] 新保守主义的纲领对于怀念传统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人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富裕的中产阶级害怕失去他们的宁静生活，害怕通过自由竞争获取成功的美国方式遭到破坏而被代之以政府的强制性财富分配。他们认为，从60年代开始的对少数族裔的照顾即是一个明证。因此，这些新的保守派越来越希望把恢复个人自由作为最高的政治准则，声称当代所谓的"民主政治"已经成为个人自由的敌人；自由派所推崇的大政府和国家对经济生活的控制，是对个人自由最大的威胁。

从70年代后期开始，一大批保守派思想家、学者、经济学家团结在共和党周围。从旧金山的当代问题研究所和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到华盛顿的遗产基金会和美国企业研究所，保守派的思想家为政治家们提供与自由派思潮争锋相对的主张。[②] 但是尼克松政府引发的信任危机，损害了共和党的威信，因此共和党保守主义时代并未到来。人们虽然怀疑自由主义的传统，但是仍未完全摈弃它。

保守主义的社会力量：右翼集团

水门事件使美国人民心灰意冷，连总统都不可信，还能相信谁呢？他们深感重建道德的重要性，并把这一希望寄托在了民主党新任总统、福音派基督徒出身的吉米·卡特身上。由于宗教一直被美国人看作是道德的基础，于是，许多宗教界人士重提《圣经》的权威性，开始研究如何用教义来解决社会问题。卡特当选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他对宗教的虔诚，他的保守主义思想受到了选民的青睐。卡特政府因此被称为战后第一个倾向保守的民主党政府。但是卡特执政时的不佳表现，令选民在1980年的大选中看中了更为

① 涂纪亮主编：《当代美国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1月第1版，第416～417页。

② 《美国的自我探索：总统的诞生(1956年至1980年)》，第267页。

保守的共和党右翼代表里根。福音派教徒在政治上逐渐活跃并联合起来支持保守派人物竞选公职,企业界的保守派则动员起来为从事右翼思想研究的学者和思想库提供资金,加上公众对吉米·卡特领导的失望,使共和党在80年代得以重振,统治美国达12年之久。[①]由于以里根为代表的保守派对美国社会经济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遂有“里根革命”或“保守主义革命”之说。

美国经济、社会和文化特征的变化是里根为代表的右翼兴起的主要原因。[②]这些变化导致自由分子感到希望破灭,左派势力越发削弱,也使得像里根这样极端保守的右翼分子得以有机会掌握美国的政治大权。

这些变化首先表现在南部和西部阳光地带的崛起所造成的美国政治力量的重新组合。到1980年,阳光地带的人口就超过了东部和北部的人口总和。阳光地带的崛起得益于美国经济中心的西迁和南移。人口地理的重新分布带来了政治气氛的变化。南部和西部强烈的平民运动传统完全可能产生一种进步甚至是激进的政治;但是在20世纪下半叶却产生了强烈的反政府情绪和对国家干预人们生活的憎根。因为政府的许多规定和限制,如环保法、土地使用限制、甚至在能源危机时规定的55英里的汽车时速等,对西部的影响都远较其他地区大。南部和西部对他们的过去都怀有一种近乎神秘的崇拜,这种崇拜更加深了他们对20世纪中叶以来自由派政府的敌意。西部的许多地区出现了人数众多颇有影响的保守主义运动。特别是加州南部地区,出现了像橘子县(Orange County)这样全美右翼势力最重要的中心。

其次表现在宗教的复兴。60年代,许多社会评论家曾预言宗教在美国社会中的作用和影响会永久消失。但是70年代以来,宗

---

① Himmelstein, Jerome L, To the Right: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Conservatis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pp 97~197

② America in Modern Times Since 1941, p 558

教开始复苏，这场宗教复苏可以说是从19世纪早期第二次宗教大觉醒以来最具影响的宗教复苏运动。这场宗教复苏直到90年代仍在以各种形式进行。许多宗教界人士认为，没有上帝的文化正在侵入他们的社区和家庭。比如女权主义扩张正在威胁传统家庭。这些保守的宗教界人士憎恨政府极力推进女权运动目标的做法。特别是最高法院的有关判决，它们先是消除了宗教对学校的影响，接着又赋予妇女堕胎的权利。于是保守派成立了全国保守派政治行动委员会、反对自由堕胎的全国生命权利委员会、反对妇女平等权利的右派妇女组织、煽动冷战的美国安全委员会等保守派团体。这些新右派组织有着非常浓厚的宗教色彩，鼓吹福音派复兴，宣传基要主义。1978年成立的"基督教之声"组织、1979年成立的道德多数派[①] 和"宗教圆桌会议"以及各保守教派的基督教联盟组织"全国基督教行动联盟"都主张强化宗教的作用，恢复基督教传统，用传统教义来统治美国的舆论和恢复基督教传统美德，重建美国的价值观。到70年代末，这股基督教右翼势力成为美国社会很有影响和非常引人注目的政治力量。

基督教福音派就是70年代兴起的新右翼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场福音运动早在1964年的总统选举就开始了。这一年，共和党保守派巴里·戈德怀特(Barry Goldwater) 竞选总统失败。但是在那时，一个名叫里查德·维戈瑞(Richard Viguerie)的颇具组织才干的保守派积极分子获得了1.2万名支持者对戈德怀特竞选的赞助，并把它发展成一个保守派网络和经费筹集组织。到70年代中期，他已经成功地得到了400万名赞助者和1500万名支持者。以前，比起他们的对手保守主义运动在筹集经费上要逊一筹，但从

① 弗吉尼亚的基要主义分子牧师杰利·法雷尔(Jerry Falwell)通过他的电视观众发动了一场他称之为道德多数派运动，攻击美国文化中世俗化的人道主义(secular humanism)。这场道德多数派运动和其他类似的组织强烈反对联邦政府对地方事务的干预，谴责堕胎、离婚、女权、同性恋，极力维护不受限制的自由企业，支持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导地位。

70 年代开始，由于保守派组织的努力，保守派比对手经费更优厚，组织更完善。到 70 年代末，保守派已经发展了非常完善的政治网络，他们有右翼智囊团、咨询公司、说客、基金会和学术中心。而且保守派内部涌现了许多有魅力的领导人才，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共和党人罗纳德·里根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位。

里根时代

从 1932 年到 1980 年间半个世纪中，一直未出现极端的保守派共和党政府。虽然尼克松总统曾经是个非常保守的共和党人，但在他执政的几年里，国会被民主党牢牢地控制。虽然他在外交上有所作为，但在政上并无多少建树，并灰溜溜地离开了白宫。因此，共和党一直没有在美国政治生活中得势，新政自由主义政策一直是美国的主旋律。但是在 1980 年的大选中，极端保守的里根以压倒多数的优势击败了谋求连任的卡特，一举登上美国政治舞台。

里根是在美国中西部环境中长大的。1937 年，26 岁的里根成为好莱坞一个比较成功的西部片和喜剧片演员。年轻时代的里根非常仰慕富兰克林·罗斯福，信奉自由主义。但是，当里根成为演员工会联合会主席后，他强烈反对工会中的共产党成员，迅速转向右翼。50 年代早期，由于出色的演说才能，里根成为通用电器公司的发言人，并有一大批右翼追随者。1964 年，他代表保守分子戈德怀特在电视上发表了一次令人难忘的演说，遂继戈德怀特之后，迅速成为共和党保守派的领导人物之一。里根是个非常出色的演说家，充满男性魅力，而且总是不厌其烦地重复他一成不变的中心主题：美国人必须摆脱政府的束缚。1966 年，在一群富有的保守派支持下，里根首次以绝对多数当选为加利福尼亚州州长，这给他提供了进一步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和推销自己观点的机会。作为典型的共和党保守派，里根信奉自由企业制度和企业家的判断，认为自由企业制度是解决经济问题的最佳途径。他强烈

反对新政以来联邦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认为这导致政府过于庞大，预算无法平衡。他主张大规模削减联邦社会福利项目，同时降低收入所得税，让企业家有更多的资金进行再生产。他歧视黑人，主张对白人学校进行免税，同时反对控制私人拥有枪支，支持实行死刑。他是自由堕胎的坚定反对者，反对男女平权。为了进一步宣扬新教教义，用传统基督教精神来解决美国社会的道德问题和精神危机，他主张在学校教授神学。在对外政策上，里根信奉要加强美国的国际霸主地位，认为只有美国才能领导世界。因此，他呼吁大力加强美国军事实力，主张对苏联采取强硬政策。同时他主张封锁古巴，并坚决支持以色列；他希望加强和台湾的联系，恢复政府间关系。正是这样一个极端保守的共和党人开始了共和党保守主义时代。

1980年是保守主义全胜的一年。在总统选举中，里根获得489张选举人票，卡特只得49张选举人票。在国会里，共和党以53席对民主党47席控制了参议院。虽然众议院的共和党人仍是少数派，但是如果算上民主党内的保守派人士一起，众议院的保守势力占据了上风。

里根能够赢得大选胜利，其个人魅力是一个重要原因。但里根能够取胜的根本原因是新政联合阵线的瓦解。新政自由主义解决了一战后出现的经济大危机，并使美国经济几十年长盛不衰。战后，越来越多的蓝领工人受益于自由主义政策，成为中产阶级。他们关心安逸的中产阶级生活，对美国经济滞胀问题非常担心，不愿为了维持福利制度多交税，对于60年代以来的黑人民权运动和青年反主流文化运动忐忑不安，对民主党自由主义政策的前途担忧，思想趋于保守。开始从民主党的支持者转而成为共和党的支持者，联合阵线中的另一组成部分少数族裔团体，也因为经济地位的改善纷纷改换门庭，投入共和党怀抱。虽然大多数黑人选票和近一半的妇女选票仍然投给了民主党，但大多数男性白人公民的

选票投给了共和党。

里根本人就是这样一个中产阶级典型。他过去受惠于新政，因此一直是新政的拥护者。但是成为中产阶级后，思想发生了转变。1962年，里根登记为共和党人。著名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曾生动地描述了美国人的这种政党情结："20年来，民主党总是对选民说，假如他们想要像共和党人那样生活的话，他们就得像民主党人那样投票。战时和战后的繁荣显然证明了那种要求是正当的。对民主党人来说，惟一的问题是一旦选民能像共和党人那样生活的话，他们也就能像共和党人那样投票，而且他们越来越频繁地这么干了。"[①]

1981年1月20日，里根宣誓就任美国总统。他的就职演说是一篇彻头彻尾的保守主义宣言，呼吁缩小政府规模、崇尚传统、提倡减税、明确联邦和州之间的权力关系和责任关系等等。[②]

为了抑制财政赤字，保障军费开支，里根大肆削减非国防开支。他首先削减了一些社会福利计划。考虑到90%以上的美国人都受益于被称为美国社会安全网的社会保障体系，里根并不敢完全取消这些计划，而是通过消灭浪费、欺骗和滥用现象来改进福利计划，同时削减一些"随意性"的社会福利项目。里根削减的项目包括对抚养未成年儿童家庭的补助项目，取消已有职业的家长的受益资格。同时减少联邦对州的医疗补助，取消食品券因通货膨胀自动调整的做法，规定收入超过贫困线130%以上的人没有资格获得食品券，取消大部分联邦建房补贴。里根的福利政策导致年收入1万美元以下的家庭在1982—1985年间少获得联邦津贴470美元（按1982年美元价格计算），收入在1～2万美元之间的家庭每年损失360美元，而收入超过8万美元的家庭只少收入

---

① 小阿瑟·施莱辛格主编：《美国共和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65页。

② 《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就职演说全集》，第445～454页。

170 美元。70%的削减项目影响到年收入低于 2 万美元的 48%的人口。[①] 在削减联邦福利项目的同时，里根鼓励私营福利事业的发展。为此，他给予私人养老金等各项计划以更多的税收优惠。

里根认为，为了提高社会保障效率，消除福利计划管理机构的官僚主义做法，必须下放联邦权力，让州和地方承担更多的社会保障责任。他认为联邦福利计划使联邦政府无所不在，到处插手，不仅效率低，费用大，而且这些官僚机构往往不负责任。这个被称为“新联邦主义”的政策使原先由联邦政府负担的食品券和抚养未成年儿童家庭的补助等几十项福利项目改由州和地方自筹资金解决，联邦逐年降低了对州和地方的援助。里根认为，通过下放联邦权力可以缩小政府规模，减少政府开支。各州虽然希望多一些权力，但他们并不希望在国家经济形势不好的情况下接受联邦政府的福利包袱。在削减福利项目的同时，里根还推行低税收政策，取消他所认为的会扼杀工商业积极性的一整套政府统制条例。在其任内前 3 年，政府对个人和企业的税率下调幅度达到 25%，[②]中上阶层的人成为减税政策的真正受益者。难怪里根经济政策被认为是“劫贫济富”。

① 黄安年著:《当代美国的社会保障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年 3 月第 1 版，第 223～224 页。

② Brinkley, Alan & Fitzpatrick, Ellen, America in Modern Times Since 1941, The McGraw－Hill Companies, Inc , 1997, p 568

第八章　90 年代的中间道路

里根时代的繁荣使副总统布什顺利登上总统宝座。1989 年上任的布什基本上沿袭了里根时期的内外政策，里根时代也因此得以延续到 90 年代初。在布什任内，世界格局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以苏联退出和解体而告结束。布什在外交上的成功无法克服国内的经济困难。面对国内经济衰退，布什继续老调重弹，强调经验、品格、信任、家庭观念，忽略对经济政策的重视。显然，变换着的社会和世界需要新一代的领导人。在 1992 年的总统大选中，民主党人推出了年仅 46 岁的阿肯色州州长克林顿为总统候选人。他以年轻和新一代人的面貌出现，着重争取新一代人的选票，适应美国人民冷战后的一种时代变换感，赢得了大选。

克林顿政绩斐然

克林顿于 1946 年 8 月出生于美国南部阿肯色州霍普镇的一个平民家庭，是战后出生的一代。中学时代的克林顿成绩优异，毕业后考入乔治敦大学攻读国际关系，而后作为罗兹奖[①] 获得者赴英国牛津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学成后，克林顿返回美国到耶鲁大学法学院攻读博士学位。1979 年，年仅 32 岁的民主党人克林顿

① 这是英国著名政治家、金融家、殖民主义者赛西尔·罗兹(Cecil Rhodes)于 1902 年捐资创立的，专门用于奖励美国优秀大学毕业生赴英国深造，是一项很高的荣誉。

当选为阿肯色州州长，在美国政坛初露头角。一届任期很快结束，政治上尚不够成熟的克林顿未能争取到连任。但是两年后，他成功地卷土重来。由于其出色的政绩，赢得了大部分阿肯色州选民的支持，连续5次被选为该州州长，成为该州历史上任期最长的州长。鉴于其政绩卓著，克林顿被美国州长联合会授予“最佳州长”称号，并于1990年被选为民主党领导委员会主席。美国《时代周刊》称克林顿是民主党最称职的领导人之一，代表了民主党新一代的主流派。1992年，克林顿正式参加总统竞选，并挑选战后出生的田纳西州参议员小艾伯特·戈尔作为竞选伙伴。这一对战后出生的竞选搭档，以新一代人和改革者的面目出现在选民面前，对共和党政府12年统治的经济败绩猛烈攻击，赢得了大选。

克林顿上任后，在国内政策上主张政府积极参与经济事务（符合民主党自由主义传统），同时又认为政府不能包办一切，强调重视市场作用（与共和党观点接近）。这是一种中间道路。他主张缩小收入差距，强调个人权利，通过改革税制（尤其是向富人开刀）来谋求预算平衡，满足扩大政府开支的需要。克林顿任内，美国经济出现持续稳定增长。1997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3.8%，达到了1988年以来最快的增长速度。与此同时，国内通货膨胀上升率为罕见的1.5%。生产能力的不断提高促使实际工资和利润的提高，政府赤字财政得到有效控制。1998年2月初，克林顿提出了17300亿美元的预算，是30年来第一个出现盈余的预算。1999年1月21日，克林顿总统在其年度国情咨文中预计，今后15年，政府的预算盈余可达4万亿美元。3月中旬，美国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开始指向万点大关，充分表明美国经济保持了持续增长的强劲势头。[①] 良好的经济形势使越来越多的人收入超过平均线。

① 1999年3月16日上午9点51分（格林威治时间14点51分），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首次突破万点大关，达到10001 78点，最终报收9930.47点。

在1982年,不到300万个家庭年收入超过10万美元,今天约有700万个家庭达到这个数目。如果经济保持现在这样好的发展趋势,到2012年,大约将有1600万个家庭收入超过10万美元大关。与此同时,收入在贫困线以下的人越来越少。从1996年到1997年之间,贫穷的黑人减少了60万,降到910万,而贫穷的西班牙裔美国人则从870万降到830万。即使是这些穷人家庭,他们中的41%有自己的住房,70%有一辆汽车,97%有彩电,2/3有空调器。

在社会公共政策上,克林顿也发起了一系列改革运动。他推动制订了面向21世纪的《美国教育改革法》(该法已经于1994年生效),提出了迄今最深刻的医疗改革方案。他主张发展美国的福利制度,并针对福利制度本身的问题,进行了最深刻的改革,重新定义了福利概念,既强调享受福利的平等权利,又严格了获得福利的条件,规定了一系列责任和义务,让每个享受福利而又能从事工作的人最多在两年后就必须参加工作。这种做法有别于民主党自由主义的传统,既有自由主义成分在内,又吸收了保守主义精神。克林顿也因此得到许多自由派和保守派的支持,特别是广大中产阶级为之振奋。在1999年1月作的《国情咨文》中,克林顿拟把政府预算盈余用于进一步扩大对社会保障体制的支持,加强对诸如老年人医疗保健计划、旨在为每个人提供长期医疗服务的计划、残疾人就业和社会福利救济项目的投入。

在族裔关系方面,克林顿也实施其雄心勃勃的计划。早在本世纪初,著名黑人活动领袖杜波伊斯就曾预言:"本世纪的问题就是这条种族分界线的问题"。[①] 克林顿也认为,"有时我们相邻而立,却仍彼此隔离,心与心之间相距千里。"[②] 1968年,由于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被暗杀,美国国内发生种族大骚乱,时仅

① 弗·斯卡皮蒂 著《美国社会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11月第1版,第87页。

② 克林顿 著,金灿荣等译,《希望与历史之间:迎接21世纪对美国的挑战》,海南出版社,1997年第1版,第91页。

22岁的克林顿在参加红十字会的救援活动时曾遭到黑人殴打。如今，时近世纪之末，这条分界线依然如故。有着亲身体会的克林顿认为，美国当务之急“必须消除仍然撕裂着国家的种族分界。”[①]为此，他亲自挑选成员，并委任以研究黑人问题著称的历史学家约翰·富兰克林为主席的7人小组委员会组成一个种族问题总统委员会来认真讨论种族问题，并提出要构建“一个美国”的种族战略。[②] 这个委员会将进行多方讨论、磋商，并计划用一年时间提供一份详细的关于种族关系的报告，并提出相关建议。克林顿计划每月举行一些“小镇讨论”、“白宫会议”之类的讨论会，欢迎所有的评论家参与讨论和发表意见。这些形式的讨论会旨在修复旧伤，促进种族间的融合。此外，克林顿还围绕“一个美国”的构想，和他的助手一起制定了6个关于如何促进种族融合、消除歧视的目标：1)减少由于仇恨导致的犯罪；2)提高非洲裔美国人在司法中的信任度；3)找到更好的办法来测量种族敏感性，比如让司法部在统计黑人青年的犯罪率时要选用不同的社区；4)定期发布一些关于少数族裔取得进步的总统报告；5)制作一些有关少数族裔形象的文化类的电视片，而不是在屏幕上过份强调黑人犯罪；6)和大众媒体一起努力，减少族裔间的误解，鼓励对族裔间的差异作正面的描述。[③]克林顿确实在言语和实际行动上采取了有建设性的步骤着手解决美国的种族难题。

肯定性行动是迄今争议最多的政治难题之一，它关系到少数族裔和妇女团体的权利。在这个问题上的纷争反映了美国社会自由主义传统和新保守主义的斗争。克林顿完全站在中间立场上，

---

① 《希望与历史之间：迎接21世纪对美国的挑战》，第92页。

② http://www whitehouse gov/race initiative/one America/ 克林顿在1997年6月份关于种族问题的一个重要讲话中提出的“一个美国”的构想，指在美国生活着的各个不同种族，要消除彼此的偏见，消除歧视，因为他们都是美国人，属于同一个国家的公民。21世纪即将来临，每个公民都要为推进美利坚民族的同一性而努力，不再作为一个分裂的社会继续存在下去。

③ U S News & World Report, June 23, 1997, p 22

没有偏袒哪一方。他没有马上终止这一计划，而是想方设法完善其不合理的地方。他认为要采取措施"结束滥用法律，禁止配额，使肯定性行动受到严格审查，反对给任何不合格的人以任何好处，并特别努力确保每个人获得的不是一个保证，而是一个机会"。[①] 问题在于，现实社会中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证实自己的实力，虽然肯定性行动计划已经"太滥"，但有必要支持"正确"[②] 的肯定性行动。

克林顿的绯闻案与新闻的堕落

克林顿主政的 90 年代，社会愈加多样化。总的来说，80 年代的保守观念在 90 年代不断发生演变。过去赞成同性恋是要遭受非议的，现在虽然人们对同性恋仍有异议，但是同性恋正在完全合法化。克林顿的两次竞选就获得了同性恋组织的财政支持。这也说明，80 年代过于保守、极端的观念正逐渐被开放、宽容的观念所取代。但是开放的另一方面也产生了极端的社会观念。这种极端观点有别于 80 年代的保守主义。比如在关于诸多社会问题的辩论中存在着严重的 PC(Political Correctness，政治正确)倾向，PC 分子成分复杂，不乏过去的许多保守派，但是许多人又是 60～70 年代激进的女权主义分子、同性恋团体成员，或是族裔权利倡导的急先锋。他们大谈权利、平等，对反对他们观点的人动辄扣以政治不正确的大帽子。这种做法实际上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

在 20 世纪，大萧条、二战、冷战等一系列危机事件将总统一职变成了一种神圣的职位，确立了现代美国总统的崇高地位。虽然水门事件损害了总统职位，但卡特、里根和布什 3 位总统的品行在一定程度上又重新让总统成了道德楷模。不过克林顿因与前白宫

① 《希望与历史之间：迎接 21 世纪对美国的挑战》，第 93 页。
② 《希望与历史之间：迎接 21 世纪对美国的挑战》，第 249 页。

实习生莫尼卡·莱温斯基的性丑闻以及新闻界长达一年的大肆渲染，再次打破了总统职位的神话。从党派政治斗争出发，共和党人抓住这一事件不放，直至启动弹劾程序，使克林顿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二位被国会启动弹劾程序的总统。美国宪法规定，不得解除美国总统、副总统以及所有文职官员的职务，除非他们叛国、收受贿赂或者犯有其他重罪和轻罪。这一弹劾条款，原意是要让总统不要成为滥用职权的君主，通过三权分立的宪政制度约束和控制总统权力。但是制宪者们做梦也没有想到，有朝一日，弹劾条款会用在一位隐瞒婚外情的总统身上。

弹劾程序的启动，表明美国的三权分立制度是行之有效的。克林顿无疑是当今世界上最有权势的政府领导，但是即便这样，他也不得不屈身到国会山作证，回答国会议员和独立检查官肯尼斯·斯塔尔提出的各类令其极为难堪的问题，并在电视中对全国人民公开表示歉意。对克林顿绯闻案的调查花费美国纳税人数千万美元之巨，仅独立检察官斯塔尔手下的 27 名律师人均年收入就达近 10 万美元。斯塔尔完成调查后递交给国会的 445 页的报告之长也是罕见的，而提供给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的所有弹劾材料装满了整整 36 个纸箱。众议院于 1998 年 12 月 19 日对众院司法委员会提出的四项弹劾罪名进行投票，最后分别以 228 票对 206 票、221 票对 212 票裁定克林顿犯有作伪证和妨碍司法两项罪名，其他两项罪名[①]未获得通过。参议院于 1999 年 2 月 13 日就克林顿总统弹劾案进行表决，结果 100 名参议员先后以 55 票对 45 票，以及 50 票对 50 票，裁定克林顿并没有触犯众院弹劾小组所提的伪证和妨害司法两项罪名。这件历时 13 个月之久的绯闻案就此画上一个句号。

---

① 众议院分别以 205 票对 229 票、148 票对 285 票裁定克林顿在波拉·琼斯案中作伪证、滥用权力这两项罪名不成立。（波拉·琼斯案在克林顿与莱温斯基的绯闻案之前就发生了。琼斯指控克林顿总统在担任州长时对其性骚扰，由于证据不足，最高法院驳回了琼斯对克林顿的指控。）

在克林顿绯闻案中，受损最大的显然是克林顿总统。论克林顿的政绩、风格以及美国社会经济现状，克林顿本可以作为战后出生的总统而流芳百世，和他学生时代的偶像肯尼迪总统一样享有崇高声誉。但是绯闻案严重损害了克林顿的名誉，他虽得以逃脱弹劾，但大部分美国人认为，绯闻及弹劾案将伴随着这位年轻的总统永载史册。

保守势力虽然不再如里根时代那么辉煌，但是依然非常强大。他们一直不赞成克林顿过于关切黑人、妇女、同性恋等团体的平等权利。克林顿政府的绯闻案给了保守派议员反击民主党政府的大好时机。在主张弹劾克林顿的人中，呼声最大的正是保守派，他们大谈道德，主张立马弹劾克林顿。但是实际上对克林顿性丑闻调查案进行最后投票的参众两院的表决结果显示出来的是两大党之间明显的党派分歧。显然，党派利益的考虑多于权力制衡原则，乃至道德标准和要求。参众两院的民主党议员紧紧团结在民主党总统克林顿身后，显示出民主党内部的团结一致，他们强烈反对弹劾克林顿的提案。共和党咄咄逼人、不负责任的姿态和完全基于党派考虑的投票方式大失民心。弹劾案结束之后的美国民意调查显示，44％的美国人对共和党印象极坏。

20 世纪的美国是总统权力急剧膨胀的世纪。虽然有人认为弹劾克林顿程序的正式启动标志着总统权力的严重削弱，对克林顿绯闻案的调查显示了国会拥有着强有力的制衡总统的宪法权力，但是正如历史学家小施莱辛格所言，“21 世纪美国总统在国际舞台上面临的问题将呼唤更强有力的行政领导。”[①]可以预见，美国总统权力不会因为这一弹劾事件受到太多的削弱。美国《时代》杂志说，随着弹劾案的结束，人们终于松了口气。现在，克林顿有时间和精力去推进教改计划、医疗保险方案、平衡预算等老百姓更

---

① Schlesinger Jr , Arthur, "How History Will Judge Him", Time, February 22, 1999, p 34

关心的问题的实施了。

随着信息传媒技术,特别是互联网和现代高技术的发展,新闻报道越来越迅速直观。但是,有关莱温斯基事件的调查也暴露出美国新闻媒体报道水准的下降和不负责任,使民众对新闻的真实性感到怀疑,新闻媒体在水门事件中确立的新闻监督作用严重受损。人们质疑新闻界能否恢复夕日的辉煌和信誉。新闻界过于重视名人效应,对名人轶事的报道过于夸张、缺乏深度。此前不久,对英国戴安娜王妃悲惨身亡的报道就超过了迄今为止对任何事情的报道规模。在这之后就是把莱温斯基绯闻案如炸弹一般投向华盛顿和世界舞台,就像鲨鱼闻到了腥味,在竞相谴责的荒谬竞赛中根本谈不上有什么新闻报道标准。普通人已经厌倦新闻媒介对政治领导人和社会名流穷追不舍、狂轰乱炸式的报道。美国的自由与民主变得愈加光怪陆离。最感到为难的是美国孩子的父母。在长达一年多的绯闻案调查中,父母不知道如何向孩子解释整天充斥电视节目的总统私人绯闻。正是这位曾信誓旦旦提出"机会、责任、社区"三原则[①]的总统,面对独立检察官的讯问,在宣誓的情况下居然作了伪证。这使美国社会的道德观念和社会责任感更加纷乱。有人认为,对克林顿的审判,实际上是对美国社会道德观退化的审判。

不过,克林顿总统因为政绩斐然,获得的支持是前所未有的,即便是在遭受性丑闻案调查最困扰的时刻,大部分美国民众对他的政绩还是持肯定态度,不希望这个令人爱恨交加的人物成为党派斗争的牺牲品,以致威胁到现在的大好经济形势。民众对克林顿事件的漫不经心让保守派大吃一惊,他们把这看作是民众"对道

① 克林顿在《希望与历史之间:迎接21世纪对美国的挑战》一书中提出,为实现美国梦,让多元化美国社会更强大,同时继续发挥美国对和平、自由、繁荣的世界的领导作用,必须推动3个步骤:首先,为每一位美国人创造机会;其次,要求所有的美国人承担自己的责任;第三,形成更强有力的社区。(见该书序言)

德的不在意，他们太沉醉于互联网、便宜汽油，对自己的灵魂关心太少。”[①]他们原以为，通过对克林顿道德的诋毁可以摧毁克林顿政府。但是事实上，时代变了。总统不再像危机年代那么具有非常巨大的道德影响力。同时，在冷战结束后的非危机时代，美国政治辩论的中心正从华盛顿转移到州和地方。对老百姓来说，他们更关心硅谷、好莱坞、个人的收入等等，克林顿的个人绯闻并不能让他们花费大量精力去关注。

克林顿任内经济状况空前稳定，美国民众对民主党的支持率大大增加。80年代达到颠峰的保守势力要想重新夺回总统宝座，显然必须放弃里根时代彻头彻尾的保守主义纲领，适应新时代需求。90年代末和即将到来的21世纪都不能过于强调现代自由主义和里根的保守主义，而须在政治、经济、社会政策上遵循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正如克林顿本人在1996年为大选而出版的著作中所言，要使“对21世纪美国的期望变成现实，我们就必须打破过去的思维方式，就必须面向未来进行新颖而大胆的尝试。”[②] 虽然民主党和共和党未来的政治前途难以预料，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它们都必须在变化的世界里寻求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平衡，才能适应时代的潮流。

---

① Gibbs, Nancy, "Special Report: Legacy of A Scandal", Time, February 22, 1999, p 32

② 《希望与历史之间：迎接21世纪对美国的挑战》，第4页。

第三编

超级大国的兴盛

第一章　投身世界政治舞台

19 世纪末的美国以无可比拟的物质实力和地理优势，在西半球顺利崛起。1898 年的美西战争拉开了美国投身世界政治角逐的序幕。随后，它利用各大国被欧洲动荡局势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所牵制的有利时机，屡次介入中美洲国家的内部事务，把欧洲力量从自己的后院挤走，逐步成为拉丁美洲的霸主。在东亚，它利用“门户开放”的口号和均势外交手法最大范围地维护和扩大自己的利益；在欧洲，它打破了一个多世纪的不介入传统，以一战为契机，大发战争财，在交战各方精疲力竭之际参加战争，成为决定欧洲局势的重要杠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信心卷入了世界政治，成为大国俱乐部中重要的一员。

胡萝卜加大棒：追求拉美的霸权

本世纪初，美国拉美政策的主要目标是确立和巩固在这一地区的霸权地位，其外交活动主要是围绕着巴拿马运河展开的，其手段则体现在本世纪初的两位总统有特色的外交上：西奥多·罗斯福的“大棒”政策和威廉·塔夫脱的“金元外交”。前者注重以武力手段赤裸裸地追求美国的战略安全利益，后者则利用美国的经济实力进一步开拓海外市场，达到从经济上扩张美国利益的目的。两者一强一软，一明一暗，顺利地确立了美国在加勒比海和墨西哥湾

地区的霸主地位。在这一过程中,“门罗原则”[①] 再次成为其对拉美扩张的堂皇借口。

19世纪末,随着海军力量的加强以及太平洋扩张的需要,美国急需一条能够沟通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捷径。巴拿马成为首选之地。1902年6月美国参议院通过了修建巴拿马运河的议案。国务卿约翰·海立即设法与哥伦比亚驻美大使签定了从哥伦比亚手中获得6英里宽的运河区以及建造、防卫和控制运河99年的条约。但是,这一有损哥伦比亚主权的条约遭到了哥政府的拒绝。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大怒,马上派遣美国军舰进驻巴拿马港口。巴拿马遂宣布从哥伦比亚独立出来,1个小时后美国迅即宣布承认巴拿马政府。两周后,约翰·海和巴拿马签定了一项条件更为苛刻的条约。主要内容是:1)美国从巴拿马共和国“长期租用”10英里宽的运河区,在运河区内享有“就像它是该地区的主权国”一样的广泛权利;2)为此美国政府一次性付给巴拿马政府1000万美元,此后每年付25万美元;3)美国保护巴拿马共和国的“独立”和“主权”。1904年运河开工,10年后正式投入使用。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得意洋洋地宣称“我拿过来了运河区”,并把自己的这一成就与美国获取路易斯安那和德克萨斯相提并论。

古巴横亘于墨西哥湾到加勒比海的通道之中,是美国控制加

---

① 1823年,门罗总统向欧洲列强发表了“今后欧洲任何国家不得把美洲大陆上已经独立自由的国家当作将来殖民的对象”的咨文。1845年波尔克总统又进一步扩展了“门罗咨文”,声称“美洲人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 …… 不允许任何外国介入”,到1853年,上述这些原则被冠以“门罗原则”。在1895年的委内瑞拉事件中,国务卿奥尔尼以“美国拥有本大陆的最高主权……它的命令就是其臣属的法律”的照会再次扩大了门罗原则,史称“奥尔尼推论”;1904年12月,西奥多·罗斯福在他大选胜利后借英、德以索债干涉多米尼加为由,再次对“门罗原则”进行了新的推论:“在西半球奉行‘门罗原则’的美国将不得不对诸如不道德以及无能等行为进行国际警察的管辖”,称为“罗斯福推论。”1911年,旧金山的一些日本商人和墨西哥谈判准备购买一块海滨地产,后被国务院制止。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洛奇以此大做文章,宣称“某些东方大国”的威胁,并在参议院通过了一项决议案,驱逐外国的公、私企业,把整个西半球变成美国的战略和商业势力范围,“门罗原则”被“洛奇推论”再次引申。

勒比海地区和完成中美洲霸权的枢纽之地，美西战争后一直处于美国的军事管制之下。1901 年，美国国会在援助古巴法案中附加了《普拉特修正案》，要求古巴不能同任何国家签定损害其独立的条约；在古巴无力充分保护自己的利益时，美国有权干预；古巴应向美国割让"建立加煤站或海军基地所必需的土地"等等。古巴亲美政府不顾人民的反对，与美国签定了包括该修正案在内的条约。此举激起了民众的反抗。1906 年古巴发生了反政府暴动，罗斯福立即派遣军舰进驻古巴，协助当权者镇压起义。为了平息古巴人强烈的反政府情绪，在 5000 名美国士兵的"看护"下，古巴成立了新政府，时任美国陆军部长的塔夫脱还成为古巴的临时总督。此后，美国政府不但没有对古巴进行允诺的改革，反而谋求进一步扩大美国的商业利益。到 1920 年，美国在古巴的工厂所生产的糖占整个古巴糖产量的一半，古巴对美国的出口比 1900 年增加近 23 倍。就这样，"古巴在《普拉特修正案》、美国武装部队和美国经济利益的枷锁下，一直是美国的一个保护国。该岛的'独立'是一个神话。"①

海地的深水港圣尼古拉位于通往巴拿马运河的要道上，是关系到运河安全的要害地区。1911 年以后，海地国内的政治局势动荡不安，美国惟恐会引来欧洲国家的干预。一战爆发后，美国决策者更是害怕该港落入德国之手，终于在 1915 年 7 月借海地内乱之际派兵进驻海地，实行军事管制，直到 30 年代中期才结束。

美国对尼加拉瓜的兴趣最早源于它曾是修建沟通两洋运河的选址考虑之一，虽然美国最终选定了巴拿马，但尼加拉瓜却因巴拿马运河而"成为美国的前院"。1909 年，尼加拉瓜发生了反政府的武装起义，美国以两名支持暴动的美国人被杀为由断绝了两国外

① 托马斯·佩特森：《美国外交政策》（李庆余 译）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年版，第 296 页。

交关系,支持叛军打败政府军,并与新上台的政府签定协议,以美国贷款换取了对尼加拉瓜海关的控制权。一战爆发后,威尔逊命令美国战舰进驻尼加拉瓜海面,另与尼签订新条约,鼓励美国资本对尼的投资,支持亲美政府的财政稳定,并保证阻止欧洲列强染指尼加拉瓜的港口。这样,尼加拉瓜也成为美国的保护国。

墨西哥是美国的南部近邻,美国拥有许多投资和财产,因此成为美国关注的对象。1913 年 2 月,美国指使维多利亚·韦尔塔(Victoriano Huerta)将军推翻了民族主义政府,但韦尔塔上任后拒绝屈从于美国。威尔逊政府遂拒绝承认韦尔塔政权,并支持卡兰萨(Venustiano Carranza)为首的"立宪派"。当时大多数欧洲国家均已承认韦尔塔政府,只有英国政府不愿开罪美国,召回驻墨西哥公使并劝韦尔塔辞去总统职务。1914 年 4 月,美国海军在墨西哥登陆,韦尔塔逃亡欧洲,卡兰萨组成新的临时政府。但是,卡兰萨同样不满美国的过分干预,双方很快陷入新的矛盾。1914 年底,墨西哥出现新的内战,威尔逊政府本想支持反对派推翻卡兰萨,后因反卡兰萨的比利亚及其部队更为反美,并造成了美国人的伤亡,威尔逊才放弃支持比利亚的打算,并不顾卡兰萨的强烈反对,派遣美军深入墨西哥境内消灭了比利亚的力量。1917 年 2 月底,"齐默尔曼(Zimmerman)电报"事件[①] 发生,为了确保墨西哥在美国反德战争中的中立,8 月 31 日,美国极不情愿地承认了卡兰萨政府。

---

① 1917 年 1 月 16 日,德国外交大臣齐默尔曼密电德国驻墨西哥公使,指示如果美德战争爆发,向墨政府建议与德国结盟对美开战,条件是德国帮助墨政府收复德克萨斯、新墨西哥、亚利桑那,并请卡兰萨出面邀请日本加入反美同盟。该电被英国情报部门截获后转交美国政府。

伸向东亚的外交

自从 1784 年 8 月"中国皇后号"商船抵达中国广州以来[①]，美国商人就开始作起了"中国市场梦"。此外，急于"拯救"世界的基督教徒们也看好中国是他们传教的"市场"。1898 年美国占领了菲律宾，因此有了进入中国的跳板。但是，作为后起的大国，它在这一地区还没有与其他列强相匹敌的实力，由此出台了颇具美国特色的"我也来一份"的"门户开放"政策。

1895 年甲午战争后，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美国虽然在中国乃至亚洲都没有太大的切身利益，但它还是为"他们真实的和想象中的亚洲利益作辩护"[②]。1899 年秋，国务卿约翰·海向日、德、俄、英、法、意等国发出了"门户开放"的照会，要求他们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尊重各国平等的贸易机会，出于不同考虑，各国作出了程度不一的回应。美国遂宣布各国接受了"门户开放"原则。

1900 年，中国爆发了"义和团"运动，包括美国在内的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中国面临着被全面瓜分的危险。7 月 3 日，约翰·海再次发出"门户开放"照会，要求各国维护中国的行政和领土完整，维护"平等与公正的贸易"。但在随后列强要求中国赔偿损失的谈判中，美国像其他列强一样索取了高额赔偿。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美国在远东的军事力量极小，不足以与其他列强对抗，然而，它的经济蒸蒸日上，需要亚洲的市场。因此，"门户开放"是当时惟一的也是最好的外交选择，体现了美国在整个东亚的外交观念和战略。

"门户开放"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美国在中国已有的和潜在的商业利益，但它并没有减少列强日益激烈的矛盾和冲突。俄

① 该商船投资 12 万美元，获利 3 8 万，利润高达 25％。李定一，《中美早期外交》，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年版，第 7 页。

② 托马斯·佩特森：《美国外交政策》上册，第 272 页。

国在中国东北的“特殊利益”得到了美国极不情愿的承认，因为它知道“没有军事力量，想发挥一个亚洲强国的作用是徒劳的”①。所以，当罗斯福听到日本1904年2月8日偷袭俄国远东舰队的消息时暗自高兴，这也是1905年5月当日本要求他出面邀请俄国进行停战谈判时欣然接受的原因之一。罗斯福认为这是保持该地区均势、进一步扩展美国在太平洋影响的机会。8月9日，日俄双方代表团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朴茨茅斯谈判，签订了结束战争的条约，俄国在中国东北南部的特殊利益被日本所替代。

令罗斯福失望的是，日本与俄国一样，变本加厉地追求和维护它在中国东北的特殊利益。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撕毁先前与美国达成的出售南满铁路的协议，全力阻止包括美国在内的外国资本和商品进入中国东北，力图把中国东北南部变成日本的独家殖民地。围绕经济利益，美日矛盾日益突出。在试图拉拢英国遏制日本的外交失败后，罗斯福开始谋求与日本在太平洋地区的“和平共处”。他一方面派遣美国“白色大舰队”访问东京向日本炫耀武力；另一方面，开始进行外交试探。1908年底，美国国务卿与日本驻美大使达成了鲁特—高平联合声明，日本以不侵犯菲律宾和实行“门户开放”的承诺换取了美国对日本在中国东北势力范围实际上的接受。但是，两国的矛盾并未消失，经济角逐仍在继续。随着日本野心的逐步扩大，后来的伍德罗·威尔逊开始采取对抗日本的措施，两国关系变得紧张。但是，美国此时在东亚的军事力量毕竟有限，到了1917年，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局势越来越明朗，为了避免两面受敌以及战后安排中的与日本合作的需要，威尔逊不得不姑息日本，1917年底美国与日本签订了《兰辛—石井协定》，明确承认日本在中国东北和内蒙古东部的“特殊利益”，换取日本对“门户开放”政策的空洞承诺。

① Akira Irira, The Cold War in Asia,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1974), p 35.

并不是所有的美国决策者都同意罗斯福的均势外交，他的继任者塔夫脱就力主美国应该在中国有所作为，以实现“中国市场梦”。在他的任期内，国务院设立了远东司，并由曾担任驻中国沈阳总领事的威拉德·司戴德（Willard Straight）为代司长。此人曾与中国东北的地方官员合作筹建东北铁路，与日俄展开竞争。此时，在国务卿诺克斯（Philander C. Knox）的支持下，他很快组织了一批华尔街的银行家成立了银行团，打算与英国联手向中国政府贷款，购买满洲铁路并使之中立化，从而把日、俄势力排挤出东北。该计划引起了俄、日等国对美国野心的警惕，最终以日、俄、英的联手反对而未果。一位历史学家感慨道：国务卿诺克斯不但“没有分化俄国和日本，没有为美国金融界开发满洲打开大门，实际上反而把那个门钉死，把自己关在外面”[①]。

东北政策失败后，美国政府开始谋求加入筹建中的向中国湖广铁路借款的英、法、德3国银行团。它不断向英国抗议、向中国政府要求，终于在1910年11月挤了进去，与3国达成了4国银行团协议。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在湖广铁路借款上的努力结果并不比在东北好多少，而且成为后来中美关系的一个纠纷。为了控制日本和俄国在中国的单干，美国又建议把日、俄两国也纳入到四国银行团。在遭到中国拒绝后，塔夫脱政府拒绝承认新建的袁世凯政府。此举充分说明美国对华政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牵制其他大国维持其在华利益。

20世纪初，美国在东亚还没有直接的重大利益，更没有与其他老牌帝国对抗的相应军事力量，虽然不乏对这一地区的扩张兴趣，也不缺少主动的外交出击，但政策基调还是维持现状，“试图以墨守成规和提出抗议等方式延缓解决与日本的分歧，直至到亚洲

---

① 转引自佩特森：《美国外交政策》上册，第313页。

的力量均势调整到更利于美国在战争结束时取得优势地位为止。"[1]

介入欧洲事务

1898年美西战争胜利后，美国崛起为一个世界性大国。其势力突破了西半球的传统范围，进入东亚太平洋地区。从本世纪初开始，它的这种对外扩张更加明显，甚至在对欧洲事务方面，美国决策者也开始偏离了坚持了一个多世纪的"不介入"欧洲政治纠纷的传统，出现新的政策征兆。

20世纪初，英、法、德等欧洲大国围绕对北非摩洛哥的控制权爆发了一场外交争端。尽管法国与意大利、英国和西班牙等国有约在先，承认法国在摩洛哥的"特殊利益"，但德国却不买这个账。1905年3月底，德皇威廉二世访问摩洛哥，公开否认法国在摩的特殊地位，宣称德国甚至不惜为此与法国开战。英国马上支持法国，孤立的德国遂寻求美国的介入，并暗示它主张在摩实行美国倡导的"门户开放"。罗斯福立即表示愿意参加国际会议，欧洲国家都表示愿意接受美国的仲裁，美国由此掌握了外交主动权。1906年初解决摩洛哥争端的国际会议在西班牙的阿尔赫西拉斯召开，最终各大国接受了由美国倡导的以"门户开放"为基础的解决方案。美国虽然在摩洛哥没有获取什么重大利益，但"美国由担心欧洲干涉美洲事务一变而主动卷入欧洲争端，这是外交政策取向上的一次大转折，表明美国已经与那些长期主宰欧洲事务的老牌大国比肩而立共掌大计了"[2]。

罗斯福的此次外交行动受到了国内多方面的猛烈批评与指责，这说明美国介入欧洲事务的国内基础还远未成熟。但是，

---

① 罗伊·沃森·柯里：《伍德罗·威尔逊与远东政策》，（张玮英 曾学白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309页。

② 李剑鸣：《伟大的历险：西奥多·罗斯福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247页。

1914—1918 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给美国再次介入欧洲政治创造了机会，开启了美国走向欧洲的大门。

1914 年夏，萨拉热窝的一声枪响拉开了到那时为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战争。1890 年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下台后，德皇威廉二世奉行新的世界政策，欧洲的结盟体系开始失控，迅速演变成两大对立集团。持续近一个世纪的“欧洲协调”寿终正寝，最终酿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战争使美国人悲喜交加，一方面，他们认为这是欧洲“旧政治”的必然结果，“均势”——“强权”——“势力范围”等为美国所不耻的概念再一次给人间带来了灾难；另一方面，欧洲的战争又为美国的持续扩张创造了史无前例的绝好机会。驻英大使沃尔特·佩奇在战争之初就致信威尔逊总统“请做好准备，因为你得出面平息他们的大争吵。”[①]

以罗斯福为代表的扩张主义势力大张旗鼓地呼吁美国立即加入战争，谋取战后世界的大国地位。但是，威尔逊政府却谨慎地要求国民保持“行动和思想”上的中立。中立是美国政府深思熟虑后的一项明智选择。首先，它符合不卷入欧洲政治的传统。美国国父华盛顿离任前的《告别词》确立了美国人对欧洲复杂政治实行孤立主义的外交准则。一战的爆发恰恰证明了这一政策的正确性。正因为如此，“使我们置身战争之外”的口号使威尔逊在 1916 年再次当选；其次，在还不能确定胜负赢家的时候，隔岸观火无疑是美国最佳政策。威尔逊的心腹豪斯上校的表述可谓淋漓尽致：“如果协约国战胜，那就意味着在很大程度上俄国将主宰欧洲大陆。如果德国战胜，那将意味着在未来几代人的岁月里将盛行坏到无法形容的军国主义的专制统治。”[②]这种矛盾心理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威尔逊在 1917 年提出“没有胜利的和平”的调解口号；最后，

① 转引自杨生茂主编：《美国外交政策史：1775—1989》，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 275～276 页。

② 转引自杨生茂主编：《美国外交政策史：1775—1989》，第 276 页。

中立身份为美国的商业扩张提供了绝好时机，威尔逊一直向美国人民表白没有人比他更关心把美国的企业带到地球上的每一个地区。正是在中立的保护下，美国商人同时和交战双方开展了广泛的贸易往来，美国外贸的出超额大幅增加。美国不但调整了国内产业结构、扩大了海外市场，而且由债务国一举变成债权国。战争给欧洲大陆造成的是前所未有的创伤，但为保持中立的美国带来的却是独一无二的崛起良机。

大战持续的时间超出了任何国家的估计，并演变成为一场真正的总体战。惨重的人员牺牲和经济损失冻结了任何外交斡旋的可能，各国也耗尽了一切可能的资源，双方陷于僵持状态。到1917年，俄国在德国的打击下处于分崩离析的边缘，法、英受到重创，德国仍保持军事优势，情况开始向有利于同盟国的方向发展。美国本来就因为经济贸易关系与协约国绑在了一起，加之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的接近，更因为美国决策者对欧洲力量均衡的估计以及德国外交政策的失误所提供的口实，最终以德国恢复无限制潜艇战和“齐默尔曼电报”为由，以协助国的身份[①] 于1917年4月对德国宣战。美国参战对欧洲战事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全面力量对比以及由此带来的心理效应。持续了3年的战争把美国以外的所有大国都卷入其中，交战各国精疲力竭，此时美国的参战加强了协约国的力量，弥补了沙俄崩溃所带来的影响。在内外交困下，德国爆发了1918年的“十一月革命”，德皇被推翻，新上任的共和政府决定有条件投降，漫长的鏖战终于平息下来。

威尔逊终于以胜利组织者和仲裁人的身份出现在法国巴黎的谈判桌前，实现了西奥多·罗斯福的梦想，美国终于成为世界大国俱乐部中无可争议的一员。

---

① 在战争动员中，一位美国政府官员使用了“盟国”一词，威尔逊发现后，立即命令将之改为“our associates”，以表示美国即使参加了战争，但仍然不愿与欧洲国家为伍。

第二章　谋求国际新秩序

美国加入战争的主要动机之一就是要以美国模式来重新塑造世界。在战争即将结束之际，威尔逊向美国民众呼吁"世界金融领导地位将属于我们，工业首要地位将属于我们，贸易优势将属于我们，世界上其他国家都期望我们的领导和指引。"强大的经济、军事力量与强烈的信念相结合，美国改变世界的雄心初露端倪。

威尔逊的世界蓝图

对于威尔逊来讲，美国的使命不仅仅是西奥多·罗斯福追求的大国地位，而是要以美国的模式重塑世界政治，创造全球的永久和平与繁荣。正是本着这一目标，他把美国带入了一战。战争使美国变成世界上实力最强的国家，也使威尔逊更有信心来完成这一使命。

1918 年 12 月 4 日，在鼓号齐鸣声中，作为第一位离开本土的在任总统，威尔逊乘坐"乔治·华盛顿号"军舰赴巴黎参加和会。随行顾问、专家和秘书达 1300 名之多，另备有 2000 多份"咨询团"的研究报告。尽管国内有强大的反对力量，但他还是义无反顾地开始了 6 个多月的创造美国式世界和平的征程。

威尔逊的战后世界蓝图最为系统地体现在他 1918 年 1 月 4 日提出的《十四点计划》中。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联席会议上，威尔逊以其一流的口才和"崇高"的立论说明了美国参战的目的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目标，他本人把这十四点称为"世界和平纲领"。

它包括3个方面的内容：第1～5点是许诺建立战后"开放的世界"，其中主要包括公开外交、公海自由、裁减军备、对殖民地作出"自由、坦率和绝对公正的"调整等；第6～13点具体涉及对战败国的处理，恢复比利时主权与领土、从俄国撤军、让法国收复阿尔萨斯和洛林、奥匈以及奥斯曼帝国的少数民族自治、达达尼尔海峡国际化等；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是提议成立国际联盟，美国政府官方解释这是"达到永久和平的全部外交结构的基础"，而威尔逊本人则坦率地宣称其目的是"要为世界的其余地区作门罗原则为西半球世界所作的事情。"

自诩为"大国中惟一一位没有自私民族利益的政治家"，威尔逊带着他的蓝图来到了战火刚刚平息的欧洲大陆。美国迫使欧洲交战国接受以《十四点》作为交战双方停战和谈判的基础。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正式开幕。美国的"世界和平纲领"招致各国的反对和消极抵抗，会议的几个主宰者各有所求，他们对美国这个后来者的主导地位极为不满，但又无可奈何。为此，法国傲慢地挑战："上帝给了我们十诫，我们打破了。现在，威尔逊给了我们'十四点'，我们将会明白它是什么"；英国力图以传统的均势手段维持对欧洲大陆的控制；意大利公然反对民族自决的原则，不惜阻挠会议进程以谋求得到领土报偿；日本人更是咄咄逼人，厚颜无耻地追逐它在中国的利益。从会议的参加者到会议的举行方式，巴黎和会处处隐含着与威尔逊所倡导的"平等""公开"等精神相违背的因子。威尔逊不得不眼看着他的"十四点"被一点一点地肢解和违背。历史学家托马斯·贝利对此形象地比喻说，威尔逊"像一个母亲一样，不得不把自己年幼的儿子拿去喂狼，以拯救自己的长子。"

威尔逊的"长子"就是要建立美国所设想的新国际秩序，把"门户开放"和"门罗原则"国际化，具体表现就是以集体安全原则为基础的国际联盟。在这一点上，威尔逊作出了极大的努力，毫不让

步，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他迫使会议首先讨论了建立国际联盟的问题，还亲自监督国际联盟盟约的起草。会议最后决定成立国际联盟，建立一个由 5 个常任大国和几个选举产生的小国组成的行政院和一个所有国家参加的国联大会。国联的主要任务是“保证和维护所有联盟成员国的领土完整和现存的政治独立不受外部侵犯，如发生任何这样的侵略或出现这样侵略的威胁或危险，行政院将提出履行上述义务之手段。”国际联盟的建立终于使威尔逊的理想化为现实。依据威尔逊的想法，由美国领导的这种集体安全的国际体制将会一改过去的国际争斗，为世界带来和平与繁荣。

1919 年 7 月 8 日，威尔逊带着包括国际联盟盟约在内的《凡尔赛和约》返回华盛顿，亲自把和约送到参议院并敦促早日通过。但是，等待他的不是国会议员的喝彩，而是反对派的抗议声。国会参议院内对国际联盟的态度大体分成三派，一是支持威尔逊的民主党人，他们的人数不足以达到通过和约所需要的 2/3 多数；二是以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洛奇为代表、占共和党议员半数的强硬保留派，要求对国联盟约中最重要的有关集体安全的第十款作出保留；三是 14 名“不妥协分子”，他们在任何条件下都反对批准盟约，加入国联。部分出于政治斗争、部分出于观念之争，这后两派人在国会内外掀起了一场反对美国加入国际联盟的运动。威尔逊不仅坚持美国必须参加国联，而且坚决反对作任何保留。为了争取民众的支持，他决定“到人民中去澄清被反对派所毒化了的公众舆论”，遂开始了近一个月的全国巡回演说，行程 8000 多英里，发表 40 场演说，最后因病返回华盛顿。为了让国会原封不动地接受他的国联，他指示参议院中的民主党议员，不惜与“不妥协分子”为伍，也要反对洛奇的修正案。这样，不论是威尔逊的国联，还是洛奇的修正案，都未能赢得参议院的 2/3 的票数。洛奇为此得意洋洋地宣布“威尔逊先生的国联死了”。威尔逊不甘心失

败,决定把赌注押到1920年的总统大选上。但当选总统的是共和党人哈丁(Warren Gamaliel Harding),而不是民主党人。1921年3月哈丁任总统后并公开宣布美国放弃加入国联。威尔逊的世界蓝图就此告终。

威尔逊这位“国联之父”竟未能说服他自己的人民接受这了不起的国际关系的重大试验,这实在是莫大的讽刺。不过,虽然美国最终未能参加国联,但是威尔逊的努力还是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首先,“门罗原则”被纳入国联盟约,威尔逊本人就曾宣称盟约的核心就是把门罗原则作为一种全世界的主义。其次,威尔逊所提倡的国际和平思想成为影响两战之间国际关系的最重要的舆论,这一时期风起云涌的和平、非战以及裁军运动都与该思潮不无关系。国际联盟也成为20～30年代遏制侵略和谴责扩军的重要舆论工具。此外,美国虽然没有正式加入国联,但它从未停止致力于在非政治和非军事领域影响国联决策的努力,1925美国外交官开始谨慎参加国联的活动,1930年10月,美国正式参加了国联行政院对满洲危机的讨论。最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联合国,一定程度上是威尔逊国联计划的再生和继续。更重要的是,威尔逊开创的利用国际组织追求世界和平的方法,为本世纪美国外交家乃至世界各国外交家争相效仿。

美国式国际秩序的兴衰

一战后欧洲的格局基本确定,但大国在太平洋的竞争却如火如荼。伴随着赶走德国、占据山东半岛、控制中国财政、出兵西伯利亚等行动,日本在亚洲、特别是在中国的优势成为美国在该地区谋求利益的最大障碍,连威尔逊也“承认他对日本人已完全失去信心”。[①] 在巴黎和会上,由于在国联问题上需要日本的合作,威尔逊

① 罗伊·沃森·柯里:《伍德罗·威尔逊与远东政策》,第310～311。

在遏制日本方面无所作为，甚至不顾中国人民的抗议和一些顾问的反对，把德国在中国山东的利益转让给日本。战争结束后，美国开始把日渐壮大的海军力量调至太平洋，发展珍珠港基地，在菲律宾和关岛设防，由此引发了一场美、日、英3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海军军备竞赛。英国声称，它不惜花光英帝国的最后一枚硬币来保持世界最强大的海军，日本则把多达1/3的国家预算投入海军建设。美国的外交决策者们深知很难说服国会继续增拨海军军费，因此呼吁召开限制海军军备和讨论远东问题的华盛顿会议，力图减缓军备竞赛、稳定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局势。

应美国的邀请，1921年11月12日，英、法、意、日、中、比、荷、葡以及美国共9个国家在华盛顿召开国际会议。经过近3个月的外交谈判，会议通过了三个条约：《五国条约》对列强的海军力量发展作了限定，规定了美、英、日、法、意的海军主力舰吨位比例是5:5:3:1.75:1.75的比率（=约10万吨排水量）；《四国条约》废除了英日同盟，代之以美、日、英、法四国协调并承诺互相尊重各自在亚洲太平洋上的领地；《九国公约》则把20多年前美国政府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法制化，成为九国在东亚行动的法律准则。华盛顿会议是美国谋求太平洋领导权的一次重要国际会议，它在和平裁军的名义下，限制了大国间的海军军备竞赛，确立了美国与英国在海军发展方面的平等地位；它还拆散了英日同盟，遏制了日本的扩张势头，维护了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潜在扩张机会。

在华盛顿会议上，美国国务卿休斯（Charles Evans Hughes）谋求的不仅仅是控制海军军备竞赛和拆散英日同盟，而且也试探使日本在经济上依附于华盛顿。这代表了20年代美国共和党政府的一个重要外交主题：经济外交。由于威尔逊加入国联计划的失败，导致了共和党政府20年代在政治和军事上不敢有大的作为。但是，他们充分认识到美国的利益是与欧洲特别是德国问题、与创建一个开放的国际经济秩序密不可分的。为了避开国会的干扰，

国务院、商业部和财政部的精英和私人企业家以及银行家们密切携手合作，力图稳定欧洲经济秩序，向拉美和东亚扩张美国的贸易和商业利益。

对外贷款。 战争使美国从战前的债务国一跃成为债权国，美国的资本开始大量流向国外。在支持重建的名义下，美国许多私人金融部门积极介入了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奥地利等中、东欧国家经济复兴的投资中。这些大规模的投资也与这一时期美国金融资本的成熟密切相关。20 年代，美国国内大型的现代金融集团在经济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使这一时期美国的对外私人投资迅猛发展。在这场海外投资热潮中，纽约联邦储蓄银行和摩根财团扮演了领头羊的作用。在政府的指导下，这两家重要的金融机构代替政府出面参加国际经济会议，带领美国的资本家积极参与欧洲的重建，并且以购买外国政府债券的方式深入巴西、秘鲁、古巴、智利等国家的金融市场，安排欧洲经济重建。伴随着美元流出，许多美国银行打入海外市场，甚至在中国、俄国和日本都设立了分支机构。摩根财团的合伙人托马斯·拉蒙特还亲自赴中国和日本考察，组织了第二个中国银行团。1923 年 9 月，日本东京和横滨发生大地震，拉蒙特抓住这一机会，开拓日本市场。日本天皇为此数次授予摩根财团勋章。

为了协调势不可挡的私人海外投资，以不能向拖欠美国战债的外国政府贷款为由，华盛顿规定任何海外贷款都须获得政府批准。这样，政治和金融相结合，构成了 20 年代美国外交的新特色。到 1929 年，美国的海外投资达 100 亿美元，其中 70% 都是在 20 年代完成的。

“战债”外交。 所谓战债，主要包括美国在战时借贷给协约国用于战争的贷款以及战后用于中、东欧国家重建的款额，美国政府没有对这两种不同性质的债务进行区分，只是笼统地要求欧洲国家归还借款，国会还为此专门成立了“世界大战外债委员会”。

协约国对美国的做法颇为不满，把应付战债和德国对它们的战争赔偿挂钩，结果导致了1923年法国和比利时因德国不能按时支付赔款而出兵占领了鲁尔区的国际危机。

欧洲的动荡使美国朝野认识到只有稳定的欧洲才有繁荣的美国，才能保证美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在欧洲的和平扩张，而欧洲稳定的前提则是德国的稳定。怀抱着这种信念，加之对欧洲国家拖欠战债的无奈，美国政府开始以战债为切入口，积极介入欧洲事务。1922年，政府邀请摩根财团总裁摩根以“私人身分”参加在巴黎召开的全球银行家委员会，讨论向德国提供贷款事宜。1924年初，美国再次选派两位与摩根财团关系密切的道威斯将军和扬格参加国际会议，通过了“道威斯计划”，重新安排了德国赔款，平息了欧洲的紧张局势。根据“道威斯计划”，大量美国私人资本开始涌入德国，德国的经济有了迅速的发展，由此，美国贷款－德国赔款－协约国还债的金融循环得以维持。但随着美国国内经济的空前繁荣，私人资本开始转向投资美国国内的股票和证券，德国从美国借到的资金越来越少，到1929年10月纽约股票市场大崩溃后，美国几乎关闭借贷大门，德国经济的稳定局面也告结束。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1929年另一次国际会议召开，确立了“扬格计划”，进一步削减了德国的赔款额。但是从1931年春奥地利信贷银行的倒闭开始，西方工业国家爆发了全面的金融危机，德国帝国银行损失惨重，更无力偿还债务。为了拯救德国经济，1931年胡佛总统提出了《缓债令》，同意欧洲各国暂缓支付美国的战债。但它并未有效地阻止已经蔓延开的金融危机，最终发展成为西方国家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大萧条。

德国拒付赔偿，英法也停止还债，为此1932年夏欧洲有关国家召开会议，单方面冻结债务问题。美国政府利用战债维持欧洲稳定的企图逐告破灭，12月，美国国会通过决议，否认战债和赔偿的关系。1934年又通过《约翰逊法》，规定不按期偿还债务的国家

不能获得美国的新贷款,也不得在美国发行债券。美国与协约国关于债务的斗争十分激烈。但在大萧条的背景下,债务国坚持拒付,债务问题遂成为僵局。

美国利用战债追求其外交目的还表现在它试图把战债和裁军联系在一起,胡佛总统曾表示"美国愿意做更多的让步,通过国际协定以换得真正地减轻各国数量大得惊人的日益增长的军备负担",但它的这一企图同样遭到了其他国家的拒绝。

商贸扩张。 20 年代美国对外金融扩张的代表是财政部和以摩根财团为代表的私人银行资本家,同一时期,声势浩大的商业贸易扩张的代表则是商业部和战后崛起的大型现代化工业公司。为了鼓励企业向海外扩张,美国政府通过了一系列立法:1918 年的《韦布—波默林法》,允许出于扩展外贸而进行联合的公司不受反托拉斯法的限制;1919 年的《埃奇法》,从法律上认可美国银行在国外的分支机构;1920 年的《商船法》允许政府向私人出售船只,并以贷款方式鼓励建造新的商船等等;胡佛还创立了商务参赞制度,为美国公司的海外扩张提供商务情报等服务。在政府的有力支持下,美国私人公司纷纷开始了其跨国公司的征程。

在欧洲,利用战时建立的商业关系和战后重建机会,借"道威斯计划"的东风,包括福特公司、通用汽车公司、杜邦公司、通用电气公司等在内的美国各主要公司都积极进入了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在东亚,新的对华银行团投资计划流产后,胡佛依然积极倡导美国企业进入中国。从 1922 年到 1933 年,国会接连通过了几项中国贸易法,到 1930 年,美国在华公司已达 500 多家,直接投资达 1.55 亿美元。同一时期,美国在日本的经济利益发展更快,到 1932 年,日本成为美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在拉美,美国奉行"巴拿马政策",投资和贸易达到了"繁荣"阶段。商业巨擘跨过中美洲,直接深入南美,巴西、阿根廷、智利、委内瑞拉等国家都成了美国各大公司的竞争目标,美国对拉美的出口额大幅增加,并逐渐垄

断了许多拉美国家的外贸。到了30年代大萧条时，美国政府更加重视美洲市场，国务卿赫尔着手创办了进出口银行，利用《互惠贸易协定》，使美国对拉美的出口从1933年的2.44亿美元增加到1938年的6.42亿美元。美国对拉美的经济扩张招致了许多当地人的批评，有人称美国为“新罗马帝国”，即以经济渗透为手段达到控制他国的目的。

一位史学家曾很好地概括了这一时期美国对外经济扩张的特点：“20年代美国经济实力在海外的增长并不仅仅是规模的扩大，而且是()美国公司发展到更多的国家；(2)在特定的国家中，设立了更多的工厂；(3)在特定的外国领土上，制造和采掘了更多的产品；(4)投资于某个国家时，进行更大程度的一体化；(5)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分工。”

威尔逊的和平计划和华盛顿会议开启了20年代影响国际关系的舆论主题，裁军、和平与非战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继华盛顿会议后，美国积极组织和参与了1927年日内瓦、1930年伦敦、1932—1933年日内瓦和1935—1936年伦敦的一系列裁军会议。与华盛顿会议的宗旨一样，美国特别强调限制当时最重要的军事力量——海军。因为国会拨款的限制，美国海军增长速度较为缓慢，因此它极力谋求限制其他国家的海上力量超过美国。但是除了华盛顿会议和1930年的伦敦会议，国际裁军收效甚微。

大众政治的兴起是20世纪国际关系不同于以往的重要特征之一，加之美国政治体制的特点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所显示的巨大破坏力，战后各国都产生了强烈的反战思潮与和平运动。威尔逊“理想主义”的和平方略成为战后西方世界如火如荼的和平主义运动的动力源泉。1921年，美国全国防止战争委员会成立，成为包罗各种各样团体的最大的和平组织。美国政府和非政府机构协同一致，以和平、非战为口号，积极介入欧洲以及世界事务，力图以威

尔逊式的模式来引导世界。1928 年 2 月国务卿凯洛格和法国总理白里安发起了一个世界反战宣言——《非战公约》。半年之后，签字国就达 62 个。该公约当然不可能杜绝战争的爆发，但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宣布战争非法、并为大多数国家认可的国际法则，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为二战后的战犯审判提供了法律基础，时至今日，它仍然是一项重要的国际法原则。

第三章　罗斯福的新政外交和同盟外交

1933年是决定世界历史命运最具象征意义的一年。这一年，战争狂人希特勒掌握了德国的命运。几周以后，富兰克林·罗斯福就任美国总统。罗斯福最终成为希特勒的克星，救欧洲于水火，也给世界带来了“美国世纪”。

罗斯福上台之际，美国正值严重的经济大萧条。大萧条进一步强化了国内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孤立主义思潮。罗斯福以“国际主义”为指导，结合日趋紧张的国际形势，凭借其高明的政治手法，逐步克服了强大的孤立主义思潮，教育美国民众认清法西斯主义对世界和平及美国安全的巨大危害，引导他们开始理解美国所负有的世界使命，推动美国一步步地参加到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行列中。

罗斯福的新政外交

恢复美国经济是罗斯福政府压倒一切的任务。在其第一任期内，罗斯福政府主要是围绕着恢复国内经济的“新政”展开其外交的。在他上台前，美国国会通过了《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提高了75种农产品和925种制成品的进口税，把按值所征的进口税从1921—1925年间的26%增加到50%，创下了美国历史的关税最高点。其他各国纷纷效仿，英国宣布实行“帝国特惠制”，对英联邦以外的国家进行贸易歧视，法国、德国和日本也开始组织以自己货币为核心的封闭性区域市场。国际贸易大量萎缩，几乎陷于停顿；

各大国围绕关税、货币和贸易问题争吵不休。

在这种形势下,罗斯福认为恢复各国对国际经济合作的信心尤为必要,就像他利用新政恢复国内民众对银行的信心一样。因此,他积极响应即将召开的伦敦世界经济会议,主动邀请英法国家的领导人到华盛顿进行蹉商,并发表联合声明,试探告诉世人,世界大国仍致力于、并且也能够达成国际合作。1933年6月,世界经济会议在伦敦顺利召开。但令许多人不解的是,正当会议就稳定各国货币及其相互汇率进行热烈讨论之际,罗斯福却向会议发出了一封震惊所有与会代表的信件,公开表示美国将拒绝就稳定货币进行国际合作。美国的这一立场使会议无果而终,没有达成任何重要协议。罗斯福的这一表现典型反映了他的外交观念以及当时美国国内的形势:他所追求的是以美国国家利益为前提、由美国领导下的国际合作。[①] 在此之前,罗斯福多次表明会议只需达成一项宽泛的国际间合作的联合声明,达到向民众表明大国谋求合作的目的,而不应在具体的经济领域制定什么规则,特别是任何试图稳定货币的协议。因为罗斯福"新政"中的一项重要措施就是鼓励美元贬值以带动美国经济走出低谷。与他的想法相反,伦敦会议一开始,英法等国就力主达成稳定货币的国际协议。罗斯福本来就不认为这种办法能够迅速拯救国内经济,加上国内强大的孤立主义势力的反对,罗斯福因此断然反对讨论这类协议。

不过,罗斯福并不是经济上的孤立主义者,他只是不相信国际经济合作能够马上治愈国内的萧条。从长远来看,他仍认为美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必须依靠世界市场。因此,随着美国经济开始走出低谷和美元趋于稳定,罗斯福又开始注意国际经济合作。在国务卿科德尔·赫尔的积极倡导下,罗斯福在1934年敦促并批准了

① 罗伯特·达莱克对此有较为全面的研究,《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伊伟等译,白自然校),上册,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51~82页。

《互惠贸易协定法》。这一法律授权总统可以直接和外国政府进行关税谈判，并有权实行不超过50%的关税增减。到二战爆发前夕，根据这一法律，美国已和有关国家达成30多个互惠贸易协定，扩大了美国的贸易，出口额增加了近1倍，同时一定程度上也带动了世界贸易的的复苏。

在拉美政策上，罗斯福修正了他的远房堂兄西奥多·罗斯福对"门罗主义"的引申，推出了"睦邻政策"。[①] 他宣布："我将使这个国家致力于睦邻政策……即成为坚决尊重自己，并因此而尊重别国权利的邻邦……成为尊重自己的义务并尊重在与各邻邦交往中达成的协议神圣性的邻邦。"秉承此意，1933年12月国务卿赫尔在乌拉圭蒙得维的亚召开的第七次泛美会议上，破天荒地对拉美国家正式表示，"任何国家都没有权力干预其他国家的内外事务"会议闭幕时，赫尔电告罗斯福，称其表态使拉丁美洲各国对美国的感情大为好转。为了巩固这一成果，美国军队随后撤出了古巴和海地。1934年，美国开始和拉美国家相继签署互惠贸易条约，双方间的贸易也有了较大发展。但是从当时的国际大形势来看，有人认为罗斯福的睦邻政策与英国的帝国特惠制以及日本在东亚的势力范围并无本质差别。[②]30年代后期，随着欧洲形势的日益恶化，罗斯福更为重视拉美政策。泛美会议频繁举行，连续不断地通过了一系列旨在加强美洲各国合作的决议和方案。在经济方面，从1938年起，罗斯福开始倡导进一步的经济合作计划，美国大量的政府贷款和私人资本流向拉美地区，抵制了轴心国向拉美国家的经济渗透。在政治和防务领域，1939年9月的巴拿马美洲国家

---

① 帕特森对"睦邻政策"的定义可谓一针见血，他说："华盛顿越来越放弃武装干涉，而使用经济渗透、政治颠覆、拒绝承认、支持稳定的独裁者、仲裁条约、泛美主义、进出口银行贷款以及训练国民警卫队等方法，拿由富兰克林·罗斯福使用的且广泛流传、但并非他发明的一个引人的说法来概括，这些政策就叫'睦邻政策'"，《美国外交政策》，第490～491页。

② Akıra Irıye, The Cambrıdge History of Amerıcan Foreign Relations, pp 147～148

会议把美国刚刚通过的《中立法》适用到拉美地区，成立了"美洲国家中立委员会"和"美洲国家财政经济咨询委员会"。根据罗斯福的建议，会议还在大西洋沿岸划定了"不许有任何非美洲的交战国的任何敌对行为"的中立区。1940年，欧洲大陆陷落后，美国国务院专门成立有关对策委员会，研究西欧国家在拉美的势力范围或殖民地转让问题。是年，泛美会议通过了该委员会的建议，即美洲国家不承认非美洲国家间的殖民地转让，从而杜绝了轴心国染指美洲的可能性。罗斯福的这一系列外交行动有助于拉美国家的稳定，阻止了法西斯势力对这一地区的渗透，使美国以后参加反法西斯战争时无后顾之忧。

摆脱孤立主义

罗斯福步入白宫时，面对的不仅是国内凋敝的经济，还有日益恶化的国际形势和美国民众严重的孤立主义情绪。在欧洲，经济萧条所引发的"以邻为壑"的经济政策激化了各国间的政治斗争；在东亚，日本在侵占中国东北地区后，进一步蚕食华北；国际联盟日益软弱无力，萧条的世界又面临着战争的危机。

20～30年代，贸易上的保护主义，政治上的孤立主义和普遍的和平主义情绪结合在一起，成为美国国内一股强大的社会思潮和政治力量。

1934年4月，参议院成立了以杰拉尔德·奈为首的特别调查委员会，调查商业界对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推动作用，引起全社会对美国参加一战的原因的注意，很多人认为，美国与交战国的经贸关系是导致美国卷入欧洲战争的重要原因。同时一部揭露军火商在一战期间贩卖军火、大发战争财的纪实作品《死亡商人》一书一再再版，成为30年代中期的畅销书，美国民众愈发觉得割断美国与战争国家的经济联系是美国避免被军火商和欧洲交战国拖入战争的惟一办法。在这一背景下，1935年8月，国会通过了

30年代第一个《中立法》，规定对所有交战国实行武器禁运。次年，国会修改《中立法》，增加了禁止向交战国贷款的限制。1937年，借西班牙内战之际，国会又使《中立法》永久化，并把它适用于内战国家，它还规定战争国家在向美国购买非军事物资时，必须"现金购买，运输自理"，即"现款自运"原则。罗斯福的经济外交既有民族主义，又有国际主义。但是在政治战略方面，他的国际主义倾向则更为明显。尽管国内的孤立主义势力猖獗，但他还是采取了一系列主动的外交尝试。

《中立法》这种不区分战争性质的做法在实践中被证明有利于侵略者，而不利于被侵略者。在1935年秋的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的战争中，前者可以从美国购买战略物资自行生产军火，而后者却无法从美国购买军火；1936年开始的西班牙内战中，叛军可以从德国和意大利获得军火，而共和派却无法从美国进口军火。有鉴于此，罗斯福日益感觉《中立法》"可能实际上帮助了侵略者，而使被侵略者得不到援助"，认为有必要修改现行的《中立法》[①]。

在谋求修改《中立法》同时，罗斯福越来越关注日趋紧张的国际局势。1937年10月，他在芝加哥又发表了著名的"隔离演说"，呼吁通过国际合作对侵略者进行隔离与孤立，并参加了讨论日本侵略中国的《九国公约》布鲁塞尔会议。虽然会议未能取得有意义的结果，但至少标志着美国愿意与欧洲国家共同处理国际危机。1937年底，日本在中国长江炸沉美国"帕尼号"炮舰，引起美国对日本的进一步反感。罗斯福借机派遣海军部情报局负责人秘密赴英国，探讨共同对付日本的可能性[②]。这是二战前美英两国间第一次军事合作会谈。

在1939年初向国会递交的年度咨文中，罗斯福没有像以前一

---

① Word Peace Foundation, ed., Documents On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1938—1939, (Boston, 1940), pp 26～30

② Akira Iriye,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p 158～159

样大谈国内形势,而是着重国际形势,强调国际侵略力量的威胁,呼吁美国应尽其所能以战争以外的各种手段制止侵略。为此,在向国会递交的年度财政预算中,罗斯福把防务开支的比例提高到整个预算的15%,为美国和平年代之最。美国由此开始了大幅度的备战行动。

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进攻波兰,两天后,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罗斯福政府一方面宣布实行中立,另一方面谋求修改《中立法》,废除军火禁运条款,实行现款自运。在他的努力下,国会终于在10月和11月废除了《中立法》中军火禁运条款,把现款自运扩大到军火贸易,从而为英、法从美国购买武器弹药开了绿灯。1940年6月,法国战败,危及英伦三岛,英国首相邱吉尔请求美国向英国提供驱逐舰援助,以对付德国的潜艇,确保其大西洋生命线的畅通。9月,罗斯福在不违背国内法律的前提下,以总统行政协定的方式与邱吉尔达成了"驱逐舰换基地交易":美国以50艘旧驱逐舰交换英国7个在加勒比海的海军基地99年的使用权。这一交易加强了英国的海军,同时又扩大了美国的防御圈。

在抵抗德国的侵略中,大英帝国耗尽了它的财力,已无现款购买美国的军火。邱吉尔只好以为了我们的共同事业为由,呼吁罗斯福提供无需现款的援助。12月罗斯福想出了以"租借"的办法来援助英国,并促使国会在1941年3月通过了《租借法》,授权他可以以"出售、转让、交换和租借"等各种形式援助他认为对美国国防至关重要的国家。英国成为第一个租借援国。5月,租借适用于中国。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也成为租借受援国。到战争结束时,美国对盟国的租借援助总额高达500多亿美元,从而实现罗斯福提出的让美国"成为民主国家伟大兵工厂"的许诺。作为最大的受援国,邱吉尔盛赞《租借法》是"人类历史上最圣洁的法律"。

在东亚,罗斯福继续追求门户开放、反对一国独霸的外交政

策。上任之初,他继承史汀生的“不承认”政策,对日本在中国的侵略行为只作口头上的抗议。1937年7月“芦沟桥事变”时,美国也只是“呼吁各方不要诉诸战争”[①]。这种无所作为的政策迎合了美国国内严重泛滥的孤立主义思潮,也符合美国在东亚没有重大直接利益、在日本的经济利益大于在中国利益的现实。

但是,随着日本在东亚地区扩张的深入和加剧,罗斯福对日本采取了比对德国更为强硬的政策。1938年6月,美国宣布对日本进行飞机以及制造材料的“道义禁运”,并以法律禁运相威胁。随后,又向中国提供2500万美元的桐油贷款。1939年7月,美国政府通知日本《美日商约》将在半年后中止。1940年夏,由于日本宣布建立“东亚新秩序”并占领了法属印度支那北部,罗斯福下令对日本禁运航空汽油和废钢铜铁。除了禁运和援华抗日外,美国也开始向日本显示实力。1941年春,在太平洋完成春季演习后的美国舰队不像往年一样撤回大西洋,而是受命驻扎珍珠港。7月,一改《九国公约》以来不在菲律宾设防的政策,美国建立了远东战区并派遣轰炸机队进驻菲律宾。在日本进占印支南部后,美国宣布对日本进行除大米和棉花以外的全面禁运。显然,美国此时已不惜冒战争的风险来遏制日本的扩张。11月国务卿赫尔向日本提出了强硬的《美日协定基本纲要》,要求日本从中国和印度支那撤军。12月6日,罗斯福又向日本天皇发出呼吁和平的电报,第二天日本则以偷袭珍珠港作了回应。

争取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全球化。赢得战争的胜利成为罗斯福战时外交的首要

① 李巨廉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历史资料文件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5页。

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罗斯福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组织以美国为首的反法西斯同盟。1942 年元旦,美、英、苏、中等 20 多个同轴心国交战的国家聚集华盛顿,在白宫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表示联合一致"保证使用其全部军事和经济资源",与法西斯斗争到底。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美国开展了全方位、高层次的外交活动。

与一战情况相似,美国全力以赴投入世界战争的先决条件是有一个稳固的后方,一个为美国的战争提供源源不断战争物资的基地。不同于上次战争的是,这一次的后院要大得多,几乎囊括了整个西半球。

美国巩固西半球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基地的努力与其扩大在美洲影响的外交相辅相成,密不可分。1938 年美洲国家组织利马会议通过决议,声明美洲各国将在反抗任何"可能威胁他们的外国干涉和活动中"进行合作①。1939 年的巴拿马宣言中则呼吁美洲国家建立整个西半球的安全带,对抗轴心国可能的进攻,减少或中止同轴心国的贸易往来并把重要的物资销往美国。1940 年 6 月,法国战败后,国务院立即照会德国,宣布欧洲国家在西半球的任何领土如向非美洲国家转让的话,美国一概不予承认②。

1940 年 7 月下旬,应美国的要求,原定于 10 月份召开的第二次美洲国家间外长会议提前在哈瓦那举行,通过了《关于临时管理欧洲国家在美洲殖民地的公约》和《哈瓦那议定书》,确定了美国一个月前发出的照会原则。会议还达成了《美洲国家防御合作互助宣言》,为美洲国家的集体防务打下了基础。从巴拿马会议到哈瓦那会议,美洲各国逐步由中立走向防御,与美国对欧外交政策的演变保持同步。1942 年 1 月,在巴西首都里约热内卢召开的第三次美洲国家外长会议呼吁各国与轴心国断交,成立咨询性质的泛美

---

① Cordell Hull, Memoirs of Cordell Hull, Vol 1, New York, 1948, p 602

② Harley Notter, Postwar Foreign Policy Preparation 1939—1945, 3580, Washington, D C GPO, 1949, pp 29~38

防务委员会,协调管理美洲的战略物资。此外,美国还与16个国家签定了降低关税的协定,一方面把美洲国家从轴心国的市场上抢过来,另一方面加强了美洲国家在经济上对美国的依赖。应该说,美国稳定后院的努力获得了相当的成功。到1943年1月,除阿根廷以外,所有美洲国家都与轴心国断交或宣战。美国的租借援助也扩大到除巴拿马和阿根廷以外的所有国家,它还向这些国家派出了各种类型的军事顾问团。

1945年2月,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在望之时,美洲国家会议在墨西哥城外的查普特佩克堡(Chapultepec)召开,决定建立泛美防务体系。《查普特佩克宣言》声称:对任何一个美洲国家领土完整、主权和独立的外来侵犯,都将被视为是对所有签字国的侵略。为此,会议还成立了由美洲各国军事代表组成的泛美参谋部,战时的泛美防务委员会也成为常设机构。在经济方面,会议通过了《美洲国家经济宪章》,力求在美洲国家间消除一切关税壁垒和贸易歧视,实行贸易机会均等,巩固了战时形成的美洲国家间密切的经济关系。

就这样,从里约热内卢到查普特佩克堡,美国不仅确保了战时西半球的稳定和安全,同时还成功地把战时的领导地位和平地转移到战后。

欧洲战争爆发后,罗斯福积极说服国会修改中立法以便援助英国。1940年底,在一次炉边谈话中,他形象地用把浇水管借给着火邻居作比喻,开始了租借的宣传工作。终于促使国会通过了《租借法》。到战争结束,美国的租借援助共计500多亿美元,英国独获316亿。8月9～13日,罗斯福和邱吉尔在纽芬兰海面的军舰上举行了他们战时的第一次会晤,发表了著名的《大西洋宪章》,提出反对侵略、自由贸易、人民自决和建立战后普遍安全体制的反法西斯和重建世界秩序的原则。《大西洋宪章》后来为反法西斯同盟各国所接受,成为反法西斯的共同思想基础。

美国参战后，邱吉尔迅即赶赴华盛顿，与罗斯福商定双方成立联合参谋部作为战时所有重大战略的决策机构。在以后的几年战争中，罗斯福和邱吉尔保持经常会面和不间断的通信，维持这个两国特殊的同盟关系。据统计，两人战时在一起的时间多达 120 天，通信则达数千封之多，两人的密切关系可谓空前绝后。

1941 年 6 月 22 日，德国以闪电战入侵苏联，苏德战争爆发。罗斯福立即派遣心腹霍普金斯访问莫斯科，表示愿意援助苏联对德战争。在随后的大西洋会议上，罗斯福和邱吉尔联名致信斯大林，赞扬苏联"正在进行的抵抗纳粹进攻的辉煌防御战"，并答应给予"最大限度"的物资供应[①]。但直到 11 月，租借战争物资才开始源源不断涌入苏联。为了让苏联放心，在 1943 年初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上，罗斯福和邱吉尔宣布了"无条件投降"的原则，表达了同盟国彻底打败法西斯的决心。11 月，罗斯福、邱吉尔和斯大林在德黑兰召开第一次战时三国首脑会议，制定了对德联合作战的方针，并就战后世界的政治安排和世界组织等达成了初步一致。反法西斯同盟得到了巩固和加强。

在围绕尽快打败法西斯轴心国的大前提下，三国同盟也存在一些分歧，最突出地表现在美英两国拖延欧洲第二战场的开辟。早在 1942 年 6 月，美苏、英苏就分别发表了联合声明，宣称就 1942 年年底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任务达成了"全面的谅解"但迟至两年后的 1944 年 6 月这一任务才完成。虽然第二战场的拖延很大程度上是美英两国，特别是英国战略家过于谨慎造成的，但在苏联看来，这是西方盟国合作不力、想让苏联多承担抗德的责任所致，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苏联对西方盟国的信任度，并给战后美苏关系留下了阴影。但总的来说，罗斯福相当成功地维持了三国

---

① Theodore A Wilson , The First Summit: Roosevelt and Churchill at Placentia Bay, 1941, 1969 P 260

同盟的内在团结,从而使它们的合作与互助构成了整个反法西斯同盟的核心,为彻底打败法西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37 年 7 月,中国开始了全面的抗争,牵制了相当大一部分日军主力。1938 年底美国开始在物资上援助中国,1941 年 5 月,中国又成为美国租借物资的受援国。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中国的战略地位进一步提高。美国开始努力维持中国战场,以拖住日本陆军主力,并计划把中国作为最终反攻日本的基地。在 1942 年初美英华盛顿首脑会议上,罗斯福大肆赞扬中国的抗战,甚至把中国军队和苏联军队相提并论,他还倡议成立包括泰国和印度支那在内的盟国中国战区,由中国领导人蒋介石担任最高统帅。

为了协助中国抗战,罗斯福还特意派遣美军中的中国通史迪威出使中国,作为蒋介石的参谋长和美军中国－印度－缅甸战场总司令。1942 年初缅甸陷落,援助蒋介石政府的最后一条道路被截断。为了让蒋介石政府继续抗战下去,美国为此专门开辟了一条从印度飞越喜马拉雅山通向中国的的空中通道,史称“驼峰”空运。由于飞机的不足以及航路的艰难,援华的租借物资数量有限,为此罗斯福还专门给中国 5 亿美元的现款。为弥补援华不足的缺憾,1942 年 10 月,美国主动联合英国,宣布放弃在华享用的了一个世纪的治外法权,次年 1 月它和中国签定了包括这一内容在内的《中美平等新约》,赢得了中国方面的普遍欢迎。1943 年 12 月的美英中三国首脑开罗会议把战时中美合作推向了高潮。会议通过的《开罗宣言》要求彻底打败日本,直至其无条件投降;保证归还日本自甲午战争以来侵占的一切中国领土。接着,美国国会又应罗斯福的要求,废除了实行了半个多世纪之久的禁止中国向美国移民的《排华法》。

由于中美两国的实力相差悬殊,战略目标不尽相同,中美同盟在合作中也存在着许多冲突。史迪威为增进中国抗战能力所提出的军队改革计划威胁到蒋介石的统治地位,他的美国人的傲慢损

伤了中国官员们的"面子"，致使他与蒋介石的矛盾愈演愈烈，一直闹到华盛顿。1944 年 9 月，在中国战场因日本发动豫湘桂战役而出现危机时，罗斯福要求蒋介石把中国军队的指挥权交给史迪威，蒋介石愤然拒绝，蒋史两人的矛盾最终爆发，形成水火不容之势，中美关系一度紧张，罗斯福最后不得不召回了史迪威，史称"史迪威事件"。中美两国的这种争执为反法西斯同盟所仅见。

策划世界新秩序

从 1943 年开始，战后新秩序逐渐成为美国关注的问题。罗斯福所设想的新秩序是以美、苏、英、中四大国家的战后合作为基础。这一次，罗斯福吸取了威尔逊的教训，在人们的注意力还集中在战争时，便悄然无声地开始了战后蓝图的建构。

"四警察"是罗斯福战后国际新秩序的核心，即由美、苏、英、中四个大国合作负责战后世界主要地区的秩序。早在 1942 年 1 月《联合国家宣言》签署时，罗斯福就特别注意大国及其合作的重要性。当时的签字程序分两步，先由美、英、苏、中四国签署，次日再交剩下的 22 个同盟国按字母顺序来签署。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和顺利落实其大国合作的设想，罗斯福十分重视在维持与英国特殊关系的同时，注意排斥邱吉尔的干扰，注意与苏联和中国的合作。

1942 年 5 月罗斯福在华盛顿会见苏联外长莫洛托夫时，提出了"四警察"的概念，并得到了斯大林的赞同。到 1943 年下半年，反法西斯同盟胜利在望，罗斯福愈加注重对苏关系。1943 年 10 月，苏、美、英三国外长举行莫斯科会议，通过了《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中国驻苏大使也在宣言上签了字，因此又称《四国宣言》)，明确提出战后建立一个普遍安全组织的计划。在 1943 年 11 月底的开罗会议上，罗斯福允诺在战后帮助中国收回失地，有意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希望中国能在战后国际安排中发挥重要作用。在

紧接其后的德黑兰会议上，他又与邱吉尔、斯大林讨论战后建立国际组织等问题。1945 年 2 月，罗斯福拖着病残之躯来到苏联黑海海滨的雅尔塔，与斯大林和邱吉尔再次会谈。三方就大国（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达成一致，并同意苏联的两个加盟共和国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也可以在联合国拥有自己独立的代表权。

建立一个由美国领导的国际组织来管理世界秩序曾经是威尔逊的梦想。现在，这一梦想终于由他的忠实信徒罗斯福来实现了。德黑兰会议后，罗斯福立即下令国务院起草联合国宪章草案，作为四大国讨论战后国际组织的框架。1944 年 8—10 月美英苏和美英中先后在华盛顿敦巴顿橡树园（Dumbarton Oaks）召开会议，专门讨论了联合国组织机构的设置等具体问题。美英苏三国就联合国的组织机构、权力分配、区域性安排以及成立经社理事会等问题达成协议，签署了《关于建立普遍性国际组织的建议案》，并建议把该组织定名为联合国。随后，美英代表再与中国代表开会，补充了中方的一些建议，作为四大国一致同意的提案提交未来的联合国制宪会议审议。

1945 年 4 月 25 日，由美、苏、英、中四大国发起的联合国制宪会议在美国旧金山开幕，50 个国家的 282 名正式代表以及 1 400 多名顾问和工作人员参加了会议。可惜的是，联合国最积极的倡导者罗斯福未能莅会，他已在两个月前因过劳而去世。6 月 25 日，大会一致通过了《联合国宪章》。1946 年初，51 个国家的代表在伦敦举行了第一届联合国大会，联合国组织正式开始工作。罗斯福生前的理想终于化为现实。

在筹建战后国际安全组织的同时，美国政府也在积极谋求重建战后世界经济秩序，以避免 30 年代的世界经济大萧条的重演。1944 年 7 月 1～22 日，44 个反法西斯同盟国家的代表聚会美国新罕布什尔的布雷顿森林（Bretton Woods），讨论建立战后国际经济体制。为了这一会议的召开，美国政府准备了数年之久。早在

1941 年 11 月,财政部长摩根索就指示其助手哈里·怀特起草一份有关反法西斯同盟国家的货币稳定基金计划,并要求它"为战后国际货币安排提供基础"[1]。1942 年 3 月,这项被称为"怀特计划"的方案完成,当即得到了罗斯福的首肯。美国为此专门成立了"美国技术委员会"(American Technical Committee),负责进一步发展和实施该计划。"怀特计划"主要包括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国际复兴与发展银行(IBRD,后改为世界银行),前者由各成员国认购 100 亿美元作为基金,用于帮助各国的国际收支平衡,后者主要是发放较为长期的发展贷款,进行战后经济重建。

在美国考虑战后世界经济计划的同时,老牌的英帝国也不甘落后。1941 年底,经济学家凯恩斯受英国财政部的指示,开始考虑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建问题,提出了"国际清算同盟计划"(亦称"凯恩斯计划"),并为英国政府所接受。"凯恩斯计划"与"怀特计划"的基本思想差别不大,目的也是稳定国际货币的流通和交换,增进国际贸易。区别在于它坚持贸易赤字国应该得到更多的贷款和更大的国内经济自主权。它所设计的国际基金数量也远远超过"怀特计划",达 260 亿美元之多,其实质是贸易顺差国应担负稳定国际货币的主要责任,以此来为战后英国可能的处境和利益未雨绸缪。

1942 年 7 月,英美双方交换各自的计划,开始讨论战后国际货币问题。在争执不下的情况下,1943 年 4 月,双方同时公布了各自的计划。经过一系列的斗争与合作,最终决定于召开反法西斯同盟国家会议来讨论各自的计划。在 1944 年 7 月布雷顿森林会议上,"怀特计划"战胜"凯恩斯计划",据此创立的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为战后国际金融新秩序的基本框

---

[1] John Morton Blum, From the Morgenthau Diaries: Years of War 1941—1945,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67), pp 228—229

架。这两个组织总部都设在华盛顿,最高职位也均由美国人担任,美国还控制了这两个组织的1/3投票权。在这一轮争夺世界经济领导权的斗争中,美国大获全胜。一年后,美国国会批准了布雷顿森林协定。为了让英国议会也顺利批准,1945年底美国向英国提供了一笔巨额贷款[①]。

在摩根索致力于国际金融管理权和平转移的同时,国务卿赫尔则积极推动《互惠贸易法案》成为战后普遍的国际贸易体制。1943年开始,英美双方就战后国际贸易问题进行了蹉商和研究,到1945年双方在就业、贸易限额、关税与特惠等问题上达成妥协,提出了"供贸易和就业国际会议考虑的建议草案"。1946年初,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第一次会议在伦敦召开,接受了美国提出的召开贸易与就业国际会议的建议。随后,美国国务院公布了"国际贸易组织(ITO)宪章建议草案"作为未来会议讨论的基础。10月15日~11月26日和1947年4月10日~11月17日,联合国就业与贸易会议两次筹备会议先后在伦敦和日内瓦召开。在日内瓦会议期间,18个筹委会成员国围绕美国提出的"双边谈判,多边受益"的原则进行了战后首次关税减让的大谈判,并于10月23日签定了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ATT)最后议定书。1947年11月21日-1948年2月24日,56个国家在古巴哈瓦纳参加了就业与贸易国际会议,讨论了ITO宪章。[②] 接着,在同一地点GATT缔约国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由此拉开了战后国际贸易新体制运行的序幕。以赫尔为代表的美国贸易多边主义之梦终于实现。

---

① Randall Bennett Woods, A Changing of the Guard: Anglo-American Relations, 1941—1946,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0), pp 364~368

② 美国的贸易主张在GATT当中基本上都得到实现,因此杜鲁门当局后来自动撤销了让国会批准ITO的议案。

第四章　冷战的形成和扩大

第二次世界大战为美国确立其世界领导权提供了机会。战争给欧亚大陆带来的是经济凋敝、社会动荡和政治混乱，却使美国拥有了世界黄金储备的2/3，世界贸易的3/4，占用了世界一半以上的财富。由美国主导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等相继成立，预示着战后世界"美国世纪"的开始。正当美国登上世界霸主地位，踌躇满志地准备领导世界实现美国式的和平与繁荣的时候，却遇到了苏联的挑战。于是美苏这两个在二战中携手合作的盟国迅即走上对抗，开始了长达40多年的冷战。

冷战的形成

美苏冷战的形成，背景复杂，因素多样。远在1830年，法国学者托克维尔就预言了未来美国与俄罗斯对抗的不可避免性。近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美国对俄国革命的干涉以及随后16年的不承认。但最重要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国际权力真空，美国拥有的无可匹敌的强大以及它所追求领导世界的野心，都直接导致了冷战的出现。

早在战争期间，美苏之间就发生了一系列损害相互信任的不愉快事件，诸如第二战场开辟的拖延、苏联对华沙波兰流亡政府地下军起义的见死不救、美国与德国在瑞士伯尔尼就驻意大利德军投降的秘密谈判等事件。美国与英国合作进行原子弹的研究与开

发，同时却对苏联秘而不宣的事实也表明西方与苏联的合作并非亲密无间。

从战争后期到1946年初，美国决策者内部开始辩论苏联的战后意图及其对美国的影响，其间经过伦敦外长会议和莫斯科外长会议的争吵，在东欧、中欧、中东等地区战后安排上的龃龉。杜鲁门政府的对苏政策经历了从合作到对抗的演变过程。

在1945年2月4～11日的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努力寻求与苏联的合作，以维持战后世界的和平。美英和苏联就对德作战计划、苏联参加太平洋战争、波兰边界和政府组成、德国赔款与边界、联合国的组成和程序等一系列有关战后安排等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并达成了基本一致。但罗斯福尚未看到自己为之奋斗的反法西斯事业的最终胜利便于4月12日去世了，副总统杜鲁门继任总统。这位不谙熟国际事务的新总统在其顾问的支持下，决心对苏采取强硬政策。4月23日，他在会见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时，严厉指责了苏联在波兰政府组成问题上违反雅尔塔协议，并请他转交给斯大林一封措辞强硬的信件。杜鲁门还暗示苏联，要其考虑东欧政策的经济后果。[①] 5月9日德国投降，杜鲁门下令有关部门削减对外租借物资供应。据此，有关部门立即停止向苏联和其他欧洲国家运送租借物资，甚至在运输途中的船只都要返航卸货。杜鲁门此前刚刚威胁过苏联，因此租借供应的停止无疑加重了斯大林对美国的疑心，苏联的反应十分强烈。尽管杜鲁门后来又重新解释了命令，恢复了物资的运送，并特意派遣霍普金斯赴莫斯科解释，但斯大林仍是疑虑重重，埋怨美国"从德国被击败的前景显得清楚时起，美国对苏态度就冷淡了，美国似乎说，不再需要俄国人了。"他还表示苏联不强求美国在拉美、意大利和比利时进行所

① 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北京·三联书店，第一卷，1974年，第69～71页。

谓的"自由选举",美国也不应该对苏联在波兰的行为耿耿于怀[①]。

不管租借事件的真正动机何在,杜鲁门一直相信经济是美国对苏政策中的一张牌。早在罗斯福去世前,国务院就着手一项10亿美元的战后对苏贷款,国会也表示支持,但杜鲁门在7月份赴波茨坦参加三国首脑会议前吩咐国务院先保持沉默。他要等待斯大林首先开口,从而取得外交主动权。但是,斯大林并没有主动向美国求援,杜鲁门的如意算盘落空。杜鲁门手中的另一张牌是原子弹。从1942年起,美国开始代号为"曼哈顿计划"的核武器研制工程,经过12万人耗资20亿美元的努力,终于在1945年7月16日成功试爆第一颗原子弹。杜鲁门得到这一消息时正值波茨坦会议召开。他激动异常,开始以强硬的口吻和斯大林会谈。邱吉尔发现他"果断而有力地 …… 告诉(苏联人)有些要求是绝对不可能的"[②]。杜鲁门特意在"闲聊"中向斯大林"顺便"提及美国已拥有了这种杀伤力极大的武器,但斯大林显得若无其事,表示希望美国用它来对付日本。实际上,通过情报机构,斯大林或许比杜鲁门还要早地知道了美国的原子弹计划。当天,斯大林便下令国内加快核武器的研制速度。原子外交不但没有起到压制苏联的预期作用,反而刺激了苏联核竞赛的决心。1945年11月,莫洛托夫在莫斯科纪念十月革命28周年的报告会上指出:原子弹不可能为一国或少数国家独占,更不能把它用于外交[③]。为了加强对原子弹的垄断,美国还就核武器的国际管制向国际原子能委员会提交了"巴鲁克计划",提出了建立国际权威机构、对放射性原材料进行国际控制与核查、联合国安理会对核查不能投否决票、和平利用原子能、终止一切原子弹的生产、销毁现存的核弹等8点建议。但最重要的一条是,只有在以上条件都满足后,美国才会放弃对原子弹的

---

① 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一卷,第140-141页。

② 转引自 Schulzinger, American Diplomac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p 197-198

③ 爱德华·托津斯基:《斯大林:原苏联秘密档案最新披露》,第182页。

垄断。[①] 苏联显然不会接受这一旨在维护美国核垄断地位的计划。

原子外交的这一不和谐插曲充分反映了波茨坦会议不和谐的主题。杜鲁门代替了罗斯福,邱吉尔因国内大选中途回国,此后就再也没有回来,接替他的是新任工党首相艾德礼。面对自己不熟悉的对手,斯大林迷惑不解,为此还讽刺了英美国家的民主。[②] 此时欧洲战争已经胜利,同盟的凝聚力锐减,三国各自固守自己的利益。基辛格评论说,"波茨坦会议很快就变成了聋子的对话,与会者各说各话,没有交流,斯大林坚持要巩固他的势力范围,杜鲁门以及邱吉尔则极力为其原则辩护 …… 最后是双方各自拿出否决权,不让对手意志得逞。"[③] 结果,斯大林提出的在博斯普鲁斯海峡设置苏联军事基地、四国共管鲁尔地区以及让西方承认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政府等要求均未实现,杜鲁门关于波兰边界以及多瑙河国际化的目标也未达到。会议只就日本无条件投降发表了《波茨坦公告》。

雅尔塔会议时的和谐气氛在波茨坦会议上荡然无存,三国首脑甚至连就下一次会晤的安排都没达成一致。波茨坦会议最终成为同盟国三巨头首脑会议的绝唱。波茨坦会议的实际结果就是明确了欧洲划分为东、西两大势力范围,明确了冷战的地理界线。最高首脑会晤尚且如此,紧接其后的外长会议更难达成合作。实际上,从当年 9 月开始的多次外长会议成了双方互相指责和陈述自己观点的论坛。罗斯福的大国合作的设想在波茨坦会议被打上了一个永久的休止符。

---

① Thomas G. Paterson, et al.,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 History since 1900, third ed., (Lexington, MA: D. C FEATH AND COMPANY, 1988), p 447

② 斯大林曾表示:艾德礼能够换下伟大的邱吉尔,可见西方民主的可怜。见爱德华·托津斯基:《斯大林:原苏联秘密档案最新披露》(李惠生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7 年版,第 591～600 页。

③ 基辛格:《大外交》,第 388 页。

冷战观念的形成

1946年2月9日，斯大林在莫斯科的选民大会上发表演说，颂扬苏联苏维埃制度的优越，重申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必然导致相互间战争这一列宁主义的原理。两周之后，美国驻苏联大使馆临时代办乔治·凯南发回了一封长达8000多个英语单词的“长电”，分析苏联扩张的历史与思想渊源，试图为美国的外交决策者们扫清迷雾，提供对苏决策的理论基础。

(1)“长电”。乔治·凯南是美国外交界的一个奇才。他早年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直接考入外交界，作为“里加仔”[①] 接受对苏外交的培训，1933年美苏建交后常驻莫斯科，对苏联有较深的研究。1946年2月中旬，美国国务院得知苏联不愿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与发展银行后，遂要求驻苏大使馆弄清苏联意图，当时恰逢大使哈里曼回国述职，凯南便执笔起草了这份有名的“长电”。他从苏联的共产主义信仰、俄罗斯民族主义和苏联的极权官僚政体三个方面分析了苏联的状况，声称美国“面对着这样一支政治力量，它狂热地为之献身的信仰认为：同美国不可能达成一项长远的妥协安排；若要使苏维埃国家获得安全，就应该、也必须扰乱我们社会的和谐，摧毁我们的传统生活方式，破坏我们国家的国际权威。”[②]“长电”也指出了苏联的弱点：苏联的扩张充满机会主义色彩，它欺软怕硬，知难而退。因此美国应该打破与苏合作的幻想，努力完善自己的社会，坚定对美国社会及政治制度的信心。

---

① 俄国十月革命后，美国和欧洲各国通过各种手段企图推翻苏维埃政府，但均未达到目的。美国虽长期拒绝承认苏联，但非常关注苏联的事态发展，从20年代开始就着手培养苏联问题专家。因为没有与苏建立外交关系，不能派人直接考察苏联，故而在立陶宛的里加设立了培训基地，让有志成为苏联专家的年轻人在那里监听苏联电台，搜集苏联情报，而且和沙皇的遗老遗少们生活在一起，让他们耳濡目染，感受俄罗斯民族的文化生活氛围。这些第一批美国苏联事务专家被称为“里加仔”。

② George Kennan, Memoirs, 1925—1950 (Boston, 1967), p.557.

凯南对苏联行为的解释，在不经意中道出了华盛顿许多决策者的心声，“这样的文件正是(海军部长)福莱斯特尔一直在政府其他部门寻找而没有找到的。”[①] “长电”发后不久，凯南奉调回国出任刚刚成立的国务院政策设计室主任。

(2)“铁幕”演说。1946 年 3 月 5 日，在杜鲁门的亲自陪同和主持下，英国前首相邱吉尔在密苏里州富尔敦的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了有名的“铁幕”演说(亦称“富尔敦”演说)，他用自己特有的夸张口吻指出：“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的德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在这条线的后面，座落着中欧和东欧所有古国的都城。华沙、柏林、布拉格、维也纳、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布加勒斯特和索菲亚——所有这些名城及其居民无一不处在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不仅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屈服于苏联的势力影响，而且还受到莫斯科日益增加的高压控制。”[②]“铁幕”一词源于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攻击雅尔塔会议的一篇讲演。战争结束不到半年，邱吉尔却旧瓶装新酒，把它用到苏联身上，起到了轰动效应。他呼吁英语国家联合起来，借助美国对原子弹的垄断地位来对付苏联。邱吉尔的言论虽不代表官方，但他的影响力可能超过任何一位英美政府官员。事实上，他的讲演内容事先经国务卿贝尔纳斯告知了杜鲁门，因此许多历史学家称这一演讲为英美对苏冷战的信号。

(3)克利福德报告。这一时期，美国政府各部门都在全力以赴研究美国的战后政策，特别是对苏政策，并提交了大量的报告。其中最有名的是杜鲁门总统的特别顾问克利福德的一份报告。[③]这份绝密报告是对 4 月份国务院的一份文件的修正和发展。4 月 1

① 转引自杨生茂：《美国外交政策史：1775—1989》，第 444 页。

② Thomas Patterson, ed , Major Problems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vol II pp 299～302.

③ Thomas H. Etzold & John L Gaddis, eds , Containment: Document on American Policy and Strategy, 1945—195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8), p66.

日，国务院专家马修斯向国务院陆军海军协调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对苏政策的研究报告。[①]该报告在政策上落实了凯南的理论，提出大力加强美国的军事力量，积极协助英国，全面抗衡苏联。在此文件基础上，克利福德执笔起草了题为《美国与苏联关系》的文件并于9月24日提交给杜鲁门总统。它采纳了凯南"长电"的基调，全面回顾了战后美苏关系的演变，指出了苏联行为的根源，提出了美国应采取的对策，"美国必须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强大到足以抑制苏联，使苏联的势力范围限于它目前的地区。"[②]杜鲁门接受了这份报告并下令在决策层内传阅，以求在遏制苏联的全球战略上进一步统一认识，为下一步"杜鲁门原则"的提出奠定思想基础。

1946年底到1947年初，杜鲁门政府对苏判断已经达成共识：与苏合作是行不通的，苏联的扩张本性决定了与美国冲突的必然性，美国必须针锋相对、坚决抵制。

1947年2月21日，英国政府秘密照会美国，表示由于国内经济困难，一个月后无法再向希腊和土耳其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为了防止两国落入苏联之手，建议美国政府自4月1日承担起援助希腊和土耳其的任务。首先见到照会的美国国务院官员立即意识到这是美国从英国手中接过世界领导权的大好时机。[③]这一照会最终导致了成为战后美国外交指导思想的杜鲁门原则的产生。

1.杜鲁门原则。二战后期和战后初期，希腊国内存在着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解放阵线"和英国扶持的右翼独裁政权两大政治力量。双方政见不合，内战不断，共产党日渐壮大。接到英国的照会后，美国政府上自总统、国务卿，下到各部、司的文武官员们，立即筹划，迅速就援助希、土两国达成共识，提出具体方案。在2月27

---

① FRUS, 1946, Vol I, p 1169

② Arthur M Schlesinger, Jr., The Dynamic of World Power: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U S Foreign Policy, 1945—1973 (New York, 1973), pp 268～304

③ Joseph M Jones, The Fifteen Weeks, (New York, 1955), p 7

日的白宫会议上，副国务卿迪安·艾奇逊把援助希腊和反对苏联共产主义扩张结合起来，说服了共和党参议院外委会主席范登堡，以便争取国会的支持。范登堡这位有名的孤立主义者就此变成了冷战政策的号手，在参议院中极力游说，促成冷战外交政策上“两党一致”的形成。

3月12日，杜鲁门在国会两院特别会议上发表了“杜鲁门原则”的演说。他以特有的威尔逊方式把援助希腊和土耳其与美国反对极权主义的特殊使命联系起来：“美国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是创造条件，使我们和其他国家能共同建立一种不受压迫的生活方式…… 美国的政策必须支持那些人民，他们正在抵抗武装起来的少数人或是外来压力企图加于他们的奴役。我认为我们必须援助自由人民以自己的方式来规划自己的命运。我认为我们的帮助首先应该是经济和财政援助，这是达到经济稳定和有秩序的政治进程所必需的 …… 全世界自由的人民指望着我们支持他们维护他们的自由。如果我们领导不利，我们就可能危及世界和平——而肯定会危及我们自己国家的利益。”[①]杜鲁门的演说引起了国会议员的共鸣，法案被顺利通过，据此希腊和土耳其分别得到了3亿和1亿美元的援助。

2. 马歇尔计划。杜鲁门的演说揭开了美国遏制苏联的序幕。1947年6月5日，国务卿马歇尔在哈佛大学发表了另一篇著名的演讲，提出了一项全面援助欧洲重建的计划。实际上，这项计划肇始于1947年初。当时负责经济事务的副国务卿克莱顿和海军部长福莱斯特尔等相继提出援欧建议，但一直未得到重视。国务卿马歇尔在长达46天的莫斯科外长会议之后，认为斯大林在等待西欧垮台，趁机扩张获利，因此与苏联合作毫无可能。回国后他立即指示凯南组成班子，研究欧洲复兴问题。凯南汇总了克莱顿等人

① Joseph M Jones, The Fifteen Weeks, pp. 20～23

的报告和国务院陆军海军协调委员会的报告，提出了具体的援欧计划，并由马歇尔在哈佛大学公诸于世。

马歇尔在演讲中声明美国的援助不是反对任何国家，旨在"针对饥饿、贫困、绝望和混乱"，促使欧洲实现保持自由体制的政治和社会条件；它要求欧洲国家联合起来主动向美国提出求援方案。马歇尔演讲后，杜鲁门下令专门组成三个领导小组，掀起了争取国内支持该计划的声势浩大的游说活动。7 月份，极有影响的《外交》季刊发表了凯南以"X"署名的《苏联行为的根源》一文，对"杜鲁门原则"进行理论阐述，公开提出了对苏"遏制"政策。[①] 著名专栏作家李普曼对此一连发表 9 篇评论文章，并汇集成《冷战》一书。至此，"冷战"和"遏制"成为战后国际关系中最流行的术语，指导美国对外政策长达半个世纪之久。

在白宫的摇旗呐喊下，1948 年 3 月，美国国会终于以绝对多数通过了落实马歇尔计划的《经济合作法》，当年拨款 40 亿美元。到 1951 年底，美国共向西欧提供了 124 亿美元的贷款。马歇尔计划的实施结果是从经济上分裂了东欧和西欧，但却极大地促成西欧一体化运动。

3.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杜鲁门原则"是政治遏制，"马歇尔计划"是经济遏制，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则是军事遏制。1947 年 3 月 4 日，英法两国签署了针对德国的共同防御条约，它"意味着西欧正在向美国靠拢，消除联苏反德的可能性。"[②] 1948 年 3 月，在美国的鼓励下，英法与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三国签订了《布鲁塞尔集体防务条约》。6 月，杜鲁门授意范登堡在参议院通过了以范登

---

① X, "Origin of the Soviet Conduct", Foreign Affairs, Vol. 25 (July 1947).

18 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上册，北京·世纪知识出版社，1994 年版，第 103 页。

② 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上册，北京·世纪知识出版社，1994 年版，第 103 页。

堡命名的决议案,赞成布鲁塞尔条约,建议美国参加。7 月上旬开始,美国与布鲁塞尔条约国家在华盛顿举行秘密会谈,到 9 月 9 日,最终达成了《华盛顿文件》,构成后来北约的要点。1948 年 11 月,杜鲁门连任成为定局后,当即指示国务院开始就缔结北约进行谈判。[①]1949 年 4 月 4 日,包括美国和加拿大两个北美洲国家在内的欧美 12 国在华盛顿正式签订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条约》,北约正式成立。它规定"对一个或数个缔约国之攻击应视为对全体缔约国之攻击。"

这样,从杜鲁门原则、马歇尔计划到北约的成立,美国在欧洲推出了政治、经济和军事全方位的遏制苏联的政策,冷战在欧洲"安家落户"。

冷战的强化和扩大

在讨论建立北约的同时,白宫也在考虑继经济援助之后的加强对盟国的军事援助。7 月 25 日,在签署北约的当日,杜鲁门又向国会提交了《军援法》(亦称《共同防御援助法》),提出向北约成员以及希腊、土耳其、伊朗、南韩、菲律宾等国提供军事援助。冷战逐步迈出欧洲,渐次扩大到全球各个角落。

1950 年 1 月底,杜鲁门指示国务院和国防部全面总结美国的外交和防务战略,由此产生了 68 号系列文件。该文件强调苏联的共产主义和美国的自由世界水火不容,详细分析了美苏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以及核武器等方面的力量对比。在夸大苏联威胁的前提下,呼吁美国加强对苏联的遏制政策。杜鲁门指示组成特别委员会,进一步研究该报告所提出的行动纲要以及所需费用。6 月份爆发的朝鲜战争似乎证实了 68 号文件判断的准确性,推动了

---

① FRUS, 1950, Vol. I, pp.235~292, pp.425~481。NSC~68 号系列文件在 1975 年解密时缺少两份文件,1998 年中旬,在其主要起草者、继凯南之后出任国务院政策设计室主任的保罗·尼采的要求下解密,全文刊登在 SAIS Review, Winter - Spring 1999, pp.13~32.

文件的实施过程。9月30日，杜鲁门亲自主持的国家安全联席会议正式决定把NSC68号文件作为今后4～5年内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指南。11月中旬，国务院情报机构提交了一份危言耸听的报告，断言苏联可能在1954年发动一场全面战争，争夺世界霸权。根据这一估计，12月份国家安全委员会又通过了NSC68/3号文件19，提出了具体的军事、外援、民防、储备、对外宣传、国外情报等政策建议，后由总统批准后交付各个有关部门执行。至此，美国完成了它了全球冷战战略的规划，对苏遏制战略成为指导今后几十年美国外交的大政方针。

在东亚地区，美国的冷战政策表现在对中国和日本政策的转变中。1945年战争结束后，美国把中国看作是自己的势力范围，派马歇尔作为杜鲁门总统的特使来华，调停中国国内政治冲突，力图阻止内战爆发。但是，在美苏冷战的背景下，加上中国内部不可调和的矛盾，中国还是爆发了全面内战，美国选择与腐朽的蒋介石政权为伍的道路，向蒋介石政府出售大批军火，提高了包括顾问团在内的各种军事援助。新中国成立后，美国采取了封锁、孤立和敌视的政策，最终导致两国在朝鲜战场兵戎相见。朝鲜战争爆发后，杜鲁门宣布封锁台湾海峡，派遣第7舰队进驻台湾海峡，并批准向印度支那地区增加军事援助，加强在菲律宾的美军，开始在亚洲构筑对中国的战略包围。

在对日政策方面，美国经历了从严厉处置到扶植支持的过程。占领日本初期，美国推行解除武装、审判战犯、解散财阀，进行全面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教育的改革。但是随着冷战的形成以及中国革命的胜利，美国开始转而扶持日本、重新武装日本、打击左派进步势力，最终把日本纳入冷战轨道，成为美国全球遏制战略的远东基地。1951年9月，美国单独与日本签署了共同安全条约，以结束占领和恢复日本主权为条件把日本拉进了反共阵营。接着，美国又与菲律宾签署了相同内容的军事同盟条约，与澳大利亚和新

西兰缔结《美、澳、新公约》。朝鲜战争结束后，它又与韩国订立了互助条约，承诺在30年内向南朝鲜提供不少于55亿美元的援助。1954年9月，美、英、法、澳大利亚、新西兰、泰国、菲律宾、巴基斯坦等8个反共国家在马尼拉缔结了《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其保护范围还包括老挝、柬埔寨和越南南部。12月，美国又与台湾签订了《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利用台湾对抗中国。1955年，它支持英国、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和巴基斯坦组成了《巴格达条约》组织这一地区性的冷战的军事同盟。

就这样，短短几年，美国就建立从南朝鲜、日本、大洋洲、菲律宾、台湾到泰国、巴基斯坦，接着延伸到西亚的伊朗、伊拉克和土耳其，形成了一条横贯亚洲太平洋的对朝鲜、中国、北越和苏联的大包围圈。在保卫自由与民主的旗号下，美国实际上所作的是对欧亚核心地带进行包围、抢夺中间地带国家的地缘大战略。

在“杜鲁门原则”的指导下，1947年9月2日，美国与拉美18个国家签订了《美洲国家间互助条约》，把美洲国家发生的左派或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定性为外来侵略。1948年泛美同盟改组成为“美洲国家组织”，旨在防止共产主义对拉美的渗透，力图把西半球变成美国推行区域性政治军事集团的样板，成为美国进行全球冷战的稳固基地。

进入50年代，美国对拉美的干预越来越多。1951年，进步军人阿本斯(Jacobo Arbenz Guzman)当选为危地马拉总统，实行了一系列维护主权和保护和发展民族工业的政策，触及了美国在危地马拉的经济利益。美国立即给阿本斯贴上共产主义的标签。共和党总统艾森豪威尔下令中央情报局实行秘密颠覆行动，策动叛乱，并向叛乱分子提供飞机，最终迫使阿本斯政府辞职，代之以亲美政府。

古巴自本世纪初成为美国的保护国以来，各方面都受到了美国的严格控制。其公共事业的80%、采矿业的90%、牧场的90%

和几乎100%的石油工业都由美国资本控制。[①]政治上,"美国大使在古巴成了第二号最重要的人物,有时甚至比古巴总统还重要"。[②]美国扶植的古巴政府极端腐化、不得人心,从1953年开始,古巴革命家卡斯特罗领导人民武装起义,经过数年的斗争,终于在1959年初推翻了旧政权,建立了新政府。1960年2月,苏联副总理米高扬访问古巴,双方签订了贸易援助协定。美国政府本就反对卡斯特罗激进的国内改革政策,苏联的援助正好为美国颠覆卡斯特罗政府提供了理由。3月中旬,艾森豪威尔批准了中央情报局推翻卡斯特罗政府的秘密计划。肯尼迪就任总统后,立即组织实施这一计划,组织和护送反卡斯特罗的流亡分子武装入侵古巴,结果刚刚在古巴南岸的猪湾登陆就被歼灭,史称"猪湾事件"。为了防止美国的进一步的入侵,古巴开始向苏联寻求保护,后来的古巴导弹危机由此埋下了伏笔。

肯尼迪的拉美政策表现为鲜明的软硬两手。为了防止其他存在独裁统治的拉美国家也出现古巴式的国内革命,1961年3月肯尼迪提出了名为"争取进步联盟"的拉丁美洲经济发展计划。打着抵制"再一次想把旧世界的暴政强加于新世界人民的外来压力",[③]要求拉美国家配合美国的的经济援助,进行国内改革。"争取进步联盟"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拉美人民民主改革的要求,一时间美拉关系得到了一定的改善。然而,美国实行该计划的终极目的与拉美国家追求民族民主独立繁荣的目标大相径庭。因此,一旦出现矛盾,"争取进步联盟"便成为美国干涉拉美国家内政的掩护。多米尼加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肯尼迪曾把该国作为"争取

---

① David Horowitz, From Yalta to Vietnam: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 the Cold War, 1969, Chapter 12.

② Walter Lafeber, American, Russia, and the Cold War: 1945—1975, 1976, p.212.22 Arthur Schleisinger, ed., Dynamics of World Power, Vol. III, p.501.

③ Arthur Schleisinger, ed., Dynamics of World Power, Vol. III, p.501.

进步联盟”的样板，提供了大量援助，扶植亲美人士当选总统。但多米尼加的状况并未得到改善，亲美政府也在社会动乱中被赶下台。肯尼迪大为恼火，立即中断了一切援助，借口共产党渗透，下令海军陆战队进驻多米尼加，并“选举”出新政府。圭亚那则是另外一个例子。1961 年，圭亚那脱离英国独立，当时有以贾根为首和以波纳姆为首的两股政治势力。尽管贾根当选为第一届总统后旋即访美示好，但肯尼迪的印象是此人有亲共倾向，遂停止了美援。而波纳姆在 1962 年访美时投其所好，大肆攻击共产主义，美国便通过英国协助支持波纳姆于 1964 年上台。

由于丰富的石油资源，中东地区一直是美国觊觎的目标。1947 年秋，美国出台了中、近东政策，明确表示意大利、希腊、伊朗、土耳其等国家是美国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地区，决心保卫这一地区不受苏联的威胁，为此，1947 年 10～11 月美国与英国进行专门会谈，协调双方在该地区相互配合共同抵制苏联的政策。

在伊朗，华盛顿政府以摩萨台(Mohammed Mossadegh)民族主义政府有可能投向莫斯科怀抱为由，秘密策划军事政变，恢复了亲英美的巴列维政府。在以后的许多年里，巴列维对美国惟命是从，伊朗遂成为美国遏制苏联大战略中的一颗重要棋子，填补了美国整个亚洲反共防御圈在中东地区的空白点。

在阿拉伯世界，由于西方殖民统治以及美英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支持，出现了反西方的民族主义、泛阿拉伯主义和反帝国主义运动。1952 年上台的埃及新领导人纳赛尔(Abdul Nasser)就是这一运动的代表。他上台后，开始谋求苏联的支持，并在 1956 年使埃及成为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非洲国家。纳赛尔的政策引起了美国的恐惧，艾森豪威尔决定撤回先前答应帮助埃及建造阿斯旺大坝的援助。纳赛尔则以收回原由英国控制的苏伊士运河来回应。英法与以色列联手在 1956 年 10 月侵略埃及的运河地区和西奈半岛。美国顿时陷入了两难困境：支持英法会撕破自己一贯

标榜的反对殖民主义的面纱,恶化与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关系,加剧与苏联的对抗;而支持埃及又会得罪英法盟国,损害大西洋联盟。权衡再三,美国决定采取二战时罗斯福曾使用过的方法:牺牲盟国的部分利益,因为这是它唯一能施加影响的办法。在美国的压力下,英法不得不从运河区撤出军队。苏伊士运河危机后,美国决心填补由于英法撤出而出现的所谓权力真空,1957年初,请求国会授权总统在中东地区实行"经济援助和军事合作计划",并在必要时可以使用美国的军队。这就是所谓的艾森豪威尔原则,美国遂开始成为中东的警察。1957年,约旦国王声称受到亲纳塞尔派和国际共产主义的威胁向美国求援,美国的第6舰队和1000万美元立即来到了约旦。1958年,美国1.5万名海军陆战队士兵在黎巴嫩登陆,支持内乱中的当地政府。

50年代美国在中东的角色完全是一个传统强权的角色。[1]中东重要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石油资源是美国卷入该地区的主要动机。通过取代英法,抗御苏联,支持以色列,美国从此得以称雄中东。

在肯尼迪时期,为了适应非洲风起云涌的民族独立运动,美国开始积极插手非洲,防止苏联势力在非洲的扩大。于是,美苏冷战开始走入非洲内陆。

1960年6月,刚果推翻比利时的殖民统治宣布独立,成立了以卢蒙巴(Patrice Lumumba)为总理的民族主义政府。比利时以刚果士兵要求撤换当地军队内的比利时军官为借口,趁机控制了欧洲的投资中心加丹加省,并策划把加丹加从刚果独立出去。卢蒙巴眼见统一无望,遂请求苏联援助。这一行动改变了美国同情卢蒙巴的态度,并重新评估刚果的战略价值。在美国决策者看来,

---

① Warren I Cohe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1945—1991, p 114.

卢蒙巴已成为要把共产主义引进中非的极端分子,"是苏联的一个工具"。[①] 为此,中央情报局策动军事政变,杀害了卢蒙巴,进一步恶化了刚果的内乱和分裂。由于联合国在处理刚果事件中的亲西方立场,亲自率团参加联合国大会的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怒不可遏,用皮鞋敲击桌面,成为一大外交新闻。为了防止事态扩大,美国后协同联合国于1963年1月促成了刚果的统一,向它提供了大量经济援助,维持刚果的亲美立场。

为了与声名狼藉的欧洲殖民主义划清界限,扩大美国在非洲新兴国家的影响,肯尼迪政府比较注意发展与非洲新独立国家的关系。与国内的民权运动相呼应,肯尼迪任命了一系列有非洲背景的人员进入政府部门,并积极与非洲国家领导人接触。1963年3月,加纳的恩克鲁玛成为第一个走进白宫的黑非洲领导人,受到了肯尼迪的热情接待。在肯尼迪任期内,应邀访问华盛顿、接受他本人会见的非洲领导人多达28人。[②] 同时,美国领导人也相继访问非洲,1961年6月,美国和平队领导人访问几内亚,8月,担任司法部长的总统弟弟罗伯特·肯尼迪参加了象牙海岸的独立庆典。随着人员互访的增多,粮食、贷款、技术人员等各种各样形式的援助也有选择地流向非洲国家。

"热战"与危机

冷战肇始于欧洲,美苏两国在这里也花费了更多的心血。在1948年的柏林危机后,欧洲的对抗格局基本上稳定下来。但是,随着冷战范围的扩大,在美苏两国"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欧洲以外的广大地区,接连发生了一系列热战与危机,主要包括发生在东亚的朝鲜战争、两次台湾海峡危机、中东的苏伊士运河危机以及加勒

① 艾森豪威尔:《白宫岁月》下,二,第648页。
② 施莱辛格:《一千天:约翰·菲·肯尼迪在白宫》,第438页。

比海的古巴导弹危机。这些险情迭出的事件使东西方的对抗走到一触即发的危险边缘,把冷战推向最高潮。

太平洋战争结束时,美苏匆忙地把北纬38°线定为两国在朝鲜军事行动的临时分界线。美苏分占南北,双方扶植各自的势力。40年代末,美苏的部队先后撤出朝鲜半岛,但都留下了军事顾问团。朝鲜南北因政见不一陷于分裂,但都致力于自己主导下的统一。这一努力在1950年6月25日酿成全面内战。

美国决策者立即断定战争是苏联的国际阴谋,即使在中国军队被迫赴朝参战后,盖洛普民意测验仍显示只有5%的美国人相信中国出兵是为了保家卫国。[①]美国决策者把朝鲜战争看成是苏联发起全面战争的第一步,为此毫不犹豫地投入了战争。25日,杜鲁门批准增加对南朝鲜的军事援助,并下令出动美国军队掩护美国人员的撤离。次日,美国又决定海空军在三八线以南向南朝鲜提供一切可能的援助。在紧接其后的几天中,杜鲁门又取消海空军不得越过三八线和不得动用地面部队的限制。同时,趁苏联代表因中国联合国代表权问题罢会的机会,美国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美国的提案,谴责北朝鲜为侵略者,建立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全面参加朝鲜战争。

7月初,从日本开来的美国军队进入朝鲜半岛,并不顾中国的警告,在10月1日跨过三八线。10月下旬,中国军队被迫跨过鸭绿江赴朝参战。朝鲜战争遂成为中美军队较量的战场。经过5次战役后(950年10月~1951年5月),战线又回到了三八线,双方的拉锯战一直持续到1953年7月停战协议签署为止。

朝鲜战争对美国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它强化了国内麦卡锡主义的反共思潮和社会上的反共意识形态,导致了美国外交的僵化;

---

① Warren I Cohe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Vol. IV: America in the Age of Soviet Union, 1945—1991,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77.

第二，加强了美国与苏联敌对的决心和手段。1952年底，美国军方甚至提出对苏联进行预防性军事打击的主张。第三，美国加强了欧洲的防御，重新武装西德便是最明显的标志。最后，中美对抗固定化和长期化，亚洲也因此成为美国另一个重要的冷战战场。

1953年初朝鲜停战前，艾森豪威尔宣布第7舰队不再阻止蒋介石反攻大陆，这一"放蒋出笼"的决定显然是把台湾作为制衡中国的工具。从1954年开始，美国又策划建立遏制中国的东南亚条约组织，并与台湾蒋介石政府谈判防御协定。在这种情况下，1954年7月中国政府发表了解放台湾的声明，并于9月开始对蒋介石政府控制的金门和马祖两个小岛进行炮击。美国马上紧张起来，要求蒋介石放弃这两个外岛，固守台湾，但遭到了蒋的拒绝。12月，美国与台湾签署了《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美国只承诺向台湾和澎湖列岛提供保护，并在换文中限制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图谋。

尽管如此，蒋介石政权加强了它在金门和马祖的防务，并叫嚣反攻大陆。到1958年夏天，蒋介石在金门的驻军达10万人之多，占其地面总兵力的1/3。鉴此，中国在8月份再次炮击金门和马祖，第二次台海危机爆发。艾森豪威尔马上命令对蒋介石部队进行空中补给，第7舰队开始为国民党的供应船只护航。美国宣称放弃金马将成为"西太平洋的慕尼黑。"但是中国方面并没有被美国的强硬吓倒，在避免与美国海空军直接冲突的情况下，继续炮击。最终，艾森豪威尔—杜勒斯从战争的边缘退却。10月，美国迫使蒋介石保证不使用武力反攻大陆，并减少在金门和马祖的驻军，美国的护航停止。中国方面也减少了炮击。12月，美国宣布从台湾海峡撤出部分海空军。危机平静下来，但"中美两国仍然是势不两立"。①

东方的台海危机尚未平息，西方的柏林又起风波。战后的冷

---

① 托马斯·佩特森：《美国外交政策》下册，第684～685页。

战不仅导致德国的分裂，而且也导致位于东德境内的柏林一分为二。根据战时安排，柏林由美英苏法四大国分区占领，后来西方三国的占领区合并，成为西柏林。从此，西柏林成为东德区域内的一块飞地。在美国大量投资的刺激下，西柏林成为繁荣的绿洲，东德人口源源不断地从这里流失到西德，成为苏联和东德政府的一块心病。1958 年 11 月 27 日，苏联照会美、英、法，声明将把柏林问题转交东德政府，并与东德签订和平条约，同时建议西方三国也从西柏林撤出驻军，把柏林变成非军事的中立城市，由联合国监管。赫鲁晓夫还威胁说，如果东西方在德国和西柏林问题上达不成协议，苏联将单方面实行该计划。

赫鲁晓夫这一举动把美国推入了两难境地：接受苏联的倡议就得与东德谈判柏林通道问题，这等于承认了东德政府；而拒绝赫鲁晓夫，不但在舆论上陷入被动，更糟的是，如果苏联一意孤行，西方就得为保卫西柏林而诉诸战争。艾森豪威尔针锋相对，声称美国的态度是“寸步不让，哪怕是在很小的、似乎是微不足道的事情上也是如此”。[①] 但西欧国家则最怕看到在欧洲爆发战争。为此，英国遂开始在美苏之间进行外交协调，终于促成 1959 年 5～8 月四国外长日内瓦会议的召开。虽然没有解决柏林问题，但会议达成了赫鲁晓夫访美的协议。9 月 15～27 日，赫鲁晓夫访问美国，两国首脑就柏林问题进行了谈判，结果苏联作出让步，赫鲁晓夫表示不再坚持在一定期限内签署一项苏联－东德和约，柏林可以作为一个有待谈判来解决的问题。[②] 柏林危机渐渐平息。实际上，美苏两国谁也不准备在柏林问题冒一场军事冲突的危险。1961 年，在维也纳美苏首脑会议上，赫鲁晓夫再次声称 6 个月内解决柏林问题，西方反应冷淡。苏联和东德只好修起了柏林墙，把地理上

---

① 艾森豪威尔：《白宫岁月》下，一，第 379 页。
② 艾森豪威尔：《白宫岁月》下，二，第 504 页。

统一的柏林人为地分成两个部分，柏林墙也成为欧洲分裂和冷战的象征。肯尼迪毫不示弱，马上调派 1500 人的部队大摇大摆进入西柏林，并任命了 1948 年柏林危机中的美国强硬派代表克莱(Lucius Clay)将军担任驻柏林的总统私人代表。苏联没有作进一步的反应，柏林危机不了了之。

柏林问题刚刚平息，古巴导弹危机又接踵而来，把二战后的美苏冷战推到了最危险的境地。“猪湾事件”后，美国恼羞成怒，强化了对古巴的高压政策，策动美洲国家在政治、经济和军事各方面对古巴进行封锁与孤立。

卡斯特罗针锋相对，正式宣布古巴为社会主义国家，在军事和经济方面完全倒向苏联。美国则声明反对任何进攻性武器进入古巴。对此古巴不予理睬，开始从苏联引进中程导弹，加强自己的防御能力。10 月下旬，美国的间谍飞机发现古巴不但已拥有了苏联的中程导弹，而且即将完成发射台的建设。这无异于一颗重磅炸弹，引起美国政府内外的极大恐慌。当天晚上，肯尼迪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声称美国的方针是：“把古巴射向西半球任何国家的任何核导弹都看作是苏联对美国的进攻，对这种进攻的回答是给苏联以全面报复。”并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封锁古巴海域，对开往古巴的外来船只进行检查，以防止进攻性军事装备的流入。

这种封锁和检查将一直持续到苏联“迅速拆除和撤走”导弹为止。为此，肯尼迪组成专门领导班子，日夜不停地研究各种对付危机的政策，坚持苏方撤出导弹和保证允许国际检查。在大西洋和加勒比海，美国军舰和飞机开始巡逻，准备拦截向古巴运送武器的所有船只。10 月 24 日，运载“禁运品”的苏联船只被迫改变航线。

经过美苏的艰难交涉和联合国秘书长的斡旋，苏联在美国保证不再侵略古巴的条件下撤出了导弹，美国随后也从土耳其撤出了针对苏联的导弹，危机终于平息。

古巴导弹危机是美苏冷战史上最直接的一次对抗，双方都徘

徊于战争的边缘。物极必反,这次危机使两国决策者认识到核对抗的可怕前景,并由此开始了核武器控制谈判,并逐步走向缓和,以避免此类危机的再次发生。

第五章　越南战争

50～70 年代的越南战争是美国冷战外交中最重大的事件，它典型地反映了美国在反共意识形态的指导下，无视别国的具体情况，仰仗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势力称霸全球的决心。它同时也成为美国霸权从顶峰走向相对衰落的历史转折点。在维持美国霸权的威望和可信度以及僵硬的反共意识形态的驱使下，从 50 年代中期开始，美国一步步地侵入越南，最终演变成一场不仅给印度支那人民带来空前灾难，而且也给美国民众带来众多痛苦的侵略战争。

干预的开始与升级

早在 1950 年 2 月，美国的战略家们就把东南亚界定为美国国家安全的“重要地区”。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开始援助在印度支那挣扎的法国。到 1952 年底，美国每年对印度支那的援助额已达 2 亿美元。1954 年，日内瓦会议达成了解决印支问题的协议，法国开始撤出印度支那。这使美国感到不快，它原本希望法国能继续打下去，而不愿将越南的一部分丧失给共产党。因此，美国虽参加了这次会议，但拒绝在协议上签字。日内瓦协议规定了法国从越南撤军和越南人民军从整个南方撤出，这就为美国摆脱欧洲殖民主义的拖累以及在越南南方扶植反共国家提供了便利。会议结束后，杜勒斯马上宣布南越、老挝和柬埔寨为《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的保护国，为美国未来的干预准备了法律托辞。在遏制中国和越

南共产党的口号下，美国决心帮助南越建立一个能够打击北越共产党或者至少也能与之分庭抗礼的反共政权。为此，它利用经济和政治手段，逐渐替代法国在印度支那的地位，并选定反共、反法、亲美的吴庭艳作为美国在南越的代理人。由于担心日内瓦会议决定的越南全国普选计划会使吴庭艳落马，美国不惜破坏会议决议，支持吴庭艳破坏大选计划，在1956年底建立吴氏独裁政府。就这样，美国政府不仅成为南越的支持者，而且成为吴庭艳政府的监护人。“或者与吴庭艳同流，或者与之共沉”成为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南越政策的生动写照。

吴庭艳政权建立后，美国的经济和军事援助源源不断地流向南越。到1961年，南越已成为美国对外援助最大的5个受援国之一，就人均而言，南越接受援助的数量名列榜首。在美国的支持和纵容下，吴庭艳为了巩固自己的专制统治，违反日内瓦会议关于不得迫害任何参加过战争的个人和组织的决议，掀起了大范围的军事清剿和“除共运动”，对前越盟成员和进步群众实行白色恐怖。越南南方的革命力量受到了极大的摧残。50年代末，一些基层党组织和进步群众不顾越共中央政策的束缚，开始了自发的争取生存的武装斗争。随后，北越也开始支持南方的反政府游击战争，吴庭艳的政府军屡遭挫败。有鉴于此，美国军方开始授权在南越的美国军事顾问团扩大职能，协助南越军队制订作战计划，揭开了美国军事干涉的序幕。1961年肯尼迪上台后，把越南看成是考验美国能力和意志的一个重要的战场，他执政的1000天也成为美国空前卷入南越政治和对越军事干涉大幅度升级的时期。与越南问题休戚相关的是老挝问题。根据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精神，老挝成为一个中立国。但随着南越局势的发展，北越逐渐把老挝当成援助南越的通道，开辟了穿越老挝和柬埔寨边界地区进入南越的“胡志明小道”。美国政府支持的老挝政府军和北越支持的老挝共产党武装力量遂在老挝展开了争夺。艾森豪威尔卸任前曾告诫肯尼

迪：老挝是通向整个东南亚的门户，如果丢失了，拯救整个地区的计划就要泡汤。为此，肯尼迪不惜以派遣美国军队相威胁迫使双方停火，达成谈判协议，使老挝再次中立化。但此举并未消除老挝国内的冲突，也未能杜绝北越利用“胡志明小道”支持南越民族解放阵线。对此，美国干脆开始武装老挝亲美政府，并最终于 1964 年武力进驻老挝。

老挝问题实际上是越南问题的副产品。美国的战略重点是解决南越问题。与所有的东南亚独裁政权一样，美国扶植的吴庭艳政权专制、腐败与无能。为了加强对吴政权的指导与改革，肯尼迪派遣多名顾问和特种部队进驻南越，协助南越政府的社会改革以及军事训练，进一步违反了外国向南越派遣军事顾问不能超过 685 名的日内瓦会议规定。肯尼迪把南越当成是美国信心和能力以及新战术的实验场，通过军事、政治、经济和秘密行动等手段，帮助南越进行国内改革，加强南越对共产主义的抵抗力。1961 年下半年，南越民族解放阵线的武装加紧了对政府军的进攻，内战加剧。肯尼迪前后派遣包括副总统约翰逊、国务院政策设计办公室主任罗斯托和总统特别军事顾问、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泰勒在内的最高决策者赴南越考察。10 月，泰勒考察团提出，只有大量增加干预，美国才能拯救南越。肯尼迪自己也明白加深干预的严重性，曾私下里讲。“部队开进去，鼓乐大作，万众欢腾。然而 4 天之内每个人都会把这忘得一干二净。然后我们将被告诉必须派遣更多的部队。这好比酗酒，一杯过后，酒力渐消，你就得再来第二杯”。尽管如此，肯尼迪还是立即实施泰勒调查团提出的建议，派遣非战斗部队进入南越，并确定美国此后 3 年的越南政策：用战斗部队以外的军事手段，特别是通过美国战斗支援部队和急剧增长的军事顾问团，直接协助吴庭艳政权作战。肯尼迪的这一做法加深了美国对越南内政的介入，成为美国在南越干涉重大升级的开始，也是导致美国政府在越南越陷越深乃至无法自拔的关键步骤。

1961年初肯尼迪就职时,美国在越南的军事人员近900人,当年年底增加到3 164人,到1963年肯尼迪遇刺时已多至1.6万多名士兵,军事援助也增加了两倍,达到1.85亿美元。

但是,美国的干预政策没有促进南越的改革与繁荣,反而导致了与吴庭艳政府的龃龉,南越独裁政权依旧。1963年下半年,南越政府军镇压了抗议政府压制和迫害佛教徒的游行示威,导致了一场全国范围内的反政府运动,一名高僧当众自焚以抗议吴庭艳的专制统治,这一令人震撼的场面通过美国新闻记者的摄影镜头传遍世界,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巨大反响。在国内外的舆论压力下,加上吴庭艳本人的顽固不化,致使肯尼迪政府有了"换马"的打算。1963年10月,在美国的默许与支持下,南越军官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吴庭艳政权,吴本人及其兄弟都成了美国干涉政策的替死鬼。吴庭艳死后,南越局势更加动荡不安,仅1964年内,就七易政府。至此,肯尼迪在南越的改革试验完全失败。吴庭艳的垮台非但没有减轻美国在南越的义务,反而促使南越政府把反共的责任、甚至是管理整个社会的重担都推给了美国人。

约翰逊的越南战争

吴庭艳被杀后的第20天,肯尼迪在达拉斯遇刺身亡。林登·约翰逊继任美国总统。在他的任期内,美国的军事干预大规模升级,并把战争扩大到北越,从而使越南战争变成了一场美国人的战争。

约翰逊上台后的第一项重大行动是支持南越军人发动另一次政变。继吴庭艳之后的南越杨文明政府倾向于同南越的民族解放阵线达成一项政治解决,以使南越中立化。这一政策引起美国的不满。1964年初,在美国政府的直接指导下,杨文明被推翻,效忠美国的阮庆成立了新政府。美国的卷入大为加深,先前向南越政府提供咨询的美国顾问开始直接插手政府事务,并深入到各级军

政组织中。为了协助南越的反共战争，约翰逊批准了“34A行动计划”，开始了针对北越的秘密战。主要内容包括派U-2高空侦察机和地面特务搜集北越情报；用空投和海上进入的突击队摧毁北越沿海地区重要的经济目标；派遣鱼雷快艇攻击北越人民军的海防设施等。这是美国在越南的另一次重大升级，美国的军事打击矛头开始指向北越。

由于南越的革命斗争受到北越明里暗里的支持，因此在美国决策者看来，打击和摧毁北越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是结束越南战争的关键。就在他们苦于没有发动战争的借口时，东京湾事件提供了这样的机会。1964年7月底，美国派遣炮舰运载南越军队袭击东京湾内的北越岛屿，受到北越的还击。为此，约翰逊于8月4日再次派遣驱逐舰进入东京湾挑衅，在南越空军袭击北越海岸两处军事设施后，美国驱逐舰突然报告遭到目标不明的攻击。尽管舰长随后又报告说不能肯定确遭袭击，但是急于为战争升级制造口实的军方领导人根本不愿进一步核查事实。约翰逊下令立即对北越进行“报复性”轰炸，并把早已拟好的决议草案提交国会，将这一事件与希腊、土耳其危机、柏林危机和朝鲜战争相提并论，要求国会授予他在越南问题上包括自由扩大战争在内的各种权力。在政府蓄意制造的紧张气氛中，8月7日国会参、众两院迅速通过了《东京湾决议》。在以后的4年中，约翰逊依据这张空白支票，在美国国会没有宣战的情况下，带领美国进行了一场美国历史上最长的对外战争。根据《东京湾决议》的授权，约翰逊迅速把战火引向北越。1965年初，他借口南越的美国军事基地遭到袭击，下令实施对北越进行全面轰炸的“雷鸣行动”。到年底，美军在北越上空共进行了5.5万多次轰炸，投弹3.3万吨。“雷鸣行动”是美国在越南战争中最严重的升级行为。“它不仅标志战争以巨大的规模扩展到越南北方，而且将成为导致美国地面战斗部队进入越南南

方的关键因素。”[①]

美国的轰炸反而坚定了北越支持南方革命的决心，导致了北越的反升级。从1965年春，北越部队开始大规模进入南越，协助南方的斗争。从5月起，解放武装发动春夏攻势，西贡军队连连败退，士气低下，新兵逃亡率高达50%，军队濒临解体。美国军方强烈要求大规模派出部队，一些重要的政策顾问也警告约翰逊：越南的失败将极其严重地损害美国在亚洲乃至欧洲的威望和地位，因此应毫不犹豫地增派所需的地面战斗部队。7月26日，约翰逊决定增兵5万。这一决定成为美国介入越南战争的分水岭：支持西贡政权作战的这一界线被完全越过，美国从南越政府手中接过了地面战争，美国决策者终于决定在亚洲大陆再打一次地面战争。从1965年3月以保护美国基地为名派遣地面部队开始，越来越多的美国军队涌入越南。1965年年底达到19万人，一年后猛增至40万，到1967年底已高达50万。美国的战争给越南人民带来了无尽的痛苦。据统计，从1965年7月到1967年12月，美国在越南投放的炸弹吨位超过了二战期间整个盟军所使用炸弹的吨位，34.4万人的民解和北越士兵被杀害。但是，民解和北越并没有被吓倒，在苏联和中国的支持下，他们的力量反而得到了增长。越南劳动党决定采取新的战略，在1968年初发动了大规模“春节攻势”，近10万人的兵力同时向南越所有的城市发起进攻，连西贡的美国大使馆也遭到攻击。美国随后则以狂轰乱炸进行疯狂报复。用一位美国军官的话，就是“要拯救这个城市，就必须毁灭它”。就军事角度来讲，民解的“春节攻势”是完全失败的，暂短的胜利在几天以后即被粉碎，人员伤亡惨重。在中央情报局的指导下，南越政府随后实施了旨在逮捕、绑架和杀害民解基层干部的“凤凰计划”，严重破坏了越南党的基层组织。然而，“春节攻势”在政治上却取

① 时殷弘：《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1954—1968》，第194页。

得了成功。在此之前,美国政府刚刚向民众宣布越南战争胜利在望。而此时美国士兵惨死的电视镜头却惊呆了每一个美国人。“春节攻势”在心理上彻底激发了美国国内的反战情绪,新闻媒体、公共舆论、高校以及政府内的反对派都开始批评政府的外交政策和在越南的行为。1968 年 2 月,当影响极大的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著名电视新闻主持人克朗凯特和《华尔街日报》开始预测美国在越南必遭失败时,国内的反战舆论达到了高潮。在驻越美军总司令韦斯特摩兰公开宣称美国取得了巨大胜利的时候,新闻界透露的却是他向总统要求再增派 20.6 万人部队的消息。约翰逊此时也没了主张,只得求助于影响力极大的“圣贤”顾问小组,它由包括艾奇逊和麦乔治·邦迪等人在内的前政府高级官员组成。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圣贤”们最后直言不讳地告诉约翰逊,美国无法打赢这场战争,维持南越反共国家的目标很可能无法实现,美国应当立即使战争降级,然后尽快地从越南脱身。此时新任国防部长克利福德也反对继续派兵。1968 年 3 月 31 日,在全国电视讲话中,约翰逊宣布美国单方面停止对北纬 20 度以北的越南北方地区进行轰炸,令美国人吃惊的是,他同时还宣布将不再参加连任竞选。越南问题最终葬送了约翰逊这位曾有心成为罗斯福第二,在美国实现“伟大社会”理想总统的政治前程。

在接管了战争后,美国对越南进行了难以置信的狂轰乱炸。据统计,美军在越南使用的弹药是整个二战的 2 倍多,美军人均弹药用量增加了 25 倍。为了摧毁民解游击队的生存基地,美国进行了化学战。到 1967 年,被美国化学药物摧毁的植被达到整个南越农田的 13%,到 1971 年,46.6%的丛林和 32%的农田被喷洒了毁灭性的化学药物。美国的战争方式造成了南越平民的大量死伤。据五角大楼综合统计,1965—1972 年南越平民死伤 70～132 万人,美国参议院估计为 135 万。实际上,在美国军方统计的 85 万

“敌军”的死亡人数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平民。[①]更为重要的是，战争导致了南越社会特别是农村社会的解体和毁坏，除了大量的人口死伤外，还造成了巨大的难民潮，整个南越总人口的20%成为难民，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带来了种种严重的社会问题。一位中国历史学家悲愤地指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美国的战争使越南民族在南方丧失了差不多一代人！”[②]

尼克松与战争的结束

60年代后期，反战运动已经成为美国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它与民权运动和学生运动一起，对美国政府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压力。1960年10月，首都华盛顿爆发了25万人参加的反战大示威，这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反战示威活动，把反战运动推向了高潮。在1968年的竞选中，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理查德·尼克松允诺要结束越南战争。但是，要从苦心经营了多年的越南撤出绝非易事。尼克松和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仍然认为越南是对美国信誉和意志的考验，用基辛格的话，“我们不能像换电视频道一样轻易地从一项牵涉2个政权、5个盟国和死了3.1万人的事业当中走开。”1969年7月在访问亚洲途中，尼克松在关岛提出了“尼克松原则”：在强调美国条约义务的同时，他提出美国亚洲盟国的安全应主要由它们自己负责。据此，他提出了与北越进行“谈判”和使战争“越南化”的双轨行动方针，希望既能从越南战争中摆脱出来，体面地结束战争，又能保住南越反共政府。因此，他结束战争的努力和战争的再升级是相辅相成的。

1969年2月，南越民解武装力量再次发动大规模攻势，重创美军和南越政府军。尼克松当即命令轰炸作为“共产党庇护所”的

---

① Gabriel Kolko, Anatomy of A War: Vietnam,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Modern historical Experience, New York, 1985, p 189; p.200

② 时殷弘：《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1954—1968》，第225页。

柬埔寨和老挝。1970 年 3 月,柬埔寨发生军事政变,亲美的朗诺集团推翻了中立的西哈努克亲王。在朗诺的请求下,尼克松立即派兵进驻柬埔寨,又一次扩大美国在印度支那的战争。1971 年初,借口北越利用胡志明小道援助南越,美国又指使南越政府军队进入老挝。1972 年春,以北越越过非军事区向南越发动进攻为由,尼克松授权美国空军对非军事区以北的地区进行袭击。短短两周内,空袭迅速从北纬 18 度北移至 20 度,接着,大批 B-52 战略轰炸机又开始对 20 度以北的海防与河内等城市进行轰炸。颇具讽刺的是,打着结束越战招牌的尼克松把美国在越南的战争进行了空前的升级。有人统计,从 1969 年到 1973 年初,尼克松政府平均每 1 分钟就要向越南投放 1 吨的炸弹,《华盛顿邮报》为此称尼克松成了“有史以来最大的轰炸机”。[①]这次战争升级一直持续到 1972 年 10 月为止,其间美国共在这一地区集结了 5 艘攻击型航空母舰和 200 多架 B-52 轰炸机。从 1972 年 5 月至 10 月,美国共向北越发动 4.15 万架次的空袭。

在战争升级和武力优势的配合下,尼克松开始了他谋求越南问题“越南化”的外交谈判。从 1969 年 1 月下旬开始,美国与越南民主共和国、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以及南越阮文绍政权在巴黎举行会谈,但各方立场相去甚远,不能达成任何协议。于是,基辛格开始直接与北越代表秘密会谈,但直到 1971 年 5 月,双方在撤军、联合政府的组成和战俘等关键问题上仍存在根本的分歧。迫于国内反战和大选的压力,美国在撤军方面作出让步,双方在军事问题的解决方案上开始接近,但是,政治问题仍然死水一潭。1972 年 10 月,北越作出让步,建议成立一个由三方(北越政府、民族解放阵线和南越政府)同等人数组成的“民族和解与和睦全国委员

---

① Walter LaFeber, The American Age: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at Home and Aboard since 1750, p 606

会”，美越双方同意于 10 月 31 日在巴黎签署和平协议。在宣传效果已经达到、尼克松连任胜券在握的情况下，美国政府推迟了协议的签署，双方立场又趋强硬，战火再起。12 月 17 日，美国在海防港重新布雷，并出动大批飞机对北越进行新一轮的轰炸。这一行动引起了舆论和国会的强烈反响，白宫被迫于 1973 年 1 月 8 日重开谈判。1 月 27 日，参加巴黎和会的四方正式签定了《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

至此，美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战争得以结束。它历时 12 年零 26 天，耗资 1360 亿美元，4.6 万名美国人丧命。它所投下的炸弹远远超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各战场使用炸弹的总和。更为悲惨的是，打着“捍卫自由、保障民主”旗号的美国使得几百万越南人在战争中死亡，成千上万人无家可归。美国的炸弹几乎毁灭了越南这个国家，给它留下了永远难以摆脱的物质和精神创伤。越南战争给美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也带来了重大的影响，“越战综合症”成为美国历史上一个永久的词汇，在战争结束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难以消除。在对外政策方面，越南战争打破了维持 20 多年美国决策层内的冷战外交共识，公众对政府的外交支持率急剧下降，约翰逊成为越战的直接牺牲品。从根本上讲，战争严重削弱了美国的力量，破坏了美国的国际形象，最终使这个世界霸主面临从顶峰走向相对衰落的历史转折。

第六章　缓和与全球战略调整

在美国深陷越南战争而难以自拔的时候，60 年代的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苏联在核武器方面的迅速发展使美苏两国在核力量上形成均势，同时它也加强了对第三世界的扩张；戴高乐的法国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欧洲一体化进程加快，与美国的离心倾向加强；拉美国家动荡不定，古巴继续成为美国的一块心病；非洲在接受美援的同时，反美基调不减。在僵化的冷战思想以及由此界定的过于广泛的国家利益的驱动下，冷战时期美国的全球出击终于遭到了挫折和挑战。

伴随着过度的海外扩张以及由此带来的问题，美国政府内外要求收缩力量的呼声越来越高。参议院外委会主席威廉·富布赖特在 1966 年就著书指出，美国过分扩展海外义务的外交政策是在步古罗马和拿破仑帝国的后尘。[①]随后，经济界、学术界以及外交决策层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呼吁政府重新审视外交，收缩美国的海外力量。在一定程度上，1969 年入主白宫的尼克松正是这种呼声的代表。

尼克松曾当过 8 年艾森豪威尔的副总统，尤以强烈的反共立场而著称，一贯主张美国进行全球干预。但是，到了 60 年代后期，他开始越来越多地强调由盟国和当事国承担维持自身防务的主要

① J William Fulbright, The Arrogance of Power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6), p 3

责任。[1]1969 年入主白宫后，他从亚洲政策入手，开始了对外战略的大调整。7 月 25 日，他在关岛发表了一篇讲话，声明在同亚洲盟国关系中，美国一方面要遵守条约义务，另一方面则要求盟国承担防务责任。这份声明后经过补充说明，被正式称为"尼克松原则"，主要内容有三点：1，"美国将信守它的一切条约义务"；2，"如果一个核国家威胁一个同我们结盟的国家的自由，或者威胁一个我们认为它的生存对我们的安全以及整个地区的安全至关重要的国家的自由，我们将提供援助"；3，"如果发生其他类型的侵略，我们将在接到请求时，提供适当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但是我们将指望直接受到威胁的国家承担主要责任来提供其防务所需的人力。"[2]

由此，针对亚洲政策的关岛声明逐渐推广为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在内的对外关系总方针。在它的指导下，美国开始调整维持了 20 多年的全球冷战战略。退出越南战争、打破中美僵局、调整与盟国的关系以及谋求与苏联的缓和成为 70 年代美国外交的主要内容。

中美关系的解冻

尼克松外交战略大调整的切入口是谋求改善与中国的关系。这一战略举动显然出于多种考虑：第一，结束越南战争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中国的合作，美国力量收缩后的亚洲需要一个稳定的、与美国关系正常的中国；第二，美国 20 多年来的遏制和封锁，没有达到阻止中国走向世界的目的，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和地位日益扩大和上升；第三，1968 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和 1969 年中苏珍宝岛事件后，中苏两国关系公开破裂，因此中国可以作为美国对

---

① Richard Nixon, "Asia after Vietnam", Foreign Affairs, October, 1987.

② 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第一册，第 292～293 页。

付苏联挑战的一张牌，使美国在美苏中大三角中处于最有力的主动地位。

上台伊始，尼克松就先后通过法国、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领导人向中国转达美国愿意改善中美关系和结束越南战争的信息。1969 年 9 月，他又指示美国驻波兰大使设法接触中国外交人员，从而促成了 1970 年 1 月和 2 月的两次中美华沙会晤。为了向中国进一步表明和解意图，1971 年 3 月，美国国务院宣布取消对使用美国护照到中国旅行的限制；4 月尼克松又亲自宣布结束已存在 20 多年的禁止美中贸易的法令。

中国方面比较准确地把握了美国的信息。为了抵御来自苏联的巨大威胁，中国领导人逐步形成了联美反苏的战略考虑。1970 年底，毛泽东在会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时表示欢迎尼克松来中国访问，次年 4 月他又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在这种情况下，尼克松决定采取更为主动的行动。7 月 6 日，尼克松在向美国主要新闻机构负责人的讲话中公开表明中国人是“富有创造性的、勤劳的，是世界上最有才能的民族之一……美国政府必须首先采取步骤来结束中国大陆与世隔绝的状态。”此举一方面旨在向新闻界传达政府的政策动向，另一方面则是在为几天后基辛格秘密访华预先吹风。7 月 9 日，基辛格从巴基斯坦秘密来到中国，与中国总理周恩来进行了 17 个小时的会谈。双方商定了尼克松访华的时间，草拟了几天后发布的联合公告。7 月 15 日，尼克松发表电视讲话，宣布“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邀请尼克松总统于 1972 年 5 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①

这一讲话令全世界大吃一惊，美国公众的反应则是赞同和兴

① 冬梅 编：《中美关系资料选编(1971.7－1983.7)》，时事出版社，1982 年版，第 75－80 页。

奋。为了创造良好的访问气氛，美国宣布放宽对华贸易管制，使中国在对美贸易方面取得了与苏联同等的待遇。1972 年 2 月 21～28 日，尼克松正式访问中国，这是历史上第一位美国现任总统对中国的访问，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在此期间，尼克松与中国领导人就两国关系正常化和双方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进行了会谈，28 日，双方在上海发表了中美《联合公报》（也称《上海公报》）明确提出了反对霸权主义的主张。在影响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台湾问题上，双方各持己见，但美方承认了一个中国的立场。《上海公报》标志着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开始，也说明尼克松全球战略调整取得了初步成功。为此，尼克松不无得意地称他对中国 7 天的访问是"改变世界的一周。"[①] 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双方在贸易、文化和科技等方面的关系都取得了新进展。6 月，基辛格第四次来华，向中国通报美苏两国达成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SALT I）的莫斯科会谈内容。1973 年 2 月，基辛格第五次访华，表示美方准备在尼克松第二任期的后两年实现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建立外交关系，同时双方还作出了在对方首都互设立联络处的决定。同年 5 月，双方设立的联络处开始工作。此后，美方多次公开表示积极致力于加速两国关系的正常化进程。

但是，刚刚开始第二届任期的尼克松却因"水门事件"于 1974 年 8 月辞职。由于美苏关系的缓和、美国的国内大选、亲台湾势力的影响以及个人威望等原因，继任的福特总统无力推动美中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不过福特并未放弃中美接近：1974 年 10 月，在众议院通过的一项授权法案中，美国事实上废除了 1955 年的《福摩萨议案》。1975 年 12 月，福特访华，继续肯定美中关系正常化的重要性。但双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歧阻碍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化进

① 理查德 尼克松：《尼克松回忆录》（裘克安等译，马清槐等校），商务印书馆，1979 年版，第 273 页。

程。

到了民主党卡特政府时期，美国在中国提出的与台湾“断绝外交关系、从台湾撤军、废除《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三项建交条件上仍是裹足不前。随着苏联在第三世界攻势的加强以及中国开放政策的实施，要求改善中美关系的美国国内呼声加大，卡特开始加紧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1977 年 8 月，卡特派遣国务卿万斯访问北京，提出把台湾在美国的大使馆降级为联络处、同时让中国的联络处升为大使馆的“倒联络处”的建交方案，遭到中国的拒绝。到了 1978 年，苏联的扩张加剧，中国的战略地位再次上扬，许多决策者力主联华反苏，卡特自己对苏联的看法也发生了急剧变化，促使他下决心接受中方的建交条件，并派遣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访华，推动两国建交的进程。经过半年多的反复交涉与谈判，双方终于就两国关系正常化达成了协议。12 月 16 日，双方同时发表《中美建交公报》，宣布从 1979 年 1 月 1 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并于 3 月 1 日起互派大使。由于在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以及中国统一方式问题上未能达成一致，中美双方在发表建交公报的同时，各自又发表了阐述本国立场的单方面声明。至此，由尼克松开启的美中关系解冻进程，经过福特和卡特两届政府的共同努力终于告一段落。

调整与盟国的关系

尼克松全球战略调整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协调与盟国的关系。二战后美国领导西欧和日本组成了与苏联相对抗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同盟。由于这种同盟是二战后国际实力对比以及冷战的结果，因此随着西欧和日本实力的逐步恢复与增强以及美苏关系的变化，双方在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领域的矛盾日渐凸现。尼克松上台后，主动调整美国与盟国的关系，双方逐渐从战后初期的“主从关系”、50 年代末至 70 年代初的“分化竞争关系”逐渐演变

为70～80年代的“平等伙伴关系。”[①]

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是美国与西欧主要盟国英法两国关系的转折点，由此，西方的同盟关系出现了裂痕。肯尼迪上台后，双方关系得到一定程度的修补。但是60年代美国深陷越南战场，约翰逊政府焦头烂额，无心致力于与西欧的关系。同时西欧的经济日渐壮大，一体化进程加快，美欧双方的经济竞争加剧。在政治和安全方面，法国的戴高乐政府开始发展自己独立的核力量，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将驻法美军赶出法国，并与西德签订《法德合作条约》，力主独立的欧洲政策；西德也提出了“新东方政策”，与东欧和苏联缓和关系；英国虽然强调英美的特殊关系，但它开始加入到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中。总之，60年代，西欧国家对美国的离心力越来越明显。

尼克松上台后，意识到美欧关系出现了严重裂痕，为此，他在出任总统两个月就访问了西欧，提出建立美欧伙伴关系的口号。次年9月，他再次出访欧洲，强调要重新调整美欧关系。接着，基辛格宣布1973年为“欧洲年”，并在北约理事会上保证美国不再以西方盟主自居，甚至建议北约盟军最高司令可以不由美国人担任。1974年，除爱尔兰外的欧共体8国与美国在内的北约15国首脑共同签署了《大西洋关系宣言》，被称为《新大西洋宪章》。它强调美欧间要在“友好、和平和团结的精神”之上“保持密切的磋商、协作和互相信任”；在经济方面，各国承诺“消除各国经济政策之间的冲突根源，并鼓励相互之间的经济合作”；在军事方面，宣言强调西方防务是统一的和不可分割的，美国承诺继续提供保卫大西洋地区的军事力量，不再反对英法拥有独立的核力量，西欧各国则答应为共同安全承担相应的责任。[②]

① 颜声毅：《当代国际关系》，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4页。
② 陈佩尧：《北约：战略与态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86页。

经过这一次调整，美欧关系有了一定的改善。但是，随着西欧国家自身实力的进一步壮大以及开始承担部分防务的责任。到70年代末，它们在政治、经济和外交方面对美国的独立倾向更强。在经济方面，欧洲货币体系成立，开始摆脱美元的控制，西欧共同体的扩大进一步排斥美国的产品；外交上，西欧不再追随美国的亲以色列政策转而谋求改善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反对美国强硬的第三世界政策，主张南北对话。面对这一现象，像尼克松政府一样，卡特政府一方面尽量保持美国的控制和领导权，另一方面谋求拉住西欧，维持西方阵营的团结，并且让西欧国家在防务上承担更多的责任。1978年5月，北约理事会在华盛顿召开会议，规定北约成员国在1979年的军事开支在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必须增长3%，后来又达成协议将3%的增长率维持到1985年。

尽管双方的关系仍然存在很多矛盾，比如80年代初，双方就因为在欧洲部署盟国中程导弹问题以及西欧国家与苏联的输油管道事件的争执导致双方关系跌入新的低点。然而，从尼克松时代开始，美国与西欧关系的调整意义仍十分巨大。对美国来讲，在自身经济状况不济的情况下，凭借盟主的地位，迫使盟国和它一起分担抗衡苏联的成本。对欧洲来讲，美国的核保护伞和驻军大大减轻了苏联带来的的压力。美欧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相互依存和互相配合、经济上既合作又竞争的关系新态势开始成为美欧关系的主流。

美国与日本的关系也走过了类似美国与西欧关系的历程。冷战开始后，美国立即把日本纳入自己对抗苏联的全球战略。1951年美国召开旧金山会议，单独与日本媾和，并签署了《美日安全保障条约》，把日本作为它在东亚的战略要地，并向它提供安全保护。在美国的安全保护以及大量经济援助下，日本的经济在50～60年代迅速起飞，到70年代便上升为国民生产总值仅次于美苏两国的第三大经济强国。随着两国的经济摩擦的增多，日本要求摆脱美

国控制的呼声也越来越高。1960 年 1 月，两国对美日安保体制作了修正和调整，签订了新的《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取消了美国军队干涉日本当地事务的权力，规定在日本部署核武器必须与日本协商等较为平等的内容。据此，日本的自主性有所增强。

尼克松时代，美日关系因冲绳美军基地和日本向美国输出纺织品两个问题又趋紧张。在全球战略调整的背景下，尼克松政府和日本政府经过反复谈判，终于达成协议，于 1972 年 5 月 15 日正式将冲绳归还日本，解决了多年来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与此同时，尼克松政府迫使日本在纺织品出口问题上让步，达成纺织品协议。这两个问题的解决大大有助于两国关系的进一步调整。1969 年，“尼克松原则”把日美的“主仆”关系提升为“伙伴”关系，日本的地位有所提高，成为美国在东亚地区最大的战略盟国。与此同时美国要求日本改变在安全问题上免费搭车的状况，在联合防务中更多地出钱出力。日本遂开始加强常规防御能力，并逐渐改变对美国一边倒的追随外交，转向以两国合作为基础的多边自主外交。

尼克松的战略调整成为美日关系发展的基调。到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日本又公开提出从经济外交转向政治外交，追求日本的政治大国地位。1979 年 5 月，美日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两国将展开“全面性合作”，日本将在世界范围内协助美国承担更多的责任，同时以新日美安保条约为基础，加强自卫能力。80 年代以来，两国的关系发展同美国与西欧关系一样，虽然分歧和矛盾不断，经济竞争加剧，但是双方在安全战略方面仍保持紧密的合作。

对苏缓和的成败

战后 25 年，美国一直在战略武器以及洲际力量投放方面占有优势，而苏联则长于常规力量和地区作战能力。但是到了 1970 年，苏联的战略力量赶上了美国，改变了这种局势，基辛格把此时

苏联崛起比作是本世纪初德国的发展。[①] 两国在核领域的这种大致均势使得双方“以谈判代替对抗”成为可能。从尼克松开始，美苏开始了漫长的限制核武器谈判。以此为契机，两国关系也开始走向缓和，主要表现在战略武器控制谈判以及制度化的首脑会晤方面。

裁军和武器控制历来是美国政府用于削弱对手、维持自身优势的有效外交手法。70 年代，尼克松在控制战略核武器方面的外交努力更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他使用软硬两手，在公开赞成战略武器谈判的同时，提出了“谈判的方式和时机要同时能促进悬而未决的政治问题解决”的联系原则，把苏联在其他方面的让步作为战略武器谈判的要价。与此同时，他宣布建立反弹道导弹的“卫兵”计划，进一步支持继续开发并部署多弹头分导式导弹，宣扬“充足论”[②] 的新核战略，以谋求进一步加强美国的核能力。

1970 年 11 月，美苏双方就核武器控制的首轮谈判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举行，但未有重大进展。从 1971 年开始，基辛格与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开始秘密会谈，达成了原则协议。经过基辛格和尼克松访苏的推动，1972 年 5 月两国最终达成了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就反弹道导弹的部署以及限制进攻性战略核武器达成了部分一致，签订了《美苏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条约》和《苏美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某些措施的临时协定》。双方还建立了常设协商委员会处理条约实施的日常事务，并承诺不干扰卫星侦察等有效的核查手段。

---

① J·斯帕尼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外交政策》（段若石 译，林地 校订），商务印书馆，1992 年版，第 234～240 页。

② 美国的战略核力量主要是以针对在大城市的平民和工业设施为目标，即以“确保摧毁”为目标。尼克松上台后，放弃了“确保摧毁”而改用“充足论”的提法，旨在把美国的核战略不仅与灭绝平民而且还要与摧毁军事目标相联系，这就在数量与技术上对美国的核武器提出了新的要求。

以 SALT I 为代表,1972 年成为军备控制成效显著的一年。[①]它是苏美双方就自身的战略武器限制达成的第一个较大范围的协议,标志着两国关系的缓和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也成为两国领导人进行国内外宣传的政治资本。但是,美国并非为缓和而缓和,就在签署协议的当天,它还宣布了一项包括加速发展三叉戟潜艇和 B-1 轰炸机在内的战略力量改进计划。

1972 年 11 月,两国又开始了 SALT II 的艰苦交涉。但 1973 年 6 月和 1974 年 7 月的两次首脑会晤和日内瓦的部级官员的多次磋商都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实际上,在 SALT I 协议达成后,双方进行谈判的动力都有有所减弱。尼克松当初致力于 SALT I 谈判的主要动机在于扭转他所面临的不利的外交形势。越战的结束和中美关系的改善使美国的国际国内环境都有所改观,由此,美国外交决策者日益把战略武器谈判看成是对苏总战略中的一环,把两国任何局部的缓和同苏联的整个国际行为联系起来。1974 年 8 月福特继任总统后,虽然也在战略武器控制上下了功夫,其中重要的举动包括 1974 年的海参崴首脑会晤、1975 年的日内瓦会谈以及 1976 年初基辛格赴莫斯科的谈判,但最终皆一无所成。1977 年卡特上台后,决定以军备控制谈判来稳定美苏关系,向勃列日涅夫呼吁重开 SALT II 会谈。经过约 300 次会谈,到 1978 年 7 月双方才作出较大让步。1979 年 6 月 18 日,卡特和勃列日涅夫在 SALT II 条约和有关文件上签字。然而,正当美国国会审批这一条约时,恰逢苏联军队入侵阿富汗,参议院推迟了对 SALT II 的表决,并就此搁浅。

70 年代美国对苏缓和还表现在较为频繁的两国首脑会晤方面,而且主要集中在尼克松时期。从 1970 年开始,尼克松积极谋

---

① 海底条约自 1972 年 5 月正式生效;关于禁止生产和储存细菌武器条约也在 1972 年 4 月得到了美、苏、英的签署;美苏还在 1972 年决定下一年召开北约和华约削减武装力量的会议。

求与苏联领导人会面,但苏方因美国入侵柬埔寨反应冷淡。后来,随着勃列日涅夫领导地位的加强以及苏联"缓和"政策的出台,加上中美关系的改善,苏联领导人开始积极回应美国的呼吁。1972年5月22日,尼克松访问苏联,这是自罗斯福在1945年参加雅尔塔会议以来第一个踏上苏联国土的美国总统。访问期间,双方达成了SALT I协议、签署了《美苏关系基本原则》以及包括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扩大贸易、控制污染、医药和公共卫生、科技合作等内容在内的等一系列协议。1973年6月18日,勃列日涅夫应邀访美,举行了第二次首脑会晤,签署了有关防止核战争、进一步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谈判的原则、和平利用原子能及其他领域的合作与交流的一系列文件。1974年6月,尼克松再次访苏,就进一步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限制地下核试验、控制环境战以及在经济、技术、能源等方面与苏联达成新的合作交流协议。

1974年11月23~24日,福特总统在海参崴与勃列日涅夫举行"工作会晤",发表了《关于进攻性战略武器的联合声明》。此后,两国关系的发展虽时起时伏,但两国领导人的会晤却从未间断。1975年7月,在赫尔辛基召开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上,福特会见勃列日涅夫。1979年6月,卡特与勃列日涅夫举行了维也纳会谈,并在SALT II条约和有关文件上签字。

以战略武器控制谈判为主要标志,在频繁首脑会晤的带动下,70年代特别是70年代前半期美苏关系在较大范围内得到了缓和,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方面开始交流与合作。特别是在贸易方面,国会通过了新的出口管制法,修正了1969年到期的1949年的对苏出口贸易限制,扩大了对苏联和东欧的贸易。1972年5月的《美苏关系基本原则》更是大大带动了两国的经济交往,两国的贸易有了很快发展。但是,福特上台后,美国国会中的保守势力力图把美苏贸易和苏联允许其境内的犹太人自由移民这一国内政治问题挂钩,并在1974年底通过了著名的《杰克逊—

瓦尼克修正案》(Jackson - Vanik Ammendment),以苏联是否允许自由移民作为苏联获得美国贸易最惠国待遇的条件,苏联拒不接受这一限制。为此,苏联在1975年通知美国,不再执行1972年的美苏贸易协定,两国的贸易关系受阻,缓和受挫。

伴随着两国关系以及欧洲等重要地区的缓和,美苏两国在第三世界的争夺却日渐突出。到70年代中期,苏联的武器出口首次超过美国,占全球武器出口的30%。叙利亚、伊拉克、印度和越南成为苏联武器的主要进口国。这一时期,在非洲的几内亚、莫桑比克、安哥拉、索马里、阿拉伯半岛的南也门、印度支那、甚至在美国的后援院拉丁美洲都处处留下了苏联扩展的影子。美国一方面努力抵制苏联的扩张,另一方面也加强了自身在一些重要战略地区的政策,防止苏联影响的扩散。中东地区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从1970年开始,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爆发了接连不断的冲突,美苏两国分别支持一方,逐渐卷入争端。9月,亲西方的约旦政府开始镇压境内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苏联表示要干预,叙利亚也蠢蠢欲动,中东局势顿时紧张。为此,尼克松制定了援助以色列和美国直接干预的应急方案,[①] 最终迫使苏联让步,约旦危机得以平息。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又称为"十月战争"或"赎罪日战争")爆发,美国一方面大力援助以色列,抵抗石油输出国组织对美国实行的石油禁运,另一方面进行积极的外交斡旋。停战后,为了促使阿以脱离接触,国务卿基辛格继续他频繁的"穿梭外交",终于在1974年1月促使埃及和以色列签署了两国军队在西奈半岛脱离接触和重新开放苏伊士运河的协议;5月,叙利亚和以色列达成相似的协议。埃及和叙利亚两国接受美国的调停,标志着美国在中东地位的加强和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的改善。6月,尼克松在其总统生涯结束之际,对埃及、约旦、沙特阿拉伯、叙

① 理查德·尼克松:《尼克松回忆录》下册,第153页。

利亚和以色列5国进行了访问，再次向世人表明美国才是中东外交舞台的主角。

福特时期，促成阿以缓和、进一步排斥苏联仍然是美国中东政策的核心。为此，美国推动埃及和以色列达成了第二个西奈协议，进一步增强了美国在中东外交舞台上“仲裁人”的地位。卡特时期，美国垄断了中东外交，积极促和。1978年9月，他邀请以色列总理贝京和埃及总统萨达特在戴维营举行秘密会谈，达成了埃以和平条约框架。1979年3月，卡特在中东进行穿梭外交，举行一系列的会议，终于促成了《埃及以色列和平条约》的签署，从而消除了中东战争再次大规模爆发的可能性。埃及也被纳入到美国的反苏阵营而成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一个重要的战略支柱。此后，埃及和以色列一起成为美国军援的最大对象，因此，美国驻开罗大使馆也是美国在世界上最大的外交机构之一。[①]1979年12月27日，苏联入侵阿富汗，美国反应强烈，立即停止对苏粮食出口，终止高技术项目的出售，取消了大部分文化与科技交流，延缓新领馆的开放，停止苏联在美的官方活动，并抵制次年在莫斯科召开的奥运会。卡特政府以此为契机，加强了对中东波斯湾的争夺。1980年1月，卡特在国情咨文中向苏联发出警告：“任何外来力量企图控制波斯湾的尝试，将被视为对美国利益的重大侵犯，这种侵犯将遭到包括军事力量在内的一切必要手段的回击。”这一声明被称为“卡特原则”，标志着美国70年代对苏缓和政策的终结。

---

① L Carl Brown, Centerstage: American Diplomacy since World War II, New York, 1990, p 213 (zi812)

第七章　确立全球霸主地位

经过70年代的战略调整，美国外交的被动局面大为改善，“越南综合症”逐渐淡忘。进入80年代，美国加强了与苏联的军备竞赛以及在第三世界的争夺，最终拖垮了苏联，结束了冷战。冷战的胜利，使美国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以美国模式重塑世界的观念重新抬头，并构成了美国冷战后时期的外交主题。

赢得冷战的胜利

从70年代末开始，在美国外交决策层内出现了一股重回冷战的思潮。他们认为缓和非但没有遏制住苏联，反而束缚了自己的手脚，助长了苏联的扩张。1980年上台的里根就是这一思想的代表。入主白宫后，他开始对苏联进行“新冷战”，美苏关系又回到了40～50年代的严重对抗。在美国军备竞赛的巨大压力下，苏联国内领导层的代际更换导致内外政策发生重大变化。里根又不失时机地打出缓和的大旗，加强对苏的和平攻势。里根的这一软硬两手，加速了苏联帝国的崩溃。

里根之前的美国总统大都是律师、将军或教授出身，只有他出身于好莱坞电影明星。从政后，里根曾在1967—1974年担任美国第一大州加利福尼亚州的州长。在政治上，他以保守著称，在对外政策方面，他以反苏反共闻名。凭借较好的口才和媒体形象，他简单化的思想对美国公众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他激烈抨击苏联，公然指称苏联是“非法帝国”和“邪恶帝国”，指责其领导人为了实现

自己的目的，不惜“犯罪、撒谎和欺诈”。在贬低苏联的同时，他极力标榜美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和平力量”，激发美国公众的“美国例外主义”。正是打着对内“振兴经济”和对外“重振国威”的口号，他获得了美国公众的普遍支持，以接近古稀之年，登上了总统宝座，成为当选总统中年龄最大的一位。4 年后，他又以压倒多数获得连任。

与其强烈的反共观念相关联，里根强调对外政策的实力原则。他认为对待苏联的最有效政策就是“它在哪里干涉，就在哪里同它对抗”，因此主张大力加强美国的军事实力。他坚决反对与苏联达成任何军备控制协议，反对卡特的 SALT II 协议。他强调只有保持军事上的绝对优势才能最终保证美国的安全，并下决心要重建美国的军力，确保可以打赢针对苏联的全面战争，应付苏联在第三世界的挑战，从而挽回美国世界头号军事强国的地位。[①]

50 年代的艾森豪威尔政府强调战略核武器的威慑力，60 年代肯尼迪政府加强了灵活反应部队，以打赢常规战争。80 年代的里根政府则双管齐下，提出了开支总额达 1.5 万亿美元的 5 年防务计划和耗资 1800 亿美元旨在增强战略核力量的 6 年计划。一方面，他加强常规战争的能力，提出低烈度的常规战略，并开始扩军。1980—1988 年，美国的兵力增加了 8.8 万多人，其中海军增加 6.6 万多人。里根把发展海军、控制全球海上通道作为重点，提出要在 10 年内建立 15 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和 600 艘海军舰只。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曾指出，里根政府从事了美国历史上和平时期最大的扩军建设。[②] 另一方面，他大力实施以高技术为龙头的武器现代化，提出既要加强进攻性战略核武器和新一代中程导弹的开发应用，还要开发与部署海、陆、空全方位的有效防御设施，以抵御苏联

① Warren I. Cohe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1945 – 1991, pp 220～221.

② 转引自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下册，第 855～856 页。

先发制人的攻击，确保美国绝对安全和有效的报复力量。这就是他有名的“战略防御计划”(SDI，又称“星球大战计划”)。1984—1988年，仅用于该计划的研制费用就多至120亿美元，同一时期陆续部署的新式武器还包括：MX多弹头重型洲际导弹、空中发射的巡航导弹、海上发射的战斧巡航导弹、三叉戟潜射洲际导弹、地对空爱国者导弹、新型核动力航空母舰、B-1重型轰炸机、三叉戟II型核潜艇、更加精确的常规制导跟踪武器以及新式通讯指挥系统等。1988年初，里根在他的最后一次的国情咨文中洋洋得意地标榜：7年前的美国是软弱的，今天美国则是强大的；经过努力，“崇敬美国”已经取代了“谴责美国”，我们重振了美国的防务。[①]

与加强军备努力相一致的是里根强硬的对苏政策。最具象征意义的外交行动是，里根在其第一任期内取消了自50年代以来美国各届总统坚持的与苏联首脑会晤的做法。另一个有趣的例子是苏联大使多勃雷宁首次拜会国务卿黑格时的插曲。由于长时间驻美，多勃雷宁成为华盛顿的外交使团团长，享有直接驱车至国务院大楼地下车库、乘坐非公用电梯直通国务卿办公室的特权。但1981年1月29日驱车来到国务院时，他却被临时告知这一特权已被取消，不得不像其他大使一样步行穿过大厅并乘公用电梯上楼。在唇枪舌剑的会谈中，黑格警告说不是美国敌视苏联，而是美国受到苏联种种过度行为的伤害，美国下定决心准备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来迫使苏联改变政策。[②]这一插曲不禁使人联想到1945年杜鲁门首次会见苏联外长莫洛托夫时的类似景象。到1983年底，美国开始在西欧部署中程导弹，作为报复，苏联中止了中程核力量(INF简称中导)谈判和削减战略武器会谈(START)、加快和扩大在中欧部署SS-20中程导弹、声明部署更多的核潜艇以及

① 《国际形势年鉴》，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1989年，第263～264页。

② Al Haig, Jr , Caveat, 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 1984, pp. 100～104.

拒绝参加1984年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奥运会,两国关系跌到了整个战后时期的最底点。

里根政府并不想单枪匹马地与苏联展开全球角逐。他的盟国政策特别是对西欧政策目标是他强化冷战战略的一部分,使他们服从美国的战略需要,共同遏制苏联。为此,里根力图改变盟国的缓和气氛,推动盟国采取对苏强硬立场,由此导致了西方联盟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公开争吵。这主要体现在天然气管道和部署中程导弹两个事件上。西德、法国、意大利和奥地利等欧洲国家从60年代末以来就和苏联有天然气交易。70年代末,他们与苏联达成协议,计划由欧洲国家提供110亿美元的贷款,用于铺设从西伯利亚到西欧的天然气管道,苏联则在管道建成后以向西欧国家输送天然气来偿还贷款。里根上台后,马上对此交易提出异议,并提出以美国的燃料替代苏联的天然气的建议,遭到西欧国家的拒绝。1981年,美国借口波兰宣布军管对苏联进行包括能源在内的制裁,并希望西欧国家放弃天然气交易,加入美国的制裁行列。西欧国家再次拒绝,里根大为恼火,单方面宣布扩大对苏制裁范围,禁止美国的海外子公司和持有美国公司许可证以及使用美国专利的外国公司向苏出口其生产设备。这一决定严重影响了天然气管道项目的实施,西欧国家指责美国损害盟国的利益。欧洲共同体分别于1982年7月和8月两次正式向美国提出抗议,要求撤销禁令。里根政府置之不理,8月23日,法国政府决定征用美国设在法国的一家子公司,美国立即以禁止向该家公司和另一家公司出售技术和设备进行回击,双方争吵愈加激烈。美国决策层内也出现了分歧,该事件成为国务卿黑格辞职的原因之一。经过半年多的交涉和谈判,美国终于在11月13日宣布取消对苏天然气管道制裁,西欧国家则同意研究替代苏联能源的方案、加强对苏物资的出口控制、协调与美国的出口信贷制裁等,事件才得以平息。再就是美国在欧洲部署中程导弹问题。70年代末,苏联开始在欧洲部

署先进的 SS－20 中程导弹，取得了在欧洲战区明显的核优势。北约成员国的外长和国防部长为此在 1979 年 12 月通过了一个“双重决定”：一方面决定对北约战区的核力量进行相应的现代化，另一方面支持美国和苏联尽快谈判，如果在 1983 年底前还达不成有关协议，就在欧洲部署 572 枚潘兴 II 式中程导弹以对抗苏联。里根一上台，马上制定了体现实力原则的“先部署，后谈判”的方针，决定尽快在欧洲部署导弹。有关欧洲国家都持反对态度，除法国以外的各个国家都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群众性反对部署导弹的反美游行示威。尽管美国最终如期部署了导弹，但这是北约成立 30 年来遇到的最严重的危机，反映了欧洲盟国在对苏政策上与美国存在着巨大分歧。[1]

里根的反苏强硬姿态最明显地表现在他的第三世界政策上。中美洲的小国萨尔瓦多是个突出的例子。1981 年，萨尔瓦多反政府游击队向政府军发起猛攻，亲美政权岌岌可危。里根立即行动起来，以此大作文章，把游击队和苏联扩张威胁相联系，大肆宣传“萨尔瓦多象征着在拉美地区古巴的冒险主义和苏联的战略野心两者相结合的危险态势”。[2]2 月 23 日，国务院发表了《共产主义在萨尔瓦多的干涉》白皮书，“证明”苏联和古巴自 1979 年开始对萨尔瓦多反政府武装力量进行支持。以此为借口，里根政府首先派人前往南美洲和欧洲进行舆论宣传，争取盟国的支持；接着加强对古巴的封锁，调集大批军舰和两艘航空母舰到古巴邻近海域进行军事演习；最后，强化对萨尔瓦多政府的支持，提供 2500 万和 6350 万美元的紧急救援，并派遣军事顾问帮助萨尔瓦多政府训练军队等。但是，萨尔瓦多的局势仍未有大的改观，美国政府认为主要原因是萨尔瓦多游击队得到了尼加拉瓜政府的支持，于是，从

---

① 斯帕尼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外交政策》，第 379～388 页。

② Al. Haig, Jr., Caveat, p. 125.

1982 年下半年开始，对该国的桑地诺民族主义政府进行全方位的制裁和颠覆。1983 年 10 月，加勒比海小国格林纳达发生军事政变，美国打着保护侨民的名义立即出兵，组成亲美的新政府，把格林纳达重新纳入美国的势力范围。

即使在加强与苏对话和谈判的 80 年代后半期，里根的第三世界政策依然以反苏和追求美国霸权为标志。在中东，里根寻求同时拉拢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加入反苏同盟，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在中亚，里根政府大力支持阿富汗游击队反对苏联军队和苏联扶植的傀儡政府，终于在 1988 年 8 月促成了停火协议，促使苏联答应撤军。在东南亚，继续支持柬埔寨的一些反政府力量；在南部非洲，坚持把解决南非内部种族问题与驱逐在安哥拉的古巴和苏联势力挂钩，说服国会取消对安哥拉反政府武装援助的禁令，积极支持"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联盟"（安盟，UNITA）这一反政府武装，最终在 1988 年 12 月促成古巴从安哥拉和南非从纳米比亚的撤军协议和 1990 年的纳米比亚大选；在中东，发生了针对美国的恐怖活动后，1986 年 4 月对利比亚实施空袭报复。[①]

为了与苏联对抗，里根政府甚至不惜干出违反美国法律的勾当，这就是 1984—1986 年间的"伊朗门"事件（Iran - Contra affair）。1982—1983 年美国对黎巴嫩的军事干预引起了中东强烈的反美情绪和针对美国的恐怖活动，1983 年 4 月，美国驻黎巴嫩大使馆被炸，16 个美国人死亡；10 月，贝鲁特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营房受到袭击，241 人死亡。1984—1985 年间，在贝鲁特有近 10 名美国人被亲伊朗的穆斯林游击队扣为人质。为解救美国人质，从 1985 年年中开始，里根政府违反国会禁止向伊朗出售武器的法律，向伊秘密出售武器来求得人质的获释。随后，里根政府又把售

---

① James M. Mccormick, Ameican Foreign Policy & Process, 3rd edition, Itasca, *IL*: F. E Peacock Publishers, Inc., 1998, pp

武器的所得秘密转移给尼加拉瓜的反政府武装，这又违反了国会不许支持该武装的禁令。事情败露后，里根拒不承认参与此事，结果导致国会与白宫关系十分紧张，也一度影响了政府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和对政府外交的支持。"伊朗门"事件充分反映了里根反共反苏政策的决心。

里根的重整军备，加强与苏联争夺和对抗的政策给美国的经济造成了沉重的负荷，每年的军事预算高达3000亿美元，联邦赤字居高不下。但苏联比美国还要困难，它不得不以只相当于美国1/3强的经济实力维持与美国大体相当的军事实力，这种穷兵黩武的政策致使苏联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开始提出"新思维"，主动向西方求和。有鉴于此，里根摇身一变，迅速调整他的对苏强硬政策，成为和平演变的斗士。1984年10月，国务卿舒尔茨公开宣称今后苏联在世界各地的举动不会与美苏两国关系自动挂钩，"如果想建立一个面向下个世纪的稳定的美苏关系，我们得学会用长远的眼光和基于谈判与实力并重的战略。"①接着，里根也表示要谋求建立良好的美苏关系，要通过和苏联的谈判来减少国防开支。

1985年1月，两国开始了中导、战略核武器和整个防务问题以及空间核武器的三个轨道的全方位会谈，经过1986年冰岛的雷克亚未克和1987年华盛顿两次首脑会晤后，谈判速度加快，达成了中导条约：双方在3年内消毁所有的中程导弹，在18个月内消毁所有的中短程导弹。两国将永远禁止一切有关这种导弹的部署、生产、储存和维修的设施，为此，还成立了专门的核查机构。

美苏关系缓和的另一标志是两国间频繁的首脑会晤。里根在第一任期内完全取消了前几任政府坚持的首脑会晤，而在其第二

① James McCormick, ed , A Reader in Amerian Foreign Policy, (Itasca, IL: F E P eacock Publishers, Inc , 1986), p 382

任期内，他和戈尔巴乔夫举行了比以往任何领导人都多的会晤。1985年11月两人在日内瓦举行了第一次会晤（亦称“炉边会晤”Fireside Summit），建立了私人友谊，并就今后的合作奠定了基础。第二次是1986年11月11～12日在冰岛的雷克亚未克，此次会晤推动了双方正在进行的军控谈判，特别是中导谈判，双方还就共同削减50%的核武器达成了协议；1987年11月在华盛顿的第三次会晤中，两人签署了中导条约，同时讨论了进一步削减战略核武器问题。1988年5月29日至6月2日，双方举行了第四次会晤，交换了中导条约的批文，并就其他方面的军控以及双边和国际事务交换了意见；是年底，戈尔巴乔夫在纽约拜别了里根，并和即将接任的布什举行了会谈。

1989年上台的布什政府基本上承袭了里根的两手政策。一方面，布什政府提出了“超越遏制”战略，宣布只要苏联减少其全球干预，减少东欧驻军，放弃勃列日涅夫原则，开放铁幕，在第三世界地区与西方国家合作，支持政治多元化和人权等，美国就会谋求良好的美苏关系，完成削减战略武器会谈并寻求国会批准另外两个限制核试验以及开放天空的协议。另一方面，在表示继续致力于军控和裁军的同时，布什政府又强调美国将继续保持强大的国防力量、进一步发挥MX导弹的威慑能力、继续SDI计划、开发和研制新型的移动导弹。1989年11月，布什和戈尔巴乔夫在马尔塔举行首脑会晤，美国以支持苏联的国内改革、支持苏联加入世界经济体系等许诺换取了苏联对东欧剧变的认可和接受，两人还正式宣布美苏冷战结束。在内忧外患的包围中，苏联帝国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它既不能承受里根重回冷战的强硬挑战，也经不起美国的经济利诱与和平攻势。在里根和布什两届政府软硬两手政策的持续压力下，苏联再也无力承受军事竞争的压力，主动退出了冷战。美国的对苏战略目标开始转为按照美国的模式对苏联进行重建，就像是二战后对待日本和西德那样，用美国人的话说，就是要

让苏联回归国际大家庭。在美国的安排下，苏联以观察员身份加入了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ATT)。1990年6月美苏的华沙首脑会晤又就销毁化学武器、加快削减战略武器会谈和进一步加强文化交流等达成了协议，美国政府继续以两国经济正常化和最惠国待遇等条件迫使苏联放开其移民政策。12月，美国向苏提供了10亿美元的冬季食品援助，几个月后，声明再次提供15亿美元的农业贷款。1991年7月，削减战略武器会谈结束，双方在莫斯科的首脑会晤中正式签署相关条约，据此美苏将减少远程核武器，减少核弹头以及核武器发射装置，建立了包括12种类型的核查制度。

伴随着在军事上的逐步削弱和经济上对西方依赖的日益加深，苏联帝国的政治也走到了尽头。1992年底，克里姆林宫上空飘扬了70多年的红旗悄然落下，俄罗斯的三色旗重又升起，苏联帝国几乎在一夜之间分崩离析。一个超级大国就这样解体了，给世人和后人留下无数的感叹和疑问。

创建世界新秩序

在成功地逼降苏联的同时，像以往两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所发生的一样，美国又开始了重塑世界的征程。不同的是，美国这一次既没有难以克服的内部强大的反对势力，也没有碰到像二战后来自苏联的外部挑战。这一现象的出现与美国未雨绸缪的外交政策休戚相关。从70年代后半期开始，美国谋求"美国治下的和平"的努力已初露端倪。从卡特的人权外交、里根对在第三世界政策的变化、布什的超越冷战和创建世界新秩序的提出到克林顿明确的冷战后美国外交的三大支柱，清晰地表露出美国确立全球霸权的目标和手法。

上台伊始，卡特总统就宣布从尼克松－基辛格的现实政治转向"人权外交"，声称"对人权所负有的义务"是"美国对外政策中的基本信条"，人权是美国对外政策的"核心"和"灵魂"，"树立美国理

想主义的榜样，是处理外交事务的一种切实可行的和现实的态度，道德原则是行使美国武力和扩大影响的最好基础”。[①]

在实践中，卡特人权外交有两个重点地区：苏联东欧集团和第三世界。针对苏联压制国内持不同政见者的做法，卡特政府展开舆论攻势，敦促国会通过谴责苏联侵犯人权的决议，增加对自由欧洲广播电台拨款，宣扬美国制度的优越，加大渗透和宣传力度。但同时，为了不影响与苏改善关系的大战略，卡特对苏人权外交基本上是审慎的，比较注意把苏联的人权问题与其他问题分离。特别是到他任期的后期，人权攻势相对减弱，并最终退居次要地位。相比之下，卡特政府对第三世界的人权外交一直显得十分强硬，其目标是“争取第三世界独裁国家内部的民心，促其政府进行民主改革，减少苏联插手第三世界国家的机会和可能性，这也是卡特‘以火灭火’战略的反应。”[②] 为了推行人权外交，国务院专门成立了人权问题特别工作局，每年就各国的人权情况提出报告，用来作为美国政府制定军事和经济援助计划的参考。像许多新出台的美国外交政策一样，拉美再次成为人权外交的试验场。在人权的旗号下，乌拉圭、阿根廷、智利、尼加拉瓜、玻利维亚和海地等许多国家因人权问题在获得美国经济和军事援助方面受到了限制，迫于经济压力，它们不得不进行选举，走向美国所要求的“民主化”道路。值得注意的是，同一时期智利的独裁者皮诺切特、海地的杜瓦里埃都得到了大量的援助，菲律宾、南朝鲜和印度尼西亚等独裁政府依然一如既往地保持着和美国的亲密关系。这种“双重标准”体现出人权外交服务于美国对外战略的实质。

除了卡特个人的因素外，美国的人权外交在一定程度上是60～70年代美国国内民权运动在外交上的反映。它旨在重新树立

① 吉米·卡特：《保持信心》，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版，第129页。
② 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下册，第797页。

美国的海内外形象，减少越南战争后遗症的阴影，激发民众对政府外交政策的支持。从长远来看，人权外交带来的是反映“美国例外论”的优越感以及力求以自身的模式重塑世界秩序的霸权心态，它既服务于冷战，也表明美国外交开始摆脱冷战中一切以苏联划线的束缚。

战后美国对待第三世界国家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到了冷战的左右。尽管不乏对第三世界国家动荡性质的正确认识和一些富有创新的政策，但几十年来的主流政策还是受到反共意识形态的牵制而显得简单化。[①] 因此，许多年来，只要第三世界（某些国家）反共反苏，美国便一概加以大力支持。随着美苏冷战的缓和，第三世界问题的内部特性日益明显，美国的政策也逐步摆脱冷战思维的框架。80 年代后期，里根对菲律宾、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南非的政策比较鲜明地体现了这种变化。

由于马科斯总统的反共姿态以及菲律宾的石油资源，美国一直支持这一独裁政府。1986 年通过舞弊，马科斯第四次当选菲律宾总统。但菲律宾人民多年的不满一下子爆发出来，转而支持被马科斯暗杀的著名政治家阿基诺的遗孀、阿基诺夫人。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次美国站在了阿基诺夫人的一边，并成功地迫使马科斯出走夏威夷，结束了其长达 21 年的独裁统治。在中东，由于美国和以色列的特殊关系，自 1975 年埃及和以色列签署西奈协议以来，美国一直以承认以色列的生存权、接受联合国有关巴勒斯坦分治的决议以及放弃恐怖活动等条件拒绝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发生任何联系。卡特时期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著名黑人民权领袖安德鲁·杨就因未经授权而与巴解代表接触而被迫辞职。1988 年底，巴解组织主席阿拉法特开始转变立场，寻求政治解决巴勒斯坦问

---

① 时殷弘，“与复杂形势相违的简单化政策：论冷战时期美国在东亚的安全政策”《美国研究》1997 年第二期，第 7～26 页。

题的方案。美国立即作出了相应的政策调整，开始与巴解组织进行对话，中东和平进程遂迈入新的历程。在南非，美国虽然一直标榜反对种族隔离政策，然而由于美苏两国在安哥拉争夺的牵制，里根政府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一直采取“沉默外交”(quiet diplomacy)，拒绝参加国际社会对南非的制裁。直到1986年，美国国会才通过有关反对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法律，里根政府也开始公开谴责南非政府，并采取有关制裁措施，迫使南非政府进行改革。

这三个案例反映了里根政府在美苏关系开始松动的背景下调整其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政策，即把追求第三世界的稳定和民主自由化的重要性置于反共的目标之上。这一变化和卡特的人权外交相衔接，逐步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新主题。

1989年乔治·布什入主白宫后，继续里根的外交政策。在他任期内，主导战后国际关系40多年之久的冷战结束了，国际形势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应付剧变的国际形势的同时，布什政府也看到世界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为此，他提出了建立“世界新秩序”的口号，呼吁其他国家和美国一起致力和追求“一个新时代，没有恐惧的威胁、全力追求正义与和平，一个全球东、西、南、北国家都繁荣稳定与和睦相处的时代”。他特别强调美国在这种新秩序中的特殊作用，“两个世纪以来，美国一直是全世界自由与民主的榜样，几代人以来，美国领导、捍卫和光大了自由斗争……美国的领导权是必然的……我们对争取自由有着独一无二的责任。”显然，布什追求的完全是美国领导下的“世界新秩序”。

布什的“世界新秩序”在1990—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得到了充分的实践。80年代，由于伊拉克重要的地理位置、丰富的石油资源以及平衡美国的仇敌伊朗的价值，美国一直谋求与伊拉克保持较为和谐的关系。在两伊战争，1987年伊拉克误击美国船只、1990年夏伊拉克指责科威特石油压价并要求石油输出国组织提高石油价格等事件和问题上，美国政府一直保持较为克制的态度。

但是,1990年伊拉克悍然入侵、吞并科威特的行动,完全破坏了国际法准则,损害了美国追求"美国治下的和平"的目标。布什政府反应强烈,立即宣布冻结伊拉克政府在美国的所有资产并采取贸易制裁,命令15万美军屯兵伊拉克边境以"防止可能的入侵",并要求它从科威特无条件撤军、恢复科威特的主权、保护伊拉克境内的美国公民等。在伊拉克侵略问题上,美苏两国迅速协调立场,布什和戈尔巴乔夫在赫尔辛基会晤,共同声明"伊拉克的侵略行为是不可容忍的"。1991年2月22日,在联合国授权下,以美国军队为主的50万多国部队从海、陆、空向伊拉克发起全面进攻,5天以后,伊军被赶出科威特。

布什的"世界新秩序"也体现在美国对俄罗斯的外交政策中。苏联解体后,布什一方面迅速承认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独立地位,另一方面加快和俄罗斯的接触。1992年2月和6月布什先后在戴维营和华盛顿两次与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会谈,以贸易最惠国待遇和经济援助等条件拉拢俄罗斯,促成两国正式签署进一步减少核弹头、削减战略核导弹运载工具以及禁止在大型陆基导弹上装载多核弹头等新的军控条约。1992年4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决定向俄国提供240亿美元的援助,促进俄罗斯经济市场化和防止"独裁统治的重新崛起";10月,美国国会通过了《支持自由法》(Freedom Support Act),向俄国提供4.1亿美元的新援助,批准了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金支持,其中包括建立30亿美元的稳定俄罗斯货币基金。另外,美国还特意从自己的防务开支中抽出8亿美元用于俄罗斯销毁苏联有关核武器工作。

随着冷战的结束,历史上一向多事的巴尔干半岛陷入混乱。南斯拉夫联邦的几个共和国纷纷独立,独立的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因民族问题先后陷入内战。布什政府采取谨慎的态度,支持联合国对南斯拉夫联盟的制裁措施以及北约在波黑设立"禁飞区"的政策,力求维持巴尔干的稳定。1991

年9月,中美洲小国海地发生了政变,民选的阿里斯地德(Jean-Bertrand Aristide)政府被推翻。布什政府不但为阿提供政治庇护,而且谴责军政府是独裁统治的非法政府,并采取停止经济援助、冻结海地在美资产、动员美洲间国家组织实行禁运等措施压迫海地政府下台。1992年索马里政府垮台,国内陷入内战与饥荒。7月,联合国开始组织救援,12月,即将离任的布什政府专门派遣2.8万人的部队前往索马里领导人道主义救援行动,实施"恢复希望行动"(Hope Restore Operation)。这种以"人道主义干预"为名的军事行动成为布什"世界新秩序"的重要内容,并为后来的克林顿政府继承和发展。

1992年上任的克林顿继承和发展了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进一步明确了冷战后美国外交政策的目标。1993年1月13日,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在对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讲话中全面阐明了克林顿政府的外交原则:第一,美国的经济安全是美国政府的外交重点。第二,保持强大的、灵活的防务系统。第三,促进民主。克林顿批评布什的外交政策过于注重"维持现状",声称"我的政府要为民主而战",要通过贸易、经济援助、安全援助以及救济等一切可用的手段来促进全球民主进程。9月,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莱克又宣布美国在欧洲将以"扩展战略"来代替冷战时代的"遏制战略"。1994年8月,"扩展战略"又发展为"参与与扩展战略",其主要内容是:以"全球民主化"为核心,以经济和军事实力为后盾,通过对世界事务的广泛参与,扩展美国的影响,达到"美国治下的和平"的最终目标。

围绕着经济安全、促进民主和优化军备这三个方面,克林顿在国内、外政策上都作了较大的调整,强调国内和国外政策的一致性,专门成立了"经济安全委员会"以完善"国家安全委员会"。1994年11月,克林顿政府终于促成长达8年的关税和贸易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的圆满结束,除了减少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外,这

次谈判通过了美国的倡议，把 GATT 扩大到了农业、服务产业、投资、知识产权等领域。最后，会议还决定以世界贸易组织(WTO)替代 GATT，并规定未来的 WTO 以提高生活水平、确保充分就业、大幅度增加实际收入和实际需要、持久地开发和充分利用世界资源、拓展货物和服务生产的贸易行为准则为目的，统辖乌拉圭回合以及东京回合所达成的 GATT 各种贸易规则，统一处理贸易争端。从 30 年代美国执行《互惠贸易法》以来，美国就一直努力推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贸易。40 年代末，美国曾提出建立国际贸易组织(ITO)，后因国内外的重重阻力而流产。世界贸易只好由 GATT 这一临时性多边条约进行管理。因此，WTO 的建立是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是美国将其世界经济领导权法制化的一次尝试。据测算，WTO 的建立会为美国带来巨大的商业利益，其中仅出口一项就可以增加 6000 亿美元。在此之前，克林顿成功游说国会在 1993 年 11 月批准了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 3 国政府签署的关于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协定(NAFTA)。3 国在关税、投资、开放服务行业、知识产权以及环保和维护工人权益等方面达成一致，加强了西半球的经济往来。除了这两项重大的成就外，美国还积极推进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美洲自由贸易区和以及酝酿《跨大西洋新纲要》等区域经济合作进程。克林顿政府的目标是力求全球经济自由市场化，以便最有力地发挥美国的市场、资金以及技术上的优势。

在促进海外民主方面，克林顿政府同样不遗余力。在欧洲，南斯拉夫解体后，波斯尼亚境内的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穆斯林为争夺版图发生内战。克林顿政府从 1993 年 2 月开始积极介入，支持穆族，并建议联合国对波斯尼亚实行国际武器禁运，继而发展到利用北约对塞族实施空袭，迫使塞族在 1995 年 10 月同意停火，11 月，冲突各方在美国的斡旋下在俄亥俄州的代顿签订和平协议。波黑战争刚刚熄火，南斯拉夫联盟境内的科索沃阿尔巴尼亚

族独立分子又开始谋求从塞尔维亚独立出来，遭到了南联盟总统米洛舍维奇的果断回击，巴尔干又起战火。从 1998 年中期起，美国带领北约国家向南联盟施加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压力，米洛舍维奇被迫与美国特使霍尔布鲁克达成“米－霍协议”，规定在北约监督下南联盟军队撤出科索沃。但是，协议刚刚达成，阿尔巴尼亚分离主义势力“科索沃解放军”再次挑起战火，西方国家以战争相威胁，1999 年 2 月南联盟被迫和北约在法国巴黎南部小镇朗布依埃进行和平谈判。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坚持向科索沃派出部队并将科索沃从南联盟实质性地分离出去，遭到南联盟的坚决反对，谈判破裂。3 月 14 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在未经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悍然对南联盟首都开始了大规模的空袭，南联盟最终不得不同意从自己的国土科索沃撤军，并允许以北约为主的国际安全部队在联合国的名义下进入。北约轰炸持续了 78 天，给南联盟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使南联盟经济倒退了 16 年。这一惨重的代价令人无法不产生疑问，美国和北约进行的究竟是阻止对阿尔巴尼亚人种族清洗的“人道主义救援”，还是在对塞尔维亚人制造人道灾难？

在中欧和俄罗斯政策上，克林顿的目标是促进俄罗斯继续进行政治经济改革，确保中欧的民主化进程。经济上，克林顿在不同场合多次表态美国将增加对俄罗斯的援助。在政治上，克林顿声明将和俄发展一种“新型的民主伙伴”关系，并在 1993 年的叶利钦与俄罗斯国家杜马之争、1994—1995 年俄派兵镇压车臣独立要求以及 1996 年的俄国总统选举中，都坚决支持叶利钦。但是，美国谋求的是以最小的代价控制俄罗斯和中欧的变化。打着稳定欧洲巩固民主的旗号，1993 年美国提出了北约东扩计划，试图把原东欧集团国家都纳入到西方体系之中，此举遭到了俄罗斯的坚决反对。为此，1994 年 1 月美国又提出了“和平伙伴计划”的折衷方案，迫使俄罗斯就范。在美国的政治压力和经济诱惑下，俄罗斯最

终不得不同意北约东扩。1999 年 3 月，首批东欧国家波兰、捷克和匈牙利成为北约新成员，美国达到了通过北约间接控制东欧国家防务，削弱俄罗斯在这一地区的战略存在的目的。

在第三世界地区，美国有重点地推动和平进程促进民主事业。在中东地区，苏联的因素不复存在，克林顿对反美的伊朗和伊拉克采取“双重遏制”战略取代了布什在两伊间实施的均势战略，同时继续促进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的和平进程。1993 年年底，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达成和解，接着 1994 年 10 月，以色列和约旦签署了协议，中东和平基本上成为定局。在海地政策方面，克林顿采取了更为强硬的政策帮助流亡的阿里斯地德重返政权。他第二届政府的国务卿奥尔布莱特曾说过一句著名的话，海地军政府“要么自愿下台，要么不自愿地下台。”在美国军用飞机待命升空的最后一刹那，海地的独裁者选择了前者。

克林顿外交政策的第三个重点是优化和强化美国防务力量。克林顿强调与冷战时代不同，冷战后世界的动荡因素主要是核武器和生化武器扩散、常规武器的军备竞赛、种族冲突以及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动荡。为此，美国必须重新优化和组合军事力量，加强防务系统的高技术成分，努力使军队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在常规力量方面，1993 年 10 月克氏政府提出了《对国家防务战略、军力结构、现代化、基本设施和基础的总评估》，呼吁对美国的整个防务体系进行改组，建议扩大美国的干涉范围，减少成本，确保能够同时打赢两个地区战场的战争（例如北朝鲜和伊拉克），确保美军有足够的力量参加海外和平行动，维持美军的威慑能力和参加其他有关行动能力等等。为此，克林顿对美国海、陆、空都进行了一定范围的裁军，并以谈判和条约等形式要求其盟国向美国提供军事运输、装备等方面的支持。在战略核武器方面，美国在保持有效核威慑的前提下，继续支持和鼓励俄罗斯销毁更多的战略武器、进行进一步削减和控制战略武器的谈判、并积极谋求防止大规模杀伤

武器的扩散。1996年4月，克林顿首次提出“预防性防务战略”，推出“国家导弹防御系统”（NMD）和“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这是对里根时期“星球大战计划”的继承，把针对苏联核打击的防御战略变成全球范围内的针对核、生物、化学武器和导弹的全面防御战略。这是美国在核武器政策上的一大转变，反映了美国在冷战后防务政策的调整，显示美国在应付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导弹扩散方面已逐步形成一套以外交努力和军事威慑、以国际多边控制和单边军事防御与打击相结合的战略。引人注目的是，尽管克氏政府口头上呼吁裁军和减少军费开支，但美国却保留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继续进行尖端武器开发，其军费开支一直居高不下，甚至呈上涨趋势。它的年国防预算不但在世界各国中遥遥领先，而且比仅次于它的10个军事强国的军费预算总和还多。

美国的对华政策

1979年中美两国建交以来，两国间的政治战略对话、经济贸易往来、教育与科技文化交流的层次和水平不断提高，高层领导人互访不断，双方在外交、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军事领域都开展了交流与合作，两国关系发展迅速。但是，主要围绕台湾问题，双方的矛盾也在发展，1979年4月，美国国会通过并由卡特签署的《与台湾关系法》违背了中美建交公报的基本原则，成为阻碍中美关系顺利发展的严重问题。

80年代初里根上台后，在对外政策上以意识形态划线，敌视中国，指责卡特政府出卖了台湾这个“老朋友和旧盟国”；声称要充分实施《与台湾关系法》，向台湾出售性能先进的武器装备。中国政府为此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双方经过长期艰辛的谈判，终于在1982年8月15日达成协议，发表了中美之间第三个联合公报——《八一七公报》，使中美在解决建交时遗留下来的美国售

台武器问题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在《公报》中，美国一方面作出了不会无限期地向台湾出售武器、逐步减少对台武器出售、不干涉中国内政等承诺；另一方面，则谋求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将武器出售同中国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挂钩。在《公报》发表的同时，中美两国各自发表了一个单方面的声明，对《公报》作出有利于自己的解释。尽管如此，1983年底和1984年初，里根政府两次向中国表示：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在台湾问题上将恪守中美间3个公报的原则；对于中国的和平统一，美国"不介入，不当调停人，不提出特别方案"，中美关系又趋于正常发展。

80年代中后期，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发展，中美双方对各自的外交战略都进行了重大调整。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维持与美国关系的同时，着手改善中苏关系。同一时期，里根政府亦根据不断变化的形势调整了对华政策，强调美中应建立一种"长期的、持久的和建设性的关系"。它一方面在战略上借助中国稳定亚太地区的局势，另一方面加强中美经贸关系，使经济合作逐步成为两国关系的主要内容，两国关系在稳定中有了较快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保持频繁的高层往来。1984年1月，中国国务院总理访美，同年4月美国总统里根访华。此后，美国国务卿、商务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国防部长相继访华。中国各级领导人也先后访问美国。推动了两国间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各方面的交流、对话与合作。第二，中美经济关系不断加深。1984年两国签署了《中美工业技术合作协定》、《中美科学和技术合作协定》和《应用科技合作计划谅解备忘录》，扩大了两国经济关系的合作领域，促进了中美政治关系的改善和发展。里根访华时，中美双方又签署了关于《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中美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定》、《科学技术情报议定书》和《工业科技管理合作议定书》等，使两国经济和科技交往与合作达到一

个新的水平。美国政府先后几次放宽对华技术出口限制，在技术出口问题上把中国作为非盟国的友好国家看待，从而为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根据中国方面的统计，1988 年中美双边贸易额从 1980 年的 48 亿美元发展到 100 亿美元，美国成为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中国在美国贸易中的地位，也由 1980 年的第 24 位上升到 1988 年的第 10 位。同期，美国对华投资不断增加。到 1988 年，美国在华投资项目达 630 个，协议投资金额达 34 亿美元，占外国在华投资总额的 14%。[①]

中美两国关系的全面发展也使双方的摩擦机会增加，分歧突出。经贸关系的发展带来了两国贸易不平衡、知识产权保护和市场准入等一系列问题，文化教育和人员的交流也使人权和西藏等问题涌现出来。

1989 年春夏之交，中国出现了一场有害于中国稳定和发展的政治风波，它成为美国在新的国际形势下调整对华政策的借口。这首先反映在美国政府对中国战略价值的判断上。东欧巨变、德国统一、苏联解体和海湾战争这一系列有利于美国战略地位的国际事件，冲昏了美国人的头脑，以为今后的世界将是美国的一统天下。甚至在最为谨慎的学术界，亦出现了鼓吹资本主义文明已取得最后胜利的“历史终结论”和美国已成为真正的世界领袖的“单极世界论”。[②]由此，美国决策层认为中国“作为美国同盟的价值大大下降了……支持华盛顿和北京保持密切关系的地缘政治理由正在失去其力量”，美国不再视中国是维持全球均势的战略大三角中的一员，而只是制定地区政策时必须考虑的几个经济和军事大国

① 熊性美、佟家栋：《中美贸易十年来的基本估价》，《中美关系十年》，商务印书馆，1989 年版，第 196－207 页。

②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pp. 30 - 31. Charles Krauthammer, "The Unipolar Moment", Foreign Affairs, vol. 70. no. 1 (Winter, 1991)

之一。[1]第二，意识形态再次成为美国对华决策的重要因素。苏联解体后，美国决策者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也坚持不了多久，主张通过对华施加压力促使中国发生类似苏联集团所发生的那种变化。因此，在冷战结束后的相当一个时期内，"以压促变"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一大特色，在人权、安全、台湾等问题上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力求把美国和西方的价值观念和政治制度推向中国，使中国成为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一员"。第三，美苏之间的冷战虽已结束，但冷战思维仍在影响美国的对外决策。美国有些人把中国当作苏联之后的敌手，攻击中国政府及其内外政策，鼓吹"中国威胁论"，呼吁美国行政当局采取措施阻止中国的崛起。[2]在这种背景下，布什和克林顿的中国政策摇摆多变，中美关系极不稳定。布什政府初期的对华政策表现为"以压促变"、"六四"事件后，美国先是通过各种渠道干涉中国内政，后又在西方国家中带头对中国进行制裁。美中高层次的政治、外交、军事交流几乎全部停滞。即使在这最困难的时候，布什本人仍坚信与中国保持接触的重要性。为此，他不惜冒着巨大的国内政治风险，在 1989 年 7 月和 12 月，两次秘密派遣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作为特使访华。1990 年后，布什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和美国国家利益的需要开始调整对华政策。首先，他坚持无条件给予中国在美国对外贸易中的最惠国待遇，三次否决国会有条件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议案。他还放松了制裁措施，同中国进行广泛接触，用"以谈促变"配合"以压促变"。其次是部分恢复高层接触，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助理国务卿、商务部长等相继访华。最后，军事技术交流也逐步恢复，波音公司获准向中国出售带有军民两用技术的飞机，再次允许

---

[1] Harry Harding, *A Fragile Relationship: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Since 1972* (Washington, D C : The Brookings Institute, 1992), chapter 1

[2] 里查德·伯恩斯坦、罗斯·芒罗:《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新华出版社，1997 年版；Samuel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 Foreign Affairs, vol 72, no.3 (Summer, 1993)

美国卫星由中国火箭发射等。但与此同时，布什政府继续对中国施加压力，推行对华人权外交，在人权、知识产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对华贸易逆差、市场准入等问题上向中国施压，把中国加入 GATT 同中国的政治经济改革联系起来。执政后期，布什在施压中对话、在对话中施压的双轨政策更为明显。两国在取消对华经济制裁、核武器控制、减少贸易壁垒、技术出口与转让等领域加强了对话并达成了一定的协议。但是，在台湾问题、人权和经贸谈判上继续向中国施加压力，更为严重的是，1992 年 9 月 2 日，出于政治选举的需要，布什宣布向台湾出售 150 架 F－16 战斗机，严重违反了《八一七公报》，使刚刚有所恢复的中美关系又遭挫折。

在竞选期间，克林顿指责布什“纵容”中国政府，支持中国“民主潮流”不力。1993 年上台伊始，克林顿政府采取了强硬的对华政策：阻挠北京申办 2000 年奥运会，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国出口电子产品和太空系统技术，连续两次宣布增加对台湾的武器出售。但克林顿的强硬政策并没有收到预期效果，反而不利于美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导致了政府内外就对华遏制还是对华接触展开了一场辩论。1993 年 9 月克林顿政府不得不调整其僵硬的政策，提出了“全面接触”的对华战略，表示美国将通过与中国的接触，解决两国在人权、武器扩散和贸易逆差方面的问题。这一战略特别强调了美国需要在人权问题上与中国对话，在国际事务中同中国磋商与合作。1993 年 11 月，克林顿和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美国西雅图召开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第一届非正式会议期间举行了首脑会晤，克林顿表示美中“必须就广泛的地区和全球问题作出共同努力”，美中将以更加坦率的态度商讨解决存在的问题。西雅图会晤标志着美国改变对华一味施加压力的强硬政策，转而推行以对话、有限合作与有限遏制为特征的全面接触战略，中美关系终于迈出了改善的一步。

西雅图首脑会晤后，美中之间的高层往来频繁，政治和外交对

话的层次与内容不断扩大。经济上，1994 年 5 月克林顿政府在无条件延长对华贸易最惠国待遇的同时，宣布将贸易与人权脱钩，以推动美中间经济贸易发展。军事上，美国恢复了 1989 年中断的美中军事交流，两军高级官员和将领进行了互访。然而，遏制派力量仍然影响着克林顿的对华政策。1994 年 9 月 7 日，美国政府调整对台政策，实质性地提升了美台关系，同意台湾驻美机构更名为台北驻美经济文化代表处。更为严重的是，克林顿政府在国会的压力下，违背对中国的承诺，于 1995 年 6 月允许李登辉以“私人身份”访问美国，使中美关系再次跌落到谷底。1996 年 3 月，中国政府为打击台湾岛内分裂势力的嚣张气焰，在台湾海峡地区举行了大规模的三军联合军事演习，克林顿政府派遣两支航母编队到台湾海峡附近游弋、观察和示威，引发了中国方面的强烈反响，两国关系再次降级。

危机迭起的紧张局面再次引发了 1995 年底美国政府内外新一轮的对华政策辩论。一部分人认为，中国是美国在当前乃至 21 世纪面临的主要对手，主张对中国采取全面遏制政策。另一派则建议，美国应对中国实施接触与防范并举但以接触为主的政策，克林顿政府的政策班子、两大政党的务实派、在中国有巨大利益的产业和公司的领导人以及一些外交政策咨询机构的专家，是这一派的主要代表。经过争论，全面接触再次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共识。1996 年 5 月以后，美国政府领导人包括克林顿、总统安全事务助理莱克、国务卿克里斯托弗等人，相继发表重要讲话，阐述美国对华接触政策，表示要从战略高度重视美中关系，将对华政策列为优先考虑的外交课题之一。在 1996 年 11 月马尼拉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第四届非正式会议上，克林顿再次同江泽民主席会晤，强调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美国要在各个领域加强同中国的接触，同时避免因具体问题上的分歧和摩擦而影响全面的美中关系，表示欢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此后，克林

顿政府新的对华政策付诸实施，美中关系在历时一年的紧张与对抗之后，呈现出改善的势头。中美间就两国元首互访进行了磋商，并开始为此积极创造条件。美中间的高层接触空前增多，进一步加强了美中间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交流与合作。1997 年 10 月 26 日至 11 月 3 日，江泽民主席对美国进行了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宣布中美两国将致力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1998 年 6 月，克林顿应邀访华，并首次在上海公开表示对台湾的“三不”政策，即不支持“一中一台”或“两个中国”，不支持台湾独立和不支持台湾参加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参加的国际组织。1999 年 5 月，中国总理朱 基访美，就中国在年底以前加入 WTO 达成初步协议。

但就在中国总理访美回来后不久，1999 年 5 月 8 日，中国在南斯拉夫首都的大使馆遭到美国 B－2 战略轰炸机投下的 5 枚激光制导炸弹的攻击，造成 3 名中国记者死亡，数十人受伤的惨案。中国国内群情激怒，出现大规模反美游行。中国政府暂时停止了中美军事交流和人权对话，中美间就中国加入 WTO 的谈判也未能如期举行。中美关系再次陷入低谷，面临着又一次的严峻考验。

第四编

战争与军事力量的崛起

第一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作为军事强国的第一次亮相

1917年4月,美国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一位美国参议员拦住一位参谋部的军官,问到一个美国介入战争的关键性问题:"天哪!你们不打算派军队到那里去,是不是?"回答显然是否定的。宣战伊始,威尔逊总统对协约国作出的许诺是,美国将无所吝啬与限制地投入武力。大约18个月以后,已有200多万人的美国远征军在欧洲与法国和英国的军队协同作战,迫使德国投降。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美国作为军事强国第一次在世界舞台上亮相,成为美国走向世界大国的关键步骤。

美国的参战动员

美国参战时,正值法国在东线发动尼维尔攻势遭到惨败。在这次攻势中,法国有12万人伤亡,法国半数的部队出现兵变。到了1917年6月,部署在东线的法军没有一个师是可靠的。法军总参谋部请求美国立即派出部队,至少先派出一个师的先遣部队,以鼓励法军的士气。与此同时,凡尔登战役的英雄亨利·贝当将军奉命指挥法军,他向部队保证再也不搞尼维尔攻势了,强调美军和坦克即将到来,试图以此恢复法军的信心。但此时美国的国内兵力却十分有限。它的正规陆军只有13万人,另有18万国民警卫队和1.7万预备役部队。为了参战,陆军部要求扩军,并认为公平而有效的办法是实行征兵制。

威尔逊总统和陆军部长牛顿·贝克却认为这种强迫征兵制不适合美国的国情,他们把征兵的办法定为“选征兵役制”。1917年5月18日国会通过的法律规定,所有年龄在21到30岁的成年男子一律登记应征。一些国会议员联想到内战时期发生在纽约市的征兵暴乱,预言这次征兵将产生“全国性的骚乱”,还称美国永远也不可能将一个应征士兵送到法国前线。但事实恰恰相反。6月5日,各地征兵处截止登记时,全美有958万人登记,未发生任何混乱。随后征兵登记又扩大到18岁到40岁的成年男子,使应征人数达到2423万,其中218万人参加了陆军。但国民警卫队、海军以及海军陆战队仍继续采取募兵制征兵。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总兵力达到了500万。与征兵工作相适应,军官训练营则培养出一大批“3个月速成军官”。数千名少尉以上的军官大多出身于上流社会家庭,一个训练营的军官开玩笑地说:“有那么多的罗斯福,你只要一转身就可能被另外一个罗斯福绊倒。”①

第一次世界大战还使美国步入20世纪一个新的、鲜为人知的领域:经济动员和管理。从最广泛的经济关系来说,美国参战就意味着对物资和服务的需求远远超过其供应能力,国外需求明显增加。美国不仅要维持英法两国的民用经济,还要向协约国提供军队。到1917年,国外需求已经使美国的经济从衰退中摆脱出来,从而使大量的经济活动围绕着战争展开。美国的军用品和兵器工业的订单已经全部为协约国所包揽。因此到1917年4月,美国已经面临不扩大生产就不能组建一支战时陆军和海军的境地。这样,战时动员的短期效应给美国的经济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紧张状态。无论是在民用物资还是在特殊军用设备,军队都是大买主。美国总共有480万人的参战部队,共消耗了320亿美元的物资。在战时扩军的两年期间,美国军队消耗了大约1/4的全部国民生

① 塞谬尔·莫里森等:《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下卷,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07页。

产总值。

从技术意义上看，由于美国政府对经济动员的挑战有足够的了解，它才没有在1917年的动员中出洋相。早在美国参战之前，陆军部和海军部就先后设立了各种咨询委员会，研究工业动员问题。从制度上讲，这些活动产生出海军咨询委员会、工业预备委员会，以及更为重要的国防会议顾问委员会。国防会议是根据1916年的一个法令成立的，其中包括负责战时动员工作的内阁主要成员。这些委员会在1917年合并成军需总委员会和军事工业委员会，它们谨慎地研究全面经济动员的潜在影响。一般来说，委员会的领导人包括了那些热心公益的企业家和专业管理人员。他们担心战时经济危机将导致某些产业的国有化，他们要求政府对经济动员实行更为集中的控制，但又必须维持美国工业的现有特色。

在美国忙于整训自己匆匆建立起来的军队时，协约国的处境更为艰难了。3条战线的欧洲战场已经变成了一条战线的孤军奋战。在东线，1917年秋俄国发生了十月革命，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呼吁和平，并决定退出战争。德国军队立即赶赴西线。在南线意大利，德奥联军发动的攻势粉碎了意大利的军队，并把意大利的残兵败将赶向威尼斯。虽然协约国的增援很快使前线恢复稳定，但更多的德军随着东线战争的结束而转向法国。这时，上自伦敦和巴黎的内阁议会，下到协约国军队的各级指挥官，到处都弥漫着一种惶惶不可终日的悲观情绪。协约国军队的司令官们清楚地意识到，自1914年开战以来，德国人第一次可以放手发动战略进攻了。没有美国军队的参战，他们可能无法抵挡住德国这样一场大规模的进攻。而在1917年12月，到达欧洲的美国远征军还不到20万人，只能提供4个师的作战实力，而且没有一个师完成其全部训练，故只有第1师的几个工程兵团参与了前线的实际战斗。

美国的参战与海军的作战

1917年5月26日，威尔逊总统提名约翰·潘兴将军为美国远征军总司令。潘兴毕业于西点军校，担任过军校的战术教官，在对印第安人的战争以及对墨西哥、古巴和菲律宾的军事行动中屡建战功。潘兴根据当时欧洲战争的经验，建立严密的指挥体系。在仔细研究了英法两国的参谋制度后，他建立了远征军参谋部以及各级参谋部；它们由总参谋部、技术参谋部和行政参谋部等3个部门构成，设有参谋长、副参谋长以及5名分管人员、情报、作战、供应和训练的助理参谋长。同时，潘兴强烈反对英法两国提出的由它们指挥美军或将美国分解并入英法军队中的主张，坚持美军的独立指挥权。潘兴的立场得到了威尔逊的支持。协约国司令部成立后，潘兴也仅仅分出少量部队归英法指挥，主力仍由其直接掌握。

1917年6月，最早开赴欧洲的美军先遣部队（第1步兵师）抵达法国，并在美国独立日那天举行检阅游行。当美军第16步兵团1个营的士兵精神抖擞地通过巴黎的街道时，近百万巴黎人狂热地投掷鲜花，拥抱美国士兵，尽情地欢呼。美国军人的热情和精神与被战壕的痛苦搞得憔悴不堪、精疲力尽的法国士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位美国上校自豪地宣布："拉法耶特，我们来了！"

美国海军参战的速度则要快的多。在对德国的反潜艇战中，美国海军的最大贡献是提出了宝贵的专业性建议，促使英国海军采取舰队的护航制度，从而最终打破了德国潜艇的威胁。随着战争的进行，欧洲越来越多地依赖横跨大西洋的海上交通线，美国的兵员和物资成为协约国继续战争的支柱。美国船队开始急剧膨胀，这就要求海军拥有更大规模的护航舰队。美国遂调整其造舰政策。1917年7月，海军部中止了1916年的造船计划，全力投入反潜艇舰船的建造，这些艇船不断地投入战斗。由于增加了51艘

1 200 吨的快速驱逐舰,美国舰队中驱逐舰的力量大为增强。美国遂决定将攻击重心放在德国的潜艇基地。当时美国海军的进攻主要有两种选择:一是用水雷炸沉或吓退进出基地的德国潜艇;二是向德国潜艇基地特别是在比利时的基地发动直接进攻。

海军部的决策者选择了在苏格兰与挪威之间建立一道北海水雷屏障,作为美国反潜艇攻势的主要部分。这个计划的关键在于能否制造出一种无须潜艇直接触动即可引爆的水雷。要封锁一个长 250 英里、纵深 15～35 英里的区域,如用常规的触发水雷的话,大约需要 40 万枚,而且海军也无法在短期里迅速布设这么多的水雷。为此,美国的发明家在 1917 年研制出一种新型水雷,它带有一根 70 英尺长的铜线,可以通过电磁脉冲引起爆炸,一旦潜艇触动这些铜线,就会遭到灭顶之灾。虽然每颗电触发水雷的单价要比普通触发水雷贵的多,但美国决策者们认为,只要 10 万颗新式水雷就可以布设在计划内的整个区域,从而使战役的价格效能比更为合理。从 1918 年夏天到战争结束,美英联合特混部队一共布设了 7 万颗水雷。这一行动实际上封锁了德国潜艇的出路,将德国的外洋海军截堵在港湾里,严重挫伤了它的效能和士气,大大加速了德国失败的进程。

对于北海水雷屏障的作用,英国海军部一直持怀疑和冷淡的态度。1917 年,英国对德国在比利时的潜艇基地进行了一系列封锁作战,但这种直接的海上进攻和两栖进攻收效甚微。有鉴于此,美国海军决定改用轰炸的方式来攻击德国的基地。美国年轻的海军航空兵对反潜艇作战作出了贡献,它主要是利用飞机执行侦察任务。美国刚刚参战时,海军部就开始着手制定一项建造 700 架飞机的计划,后来又扩大到 1700 架。到战争结束时,海军航空兵最终拥有 2000 架飞机和 3.7 万名官兵,其中有 1.9 万人被派往欧洲战场。1917 年 11 月,海军部将航空兵的轰炸任务排到了首位。这就要求海军将其计划中的水上飞机转为陆基的轰炸机。1918

年秋季，北海轰炸机大队开始投入战斗，它由海军飞行员组成的夜间飞行联队和陆战队飞行员组成的白天飞行联队组成，共对欧洲大陆的目标进行了5700架次的轰炸。总的来说，北海轰炸机大队的参战时间太迟了，无论是在海上还是在陆地都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美国海军航空兵的参战行动，证明飞机在战时各种军事行动的重要作用。战后，美国海军保留了一批优秀飞行员，构成随时可以扩编的基础。

美国海军依靠严密护航的船队，完成了它在战时保证美国陆军、军需品和其他战争物资从西半球运达协约国的任务。如果没有美国海军的出色表现，协约国很可能会在美国地面部队到达之前就被打败。不过，战争的最终胜利则有赖于美国远征军同英、法以及意大利军队的配合。

美国陆军与战争的结束

由于1917年底苏俄与德国停战，数十万德国军队得以转调西线。到1918年春天，德军已经在人数上占据优势。德国统帅部踌躇满志，准备直取巴黎，一举结束战争。协约国要求美国增援解救危急的呼声越来越高，德国则同协约国展开了一场“争夺法国的赛跑”。德国元帅兴登堡忍不住地问道：“它（美国）会不会及时赶来，从我们头上抢走优胜者的桂冠？这一点，而且只有这一点，才是决定一切的问题！我相信我能做出否定的回答。”但事实与兴登堡的愿望完全相反。从美国各地训练营中出来大批新兵急匆匆地奔赴法国。3月里运送了8万人，4月份12万人，5月份达到了25万人。在1918年3月到10月这个危急时期里，美国总共向法国运送了175万士兵。德军总司令鲁登道夫当时曾写道：“美国就这样，成为在这场战争中起决定作用的力量。”[①]

---

① 塞谬尔·莫里森等著：《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下卷，第511页。

1918年3月21日，德军开始在西线发动攻势，不到一周它便重创英国第5军，俘虏9万人，迫使英军后撤25英里。4月9日德军又发动了第二次攻势，英军全线撤退。5月底和6月初，德军发动了针对法军的第三次进攻，不到一个星期，德军就俘虏4万法军和650门大炮，前锋直抵马恩河右岸，大有立即占领巴黎之势。在这危急时刻，协约国将全部军队交给法国元帅福煦统一指挥。英法意3国领导人向美国发出紧急呼吁："英军和法军已经不可能增加各师的兵力……战争失败的危险性因而甚大，除非美国部队尽快到来，使协约国的兵力劣势得到挽救。"[①]

潘兴、贝克和威尔逊原来设想让美军在法国另外组建一支独立的部队，但面对欧洲的战局，潘兴暂时放弃了这一设想，把他的军队全部交给福煦使用，由福煦酌情将它们部署到协约国的各个军中。5月28日，美军第1师协助英法作战，打退了德军的进攻，并夺回了一个高地。6月4日，美军第2师的一个海军陆战队旅在法国殖民军的支援下奋战96个小时，在减员一半的情况下，仍坚持反攻，终于击退了德军，迫使它退回马恩河的右岸。第二天，第2师又发动了进攻，经过3个星期的战斗，将阵线推进了3英里以上，挫败了鲁登道夫的攻势。这几次作战是美国参战以来的第一场硬仗，虽然对欧洲的整个军事局面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但在鼓舞法军日益低落的士气方面起着无可估量的作用。

7月15日，鲁登道夫发动了德军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攻势，这就是众所周知的第二次马恩河战役。德军要取得胜利的关键是保密，但协约国却事先从柏林获得了这一情报，因此有所准备。德军对巴黎东北部的蒂埃里堡突出地段进行了最猛烈的攻击，如果蒂埃里堡被占领，那么巴黎也将保不住。28万美国部队赶来支援法军，抵抗看来是难以抵抗的德军攻势。3天之后，德军攻势停止。

① 塞谬尔·莫里森等著：《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下卷，第512页。

福煦将军为了不让德军有任何巩固其阵地的机会,立即命令美军第1师、第2师和法国第1摩洛哥师,组建一支先头部队进行反攻。德军此时已无法弥补在过去4个月里所损失的80万部队。在蒂埃里堡附近的战役中,美军第38步兵团由于制止了德军越过马恩河而获得了"马恩河岩石"的称号。一位战死的德国士兵在信中提到第38团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射手"。协约国在马恩河战役中的胜利,对德国人的心理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德国首相赫特林后来承认:"1918年7月初我曾深信……我们的敌国将会在9月1日以前向我们求和……到了7月18日,我们之中连最乐观的人都知道,一切都输掉了,这个世界的历史3天就演完了。"①

马恩河战役结束后,潘兴开始组建美国军团。1918年8月10日,美国第1集团军正式建立,原来一直散布在西线作为预备队的各师开始集结为强大的集团军。它们的任务是,扫平凡尔登南面圣米耶尔那一段突出部的德军。自从开战以来,德军就一直占领着圣米耶尔,它控制着梅济埃尔—色当—梅斯铁路和布里埃铁矿大盆地,在战略上十分重要。9月12日,潘兴指挥50万美军对这一地区发动了进攻,48小时内美军便拿下了圣米耶尔。在这场美军首次自行发动的战役中,美军俘获德军1.6万人,夺取大炮400多门,自己仅仅伤亡7000人。潘兴后来写道:"圣米耶尔的胜利,大概比战争中任何一场作战行动都更能鼓舞疲惫的盟国。"作为潘兴的参谋长,乔治·马歇尔上校由于精心策划了圣米耶尔攻势计划而在美国军界名声鹊起。

圣米耶尔战役结束后的两个星期,美国远征军又参加了协约国从伊普雷至凡尔登的全线大反攻。这次反攻恰逢其时。奥地利军队对意大利的最后一次进攻已经失败,意大利军队做好了反攻的准备。同盟国中的保加利亚已经在9月崩溃,土耳其也面临着

---

① 塞谬尔·莫里森等著:《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下卷,第513页。

同样的命运。从7月份开始，协约国军队在西线连连获胜，德军的士气日渐衰落。在全线反攻中，美国第1军负责从默兹河至阿尔贡森林这一段，以占领色当和色当—梅斯铁路为最终目标。9月26日展开的默兹河—阿尔贡森林战役，是美国部队参战以来进行的最大的一次战役。这场战役为期40多天，协约国共投入兵力120万人，飞机840架，坦克330辆，美军伤亡达12万人之多。经过美军英勇奋战，10月31日，阿尔贡森林落入美国人的手中。美国军队与法军共俘虏德军2.5万人，大炮874门，机枪3000挺，德军伤亡10万人。协约国军队在弗兰德至兰斯的全线攻势中也取得了同样的胜利。

通过这场战役，德国大势已去，协约国的兵力重新开始占据优势。福煦将军计划在1919年春天发动新的进攻，潘兴则要求将他指挥下的部队扩大一倍。10月2日，鲁登道夫通知德国政府，德军已经很难再支撑48个小时。德国政府惊恐万分。为了取悦威尔逊，匆忙建立起议会制度，并组成一个自由派政府。10月3日，该政府第一次向威尔逊提出以《十四点计划》为基础议和。同一天，美军海军陆战队第2师发动了勃朗峰岭战役，攻占了这个自1914年以来就为德国占领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山岭。一位法国将军评论说："攻占勃朗峰岭是1918年战役中最重大的单项成果。"与此同时，德国海军发生兵变，慕尼黑和莱茵河畔的城市以及柏林都爆发了革命，德国再也无力进行任何抵抗了。11月9日德皇威廉二世宣布退位，逃往荷兰。11月11日，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停战协议在法国的贡比涅签字。协议规定德军撤出其占领其他国家的地区，交出潜艇并由协约国扣押德国飞机、坦克和重炮，废除德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协约国将对德国进行封锁直到缔结和约为止。这一天后来被美国定为退伍军人日。值得一提的是，德国远洋舰队在11月12日向美英联合舰队投降后，军舰和水手全部被扣留。当德国海军军官得知凡尔赛和会结果并知道他们

的军舰只有被俘获的"分"时，开始大规模地破坏舰队。1919年6月21日，德国人打开了全部舰艇的海底阀，使之沉入海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参加的几次重大战役，是美军有史以来参加的最大规模的战斗。虽然美军表现尚好，但也付出了伤亡32万人的巨大代价。美国远征军能在短时间里达到较高的战斗水平，这同潘兴的贡献是分不开的。他创建了一支可以打总体战的现代化部队，配以高效率的参谋机构、严格的训练方法以及大规模的后勤保障体系，这些都对美军今后的发展起着难以估量的影响。由于潘兴的杰出贡献，美国国会授予他六星上将的最高军衔，这也是美国历史上惟一的一位六星上将。

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协约国的胜利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它的参战彻底改变了交战双方的力量对比，提高了协约国的士气，扭转了败局，并缩短了战争的时间。在战争中，美国动员了它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军队，组建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远征军，并第一次在欧洲的土地上作战。为了进行战争，美国进行了历史上首次全国总动员，把国民经济纳入到战争的轨道，取得了进行现代化战争的经验。此外，它还组建了当时世界第一流的海军，它的空军也开始崭露头角。美国战时所获得的后勤保障等方面的丰富经验，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借鉴。

尽管第一次世界大战对美国军事力量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战争的经验表明，美国以往的军事战略思想已经不能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在此以前，美国军事决策者一直认为，未来战争是短暂的，只要保持一支数量有限、训练有素的"可扩大的"军队，便可应付突发性的战争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证明，现代战争已经不单纯是军队的战争，而是综合国力的总体较量，必须有坚强的经济以及先进的武器装备作为后盾。大战初期，美国仓促上阵，工业生产从民用转为军用的过程太慢，并一度造成了混乱；当美国的工厂刚刚开始大批量生产飞机、大炮的时候，战争便结束了。而在

此之前,美国军队只好使用协约国的装备。此外,美国人的战争和军事知识太少,匆忙入伍的士兵在战争中因训练不足而遭受不必要的伤亡。同时,美国在战争中还存在着后勤供应大量浪费的严重情况。由于落后的军事思想,订购了大批无用的东西。例如,欧洲战场主要进行阵地战,很少使用骑兵,但陆军部却买了100万条马毯、200万个饲料袋、95万个马鞍、280万个马笼头,造成巨大浪费。在法国几平方英里的后勤基地里,堆满了浴缸、痰盂、书柜、办公桌乃至割草机等,这些东西根本就派不上用场。①

第一次世界大战还表明,美国必须在军事思想、体系结构上以及武器装备上进行改革。为适应现代战争的发展,它必须在军事编制上扩大军队规模,建立军和集团军的编制,在武器装备上发展和研制飞机、坦克等先进武器,并进行各军种的协作。这些都成为20年代美国军事改革的主要内容。毫无疑问,第一次世界大战确立了美国世界军事强国的地位。在法国作战的美国人,无论是职业军人还是平民士兵,都知道自己亲身经历了美国军事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折点。他们千里迢迢开赴欧洲,与盟国一起,跟以专业技术著称的德国军队打了一场工业化的战争。由此,他们领略了未来战争的风貌。

① 杰可·雷恩等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著名战役》,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22页。

第二章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军事理论与军事战略的发展

美国与海军裁军会议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面临着日本和英国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相对海军优势。一战结束时，英国拥有42艘主力舰，而美国仅仅有16艘，为此海军部提出了新一轮的造舰计划，以便使海军的主力舰超过英国。美国的造舰计划虽以赶超英国为目的，但在作战上却主要是以日本为主要的目标。根据美国海军1913年制定、1921年由海军部和陆军部批准的《橙色作战计划》，美国军方认为美日两国极有可能在太平洋上发生战争，因此美国必须加强其太平洋舰队，并在关岛、菲律宾和夏威夷设防。这份计划强调，美国海军在太平洋上应具有在日本四周海域发动进攻的能力。到1919年底，美国在太平洋的舰队几乎同日本海军一样强大；同时，美国还表示要在菲律宾等地扩建海军基地。美国海军的扩展，不可避免地引发同英国和日本的军备竞赛；而这种军备竞赛，一方面受到各国财政的制约，另外一方面也遭到各国强大和平主义运动的批评。面对这种形势，爱达荷州参议员威廉·博拉建议美英日3强召开海军裁军会议。国会两院绝大多数议员都同意这一提议，并将决议附在1921年《海军拨款法》上。此时英国正急于要结束它在1902年同日本建立的防御性军事同盟，因为它的自治

领特别是加拿大不喜欢这个同盟，因此英国对美国的建议表示欢迎。1921年8月，美国向英国、日本、法国、意大利以及其他在远东地区有利害关系的国家中国、荷兰、比利时和葡萄牙发出正式邀请，提议11月在华盛顿召开国际会议裁减军备。

1921年11月21日，上述9国代表云集华盛顿会议历时80多天才闭幕。中心议题是限制海军军备与远东、太平洋问题。会议开幕当天，美国国务卿查尔斯·休斯冷静而慎重地宣布，美国将拆除30艘舰艇，然后他转向英日两国代表，要求英国凿沉23艘，日本凿沉25艘。此言一发，语惊四座。当时一位评论家写道："休斯在35分钟内凿沉的舰艇，比世界上所有的海军上将在几个世纪中击沉的舰艇还要多。"[①]休斯还提出美英日三国主力舰的吨位应是5:5:3。英国迫于欠美国44亿美元的债务尚未还清，只好同意美国的倡议。但日本对休斯的建议极为不满，它的代表加藤宽室海军中将在海军专门委员会上顽强地坚持美英日的比例应为10:10:7。对此休斯威胁说，如果日本坚持其主张，那么日本每建造1艘军舰，美国就造4艘。高压之下，日本只好让步，以美国不得在西太平洋增建海军基地为条件，接受美国的建议。

华盛顿会议在限制海军问题上达成了《五强海军条约》，它规定美、英、日、法、意主力舰吨位的比例为5:5:3:1.75:1.75(1＝大约10万吨排水量)；美英日3国一致同意拆毁总数为70艘的舰艇，并限制航空母舰的吨位。各国在10年内停止建造排水量在1万吨以上或装有8英寸以上口径火炮的军舰。为了使日本同意上述比例，美英两国不再加强它们分布在新加坡和夏威夷之间的任何一处太平洋防御区和海军基地。这一承诺使日本舰队在东方进行海上作战的价值实际上增加了两倍，并使美英防守关岛、菲律宾和新加坡事实上成为不可能。但是，日本仍认为《五强海军条约》

① 托马斯·帕特森等：《美国外交政策》，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79页。

是对其海军力量的极大限制,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利用该条约大肆攻击接受限额的自由派政府,并最终在1934年公开撕毁《五强海军条约》,开始执行疯狂的造舰计划。结果,珍珠港事件爆发时,就每一种类型的舰只而言,日本海军都比美英两国的太平洋舰队总和还要强大。

由于华盛顿会议没能对非主力舰规定限制,主要军事国家便转向建造非主力舰,尤其是在万吨以下、8英寸炮径的巡洋舰和潜艇。英国在巡洋舰、日本在潜艇上的总吨位已经超过了美国。面对这种形势,美国总统卡尔文·柯立芝和国务卿弗兰克·凯洛格决定召开第二次海军裁军会议。1927年6月20日,裁军会议在日内瓦国联总部理事厅开幕,美英日正式出席,法国和意大利派观察员列席会议。美国向会议提出如下草案:华盛顿会议确定的比例原则同样适用非主力舰,非主力舰分为4级,巡洋舰、驱逐舰和潜水艇应加以限制,其他战斗力有限的船只不受限制;具体规定美英日非主力舰的总吨位限额;美国还建议船只的更新年限:巡洋舰20年,驱逐舰15~17年,潜水艇12~13年。由于美英在巡洋舰问题上各持己见,导致会议破裂。8月4日,美英日发表一份重复各自立场的共同宣言。

1927年日内瓦海军会议结束后,美英两国的军备竞赛有增无减,两国为此在1929年夏举行了长达3个月的秘密会谈。9月,英美两国分别发表了会谈结果,其主要内容有:英国主张自己拥有巡洋舰50艘,其中配有8英寸口径大炮的大型巡洋舰15艘,配备6英寸口径炮的小型巡洋舰35艘,总吨位33.9万吨;美国要求拥有相当水平的巡洋舰,其中配备8英寸口径大炮的大型巡洋舰21艘,配备有6英寸口径炮的小型巡洋舰15艘,总吨位31.5万吨,但英国只同意美国拥有18艘大型巡洋舰。同时,美英还就1930年1月在伦敦召开第三次裁减海军军备会议取得一致的意见。

1930年1月21日,伦敦裁减海军军备会议开幕。最初两个

星期的会谈毫无结果。2 月 6 日，美国代表团提出美国的谈判基本方针，美国与英国在各类舰船上要有相等的水平。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美国巡洋舰总吨位为 31.5 万吨，英国为 33.9 万吨，美国可以拥有 18 艘大型巡洋舰，英国可以拥有 15 艘大型巡洋舰。为了弥补英国在大型巡洋舰方面比美国少 3 万吨的差距，英国在小型巡洋舰上可以比美国多 4.2 万吨。美英在驱逐舰和航空母舰方面的吨位也应相等；各国潜水艇保有量应降低到最低水平。随后，英国、日本、法国和意大利都提出了自己的方案。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伦敦会议签署了 5 国限制和裁减海军军备的国际条约，其主要内容包括：1）主力舰：从 1931 年到 1936 年，美英日 3 国不得行使华盛顿协定允许的建造补充主力舰的权利，英国拆除主力舰 5 艘，美国拆除 3 艘，日本拆除 1 艘。主力舰的数目，美国英国各为 15 艘，日本为 9 艘。2）航空母舰：其吨位限制依然按华盛顿会议的规定，美英各为 13.5 万吨，日本为 8.1 万吨。3）潜水艇：5 国同意今后建造的潜水艇不得超过 2 000 吨，火炮口径不得超过 5.1 英寸。美国认为这次会议是其外交上的一个胜利，获得了在非主力舰方面与英国拥有相等地位的权利，为美国今后扩充其海军力量提供了国际法的依据。

新式武器的出现与军事理论的新发展

就美国军事发展而言，两次大战期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一方面美国参加上述各种裁军会议，另外一方面，由于这一时期新的军事理论不断出现，导致新的武器装备层出不穷。在空中力量方面，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飞机初步显示出威力，美国开始大力发展空军。在地面力量上，则开始注重坦克的作用。在海上力量方面，航空母舰的威力开始引人注目。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美国军事理论和军事武器都得到了迅速发展。

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进入了它的汽车时代。在当时

的情况下，坦克本来应该是美国军事实验的重要对象。但是，像战前忽视运输汽车一样，美国军方战后依然对坦克漠然处之。潘兴将军本人对坦克虽然没有太大的兴趣，但他对坦克在西线表现出来的价值却深信不疑。1918 年 1 月，潘兴组建了美国坦克部队，小乔治·巴顿领导在法国朗格勒成立了坦克训练中心，并组成第 304 坦克旅，成为美国的第一支坦克部队。但战争结束后，这些组织和部队却解散了。1920 年的《国防法》规定将坦克部队和装备移交给步兵。战争结束时，武器订单上还有 23405 辆坦克。但一战结束到 1930 年前，美国陆军只剩下 1115 辆坦克。

1927—1931 年间，美国陆军对机械化战争的态度暧昧，原因在于经费不足，理论争议，各机构的政治牵制以及技术条件的限制。1927 年，陆军部授权组建一支装甲兵部队，并在 1928 年到 1931 年期间进行了演习。但陆军的高级军官都对机械化部队的价值不屑一顾，几乎没有人赞成应根据装甲作战的学说来组织一支独立的装甲部队以发挥其战斗能力。就在步兵继续将坦克视为一种支援武器时，骑兵部队的一些高级军官却对机械化十分欢迎，因为现代化武器已经暴露出骑兵在作战中的局限性。但根据法律，骑兵不能拥有坦克，因此在 1933—1937 年间，他们创建了一支高度试验性的机械化旅。这支骑兵部队以轻型坦克为核心，强调骑兵传统的运动性和突然袭击，而不是强调机动火力。不过，对于整体合成的机械化步兵和炮兵部队，他们依然低估其重要性。到 30 年代，陆军准备定购一批新型坦克，但它拒绝接受民间坦克设计师沃尔特·克里斯蒂设计的极有前途的中型坦克。克里斯蒂设计的履带式坦克的时速为 43 英里，而同期的其他坦克最高时速只有 18 英里。克里斯蒂的坦克装甲很厚，越野和爬坡能力强。当它满载时，重达 15 吨。陆军部拒绝这种坦克的主要原因是，这种重量的坦克不能适应陆军的舟桥设备，陆军的标准架桥设备只能承受 7.5 吨的重量。美国在 30 年代轻型坦克的基础上产生了第二

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斯图亚特将军”坦克，这种坦克比较灵活，但其明显的缺点是火力太弱，装甲也太薄。美国陆军直到1939年吸取西班牙内战的经验后才开始匆忙发展中型坦克，它们后来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不可缺少的武器。在国内碰壁后，克里斯蒂把他坦克的一部分底盘卖给了苏联。在克里斯蒂坦克的基础上，苏联人生产出T-34型坦克，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好的中型坦克。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美国陆军在坦克与野战部队协同作战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步兵和骑兵的作战条令都要求在进行突击作战时，大量使用坦克。不过，陆军的4个机械化团对地面作战的新形式还没有表示出很大的热情。另外在坦克的性能方面，美国还没有一辆可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苏联和德国的坦克相媲美的重型坦克。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海军一直以日本为假想敌，海军作战计划的制定以美日两国未来在太平洋上进行决战为基础。因此，美国海军一直强调马汉的海军理论，强调战列舰的战略作用，而忽视了航空母舰和飞机的巨大战略价值。1929年，美国海军进行了“舰队问题第9号演习”，“萨拉托加”号航空母舰对巴拿马运河进行了成功的进攻，但却被说成为战列舰的重炮所击沉。进入30年代后，航空母舰的作用依然没有得到重视，在“舰队问题第19号演习”中，航空母舰只是起到掩护战列舰的作用。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美国的军事战略家还认为战列舰是海上的决定性力量；当时还年轻的战略家伯纳德·布罗迪在其相当优秀的论著《机械时代的海上力量》中写道：“航空母舰不大可能取代战列舰，它不能以大型炮舰在其射程内所特有的精确和力量进行打击。”[①]

在20年代，由于空军的发展，美国海军也尝试将空军与海军联合起来。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海军中出现了一个强调航空

---

① 拉塞尔·韦格利：《美国军事战略与政策史》，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310～311页。

母舰和航空兵作用的军官学派,面对海军内部推崇战列舰的将军以及海军外部空中力量的极端热衷者反对的压力,这个军官学派依然坚持其观点,发表许多相关文章,并不断向有关部门施加影响。而早在1919年,他们的一篇文章就写道:"任何一支拥有若干飞机中队的舰队都要比没有配备这种飞机中队的舰队拥有巨大的优势。我们必须为我们的舰队配备航空母舰,在战略点上获得飞机基地,否则当下一场战争到来的时候,我们就将面临着灾祸。"这些军官强调,在海军飞机的任务中,轰炸敌人的战舰和基地按其重要性而言应被列为首位,而保护美国舰队则是次要的。航空母舰将取代战列舰的传统地位,在未来战争中将能在海战中歼灭敌人的舰队。此后,美国对待航空母舰的态度有所改变,1921年,美国建造了试验性的航空母舰,次年,第一艘航空母舰"兰利"号正式下水。到1929年美国建立了快速航空母舰特遣舰队。

富兰克林·罗斯福上台以后,美国开始大力发展海军力量。国会在1933年和1938年两次通过了扩建海军的法案,1933年法案规定在3年内将2.38亿美元用于建造包括2艘航空母舰、4艘巡洋舰、20艘驱逐舰和其他一些小型战舰在内的32艘舰船。1938年的法案规定在10年内耗资11亿美元建造3艘战列舰、2艘航空母舰、9艘巡洋舰、23艘驱逐舰和9艘潜艇。这样,航空母舰和战列舰一样引起了海军部门的重视。到1941年,日本拥有航空母舰10艘,而美国已拥有7艘航空母舰,除"列克星顿"号和"萨拉托加"号各为3.3万吨外,其余1.45~2.7万吨不等,这些舰船大多数可以载80多架飞机。

米切尔与美国空军的兴起

与坦克和航空母舰的命运相比,飞机就有所不同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飞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得到了广泛的应用。飞机虽然在火力和速度上还存在着缺陷,但在实战中却表现出巨大的

潜力,使人们认识到这一新式武器有可能改变未来战争的面貌。对美国军事而言,两次大战期间,飞机对美国军事政策所产生的影响非常广泛而深远。其中,威廉·米切尔个人起到重要的作用。

米切尔是美国空军的创始人。1898年他参加了陆军,1916年学会开飞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他作为观战武官被派往欧洲,1917年转入航空部队,战争末期,米切尔已成为美国航空兵部队的最高指挥官。1921—1925年,米切尔担任美国航空兵部队副总司令。在此期间,米切尔力主航空兵部队从陆军中分离出来,建立统一、独立的空军。他激烈地批评海军、陆军对空军的忽视,并指责陆、海军两个部玩忽职守、弄虚作假。为此,他受到陆军部和海军部的指控,1925年被美国军事法庭判处有罪,停职5年,并退出现役。在以后的10年里,米切尔著书立说,并以统一空军调查委员会成员的身份,批评美国在民用和军事航空方面的政策,力图把他的发展战略空军的思想付诸实施。

米切尔首先预见到空军在未来战争中将起到的重要作用。根据自己在一战中的经验以及对战后欧洲空军的考察,他认为传统的作战方式已经过时,应以空军作为国家安全战略的新基础。米切尔进行了多次试验,证明飞机可以击沉所有的水面舰艇。1921年7月,他成功地进行了飞机击沉战列舰的试验。米切尔据此认为,保卫海防和近海海域应主要依靠航空部队,用空军来消灭敌人的海军。这样,单单防御海岸是不够,防御敌人飞机的惟一有效的方法是要有足够的预警时间,以在敌机到达之前用歼击机进行拦截攻击。根据这种理论,米切尔特别注意空军同其他兵种的协同作战和统一指挥的问题。他认为空军要配合地面部队的行动,除攻击敌人的要害部门外,还要用空军打击敌人的地面部队。米切尔坚决主张建立陆海空三军统一的指挥系统,最好通过建立一个统一的国防部来协调各军种的作战任务。在实际运用中,米切尔提出了战略轰炸的思想。他指出:“空中力量可以直接攻击敌对国

家的要害，彻底击毁它们并使其瘫痪。"空中作战的真正目标是敌国生死攸关的核心地区，这些地区包括构成敌人战争能力的一切基础设施，如工厂、农田、燃料储存库、重要城市目标等。米切尔认为，对生产、人口集中的地区进行轰炸，使这些中心瘫痪，不能进行生产，可以彻底摧毁敌国人民的意志。因此，这种战略轰炸将迅速决定战争的胜负。应该指出的是，米切尔是从全球战略的角度来探讨美国空军在未来的作用。他强调指出，保卫美国在太平洋的领地和利益，其重点应是在阿拉斯加，因为从那里起飞的远程轰炸机，可以威胁到日本在太平洋中部和北部活动的海军，甚至可以威胁日本本土，从而遏制日本进攻菲律宾、关岛和夏威夷。米切尔还建议美国要建立北极军用航线来连接美国同亚洲大陆，即建立经阿拉斯加到西伯利亚，或经阿留申群岛和千岛群岛到日本的航线。这样空军的使用不仅仅限于本土，还可扩大到世界各地。

另外，米切尔还提出一些富有远见的战略设想。早在 1918 年，他就提出在敌人后方使用空降兵的计划，后因战争结束而没能实施。他还曾正确地预言日本将突然袭击珍珠港。当然，米切尔的学说也有一些不切实际并为以后的实践证明是错误的东西。他认为攻击地方中枢地带以及使用少量炸弹就能使敌国经济瘫痪的观点，被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当时纳粹德国遭到了盟军前所未有的轰炸，但德国只是在盟军完全攻占其国土时才投降。此外，米切尔还夸大空军的作用，无视其他军种在战争和国防中所起的作用。他认为陆军"完全无济于事，它们纯粹是成千上万被推上屠宰场的人"；他还不赞成研制航空母舰以及舰载或陆基的航空武器。尽管米切尔的学说有不足之处，仍在美国军事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米切尔关于空军的作用以及战略轰炸的思想，成为美国军事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提出建立一支独立而统一的空军以及强调空军支配地位的设想，在以后都得到了实现。米切尔还提高了美国公众对空军的认识，正是因为这些原因，

米切尔被称为“美国空军之父”。由于米切尔等人的大力推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空军逐渐发展起来，成为美国军事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空军普遍受到轻视。威尔逊总统曾经说过：“我不希望美国航空兵以任何形式参与这样一种计划……这项计划以对敌国工业、商业或居民进行狂轰滥炸为目的，而这些目标又明显与军事需要无关……”[①] 1919 年，总结美国参战经验的迪克森委员会提出了一份报告，认为陆军的作用是决定性的，对空军的作用则一笔带过。这时大众普遍认为，美国空军在战时主要是协助法国作战，飞行员的任务是观赏而不是打仗。同时人们还嫉妒飞行员优厚的待遇和报酬。战后美国停止制造飞机，航空工业几乎解体。到 1925 年，美国的 1396 架飞机中仅有 34 架可以使用。米切尔提出的关于发展空军的思想和计划受到人们的普遍怀疑。经过米切尔的不懈努力，美国国会的一个特别委员会才在 1925 年的一份报告中指出，美国空军的状况极为落后，甚至远远落后于日本；防空力量也不容乐观，“美国将面临着来自海外各方面的空中进攻而束手无策”。报告要求重视空军的建设，建立分属陆军和海军的空军，以适应现代化战争的需要；并提出了加强海军航空兵的建设，发展航空工业的具体建议。该报告促使国会采取行动，调整对空军的政策，把用于航空的经费从 1925 年的 2500 万美元增加到 1931 年的 6900 万美元。1926 年国会立法决定成立可以拥有飞机 6900 架的陆军航空兵，1927 年又把轰炸机放在飞机研制的首位。同时，海军也在 20 年代发展了自己的航空兵。

30 年代空军的较大发展也与当时紧张的国际形势密切相关。在日本侵华战争、西班牙内战以及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战争中，飞机都显示出重要的作用，这就迫使美国陆军部任命一个特别委

① 拉塞尔·韦格利：《美国军事战略与政策史》，第 289 页。

员会调查和研究美国的空军问题。该委员会在1934年提出研究报告，认为自1926年以来美国空军已经取得了突出的、令人满意的进步，在一般航空业方面，美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海军航空兵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但报告同时也指出，陆军的防空能力很差，而下一场世界大战很可能从空中开始，美国空军要为此时刻做好准备，因为夺取战争初期的制空权对战争的胜负至关重要。因此报告建议，美国要大力发展空军，建立航空部，管理所有的军用和民用航空事业，海军仍可以保留自己独立的航空兵。但报告反对空军独立，尤其批评陆军航空兵进行实际上的独立作战，强调陆军航空兵要在陆军部以及总参谋部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建设，和平时期可以拥有2320架飞机。报告还建议要建设航空工业、机场、学校和后勤设施，民用设施要能够适应空军作战的需要。同时大力发展空军预备队，提高飞行人员的待遇，民航飞行员要作为空军预备役。这一报告在美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1935年，美国正式成立了航空兵司令部，统一指挥在美国本土上的所有各类军用飞机。30年代美国还加强了军用飞机特别是轰炸机的研制，一批性能先进的飞机先后问世。1933年，美国研制成功了远程导航系统以及精密的轰炸瞄准仪，大大提高了轰炸的效率。1935年，高性能的远程轰炸机B-17型轰炸机交付使用，使米切尔提出的战略轰炸理论有了实施的条件。美国空军在30年代还在夏威夷、菲律宾和巴拿马运河区建立了远程轰炸机和巡逻机的基地。罗斯福在1939年批准了扩建空军的计划，计划用3亿美元把陆军航空兵和海军航空队分别扩大到24个大队5500架飞机和3000名飞行员。这样，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美国陆军拥有2400架飞机，海军拥有1700架，人员达2万人。[①]为美国赢得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

① 陈海宏：《美国军事力量的崛起》，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34页。

第三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军事战略

参战以前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国总统罗斯福宣布国家处于紧急状态，并采取了一些旨在提高陆海军战备程度的计划。到 1940 年 6 月，纳粹德国先后征服了挪威、丹麦和荷、比、卢 3 个低地国家，并打败了法国。美国决策者意识到，它再也无法依赖欧洲的均势来维护自己的利益。美国开始改变它原来的中立政策，转而向英国提供武器装备。1940 年 9 月，美国向英国转让 50 艘超龄驱逐舰；作为交换条件，美国获得了从纽芬兰到特立尼达之间的 7 个海军基地 99 年的使用权。这个协议加强了英国海军反潜护航的能力，也扩大了美国海军在空中和水上进行中立巡逻的范围。同时罗斯福还不顾军方的反对，允许英国优先购买美国陆军和海军所订购的包括飞机在内的紧急军事装备。

德国发动对不列颠的空战后，加强美国的军事力量显得更为紧迫。由于美国国内对美国是否参战存在着很大的分歧，罗斯福和军方只能采取一些可以为公众接受的最低限度的动员措施。在罗斯福政府的推动下，1940 年 7 月和 9 月国会通过了一系列“两洋海军”法案，批准将海军作战舰队的吨位增加 1 倍，这些军舰包括 9 艘战列舰、11 艘“埃塞克斯”级的航空母舰和 44 艘重巡洋舰以及轻巡洋舰。同时，陆军航空兵在 1940 年也实施一项扩编计

划,以达到 54 个大队和 4000 架作战飞机的规模;这一计划后来再次扩大,提高到 84 个大队和 7800 架飞机。争论最激烈的问题是扩充陆军地面部队的建议。不顾陆军参谋部的反对,罗斯福下令进行动员。1940 年 6 月国民警卫队开始待命服役;9 月,国民警卫队员开始加入联邦军队,进行补充训练。到 1941 年 6 月,已有近 30 万国民警卫队员加入了陆军现役序列,加上已经动员起来的预备役军官、其他军官和士兵,美国陆军达到了 120 万人。

当 1941 年来临的时候,欧洲的战局开始出现变化,德国没能赢得"不列颠之战"。美国进一步加强了与英国的安全合作。在罗斯福的同意下,美国战略规划人员开始与英国人会谈,讨论美国参战后的任务。1941 年 1 月到 3 月,美国同英国制定了联盟战略的大致轮廓。两国同意,纳粹德国是主要威胁,因为只有德国才拥有保障轴心国胜利的人力、工业实力和军事能力。一旦打败纳粹德国,意大利、日本灭亡的日子也就屈指可数。由此,先欧后亚的战略概念确定下来。

1941 年 6 月,希特勒入侵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扩大。美国立即宣布,1941 年 3 月通过的《租借法》也适用于苏联,苏联开始得到美国的租借援助。为了能把战略重点放在欧洲,美国在 1941 年竭力想威慑住太平洋战争的策源地——日本。但日本不顾美国的一再警告,在 1941 年夏占领了法属印度支那的南部。美国不得不冻结了日本在美国的财产,对日本实行全面的战略物资的禁运。美日两国开始走向战争。

太平洋战争

1941 年 12 月,珍珠港事件爆发。日本横扫欧美在亚洲的殖民地,一跃成为亚太地区的主宰。到 1942 年春天,日军同时向 3 个方向推进:在北太平洋进逼阿留申群岛,横越中太平洋,向南攻打盟军在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残留的基地。这一庞大计划的目

标是切断美国通向澳大利亚的交通线，并与美国进行一场海上决战。在1942年5月3日到8日的珊瑚岛海战中，一支拥有两艘航空母舰的美国特混舰队同日本的舰队进行了一场混战。这是一场由飞机承担进攻任务，双方舰队根本未曾照面的海战。海战中，美国虽然损失了1艘航空母舰，但日本也不得不撤出战斗。日本在太平洋的攻势第一次被遏止。一个月后，策划袭击珍珠港的日本海军上将山本五十六率领联合舰队，企图占领中途岛，并同尼米兹率领的美国太平洋舰队进行决战。尼米兹根据事先得到的情报，于6月4日派出自己的海军航空兵鱼雷攻击机去进攻日本的航空母舰。这些飞行员很难确定日本航空母舰的位置，只好在没有战斗机的掩护下发起进攻，结果被从航母起飞的日军战斗机消灭。但这些战斗机此时已没有机会拦截随后赶来的3个美军轰炸机中队。美国飞机抓住日本航空母舰给飞机加油、装弹的大好时机进行攻击，击沉3艘日本航空母舰。在接下去的交战中，双方又各自损失1艘航空母舰。中途岛海战使日本人最为骄傲的联合舰队元气大伤，不再享有明显的优势了。此后，太平洋战争转入了相持阶段，美国逐渐地取得了战场的主动权，赢得了战略优势。

到1943年年底，美军已经破坏了日本在中太平洋的防御圈，并且摧毁了日军进行常规陆海空战争的能力。西南太平洋战区司令麦克阿瑟将军和中太平洋战区司令切斯特·尼米兹将军在各自的战区中组织力量，进行旷日持久和激烈残酷的战斗。麦克阿瑟的地面部队由美军和澳大利亚的步兵师组成，美国的两个野战集团军（第6集团军和第8集团军）向西发动进攻以进入菲律宾，澳大利亚的军队则继续与被孤立在西太平洋岛屿上的日军进行地面作战。尼米兹负责的战区里有美国陆军航空兵第7航空队、4个海军陆战师、1个独立海军陆战旅和4个陆军步兵师。到1944年，美军已经在太平洋建立了一个能支持持续作战的后勤保障体系。在麦克阿瑟的战区里，这个系统主要依靠11个大型固定基

地，并依赖船只和飞机跟在作战部队后方向前方输送补给品，从一个岛屿运送到另一个岛屿。在中太平洋，尼米兹的舰队依赖可以在海上对战舰进行补给的海基后勤系统，还可以利用本战区内已被占领的环状珊瑚岛作临时基地。这些后勤设施的建立与完善，使得美军在太平洋地区作战有着日本无法比拟的优势。

1944年初，麦克阿瑟由新几内亚北上，尼米兹经中太平洋西进，两路向菲律宾方向分进合击，美军在战斗中运用了"越岛"战术，进展迅速。1944年6月，美军开始进攻日本内防御圈的支撑点——马里亚纳群岛的塞班岛。尼米兹预计日本联合舰队必定出动主力增援，于是派遣第5舰队的主力——58特遣舰队的4个航空母舰特混编队，共有15艘航空母舰和890架舰载飞机，开赴马里亚纳群岛西部海域掩护。日本联合舰队果然以第一机动舰队东进菲律宾海。双方以舰载飞机进行决战。在这场著名的马里亚纳海战中，美国海军航空兵充分显示了美国飞机性能和飞行员素质的优势。在6月19日的空战中，日本损失飞机315架，而美国仅损失23架飞机。目睹这数百架飞机被击落坠入海中的壮观场景，美国飞行员惊呼："这简直像古代捕杀火鸡！"此外，美军还击沉了日本3艘航空母舰。这次被称为"马里亚纳火鸡大射杀"的战役消除了日本海军航空兵在太平洋上对美军的威胁。由于没有遭到敌人来自海上的攻击，美军两栖部队很快攻克了塞班岛，接着又收复了关岛和提尼安岛。美国陆军航空兵立即把马里亚纳群岛变成它B－29型战略轰炸机的基地。

美军攻占马里亚纳群岛之后，南起菲律宾、中经台湾和冲绳岛、北至日本本土，都处于美军直接进攻的威胁之下。美国海军司令金海军上将想直接进攻台湾，而麦克阿瑟则希望进攻菲律宾，最后，由于没有足够的两栖作战部队和后勤保障船只，金的计划只能让位给麦克阿瑟。1944年10月，麦克阿瑟的第6集团军和第7舰队在莱特湾发起攻击，日本海军再次组织兵力与美军决一死战。

这次战役宣告日本海军舰队的彻底覆灭，它在战斗中损失了 4 艘大型航空母舰，3 艘战列舰，9 艘巡洋舰，11 艘驱逐舰和 500 多架飞机。相比之下，美国第 3 舰队和第 7 舰队只损失了 2 艘小型航空母舰和 3 艘驱逐舰。是役，日本还采用了自杀飞机的"神风特攻队"战术，虽然取得了一些效果，但无法阻挡美军的胜利攻势。

在美军的航空母舰和两栖作战部队向西太平洋挺进的时候，美国空军对日本的经济命脉和国民的士气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从战争一开始，美国军方就把战略轰炸视为战胜日本的必不可少的因素。在对日战略轰炸中，美国使用了当时最先进的 B－29 型远程轰炸机。这种飞机装有 4 个发动机，可以飞行 2000 英里并在 3 万英尺高空投掷 10 吨炸弹，人称"空中堡垒"。占领马里亚纳群岛之后，美国陆军航空兵在该岛建立了 4 个重要基地。美军第 21 轰炸机司令部从 1944 年 11 月起开始对日本本土进行轰炸。根据对德国轰炸的经验，美国空军首先对日本的钢铁和飞机工业区进行定点高空轰炸。由于天气恶劣、机械故障以及飞机数量不足等原因，加上日本严密的防空体系，只有 20％的炸弹击中了目标，没有给日本造成重大破坏。为此，美军开始改变了轰炸策略。鉴于日本的工厂散布在整个城市里，城市人口相当集中，房屋大多为木质结构，美军转而大量使用燃烧弹，从 1945 年 3 月 9 日到 19 日，共出动 1600 架次 B－29 型轰炸机密集空袭东京、名古屋、大阪、神户等城市，投弹近万吨，摧毁了约 40 平方英里面积的建筑物。仅东京就有 16 平方英里土地上的 26.7 万幢建筑物被烧毁，8.3 万人死亡。由于日本战争后期防空力量日渐削弱，美军飞机的损失率还不到 1％。燃烧弹的这种轰炸袭击，加上美军飞机散发的警告性传单，致使日本 850 万城市居民逃向农村，日本的战时经济几乎陷于瘫痪。到战争结束时，美军飞机先后轰炸了 65 个日本城市，总计投弹 15.3 万吨，炸死 33 万人。

在对日本实施战略轰炸的同时，美军先后占领了吕宋岛和硫

磺岛，接着进行了太平洋战争中最为惨酷的冲绳岛战役。对美国海军而言，这场战役是使用快速航空母舰及其护卫舰来对付自杀飞机的消耗战。在10次重要的交战中，日军出动了2800架各种类型的飞机冲击美国舰队，给美国舰队造成前所未有的损失。地面战斗进行得更是激烈，它使美军付出了伤亡约4万人的惨重代价才取得了胜利。冲绳岛战役结束时，美军开始从欧洲撤军，重新部署作战师，准备参加1945年底对日本本土发动的总攻。日本败局已定，但日本看来决心抵抗到底。美军领导人估计，进攻日本本土，美军可能将付出百万人伤亡的代价。他们没有想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式武器——原子弹，会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原子弹的研制，1945年7月16日，美国成功地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决定使用原子弹的重任落到了在4月份继任总统的哈里·杜鲁门的身上。为此他成立了一个由文职官员组成的“临时委员会”，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一起仔细研究使用原子弹的问题。在1945年8月，美国仅有2枚可以用于实战的原子弹，因此不允许有任何估计上的失误。由于面临着大规模进攻日本的艰巨任务，参谋长联席会议力主使用原子弹。与此同时，日本拒绝了盟国提出的《波茨坦公告》。于是，杜鲁门决定对日本使用原子弹，8月6日和9日，两颗原子弹分别投向广岛和长崎。苏联也宣布对日作战。日本政府被迫在8月15日宣布投降。9月2日，在东京湾的美军“密苏里”号战列舰上，麦克阿瑟代表盟军主持了对日本的受降仪式。

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结束，人类历史上破坏最严重的一场全球战争宣告结束。

从“波列罗——围歼”计划到“霸王行动”

在太平洋战场，美国基本上是独自打败日本的。虽然麦克阿瑟和尼米兹在战略重点的选择和物资分配上常有龃龉，但毕竟只

发生在美国各军种之间。在欧洲战场上，情形则大为不同。围绕着尽快地击败德国这一最重要的战略目标，美国战略家不得不与他们的英国和苏联盟友进行艰难的协调和习以为常的争吵。

1942 年 3 月，为了履行罗斯福对斯大林尽快开辟第二战场的承诺，美国军方制定出“波列罗—围歼”计划，要求把当时盟国所能获得的全部人力、物力都集中在英国，以便在 1943 年春天发动横渡海峡的大规模进攻（“围歼”），开辟欧洲第二战场。为此需要 48 个师，其中包括大约 100 万人的 30 个美国师，其余部队则由英国提供。同时，美国还必须出动一支强大的空军，与英国空军协同作战。它计划在进攻的正面（从勒阿弗尔到布洛涅之间）部署 6 个师共 7.7 万人，1.8 万辆汽车和 2250 辆坦克。[①]除了这个总计划外，美国还有一项应急计划，这项代号为“大锤”的计划要求为 1942 年 9 月横渡海峡准备一支突击部队。“大锤”计划只有在两种紧急情况下才准备实施，一是苏联战场濒于崩溃，二是德国陷于土崩瓦解。“波列罗—围歼”计划最初由美国陆军参谋部作战计划处制定。该处新任处长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上校对此作出重大贡献。艾森豪威尔曾在其日记中写到：“为了制定一项有关各方都同意的共同战略方针，把我搞得筋疲力尽。我们必须到欧洲去打仗，必须停止在世界各地浪费资源。”这一计划得到了罗斯福的首肯，后者还在 1942 年 4 月派马歇尔将军和其私人助理哈里·霍普金斯去英国游说。英国人虽然同意美国的计划，但对“大锤”计划的可行性表示怀疑。6 月，由于英美两国参谋长在“大锤”计划上难以达成一致，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遂建议罗斯福停止考虑“波列罗—围歼”计划，将美国的主要力量转向太平洋打击日本。罗斯福断然拒绝，并在 7 月再次派遣霍普金斯、马歇尔等要员到伦敦，命令他们同英国协商，争取在年底以前将美国的地面部队投入欧洲的作战。

① 肯特·格林菲尔德：《第二此世界大战中的美国战略》，解放军出版社，1985 年版，第 34 页。

讨论的结果却是美方接受了英国提出的进攻北非的“火炬”计划。罗斯福多少担心，如果失去北非，德国人向东可以与日本会合，向西可以占领法属达喀尔，直接威胁美洲海岸。

1942年1月，在艾森豪威尔的指挥下，英美联军成功地实施了“火炬”计划，稳住了北非战场，并开始进行反攻，取得了开战以来的最大胜利，由苏伊士运河直达印度的英国海上生命线保住了。北非战役结束后，意大利成为盟国下一个进攻目标。1943年7月10日，在艾森豪威尔指挥下，英美两国部队共25万人在漆黑的夜晚齐头并进，同时登陆西西里岛。守岛的35万德、意军队惊慌失措。7月22日，美第7集团军在小乔治·巴顿将军的指挥下胜利地进入了西西里首府巴勒莫城；到8月17日，这个大岛完全落入盟军手中。在此之前，盟国空军出动560架飞机对罗马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大空袭。意大利国王维克多·艾曼奴尔三世鼓起足够的勇气迫使墨索里尼辞职，新政府开始同盟国进行停战谈判。这使德国获得可以加强其在意大利军力的时间。

对盟军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大转折，发生在1943年到1944年冬季的苏联战场。苏军的顽强抵抗迫使德军转入战略防御，苏联方面也承受了纳粹德国最沉重的军事压力。因此，斯大林强烈要求英美尽快开辟第二战场。他认为发动北非战役以及对德国的战略轰炸，并未给德国以致命的打击。

如何开辟第二战场，一直是英美战略决策者考虑的重大问题。1943年12月德黑兰3国首脑会议最终决定，1944年春季在欧洲大陆开辟拖延已久的第二战场，实施代号为“霸王”的渡海作战计划。作为战略预备队驻扎在美国的陆军地面部队开始开赴欧洲北部，而将对地中海战区和太平洋战争的增援降低到最低程度。1944年美国陆军向欧洲派遣了26个师，向太平洋只派了7个师。此外，由于美军在盟国远征军中占了多数，英国同意由一名美国将军来担任这次进攻的指挥官。作为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内心希望

能亲自出任远征军总司令，直接指挥作战。但罗斯福却不想让这位杰出的军事组织天才离开华盛顿。他曾对马歇尔讲，没有后者在身边，他一天也睡不安稳。马歇尔抑制住自己征战的渴望，推荐自己最信任的部下艾森豪威尔担任这个职务。

在"霸王"计划的准备过程中，美国同英国围绕战略问题争论不休。现在的焦点是如何实施这一计划。正当艾森豪威尔等人为"霸王"计划的战术后勤问题绞尽脑汁的时候，英国方面就美国的"铁砧"计划提出异议。"铁砧"计划要求在发动"霸王"计划的同时进攻法国南部。这样一来，舰船、运输机、战术飞机以及作战部队都显得紧张。在英国陆军元帅布鲁克爵士的支持下，丘吉尔要求美国将准备用于"铁砧"计划的部队用到加强意大利或其他地中海战场的行动中去，以加强英美未来在巴尔干地区的影响。但美国坚持"铁砧"计划的设想，认为在法国南部开辟第二个"第二战场"可以分散德军在法国的兵力，而且盟军如果能迅速地在莱茵河沿岸会师的话，还可能围歼部分德军。但由于盟军 1944 年在意大利进展缓慢，无法将足够的兵力调往法国，只好将"铁砧"计划推迟，起初是无限期推迟，后来更名为"龙骑兵"计划。

经过一年多的周密考虑，"霸王"行动计划实施的日期定在 1944 年 6 月 6 日。该计划的要点是，在迷惑德军，使之无法确切知道盟军的登陆地点的情况下，充分利用盟军的空中和海上优势，取得突袭制胜的效果。

进攻地点选在了位于法国海岸西南部的诺曼底，因为从那里可以很快占领位于科唐坦半岛的瑟堡港。英美军事家还考虑过其他几个登陆地点，它们各有利弊。若选英吉利海峡最窄处的法国北部加莱登陆，意图过于明显，何况德军早已加强这个方向的防御。若在更南部的布列塔尼发动进攻，可以得到 5 个重要的港口设施，但在这样远的地方发动进攻将会使德军有充裕的时间加强西部防线。通过情报机构，盟军了解到德军统帅部错误地以为盟

军将选择加莱海峡来进攻法国,这为盟军提供了可乘之机。为此,美英战略家制定了一个复杂的欺骗计划,使用了当时可以调动的一切手段:空袭,假军事设施和运输调动,假无线电通讯,谍报人员的假情报和其他情报手段来迷惑德国人,让他们深信盟军会在加莱海峡发动进攻。如果在登陆之前德军没有变更其兵力部署,那么盟军突击部队在登陆时只会遇到德军的6个师,其中只有2个师是精锐部队。同时登陆的成功还取决于盟军登陆部队的空中优势。在登陆之前的3个月,美英空军开始实施"搬运"计划,对法国的铁路系统、塞纳河和其他重要河流上的桥梁进行大规模的轰炸。作为欺骗行动的一部分,盟军把炸弹总量的2/3投向了加莱海峡的目标。"搬运"计划实施的结果使德国西部和法国北部70%的铁路交通系统在盟军进攻之前就陷于瘫痪。

6月6日登陆日作战结束时,盟军共有10万人的突击部队登上了法国诺曼底海滩。诺曼底登陆很快变成了一场长达2个月的你死我活的鏖战。在美军的作战地段,到处是密集的灌木丛,道路狭窄,减缓了美军向南推进扩大登陆地区的速度。此外,盟军在修建后勤基地方面也遇到了困难,一场猛烈的暴风雨摧毁了盟军在海滩沿线建立起来的临时港口设施,而且地面战斗也没有夺取足够的地区来建立空军基地和物资堆积场。尽管有这些问题和困难,到7月上旬,盟军在欧洲大陆牢牢地站稳了脚跟,集结了100万军队,并得到了占优势的空军的保护。登陆作战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似乎证明了过早开辟第二战场的非现实性。

为了扩大战果,美国最终实施了"龙骑兵"计划。8月15日,一支由意大利战场抽调出来的作战师为核心组建起来的攻击部队,在没有遭到强烈抵抗的情况下在法国南部登陆成功,作为对莱茵河以西的全部德军实施双向大包围的一部分而向北挺进,这意味着盟军现在有一条从德国边境直到英吉利海峡的连绵不断的战线。

美国空军对德国的战略轰炸

如果说"霸王"计划决定了纳粹德国在前线的失败命运，那么对第三帝国的战略轰炸则摧毁德国人的抵抗意志和后方的基本生产能力。美国人坚信，B－17型轰炸机可以飞出护航战斗机的范围对敌后特定的工业目标实施精确轰炸。美英联合参谋长会议把对德战略轰炸列为最重要的进攻目标，坚持实施大机群轰炸，因为这样可以减少轰炸机的损失。同时，轰炸攻势还有其政治含义，因为罗斯福和丘吉尔把它作为"空中第二战场"送给斯大林，破坏在苏联作战的德国陆军的后勤供应，使之陷于瘫痪。在这一战略中，英国空军将在夜间轰炸，而美国空军则在白天轰炸。

1943年3月5日，美英第一次对德国进行了大规模的联合轰炸攻势。从3月到7月，英国轰炸机司令部和美国第8航空队对以鲁尔为中心的德国工业城市连续进行43次大规模的空袭。1943年下半年，随着盟军攻入意大利，美国以意大利南部为基地，组建了第15航空队，加强战略轰炸。对于在美军飞机作战半径外的敌方目标，美军采取了"穿梭轰炸"的战术，即美机从英国或意大利南部基地起飞，空袭德国、匈牙利或罗马尼亚境内的敌方目标，然后继续飞行到北非或苏联境内的机场着陆。在着陆机场进行技术维修、加油和补充弹药后，返航时继续进行空袭，然后回到原基地。总的来说，1943年盟军对德国的战略轰炸比1942年有相当大的发展，投弹量达到了20.1万吨，其中美军投弹4.4万吨。但是，这些战略轰炸对德国的军工生产和德国的整个国民经济仍未造成巨大影响。据统计，1943年的战略轰炸给德国造成的总损失尚未超过其国民生产能力的3%～5%。[1]

从1944年4月起，为准备"霸王"行动，美英空军开始集中轰

① 肯特·格林菲尔德：《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战略》，第132页。

炸法国北部和比利时的机场、交通枢纽和防御工事，同时加强轰炸德国的石油工业区。由于集中轰炸石油工业区和交通运输线取得了良好的效果，9月25日，盟国空军发出指令，将这两者列为战略轰炸的优先目标。但是到了战争后期，所谓有选择的精确轰炸和一般性区域轰炸事实上已经没有区别了，美国空军也开始对德国城市进行大规模的轰炸。由于美英空军力量大大加强，德国空军进一步削弱以及德国控制的地区日益缩小，使得盟国完全可以全面开展战略轰炸。从1944年4月到12月，美国第8航空队的第一线飞机从1049架增加到1826架，英国轰炸机司令部的飞机也从1023架增加到1513架，同时盟军还大量装备了用于护航的新式远程歼击机，德国此时已经完全丧失了制空权。1944年盟军全年投弹量为120万吨，约占战时盟军对欧洲投弹总量的60%。

1945年1月，正当苏联军队向德国东部迅速推进的时候，美英联合参谋长会议决定重新执行"恐怖战略"，对柏林及德国东部城市德累斯顿、来比锡、克姆尼茨等实施大规模的摧毁性轰炸。从2月22日开始，盟国空军对德国进行了最后一次战略轰炸。根据艾森豪威尔的要求，这次代号为"竖笛"的行动计划，在盟军强渡莱茵河对德国发动最后攻势时，对德国的交通线进行了密集轰炸。从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和荷兰等基地出动的9000架盟军飞机，对德国铁路交通的200个大目标和数千个小目标实施连续轰炸，一周内投弹量就达5.5万吨，德国的交通运输因而陷于瘫痪。到1945年4月，盟国对欧洲的战略轰炸实际上已经结束，整个1945年上半年投弹总量为48万吨。这场在3万英尺高空中进行的消耗战，对第三帝国的灭亡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第四章　建立统一的国防指挥体系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不时提出有关武装力量统一的问题。但历史形成的陆军和海军相对独立的传统，一时难以克服，统一的努力仍然困难重重。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海陆军的合作提出了新的要求。陆军和海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合作，然而战争中两军的合作远非令人满意。在一定程度上，珍珠港的悲剧就在于缺少这种合作，驻扎夏威夷的各军种缺少必要的通信联系。在太平洋战场上，尼米兹海军上将领导的中太平洋地区司令部同麦克阿瑟将军领导的西南太平洋地区司令部之间一直存在着摩擦。这两个司令部的争吵直接导致参谋长联席会议中陆海军代表关系的紧张。一直到德国战败时，陆军和海军才分别默认各自在太平洋战场和大西洋战场作用是第二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对国家安全的要求迫使美军考虑建立统一的指挥体系。

《国家安全法》与空军的独立

战后美军指挥体系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是，核武器的出现加剧了各军种之间对军事任务的竞争，每个军种都要求承担更多的军事任务，都想建立一支既能打核战争又能应付传统的短期作战任务或战争总动员的部队。

杜鲁门政府规定的军费限额为联邦预算的1/3，大约在100到130亿美元之间。分散到各军种后，这笔钱只能维持一支骨干

框架部队和经费不足的研究与发展计划。为分割这些有限的军费,各军种之间出现了大量的矛盾与争执。在陆军中,陆军航空兵在战后寻求一个完全独立的军种地位,以核武器与战略威慑作战为其主要任务。陆军地面部队则要求实行一项包罗万象的普遍军训法,使之可以在平时的公民义务军训的基础上,在下一场战争中动员起一支受过训练的军队。陆军航空兵和陆军的主要设想都是在欧洲同苏联打一场全面的战争。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则试图将全面战争的准备与保持其传统的海权思想统一起来。海军部力图在保持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部队结构,即航母特混、陆基反潜航空兵、舰队陆战队和潜艇部队这一前提下,也能够使用核武器进行作战。

军事任务以及与其密切相关的军费、国防体制和战略等问题一起给美国国防政策造成了长达5年的政治混乱。1945年,陆军部将参谋长联席会议批准的一项武装部队改组计划提交国会,引起了第一轮有关建立统一的国防指挥体系的争论。陆军同意让空军独立出去,并认为应建立一个只受一名军官领导和对一名文职国防部长负责的统一国防参谋机构,有利于军事政策的执行。这项新的改组计划是陆军部的参谋部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区联合司令部关系的翻版,它要求把确定各军种的作用与任务和编制年度预算的权利完全交给惟一的国防机构和国防部长,以此来“统一”整个武装部队。同时该计划还认为个各军种之间的竞争是制定更有效军事计划的最大障碍。

海军在这一时期或是附和陆军的建议,或是索性保持缄默。海军越是深入研究陆军的建议,越觉得不能同意陆军的观点。海军认为自己有着特殊的战略任务,它的一些特殊战略和技术问题在统一的司令部里很难得到足够的重视,而陆军与空军的合作又很可能削弱海军的作用。另外,就海军空中力量的使用问题,海军曾与陆军航空队有过激烈的争论,它担心自己的空中力量会被空军夺走。在海军看来,国防指挥系统的统一可能意味陆军会抢走

自己的登陆力量——海军陆战队。为此，海军部在詹姆斯·福雷斯特的领导下，对陆军部的计划进行反击，使之不能在白宫和国会通过。1945年，福雷斯特竭力阐述海军自己的"建设性建议"，并聘请了一位投资银行界的老朋友、战时动员专家费迪南德·埃伯施塔特为他研究统一问题。为了协调各军种之间的关系，埃伯施塔特的计划要求继续保留参谋长联席会议和战区联合司令部，维持它们原有的关系，这样就可以防止参谋长在确定各军种的作用时大权独揽。此外，埃伯施塔特还坚持，制定军事计划的主要困难并不在于军种之间的竞争，而在于文职官员与军人及政府各部门之间缺乏协调。因此他建议设立一套新的机构来负责集中制订宏观计划，协调情报搜集与分析工作，制定动员计划，管理科学研究与发展工作，并监督教育与训练。

面对说服力很强的埃伯施塔特报告，陆军只好迁就海军的批评意见，修改了自己的建议。在它的新报告中，陆军不再坚持设立统一的参谋长，而建议把战时参谋长联席会议改成由三军参谋长、国防部长及其首席军事顾问共同组成的5人参谋长小组。当海军和陆军把各自的建议提交国会后，双方为此斗争了近两年，杜鲁门总统和国会也被这场斗争搞得精疲力竭。1947年他们只好强行制定了《1947年国家安全法》(National Security Act of 1947)。这是战后美国建立统一国防指挥体系的基础性法令，总的来说，它标志着海军的胜利。

《国家安全法》规定，建立独立的空军部，并成立一个由陆军部、海军部和空军部组成的"国家军事机构"(National Military Establishment)，而国防部长作为总统在国家安全方面的主要助手领导这一机构。国防部长与三军部长及三军参谋长一起组成一个军事委员会，三军参谋长加上总统任命的一名参谋长继续作为参谋长联席会议行使职权。至此，参谋长联席会议第一次得到法律上的正式承认。它将授权成立一个由100名军官组成的联合参谋

部,其中各军种的代表数额大致相当。为使国家军事机构与国家基本政策的制订相联系,在埃伯施塔特和福雷斯特的建议下,《国家安全法》规定设立 3 个机构:1)由总统、国防部长和其他主要军事、外交官员组成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决定统一的国家军事政策,让军事政策服务于国家利益。1949 年以后,国家安全委员会由总统、副总统、国防部长等组成。总统可以在需要时指定其他有关部门的首长参加。在实践中,该委员会主要是在外交决策中协调外交与军事的考虑。2)中央情报局协调政府各部门的情报活动,并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报告工作和提出政策建议,直接对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在此之前,杜鲁门在 1946 年 1 月下令撤消战时的战略情报局,设立中央情报组,当时是置于国务卿、陆军部长、海军部长以及总统的个人代表李海海军上将组成的国家情报局的监督之下。到 1947 年,这一机构更名为中央情报局。1947 年 12 月,国家安全委员会指示,赋予中央情报局在国外进行“隐蔽活动”的任务。3)国家安全资源局。它负责协调军队与地方的战时动员。

《国家安全法》只标志着一场“战役”的结束而不是整个“战争”的结束。作为新政策的设计者,福雷斯特成为第一任国防部长。在他任职一年半后,他深感失望,要求赋予国防部长更大的权力。因为按照《国家安全法》的规定,国防部长身边没有一名参谋人员帮助他加强自己的权力。战争中参谋长与陆军部长之间逐渐建立起来的那种相互信赖的亲密关系,如今在国防部长与集体领导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之间怎么也建立不起来。

海军的造反与统一指挥体系的最终确立

虽然 1947 年《国家安全法》成功地将空军从陆军中独立出来,但它未能保证各军种之间的有效合作。陆军一向认为,在总统与各军种之间,在各军种当中,特别是当需要对预算纠纷作出妥协方案的时候,国防部长仅限于扮演调停人的角色。同时,参谋长联席

会议提出的预算申请通常比杜鲁门批准的限额多出一倍，因此，福雷斯特无法满足它的要求。1948年他把各军种的参谋长们召集到佛罗里达开会，就各军种的作用与任务达成了一个君子协定。根据协定，海军可以发展用于海战各阶段的核武器，海军陆战队也可以发展空地两栖部队，但海军不得拥有空中战略力量，海军陆战队也不得拥有地面部队。但在这些讨论中，各军种的观点既未改变也未澄清；各军种除了认可自己的主要任务外，仅仅承认第二位任务可以有交叉，但都不愿意发展与提高那些被认为是第二位的武器装备与作战能力。由于受到各军种与国会的压力，福雷斯特无法统一各军种对国防指挥体系的不同看法，这位一丝不苟、兢兢业业的技术官僚终因精神崩溃而自杀。

路易斯·约翰逊于1949年3月继任国防部长。为了限制各军种之间的争斗，遵守预算限额，约翰逊试图强行解决长期存在的关于各军种作用与任务的争执。在编制1950年国防预算时，约翰逊砍掉了“美国”号航空母舰，并将现役的航空母舰从8艘减少到4艘，将舰载航空兵大队由14个减少到6个，从而给海军航空兵以致命的打击。于是发生了一场“海军将领造反”的战斗。

当海军作战部长参谋长路易斯·登菲尔德从新闻报道中得知约翰逊的决定后，立即以辞职作为抗议。海军将领们认为，约翰逊的行动实际上是空军破坏海军未来发展前途的一个重要举措，因为这笔钱计划被用来购买新型B－36型战略轰炸机。“海军将领造反”的另外一个导火索是，新闻界披露了海军高级将领对约翰逊政策的尖锐批评，认为这种政策已经危及到美国的安全。一时间舆论大哗，国会不得不进行调查。海军中不仅有现役的将领到国会作证，而且还有退役的二战英雄。他们都攻击B－36，怀疑这种飞机的功效。海军将领们警告说，约翰逊削减海军经费已经对美国的战略造成不良的后果。最后，国会仍维持原来的削减预算，但B－36的计划也被砍掉了，登菲尔德被解除了海军职务。这次“海

军将领造反"的成功之处在于，它使美国公众注意到了海军的困境，并对空军的主张有了比较清醒的看法。更为重要的是，"海军将领造反"还使美国决策层意识到，"国家军事机构"必须进行大改组，就连埃伯施塔特在1948年组织的一次关于国防管理的调查中也认为，他在1945—1947年亲手创建的机构需要修正。杜鲁门政府提出了国防法的修正案，并在1949年8月10日签署了《国家安全法》修正案。据此，国家军事机构更名国防部，成为政府中的1个执行部门，而陆军、海军和空军3个部则由政府执行部门变为国防部下属的3个军事部门，不再具有行政部门的地位。国防部长在1名国防部副部长和3名助理部长的协助下，作为1个政府执行部门的首脑，其权力大为增强。同时，为了限制各军种之间的竞争和提高工作效率，经国会批准、1名不代表任何军种的军人出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联合参谋部的工作人员由100人增加到210人。尽管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对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决议没有否决权，但他却成为国防部长和总统的首席军事顾问。从影响上看，1949年修正案使国防制订计划的权力开始集中到国防部长，他可以利用编制预算的权力去解决纠纷；只要总统或国会不加否决，参谋长联席会议就无法改变国防部长的预算方案。通过这次改革，美国的国防指挥体系从形式上的统一过渡到实质上的统一。

1953年，国会通过法令，加强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权力，他可以任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国防部在原有的3名部长助理的基础上，又增加了6名部长助理和1名法律总顾问，从而大大加强了国防部长和三军部长对军队的控制权。但各军种在经费上的矛盾依然存在，它们常常通过游说获得所需要的拨款。为解决这一矛盾，国会在1958年通过的法令使国防部长掌握了作战指挥权，同时还在军费拨款、人事、科研、后勤等方面具有更大的实权。另外，这一法令还撤消了各军种的作战指挥权，建立了以国防部长为首的作战指挥和行政管理两大系统。在作战指挥方面，国防部

长通过参谋长联席会议对各联合司令部、特种司令部及所属部队实施指挥；在行政管理方面，国防部长通过3个军种司令部对全军实行更直接的行政领导。同时国防部里还成立了防务与研究工程局，负责和监督所有军种的军事发展科研计划。至此，一个权力集中、职责明确和指挥有效的国防指挥体系终于建立起来了。

统一的国防指挥体系建立起来后，又不断得到充实和完善。到肯尼迪总统任内，美国国防体系再次进行了较大的改革。他一方面加强国防部对三军的文职控制，另一方面加强参谋长联席会议在作战方面的职能。肯尼迪首先在国防部办公厅里设立一系列的国防局，每一个局都标志着国防部长在一个新的领域里克服了三军分立的障碍，实现统一领导。国防情报局的设立统一了三军的情报工作，避免了美军情报机构重叠、工作效率低下以及各自为政的局面。国防补给局的设立协调了美军的共同补给问题，推行了统一的补给政策，从而节省了大量的人员和经费。这一时期另外一项重要的完善措施是，在美军统帅体制内建立一个高度现代化的指挥、控制和通讯系统—"国家军事指挥中心"。该中心设在联合参谋部的作战部之下，受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指挥，其作用是供美军统帅部在发生核大战和其他紧急情况时统一指挥和控制全球美军的作战行动。

与此同时，美国还逐渐建立和完善了危机控制系统，其核心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作战中心，即白宫的"情况室"。它负责与国防部、国务院、中央情报局危机判断中心联系，是危机控制系统的最高决策机关。在基辛格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时期，危机控制中心并入国家安全委员会及其各地区小组(欧洲、拉美、非洲、中东和东南亚等小组)。这些小组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拟定送交总统的备忘录，其内容涉及世界各地区出现的紧张局势和发生冲突时美国应采取的军事政策和战略。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还同盟国建立了联合指挥机构。

为了准备进行全球战争以及各种地区性的局部战争,协调与盟国的军事行动,美国首先与西欧建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到 50 年代中期,美国还统一了世界各地的美军指挥体系;在远东、太平洋、阿拉斯加、加勒比和欧洲地区,陆海空三军由参谋长联席会议派出 1 个司令统一指挥。1957 年 8 月,美国和加拿大建立 1 个北美空防联合指挥部,后改为北美航空空间防御指挥部,下设 6 个防空区,每个区都有 1 个防空师。在越南战争期间,美国建立了 1 个区域性联合指挥系统,它是美国全球战略指挥系统的一部分,使用卫星等先进的通讯设备。

经过战后的改革与调整,美军的统帅机构基本上实现了三军统一、集中指挥的目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军历次对外用兵,均是在以总统为首的指挥机构的统一指挥下进行的;三军协同作战,行动迅速而有效,表现出很强的战斗力。

第五章　核武器与战后美国军事战略的转变

1945年原子弹的试验成功以及对广岛、长崎的轰炸，使得人类进入了原子时代。战后初期，美国垄断了原子弹，促使美国调整与修改其军事战略。美国的战略理论家提出了适应原子弹特性的国家安全战略构想并为美国决策者所采纳。因此，核武器对战后初期美国战略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国家安全战略的转变与美国战略空军的建立。随着战后美苏冷战的开始与加剧，美国战略决策者从核战争的假想出发，逐步发展出"大规模报复战略"。然而，核武器的使用存在着许多制约因素，美国决策者最后不得不承认，在核武器的理论与战略之间，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矛盾。

原子弹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辩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美国战略理论家伯纳德·布罗迪在其著名的《绝对的武器》一书中明确指出："在过去50年中所形成的国家安全之传统概念——在这一概念中相当正确地宣称海军是我们的'第一道防线'——似乎应该修正。作为对原子弹所产生问题的解决办法，关心国家安全防御的有效性其本身显然是不够的；显而易见，我们的军事当局应以前所未有的高昂干劲，去修正过去所继承的那些概念。因此在原子弹时代，美国国家安全的第一个关键步骤是采取措施，确保我们在受到袭击之时有可能进行以其

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报复性反击。"[1]因此，布罗迪提出美国首先需要使军人和装备在投入战争时已经处于动员状态，美国再也不能等待战争爆发后再加强其武装力量了。其次，美国军队必须"使自己能够独立于城市及其工业，不需要依靠它们的支援"。布罗迪还提出一个惊人的观点：在最高司令部很容易被对方摧毁的情况下，地方司令官只要知道自己的国家已经遭到原子弹的袭击，他就有权自行决定用原子弹攻击对方。

原子弹的出现和使用也改变了普通美国人对战争的理解。在许多他们眼里，为了以最小的代价惩罚侵略者，使用空中力量再加上原子武器助威是最为恰当的。时事评论大家沃尔特·李普曼曾概括说，美国人认为，发明原子弹和火箭就好像是"使他们关于打仗的一切如意算盘全都变成了现实：现在打仗不需要全国通力奋斗，不需要征兵，不需要训练，不需要纪律，而只需要钱和工程技术，这两样东西我们都绰绰有余。有了这个包治百病的良药，我们就不必花时间、精力，不必流汗、流血，也不必流泪，就可以成为全球最强的军事大国，而且所花的钱，同建立一支强大的陆军、海军和空军的代价相比也并不算多"。[2]

原子弹的出现和冷战的展开不可避免地导致美国决策者内部对战略问题展开辩论。原子弹加深了大国之间的裂痕。在对日本使用原子弹之后，美国人一直把原子弹当作可以在谈判中向苏联施加压力的主要王牌。热衷于原子弹的战略理论家提出，原子弹使传统的军事力量过时无用。那些喜欢资本密集型而不是劳力密集型战争的人也与之一唱一和。但是有识之士很快发现不能够想当然地认为原子弹具有决定意义，更不能随随便便就不要常规军队了。于是，在美国决策者内部就有了以乔治·凯南为首的国务院

---

① Lawrence Freedman, *The Evolution of Nuclear Strategy*,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81, pp 44—45.

② Lawrence Freedman, *The Evolution of Nuclear Strategy*, p 48.

政策设计室与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之间的战略辩论。

凯南不主张在未来战争中使用核武器。他认为美国的战略应该是,通过运用有限的、部分的以及平衡的军事力量,把苏联的势力限制在目前它所占有的势力范围之内。凯南指出,在军事力量的运用过程中,陆海空三军力量的运用应大体一致,不能片面强调以核武器为主的空中打击。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的建议与凯南截然不同。它建议政府应实行大规模发展空中力量的计划,最终成为美国的一种军事力量。在出现紧急军事状态下,可利用这一力量进行大规模的"空中战略打击"。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凯南观点的基本缺陷在于:如果限制核力量的运用,万一在未来发生敌对状态,美国可能第一次面临大规模的失败。由此可见,双方争论的焦点是,在战后美国军事战略中,是以常规武器为基点,限制核武器的运用,强调三军的力量协调,还是以核武器为基点,大力发展以携带核武器为主的战略空中力量。

1945 年 11 月,美国陆军航空兵司令阿诺德将军发表了一份官方报告,该报告虽然认为"美国必须承认,未来免受原子武器进攻的真正安全将依赖于我们用压倒一切的力量,采取立即进攻的能力;必须让潜在的侵略者明白,对美国的进攻,其本身将会立即受到巨大的、毁灭性的、来自空中的原子弹进攻。因此,原子武器使得进攻和防御的空中力量,成为民族生存的第一需要"。但报告也强调了制约这一战略的关键因素:第一,原子弹数量少,"由于原子弹需要消耗稀有的重要作战物资,占用大量的工业生产能力",从而使其造价极高,不能随便用如此珍贵的武器去打小的目标,也不可以冒险携带它穿过严密的防空区。第二,当时能够运载原子弹的惟一手段是航程有限的轰炸机,因此有必要取得海外基地,这就需要依靠常规作战来获得和维持。与此同时,参谋长联席会议主持的一个项目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如果敌人很"顽强"并有足够的剩余部队,即使最后使用原子弹也未必能解决问题;要取得胜

利就必须实际攻占敌人的国土直到其最后停止抵抗为止，为了完成此项任务，陆军和海军自然都是必不可少的。

随着东西方关系的进一步紧张，人们越来越注重美苏双方力量的对比问题，因此，原子弹在美国战略中的地位日益突出。美国军方也越来越认为在战争初期使用原子弹可以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从而强化了使用原子弹的意见。空军在一份重新估价美国军事战略的研究报告中提出，原子弹不仅可以使用，而且可以决战决胜，并不需要在使用原子弹之前或使用的同时进行常规战斗。该报告进一步指出："在以往的战斗中，军队要花许多力气去攻占能把敌人要害地区置于攻击距离之内的基地。但有了原子弹和远程轰炸机后，没有这些中间基地也能够对敌人心脏地区进行摧毁打击，至少可以减少所需要的中间落脚点的数目。假如可以生产大量的原子弹，战争的目的又是使敌人彻底屈服，那么在战争一开始就可冒些风险进行一次全面的原子弹袭击，把敌人吓得目瞪口呆，乖乖投降。"[①]同时，技术上的两项重要的发展也使得人们相信原子弹的使用不再是遥远的事情。首先，科学家已经发明了通过更有效地使用裂变物质的办法来更容易地生产原子弹；其次，美国第一批 B－36 型远程轰炸机即将交付使用，这将减少美国对海外基地的依赖。

使用核武器的设计与美国核战略的形成

在上述战略前提下，使用原子弹便成为美国战后军事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下属机构设计了在战争爆发时使用原子弹的诸多方案。

1945 年 11 月，联合情报委员会向参谋长联席会议递交了第 329 号报告。它以苏联为美国的假想敌，选择苏联 20 个最重要的

① Lawrence Freedman, *The Evolution of Nuclear Strategy*, pp. 54～55.

目标作为战争爆发时原子弹轰炸的对象。1946年,该委员会又呈送了第329-1号报告。它对苏联的作战能力进行了分析,认为由于缺乏远洋舰队,苏联在最近的将来不可能进攻美国本土。报告的结论是:美国对苏联使用核武器不会遭到苏联的反击。联合军事规划委员会的设想也充分考虑了战略空军的力量。根据该委员会1945年12月发布的第432-E号指令,美国空军可以利用英国、意大利(福贾)、印度(亚格拉)、中国(青岛)和日本(冲绳)的基地进攻苏联。它认为,美国在对苏联的中心城市进行决定性打击时,所能采用的惟一有效的武器就是远程飞机所携带的原子弹。"如若从上述基地起飞,并运用现有196枚原子弹,那么美国便能给苏联武装力量的工业源泉以毁灭行动打击,从而一举解决问题。"

1947年开始,美国各军种开始制订联合作战计划。这些计划体现了这一时期美国军方的基本构想:主要依赖在战争初期使用原子弹进攻,以达到两个战略目的,一方面阻止敌军前进,另一方面摧毁敌人重要的社会和经济目标,从而迫使敌人投降。这些计划最重要之处是其中一个关于使用原子弹的附件,它规定"最重要的目标群"是苏联城市和重点工业区;如能将其摧毁,"就会使苏联的工业和控制中心瘫痪,从而大大削弱其武装部队的进攻和防御能力"。空中进攻将以一系列空袭开始,主要使用原子弹,时间为30天左右,共袭击70个目标地区,其中包括居民2800万左右,这些居民将有10%丧生,另有15%受伤。[①]

与此同时,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也开始进行有关战略设计。1947年8月,国务院政策设计室完成了第7号文件,提出美国应该面对苏联军事上的挑战。1949年9月,在同国务院、陆海

---

① Thomas Etzold, John Lewis Gaddis, eds., *Containment: Documents on American Policy and Strategy, 1945—195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357～360

空3部、国家安全资源局以及中央情报局进行充分磋商后,国家安全委员会完成了绝密文件——《美国对于原子武器的政策》,即国家安全委员会第30号文件。它从以下4个方面论证了“决定现阶段制订有关使用原子武器可行性”的问题:第一,如果战争不可避免,不能限制核力量的运用;第二,国内外因素对使用原子弹的确认,反对以道义为借口禁止使用原子弹;第三,没有国际管制原子弹的体制,美国不能单方面决定禁止使用原子弹;最后,强调使用原子弹的决策是军事责任与政治责任的双重结合。基于上述4个方面的论证,国家安全委员会得出结论:第一,在敌对状况下,国家安全机构必须准备有效而迅速地使用一切适用的手段,包括原子弹,以保卫国家的安全利益,并为此制订相应计划。第二,在战争状态下使用原子武器的决定,将由行政首脑在他认为需要这样做时作出。[①]

国家安全委员会第30号文件展示了战后初期原子弹在美国军事战略中的重要性。一方面它注意了原子弹与西欧安全的关系:由于与西方盟国的伙伴关系以及美国进行原子弹战争时必须使用西欧的军事基地,因此美国和西欧都意识到它们军事同盟的重要性;美国可以借此威慑苏联,保卫自己在欧洲的利益,西欧则可以借助美国的原子弹,抵消苏联在东欧的地面部队对它们国家安全的威胁。这种关系的发展结果,便是1949年北约组织的形成。对美国而言,这是它建国以来第一次在和平时期与西半球以外的地区结成军事同盟。另一方面,国家安全委员会强调了战略空军与核武器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意义。文件的制订者从未来美苏之间爆发战争的假想出发,明确要求对使用原子弹作出计划。正如杜鲁门在1949年4月的一次讲话中所宣称的:“假如使用原子

① Thomas Etzold, John Lewis Gaddis, eds , *Containment: Documents on American Policy and Strategy*, 1945—1950, pp 339~343

弹的决定是为了美国的利益而世界上的民主国家又处于危险之中，我将毫不犹豫地再次作出这个决定。”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军事战略的制订者明显强调了空军的力量和盟国的重要性。至于如何判断使用原子弹是“为了美国的利益”和“拯救处于危险之中的民主国家”，对决策者来说则缺少明确的标准。

与此同时，美国军方也开始有人怀疑原子弹对于敌人最终究竟有什么作用。在最初几个军事计划制订出来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第30号文件通过后不久，以空军中将哈蒙将军为首、由各军种代表组成的审查委员会检讨了原子弹的效用问题。哈蒙报告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严密的思考，并提出了疑问。报告肯定了原子弹的价值在于它是“迅速威慑敌人，重创苏联要害部门，从而打击其作战能力的惟一手段”。更为重要的是，要实现原子弹的这一军事价值就必须破坏苏联武装部队的各种石油产品的供应。另外，与普通看法大相径庭的是，这个报告指出除非辅之以巧妙的宣传和政治措施，否则使用原子弹可能在政治上造成反作用。赞同战略轰炸的论点总是强调使用原子弹可以摧毁敌人的斗志，但实际上，可能适得其反。哈蒙报告为此强调：“对于大多数苏联人民来说，原子弹轰炸正好证实了苏联的排外宣传，使他们更加憎恶美国，团结起来，增强斗志。”[①]哈蒙报告成为战后有关原子弹战略价值讨论中最有价值的一份官方文件，但它的影响相当有限。当时美国军方，特别是空军普遍认为原子弹是现代战争一种无法抵御的力量。同时，由于美国决策者十分重视苏联常规力量在欧洲占优势的问题，因此他们一向认为原子弹是可以用来克服美苏常规力量不平衡的最佳手段。1949年初，美国决策者估计，美国的核垄断会持续若干年。而杜鲁门在1946年时曾告诉美国的原子弹之父奥本海姆，

① Thomas Etzold, John Lewis Gaddis, eds., *Containment: Documents on American Policy and Strategy*, 1945—1950, pp 360～364

他相信苏联永远造不出原子弹。

但出乎美国的预料,1949 年 8 月苏联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原子弹爆炸试验,从而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美国对此的反应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以美国垄断核武器为基础的战略理论失去了支撑,另一方面美国更加努力发展它的核战略。面对苏联制造和投放原子弹的能力越来越强的事实,美国的对策不是放弃依赖核武器,而是下更大的赌注,进一步研制氢弹,从而开创了战后美苏核军备竞赛的先例。

美国估计,苏联到 1954 年将拥有 200 枚原子弹和投送若干原子弹的运载能力。为此杜鲁门于 1950 年 1 月下令国务卿艾奇逊和国防部长约翰逊"根据苏联可能拥有的裂变弹实力和热核弹实力重新审查我国在和平与战争时期的目标,以及这些目标对我国战略计划的影响"。为此,艾奇逊指示接替凯南担任国务院政策设计室主任的保罗·尼采"对美国国家安全政策依次进行全面研究"。1948 年,尼采完成了标号为 68 号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

国家安全委员会第 68 号文件认为东西方之间的敌对状态将持续下去,战争的危险不仅来源于危急之际可能发生的判断错误,而且也可能是苏联预谋的侵略所造成的后果。文件认为苏联的危险不仅在于它将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强加于苏联人民,而且还要将其强加于世界人民。文件对两国核武器的发展趋势以及对核武器的态度进行了详细的估算。它推测,一旦战争爆发,"很难想象苏联领导人会放弃使用原子弹,除非他们完全有信心可以用其他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另外,文件接受了要打核战争自然就要进行突然袭击的观点,承认"在进行迅雷不及掩耳的偷袭方面,集权主义国家比开放社会占优势"。同时,文件不赞成关于两个拥有原子弹的大国可以在相互威慑中稳定共处的意见,认为这样的国家只会相互威胁,从而刺激战争的爆发,因为苏联比美国更适合采取核战略。因此文件建议:"在缺少有效的军备控制的

情况下，我们似乎没有其他的选择，只能在其他方面的考虑也允许的情况下，尽快扩大原子武器的生产。无论是致力于军备控制还是生产原子武器，绝对有必要尽可能迅速增加我们的和盟国的陆海空各军种的力量，使我们在军事上不过分依赖原子弹。"但文件也承认，在建立起强大的常规力量之前，美国只能依赖原子弹，并在核力量方面尽可能长期保持对苏联的明显优势。为此，国家安全委员会拒不接受有关不首先使用原子弹的主张。它指出："由于我们的常规武器目前处于相对没有准备好的状态，如果采取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会使苏联认为我们承认自己很软弱，也会使盟国以为这显然表明我们准备抛弃他们。"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的结论是："本纲要的成功完全依赖于美国政府和人民以及全体自由国家的人民认识到冷战实际上是一场关系到自由世界存亡的真正战争。"美国必须准备在任何地区同苏联抗衡，不论这些地区代表美国的"边缘利益还是根本利益"，任何吸引苏联的地区都是美国的势力范围。[①]

随后，杜鲁门指示进一步考虑该报告所提出的行动纲要，特别是它所需要的费用。尼采估计约为500亿美元。虽然艾奇逊让他压低数额，但仍然高得吓人。第68号文件出笼后的最初一个月，受到了各部门的严厉批评，但惟独没有批评它对核武器的看法。1950年6月朝鲜战争的爆发似乎证明了文件结论的正确性。9月杜鲁门正式批准了这份文件。到1953年夏天，美国的核储藏量已增加到1000件。到50年代末，又增加到1.8万件。[②]杜鲁门政府的核政策为艾森豪威尔时期推行"新面貌"和"大规模报复战略"奠定了基础。

---

① 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委员会文件的全文，见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0, vol 1, pp 235～292

② 麦乔治·邦迪：《美国核战略》，褚广友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320页。

“大规模报复战略”及其影响

促使新战略诞生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对核武器看法发生了变化。到1953年，杜鲁门时期上马的各种核项目已经取得了成果，美国已经拥有一系列不同水平的核打击力量，大到可以摧毁一个城市的氢弹，小至可以在战场上使用的小型战术核武器。虽然战略核武器和战术核武器各有各的支持者，但这两种武器可以说是这一时期美国核战略的两个主要方面，其中，战略核武器用来威胁毁灭苏联和中国的城市及工业中心，而战术核武器则可通过增加部队的火力弥补人力的不足。战略核武器和战术核武器之所以能同时并举，是因为美国已经可以大批量生产这种武器了。另外，经济上的考虑也是促使核武器成为美国战略核心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加强常规军备远较核武器更费钱。因此，在美国决策者内部要求把核武器“常规化”的呼声甚高，其中以国务院、参谋长联席会议以及财政部要求最为强烈。艾森豪威尔时期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阿瑟·雷德福强调指出：“我们一方面花大笔的钱去生产这些武器，而另一方面却又因为担心公众舆论而在使用这类武器的问题上萎缩不前……如果我们确实建议使用这些武器，那么现在该是明确我们对使用这类武器的立场的时候了。”他还强调，除非全面使用核武器，否则就不可能有效地改变目前武装力量的组成状况。财政部长乔治·汉弗莱认为，依靠原子武器能节约大量资金，只有大规模使用这种武器，才能真正改变国防部的计划，削减军事预算的开支。国务卿约翰·杜勒斯则说得更直截了当：美国必须设法排除使用这类武器的禁忌。他在1953年曾对《纽约时报》的记者说，美国不会对红色中国发动一场地面进攻，而将对中共大陆的港口和岛屿采取海上和空中打击。艾森豪威尔无疑赞同上述观点。他很快批准了要求赋予核武器以常规地位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62/2号文件，并在1954年初致国会的国情咨文中描述核武器

"强有力地增加了我们的财富",因为"在1946年尚被认为只是遥远将来之可能性的各类原子武器,今天已经获得了我们武装力量武器库中的常规地位"。

到1954年1月,杜勒斯公开宣布了艾森豪威尔政府这一新战略。他在纽约外交学会发表的题为《外交政策演变》的演说中宣称,阻止侵略的办法"主要依靠在我们自己选择的地点,用我们自己选择的方式进行立即报复的巨大能力"。杜勒斯的讲话很快被称为"大规模报复战略"。《纽约时报》评论说,华盛顿正在"以各国政府谈论这一问题时所使用的最为明确的语言告诉中国人和俄国人,今后不论是在朝鲜、印度支那、伊朗还是在其他任何地方发生的新的代理人战争或灌木林火式的战争,美国都可能用原子弹对苏联和红色中国进行报复"。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也说,美国将"不允许共产党人在世界各地的小型战争中把我们一口口地吃掉,我们今后将主要依靠我们的大规模机动报复能力,其好处在于我们可以自己斟酌决定在我们所选择的时间和地点使用这种能力,打击侵略的主要策源地"。还在杜勒斯讲话之前,1954年1月8日,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式批准了题为《使用原子武器的一项政策》的文件。艾森豪威尔对国会领袖解释说,如果"共产党再次发动战争",他将计划用美国"拥有的一切武器打击它们"。[①]

以"大规模报复"为基点的"新面貌"战略对战后美国经济、军事及军事思想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首先,"新面貌"是作为一项国家安全政策提出的,然而也体现了艾森豪威尔的思想,即保持美国实力最有效的途径是增强经济实力。在他执政的8年时间里,无赤字的国家安全一直是国防政策的基本指导思想。这一政策的结果刺激了这一时期美国工业和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也促进了

①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2—1954, vol 15, pp 1700--1705

国民经济的军事化。50年代,迅速发展的军事工业与政府的某些官僚机构相互影响、相互利用而形成的"军事—工业复合体",对美国的政治、经济甚至社会生活都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其次,"新面貌"政策改变了美国对未来战争的看法,从而引起美国在建军方针、备战计划以及军队建设等方面的一系列重要变化。在杜鲁门时期,美国对未来战争的设想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为基础,认为战争的胜负仍将由陆海空三军在陆上的共同行动来决定,核武器只是加速战争进程的"最后手段"而已。在军队建设上,杜鲁门政府奉行三军均衡的方针,在加速发展核武器的同时,常规力量的发展也得到高度重视。而艾氏政府则认为,未来战争是全面核战争,将以核突袭开始,随之实施常规地面进攻,战略空军和核武器将是战争进程和结果的决定性力量。在建军方针上,艾氏政府不再搞三军均衡,而要求所有的军种都要装备核武器。结果,陆海军的经费大幅度削减,海军的经费只是在后来研制和采购核潜艇才开始回升,而空军的费用则稳步上升。在这种政策的指导下,从1953年到1961年,美国的核武器数量由1350件增加到2.3万件。由于拥有大量的原子弹,艾氏政府认为,在战争爆发的情况下,美国应优先考虑使用原子弹。

最后,"新面貌"对战后美国军事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这就是核威慑思想的形成。威慑的概念虽然在美国战略思想发展史上由来已久,但一直是一种次要的考虑;甚至在朝鲜战争之前,美国关于战略的定义也没有因核武器的出现而根本变化。而"大规模报复"战略则引进了"威慑"这一全新的概念,核武器的报复能力越大,越现实,实际上使用的可能性就越小。因此,核武器的作用主要不是为了战争,而是为了遏制战争。把美国的战略定义从达到战争目的而应用战斗,变为主要是以军事力量遏止战争,是美国战略思想史上的一场革命,其最主要的结果就是为美国战略添加了新的基石——核威慑。

第六章　冷战中的热战：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

1950年6月25日清晨，朝鲜战争爆发。这场战争是在复杂的形势下产生的一个复杂的问题，不能用简单的判断来解决。从内部看，它是朝鲜南北双方矛盾积累并不断深化的结果；从外部看，战争的根源在于美国和苏联在朝鲜半岛划分势力范围和冷战的对峙。没有美苏之间的冷战，朝鲜是不大可能分裂的，而没有朝鲜的分裂，便不会有朝鲜战争。

朝鲜战争与美国"有限战争"战略的形成

在战争爆发后的一个星期里，美国政府连续召开高层会议，迅速做出军事干预的决定。认定朝鲜战争的性质是美国政府制定一切有关政策的决定因素。杜鲁门总统认为，这次战争是北方的一次"算计好了的侵略"，是"柏林事件更大规模的重演"。同时美国决策者还认为，"进攻是由苏联发动、支援的和怂恿的，非用武力不能加以制止。"[①]美国军方的反应更为强烈，因为在本世纪朝鲜战争爆发之前，美军几乎没有打过真正的局部战争，美军领导人的头脑里没有"有限战争"的概念。所以面对北方越过三八线，他们想到的已经不是朝鲜战争的本身，而是以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开始了，

① 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394、400页。

苏联“终于要决一雌雄了”。[1]在战争爆发后举行的第一次高层会议上，美国决策者就战争的性质达成了共识。这不仅使他们下决心进行军事干预，而且很快便上升为全面的干预。杜鲁门批准增加对南朝鲜的军事援助，出动海空军掩护美国非军事人员撤退，同时命令三军参谋长立即做好参战准备。26日，朝鲜战局急转直下，北朝鲜占领了南朝鲜首都汉城。杜鲁门召集紧急会议，决定美国海空军向南朝鲜提供一切援助，但有关军事行动要限制在三八线以南。28日，根据国防部的紧急动议，杜鲁门召集军政首脑开会，国防部长约翰逊在会上提出一项事先得到参谋长联席会议同意的方案，建议取消海空军不得越过三八线的限制，并决定投入美国地面部队和辅助部队。会议很快批准了这一方案。杜鲁门向盟国占领日本最高司令麦克阿瑟发出第84681号命令，授权他使用美国地面部队保卫朝鲜半岛南端的港口、机场和其他交通设施，增加海空军力量，并取消它们不得越过三八线的限制。两天之后，参谋长联席会议根据麦克阿瑟的请求，下达了第84718号命令，取消了前项命令中关于限制使用美军地面部队的规定，将麦克阿瑟可以采取行动的界限划定在“目前情况下不危及日本的安全”。至此，美军全面卷入朝鲜战争。

在美军全面卷入的同时，美国政府还把朝鲜问题紧急提交联合国，力图给美国的行为披上一层合法的外衣。国务院和国防部共同起草了一项建议，提出成立统一的联合国军司令部，由美军推荐一名司令统一指挥各国军队。7月7日，由于苏联代表缺席，该提案获得安理会的通过。除美国之外，还有15个国家先后提供了数量不等的战斗部队，它们是：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哥伦比亚、埃塞俄比亚、法国、希腊、卢森堡、荷兰、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土耳其、南非、英国。另外还有丹麦、印度、意大利、挪威、瑞典5国

---

① 李奇微：《朝鲜战争》，军事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3页。

提供了医疗队。实际上，美国提供联合国军地面部队的50%，空军的93%，海军的86%。7月24日，麦克阿瑟宣布在东京成立联合国军总部。

从战争爆发到7月上旬，美国决策者作出的各项决定基本上表明了美国的政策目标，即以联合国军的名义对朝鲜战争进行全面的军事干预，使朝鲜半岛恢复到战争爆发之前的状态。但此时美国决策者内部也存在不同的意见，认为美国应利用这一有利的时机统一朝鲜。随着美军在南朝鲜防线的收缩以及增援部队的陆续到达，美军开始在朝鲜南端釜山外围建立一道坚固弧形的防线，朝鲜人民军的攻势陷于停顿。战场形势的变化对美国重新审定政策目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军方的坚持下，8月25日，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分别召开会议，讨论是否越过三八线的问题。与会者基本同意，美军应越过三八线。9月1日，杜鲁门第一次公开表示美国将改变战争目标，他声称美国将努力使朝鲜获得统一。11日，杜鲁门批准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定的有关美军在朝鲜行动方针的报告，其主要内容是只要中苏不介入，美军就可以占领北朝鲜。在向三八线以北进攻时，沿朝中、朝苏边界地区不得使用美军作战；如中苏军队介入，美军避免在北朝鲜进行地面作战，并不得采取使局势更为严重的行动。至此美国实际上已做出武力统一朝鲜的决定。而仁川登陆的成功更是推进了这一决定的实施。

8月下旬，朝鲜人民军又开始发起一场新的攻势，31日，朝鲜人民军突破了洛东江防线。面对这种战局，麦克阿瑟希望实施一次大胆的战役来一举扭转自己不利的处境。麦克阿瑟设想在仁川发动一次两栖进攻，以此来迅速收复汉城；同时也可以破坏洛东江一线北朝鲜的后勤供应。更为重要的是，麦克阿瑟认为，当他在南方的部队从洛东江防线发动反攻时，在仁川登陆的一支部队就将成为他的第8集团军和南朝鲜军队"砸碎"北朝鲜军队的一个铁砧。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在离麦克阿瑟大本营较近的一个地方实

施一次两栖作战，但麦克阿瑟坚持认为，北朝鲜军队已经耗尽全力并且濒临崩溃的边缘，通过汉城切断它们的退路将加快它们的崩溃，而一场距本部较近的登陆只能使他们退缩到一条新的防线。麦克阿瑟强调说："两栖登陆是我们所拥有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为了很好的使用这个手段，我们就必须深入敌后狠狠打击敌人。基于出其不意、旨在切断敌人供应线的纵深包围，现在是而且一向是最决定性的战争策略。"①但其他一些因素给参谋长联席会议和海军增添了新的担忧。从地图上看，位于朝鲜西海岸的仁川也许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但它却不是一个适于进行两栖登陆作战的理想地点。为了到达那里，进攻舰船将不得不在没有正常导航灯的情况下，探路通过一条狭窄而曲折的通道。如果其中一艘舰船在那里沉没，前面的舰船就将陷于困境，而后面的舰船航路就会堵塞。那里的海浪最高可以达到 33 英尺，并可以产生每小时 5 海里的潮流；那里还沉积了大量的泥沙，从而造成了航行的困难。为了确保坦克登陆艇有足够的水深，进攻时间将不得不选在高潮期。在 1950 年秋季，进攻只能在 9 月 15 日、10 月 11 日和 11 月 3 日这 3 天或其前后进行。这次进攻将在防波堤而不是在海滩上进行，而且必须立即进入市区街道。另外，一个名叫月尾岛的小岛高出仁川港，必须在进攻前对该岛进行轰炸并占领它，这样就会暴露进攻意图。但麦克阿瑟坚持他的设想。

9 月 15 日，美军在仁川成功登陆，无一伤亡。第二天，第 8 集团军越出釜山防御圈开始反攻，美军以南北夹击之势，切断朝鲜人民军的退路。9 月 26 日，第 1 骑兵师的部队与在仁川登陆的第 7 师会合。这两项行动摧毁了三八线以南的北朝鲜军队，俘虏 10 万多人。9 月 28 日，联合国军夺回汉城。随着仁川登陆的进展，9 月 27 日，杜鲁门批准了一项新指令，授权麦克阿瑟在三八线以北进

① 拉塞尔·韦格利：《美国军事战略与政策史》，解放军出版社，1986 年版，第 460～461 页。

行军事行动以“摧毁北朝鲜的武装力量”。10月1日，麦克阿瑟向美军下达突破三八线的命令。同日，李承晚也向南朝鲜军队下达了越过三八线的命令。

这时美国整个军事部署的前提是中国不会参战。10月12日，中央情报局在《关于中国干预朝鲜可能性的报告》中承认，中国地面部队即便没有空军的掩护，仍然具有有效干预的能力；但从军事角度看，进行干预的最有利的时机已经过去。中央情报局的结论是，今后中国“最可能是继续以隐蔽的方式援助北朝鲜”。虽然如此，美国政府对美军大规模越过三八线后中国会做何种反应，心中一直无数。为了进一步了解中国参战的可能性，10月15日，杜鲁门飞抵威克岛同麦克阿瑟进行会谈。麦克阿瑟在会谈中认为，中苏进行干涉的可能性极小，因为中苏进行干预的最有利的时机已经错过。中国兵员不足、没有空中掩护以及中苏不能在军事行动中很好地配合等原因，都制约着中苏参战。杜鲁门对此非常满意，他坚信“不久将恢复全朝鲜的和平”。威克岛会谈后，美国不顾中国的一再警告继续北进。10月24日，麦克阿瑟指示美军要“一鼓作气”打到鸭绿江。但25日在云山一带的美李军队遭到于16日开始入朝参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沉重打击。

11月底，中国人民志愿军对美国第8集团军和独立第10军发动进攻，迅速将联合国军赶回三八线一带。中国人民志愿军两次战役的胜利对美国在军事上和心理上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麦克阿瑟报告说：“我们正面临着一场全新的战争。”《新闻周刊》评论说：“这是自珍珠港以来美国军事上最大的失败，也许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军事灾难。”面对美军的一再溃退，美国决策者一方面频繁开会，估计朝鲜战场的形势和商讨对策，另一方面，政界、军界的一些人开始公开鼓吹扩大战争、对中国使用原子弹。麦克阿瑟首先建议把战争扩大到中国本土，并扬言要把35～50枚原子弹投到中国东北的重工业基地和军事基地；在打退中共的进攻后，沿鸭绿

江铺设一条放射钴地带,以防止中国再次发动进攻。麦克阿瑟抱怨说:“华盛顿根本不懂得远东地区的政治,我们要是能够打败红色中国的军队,就可以让蒋介石重返大陆,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使用原子弹。”[①]杜鲁门也同意战争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12 月 15 日他宣布全美处于紧急状态,加快了预备役的动员,并通过第 4 次追加军费来执行重新武装的计划。由于杜鲁门手中没有一个可以随时投入战斗的战略预备役师,所以无法给麦克阿瑟增加更多的部队,而只能对损失的部队进行补充。在扩大战争的问题上,英国明显持反对意见。联合国军虽然决定打下去,但已经回到原来的目标,即维持南朝鲜政权的存在。而这一点是麦克阿瑟无法接受的。

1951 年 1 月 1 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发动第三次战役,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使用优势兵力猛扑联合国军在汉城以北的阵地。中国军队和朝鲜人民军不顾重大伤亡,继续进行攻击,击溃了南朝鲜的 2 个师,纵深插入李奇微指挥的联合国军的中央阵地。李奇微命令联合国军撤出汉城及仁川港,当中国人民志愿军从北面攻入汉城时,最后一批联合国军正在撤出汉城,并炸毁了汉江大桥。从 3 月中旬开始,联合国军开始反攻,到 3 月底,双方在朝鲜战场的战线又恢复到三八线一带。由于美国已经下定决心在朝鲜打一场有限战争,4 月 11 日,杜鲁门撤销了麦克阿瑟在远东司令部的一切职务。同时朝鲜战场上形成了拉锯式的阵地战,最后双方同意举行停战谈判,并于 1953 年 7 月 27 日正式签订了朝鲜停战协定。

朝鲜战争标志着 1945 年以来美国军事政策的转折,它为美国重整军备和北约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政治气候,它还促使美国在亚洲发挥更为积极的军事作用。美国在战争期间以及战争结束之后同亚洲一些国家和政权签订了双边或多边的共同防御条约,从

① 《麦克阿瑟回忆录》,台湾文国书局,第 251~252 页。

而使亚洲同欧洲一样成为美国全球防御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美国政府为打朝鲜战争总共花费了400亿美元，动用了200多万人。它在朝鲜战争中阵亡33629人，20617人死于事故和疾病。美国的盟国共阵亡6.1万人。虽然从全球的观点看，这场战争是有限的，但它波及到东亚和东北亚的大部分地区。只有后来亚洲发生的另外一场战争，才对美国的军事政策产生比朝鲜战争更大的影响，那就是越南战争。

越南战争与美国军事战略的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就开始卷入印度支那的事务。1954年8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拟定了一份对印度支那的政策文件，基本上确立了以后几年美国对印度支那的政策基调：在越南取代法国，全力扶植南越吴庭艳政权，直接插手印度支那事务。随后，美国开始向西贡提供大量援助，美国军事顾问团也开始训练南越军队。当吴庭艳于1955年宣布南方的"越南共和国"是个独立国家的时候，华盛顿迅速予以承认并声称将保卫南越的"独立和自由"。就这样，美国破坏了日内瓦协议有关1956年举行越南大选的规定，扼杀了越南和平统一的可能性。从1955年到1961年，吴庭艳得到了美国10多亿美元的各类援助，美国平均每年向他提供大约8500万美元的军事装备。到1960年初，美国军事顾问团达到685人，帮助训练和建立一支15万人的南越军队和5万多人的警察部队。美国对印度支那正式承担了军事义务，走上直接卷入印度支那冲突的道路。

1961年，刚刚上台的肯尼迪授权拨款2840万美元用于扩充南越军队，1270万美元用于装备和训练南越的保安队，还同意建立一个关于越南问题的总统特别工作小组，负责审议南越所谓反叛乱计划。1961年5月，美国派遣了100名"特种作战部队"进入南越，之后又提出了在"18个月内绥靖南越并在北越建立基地"的

计划。10月肯尼迪又派总统特别军事代表、前陆军参谋长马克斯韦尔·泰勒前往南越考察派遣美国后续部队进入南越的问题。泰勒在考察报告中提出应争取农民,封锁南越共产党与外界的联系,尤其是切断越南北方的支援。为此,泰勒建议美国向南越派遣美国武装直升机部队和提供大量的轻型飞机,迅速增加美国军事顾问以及驻越特种部队的人员等。肯尼迪政府接受了这一建议,从此美国在越南开始了反游击战的特种战争,其在越南的军事人数不断增加,1962年为9000人,到1963年11月肯尼迪遇刺时已经达到1.67万人。1962年2月,美国还在西贡成立了以保罗·哈金斯中将为司令的"军事援助司令部",统一指挥在南越的美军和南越军队。

林登·约翰逊继任总统后,美国在越南已经处于进退两难的处境,特种战争的政策面临着失败。在这种情况下,约翰逊决定加强对南越的支持,向南越增派军事顾问7000人,追加5000万美元的经济援助。约翰逊还任命威斯特摩兰将军为驻南越美军总司令,派泰勒将军为驻西贡大使。1963年底制定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行动备忘录》明确表示,美国卷入南越的中心目标是"为了帮助那个国家的人民和政府在反对外部指挥的和得到外来支持的共产党的阴谋的斗争中取得胜利"。为此约翰逊政府首先决定对北越实施"秘密战"。所谓秘密战是指美国或美国指挥的南越部队秘而不宣地进行旨在打击北越的军事和准军事行动,它包括秘密破坏、骚扰、武装侦察和武装袭击等一系列方式。1964年2月,美国开始实施代号为"34A行动计划"的秘密战方案。①

越南战争由特种战争转变为局部战争是从1964年8月开始的。8月2日,美国"马多克斯"舰长报告说,他在东京湾执行一项

① George Herring, *America's Longest War: The United States and Vietnam, 1950—1975* (*New York*, 1986), pp 118~119.

任务时，遭到3艘北越鱼雷艇的攻击。尽管舰长后来又报告说不能肯定确实遭到袭击，但急于为战争升级寻找借口的军方领导人却不愿核查事实。[①] 8月4日下午，约翰逊主持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决定立即对北越进行"报复性轰炸"，并且向国会提出给与总统广泛授权的决议案。当天晚上，美国舰载战斗机轰炸机对北越的海军基地、油库进行60多架次的轰炸。这次轰炸成为美国正式卷入越南战争的导火线。8月7日，国会通过《东京湾决议》，授权约翰逊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击退对美国武装部队的"任何反击"，同时还授权约翰逊根据《东南亚集体防御条约》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协助这些国家"保卫其自由"。随后，美国从本土抽调大批作战飞机进驻南越，一批美国军舰也开始在越南海域集结。9月和11月，泰勒两次返回美国，与约翰逊商定逐步扩大越南战争的具体步骤，为此制定了"火箭行动"和"雷鸣行动"计划，要求美军逐步轰炸北纬17度附近的越南运补基地、纵深的军事目标以及工业基地。在1965年2月实施"火箭行动"之后，约翰逊在3月2日命令执行"雷鸣行动"。104架美国空军飞机和19架西贡空军飞机分别轰炸了北越的广溪弹药库和邦村海军基地。到1965年底，美国在北越上空总共进行了5.5万架次的轰炸飞行，投弹3.3万多吨，而这只是"雷鸣行动"的很小一部分。可以讲，"雷鸣行动"是美国在越南战争中一次严重的战争升级，标志着战争急剧地扩大到越南北部，同时也导致美军地面部队的卷入。1965年3月3日，美国海军陆战队3 900人"根据西贡政府的请求"，在岘港附近的滩头登陆，美国地面部队开始直接和大规模地卷入越南。

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主要作战区域大致可以分为南北两个战场，作战方式在南方以地面作战为主，在北方以空中轰炸为主。1966年以前美军在越南南方的地面作战基本上以北纬17度线至

① George Herring, *America's Longest War*, p.121

西贡的沿海基地为据点，构成环形防御圈的战役格局，逐步向南方解放区渗透，诱寻人民武装主力出击决战。在南越，美军最主要的军事行动是发动第一次"旱季攻势"，重点是指向南部的东区、中部平原和西原地区。同时美军还大量使用空军轰炸南越解放区，配合美军地面部队的进攻。1966 年 2 月威斯特摩兰在檀香山会议上提出了 5 点军事战略，主要内容有：保卫主要居民中心，逐步建立交通线，保卫美军基地安全，使尽可能多的美军处于机动状态以便抓住机会同越共主力决战，继续轰炸越南北方等。[1]在这一战略的基础上，美国继续强化"南打"，加剧"北炸"，力图从根本上扭转战局。美军集中主力部队和优势装备，深入越柬、越老边界，对南越人民武装力量的根据地进行长时间的反复扫荡，进而摧毁它们在西贡地区、南越中部和北部的根据地。在 1966 年到 1967 年美军发动的第二个"旱季攻势"中，美军驻南越境内的总兵力已经达到了 47 万人，美军的地面部队几乎全部投入到扫荡之中，使南越解放区遭到巨大的损失。

1967 年到 1968 年的旱季，美军为了巩固已经夺取的重要地区和继续扩大战果，采取固守与清剿相结合的战略。此时，南越人民武装在逐渐积蓄力量的同时，其武装斗争也开始从农村向城市发展。他们实行游击战和运动战相结合的战术，抓住战机，主动向美军出击。1968 年初，南越解放军在非军事区以南转入战略进攻，1 月至 3 月，南越解放武装共组织了 3 次大规模的"春节攻势"。春节攻势之后，"强大的美国突然像困在海滩上的鲸一样动弹不得了"。[2]对美国而言，再也没有比 1968 年春节攻势那样可怕的事情了。

在南方开展地面进攻的同时，美军还对北方进行大规模的轰

① George Herring, *America's Longest War*, p.156.

② 托马斯·帕特森等著《美国外交政策》，下卷，第 707 页。

炸。这是美国越南战争的重要战略组成部分，其主要目的是切断越南北方与南方之间的联系，阻断中国对越南的物资援助，使南方战场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在1965年3月以前，美国空军集中轰炸北纬20度线以南的地区。在此期间，美军集中轰炸的目标是北方的军事基地、雷达基地、无线电设施和船舶等。从1965年夏季开始，美军开始集中轰炸北越南下的交通运输线，主要目标是铁路、桥梁、公路线等通向南方的运输补给线。美军轰炸强度迅速加大，并将空袭战场逐步扩大到中越边境地区。1966年6月到7月，美军集中轰炸了北越的储油系统。在短短的1个月之中，美军摧毁了北越储油总量的70%。从1966年底开始，美军将轰炸重点集中在河内附近禁区内的一系列目标，特别是河内市区的工业系统。1968年4月以后，美军集中力量重点轰炸由北方途经柬埔寨通向南方的"胡志明小道"，并对北越的纵深目标实施报复性轰炸。据美国国防部透露，美军对北越的轰炸随着战争的升级而加剧，1965年共计出动飞机5.5万架次，投弹量为3.3万吨，1966年为14.8万架次，投弹12.8万吨，到1967年底，已投弹86.4万吨，超过美军在朝鲜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期间美军的投弹量(分别为63.5万吨和50.3万吨)。[①]

1969年1月，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面对变化了的国内外形势，尼克松开始改变越南战争"美国化"的局面，宣布美军将撤出越南，实行战争"越南化"。到1972年，越南南方军民在各个战场都发起了全面的战略反攻，美国再在也无法推行其"越南化"的政策了。1973年1月27日，交战各方在巴黎签订了和平协议，美国的越南战争结束。

越南战争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所参加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局部战争。在这场战场中，美军曾投入了9个师、4个旅和2

① 时殷弘:《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237页。

个团的兵力,人数最多时达到66.3万人。战争期间,美军阵亡人数高达5.6万人负伤多达30万人,耗资达2000亿美元。从美国军事史的发展角度看,越南战争中美军作战理论和作战方式的特点,给美军留下了丰富的经验教训,为美军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借鉴。首先,美军利用现代化的技术装备,把越南战场当做新式武器的试验场。美军利用实战的机会检验其新式武器的性能,改进其作战方法和手段,同时结合这种试验,对一些具体的作战方法和手段进行了研究、改进和充实。这些问题主要包括:在"没有前线和后方区别"的情况下,如何组织进攻与防御;解决在远离本土作战情况下的后勤保证问题;热带丛林战的作战方式问题等。所有这些都为美军作战理论的发展和更新增加了新的内容。其次,战略轰炸理论在越南战争中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美军在越南战争中针对目标的不同灵活采用不同的战术,常用的基本战术手段是以小编队、多批次、多方向低空侵入,并利用气候地形的因素,突然改变航线等方法,取得战术上的突然性。因此,美国的战略轰炸使北越遭到巨大的破坏。据美国军方统计,1966—1967年,单是摧毁或严重损坏的越南运输工具一项就包括9345辆机动车,4789个火车头和车厢,20925艘船只。到1968年10月底,美国估计已摧毁或严重摧毁北越77%的弹药库、65%的油库、59%的发电厂、55%的大中型桥梁和39%的火车站。从纯粹的作战意义上讲,美军的战略轰炸取得了预期的目的。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作战手段是,美军大量使用直升机配合地面作战。美军根据越南特殊的地形环境,利用直升机以便在最短的时间里把部队运往偏僻而交通不便的作战区域。一旦发现作战对象,就进行闪电式的袭击。同时,直升机在战场救护、兵员撤退等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直升机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美军生存的必不可少的要素。

除上述作战特点外,美军在越南战争中还表现出指挥反应迅

速、各军种协同作战周密等特点。在陆军同空军的协同作战中，美军实行的紧急空中支援申请程序简捷有效，地面部队提出申请后，支援飞机最快可以在5分钟内到达预定区域。在炮兵与步兵的协同方面，美军前沿步兵连以上单位均派有炮兵联络官，在步兵发出火力支援申请5分钟后炮兵即可进行射击。不容置疑的是，虽然越南战争极大地消蚀了美国的国力，但它却对美国军事理论和作战方式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在当今依然看得非常清楚。

第七章　海湾战争与新的战争观

从“沙漠盾牌”到“沙漠风暴”：美国与海湾战争

1990年8月2日，当地时间凌晨2点，在空军的支援下，伊拉克以5个师的地面部队突然大举入侵科威特。它两个师的先头部队从东段突入科威特境内，第二梯队3个师随后跟进，直取科威特首都科威特城。另外还有9个师开赴科威特边境待命。同时，伊拉克的海军陆战队在科威特城附近登陆，配合进攻。而科威特军队仅有2万多人，来不及进行有效的抵抗，防线就崩溃了。当天上午11点左右，伊拉克军队攻入科威特城并占领王宫。下午2点左右，伊拉克军队基本控制了科威特的首都，埃米尔国王乘坐直升飞机逃脱，他的兄弟、亚洲奥林匹克运动委员会主席法赫德亲王在保卫王国的战斗中阵亡。

8月3日，伊拉克军队攻占科威特西部和南部的一些重要地区，从而基本上控制了整个科威特。此次入侵造成1 300人的伤亡。8月7日，伊拉克宣布成立“自由科威特临时政府”，并废黜了科威特的萨巴赫政权。8月8日，伊拉克宣布正式兼并科威特，将其作为伊拉克的第19个省。

入侵事件发生后，美国做出了迅速而果断的反应。8月2日深夜，美国总统乔治·布什立即召集有关人员紧急磋商，讨论对伊拉克进行全面制裁的措施，并制定采取军事行动的多种选择。8

月3日,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柯林·鲍威尔将军在五角大楼指挥中心宣布美军驻巴林麦纳克港内的军舰进入戒备,在印度洋的"独立"号航空母舰向阿曼湾靠拢,印度洋迪戈加西亚岛的美国空军基地进入高度战备状态。8月4日,美国决策者敲定了军事行动的具体方案——"沙漠盾牌"行动计划。其主要的目标就是防止伊拉克入侵沙特,并采取一切手段迫使伊拉克撤出科威特,如有可能则推翻萨达姆政权。根据"沙漠盾牌"行动计划,美国各军种迅速部署了兵力。空军在3天内向沙特各个基地派遣96架F-15和F-16战斗机、72架轰炸机和100架支援飞机。另外一个拥有72架战斗机的空军联队在西班牙待命。一周之内,3艘航空母舰上的180架战斗机也加入这一行列。此外,14架F-111战斗轰炸机和50架巨型B-52战略轰炸机分别在土耳其和迪戈加西亚岛上的基地待命。整个部署完成之后,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各种飞机达到600架。

在地面部队方面,美军首先派遣了第82空降师,其主要使命是保卫美军在沙特的基地,并视情况准备将地面部队增加到30万人。在海军方面,常驻波斯湾地区的中东联合特遣部队的6艘军舰处于戒备状态,并开始积极巡逻,同时在阿曼湾和红海海域保持3艘航空母舰。在"沙漠盾牌"行动最初的几个星期里,美国机动作战中心提供了惟一可靠的陆基卫星通讯系统。[①]

为了便于统一指挥和协调,美国成立了以富有沙漠作战经验的中央总部司令诺曼·施瓦茨科夫上将为首的作战指挥中心,并很快在沙特建立了前线指挥部。8月5日,美国国防部长迪克·切尼率领要员到沙特,就派兵计划中的有关问题同沙特领导人进行最后协商;同时,美军进入部署准备。8月7日凌晨2点,布什正式签署了"沙漠盾牌"行动计划。7点30分,美军部署行动开始。

① 张相元主编:《海湾战争纵览》,1992年版,第13页。

美国空军战斗机部队首先开始部署。第一战术战斗机联队的F-15战斗机从弗吉尼亚兰利空军基地起飞，进行过7次空中加油，不间断飞行了14个小时后抵达沙特。8月9日，这些战斗机在从欧洲调来的美国空军RC-135"铆钉"侦察机和刚刚从美国飞抵的E-3预警飞机的支援下，沿伊拉克与沙特边界执行空中巡逻任务。从8月17日到9月中旬，美国空军调派了400多架战斗机、轰炸机分别进驻沙特、阿联酋、卡塔尔、阿曼和土耳其等地。B-52战略轰炸机也从太平洋地区和美国本土转场到靠近海湾地区的迪戈加西亚空军基地，使空中打击力量率先完成了部署计划。到10月6日，美国三军在海湾地区的总兵力已经达到了20万人，其中地面部队13万人，坦克1000多辆，作战飞机444架，海军舰艇78艘。在具体战略部署上，在距沙科边界50千米的地方布设了第1、第7陆战远征旅和陆军第24机动步兵师，M1和M60坦克为主要装备，构成了美军第一道防线。陆军第101空中突击师和第1骑兵师，第2装甲师和第11防空旅部署在距沙科边界100～250千米的区域内，主要装备"阿帕奇"攻击直升机、M1坦克和"爱国者"防空导弹，构成了坚固的第二道防线。美国陆军的其他部队和空军的A-10攻击机及其他飞机大都部署在沙特的中部地区，构成了第三道防线，可在必要时对一线进行作战支援和对伊拉克进行空中打击。

与此同时，美国开始了战时动员工作。8月22日，布什总统签署了第12727号行政命令，授权国防部长征召后备役部队和后备役人员服现役。8月23日，国防部授权各军种征召精选后备役人员服现役。最初规定征召1.5万名陆军、1.45万名空军、6300名海军、3000名海军陆战队后备役人员。同时，运输部长授权海岸警卫队，命令1500后备役人员进入现役。[1]

[1] 王普丰：《高技术战争》，国防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54～155页。

另外，美国后勤所需要的大部分设备也运抵海湾地区，部队医疗和生活设施也日趋完善；除2艘各有1000张床位的大型医疗船外，三军在沙漠上还建立了各自的医疗中心。同时，美军在波斯湾、红海和地中海附近的10个国家的海港、机场以及在关岛、泰国等地也建立起完善的转运、补给、维修等后勤保障网络。至此，“沙漠盾牌”行动计划已基本完成，美军由部署转入驻防和临战演练。

在国际社会对伊拉克进行的3个多月制裁没有收到明显效果后，美国开始为开战进行准备。为增强海湾地区的美军实力，进一步向伊拉克施加压力，从11月8日开始，美国向海湾地区大举增兵。1月5日，美国同伊拉克在日内瓦的外长会议破裂之后，美军更以每天5000人的速度向海湾地区增兵。根据1月10日的统计资料，美国在海湾地区的总兵力已经达到36万人。在沙特地区部署了27万人，1400辆坦克，630架作战飞机。在土耳其、卡塔尔、阿联酋、阿曼和迪戈加西亚空军基地共有作战飞机173架。在海湾水域的美军作战船只增加到81艘，其中在海湾内有6艘；在阿拉伯海的北部是一支由13艘军舰组成的“中途岛”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在红海的12艘军舰包括“萨拉托加”号航空母舰和“肯尼迪”号航空母舰，在地中海的29艘战舰包括“美国”号航空母舰和“罗斯福”号航空母舰，“突击者”号航空母舰正在开往海湾的途中。全部航空母舰部署完毕后，海军作战飞机将达到700架。到1月15日，美军作战总兵力将增加到43万人，坦克2000辆，飞机1300架。与伊拉克正规军51万人、坦克4000辆、作战飞机500架相比，已经相差无几。[①]如果加上多国部队中的其他力量，其实力已经远远超过伊拉克，美国已具备取胜的基本条件。至此，美军的任务已由保卫沙特转为将伊拉克军队赶出科威特。“沙漠盾牌”行动开始由守势转为攻势。

---

① 张相元主编：《海湾战争纵览》，第15～16页。

1991年1月17日,海湾战争进入实质性阶段,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经过充分准备后,向伊拉克发起大规模的进攻,开始实施代号为"沙漠风暴"的军事行动。

"沙漠风暴"的第一阶段是战略空袭。1月17日拂晓开始,多国部队的空中力量对伊拉克腹地的重要目标实施攻击,重点是萨达姆的指挥和控制中心,以及萨达姆进行战争所需要的关键性基础设施。在发起进攻之前,美国陆军第101空中突击师的"阿帕奇"直升机在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派出的MH-53J"低空铺路"直升机的引导下,用"地狱火"导弹对伊拉克边境的伊军预警雷达阵地进行攻击。而在发起这次进攻前几分钟,美国1架F-117A隐形战斗轰炸机摧毁了伊拉克南部防空作战指挥中心;其他的F-117A隐形飞机在发起进攻时飞过伊拉克防空体系的上空,攻击事先选定的巴格达的目标。这些攻击使伊拉克的政治统帅部门和军事指挥部门陷于严重的瘫痪状态。在整个战争期间,进行夜间攻击的F-117A隐形飞机是惟一的有人驾驶飞机。

在发起进攻后的几分钟,美国海军的"战斧"式巡航导弹开始从红海和波斯湾的军舰上不断攻击巴格达的伊军总部、通讯设备和配电设备等军事目标,以确保对伊决策人员不断施加压力。随后,美国空军的F-15E"鹰"式战斗机开始攻击伊拉克西部的"飞毛腿"导弹生产和发射设施。与此同时,大量的美国海军、海军陆战队、空军和盟国的攻击或支援飞机集中攻击伊拉克一体化的防空系统和指挥与控制设施,从而使伊拉克的防空系统再也无法协调防御了。多国部队的空军力量特别是美国空军根据不同的目标性质,在战略轰炸过程中使用了不同类型的飞机。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A-6飞机和F/A-18战斗轰炸机、海军陆战队的AV-8和海军的A-7飞机攻击和摧毁了伊拉克的防空雷达、通讯枢纽和军事司令部。美国空军的F-15、海军的F-14和海军陆战队的F/A-18飞机担负空中巡逻和搜索攻击目标,并在迅速

建立制空权方面起了重要作用。美国空军的 F－111 战斗轰炸机、F－15E 战斗机和海军的 A－6 强击机使用精确制导炸弹执行摧毁敌方坦克的任务。F－16 飞机轰炸了整个战区内的各种目标，B－52 轰炸机对伊军后勤供应点和其他目标进行了轰炸。美国空军的 A－10 强击机执行拦击"飞毛腿"导弹和摧毁坦克的任务。部署在前沿的海军陆战队的 AV－8B 飞机则提供空中支援，按计划攻击海夫吉以北的伊军炮兵阵地。在空战开始的头 3 周，美国海军航空兵的 A－6 飞机和 F/A－18 飞机和配备武装直升机的水面舰艇击沉和重创了伊拉克的导弹艇、扫雷艇、巡逻艇和武装气垫船，还摧毁了"蚕"式导弹发射阵地。[①]到 2 月 2 日，伊拉克海军已丧失了作战能力。

随后，多国部队的空袭目标主要是科威特境内的伊拉克防空力量，并在战略空袭阶段的基础上，确立对科威特和伊拉克的制空权。这一阶段是一次由美国的海军、海军陆战队、空军以及盟国飞机参加的联合作战行动。多国部队飞机击落伊拉克固定翼飞机 35 架、直升机 6 架，而盟国没有损失 1 架飞机。多国部队还袭击了科威特战区内的伊拉克地空导弹发射阵地、机场以及指挥和控制中心。至 1 月 27 日，美国中央总部宣布，伊拉克空军已经丧失了战斗力，多国部队已掌握了制空权。

这次空中战役，从根本上扭转了双方力量的对比。多国部队共出动作战和支援飞机 12 万架次，发射"战斧"式导弹 288 枚。这些攻击彻底摧毁了伊拉克的指挥和控制系统，萨达姆无法指挥战场上的作战，各级指挥官也同自己的部队失去了联系。伊拉克为支援科威特战区而存放的大批战略物资损失殆尽，补给物资必须通过的道路网遭到严重破坏。在整个战争期间，多国部队获得的制空权确保了地面部队的机动性和安全，从而为地面战役取得决

---

① 王普丰：《高技术战争》，第 163～164 页。

定性胜利奠定了基础。

“沙漠风暴”行动的第四阶段，是一场多国部队进行的海陆空联合战役，目的是切断伊拉克东南部的交通线，摧毁在科威特战区的伊拉克军队。它的主要作战考虑是，多国部队各军种合成的主攻部队绕过伊军预先准备的防御阵地，迅猛突进伊拉克腹地——幼发拉底河谷地区，包围伊军精锐部队共和国卫队。而在科威特的伊军，受到北面和西面的侧翼包围和南面的正面进攻，将被迫在投降和被歼之间进行选择。为了实施“沙漠风暴”计划，多国部队进行了仔细的战役部署。左翼为美国第 18 空降军，其编制包括第 82 空降师、第 101 空中突击师和第 24 机械化步兵师。第 18 空降军的右侧是美国第 7 军，管辖第 1 步兵师、第 1 骑兵师、第 1 装甲师和第 3 装甲师。中央是联合部队的北部司令部，管辖由埃及、叙利亚、科威特和沙特等国组成的部队。在联合司令部的右侧，是美国第 1 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辖第 1、第 2 陆战师以及配属的美国陆军第 2 装甲师第 1 旅。美国第 7 军和第 18 军以及盟国的一些部队，共配备装甲车和支援车辆 6.5 万辆，在地面战役开始前由东向西调动，进入伊军右翼的正面的进攻出发阵地。整师整师的兵力连同它们的支援部队行进几百英里而未被伊军发现。部队的运送大多是在松软沙漠便道上进行的，寥寥无几的公路网不仅使部队运动很困难，而且使运动的管理也变得很复杂。为了避免大规模的交通堵塞，多国部队认真制定了准确的行军时间表，每 15 秒钟有 1 辆军车通过 1 个检查站。这次大规模机动作战行动，被美军称为“漂亮的左勾拳”。

1991 年 2 月 24 日当地时间 4 点，多国部队的地面进攻正式开始。美军第 1 陆战队远征部队所属的第 1 陆战师迅速突破伊军的两道防线，并击退了伊军装甲部队的多次反攻。第 2 陆战师在完成排障任务后，在第 1 陆战师的左翼发起进攻。第 18 军也在自己的地带里长驱直入，第 101 空降师以空中突击方式向前跃进，占

领了通向幼发拉底河中途的目标，该军的攻击矛头指向伊拉克的心脏地带。位于第18军最右翼的第24机动步兵师和第1装甲师同时发起进攻。在第一天，第18军俘虏伊军2500人。第1陆战队远征部队、联合部队东部司令部和第18空降师的高速推进，使多国部队战区指挥官加快了其余部队进攻的时间表。

由于助攻方向的顺利发展，美军第7军几乎比原计划提前15个小时越过进攻出发线，并迅速深入伊拉克境内，攻击由伊拉克共和国卫队的装甲和机械化部队组成的预备役。第18军攻占了预定的目标，第24机械化步兵师在长途奔袭200英里穿过满目荒凉的沙漠后，到达幼发拉底河河谷地区，完成了对伊拉克南部和科威特伊军的包围。在空军和炮兵的支援下，第7军和第18军打垮了伊拉克的部队，俘虏大量伊军并摧毁了他们的装备。2月26日黄昏，多国部队已经推进到伊拉克境内数百千米，俘虏3万多人，歼灭和重创伊军42个师中的26个师，使其指挥和控制系统失去作用，并迫使伊拉克军队全面溃退。第18空降师保障了多国部队的左翼的安全，26日晚上，第7军在对伊拉克共和国卫队3个机械化师的进攻中担任主攻。2月27日，第1陆战队远征部队提前占领了科威特国际机场和西部高地等预定的最后目标，从而完成了进攻任务。第7军和第18军在当地时间8点继续进行进攻，以完成对伊拉克共和国卫队的攻势作战。2月28日8点，进攻作战停止，整个海湾战争结束。此时距地面战役打响仅100个小时。据美国军方的统计，多国部队共俘虏伊军8.6万人，击毁和摧毁伊军坦克3847辆，装甲运输车1450辆，火炮2917门。在“沙漠盾牌”和“沙漠风暴”行动中，美军死亡为184人；在“沙漠风暴”中美军受伤213人，被俘或战斗中失踪52人。[①]

① 张相元主编：《海湾战争纵览》，第857页。

美国新的战争观

高技术历时42天的海湾战争，体现了未来战争的许多特点。通过这场战争，美军完善了对未来战争模式的构想，并发展出一种新的战争观。

首先，高技术是决定未来战争胜负的关键。1992年美国国防部长切尼在向国会呈送的题为《海湾战争》的报告中强调，高技术系统在海湾战争中极大地提高了美军的战斗力。切尼指出："这次战争首次展示了被称之为'战争中军事技术革命'的作用。军事技术革命包括许多领域：防区外发射的精确制导武器、先进的探测器、能提高突袭效果和生存能力的隐形技术、夜视器材和战术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利用上述技术和即将出现的新技术，会像过去坦克、飞机和航空母舰一样，使战争的性质发生重大变化。"[①]据不完全统计，在海湾战争中使用的高技术武器装备有80多种，其中首次使用的就达50多种，美军是使用这些先进武器的先锋。在侦察技术方面，美国在海湾战争期间动用了70多颗卫星，包括电子侦察卫星、照相侦察卫星、雷达成像侦察卫星、预警卫星等。其中有第五代KH-11、第六代KH-12"锁眼"式卫星，还有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微波遥感卫星"长曲棍球"等。在电子战技术方面，美国使用了大量的电子高频、甚高频、超高频和特高频通信干扰机、电子战飞机等。许多飞机都装有高速计算机芯片和软件，帮助战斗机飞行员避开敌人的拦截，自动选择可以安全通过敌方防空系统的程序。在精确制导技术方面，美国使用了大量微电脑控制的精确制导武器，如"战斧"巡航导弹、"爱国者"地空导弹、"响尾蛇"空空导弹、AGM-88A"哈姆"式高速反辐射导弹、激光制导炸

① 引自沈善文主编：《新世纪旋风——世界军政显要谈高技术与战争》，国防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7页。

弹等。由于装上了微机,“爱国者”导弹的命中精确度比原来提高了100倍。GBU－24型激光制导炸弹则能直接命中“飞毛腿”导弹掩体的大门和直接飞向伊拉克防空司令部掩体的通气孔。美国在海湾战争中还首次使用了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F－117A隐形飞机,它在“沙漠风暴”空战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另外,美国还在战争中大量使用了夜视技术,如夜间低空导航和目标导引红外系统、AN/AVQ－26夜间攻击系统、小型昼夜激光目标识别设备以及驾驶员夜视系统等。

这些高技术在海湾战争的空战中表现的最为突出。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莱斯·阿斯平1992年在题为《新时代的防务:海湾战争的经验教训》的研究报告中指出,高技术通过3种方式提高了美国空军的生存能力:使用压制敌方防空系统的武器装备;运用隐形技术;使用无人驾驶的巡航导弹。更为重要的是,高技术提高了美国空军作战的准确性。阿斯平在报告中强调,精确打击是“沙漠风暴”行动中空中作战最显著的特点。美军摧毁了巴格达大约50个军事目标,却没有对城市中其他的50多万建筑和民用设施造成大的损害。同时,精确打击减少了打击伊军目标所需的飞行架次,并使美军大部分飞机可以在1.2万英尺以上的高空实施空中打击,从而保证飞行员的安全。精确打击使空袭成为一种能够以最小的武力取得最大效果的更有节制的军事打击工具,甚至摧毁原来认为只有核武器才能摧毁的坚固目标。[①]

其次,海湾战争也表明,高技术条件下的战争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战略理论和新的战法。高技术性只是体现了海湾战争一个方面的特征,其另外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美军作战理论和战法在正规化上的突破。海湾战争不仅进行了常规的空中作战、海上作战和地面作战,而且还组织了最大规模的“空地一体作战”和“海地一

① 引自沈善文主编:《新世纪旋风——世界军政显要谈高技术与战争》,第12～13页。

体作战”，逐步完善了这一新的作战理论和作战样式。“空地一体作战”是美国新近提出的一种作战理论，美军在80年代末对这种作战理论进行了反复的研究和演练，最终在海湾战争中首次得到成功的运用。这一理论的中心内容是：利用传感器代替人员确定敌人的位置，通过侦察部队核实情报，使用远程火力攻击敌人，为决战创造条件；战役将由占绝对优势的合成部队在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进行，战争初期就要夺取主动权，加快战争节奏，只有在条件成熟和部队到达之后，才能实施近战。了解空中与地面部队的不同任务，是掌握这一理论的关键。联合作战地区是地面和空中作战的战场；其纵深程度是根据陆军部队的作战能力即攻击直升机和导弹的射程确定的。如果导弹射程增大，陆军纵深程度也会随之增大。

按照这一作战理论，未来战争将划分为应急战区和预设战区。在应急战区，“空地一体作战”将由联合部队实施，联合部队将包括陆海空和海军陆战队，其中陆军投入一个军。而在预设战区，陆军投入多个军，一些军固定部署，另一些军担任机动作战任务。作战准备与实施分为4个阶段：进行侦察与准备、为决战争取主动、实施决战和休整。另外，情报是“空地一体战”的重要环节。由于未来作战将由联合部队实施，所以情报不再是军种情报而是联合情报，高级指挥官必须掌握在过去作战中只有下级指挥官才了解的情报。为夺取战场的主动权，侦察和欺骗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通过联合目标跟踪和共同运用，在时间和空间上分割敌人，可以为决战创造有利条件，以优势兵力消灭敌人。

“海地一体作战”是美军在海湾战争中形成、完善并得到充分发挥的作战理论。这一崭新的理论在海湾战争的运用使现代战争的作战方式有了新的发展。美国海军在海湾战争中改变过去在陆军侧翼使用舰炮对陆军进行支持的传统作战方法，首次使用海基“战斧”式巡航导弹攻击伊拉克的本土目标，随后用舰载飞机对陆

地目标实施连续的纵深打击，从而使海军也可以成为陆地作战的一支独立力量。美国把海军舰艇的高度机动性、破坏性和密集火力相结合，以远程航线和弹道的机动来代替传统的人力及兵力机动，以海军单一的对海作战和对陆支援，改为海上远程对陆上目标进行突击，从而完成“海地作战一体化”。

这种一体化作战理论反映了美军新的作战样式。对此，美国陆军上将约翰·福斯在1991年12月解释说，美军未来的主要作战样式是应急作战，因此必须强调从本土向外投送力量的能力。在应急作战中，对危机做出政治和军事反应的时间越来越短，有时仅仅有几个小时。因此应急作战的不同阶段对部队有着不同的要求。战争初期，对重型部队需求较小，轻型部队和特种作战部队将迅速前往危机地区，随着决战的临近，对重型部队的需求越来越多。要胜利完成应急作战任务，确定如何结束战争至关重要；只有将政治标准转化为军事目标，才能确定部队的任务、组织、集结和实施决战。[①] 海湾战争突出表现了这一战争的特点。

最后，海湾战争的结果是美国军方在注重武器装备现代化的同时，更加强调了军人素质的重要性。美军认为，海湾战争胜利的经验之一，就是依靠高质量的部队和指挥官；赢得战争要靠勇士，先进的武器要由灵巧的人按照正确的方法操作才能发挥最大的战斗效能。美国认为他们参加“沙漠盾牌”和“沙漠风暴”行动的部队是一支训练有素、目的明确的全志愿兵部队，是美国历史上素质最好的战斗部队。对此，美国陆军部长迈克尔·斯通在总结海湾战争的经验时强调：“历史证明，人是战争的决定因素。拥有高质量兵员的部队既可以应付突发事件，又可以应付持久战争。军队只有具备良好的素质，才能严于律己，克尽职守，才能正确掌握和使用

① 引自沈善文主编：《新世纪旋风——世界军政显要谈高技术与战争》，第77～78页。

现代化武器装备,准确理解和灵活运用作战理论。"[①]因此,海湾战争结束后,美军加强了保证兵员质量方面的建设,同时还注意提高领导和管理水平。美军认为,海湾战争的经验表明,指挥官在取得战争胜利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美军今后将更加注重对指挥官的培养,开拓多种培养途径,以提高部队领导与管理水平。

通过海湾战争所体现的新的战争观,在对伊拉克的再次空中打击中以及 1999 年 4 月开始的北约对南斯拉夫的空袭中,都得到了进一步的印证和充实。这一趋向估计还将继续下去。但是,在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大规模空袭南斯拉夫联盟的行动中,高技术战争也表现出局限性。

首先,过高地估计空袭的作用。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根据冷战结束后的作战经验,设想"只需一周的轰炸就能解决问题"。但实际上空袭持续了整整 78 天。另据空袭结束后的调查,北约给南联盟军队造成的损失远比先前估计的要小的多。这说明,只要被轰炸对象备战充分,防御灵活,是可以把空袭所造成的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其次,高新装备性能不稳定,战略力量储备不足。在对南联盟的空袭中,美国和北约其他国家的飞机以及其他武器装备性能欠佳,常因天气恶劣而不能执行预定的作战任务。同时,对南联盟的作战,几乎耗尽了美国大部分尖端武器的储备。单纯依赖这种武器的缺陷非常明显。最后,打击强度不足。这是不动用地面部队的一个明显的弊端。为了减少飞行员的伤亡,北约对军事行动限制较多,因此攻击强度比"沙漠风暴"和"沙漠之狐"行动都要低。这次空袭南联盟,北约飞机 20 多天才出动 6000 架次,而在 1991 年的海湾战争中,每天出动高达 2000 架次。单纯依靠空中打击还不足以速战速决。

① 引自沈善文主编:《新世纪旋风——世界军政显要谈高技术与战争》,第 79 页。

第五编

移民国家与大众社会

原书空白页

第一章　民族熔炉:神话与现实

除了占全美国人口0.85%的土著印第安人外,今天的美国人几乎全部都是世界各地的移民或移民的后裔。几个世纪以来,数千万移民飘洋过海,从世界各地来到美国。他们肤色各异,语言不通,代表着不同的文化、种族,有着不同的历史背景和宗教信仰。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他们杂居混处,彼此影响、彼此包容。今天,虽然他们肤色依旧,宗教各异,并不同程度地保留了本种族的习俗和文化,但是他们都成为了美国人,都能使用同样的语言——美国英语,也拥有广为认同的文化——美国文化。换言之,他们都是美利坚民族的一分子。

美国实现了世界史上一个国家发展史的奇迹,一个历史不到300年的国家,一跃成为世界上最繁荣、强大的国家。这既是美国的成功,也是美国移民的成功。实现了美国梦的幸运儿为数不少,他们有的成为杰出的政治家、领袖,有的成为腰缠万贯的工业大王、金融寡头,有的成为伟大的诗人、著名作家、体育明星和影视明星。然而,现实总是那么残酷无情,有成功就意味有失败,有希望就意味着有失望。经过多年努力,不少人的美国梦破灭了,他们仍然处在美国社会阶梯的最底层,仍然遭受着物质上的匮乏、贫困,精神上的压抑、折磨。《独立宣言》宣扬的"人生而平等"对于他们依然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想。尤其是对于某些少数族裔而言,要在白人占主导地位的美国社会有一席之地谈何容易。纷繁复杂、危机四伏的美国种族关系表明,各种族间的差异仍然很大。种族

矛盾与冲突是个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但另一方面，种族间的差异与融合恰好是美利坚民族生命力的源泉。冲突最后往往导致在一定程度上求同存异，并产生了为各个种族所认同的独特美国文化，形成了不同种族共同的精神基础。同时由于差异的继续存在，种族间仍然不断地发生着融合，也发生着冲突，正是这种由于差异所导致的冲突和融合使得美利坚民族欣欣向荣，充满活力，使得美国文化长盛不衰、不断发展。

移民政策的演变

一个国家的移民政策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个社会对于新移民的态度和立场。美国20世纪移民政策的变化甚大。20世纪以前，移民北美是不受任何限制的。大部分移民是对旧世界欧洲厌倦了的人，或是被旧世界讨厌的人，如持不同政见者、异教徒，还有就是做财富梦的商人、探险者等等。新世界毫无保留地接受了这些人，移民则成了美利坚的合众国缔造者，不论是美国建国前，还是建国后，移民的大潮一刻也未停止过。但是，随着移民数目的增加，来源的复杂，新移民与旧移民间的矛盾越来越多，冲突时有发生，终于发生了排外运动，反映到政府的移民政策就是以种种措施限制移民。进入20世纪，美国终于结束了自由移民的时代，开始了有限制的移民政策。1965年的《移民法》标志着一个比较现实和理智的移民政策的出台，美国人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和人道主义的原则继续有限度地接纳新移民，成为世界上接受移民最多的国家。20世纪移民浪潮的起伏变化都是和政府移民政策、美国民众对待新移民的态度相一致的。

美国各族裔的移民是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因不同的原因来到美国，并分布在不同的地区。1900年，美国人口接近7 600万，而今天，美国人口已经达到2. 5亿，增加了3倍多。这么多的人口除了人口出生率提高和死亡率的降低所导致的人口自然增加外，

主要是由于外来移民的不断涌入。在整个20世纪，即便美国政府一再限制移民规模，移民一刻也未停止过，在本世纪初和60年代，美国出现过两次大的移民浪潮。到了80年代，移民美国再掀起热潮(见下表)

1901－1992年移民一览表

阶段	1901－1910	1911－1920	1921－1930	1931－1940	1941－1950	1951－1960	1961－1970	1971－1980	1981－1990	1990	1992
单位：千人	8795	5736	4107	528	1035	2515	3322	4493	7338	1536	974

资料来源：《美国统计数据摘要：1994年》，第10页。

美国曾在1802年第一次制定了移民入籍程序，规定任何外来人士都能取得美国国籍，成为美国公民。这种自由移民的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从1900年到1915年，涌入美国的主要是东欧与南欧的移民。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满目苍痍、一片凄凉。相反，未受战争破坏的美国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美国成了世界的希望，大量移民滚滚涌入。20世纪初目睹了美国史上最繁忙的移民浪潮。

新移民在就业等方面对老移民形成强有力的挑战，此时老移民似乎忘记了自己也是移民或移民的后裔，日益歧视这些新移民。1902年，美国发生了严重的排华运动；1907年，日本移民也受到了同样的遭遇。其他地区的新移民也受到了程度不同的歧视。在遭到历任总统多次否决后，国会还是于1917年通过了《识字测试法》。这是美国历史上移民政策的一个里程碑，它标志着政府首次干预移民。这项法律要求新移民必须在能较熟练运用英语或其他一种语言后才能进入美国。1921年，国会又通过了美国历史上第

一个《移民定额法》[①]。次年该法修订后移民美国的总数急剧下降，但是并未实现选择移民的目的。于是，1924 年国会对此法案再度修订，限定每年进入美国的人数为 16.4 万人。就在同一年，又规定了一个移民出生法，严格限制东方移民进入美国。这一系列移民政策的实施，导致移民人数急剧下降。到二战结束前为止，美国在移民限额问题上非常吝啬。但这并不意味着移民完全停止了，通过各种途径进入美国的人数仍然十分可观。例如，在二战期间，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罗斯福总统为 1.5 万名左右受迫害的犹太人安排了旅游签证来美国避难。[②] 他们对美国的科学、文化作出了惊人的贡献。此外，通过非法途径移民美国的人也不计其数。

1965 年，美国移民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国会通过的《1965 年移民法》；废除了实行近 40 年的原籍份额制，放宽了移民政策。该法确定了移民签证的 3 原则：1)有工作技能的人，特别是美国需要和缺乏的专门人才；2)有充分理由寻求战争或政治庇护的人；3)与美国公民有亲属关系的人。从此，移民的准入不再基于不合理的配额，而是根据他们的才能和人道主义的考虑。在"家庭团聚"的口号下，移民潮涌而至。

移民潮打乱了美国的种族结构，削弱了对东方移民的政策歧视。1965 年以后的移民中，来自亚洲和拉美国家的移民占了很大比例，导致美国人口中非欧白人的比例迅速增加。1960 年，美国白人占美国人口总数近 90%，1992 年，白种人口比例下降到 83.5%。据预测，到 2000 年，白人人口比率将下降到 80%。[③]美国社会的人口构成愈加丰富多彩。

① 该法规定，允许每年移居美国的人数为 35.7 万人，任何国家每年的移民人数为 1910 年美国人口普查时原籍该国的美国人总数的 3%。该法适用于除西半球以外的所有国家，有效期为一年。1922 年该法重新修订，有效期为两年。制订该法的目的除限制移民数额外，还在于选择西欧及北欧国家的移民而减少南欧和东欧国家的移民。

② J. 布卢姆：《美国的历程》，中译本下册，商务印书馆，1993 年，第 439 页。

③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 S.*, 1994, p. 13.

非法移民

在自由移民时代，不存在非法和合法之分。非法移民的出现是在美国政府干预移民，并制定政策限制后才出现的。1965 年移民政策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后，伴随着合法移民潮的出现，非法移民也迅速增加，并成为人们关注的社会问题之一。1986 年，美国国会通过《移民改造与管理条例》。据此，大约有 370 万非法移民最终取得了美国公民身份。这一法令同时规定，雇佣没有身份证明的外国人为非法。它使很多后来的非法移民抱一线希望，希望有一天还会有类似的法律改变他们的身份。

据估计，美国目前至少有三四百万非法移民，而且每年至少有 30 万新的非法移民。这些非法移民有一半是墨西哥人，其余大部分来自拉丁美洲、菲律宾、加拿大、波兰以及海地。值得一提的是，一些中国人也加入到非法移民的行列。1993 年 6 月，在纽约市昆士区海边公园就发生了约 300 名中国人乘“金色冒险号”货轮非法移民事件。在美国的非法移民大部分是通过墨西哥边境进入美国的。这些非法移民给美国造成了许多社会问题。一方面，非法移民最易受到雇主的盘剥，并往往是犯罪分子欺骗、敲诈、绑架、强暴的对象。另一方面，他们又愿意以低工资从事最苦最脏的活，这些工作往往是美国人和合法移民不愿干的。

非法移民给美国的社会福利、医疗保健、以及教育系统都带来了沉重的负担。据估计，1994—1995 财政年度里，加利福尼亚州光为非法移民就支付了 25 亿美元。与此同时，加州自己尚有许多人需要依靠救济金来维持生活、解决温饱。为了应付这种窘境，美国每年都要驱逐许多非法移民。以 1990 年为例，美国政府总共驱逐了 105 万这样的非法移民。[①]

① *Datapedia of the U S* , 1790 - 2000: *American Year by Year*, *p*.68

非法移民越来越引起美国人的担忧,对现有的移民政策有了广泛的争论,政府也希望通过修改现有的移民政策来解决日趋困难的财政和社会危机。1995年,非法移民问题较为严重的加利福尼亚州提出并由全民公决通过了著名的《187提案》,又称《"拯救吾州"提案》。这项提案是专门对付非法移民的。它规定:公立医院不能收治非法移民,非法移民的子女不能到公立学校上学;取消非法移民所能享受的各种其他社会福利。在加州的全民公决中,该提案获得许多人的支持。但是反对者认为,它是对开放式美国立国精神的否定。尽管如此,它对于打击非法移民还是起到了一定作用。

加州反对非法移民走在了全国前列。全国性的争论还在进行中。经过反复争论,1997年美国对移民法又进行了修改,并于4月1日起开始实施。修改后的移民法主要是针对新的非法移民。根据它的规定,在入境6个月后如果一旦被查出是非法移民,将在3年内不准再入境。在美国非法居留已经1年以上的,将在10年内被禁止入境。对申请政治避难者也进行了种种限制。但是这一政策是否能有效地制止非法移民,恐怕只有天晓得。

移民与社会

美国是一个靠移民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国家,一代代的移民为美国社会的兴旺、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繁荣作出了无比巨大的贡献。今天,美国能作为世界第一流的强国屹立于地球上,应归功于一代又一代的移民。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有一次对美国革命女儿会讲到:"大家要记住,要永远记住,我们所有的人,都是移民者……的后裔。"[①] 这正是对美国人的准确描述。

移居美国的移民用双手缔造一个崭新的国家。总的来说,他

① 《美国的历程》下册,第416页。

们的贡献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增加美国人口,优化美国人口结构。最初,北美大陆人烟稀少,移民一批批地到来,使美洲大陆人口成百倍地增加,这些人使得广袤的土地得到了开发和利用。而且,由于移民大多都是年轻力壮的中青年,这就为美国节省了大量人口生产的成本,也使美利坚这个新兴的民族充满了活力和朝气。移民的到来一方面产生了十分微妙的社会问题,但另一方面,由于不同种族的人通婚与混合,使美国的人口素质不断得到优化。

(二)欧洲移民为美国的工业化带来了新的科学技术,为美国在本世纪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和二战后奠定超级大国的地位提供了宝贵的人才资源。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的移民中有许多人是各国的科学技术人才和熟练技术工人。由于当时欧洲已先一步完成了工业化,使这些人才无用武之地。新兴的美国正处于工业化的高涨年代,到处充满了发财的机遇。加上交通运输业发生了根本性的革命,轮船和火车得到大量使用,使欧洲移民毋需饱尝早期移民漂洋过海中的艰辛和危险,就可以顺利地来到美国。

本世纪 30～40 年代,美国利用欧洲的混乱和战争,吸引了大批德国和犹太科学家。1965 年,美国调整其移民政策后,又有大批亚洲等地的科学技术人才来到美国,服务于美国的国防建设和经济发展,他们构成了美国保持超级大国地位的人才基础,为美国最后赢得冷战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即便在今天,新移民仍是他们母国最优秀和最具吃苦耐劳精神的人。

(三)提供廉价劳动力。为了在美国立足,一代代新移民总是乐意从事最辛苦、最危险、报酬却最低的工作。这些新移民怀着对于实现美国梦的信心,从社会的最底层干起,兢兢业业,辛勤劳作。在某种意义上,美国是在向全世界开放其劳动力市场,让竞争的机制充分发挥作用。这就使得美国社会生机勃勃,充满了活力和干劲。

（四）丰富美国文化。美国文化最大特点是它的多样性。虽然美利坚文化中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成分从殖民地时期起就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其他少数种族的文化也是美国文化有机的组成部分。北欧人、德国人、中国人、犹太人、日本人、波兰人等少数族裔也为美国文化带来了新鲜的血液。以犹太人为例，美国目前的犹太人有600万以上，他们大多数属于中产阶级和中上阶级，在文化、法律、教育、科学界居非常重要的地位。在美国的大学中，每10个人中就有一个犹太人。犹太教已经发展为美国三大宗教之一。华人对美国的贡献也非常突出。里根总统曾这么评价在美华人："中华文化是美国多元文化中有价值的一部分，成千上万的华人在美国土地上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这是值得骄傲和自豪的。"[①]一代代移民丰富了美国文化，使美国文化灿烂多彩。也正是由于美国文化的多样性，它也更容易为世界各国人民所喜爱并接受。

美国是世界上民族成分最为复杂的国家，全世界任何地方的民族，都能在美国找到其足迹。但美利坚民族的主体仍然是以盎格鲁－撒克逊为主的白人新教徒。美利坚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是其主体不断接受和同化异民族的过程。[②]

新移民要想在美国谋得一席之地，总是不得不接受和服从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盎格鲁－撒克逊种族的社会规范和价值观念。这种要求，可以从美国早期宗教不宽容的历史得到阐述。以盎格鲁－撒克逊种族为主体的新教徒总是对东南欧的天主教移民抱有疑心，这种疑虑在本世纪最初的20年发展成为所谓的"美国化运动"，公开要求消灭移民原有文化传统，对他们进行强制同化或高压同化。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1913年美国政府成立了专门的移民归化

---

① 转引自邓蜀生：《美国移民政策的演变及其动因》、《美国历史与美国人》，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204页。

② 《美国历史与美国人》，第206页。

局。该局主要是通过动员和组织各级教育机构开办一系列培训班，教授新移民学习美国英语和美国文化。这些措施客观上帮助了外来移民迅速适应美国社会，尽快在美国生活中自谋生计。但是它在主观上体现了加强外来移民归化美国主流文化的思想。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美国政府加强了对移民的强制归化，尤其是美国对德宣战后，在美的德裔公民受到了极其不公平的待遇。这种情况同样出现在二战期间。珍珠港事件爆发后，在美的日本侨民受到全社会普遍的怀疑和敌视，并强迫移居到集中营中，成为美国移民史上可耻的一页。直到80年代，美国政府才不得不对这一行动作出道歉，并根据法院的判决，向幸存者赔偿了数十亿美元。

移民问题——"大熔炉"还是"大拼盘"

一般人讲到美国是个大熔炉，往往指美国人特别宽容，各种族的人能彼此安居乐业。这种看法实际上曲解了"熔炉论"的本意。"熔炉"的提法最初出现在1909年犹太人剧作家以斯雷尔·赞格威尔创作的剧本《熔炉》中。该剧把美国描绘成是上帝的坩锅，是一个伟大的熔炉，在这个熔炉中，各种族的人得到冶炼并重铸成美国人。剧本上演之际，正是美国排外主义思潮盛行之时。先是爆发了排华运动，接着是发生排日事件。《熔炉》的上演，迎合了当时盛行的排外主义思潮，成了人们广泛使用的术语。人们运用这一"熔炉"理论，认为其他民族或种族都应认同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归化这一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宗主。这才是"熔炉论"的本意。

熔炉理论的生命力并不旺盛，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起它就开始受到强有力的挑战。由于历史背景、社会地位特别是经济地位的差异使当时美国人对于参战意见不一，也就形成各个民族利益集团。加上美国主流社会当时对德裔集团的不信任，熔炉论显得苍白无力、不攻自破。这种情况也同样发生在二战期间，突出地表现

为不公平地对待日本侨民。

1965年,新移民法实施后,大量移民尤其是亚洲和拉美国家移民来到美国,再次引发对移民融和同化问题的关注。许多人视之为洪水猛兽,认为新移民对美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形成了强有力的挑战,担心无法再保持美国文化的纯洁性(亦即保持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主导地位)。但是,在经历了民权运动的风潮之后,更多的人则从宽容和多样化的观点来看待这一问题,提出了多元文化的理论。他们强调各族裔移民在溶入美国社会的同时,仍然保留了自己原有的民族文化特色,因此,各种族的文化都应在美国社会有一席之地。他们通过历史来说明,美国社会是个"大拼盘",是"搅拌好的色拉"。换言之,美国已经成为多种族文化的组合体。

这一看法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赞同。据1994年美国《新闻周刊》的一次民意测验,只有20%的美国人认为美国仍然是一个熔炉。[①]但"拼盘论"也有其弱点,究竟是各种族拥有的共性多,还是各自保留的个性多?在80年代的保守主义气氛中,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为,移民越多,社会摩擦就越多。这种社会磨擦会导致各种族之间越来越隔离和分化。拉美移民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近年来,美语的统治地位随着拉美移民的增加越来越受到挑战。这些拉美移民在日常生活以及在拉美移民较多的聚居地广泛地使用西班牙语。由于美国宪法并未规定英语是法定语言,因此很多学校甚至使用西班牙语进行教学,这意味着这些移民及后代可能终身不懂英语,从而难以与美国主流社会融合。

保守派的这种担忧尚未成为社会的主流看法。白人依然是社会人口结构中的大多数,美语也仍然保持了自己的通用性和牢不可破的语言霸主地位。更令人深思的是,另一方面,从穿牛仔裤、吃汉堡包、听爵士乐、看好莱坞巨片,到讲究效率、追求实际,包括

① 转引自汤姆·摩根索:《美国:还是一座熔炉吗?》,《编译参考》1994年1月。

作为美利坚民族一分子的优越感和自豪感，以及诸如在海湾战争中人们普遍表现出来的空前的爱国主义（美国式的民族主义）等等，都不再是某一种族特有的属性，都已经深深地烙上"美国人"这一印记，并已成为美国人灵魂一部分，无论他是白人、黑人还是拉美裔移民。由此看来，即便是大熔炉的理论受到普遍的怀疑和挑战，但比起欧洲等国，美国似乎仍然不失为一个熔炉。但是，这一熔炉，如果能这么说的话，再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白人文化一统天下的熔炉了。

今天，美国文化这个词已经为世人所认同。但是，美国社会到底是个"大熔炉"还是一个"大拼盘"呢？美国人对此并未达成共识。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残酷场面、目睹了60年代的社会动荡、70年代由于水门事件带来的一系列社会信心危机，美国人也开始重新审视他们传统的移民社会。到底如何界定这种移民社会文化呢？"熔炉论"过分强调了盎格鲁－撒克逊种族的优越性，排斥了其他优秀的少数种族。美国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大熔炉，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文化一统天下的时代也已是过眼云烟。但美国文化也不是各种族文化的简单组合体，如果这样的话，就不能称之为美国文化。因此，笃信美国社会是个大拼盘的人忽视了各种族间文化的相互影响。用熔炉论和拼盘论来解释，都有道理，但又失之偏颇。美国文化似乎应该介乎两者之间。

美国当代历史学家丹尼尔·布尔斯廷认为，"美国的突出之点并不在于到美国来的移民能够融合成为一个国家，而在于如此众多的人居然还多少保留了各自的特性。"[①]这似乎可以构成解释美国文化形成模式的第三种理论。根据这一理论，组成美利坚合众国的各种族文化在接触中相互影响，由此产生新的、各种族都能普

① 丹尼尔·布尔斯廷：《美国人》三部曲之《美国人：民主历程》，生活·读者·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4月第1版，第286页。

遍接受的文化(即美国文化),同时又多少保留了本种族文化的相对独立性。可以用化学方程式来形象地加以表述这个理论。在这个方程式中,美国文化可以看作是各种族文化经过化学变化(这种化学变化可以看作是相互间的接触、影响、冲突以及环境的改造等)激烈作用的产物,亦即:A+B+ …《——》C。具体地说,这种化学反应过程是达到一种动态平衡。这种动态平衡可以理解为各个种族仍然保持一定独立性,同时仍然在不断影响、不断相互作用,不断产生新的动态平衡,即新的文化特色。这种新的文化反过来又影响各种族的文化。新移民的到来,各历史时期环境的差异,不同种族的人在社会的阶梯中地位的不断变化,导致社会力量不断发生重组,这就导致这种化学反应方程式内部成分不断发生量变,出现新的化学反应并最终达到新的平衡。而这一过程往往伴随着社会的骚动、文化的冲突,突出时则表现为社会动荡。

“环境作为思想与文化的生发条件”,[①]对于美国移民社会文化的形成有着重大的作用。美国的独特环境(处女地、广阔的西部、丰富的自然资源、移民的国家)“为那些既保留本身特性同时又多少参与探索美国民族性的人们提供了机会。”正是这种独特的环境使得美利坚民族既“能把各式各样的人全都融化于一个国家,”[②]同时又让各种族的文化特色得以保留。美国历史证实了这一点。经过两百多年的发展,从传统的农业社会转化到工业社会,从工业社会又转化到信息社会,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完成了西部的开发,接受了不间断的移民浪潮,进行了海外扩张,加上交通通讯事业的革命、信息时代的到来,组成美利坚合众国各个种族的文化经过这么长期复杂、全方位的相互接触、相互碰撞,已经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互相融合,最终形成独特的美国文化,并作为世界文化

① 赵一凡,《美国人》,中译本后记。

② 《美国人:民主历程》,第287、285页。

的一个分支得到认同。与此同时，各种族的文化传统又都保持了一定的相对独立性，亦即各个种族保留了本种族的一些特性：包括言谈举止、风俗习惯等等。今天，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文化的许多传统得以保留正是美国文化独特之处的具体体现，也是美国文化发展的历史延续性。各种族文化相对独立性的存在使得美国文化生机勃勃，“即便在几百年后的今天，这片土地仍没有安定下来”，以致于布尔斯廷也问自己，“美国真的会有静止不变的一天吗？”[①]这正是美国移民社会的独特之处。

① 《美国人：民主历程》，第678页。

第二章 人口的移动与家庭、人口结构的变化

移民来到美国之后，并没有永久地留在一个地方，而是根据需要，不断在美国国内流动。同时，美国国内的人口也随着经济发展特别是经济地理的变化进行相应的流动。这两股人流构成了美国国内的移民大潮。由于地域广阔，加上交通便利，美国成为世界上人口流动性最大的一个国家。人口的流动不断改变着美国的人口结构和人种素质。人口的高度流动性，使社会观念更新加快了，旧的传统不断被打破。于是，人们的婚姻观、家庭观也发生了诸多变化。

人口移动的原因及区域变化

在美国，没有户口簿这类居住区域上的限制，只要是美国公民或永久居民，都可以在美国的土地上自由移动。一代代美国人为了追求自由、舒适的生活，为了获得更多、更好的发展机会，不停地迁移、不停地奔波。美国历史就是一部美国人在其土地上不断迁移的历史。人们常常说“美国人总是在迁移”(Americans are always on the move)。这句话要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在外人看来，美国人确实总是在搬家，很少听说过有哪个美国人是在同一地方安安分分过一辈子的。另一方面，从社会阶梯的角度来理解，美国人总是不那么安分守己，为了寻求更舒适的生活环境，他们总是在社会的阶梯上不断改换职业，以求最终攀上社会的上层。金

钱、职业、环境、气候、婚姻都可以成为美国人搬家的理由。美国人生活的这种特性使得美国社会的流动性特别显著。两位英国记者曾对美国人这种爱移动的性格作了形象的描述，说美国人"屁股坐不住"，老是"面向着未来，背朝着过去"，他们随时都准备"整装待发、重新开始。"[1] 正是这种频繁的流动使得美国社会充满了勃勃生机，加快了社会观念的更新，使人们更容易接受新鲜事物，同时也孕育了诸多的社会问题。

进入20世纪，美国虽然完成了西部开发，实现了工业化，但是，移民的后代继承了祖先好动与冒险的性格，人口的流动并未停止。人口的这种流动性既是美利坚民族性格的历史延续，也是美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不断寻求机会实现美国梦的过程。20世纪美国人口的移动可以从20世纪美国社会前进的脉络、经济发展的轨迹以及政治和文化的冲突、碰撞中找到相应的渊源。

20世纪初的美国人比较憧憬高度发达的城市社会。城市社会在交通、通讯以及文化生活中的种种便利和舒适已为人们广泛认识和接受。此外，由于城市工业化程度越来越全面，城市对于劳动力需求很大。高度的工业化使得农业生产技术越来越现代化，农业生产对于劳动力数量的要求越来越少。在这种情形下，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成为一种必然。特别是摆脱了奴隶制枷锁的南部黑人，在农业现代化程度越来越高的农村成为剩余劳动力。为了维持生计，也为了逃避南方严重的种族歧视，他们在19世纪末20世纪最初20年，大量向北部和中西部城市移民，构成了这一时期美国人口变化的一大特点。

一代代新移民也为城市带来了大量人口。20世纪初来到美国的移民大多是来自东南欧的农村，为美国城市生活的神话所吸引，成了城市居民的重要来源。二战以后，美国打开了移民的大

[1] 埃德蒙·福西特、托尼·托马斯：《当今美国》，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门,亚洲移民纷涌而至。这些移民除了一些因为血缘或亲属的缘故移居美国的外,大多是有专门技术的人才,他们的到来为美国城市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至于先到一步的早期城市居民,他们的迁移倾向也毫不输给19世纪西进的祖先。由于交通和通讯技术的革命,自由迁移越来越成为完全由个人意愿决定的事。由于外来移民和农村人口的压力,城市人口在就业和社会福利等方面越来越受到强有力的竞争。在这种情况下,向新兴城市迁移,去寻求新的机会就成为一种明智选择和必然趋势。正是靠着这种不安于现状的思想,使得美国的西部和南部地区得到了开发和利用,也使得美国落后地区成为人们竞相前往的目标。所以,20世纪美国人口移动受到经济因素的强大影响,特别是随着美国经济重心的迁移,人口移动加速,人口结构也随之调整。20世纪美国经济发展重心的轨迹是不断向西向南迁移,反映在人口结构上就是人口不断向西向南迁移。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政府在西部和南部大量投资高技术国防工业,大量专业人士和技术工人趋之若鹜。就这样,东北部工业化的成就在西部和南部生根开花,地区差异日渐缩小。

美国人口的地区性迁移一直是美国人口变化中的一个重要特点。早期殖民地居民大多居住在美国的东北部。随着黑人奴隶制的建立,南部也得到开发利用。独立后,美国开始了工业化现代化的历程,人口也越来越多。伴随着西进运动,大量人口西迁。整个19世纪目睹了美国史上最波澜壮阔的西进运动。同时,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特别是南方奴隶制被废除后,南部也得到一定的开发利用。1980年,美国西部和南部人口总和历史性地超过了东北部和中西部地区(见下表)。这标志着美国人口的地区性分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对于美国的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美国各地区人口分布一览表

年代	区域人口(百万)			
东北部	中西部	南　部	西　部	
1900	21.1	26.0	24.5	4.4
1920	29.7	34.0	33.1	9.2
1940	36.0	40.1	41.7	14.4
1960	44.7	51.6	55.0	28.1
1980	49.1	58.9	75.4	43.2
1990	50.8	59.7	81.4	52.8

资料来源:《美国统计数据摘要:1994 年》,第 30 页;《美国历史资料摘要:从殖民地时期到 1970 年》,第 22 页。

人口结构的变化

在 20 世纪到来之前美国就已完成了工业化,但是,20 世纪的美国社会仍是世界上吸纳移民最多、变化最快的社会。移民不断进入,国内人口不断迁移,使得美国人口的种族和年龄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20 世纪的美国,人口绝对数目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的趋势,尤其是在 20 世纪初和二战以后,美国人口的增长出现了几次高峰期。20 世纪初的人口增长主要是由移民潮导致的。这期间,出现了大量东欧和南欧移民。二战后,由于美国人追寻传统生活方式,强调安逸的家庭生活,出现了所谓的"婴儿出生高峰期"。60 年代,移民政策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使第三世界国家的专业人员大量移民美国。在美国人口增长的同时,人口密度也越来越大。随着人口绝对数量基数的增加,美国人口增长的速度趋于缓慢。在人口结构中,男女比例基本平衡。从人种看,白人仍然占据了人口中

的绝大多数，但它在总人口中的比例逐年下降，黑人和其他少数种族的人口明显增加。据估计，到本世纪末，非白种人(黑人、拉丁美洲裔和亚裔等)将占据总人口的1/5，而到下个世纪中叶，这一比例将达到1/4。非白种人口的增加必将对长期以来白人一统天下的美国社会产生广泛的影响。

美国人口状况一览表

年　代	总人口(百　万)	每平方英里人口数	男性(%)	女性(%)	白人(%)	黑人(%)	其他人(%)
1900	76.0	25.6	51.1	48.9	87.9	11.7	0.4
1950	151.3	42.6	49.7	50.3	89.2	9.9	0.9
1960	179.3	50.6	49.2	50.8	88.6	10.5	0.9
1970	203.3	57.4	48.6	51.4	87.6	11.1	1.3
1980	226.5	64.0	48.6	51.4	86.0	11.8	2.2
1990	248.7	70.3	48.7	51.3	83.9	12.3	3.8

资料来源：《美国统计数据摘要：1994年》，第8、13页。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美国人的寿命越来越长，人口老龄趋势越来越明显。1776年美国独立时，平均寿命才35岁，但是现在人均已经达到75岁以上。过去，美国老人(指65岁以上)在人口结构中的比例微不足道，尚不能引起人们对于老年人问题的讨论。但是从60年代开始，65岁以上的人口在人口中的比例越来越大，到1990年，美国人口的1/10以上已是老年人。人口老龄化对于社会来说是个全新课题。老年人退休后由于不再参加工作，收入陡降。面对高昂的饮食、住房和医疗费用，许多老人入不敷出。他们退休后的主要收入来源是退休金和政府的各种福利。老年人数量的增加加重了政府的财政负担。但由于老人作为美国的一个利益集团，拥有较高的投票率，且组织良好，进行了多次成功的游说活动，迫使美国各级政府特别是联邦政府不得不特别关注老人保障问题，有关部门也在努力探索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婚姻、家庭观念的变化

美国的家庭模式从工业化时代开始发生剧烈变化。由于生产

方式由传统的家庭经济转化到以工商业为主的市场经济，家庭不再是生产和分配中心，人们对家庭的依赖性越来越小，家庭对人们的束缚也越来越少。于是出现了所谓的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家庭成员一般由一对夫妻加上孩子组成，不再是几代同堂了。夫妇在家庭中的分工明确，“女主内，男主外”，女的生儿育女，操持家务，男的外出挣钱，养家活口。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二战。二战期间，男的上前线打仗，妇女开始走出家庭，承担起他们丈夫兄弟留下的工作。二战后，大部分妇女重新回到家庭，但也有一部分尝到了经济自主的甜头，继续留在社会工作。60 年代以后，由于就业机会特别是服务业中适合女性的就业机会的增加，许多妇女加入到劳动大军，使得传统的男女分工瓦解。此外，女权主义的兴起带来了女性的觉醒，结婚不再被看作是谋生的手段，逐渐被视为一种生活方式。这些都使得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趋向平等，同时由于家庭成员之间的依赖性减小，家庭的凝聚力也不再像传统大型家庭那么明显。

70 年代以来，美国的家庭模式已经完全打破了传统的模式，变得花样繁多、目不暇给，主要包括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无孩家庭(家庭不要孩子，仅仅由夫妻双方组成，目前这类家庭在美国为数不少)、单亲家庭、再婚混合型家庭(夫妇双方原先生的孩子们和他们一起组合成新家庭)、同性恋家庭、少年家庭(未到结婚年龄，而未婚先孕导致孩子出世的家庭，这类家庭也可以归如单亲家庭的一种，大多是由少年妈妈和她们的孩子组成)。家庭模式的多样化，反映了美国人婚姻观的剧烈变化，而这一切又都由于社会流动性的加强而变得更为复杂。

工业化以前美国人择偶往往是采取家长包办的方式，尽管年轻人有很大的发言权。因为在当时组成家庭的主要目的是传宗接代，社会鼓励生养孩子，多一个孩子往往意味着多一个人干活。工业化以后，随着物质生活的改善，婚姻愈发以感情而不以经济利益

为基础。年轻人更多的是考虑爱情和真正的幸福，而不再是只考虑家庭的实际需要。

在整个20世纪，美国人的婚姻趋向发生了变化。随着美国总人口的增加，美国独身人口、已婚人口以及离异人口的绝对数量都有明显增加，但独身人士的比例在缓慢减小。值得一提的是，在寡居的人口中，男性比例要低于女性，这说明女性的寿命比男性长。在本世纪初的时候，美国人中离异人口并不多，离婚率维持在10‰以下，到1930年，美国人的离婚率才突破1%。美国人的高离婚率是从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的，到1993年，美国人的离婚率已高达8.9%。[1]在整个离婚人口中，以黑人为代表的少数种族的离婚率普遍高于白人。高离婚率与60年代如火如荼的各种社会运动的影响有关，尤其是妇女解放运动和随之产生的性革命，人们不再受传统婚姻、家庭观念的羁绊。女权主义中激进分子甚至提出，要"砸烂家庭"、"不再为人妻、为人母"。人们的性观念也发生了180度大转变。据80年代的调查，77%的已婚女子和69%的未婚女子对婚前性交行为毫无不安和羞愧的感觉，84%的女子和96%的男子对他们的婚前性行为觉得根本无所谓。[2]而对大学生的一项调查表明，大部分男生和女生在学习期间都有了性经验。这种自由、随意的性观念的盛行导致离婚率陡然上升。离婚率剧增是20世纪美国婚姻问题上最大的一个特点。

在美国离婚容易之极。一方面是由于人们观念变了，另一方面是由于美国在70年代改变了传统的离婚法。离婚不再基于过失的考虑，离婚双方也不再势不两立。现在，离婚完全可以因为某些不可调和的原因，无所谓过失与否。这种无过失离婚法的实施，是对变化着的社会观念的一种承认。它表明，人们已经从传统的

---

①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S.*, 1994, p 55

② 乔恩·谢泼德、哈文·沃斯：《美国社会问题》，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第1版，第168页。

婚姻、家庭道德观、伦理观解放出来。

家庭观、婚姻观的变化必然反映到恋爱问题上。在当代美国社会，男女择偶一般来说是比较自由的。一个女博士找一个工人丈夫并不会成为新闻，同样，灰姑娘的故事在美国也不是神话。人们择偶一般考虑双方的情感需要。但是，择偶的标准还是受到文化、宗教、经济、种族等因素的影响。美国社会学家伯杰曾经总结过美国人的择偶观："在美国，人们认为男女相爱而结合……然而一旦对现实婚姻稍加分析，人们立即发现，阶级、收入、教育、种族和宗教背景等都限制了丘比特神剑的射向……换言之，在某些条件成熟或已经创造出来以后，人们才允许自己去恋爱。"[①] 所以，虽然随意的性行为已经非常普遍，但是一旦涉及婚姻问题，总的来说，美国人还是比较谨慎。特别是许多女性宁愿有自己的同居伙伴，而不愿轻易谈论婚嫁，惟恐把自己束缚在家庭的小圈子里。

单亲家庭是目前美国人经常讨论的一个话题，也是政府为之头疼的社会问题之一。单亲家庭是指由父母中的一方单独扶养子女生活的家庭。这里的单亲家庭，不是指由于父母双方中的一方去世而导致的单亲，而是指由于离婚、未婚同居或乱交生下孩子后，一方抛弃另一方而导致的单亲。美国的单亲家庭中，尤以母亲和孩子组成的家庭为多。美国单亲家庭的剧增反映了美国人婚姻、家庭和伦理道德观的剧烈变化，也是社会衰败家庭解体的标志。

60 年代社会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一些激进的妇女发现妇女的遭遇竟然和黑人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受到男人为主体的社会的歧视，没有平等的权利。一场妇女解放运动应运而生，妇女追求平等的时代开始了。1973 年最高法院赋予妇女自由堕胎的权利成了妇女解放运动的催化剂之一，越来越多的妇女走向社会，成为

① 马克·赫特尔：《变动中的家庭——跨文化透视》，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年版，第 159 页。

和男士一样依靠自己生活的独立个体。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最高法院的这纸决定，自由堕胎人数呈天文数字发展，这其中大部分是未婚少女。1980年，20岁以下少女有30%有过堕胎经历，到1990年仍然高达23%。[1]妇女革命虽然为妇女赢得了全面的社会平等和社会的认同，但是它却产生了一个最大的"成果"，即开创了性革命的时代。这些堕胎的少女绝大多数是未婚少女。妇女不再受到传统性观念的束缚，随心所欲地性交、少男少女未婚同居在青年人中成为时尚。这种行为的社会后果便是离婚率的提高、未婚先孕和单亲家庭的剧增。有的少女未到20岁，就成为孩子的母亲。由于她们自己在受教育和就业方面尚无保障，缺乏自治力，只能依靠政府的福利生活，成为福利制度的寄生虫，消耗了政府大量财力物力。美国福利的本意是帮助穷人和处于贫困中的妇女和儿童，但是，现在却成为单亲家庭的靠椅。这些孩子大部分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他们的母亲根本没有抚养和教育他们的能力。而且，这样的单亲家庭尤以黑人和其他少数种族为多(见下表)。所以，婚姻家庭的变化又和种族问题密切相关。许多有识之士担心，长期下去，美国人口的素质将越来越差。更为严重的是，婚姻观的随意性和家庭的解体最终会毁掉美国人的清教传统，从而威胁到美国人的精神基础，使美国不再是一个有凝聚力的民族。

单亲家庭剧增已经成为美国社会最棘手的问题之一。人们一方面觉得应该制止这种现象进一步蔓延，以挽救岌岌可危的美国人传统的价值观、道德伦理观。另一方面，由于任何举措都会引起女权主义者和民权分子的警惕和非议，涉及到种族这一敏感的政治问题，所以政府在这个问题上举步维艰，任何希望社会改革的人士都担心被扣上破坏男女平等和种族歧视的帽子，遭来"政治上不正确"的非议。

---

①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S.*, 1994, p.85.

母亲单亲家庭(孩子在18岁以下,母亲从未结婚)

年　代	全美家庭总数(千为单位)	母亲单亲家庭所占比例(%)	白人这类家庭所占比例(%)	黑人和其他少数种族的这类家庭(%)
1970	69162	1	42.5	57.5
1980	63427	3	27.5	72.5
1990	64137	7	34.3	65.7
1993	66893	8	39.7	60.3

资料来源:《美国统计数据摘要:1994年》,第66页。

传统的美国婚姻一般是只限于本种族内男女间的通婚,在美国这样一个种族歧视一度非常猖獗的国家,黑人和白人通婚在法律和传统习俗上都不为社会所容忍。禁止跨种族通婚的法令直到本世纪60年代仍然在一些州存在。

20世纪,确切地说是20世纪下半叶美国家庭结构中的一大特色是跨种族婚姻的广泛出现。这不仅体现在黑人和白人婚姻的大量涌现,而且也包括黑人、白人分别与他们种族以外的人的通婚大大增加(见下表)。跨种族婚姻的大量出现表明,在婚姻问题上,美国人的种族差异意识在逐渐淡化,不同种族间的人越来越趋向宽容和接受。如果这一趋势继续下去,跨种族的婚姻必然会越来越多,势必对社会环境和社会观念产生重大影响。跨种族婚姻导致出现了大量不属于某一特定种族的混血儿。现在,美国政府正考虑要在下次人口普查中使用"多种族人"一词,以便更规范地定义人种。

婚姻双方种族情况一览表

年　　代	1970	1980	1990	1993
夫妇总数(以千为单位)	44598	49714	53256	54,199
夫妻同族(%)	98.5%	97.1%	95.6%	`94.9%
夫妻不同族(%)	0.7%	1.3%	1.8%	2.2%

资料来源:《美国统计数据摘要:1994年》,第56页。

第三章　都市的兴起与衰败

美国是当今世界上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美国的城市化起步较晚。但是,美国的城市化进程却是它以前的宗主国望尘莫及的。在建国后短短两百多年内,无论是从城市人口总数还是城市居民集中的程度来衡量,美国都居世界前列。1990年,美国总人口的75.2%[①]为城市人口,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以城市居民为主的国家。

从本世纪初开始,美国城市发展步入了第三个发展时期,即向郊区拓展。有人称之为城市的衰弱,也有人称之为城市发展史上的新趋势,是城市化的继续。郊区化的出现使美国人口出现了第3次大流动(相对于早期的城市化带来的人口向城市迁移和西进运动2次人口迁移而言)。如今,大部分称之为城市人口的美国人其实是郊区人。全国有一半以上的人口生活在城市的边缘地带,即郊区。市郊化的趋势有其特定的历史缘由,一方面它是美国人反城市、崇尚田园生活传统的历史延续,另一方面城市化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又加深了这一趋势。

---

①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 S.*, 1994, p.43 在今天的美国,区分城市与农村一般采用1960年的标准,即分为标准大城市统计区(Standard Metropolitan Statistical Area, SMSA)与非标准大城市区。划分标准为:由一个5万人口以上的中心城市及其所在县(County)的其余部分组成,该县有75%以上的劳动力从事非农业活动。所以,现在称为城市人口的那部分美国人包括住在城市中心和郊区的人。

城市化原因

美国的城市化是随着工业化的开始而开始，适应了工业化发展的需要。除了殖民地时期建立的城市以外，早期的市镇基本是围绕着工厂自然形成的。从建国开始到19世纪末，美国工业化基本上完成。特别是北部地区，工业化开始得最早，也最为彻底。高度的工业化使得工厂林立，这些工厂的发展反过来又促进了当地城市的发展。工厂工人是城市的主要居民，他们的存在使得商业繁荣昌盛，推动着城市文化的兴起。随着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由于城市交通条件的改善，城市生活变得越来越便利、舒适而有吸引力。工业化的高度发展又带来了农业生产技术的革命。农业生产对于劳动力数量的要求越来越少，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越来越多，遂向城市大量迁移。到20世纪初，全国工业雇佣劳动者的人数几乎和农场主、佃农、农场工人人数不相上下了。[①] 这标志着以工商业为主体的经济方式终于代替了美国建国初期以农业为主的小生产者经济形式。城市生活逐渐代替了乡村生活，成为社会的主导生活方式。

大量移民的到来进一步加快了城市化的进程。早期的移民是被美国广褒的土地吸引而来，成为农场主和小商人。但是，伴随着工业化的进程，越来越多的新移民是被工业文明的神话所吸引，充当美国工业雇佣劳动力，成为城市居民的一部分。他们对于城市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初，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两次移民潮使得城市居民的绝对数目成倍递增。即便是今天，大多数新移民也还是被美国城市所吸引。

工业化带来的交通、通讯事业的革命对于城市化可谓功不可没。在19世纪西进运动的最初时代，美国人用大篷车作为交通工

① 《美国的历程》，下册，第68页。

具,一封信往往要花上数月才能到达收信人的手里。城市化离他们遥远而不可及。但是,蒸汽轮船的发明、横贯北美大陆铁路的建成,使得人口移动终于乘上了时代的快车。几乎在同时代,美国人发明了电话、电报,距离感终于成为历史。19世纪美国交通通讯事业的革命,结束了农村与世隔绝的时代,传统的生活方式土崩瓦解。城市生活的种种好处为人们所认同,同时农村的物质生活条件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早年的城市中也谈不上有发达、便利的公共交通。如果说有的话,那就是马车。有一段时期城市还出现过马拉有轨街车。蒸气机的发明和火车的发明使得城市出现了有轨电车、轻轨铁路和地下铁路。城市交通的改善,加快了人口的流动性,城市不断扩展,城市的商业也向四周扩散。到了20世纪,美国城市交通再次发生革命。全国公路网的建立、汽车的普及、二战后航空业的迅猛发展,使得城市进一步膨胀。当飞机成为仅次于汽车作为旅行的交通工具时,城市向四周扩展得更快了。

城市化三部曲

美国的城市化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从区域角度分析,美国的城市化从东北部起步,并逐渐向西部和南部推进,从时间来划分,其过程大致可以分成3个阶段。第一阶段在19世纪之前,美国的城市基本上是大西洋沿岸的一些港口城市,它们都是由美国的前宗主国和其他欧洲殖民者建造的。第二阶段是在整个19世纪,主要是东北部城市化的加速和西部、南部城市化的开始。第三个阶段是在20世纪,城市化较早的地区向郊区拓展,郊区化使城市发展步入了新时期。这一阶段又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是从本世纪初到二战结束,西部和南部的城市化进一步发展,同时东北部大城市开始分裂,郊区时代开始。第二个阶段是从二战结束到现在,由于郊区化进一步深入,导致城市带的出现和由于经济重心的移动导致南部阳光地带的崛起。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已是一个高度城市化的国家。到19世纪末，全国有1/3的人口被列入城市人口。[①]全国人口在整个19世纪增加了11倍，其中城市人口增加了86倍。8000人以上的城市从19世纪初的6座增至448座。最引人瞩目的是大城市的崛起，到1900年，全国已经有3个百万以上人口的特大型城市，而人口在50万以上的城市也有了许多。但是，全国的城市分布极不均匀。北部各州的城市化程度普遍高于中西部地区和南部各州。到1900年，北方居民中6/10为城市人口，中西部则为3/10，而南部地区还不到1/10。[②]

两次世界大战为美国的工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一批批城市化程度很高的经济中心在工业化的基础上先后形成，同时伴随着郊区化的出现。大城市的郊区化，使得大量人口向郊区移动。与此同时，中心城市人口比重下降，城市日益分化，形成包括中心城市、郊区城市以及在它们之间的往返带的大都市时代。

二战结束后，美国社会步入了空前繁荣时期。汽车的普及、生活水平的提高，使中产阶级竞相在郊区购买房屋，郊区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大城市郊区化的规模前所未有，使得城市的地域越来越广，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农田分界线日益模糊，城市地域相互蔓延，有的甚至连成一片，最终导致一个个城市结合在一起形成城市带。特别是在美国东北部大城市之间，由于经济的横向联系，这些城市组成规模巨大的工业综合区。他们是美国最大并且最成熟的大城市带。它沿大西洋，北起波士顿，南至华盛顿，长约1000千米，宽50到165千米，面积有13.9平方千米，区域内共有25个标准大城市统计区(SMSA)，总人口在4 200万以上。[③]

战后城市发展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南部阳光地带的崛起。说

---

① 标准是1790年的第1次人口普查，人口超过8千的市镇被定义为城市。

② 《美国的历程》，下册，第66～67页。

③ 转引自《美国的城市化》，应世昌：《美国研究参考资料》，1992年第12期，第14页。

它是阳光地带，是因为这里阳光充足、气候宜人。由于美国政府引导并鼓励在这一地区发展高技术为主的国防工业，如航空航天、原子能工业等，使这些地区的工业异军突起、发展迅猛。工业的高度发展使南部欣欣向荣。加上这些地区气候适宜，吸引了许多美国人迁移到此寻找工作机会和安度晚年。到1980年，美国南部和西部的人口总和就已经超过了东北部和中西部地区的人口总和。[1]阳光地带正成为美国又一大工业和经济中心。

城市改革与市郊化时代的困惑

美国虽然是世界上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但是美国城市的发展却是建立在反城市传统之上的。美国也许是世界上最反城市的国家。美国城市发展的过程中一直存在赞成城市化和反对城市化两派的斗争。这两派的斗争构成了美国城市发展史上的一大奇观。

美国最初是以一个农业大国的面目出现在世界上的，建国之父中有许多人都极力反对城市。这一派的观点主要是从农业浪漫主义出发，认为城市文明的发展会导致道德沦丧、邪恶上升。美国民主之父托马斯·杰斐逊认为，城市是“瘟疫”，是“脓疮”。甚至还有人把城市比作是“人类社会藏垢纳污的水塘”。[2]19世纪的许多美国作家、哲学家也对城市百般攻击。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主张一种无拘无束、贴近大自然的生活。但是，城市毕竟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发展起来，特别是在整个19世纪，随着工业化的进程和新移民的到来，城市化加速了。城市的发展成为历史的必然和社会的潮流。但是，反城市的人一刻也未停止斗争。不过，他们反对城市，不再是从浪漫主义单一角度出发，而是带有现实主

①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S.*, 1994, p.30.
② 《美国的历程》下册，第66页。

义的色彩。他们反对城市，主要是抨击美国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与弊端，希望能进行城市改良。他们反城市的呼声最终推动了美国城市的改革。

美国的城市在不断的批评声中得到改良，城市的硬件设施和软件环境逐步完善。改革使得城市管理体制不断适应城市发展的需要和各种新情况。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城市发展完全没有规划，城市的管理机构也大多受到工业企业的控制，政党机器的党魁们垄断了城市的权力。在最糟的贫民窟里，犯罪和卖淫盛行。当时的康内尔大学校长安德鲁·怀特写到："美国的城市政府在基督教世界里是最浪费、最无能、最腐败的，仅有少数例外。"[①]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一场旨在推动城市改良、促进公益的运动作为进步运动的组成部分席卷美国。在1894年成立的全国城市联盟指导下，人们开始改革城市的管理，促进城市向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美国的城市改革主要表现在行政管理模式的改革。工业化后期，大城市的兴起和城市社会的日益复杂化，要求建立新的、现代的城市管理体制和模式。城市改革的目标正是为了消除腐败、加强民主，创造大众参与的机制，同时强调效率，建立现代管理模式。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城市改革浪潮中，城市政府先后形成了3套管理模式，即市长制、委员会制和经理制。现在美国市政府还是沿袭了这三种模式[②]。这些管理模式的出现，为现代美国城市的管理开创了先河，奠定了基础。

建立了现代管理体制的美国城市不断制定新的城市法规，应付城市发展中遇到的问题。随着城市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二战后城市人满为患的现实，使进一步的改革迫在眉睫。1949年，国

① 《美国的历程》，下册，第77页。

② 具体情况参见本书《社会运动与社会政治篇》

会通过了《住房法》。根据这项法令,联邦政府试图资助社区发展、清除贫民窟。60年代,在约翰逊建立"伟大社会"的鼓舞下,国会通过了一系列城市立法。例如1965年,国会通过了《住房和城市发展法》,授权政府成立了住房和城市发展部。1966年,又通过《模范城市和都市再发展法》及《都市交通法》。1968年,国会通过《住宅建设和城市发展法》。[①] 这些城市立法为解决城市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有人把美国历史划分为农业世纪、工业世纪(城市世纪)和郊区世纪。美国生活的最初百年是乡村神话的时代。19世纪后半叶和20世纪上半叶的大部分时间一直是美国都市神话的时代。但是如今,只要买得起汽车和房子,美国人就会寻求逃脱拥挤不堪和危机四伏的城市。郊区化已是人们的共识。郊区化进一步发展了美国人"反城市"的传统,人口向大城市边缘的中小城市移动。于是,城市的范围越来越扩散,导致大城市一个个连接在一起,促成了城市带的形成。

郊区化使大城市中心市区人口逐渐下降。1920年,大城市郊区的人口增长第一次超过了中心市区。在40年代,郊区人口的增长几乎是中心城市的2.5倍[②],到1960年,美国人口分布状况是城市、乡村、郊区各占1/3;到1990年,如果不包括郊区人口,中心城市人口降为31%,乡村人口更是降到25%以下,而郊区人口占到将近一半。所以称美国现在为郊区世纪毫不过分。

引发郊区化的原因很多。一方面,美国人口越来越多,虽然20世纪开始的时候,美国人口才接近7 600万,但是今天,美国人口已经达到2.5亿,在一个世纪内人口增加了3倍多。这么多的人口如果大多集中在城市,必然会使城市人满为患。所以,经济条

---

① 刘绪贻主编:《战后美国史:1945—1986》,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版。第237页。

② 数据来源:*The Popul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Historical Trends and Future Projections*,第128~129页。

件允许的家庭就移居郊区。

另一方面，如果说当初大部分美国人是被工业文明带来的种种便利所吸引而来到城市的话，同样他们又被工业时代的副产品赶出了城市。工业时代给人们带来的最大的灾难就是城市日益受到诸如环境污染和城市配套设施滞后等问题的困扰。此外，种族问题又一直是美国社会的老大难问题，大城市存在许多隔离的贫民区。当 50 年代最高法院宣布种族隔离政策违宪后，一些原先住在城市中心的富裕白人开始寻求在郊区兴建房子。高度发达的汽车工业成为美国人向郊区发展强有力的保障。郊区人口的增加也吸引了大量中心城市服务产业的外移，使得郊区生活变得和城市中一样便利。而与城市相比，郊区比较清静，空气也清新，拥有清静的环境和清新的空气，因此显得更有吸引力。许多美国人宁愿每天花费大量时间驱车赶往中心城市上班，也不愿放弃在乡村居住。随着城市郊区化进一步深入，各种犯罪问题开始向郊区蔓延。郊区生活的安宁和平静被逐渐打破，人们传统理念中的郊区神话正被摧毁。中产阶级对此惶惶不安，迫切希望政府采取措施。

从诸多方面衡量，美国今天的城市远比 1900 年的城市舒适、清洁、安全。现代城市管理体制的建立，以及非常完善的监督机制使市政当局也不像过去那么腐败。但是今天，城市的发展却愈加显得困惑。这种困惑部分源于美国社会固有的问题，部分源于美国的城市日益膨胀，郊区化不断深入。两者一结合，使得美国城市险象环生。

首先是城市的财政危机重重。由于大部分富裕的居民迁往郊区，他们不再向市政当局交纳税款，而新移民和穷人的涌入又使城市日益膨胀。市政当局无力维持财政，城市日益失去自给自足的能力。此外，极其严重的非法移民也加重了各级政府在社会福利、医疗保健、以及教育系统等方面的财政负担。以加利福尼亚州为例，仅 1994—1995 财政年度，它就为非法移民支付了 25 亿美元，

这些人大都生活在城市里。

60年代的民权运动虽然消除了法律上的种族隔离，但事实上的隔离仍然十分严重。从60年代开始，城市中心地区里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以及老人和穷人的比例越来越高。他们不仅无力纳税，而且是税款的消耗者，是福利制度的最大受益者。城市中心地区的衰败导致种族关系再趋紧张，种族骚乱时有发生。近年来最大规模的一次种族骚乱事件发生在1992年4、5月的洛杉矶。当时参与骚乱的人焚烧房屋、殴打警察、哄抢商店，造成人员的伤亡和大量财产损失，对城市公共安全和公共事业造成了极大的破坏。街头犯罪是美国城市的另一大问题。在纽约、费城这样的大城市，地痞、流氓和各种犯罪分子的存在人为地把城市分裂成危险地带和安全区。种族矛盾、自由拥有枪支，使得暴力犯罪屡屡发生，这些冲突尤以城市中心黑人等少数种族人的聚居地为多。60年代开始的反文化运动又诱发了吸毒和卖淫。街头犯罪成了城市瘫痪状态最极端的表现形式，而犯罪者的年龄也呈现低龄的特点。从本世纪初到60年代末，因犯罪而被逮捕的18岁以下的青少年增加了100多倍。[①]从60年代开始，美国人口犯罪比率直线上升，从1960年的1%发展到90年代的将近6%。[②]众多的犯罪活动不少是有组织的犯罪。影片《教父》中渲染的黑手党就是一个组织严密的秘密犯罪集团。虽然这样大规模的犯罪集团是否真如电影中描绘的那样，人们并不十分清楚，但是有组织的大型州际犯罪组织的存在是毫无疑问的。这些黑社会组织有时结成联盟，有时又相互火并，并且插手企业界、劳工运动和地方政府，到处散布不良影响和恐怖气氛。近年来，美国犯罪率虽呈略微下降趋势，但是仍然保持了很高的绝对数量。

---

①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S: from Colonial Times to* 1970, p.415.

②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S.*, 1970, *p*.141;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S.*, 1994, p 198.

第四章　教育的普及和高等教育的发达

美国创立之初，它的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水平都远远落后于欧洲国家。但今天，美国拥有世界最多的诺贝尔奖得主、最多的科技精英和各种高级管理人才。美国的辉煌成就得益于它一贯重视教育的传统，发展和革新教育体制的魄力。尤为重要的是，美国人一向有危机感。正是这种危机感和处理危机的种种政策，使美国安然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面临挑战的时代。

重视教育的传统

美洲大陆的早期移民中大部分是新教徒。即使是在殖民化草创时期，他们都是教育的热情倡导者。新教徒酷爱读书源自对宗教的热情。他们虔诚地希望通过读懂《圣经》来理解宗教的真理以指导人们的生活。早在殖民地时期，马萨诸塞的法律就规定每拥有 50 户居民的市镇，就必须有 1 名教师，而每 100 户居民的市镇必须有 1 名能教希腊文和拉丁文的教师。于是，在美洲殖民地，识字者的比例至始就高于英国。美国独立后，对教育的重视一如既往。短短一二百年后，美国越过老牌帝国英国成为世界强国，这不能不归功于他们从一开始就高度重视教育。

美国人对教育的酷热一方面源于对教育宗教似的崇拜，另一方面是社会经济迅速发展而自然产生的需要。早期的教育大多是由私人负责。富人家的孩子是在私立学校或家庭教师那里接受初等教育，而穷人家的孩子是由父母或在教会学校和慈善学校接受

初等教育。由于还没有形成联邦政府资助教育的观念，所以在美国建国早期，联邦政府对教育的资助微不足道。由于教师自身缺乏系统训练，大多数老师只能教人读书识字而已，因此教育远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一批教育家开始倡导教育改革，推动政府管理和资助教育。越来越多的州规定实行义务制教育。1852 年，马萨州率先通过一项法令，规定所有学龄儿童必须入学，成为美国制定义务教育法的第一个州。1862 年，国会又通过了《莫里尔土地赠与法》，据此，许多赠地学院纷纷产生，为国家培养了众多农业和机械工艺人才。1874 年，密歇根州通过了《克拉马佐法案》，规定公立中小学的经费由地方税收承担。这一法案陆续为各州采纳，公立学校得以迅速发展。

从一开始美国人就试图把高等教育从高人一等的事业转变为民众的事业。美国的教育不同于欧洲，呈现出一种奇怪的倒金字塔形。在政府依法资助中等教育之前，“高等”院校就如雨后春笋般地空前发展。创办高等教育的最初目的是为了培养合格的牧师。新教徒来到美洲大陆 6 年后，就在马萨州建立了哈佛学院。因此，哈佛的历史比美国的历史还长。有人说，教育成为美国的一种新宗教，大学则是它的大教堂。人人似乎都要有深造机会。因此，美国高等教育不仅起步较早，发展速度也非常惊人。建国初期，教会就大力兴办大学，使得每个州都大大小小至少有一所大学。到 19 世纪中叶，已经相继出现了一大批由教会参与创办的名牌大学，包括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宾西法尼亚、哥伦比亚、弗吉尼亚等等。这些大学从波士顿到华盛顿，由北至南分布在一条线上，颇像一条长春藤，成为现在人们经常说的“长春藤”大学。这些大学现今都是美国历史最悠久、教育设施最完善、教育质量最高的大学。但是最初，它们完全都是因为宗教目的而创办的。这种起源于宗教目的的办学方式，为美国推行全民教育和发展高等教育打下了基础。

进步主义运动与20世纪初的美国教育

到1900年,除了美国南部,全国绝大多数州都已制定了某种形式的义务教育法。平均在校人数和平均学年长度均有显著提高,文盲率已降到11%左右,为历史上的最低点。全国的公立中学已增加到6000所以上,私立学校也继续发展。城市学生的入学率高于农村。同时,各地区的教育水平也不同,一般来说,西部和南部要落后于东部。尽管如此,美国已建立包括幼儿园、师范学校、夜校和成人职业教育在内的完备的教育体系。与此同时,公共图书馆也有了惊人的发展。到1900年,全国拥有9000多座公共图书馆,其中国会图书馆也已于1897年开馆。全国拥有藏书已超过了4500万册。[1] 全民免费教育已成为美国信念中最重要的内容。不过,重视教育的目的已经渐渐从最初完全宗教的性质逐步趋于世俗化。人们期望通过教育解决日常生活和民主政治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例如如何做可口的饭菜,如何迅速地使移民的孩子美国化,或是如何解决极不融洽的种族关系等问题。教育已经像人们的衣食住行一样,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20世纪初,美国的城市大量兴起。大批农业人口涌入城市,城市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扩展,但现存的教育体制却一时无法适应迅速变化的社会经济和日益增多的人口。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倡导一场旨在建立一种更为开明和实用的公共教育的制度改革,这是当时进步主义改革运动中的重要内容。

进步主义教育改革运动提倡实用主义原则,要求摆脱传统的拘泥于形式的教学方法,使教育更符合实际生活的需要。在被誉为"进步主义教育运动之父"的弗朗西斯·帕克和"首席代言人"约翰·杜威博士以及其他教育家倡导下,教育主要在以下一些方面进

---

① 《美国的历程》,下册,第89页。

行了改造:初级中学、各种能力水平的测试、师生间的工作协作、扩充课程、建造更多的体育馆和礼堂以及不断增加的课外活动。改革实现了美国教育体制和教育内容的现代化。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人们认识到美国缺乏受过专业训练的人才,于是进一步推动了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发展。1917 年制定的《史密斯 - 休斯法》规定由联邦政府拨款给各州培养专业人才。过去,都是由各州负责本州的教育,现在联邦政府渐渐干预,尤其是通过资助教育的方式来管理各州的教育。与此同时,进步主义教育协会于 1919 年成立,使教育改革在公立学校风靡一时。

二战后教育发展的总趋势

二战后的美国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它在危机中不断改革,在改革中不断完善。纵览战后 50 年,美国教育发展呈现出以下一些趋势:

(一)重视教育与教育的高投入。重视教育是美国政府的一贯政策,也是历届美国总统的一贯传统。美国开国元勋之一第三任美国总统杰斐逊,要求他的后人在他的墓碑上写上"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人,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的作者和弗吉尼亚大学之父",就是没有写"美国总统"。这充分说明了教育在杰斐逊心中的位置。历任总统几乎都继承了这一传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总统对教育尤其倾注了前所未有的热情。

战后几十年来,美国联邦、州和地方各级政府每年对教育的投入都在稳步增加。70 年代初,联邦、州、地方以及其他来源的每年总的教育支出约为 2500 亿美元,而到 90 年代,此项数字已达到 4000 多亿美元。其中,联邦支出从 70 年代初的每年 270 亿美元增加到 90 年代的每年 340 亿美元,年递增率在 8% 以上;于此同时,州和地方每年的教育支出从 70 年代的约 1700 亿美元增加到 90 年代初的 2600 亿美元,增加了近 1 倍。更为重要的是,民众也

对教育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热情，私人教育支出呈稳步上升趋势。年均各种教育投入在800亿美元之上。[①]

（二）教育的普及与教育体制的完善。巨额的教育投入大大有助于各级教育的高度普及，同时也为进一步完善教育体制提供了条件。美国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中小学义务教育制，在校中小学生约5000万人，其中4500万人就读于公立学校。小学基本上是6年到8年，公立中学一般分为4年制与6年制，分别和8年制和6年制的小学衔接。其中既有普通中学，又有职业中学。普通中学也非常强调学生动手能力，课程设置包括必修课和选修课。职业中学主要让完成普通中学学习的学生再通过两年左右的在校学习或是在普通中学学习的最后两年内，让学生根据自己喜好，学习一些和将来工作有关的课程，进行职业前培训。美国人的普遍受教育水平都在高中以上，而且，有1/5以上的美国人都接受过各种形式的大学教育。

（三）趋于男女平等的教育体制。美国早期女子学校的建立主要是为了培养妇女成为一名合格的家庭主妇。随着《莫里尔赠地法》的实施，男女才开始同校。赠地学院强调为所有的人服务，开设了许多实用的课程，不限制妇女入学。20世纪，妇女受教育的机会大大增加，要归功于本世纪初轰轰烈烈的妇女选举权运动。到1920年，男女同校已经成为美国教育制度的既定方针，同年，妇女获得所有学位的1/3。[②] 妇女拥有和男子平等的教育机会基本为社会承认。

到本世纪中叶，妇女受教育的平均水准已基本接近男士。60年代开始的妇女解放运动使美国妇女有了更多受平等教育的机会，特别是1965年约翰逊总统签署了“肯定性行动计划”，其中的

---

①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S.*, 1994, p 154.

② 《美国人民主历程》，第553页。

一条就是要保障妇女在大学新生中占有一定的份额。妇女受教育也不再局限于师范类、医护类等等传统的领域。在普通教育方面,妇女取得了和男士同样的业绩,而在高等教育方面,妇女也越来越接近男士的水平。如1992年,各类学校中有男生3220万,女生有3230万;高中在校生中,男生为680万人,而女生为650万人;大学在校生中,男生为620万人,女生为780万人。1993年,分别有80.5%的男士和80%的女士完成了高中学习,分别有24.8%的男士和19.2%的女士完成了大学学习。[①]据美国教育部统计,1999年,美国大学学士学位的57%以上将由妇女获得(其中黑人女大学生占黑人大学生的63%)。这个数字在1950年时还不到24%,1970年不过是43%。[②]

(四)趋于种族平等的教育。美国的第一所黑人学院建于1854年,比白人学院晚了整整两个多世纪。内战后,美国陆续建立了一些黑人教育机构。早年,大多数受过教育的黑人都是黑人学院的毕业生,是隔离教育制度下培养出来的。1954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布朗诉托皮卡地方教育局案》作出判决:在教育问题上,任何平等但是隔离的教育设施都是违宪的。这项决议就像一颗原子弹,在法律上彻底摧毁了任何歧视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不公平政策。

布朗案的判决再加上黑人民权运动的斗争,使60年代以来的黑人教育状况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为了贯彻政府的立场,许多地方开通了学生上学的班车,把黑人和白人聚居区的孩子组合到一起,共同学习。虽然一开始受到白人的抵制,但是慢慢地白人社会也接受黑人是和他们平等的这一观念。针对黑人就业难的特点,政府制定了许多法令大力发展黑人职业培训,提高他们在劳动

---

①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 S.*, 1994, p. 156; p. 157.

② *U. S. News & World Report*, February 8, 1999, p. 47.

力市场上的竞争力。这些法令包括1963年制定的《人力训练和发展法》、《职业教育法》，以及1973年制定的《广泛就业训练法》。黑人是这些法令最大的受益者。从80年代开始，为了着眼于黑人儿童的成长，举办了称之为“智力开发”工程，主要培训黑人学龄前儿童，以提高他们的智力水平。这项计划迄今已经耗资数亿美元。现在，黑人等少数种族受教育的条件和水准较过去相比有了长足的提高。

白人和黑人完成学业比较

	完成四年以上高中学习(%)				完成四年以上大学学习(%)			
年　份	1960	1970	1980	1993	1960	1970	1980	1993
占人口总数	41.1	52.3	66.5	80.2	7.7	10.7	16.2	21.9
白人中间	43.2	54.5	68.8	81.5	8.1	11.3	17.1	22.6
黑人中间	20.1	31.4	51.2	70.4	3.1	4.4	8.4	12.2

资料来源：《美国统计数据摘要：1994年》，第157页。

(五)发达的高等教育。从第一所大学哈佛的建立到今天，美国的高等教育，经历了将近400年的发展。联邦政府一直积极扶持高等教育，它给予大学的资助目前占高校总经费的15%左右。而且，国会和联邦政府还制定了各种法令法规，影响高等教育的发展。如今，美国国内已拥有各级各类高等院校6000余所，每年约有200万大学生入学，100万大学生毕业，其中在校研究生人数已经超过100万。美国教育无论是从教育范围、教育手段还是教育水准来说，都可以说位居世界大国前列。

美国高等院校按其规模和学术水平大致分为4类。第一类包

括初级大学和社区大学，它们由地区、市政府或县一级行政机构主办，学制2年，只能授予准学士学位。这类大学主要是学生为进入综合大学作准备，或是作为学生上岗前的培训。在全美6000多所大学中，此类大学占半数以上。第二类大学称为学院，它的课程设置较少，一般只能授予学士学位和少量硕士学位。第三类大学称为综合大学，它由许多系或学院组成，课程设置齐全，财政和师资力量雄厚，科研队伍阵容强大，有权授予从学士到博士等各种学位。这类大学规模庞大，是美国人才培养和科研的中心。第四类大学为军事院校，均由联邦政府开办。

60年代美国教育界出现了一种新的教育方式，即开放性大学(Open University)，这类大学打破了旧的条条框框，使学术从深庭大院走上了十字街头。学生主要通过自修等途径进行学习，考试及格即可获得学位。随之而来的就是职业教育异军突起，成为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职业教育包括在职培训、脱产培训、半工半读、职业再训练等等，形式多样。职业教育热，主要是因为今天的经济以日益复杂的科技为基础，所以成年人不得不每隔几年就返回大学进修一下，否则就会失去竞争力，并且难以找到更好的工作。这些开放性的教育手段，适应了现代科技社会的需要，为人们提供了继续受教育的机会，使得劳动力的素质不断得到改善。

完善的高等教育体制和发达的高等教育水平奠定了美国强国的立国基础，正是美国国力强大的潜力。虽然美国仍然是个年轻的民族，但它的科技实力却是世界一流的。世界上一半以上的发明创造都是美国人的杰作，而这可以归因于美国发达的高等教育。每年的诺贝尔奖得主也往往由美国人独领风骚。从1936年以来，在诺贝尔自然科学奖中，美国科学家共获得了25个化学奖、37个物理学奖和40个医学生物奖。自从1969年设立诺贝尔经济奖以来，美国人共获得了27个奖中的21个。而美国的芝加哥大学也因为有65名学者先后获得诺贝尔奖，被誉为是“诺贝尔奖得主的

摇篮”。发达的高等教育奠定了美国在国际竞争中的霸主地位。

战后教育危机与教育改革

美国强国的成功经验之一就是重视教育，并且以务实和现实的态度不断改革教育。20世纪美国教育发展的总脉络是在危机中不断调整、不断改革，一刻也未停止过。20世纪初进步主义运动促发了教育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使教育方法彻底与传统相决裂，教育与现代工业社会相适应，教育体制得到了完善，教育制度走上了现代化道路。20世纪上半叶的美国教育，基本上沿袭了进步主义教育的传统。但这一教育传统到二战以后受到了挑战，这种挑战是由两次大的教育危机引起的。

二战后，美国社会经济空前繁荣，军事力量无敌于天下。但是，在这样的歌舞升平中，美国的教育却蕴藏着极大的危机，面临着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和美国的人口增长、经济发展、科技革命和美国在当时所处的国际大环境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首先是教育的硬件亟待改善。由于30年代的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美国的教育投入远远满足不了学校的发展，特别是随着《退伍军人权利法》的颁布，大量退伍军人涌入学校，再加上战后生育高潮时期出生的婴儿在50年代涌入小学，显得校舍短缺，师资匮乏。就软件而言，教科书和教学手段也日益显得陈旧，适应不了现代社会的需要。冷战加速了美苏在高技术领域的竞争，使现代科学技术获得了空前的发展。然而，美国的教育基本上还是沿袭进步主义的传统，重视技能培养，忽视基本学术训练，因而不能适应科技发展和国防建设的需要。

1957年，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消息传开，美国国内举国震惊。一向自负、好胜的美国人的自信心受到极大的伤害，第一次对自己的教育体制产生了疑问。有关苏联学校办得既严格又有目的性的警告接踵而至。人们把美国在空间技术方面的落后直接

归咎于教育制度。关于教育问题的讨论和批评越来越激烈。美国人开始认识到，统治美国教育达40年之久的进步主义教育思想过分强调了个人的发展，忽视了专业基本训练。现存的教育手段只不过是用来训练人们追求物质的成功和舒适的生活，缺乏对科学的重视，而科学正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昌盛的基础。

在这场教育大辩论中，国会于1958年制定了《国防教育法》，对科学、数学和外语教学提供财政支持，强调教育的现代化，把教育的水准提高到国防安全的高度。这样，政府再次义不容辞地承担起资助教育的重大责任。教育与国防紧密地联系到一起，于是这一教育改革方案也顺理成章地美其名曰为“国防”教育法。社会民众对教育倾注了前所未有的热情，政府也大大增加了教育的投入。联邦政府还建立了全国科学基金会，为课程改革和师资培训提供资助。教师的工资也得到了提高，使得教师成了有吸引力的职业。各大学都非常重视研究工作，教授也从繁重的教学工作中腾出一部分精力进行科研。当时流行的说法是，教授们“要么出书，要么灭亡”。言外之意，不注重科研的教授是无法在学校立足的。这场教育改革运动，带有英才教育色彩，完全是为了培养杰出人才，以取得立竿见影的成效。

1969年7月16日，美国月球飞船阿波罗11号发射成功，比肯尼迪总统生前提出的美国力争要在10年内发射载人宇宙飞船、在空间技术领域超过苏联的这一目标提前了整整6个月。7月20日下午，宇航员尼尔·阿姆斯特朗上尉走下登陆舱，在月球上踩下了人类的第一个脚印，成为行走在月球上的第一个人。美国登月飞行的成功，是人类历史上征服茫茫宇宙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美国人终于挣足了脸面，教育再次奠定了美国在空间技术领域竞争的霸主地位。

60年代末70年代初是美国社会动荡的时期，各种社会运动风起云涌。此起彼伏的校园风潮使得人们的思维异常活跃，教育

界人士广泛开展了对教育理论的研究。但是,这种研究却产生许多负面影响,各种对立的教育理论使美国教育实践步履艰难,教育质量每况愈下。教育界人士惊呼,美国的教育质量已接近崩溃的边缘。

1983年4月,由教育部长任命的全国教育质量委员会发表了题为《国家处于危险之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的报告。这份报告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的国家处于危险中。它把教育改革的必要性渲染得非常强烈。美国在工业、商业、科学、技术等方面的绝对优势正在受到新崛起的国家的挑战,甚至被取而代之;虽然美国的教育在数量和规模上领先于其他国家,但是教育质量低下。据统计,美国学生在一系列国际比赛中的成绩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有许多项目甚至列倒数第一。1983—1986年期间,"国际教育成就评估协会"对各国的自然学科进行了全面调查。有15个国家的10岁学生接受了协会的测试。测试结果是:在对10岁学生的测试中,美国学生名列第8位;14岁的美国学生列倒数第一。而对即将高中毕业的学生的测试表明,高等数学美国学生名列第14位,微积分名列第12位,几何名列第12位。全国教育质量委员会的报告把美国面临的教育问题描述得十分严重,一下子印发了300万份。一时间,全国掀起了谈论教育和教育改革的热潮。教育改革成了1984年总统竞选的主题之一,两党总统候选人都抛出了教育改革的一揽子计划,许多人把这一年称为美国的教育年。导致这场教育改革运动的直接原因是教育质量的下降。

此外,教育领域还出现了半文盲。虽然这些人都会说英语,但是他们的阅读和写作能力极弱。1993年9月联邦政府的一份报告指出,美国高中生中大概有1/4不能谙熟基本阅读,而成年人中有900万人缺少基本阅读、算术和思考能力。美国高技术领域的优势正在被西欧和日本等国迎头赶上。面对这些新崛起的西方强国,美国人进一步认识到教育对国家的重要性。布什总统任内第

一次提出教育赤字。州际教育委员会为此发表了一份题为《为高质量教育而行动》的报告，指出，技术进步和全球竞争并不意味着只是培养一部分英才，而是需要同时提高全民的素质，提高普通学生、大众百姓的现代科学技术知识水平。

教育界人士认为，美国教育正面临二次大战以来最严重的危机，需要进行最重要的一次基本改革。但里根和布什两任共和党总统虽然都曾踌躇满志，希望能够有所作为，但见效甚微。真正的教改措施是在克林顿总统任内通过的。它的冲击力度超过了以往任何一次教育改革。

1994年3月31日，美国总统克林顿签署了由参众两院经过激烈辩论通过的《美国教育改革法》，这项法律于1994年7月1日开始实施。

该法试图通过全国性有系统的教育改革，使所有学生都能接受机会均等的高质量教育，以提高学生的文化知识水准，增强美国国力，从而保持美国在国际竞争上居于领先地位，迎接21世纪的挑战。该法提出了一系列政策目标和措施，包括扩大联邦政府在教育领域的权限，统一全国的教育标准，重点是加强基础教育，提倡家长参与学生的教育工作，注重教育的实践效果以及学生对知识的实际应用能力，此外，它还强调要重视多元文化教育和少数民族教育，增加妇女和少数民族中高学历人才的比例。从这项教育改革方案可看出，这次教育改革是全方位的。这表明美国正在为美国进入21世纪作准备。

克林顿政府的教改方案通过才数年，它的成效还有待观察。但是，美国整个国家对教育改革所怀有的浓厚兴趣，将成为美国教育改革的重大支持力量，也必定会促使美国政府和普通美国人对于推进教育进步不遗余力。

第五章　弱者对强者的抗争：劳工、妇女和同性恋的权利

在美国社会，受主流文化排斥的不仅有因肤色不同的黑人等少数族裔，而且还有经济地位较低的劳工，性取向不同的同性恋人群等弱势社会集团。虽然女性从人口数量上来说并不是一个少数团体，但是她们和其他社会弱势集团一样，是文化意义上的弱者，都是盎格鲁—萨克逊男性白人社会歧视的对象。于是就有了弱者对强者的抗争。

劳工权利

美国劳工都是移民和移民的后裔，他们在“美国梦”的神话吸引下来到美国，希望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换来社会地位的提高和物质生活的改善。早期移民的成功经历深深地打动了后来者的心弦，并激励着他们毫无怨言地从事着最艰苦的劳动。

劳工的移民背景使美国劳工队伍纷繁复杂。在19世纪，由于地理、世界观、组织观念、抗议方式、原国籍、种族以及肤色上存在的差别，美国劳工组织四分五裂。不同工会团体不是团结一致，而是相互争斗、排斥，使劳工一直未能形成像欧洲劳工那样强大的斗争力。美国大部分劳工是个人主义的笃信者，他们希望凭借个人的力量，去改变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实现美国梦。因为存在着劳工对美国梦的迷信，劳工们放弃了激进的斗争方式，寄希望于通过有组织的谈判、罢工来争取自己的权利。

早期的劳工组织带有乌托邦式的改良主义理想。以 1869 年诞生的美国劳动骑士团为例,它的主要任务不是领导工人通过罢工来与资本家进行斗争,更多地是宣扬劳工之间兄弟般情谊,主张互帮互助。为此,劳动骑士团创建了 200 多个消费与生产合作社,激起了人们的巨大热情。1881 年成立的美国劳工联合会(简称劳联)是一个影响较大的劳工团体,它是个按照行业组织起来的技术工人的各个工会的松散联盟。它的第一任主席是烟草工人赛缪尔冈珀斯。冈珀斯以非凡的组织才能和长达 40 年之久的领导,使劳联成为美国最大的工会组织。到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劳联已经拥有数百万会员。劳联的基本路线是在现行制度下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使技术工人早日加入到中产阶级的行列。

1935 年,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成立。它决心团结更广泛的美国工人,特别是最贫穷的产业工人。它不同于劳联的最大之处就是产业组织原则,即把一个企业内的雇工不分技术和工种都组织在一起,采取罢工达到目的。由于产联运动中经常出现的暴力,保守派把产联和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紧密相连。从产联创立以来,一直遭到资方和政府的镇压,受到传统的、保守的中产阶级的排斥。中产阶级竭力反对各种工会运动,迷恋美国式的民主制度,寄希望于通过改革来完善美国的社会制度,消除社会不平等。

政府和资本家对劳工组织的敌意,加上劳工组织内部的不团结和劳工复杂的种族成分,使得大部分劳工,无论是土生土长的老移民,还是初来乍到的新移民,都迷信于美国梦的神话。因此,美国劳工保持着中产阶级的世界观和心理状态。他们从不认为自己的生活地位是固定不变的,而总是希望能摆脱劳工地位,上升到中产阶级。因此,与很多欧洲国家的工会组织不同,美国工会组织在政治上往往趋向于保守。

20 世纪,美国劳工运动的声势由小到大,又由大到小。在罗斯福新政时期,工会获得和资本家、政府官员一起商讨解决劳资纠

纷的权利。一时间，许多工人领袖西装革履，成为资本家的座上宾，共商劳工大事。劳工和美国的资本家都受益于本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战争期间，政府重视劳工的权益，劳工的物质条件得到进一步改善。二战后，美国经历了历史上最繁荣的年代。人们普遍关心的是个人的物质享受和家庭生活的温馨。物质文明的高度繁荣和冷战的爆发使美国文化上的保守主义成分越发明显。战后美国国会和各州相继制定了许多限制左翼工会的法律，其中尤以1946年被劳工称之为“奴役劳工法”的《塔夫脱－哈特莱法》为甚。保守势力和右翼工会利用这项法律，打击左翼进步工会，把进步工会扣以“共产主义”的帽子加以摧残。1961年，最高法院又两次确认了1950年通过的《麦卡伦－伍德法》，宣称“作为一个主张以暴力推翻政府的党的积极而自觉的成员是触犯联邦刑律的罪行。”根据它的规定，美国共产党必须到司法部登记为外国代理人，并主动提供组织的领导人和成员名单。直到1963年，最高法院才宣布强制性登记是违宪的。在《麦卡伦－伍德法》存在的14年里，左翼工会遭到摧残，工会运动日趋保守，产联和劳联一样都成为右翼工会。

50年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美国向信息和服务社会过渡，劳动力结构也随之发生了一场革命。由于传统工业的停滞和萎缩，加上科技的进步，钢铁、汽车、纺织行业的蓝领工人日益减少。与此同时新的经济领域不断开拓，于是出现了白领工人逐步取代蓝领工人的局面。在50年代，从事服务工作的白领阶层的人数首次超过了蓝领工人，这标志着传统意义上的产业工人阶级成为少数。中产阶级对于工会有着普遍的不信任感，作为其部分的白领工人大都不愿参加工会，而劳工组织的发展又跟不上服务行业的发展速度，工会会员人数下降。为了适应新形势，1955年12月5日，美国最大的两个劳工组织美国劳工联合会和产业工会联合会宣布合并成为劳联－产联(AFL－CIO)，乔治·米尼当选为

第一任主席，拥有会员人数达到1500万人。米尼本人极力反对采取罢工作为工会斗争形式，他本人也从未参加任何罢工。在美国制造商协会发表的演说中，他一再强调，劳资之间的共同点非常多，如果彼此争斗，显得十分愚蠢和没有意义。米尼还与政府保持密切的关系。肯尼迪总统还曾应米尼的邀请参加在柏林的西方工会代表大会。而肯尼迪访问欧洲期间，也请米尼作为随员。由于工会领导层趋向于和政府、资方保持一致，工会日趋保守。为了维护工会的保守主义倾向，米尼为首的工会领导还开除了一些激进的工会组织，比如像卡车司机工会、洗衣工人工会等等，以维护自己的权威。由于领导层的影响，劳联-产联的会员人数愈来愈少。在整个50年代，工会组织的发展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

60年代工人运动的复苏主要是受了60年代各种社会风潮的影响，工会会员的绝对人数有所增加。但是政府对劳工组织的态度注定劳工组织不可能有大的发展。肯尼迪总统明确表示，他的政府将不是一个企业主的政府，不是一个劳工的政府，也不是一个农场主的政府，而是一个代表全体美国人、并力图为他们服务的政府。为此，肯尼迪比较注重改善劳资关系，他任命了许多劳工领导人担任政府官员、驻外使节等等。在肯尼迪任内，工厂工人的周平均工资第一次提高到历史性的100美元，劳工的总收入上升到了创纪录的水平。

由于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到70年代末，美国白领阶层人数已远远超过蓝领工人。而在这部分少数蓝领工人中仅有1/5是工会会员，工会衰退已成大势。从70年代末开始到90年代，美国的失业率逐年下降。以工业为例，1975年的失业率为8.5%，1985年则降到7.2%，到1993年，失业率更是下降到6.8%。[1]失业率的下降使得工会组织越发失去吸引力。虽然工会会

① *Statistic Abstract of the U.S.*, 1994, p.417.

员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曾有过稍稍的增加，但是90年代开始，工会会员的人数已经减少到低于70年代末的水平。以1993年为例，全部劳工中仅有17.7%属于工会成员。[①]根据1996年4月1日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美国劳工中现在仅有14.9%的工会会员。工会的地位和影响山河日下。许多留恋过去轰轰烈烈劳工运动的老工会会员一方面感到困惑不解，一方面感到无可奈何，劳工已经沦为“少数人”之一。

如今，工会日趋官僚化，传统意义上那种从工人中来的工会领袖如今已经被职业管理者替代。由于不了解工人的实际情况和实际需要，他们往往不能表达工人的切实需要，用一位老工会会员的话说，他们“不具有从下层全体会员那里得来的激情”。青年工人对于工会领导层也是强烈不满。在他们看来，热衷于谈判的工会领导人，和资方人员没有什么区别，根本不能代表他们的愿望和实际要求。对于工会来说，通过集体谈判解决劳资纠纷仍然是工会组织的一贯做法，但是这种方法由于工会领导人的一再妥协而受到严重削弱。与过去和老板针锋相对的一贯做法相反，如今，工会领导人总是号召劳工和资方保持一致。这越发引起组织内部的分裂。虽然美国的失业率一直在下降，但是工人的实际收入水平并未上升。过去，一个普通工人就能养活一个大家庭，如今，往往是丈夫和妻子一起外出工作，还买不起房子，而且许多人没有医疗保险之类的社会保障手段。老工会会员抱怨这是劳工组织的过错。一个老工会领导人抱怨说：“现在的工会领导人谈起话来活像个政府官员……”[②]

现在，美国工会的会员大多是蓝领工人中收入最低微的那些人。工会的影响和战斗力已经远不如上个世纪和本世纪上半叶。

① *Statistic Abstract of the U.S.*, 1994, p.439.

② 斯特兹·特克尔：《美国人谈美国人：再寻美国梦》，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第1版，第187页。

而且,这部分人的权利受到了整个社会的忽视,这必然会使美国社会的底层不安定的因素增加。老劳工抱怨,现在的报社连篇报导商务财经,却很难找到劳工的专栏,而年轻人对工会几乎一无所知。一位有着 14 年工龄的技术工人,失业后不得不从事低收入的工作,而在新的环境中,他根本没有体面的地位,用他的话说,那里"不需要技工,只需要畜牲。"[1]但是如果拒绝那份低收入的工作,周围的人会认为他不是一个好公民。虽然自认为工作比过去辛苦多了,但是收入却明显少了许多,前途一片渺茫——这正是许多工会会员面临的问题。

对于工会在今天美国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美国国内有不同的看法。许多人认为,美国的工会已经成为美国社会政治权力中心之一。它和其他类型的团体,例如保守派的、自由派的、宗教性的、种族性的或者是地区性的利益团体一起,在涉及到本团体利益的时候,通过政治参与,采取一致行动。而且,在遇到经济危机或通货膨胀的时候,工会集体谈判的力量高于非工会工人的力量,所以他们往往能取得一些实际利益。有人说,实际上工会组织的力量还是非常强大的。一个大的工会组织的罢工往往可以导致整个国家经济最终陷入瘫痪。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美国政府在遇到一些大的危机时,往往把一些重要工业置于政府的管辖之下,惟恐危及美国的国家安全。比如朝鲜战争期间,杜鲁门总统就把整个钢铁工业置于政府管制之下。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工会和美国社会诸多的利益集团一样,是其中的一员,并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作用和影响。所以既不能低估工会在一定条件和环境下会发挥重大作用,又不能过分期望工会的权力和影响增大。由于社会权力的多元化,工会往往不能充分发挥其潜在的权力,并在一定程度上分裂了工会组织。产业结构的调整,使大部分的工会会员并非传

---

① 《美国人谈美国人:再寻美国梦》,第 197 页。

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他们实际上是中产阶级，至少已经成为“潜在的中产阶级”。美国劳联－产联现任主席约翰·斯威尼（John Sweeney）清醒地认识到工会面临的种种困境，打算重建工会运动。他最重要的举措就是扩大工会会员的来源，吸收妇女和少数种族加入工会，同时更虚心更广泛地听取广大劳工的心声。针对由于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导致的劳工工作机会的匮乏，工会运动的目标更强调保障就业机会和提高实际工资。作为新时代的工会领导人，斯威尼对工会的前途踌躇满志、颇为乐观，他相信，他能在自己的任期内使全国工会会员人数增加一倍。在担任主席的几年中，斯威尼的工作卓有成效，已经使服务行业工人工会的成员增加了一倍。[①]虽然斯威尼的的领导给工会运动带来了一线曙光，但他无法从根本上扭转美国工会运动衰弱的趋势。

妇女权利与妇女解放运动

20世纪的美国目睹了妇女运动史上最波澜壮阔的一页。本世纪初，妇女通过不懈的努力，获得了选举权，取得了与男性平等的政治权利。60年代末开始的妇女解放运动为妇女在更广泛的社会领域赢得了认同，彻底打破了传统文化观念中家庭主妇的形象，妇女成为社会中和男人一样具备各种才能并能从事各种职业工作的社会一分子。两个运动一前一后、相互呼应，成为妇女运动史上的里程碑。同时妇女解放运动也为美国社会带来了一系列后遗症，两性关系的革命就是其中最突出的部分。

在美国，“Lady First!”（女士优先）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但是，这种口头上的“优先”和实际生活中美国妇女长期以来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的“低下”形成鲜明的反差。女士优先原则的前提是妇女必须扮演“好女人”的角色。所谓

① *U.S. News & World Report, April* 1, 1996, p.28.

好女人就是贤妻良母。和东方封建社会一样，美国女孩从小就接受粉红色是“女孩子的颜色”这种传统家庭教育模式。在家务分工上，也往往制定出“男的”、“女的”应该做的工作。传统的基督教文化也大力宣扬妇女的家庭角色，因为上帝就是这么要求夏娃的。[①]于是，数百年来，妇女在生活中一直是弱者的形象。

美国妇女受歧视的历史和美国历史一样长。妇女一直是不享有完整公民权的美国人，从建国伊始她们就被夺得了选举权。美国《独立宣言》所称的“所有的人生来平等”，在现实生活中被人为地解释为“白种男人”。没有选举权就谈不上拥有完整的公民权，也就无法在广泛的社会领域拥有和男子一样平等的权利。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完成了工业化。这一转变对全体美国人的思想都产生了极大的冲击。这场社会的大演变、大变革造就了许多杰出的妇女运动先驱。越来越多的妇女认识到选举权的重要性，她们意识到，剥夺了选举权就是被剥夺了公民权，就是践踏了美国民主、平等和自由的建国原则。这种残缺的公民权等于美国人自我否定了一贯宣扬的平等原则；同时，她们也认识到，妇女一旦拥有选举权，就可以通过影响立法的形式来改善自己的境况。

由于妇女的大声疾呼，妇女的选举权日益受到全社会的关注。妇女们也行动起来，组成了妇女争取选取权组织。1900年，卡里·查普曼·卡特夫人当选为美国妇女选举权委员会主席。她积极组织妇女开展各种形式的宣传活动。一批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则采取组织抗议游行，甚至运用绝食斗争来争取选举权。女权运动也成为20世纪初进步主义运动的一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其声势更为壮大。

1920年8月，妇女盼望已久的选举权终于成为法律事实。宪

① 根据《圣经·创世记》的记载，人类祖先亚当和夏娃由于偷吃了禁果，被上帝贬到人间。上帝对夏娃说：“你生儿育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上帝的这番话把妇女在生活中的地位作了规定。

法第19条修正案的通过，使美国妇女在政治领域中真正成为与男性一样完全平等的伙伴。妇女至少在法律上已经成为完整的美国公民。这为妇女进一步争取自己的权利奠定了法律基础。

20世纪初的女权运动使妇女获得了在法律上和男性公民平等的参政权。但是，由于几百年来妇女一直担任生活中的配角，所以，在获得选举权后，出现了妇女不会使用和不愿使用选举权的局面，使得反女权主义的逆流甚嚣尘上，阻碍了女权运动进一步深入。在获得选举权后，女权运动失去了奋斗的目标，渐渐偃旗息鼓。虽然名义上妇女的政治地位已经和男性一样平等，但是在社会、经济和文化领域，妇女受歧视的传统并未有多大的改观。妇女地位的黄金时代还未真正来临。

二战为妇女带来了契机，妇女的潜力得到前所未有的开发。由于劳动力的匮乏，许多原先向妇女关闭的职业开始大量吸收妇女，妇女成了劳动力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600万妇女涌进了劳动力市场。她们无所不在，又几乎无所不能。妇女的杰出贡献使全社会都对她们刮目相看，这在客观上改变了她们的经济和社会地位。经济上的进一步独立使得妇女开始审视自己的政治状况。战争改变着每个置身于其中的人的观念。传统的桎梏被轻而易举地打破了。

二战结束后，随着男人的归来，妇女成为劳动力市场中较弱的一方。由于工作数量的限制，妇女和黑人等少数民族团体不得不把已经干熟练的工作拱手相让。同时，社会舆论不断宣传妇女的传统美德和甜蜜的家庭生活，呼吁妇女回到家中，重新担当家庭主妇的角色，弥补因为战争失去的家庭生活。一时间，舆论导向甚至把结婚和怀孕都视为一种爱国行为。1946年，有220多万对新婚夫妇，是战前的1倍，打破了1933年的纪录。1947年，有380万婴儿出世，又一次打破了纪录。人们戏称这是以快乐活泼的方式

结束战争,欢欢喜喜进入和平年代。[1] 1956年,美国《生活》杂志还发表题为《美国妇女》的专刊,为全美塑造了一种标准美国妇女的形象:郊区主妇,年方32,有4个儿女;她中学文凭,20岁出嫁;不仅外表美丽,而且人缘好,待客热情,持家有道……

但是,由于妇女已有了多年的工作经历,加上一部分妇女并不甘心就此从工作岗位上引退,因此即便她们已经结婚生子,仍然有相当多一部分人活跃在社会的大舞台上。经济上的相对独立使得妇女在许多问题上越发有发言权。一场新的轰轰烈烈的妇女运动在孕育之中。为争取选票,肯尼迪在参加总统竞选时曾许诺妇女选民,一旦当选将为增进妇女权益做一些实质性工作。他担任总统后,劳工部助理部长埃丝特·彼得森说服他成立了一个妇女调查委员会,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这样的官方委员会。经过两年调查,该委员会写了一份题为《美国妇女》的报告。该报告指出妇女仍然在广泛的领域遭受歧视,她们仍然不能和男子同工同酬,即便是在学历相同的情况下,她们的收入往往也只有男子的一半左右。接着,在妇女们的要求下,50个州都相继成立了这样的委员会来调查妇女的现状。社会渐渐开始意识到社会中还存在妇女的不平等问题。妇女开始慢慢觉醒。

美国妇女普遍意识到事实上的不平等是在参加黑人民权运动的热潮中。女子的天性让她们对黑人等少数种族的不幸遭遇充满了同情。妇女们积极地支持黑人获得平等地位,赞成消除种族隔离制度。在参与社会运动的过程中,在呼吁全社会重视平等、重视公平的斗争中,妇女们惊讶地发现,她们所受到的压抑和黑人们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虽然和黑人相比,她们几乎很少受到肉体上的迫害,但是,她们在精神上受到的压制、迫害和黑人一样严重。

---

[1] 兰登·琼斯:《美国坎坷的一代:生育高潮后的美国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1版,第2页。

黑人虽然过去曾经是奴隶，但是妇女一直扮演着文化奴隶的角色，是文化意义上的少数族。就肤色和性别而言，社会更歧视妇女。第一位被选入国会的黑人妇女谢利·奇泽姆说，她由于是女性所遭受的歧视要远远多于她的肤色所带来的政治上的歧视。

多少个世纪以来，妇女一直“本分”地头戴“贤妻良母”的紧箍咒，被套在家庭生活的笼子里，稍稍逾越雷池就会受到传统习俗的谴责。许多不甘寄身于丈夫篱下而外出工作的妇女不得不承受沉重的社会舆论压力。民权运动开阔了妇女的视野，妇女终于感受到了她们所处的微妙地位。妇女意识的觉醒，是她们追求新生活，并给社会带来进步的关键。于是，黑人民权运动成了妇女解放运动的导火线，一场妇女史上从未有过的彻底的妇女解放运动应势而起，妇女被动地默认终生处于从属地位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

1966 年，美国妇女组成了全国妇女组织，并于 1967 年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妇女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她们提出了一系列权利要求，包括就业和教育机会、福利保障、职业培训、住房补贴、生育权利等全方位内容。全国妇女组织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团结一切妇女和一切支持妇女获得平等权利的人士到国会游说、去全国作巡回演讲，并组成了各种联系网络，争取社会同情和舆论的支持。

妇女解放运动的兴起，归功于许多妇女运动的先驱。最值得一提的是妇女运动的领袖、全美妇女组织的创始人贝蒂·弗里登，她于 1963 年出版的《女性的神秘》一书对传统社会文化宣扬的女性形象进行了深刻剖析，并进行了反驳。她在书中指出，美国妇女一直在受着一套可以概括为“女性的神秘”的思想观念和伦理道德的熏陶和毒害。这套哲学的主要意思就是宣扬所谓的好女人就是做个贤妻良母。对妇女来说，她们的职能范围就是寝室、厨房，服务的对象就是孩子和丈夫。外出工作的妇女被认为是心理失调。在这种文化氛围中出生和受教育的妇女，深受这种观念的熏陶，错

误地以为妇女一生中最大的快乐就是照顾好自己的丈夫、抚育好自己的孩子。弗里登在书中还抨击了男性在鼓吹和宣扬女性神秘观念时不择手段、不遗余力。《女性的神秘》出版后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尤其受到男性的攻击，但是却受到妇女们的普遍欢迎。许多早年参加妇女争取选举权运动的妇女鼓励自己的女儿们阅读这本书，它对妇女的影响是空前绝后的。

20 世纪上半叶的争取选举权运动是一场政治改革，而 60～70 年代的妇女解放运动则更多的是文化意义上的一场革命。这场文化革命是当时更广泛范围内的文化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促使人们去思考、去向传统挑战。现在，再也不会有父母会愚蠢地把自己的女儿从小教养得使她们认为自己不如男孩。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由于妇女解放运动带来的文化上的变化，这可以从语言称谓的变化中管窥一斑。比如，现在许多女士喜欢用 "Ms"（女士）的称呼代替 Miss（小姐）和 Mrs.（太太）的称呼，而且许多原先明显带有性别色彩的名词，如 chairman，spokesman，congressman，等等现在也可以用 chairwoman，spokeswoman，congresswoman，来表示，甚至 chairperson，spokesperson，congressperson 等中性词也用来表示这类概念。

观念的更新反过来又促进了政治、经济、社会等全方位的变革。由于妇女解放运动的影响，美国国会通过了一系列有关妇女平等权利的法律。比如 1974 年通过了《平等就业机会法》，1978 年通过了《怀孕妇女无能力工作法》等等。此外，国会于 1972 年通过了早在 1923 年就由美国妇女党提出的《平等权利修正案》（ERA）[①]，不过该修正案由于未能获得批准所需的 38 个州的支持而半途夭折，这表明反对妇女解放运动者大有人在，妇女解放运动

① 该修正案的主要内容有 3 项：第一项，合众国或其他任何一州对法律所规定之平等权利，不得以性别而拒绝或剥夺之；第二项，国会有权制订适当之法律，以实行本案；第三项，本案至少须有 38 个州批准，自批准之日起，两年后生效。

仍需向前发展。但为争取获得这一宪法修正案的批准，美国妇女团体进行了空前的游说和宣传，使平等观念深入人心。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一努力虽败犹荣。

妇女解放运动对人们的影响是巨大的。它的初衷是为了解决妇女在广泛社会领域的平等问题，但当妇女解放运动向前发展的时候，它和同时代的其他社会运动一起推动了整个传统社会文化观念的更新。这是社会的进步。但是进步往往也意味着另一个极端的开始。一些妇女运动的积极分子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两性关系的革命成了它的最高表现形式。人们一反原先在两性关系、婚姻、家庭上的保守观念，表现出从未有过的开放。

所谓的性革命的发生与妇女运动密切相关。60 年代以前，婚前贞洁、婚后忠诚还在规范着大部分美国人的基本生活方式，但这一切都在短短数年内被打得粉碎，发生了彻底变化。社会开放的速度之快和程度之深不仅令局外人感到惊讶不已，就是美国人自己也觉得仿佛一下子乘上了喷气式飞机。妇女运动的极端分子把随意的性交、随意的男女关系视为妇女解放的标志。各种相关书籍、报刊、电影、电视、广播等大众传播媒介的影响则为这一社会思潮广泛传播推波助澜。

当性革命在 60 年代这个特殊时代兴起时，女子的贞洁成了落后和褊狭的字眼，处女在人们眼里成了时代古董。美国面临着前所未有过的大量妇女堕胎的挑战。这一切又由于 1973 年在《罗诉威德案》中联邦最高法院戏剧性地改变了反对堕胎一贯立场而日趋严重，从而引发了社会对于堕胎问题的大辩论。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大辩论，在美国社会中已经愈演愈烈，大有欲罢不能之势。

堕胎之争至今已经 20 多年，但却一直无法得到圆满解决。在美国，堕胎问题实在太复杂，已经不再是一个医学、伦理和法律上争论的问题，而已成为划分人们政治立场的一个重要标志。如今美国人在这个问题上分裂成对立的亲生命派和亲选择派。双方的

斗争旷日持久,短期内难分胜负。一方面,妇女是否拥有堕胎权涉及到妇女个人的权利,特别是从妇女解放运动以来,妇女的权利一直是全社会关心的话题,是女权主义者竭力维护的权利。另一方面,由于60年代社会运动余波的影响,妇女拥有自由堕胎权之后,社会上未婚先孕、少女妈妈、两性关系的随便,婚姻、家庭观念的淡泊等等都变得越发严重。所以,许多美国人认为,为了防止两性关系进一步随便,在堕胎问题上需要有一定限制,否则必然会泛滥成灾。问题在于采取行动就意味着限制妇女的充分自由,而这又是违背男女平等的原则。这实在是令美国人感到两面为难的事情。

亲生命派基本上是虔诚的基督徒,还有一些极端主义的教派。他们打着"保护生命"的旗号大声疾呼,每一个胎儿都是一个生命体,至少是一个潜在的生命。他们认为生几个孩子是命中注定的,是上帝的恩赐。为此他们引用《圣经》中有名的摩西训诫:汝不该杀人! 在他们看来,随意堕胎等同于随意杀人,违背了基督教教义,是一种灭绝人性的犯罪行为。亲选择派依据宪法第14条修正案[①]的规定,强调"个人自由"包含了妇女自由堕胎的权力。他们认为,一旦妇女被剥夺自由堕胎权,那么宪法保护个人自由就是一句空话。而且,胎儿不能被称为公民,不享有相应的公民权利,因此也不受法律保护。

堕胎问题既与一系列社会文化观念休戚相关,又和法律规定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使得它难以轻而易举得到彻底解决。由于近年来未婚先孕现象普遍,给美国的社会福利造成极大压力,同时也对传统道德规范以及家庭、婚姻、恋爱观都造成了极大的冲击,所以,如何堕胎、在什么情况下堕胎、谁有权利堕胎等等都需要有一个合情合理的说法。据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人们在这个问

① 该项宪法修正案规定,各州皆不得制定或施行剥夺合众国公民之特权或豁免权之法律;也不得未经正当之法律手续,即行剥夺任何人之生命、自由或财产。

题上的态度从反对堕胎到支持无条件堕胎可以分成 10 个等级。足见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和长期性。

同性恋运动和同性恋者的权利

60～70 年代的美国是反叛的时代，同性恋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公开话题并发展成为一场运动正是在这一特定时期。由于同性恋怪异的逻辑和行为，同性恋运动已经成为美国社会非常引人注目的焦点之一。

在美国，同性恋的早期历史已经无据可查。有关同性恋最早的活动仅能追溯到本世纪中叶。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同性恋权利组织是 1950 年由一位名叫海·亨利的人在洛杉矶成立的玛塔辛会社（Mattachine Society）。成立这一组织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同性恋者的自我意识，并代表这些所谓"受到压迫的文化少数民族"采取政治行动。海·亨利采取了秘密活动的方式，并在组织内实行等级制。

玛塔辛会社在当时的条件下可以说非常成功，几年内吸引了几百名会员。这在两性关系尚处于保守时期的美国社会来说已经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了。新会员坚持要使这个组织更加民主化，并取消秘密的等级制。后来玛塔辛会社的总部迁到了旧金山，同性恋的活动中心也随之转移到了该地。1955 年，两位旧金山人德尔·马丁和菲利斯·里昂成立了玛塔辛会社的姐妹组织比利蒂斯女儿会（Daughters of Bilitis）。这两个组织基本上都放弃了同性恋组织最初激进的纲领，转而寄希望于通过教育手段，吸引牧师、心理学家和性学研究专家对同性恋作出公正客观的评价，以改善同性恋的社会形象，赢得人们对同性恋的尊重。值得一提的是，这个组织的许多成员是二战后退伍回来的士兵和水手。这说明在男性占主体的团体内，同性恋现象一直存在。

在 50 年代和 60 年代初期，同性恋者的处境十分尴尬。他们

不仅得不到社会的理解,还常常遭到警察的骚扰。60年代的旧金山,每年都有许多同性恋者聚会的酒吧被关闭,数百名同性恋者遭到无端逮捕。在这种形势下,1965年玛塔辛会社又把总部搬到了纽约,开始新的斗争。

1964年产生了另一个重要的同性恋组织个人权利会(Society of Individual Rights)。该组织与两个老同性恋组织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仅关心世人对同性恋的看法,而且公开表达同性恋者的要求;虽然主要是个社会性的机构,但是它设立了一些委员会来处理法律和政治事务,并为会员提供服务。因此,它吸引了大量的同性恋者入会。这个组织在高峰期时,拥有大约1200名成员。

同性恋运动进一步发展得益于60年代的社会动荡和社会运动。当时人们沉迷于各种形式的社会运动,特别是青年一代沉醉于各种新奇、反传统的生活方式,高举着反叛的大旗。科学技术的进步已经使得各种传媒发展迅速,广播、电影、电视和报刊杂志已经完全普及,使得社会上的任何风吹草动都能迅速传遍全美。60年代美国文坛"垮掉的一代"代表人物艾伦·金斯伯格成天沉醉于毒品,整日想入非非。然而其长诗《嚎叫》(不过是对性爱、吸毒进行赤裸裸地描述)却被反叛的一代捧为圣经和青年文化的宣言。金斯伯格是同性恋的支持者,他认为吸毒能够忘却过去和现在,而同性恋能够促进对自我的了解和认识,有助于达成所谓的"超级男子气和主动精神"。他的荒谬逻辑给参加反文化运动的青年指明了生活方式。于是,他们抽大麻、过着群居生活,与世无争。这些人往往男青年女性化,女青年男性化。浓抹艳妆、长发批肩的男士随处可见,身着男装、短发的女子也比比皆是。60年代,全国各地都有了同性恋的地方组织。1966年,15个地方性同性恋组织的代表聚会堪萨斯城,成立了同性恋组织全美会议这--全国性机构。

到70年代,同性恋在美国也不再是奇闻,同性恋这种新型的两性关系开始得到社会的理解。原先登不了大雅之堂的同情或是

赞美同性恋的各种文艺作品纷纷问世，成为时髦话题。许多城市为同性恋者开设了书店、酒吧、俱乐部，创立了各种同性恋杂志、报刊等等。一些电视台的谈话节目(talk show)还邀请同性恋者公开畅谈同性恋的感想。更有一些同性恋者，发展到公开结婚，组成同性恋家庭。一些意志坚定的同性恋者为了追求另一个自我，毅然做了变性手术，从生理上彻底改变自我。同性恋运动大肆宣扬同性恋符合人类自然和社会本性，是对社会有益的。他们公开反驳教会和其他保守社会团体对同性恋所持的否定和批评态度。

每年的 6 月 27 日被称为美国的“同性恋自由日”，是全美同性恋者的节日。这个日子来源于 1969 年 6 月 27 日在纽约市格林威治小区克里斯多福街道一个酒吧里警察和顾客之间的一场冲突。当时警察企图捣毁这个同性恋者的聚集地，出乎意料的是，在场的同性恋者奋起反抗。第二天晚上，街道出现了许多标语，宣布一场新的革命运动的开始。这场运动就像一团野火，吸引了大量青年学生投身其中，并从校园蔓延到全国。运动的参加者大部分是大学生。他们认为，这场同性恋解放运动是 60 年代新左派运动、民权运动、反主流文化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的进一步深入。有别于 50 年代和 60 年代同性恋组织成员温和、改革的态度，这些年轻人非常激进、好斗，并积极投入到各种运动中去。在反越战的示威游行中、在新左派和黑人权利的集会上、在有关妇女地位的讨论会中都能目睹同性恋者的身影。他们的抗争取得了相当的成功。过去，全美 50 个州都有禁止同性恋法，但随着同性恋运动的高涨，相继有 25 个州取消了禁止同性恋的法律。法院也作出裁决，只要不影响工作，联邦政府不能开除一个同性恋者的公职，“肯定性行动”的适用范围也扩大到同性恋群体。

越来越多的同性恋者公开了自己的身份，“走出来”(coming out)是他们的口号。每年的 6 月 27 日，各地的同性恋团体都要组织游行活动。1971 年 6 月 27 日，5 000 多名同性恋者在纽约组织

了同性恋大游行。在1978年的纪念日,旧金山市有30万人,也就是说当时旧金山市几乎一半的成年人都参加了游行。据估计,当时在旧金山每5个成年人中,或每3个拥有投票权的公民中,就有一名同性恋者。在旧金山,共拥有90多个同性恋者酒吧,150个左右的同性恋组织,9家同性恋者的报纸,2个同性恋者的基金会和3个俱乐部。[①]同性恋者甚至在旧金山自己的聚居地(名为Castro)举行了一场选举,从15名候选人中选出了自己的第一位领导哈维·米尔克。由于同性恋势力越来越大,旧金山市政当局不得不通过了一个地方性的家庭关系法令,赋予同性恋夫妇享有配偶医疗保险补贴的权利。美国西海岸的旧金山成为全美名副其实的同性恋活动的中心和发源地,是美国同性恋者的一个窗口。现在美国已经有8个州和一些城市部分地承认了同性恋家庭和常人一样的权利。同性恋运动的积极分子希望用自己的力量使得过去在生活中抬不起头的同性恋伙伴充满自豪感,勇敢地抬头做人。

根据最近《花花公子》杂志的调查表明,美国男性中有10%左右的人曾经有过同性恋行为。由于有许多同性恋者并未公开自己的身份,并且从来不和同性恋组织接触,所以直到今天,还难以确切得知美国同性恋者的数字。但是可以肯定,同全国的人口相比,同性恋者肯定是少数。因此,即便同性恋者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同性恋团体也注定只能作为一个弱势社会团体存在。然而由于同性恋团体的特殊性,同性恋者也受到了政客的瞩目。克林顿第一次竞选总统时,因为对同性恋者表示出同情与宽容,据说全美有300万同性恋者投了他的票,并为他捐款340万美元。1997年11月8日,美国同性恋团体组织了一次题为"同性恋权利"的大聚会。克林顿总统欣然参加,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克林顿成为第

① GitzGerald, Frances, 1986, *Cities on a Hill: A Journey through Contemporary American Cultures*, Simon and Schuster, New York, p.36.

一位参加同性恋团体活动的在职总统。此举遭到了保守派人士的强烈反对，却得到自由派的欢迎。在这次聚会上，克林顿呼吁美国社会持不同道德观念的人要学会相互谅解，大家要平等、和睦地相处。克林顿的讲话令全美同性恋者兴奋不已。但反对者称，克林顿此举有损总统的形象，特别是对传统家庭、婚姻观和伦理道德会产生灾难性的影响。但是，克林顿显然并不忌讳。1997 年 10 月，他首次提名旧金山著名同性恋慈善家詹姆斯·霍梅尔（James Hormel）担任驻外大使，但遭到参议院否决。1999 年 1 月，克林顿再次提名霍梅尔，又遭失败。但是克林顿并不甘心，巧妙利用国会休会之机，于 6 月初正式任命霍梅尔担任美国驻卢森堡大使。

在今天的美国社会中，人们围绕同性恋仍然争论不休。在 60～70 年代同性恋最盛行的时代，同性恋成为部分人追求另一个自我摆脱传统社会羁绊的生活方式。但是，随着岁月流逝，很多人普遍认为同性恋是一种畸型的社会现象，是人类道德的沦丧。他们希望用道德的力量来感化同性恋者和消除这种现象。然而，同性恋作为一种特殊的性行为，人们又不得不承认它存在的现实，且无法明文禁止。此外，从美国文化价值观念来看，美国人崇尚平等、自由和民主。既然同性恋者也是美国公民，他们选择性取向的权利就应该无条件地受到法律的保护，这关系到公民的基本人权。同性恋者也往往抓住这一理由大肆发挥。所以，人们在关于同性恋的讨论中又不得不谨慎从事，以免陷入政治不正确的窘境。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同性恋者将自己的权利与民权运动联系在一起，引起了黑人的痛恨，他们认为民权运动被同性恋者盗用了。所以当众议院"提倡民权小组委员会"主张取消对军队中同性恋的禁令时，遭到了黑人领袖们的反对。

1981 年春季，亚特兰大疾病控制中心的保健官员接到报告说，发现了一种不寻常的肺结核病和一种罕见的皮肤癌。两种疾病患者的共同之处是，他们都是同性恋者，并且他们的免疫系统都

已经崩溃。保健官员成立了专门小组,10 周内他们发现了 108 例身患此病的同性恋者。经过数月研究,专家们发现这种疾病主要通过性接触和血液传播,并且在同性恋者之间和常用注射方式吸毒者中间出现。当时医务界认为这种疾病是男性同性恋者所特有的疾病,并把这种失去免疫力的疾病称之为“同性恋相关免疫功能缺乏症”,又称之为“同性恋癌症”或“同性恋瘟疫”。不久,医务界发现一些异性恋也可能染上此疾病。1982 年 8 月,专家正式把这种疾病称之为“获得性免疫功能缺乏综合症”,简称 AIDS(艾滋病)。据当时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的统计分析表明,通过同性恋性关系传染上艾滋病的人占艾滋病人总数的绝大多数。由于已经发现的艾滋病患者大多是同性恋者,随着人们对艾滋病的恐惧与日俱增,同性恋者的名字和艾滋病紧密地联系到一起。这一发现犹如迎头一棒,打得同性恋者措手不及。

反对同性恋的运动应运而生。由于医学对于艾滋病束手无策,同性恋者就成了迁怒的对象。反对艾滋病就和反对同性恋紧密相连。人们不再顾及同性恋者的权利,许多地方发生了暴力事件,一些同性恋者的家被反对同性恋的人烧毁。同性恋者也受到了来自教会的压力。由于圣经禁止同性恋行为,信奉正统基督教教义的人,无论是黑人还是白人,都把同性恋看成是对人类的威胁,反对同性恋的人称艾滋病是上帝对同性恋者的惩罚。大多数教徒反对同性恋合法化,更反对同性恋者担任神职。

同性恋者不仅要面对艾滋病的挑战,更要承受社会的巨大压力。即便如此,他们很少有人责怪自己有罪,或认为这是自己的过错。他们和反对同性恋的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一些同性恋者甚至谴责艾滋病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的一大阴谋,是为了对付同性恋者开发出来的病毒,是为了消灭同性恋者炮制出来的杀手。一位自己是同性恋的医生说:“我过去曾经教授过传染病学,但我从未听说过有哪一种传染病是带有选择性的。但是

艾滋病却是只把矛头针对同性恋者，这太令人难以置信了。”[1]艾滋病传播得太快了，也太恐怖了。从它被发现到1984年，全国共报道了5394例艾滋病患者，其中大部分在旧金山和纽约，并且大多数患者是同性恋者。美国的许多名人，或是染上了爱滋病，或是因此已死亡，如著名棒球运动员阿文·约翰逊、被称为美国最有天赋的职业网球运动员阿瑟·爱西等。

尽管同性恋者和反同性恋者的斗争仍在进行，但双方都认识到必须加强艾滋病的治疗和防范工作。艾滋病正式发现后一年，美国政府就把诊治艾滋病列为头等大事，国会也拨款2600万元用于艾滋病的研究工作。但研究工作的缓慢进展和艾滋病的迅猛发展形成强烈的反差。从发现艾滋病至今，全世界已有艾滋病患者1000多万，迄今为止病发身亡的有100多万人。艾滋病的大量出现给美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据1994年美国公布的1份调查，从现在起到2000年，全美将有8万孩子的母亲死于艾滋病。这一现象在纽约尤为严重，18岁以下的3万名孩子的母亲将因这种病撇下他们而去。美国的孤儿将大大增加。艾滋病带来的四面楚歌使同性恋者感到自己犹如“异性社会受虐待的儿童”。[2] 他们感到有必要团结起来，维护他们的特殊权利。同性恋团体的成员间往往互相支持、互相安慰，共同抵制社会对他们的冷嘲热讽和强烈谴责。为了表示他们对艾滋病的深恶痛觉和对艾滋病患者的同情，一些同性恋组织甚至把一些因为受艾滋病感染而遭遗弃的孩子带到身边照顾。这一切有助于同性恋者加强群体意识，改善艰难处境。

---

① Cities on a *Hill: A Journey through Contemporary American Cultures*, p.98.

② 《美国人谈美国人：再寻美国梦》，第260页。

第六章　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

社会保障制度是推行社会福利的手段，也是其最重要的组成部分。1935年《社会保障法》的通过表明联邦政府第一次承担起广泛的社会保障责任。这一制度的建立是工业文明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矛盾直接冲突激化的产物，是联邦政府通过社会立法来调整社会化大生产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社会矛盾的结果。

社会福利的历史

美国宪法第1条第8项就授予国会"提供社会公共福利"的权力，但是，一直到本世纪初，人们的普遍看法是，管得最好的政府是管得最少的政府，他们不希望政府以推进公共福利之名干涉自己的生活和自由。因此，在整个19世纪，美国主要通过私人慈善机构和城市政党机器来解决对穷人的救济。

政府干预人们的福利开始于进步主义时代。1921年国会通过的《谢泼德·托纳法》授权联邦政府就妇女和儿童的健康和卫生问题向各州提供一定的补助。各州也陆续制定了为需要抚养子女的寡妇提供资助的法令。同时，由于罢工和各种劳资冲突的流血事件频频发生，政府不得不开始干预，并在一定程度上关心工人的疾苦。1906年国会通过的《雇主责任法》和1908年通过的《联邦补助法》，要求给予从事危险工作的公私雇员补助。1916年，马萨诸塞州率先通过了《失业保险法》，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破天荒

地尝试失业保障制度。与此同时，许多州认识到有责任帮助老人，并在30年代前陆续通过了老年人的退休计划。

美国建立全国性的社会保障制度并走上福利国家是在罗斯福的新政时期。1935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社会保障法》，标志着美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正式建立和美国全方位推行福利政策时代的开始。它可以说是美国社会保障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①]

社会保障法的实施，既是迫于无奈，也是工业社会发展的必然。它使得部分美国人摆脱了困境，得以维持生计。根据1935年的保障法，政府设立了社会保障委员会，负责实施两项计划，一项是给予老人和孤苦无依靠的人（包括残疾人、没有经济来源的妇女和儿童）以捐助性的社会补助，另一项是由联邦和州政府共同提供失业补助金的计划。根据第一项计划，要求雇工必须参加全国性的老年保险制度，由雇主和雇员平均分摊工资总额的1%。对于那些65岁以上已经无法参加养老保险的人，联邦和州政府共同负责对他们照顾。同时，政府强征失业保险费，开始时为雇主付给全体职工工资总额的1%，以后长期保持在3%的水平。其中该金额的90%交给州失业补偿委员会，10%上缴联邦财政部。在社会保障法实施的最初几年，大约有5000万人参加了养老保险，得到政府照顾的老年人约有200万人，每人每月的收入约为20美元；失业保障制度则为近3000万人提供了失业保障，各个州的失业补偿费最高每个人每周为18美元。[②]

1935年社会保障法的通过，在客观上缓和资本主义内部的矛盾，避免了由于经济危机可能导致的社会矛盾的激化，成为大萧条以来美国社会稳定发展的"安全阀"和"调节器"。此后，社会保障成为政府的责任，保障的观念成为美国人信条中的一部分。

---

① 黄安年：《当代美国的社会保障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3月第1版，第22页。

② 数据引自刘绪贻、杨生茂主编《富兰克林.D 罗斯福时代1929—1945》，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版，第128页。

从1935年到1965年美国社会保障法修正案的通过，美国的社会保障经历了3个重要变化。一是在1939年，在没有提高税收的前提下，国会决定扩大社会保障的范畴。养老金的发放范围不仅包括参加保险的人本身，还给他们的妻儿老小以一定的补贴。第二次大变动是在1950年，国会决定提高税收，同时提高各种补偿金，使之和物价水平相一致。第三次大变动是在1956年，国会决定赋予那些由于残废而被迫提前退休的人和在65岁正式退休的人同样享受养老金的权利。这几次修改，扩大了1935年社会保障法的适用范围，增加了受保障人的保障金额。

60年代是美国社会福利改革深入的时代。1964年，为了响应约翰逊总统向贫困开战，建立"伟大社会"的理想，美国政府开始实施《食品券法》，对低收入家庭实行补助，让他们能够买到便宜的食品。1965年和1967年，政府又两次提高退休津贴，同时降低了取得社会保障待遇所需要的条件。1965年由约翰逊总统提出并经国会批准的《老年人医疗保险法》和对无力承担医疗费用的低收入者提供《医疗补助法》，被称为是1935年社会保障法通过以来最大的社会改革。这两项法案的通过，使得美国老人得到了医疗保险。同时，低收入家庭在医疗上得到某种补助。尼克松总统任内，又扩大了社会保障范围。1972年，政府将老年人补助、盲人补助和永久性残疾人补助统一由联邦政府来管理，每月付给补助对象固定的补助金，减轻了州和地方的财政负担。这一年还通过了社会保障津贴按物价指数自动调整的条款。这一切都表明，联邦政府在社会保障问题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自1935年社会保障法通过以来，美国社会保障的范围越来越广，规模越来越大，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社会保障网络。它包括退休保险、幸存者保险、老年人和伤残者医疗保险、失业保险、污染保险、公共援助和福利服务等等。每一个项目又包含许许多多的条款。例如，公共援助和福利服务就包括：对有子女负担家庭的援

助、医疗援助、食品券、家庭和孩子福利服务等等。美国政府出版的社会保障手册有 440 页之多，包括了对社会保障法案各条款的详细解释。社会保障已经成为一项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

福利制度的困境

美国社会保障范围的扩大意味着政府开支越来越高，也意味着各种福利税收越来越多。同时人们的要求也越来越多，使得政府根本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需要。因此，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有些人享受社会福利的机会远远多于其他一些人，而付出的却比他们少，难免招致非议。加上美国的文化传统宣扬自力更生和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念，使得坐享其成者成了众矢之的。对美国的社会福利，人们的贬多于褒。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福利制度过度发展一直受到政治家的诅咒和普通人的憎恨，并被视为是政府的一大失败。

对福利制度的这种批评与美国人传统的劳动价值观紧密相连。美国传统的观念认为，衡量一个社会是否健康、一个人是否健康的最基本的一条标准是看“一个在精神上和体力上都有能力从事正常工作的人能否自力更生，并且经济独立。”[①]根据这一标准，社会保障虽然帮助了许多人，却从精神上摧残了他们。许多人躺在社会福利的温床上生活了数十年而不思进取。为了钻福利制度的空子，一些有职业的父亲甚至离家出走，以便使他们的家庭有资格取得社会援助。年轻的妈妈往往通过多生孩子来获得更多的福利。1992 年，约 1400 万有孩子需要负担的家庭接受了政府 220 亿美元之多的各种公共福利费，其中每个家庭每月平均大约要获

① Moore, Jr., John A & Roberts, Myron,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America*, Third Edition, 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 New York, Collier Macmillan Publishers, London, 1985, p 282.

得380美元的补助，这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单亲家庭。[1]许多人担心，长此下去，这种福利会助长单亲家庭的进一步增加，从而使得美国人的婚姻观和家庭观进一步沦落。更重要的是，这样家庭由于缺乏足够经济来源，无力负担孩子应受的教育，终会导致与此相关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失学辍学女童没有文化知识，直接影响着“未来母亲”的素质，而她们素质的高低，又直接影响其子女的智力素质和教育，新生一代能否受到良好家庭教育，又关系到全民族素质的提高。

与此类似的例子是，许多人失业后不愿意降低身份从事收入比从前低的职业。因为他们失业后能享受失业救济金，这些救济金能满足他们基本的生活必需。于是，很多人大钻福利政策的漏洞，而政府和纳税人则不得不担起重担。加之有一部分人即使拼命地工作，也只能挣来略微高于贫困线工资的收入，但是他们却在政府资助的范围之外。牢骚由此而起。许多人担心，整个福利制度“维护并鼓励了贫困、欺骗、懒惰、街道犯罪和吸毒，使这些弊端成为美国的一种生活方式。”[2] 他们认为，现行福利制度实际上对救助对象和救助者都造成了伤害，破坏了劳动的美德，抑制了人们工作的欲望。对此，克林顿总统颇有同感。在1993年的总统《国情咨文》中，克林顿说，“我要向依靠福利生活的人提供教育、培训、托儿、他们恢复健康所需要的保健。但是，两年后，他们必须回去工作，如果可能的话，在私营企业工作；如果必要的话，在政府机关工作。现在是结束把福利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时候了。”这是迄今为止美国总统提出的最激进的福利改革计划。

对于福利制度的另一种激进看法是，美国的福利制度实际是富人的福利制度。占人口1%的美国最大富翁的财产大于占人口

---

①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S.*, 1994, p.384.

② 希尔斯曼：《美国是如何治理的》，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版，第553页。

90%的普通人的财产总和。虽然富人们要交纳比普通人多得多的收入税，但是和他们的巨额收入相比，仍然是微不足道的。由于有钱，富人在享受社会福利方面的机会也远多于普通人。比如说，人人必须为修建一座新机场纳税。但是，在机场修建完工后，富人使用新机场的机会要远远超过一般人。再比如说，加州州立大学的学费几乎是加州一个社区大学的 5 倍。[①]于是，收入平平的家庭的孩子比富人的孩子更可能选择学费低廉的社区大学。然而政府对于州立大学的资助明显要多于社区大学，上得起州立大学的富人的孩子也因此受益更多。问题在于，政府用于资助州立大学的那部分钱中，既有富人所纳的税，也有穷人所纳的税。许多对此不满的人认为，这显然太不公平了。无怪乎许多中下层的老百姓说福利制度是为富人们服务的，富人们是福利制度最大的受益者。

从约翰逊政府以来，穷人们把享受社会福利当做自己的权利。到尼克松政府后期，由于大量失业，领取救济的人大大增加，政府财政不堪重负。70 年代以来，各级政府开支中几乎一半以上都用于支付社会保障(见下表)。

1970—1992 年政府公共项目费用

年　代	用于公共项目的社会保障费用(单位:1 亿美元)	占 GDP 比例 %	占政府开支比例 %
1970	1460	14.8	46.5
1980	4930	18.6	57.2
1990	10500	19.2	56.7
1992	12640	21.0	61.6

资料来源:《美国统计数据摘要:1996 年》,第 368 页。

这些社会保障项目，包括联邦和州政府以及地方对医疗、教

①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America*, p.282.

育、住房、失业保险等公共项目的投入。其中开支最大的是社会保险、医疗保障、教育资助和公共援助等项目。以1992年为例，光社会保险就支出6170亿美元。同时，教育领域的支出为2920亿美元，公共援助性项目投入2080亿美元，医疗费用为3540亿美元。就人均而言，1992年，联邦、州和地方为每个人支出的公共福利费用为4863美元，其中社会保险费为2369元，教育费1126美元，公共援助项目801美元，医疗费1364美元。

80年代开始，美国人个人支付的各种名目的社会福利开支也越来越多。1980年，全美个人社会福利总开支为2559亿美元，到1990年，这个数据已经达到7280亿美元，1992年，更已上升到8247亿美元。在这部分个人开支中，医疗健康费用总支出从1980年的1458亿美元，涨到1990年的4100亿美元，到1992年，已达到4629亿美元。据1998年4月20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称，在60年代，每5个工人的社会保障税收就可支付1个退休工人的福利费，但是今天，已经是3个工人养活1个退休工人。据估计，到2030年每2个工人将要养活一个退休工人。[①]因此，个人负担越来越沉重，而政府补助费用也越来越多，引发赤字财政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

“静悄悄的福利革命”

从1996年下半年起，美国开始了一场“静悄悄的福利革命”。其根本点就是改变现存福利制度，制定一项要每个享受福利的人尽快实现“从福利到工作”的转变计划。根据克林顿的提议，每个暂时无法依靠工作生活的人，不能完全依赖福利生活，他必须通过再教育、再培训等尽快恢复就业。这一计划严格规定了接受救济的时间，要求救济者参加工作，要求十几岁的少年母亲呆在学校完

---

① *U.S. News & World Report, April 20, 1998*, p.24.

成学业，并拟建立更加严格的抚养孩子的强制性制度。美国社会对这一改革措施褒多于贬。普遍的看法是，它提供了促使人们从依赖走向独立和更多尊严的机会。克林顿的福利改革计划无疑是30年代以来最激进的社会福利改革法案。

许多州还想出新办法贯彻总统“从福利到工作”的精神。如纽约州、加州、得克萨斯州等，开始训练接受福利的母亲照顾白天没有人照看的孩子。此举可谓一举两得，既保障了这些福利妈妈的福利，又让她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自食其力，缓解保姆匮乏的现状。[①] 不过，这一办法尚在探讨中，因为这些母亲受教育程度很低，有很大一部分人近乎文盲或半文盲，难以胜任照看孩子的工作。也有些是在不幸家庭环境中生活的人，经常遭到丈夫或男友的打骂，或是被丈夫抛弃，心理很不健康。而照看孩子往往需要和孩子间建立广泛的情感交流，并教授他们一些知识。这些“福利妈妈”显然是做不到。

美国政治家们也意识到福利制度的改革并不能改变通常导致福利依赖的社会问题。其中最严重的莫过于少女怀孕了。1996年，美国将近一半的长期福利给了那些生第一个孩子时年龄不足17岁的妇女。克林顿总统为此大声疾呼：“年轻女性有不要怀孕的责任，男人有不要使她们怀孕的责任，父亲有抚养孩子的责任，父母亲有为孩子提供一个安全的家并教育他们要对性行为负责、鼓励他们节欲的责任，教堂有宣讲这些教义的责任，社区组织有发展计划帮助少年母亲和她们的孩子开始新生活的责任，官员则有理解少女怀孕是复杂的社会问题乱麻中的一部分的责任，否则我

① 由于保姆工资太低，平均年工资才12000美元，使许多人纷纷放弃了这一工作。而在过去5年内，需要照看的孩子人数却翻了3倍，达到450万人，所以这一工作领域大量缺人。*U.S. News & World Report*, *November* 3, 1997, p.36

们不能结束福利依赖和少年怀孕的恶性循环。”①

由于克林顿任内经济状况比较好，因此人们不用担心福利制度难以维持。1998年初，克林顿总统提出了1.73万亿美元的预算，这是30年来第一个出现盈余的预算。克林顿在1999年初的国情咨文中提出，要把预算盈余的钱用于社会保障体系。根据他的计划，今后15年内，政府预算盈余将达4万亿美元，政府会将其中大部分盈余投入社会保障体系，包括退休基金、教育、福利救济以及长期医疗计划等等。跨世纪的克林顿政府一方面在扩大福利，加强福利国家建设，另一方面着手规范福利制度，使之真正成为对老百姓有效、有益的保障手段。

从福利制度面临的种种问题和解决它们的办法看，福利制度改革并不是惟一的答案。它们往往牵扯到诸多方面，有些问题并不是靠解决某项问题就能得到圆满解决，它需要诸多方面协同。克林顿总统虽然提出了一系列福利政策的重大改革措施，仍然困难重重。从罗斯福以来，福利改革呼声不断，但是福利制度并未有大的变化。无论哪个党，哪位总统，能做的就是修剪一些枝叶。在美国，保守的、开明的或激进的政党可以赢得或输掉将来的选举，但福利国家的机器将会保留下来。

医疗改革

医疗保障是社会保障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在1935年《社会保障法》实施以前，联邦政府从未涉足这一领域。1935年的《社会保障法》规定，联邦政府要给各州拨款，用于建设医疗服务设施，同时给予贫穷的妇女、儿童以及残疾人以医疗补助。从此，联邦政府开始干预公民的医疗保健。

---

① 比尔·克林顿：《希望与历史之间：迎接21世纪对美国的挑战》，海南出版社，1997年，第1版，第50～51页。

1935年以后，有许多改革者都曾经提出过给每一位美国人以医疗保险的设想。但是由于利益集团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这一设想均未成为现实。二战以后，特别是60年代美国社会普遍的繁荣和各种社会运动的高涨推动了医疗改革的进程。1965年，在约翰逊总统"向贫穷开战"的口号鼓舞下，国会通过了有关老年人的医疗保险和穷人的医疗援助的法律。从此，美国的老人享有了医疗保障，低收入者在遭受疾病时也有了一定的依托。这是医疗保障事业中的一次历史性大飞跃。

70年代以前，医疗改革的目标是扩大医疗保障的范围。但随着医疗保障范围的扩大，医疗总费用急剧增加。政府福利费用占了政府一半的开支，其中医疗费用的比例由1970年的17%增加到1991年的27%，或者说由占政府开支的8%上升到15.5%。[①]即使如此，1991年全美仍然有3700万人没有医疗保险，占美国人口总数的15%。[②]没有医疗保险的人主要是一些收入刚刚超过贫困线的人。对他们来说，生存尚可，却无钱参加昂贵的医疗保险。美国很多人由于各种原因不得不从事非全职的工作，而提供这些工作的雇主是毋需替雇员交纳社会保险税的，这些雇员也就成了没有医疗保险的一部分人。

1993年克林顿总统提出了长达1364页的医疗改革方案。其中心目标是给予更多的人以医疗保障，同时降低高昂的医疗费用。在医疗管理体制上，克林顿也有些推陈出新，希望通过市场竞争和政府管理双管齐下的办法，进一步调整医疗费用来源的结构，重组医疗市场。

克林顿的方案折衷了自由派和保守派的观点。他主张在各州建立1种名为健康同盟的组织，医生、医院和个人以自愿方式加入

---

①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S*, 1994, p.372

②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September 25, 1993, Health Care's Hour, p.19.

这一组织。加入这一联盟的人要缴纳一定的保险费,这个联盟相当于1个中介服务机构,负责为其成员提供各种各样的保险方案,同时为病人选择医院,并负责替它的成员付款。过去,医疗市场的付费方式是第三方付费。对于老年人和接受资助的穷人主要是由政府部门付款;有医疗保险的人则由保险公司统一替他们付款。由于医疗费用的增加,保险公司不得不提高保险金额,并把负担转嫁到个人头上。由于雇员与雇主交纳医疗保险的费用是免税的,因此他们交纳的保险金额的增加,就意味着政府税收来源的减少。克林顿希望通过建立健康同盟这种组织,使医院更趋谨慎、负责,不至于像过去那样乱收费,并减少不必要的程序以减少费用。规范了医疗单位,保险公司就很难抬高保险金额。与此同时,克林顿还希望雇主能为雇员分担更多的保险费用,至少为雇员负担80%的保险金额,以减轻普通人的负担。为避免雇主反对和抗议,政府将为雇主提供更多优惠政策以作为补偿。

克林顿的医疗改革方案没能在其第一任内实现。不过,1996年8月下旬,经过美国朝野多次讨论和修改,美国国会通过了《肯尼迪－凯斯宝姆医疗保险法》(Kennedy－Kassebaum Health Insurance Bill)。该法吸收了克林顿的一些建议,在一定程度上是朝着医疗改革的目标前进。该法旨在帮助已经参加医疗保险的人,一旦发生工作变动或失业,他们可以继续保留自己的医疗保险。同时,该法禁止因为参保者的健康问题——比如患有体质上或精神上的疾病——而拒绝给予保险的现象出现。显然,该法进一步改善了现有医疗计划的不足,对于已经有医疗保险的人来说是件好事,但它并不能帮助尚无医疗保险的4 000万美国人,同时也不能确保医疗保险成为一项可以负担得起的支出,因此离克林顿的医改目标还很远。

1997年克林顿连任总统后,再次提出了自称是新“人权法案”的医疗改革方案,罗列了医疗市场的消费者——病人所应享有的

8大基本人权。比如病人有权得到"关于他们保健计划、医疗单位、医生等方面准确、可读的信息"，病人有权利"完全加入医生对他们进行治疗的讨论和决定"等等。一位专家评论说，"如果说，克林顿1993年长达1364页的医疗改革方案像诺曼底登陆的话，这次仅仅有70页的方案只能算是派遣维和人员前往波斯尼亚。"[①]1993年时，克林顿的目标是扩大医疗保险的范围，现在他的目标是减少政府开支，同时尽量控制政府对医疗市场的管理和干预。1993年以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获得了医疗保险，而且医疗保障费用的递增率也得到有效控制。但人们担心，由于政府过多干预医疗保健市场，控制医疗手段，虽说可以避免和减少乱收费、小病大治等现象，但同时却可能使病人得不到一流治疗。此外，一些大企业担心，由于必须为雇员支付有最低限额规定的医疗费用，这些大企业会越来越多地受到政府的控制。而且，有人提出，克林顿提出的医疗改革方案几乎每一条都有漏洞。例如，克林顿强调"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只要需要，人们都有权利获得急诊治疗。"[②]这听起来合乎情理，但是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会给没有医疗保险的人钻空子。有些人生病，但没有钱或是没有医疗保障，他就会装成得了急病要求急诊。如果有哪个医院拒绝的话，就会受到指控，被认为没有保护基本人权。这样情况会造成大量不必要的急诊，反而使医疗费用增加。

---

① *U.S. News & World Report*, December 1, 1997, p.26

② *U.S. News & World Report*, December 1, 1997, p.27

第七章　“上帝保佑美国”:宗教与社会

宗教对普通美国人的影响随处可见。随手拿起任何面值的美钞,你会发现上面赫然印着:“我们信赖上帝。”而这不过是生活中极小的一个例子。美国是个笃信宗教的国家,1956 年,美国国会把过去美国“合众为一”的座右铭改为“我们相信上帝”。美国又是世界上宗教成分最复杂的国家。各国移民带到美国去的不仅是一种宗教的各个派别,而且是不同宗教的不同派别。在美国影响较大的宗教是基督教和犹太教。基督教主要包括新教和天主教。新教教派极多,约有上百个,彼此互相独立,各成体系。所以,以各教派而言,它的人数反而不及天主教徒多。美国建国后,还产生了一些土生土长的宗教教派,影响较大的有摩门教、基督降临教、基督门徒教等。二战后,随着新移民政策的实施,第三世界移民增多。非基督教 - 犹太教的教徒也日益增多。多元化成为当代美国宗教运动的主流。

宗教传统

早期美洲移民中很多人是清教徒和其他宗派的新教徒,他们往往是欧洲特别是英国宗教斗争的受害者。为寻求一片可以拥有宗教信仰自由的乐土,他们历尽艰辛、漂洋过海。但是这些宗教自由的寻求者一旦在新大陆立足,却趋向于否认其他人所寻求的信仰。在各个殖民地,移民们建立了一种由法律和政府支持的宗教

模式。几乎所有的殖民地都以法律的形式规定本州的宗教。对于怀有不同宗教信仰的人，除非皈依主流宗教，否则就会被驱逐出境。坚持自己不同信仰的人往往受到迫害，甚至被处以绞刑。以马萨塞诸州为例，教会的聚会厅既被用于政府活动，又被用于宗教活动，政教往往合一。法律强迫所有的人参加教会活动，否则就会被视为是异端、渎神。

早期的宗教活动对美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今天，美国社会生活的诸方面，都还能找到宗教起源或受宗教影响的痕迹。教育就是一个极其典型的例子。美国教育的起源和发展体现了清教主义的教育观，即以圣经为信仰的惟一源泉和最高行为准则的基本教义。清教徒认为，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有阅读能力和理解能力，教育则是达此目标的惟一手段。起源于宗教的教育如今已是百花齐放。由于人们对教育一如既往的热情，教育成了世俗化的宗教。当初为宗教目的建立的哈佛大学如今已是全世界最著名的高等学府。美国妇女和黑人虽然长期受到歧视，但是根据清教主义观点，妇女和黑奴也必须阅读圣经，于是早在殖民地时期就为妇女开办了学校，第一所黑奴学校也在 1704 年由传教士创办。这些最初完全出于宗教考虑的举措，培养了大批人才，为女权运动和种族关系革命都埋下了种子。

二战后的宗教复兴运动

二战后的宗教复兴运动始于 40 年代末，并持续到 50～60 年代。最明显的标志就是教会成员、进教堂的人数以及教堂数量巨增，宗教组织得到的捐款猛涨。整个 40 年代，教会成员已从占总人口的 49% 递增到 57%，到 50 年代末则上升到 64%。与此同时，用于宗教建筑的费用从 1940 年的 6000 万美元上升到 1965 年

的12亿美元。[1] 各种宗教书籍也频频出版，比较有影响的有：乔舒亚·利布曼的《心情的安宁》，诺曼·文森特·皮尔牧师的《怎样才能满怀信心地生活》，福尔顿·希恩的《灵魂的安息》等等。这类书把宗教描绘得非常世俗化，似乎上帝无所不在，一直伴随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工作。广播、电影、电视也都展开宣教，动员人们信仰宗教，规劝人们到教堂做礼拜。宗教的气氛处处可见、随处可闻。美国的宗教事业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

这场宗教复兴运动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原因。美国是世界上惟一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而它的本土又丝毫未受到战争肆虐的国家。和平环境和战争带来的发展机会，使得美国在二战结束后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在目睹了一场人类历史上最残酷、最血腥的战争，尤其是原子弹爆炸带来的毁灭性灾难之后，美国人的内心感到无比恐慌，胜利的喜悦也随之烟消云散，他们更倾向于去教堂寻求心灵上的一片安宁，寻找精神寄托。宗教复兴也得益于人口剧增和郊区化的深入。人们纷纷在新的居住区建造教堂，教堂成了人们在礼拜天聚会的场所。

宗教复兴还受到当时国际环境影响。二战结束后，冷战开始，美苏两国的军备竞赛和争夺势力范围使美国人失去了以往的绝对安全感。麦卡锡主义的猖獗更使人们忧心忡忡，对前途和西方价值观念产生了许多疑虑和动摇，对理性失去了信心，他们迫切需要精神慰藉。对于政府来说，则也希望借基督教教义来对抗共产主义，因而大肆诋毁无神论，这更加强了人们的宗教信仰热情。宗教成了保障国内思想稳定的强有力武器。在这样的大气候下，人们对于宗教的兴趣日益浓厚，社会普遍感受到了宗教的影响。

宗教复兴还与现代科技的进步有关。电子时代的到来使得宗教也进入了寻常百姓家。经济实力雄厚的教会为了吸引更多的教

---

① 罗纳德.L.约翰斯通：《社会中的宗教》，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1月第1版，第319页。

徒总是开动各种宣传机器。如有的教会开办了电台、电视台，进行宗教宣传。电子教会的广泛兴起是在70年代。由于技术优势，电子教会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吸引了大批青年人。有的宗教界领袖孤身一个人就开办了电子教会，教徒毋需上教堂，只要按时收看电视祷告和收听广播传教，就能聆听到上帝代言人的声音。由于这类节目办得有声有色，一些电视牧师声名鹊起。比如，像帕特·罗伯逊主持的"启示者"节目，每年收入近6000万美元。计算机的普及又让教会制作了许多电子读物。现代化手段使宗教步入了新时期。宗教复兴理所当然。但是复兴方式已越来越复杂，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

当代福音派运动

1976年，吉米·卡特当选为美国总统被视为是福音派[①] 复兴的标志，而这一年也被视为是"福音派之年"，各大报刊杂志竞相刊登福音派的介绍，福音派成了美国人津津乐道的话题。经历了60～70年代的社会动荡特别是越战和水门事件引起的精神危机后，美国人意识到道德重建的必要性，而在美国，宗教又是一直作为道德的基础。于是，许多宗教界人士又重提圣经的权威性，把它作为在解决社会问题上的指导。卡特的当选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他对宗教的虔诚。正如他自己所言："当时这个国家，正在寻找一位能公开宣称自己对真理、尊严和道德价值观念忠诚的人。而我恰好提出了这些在我的性格中固有的观念，也正是在那个时候，我所具有的品质，正好符合美国人民的需要。我对美国人民许下的诺言，

① "福音派"一词在基督教新教中有着悠久的历史，一般指以圣经为基础的基督教，强调个人信奉耶稣基督为使人赎罪的救主，而且它有一种强烈的愿望要与他人分享这种信仰（福音主义信仰）。在其他国家，人们通常把非罗马天主教徒的基督徒称为"福音派"，而不称他们为"新教徒"。但是在美国，福音派指保守的新教徒，以区别于较自由的不太拘泥于圣经的、社会态度更为积极的教派。它包括基要派（极端保守派）、圣灵降灵派（注重情感表露）和当代广泛的福音运动中较温和的多数派（强调以圣经为基础，信奉个人得救通过信奉基督的新教传统）。当代福音派的复兴主要是指后者。

就是永远不说谎话，并将建立一个无愧于美国民族优秀品质的政府。这个政府所制定的外交政策，将立足于道德和价值观念的标准之上。”[①] 由于福音派不同于自由主义的传统主流派，它在宗教观点上是保守的，因此，福音派的复兴可看作是当代美国保守主义思潮复苏、发挥影响的重要标志之一。

当代福音派强调理智，尊重科学。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不同于极端保守、反科学的传统基要主义。和传统的开明派主流宗教相对，它非常崇尚对圣经作严格的解释，严格地遵守基督信条。参加福音派运动的人建立了自己的基督教社会，自己经营教会的全部设施，如住宅、商店、餐馆、银行等等。福音派基督教还拥有了自己的全国电视网，并有 1000 多个广播电台，几千家书店和唱片公司和庞大的出版网络。他们还自己创办教育，开设了数千家中小学，有 100 多万学生。他们强烈地希望能回到宗教社会中去。

70 年代末，以福音派为中心，美国宗教界出现了一个庞大的宗教政治团体——道德多数派。道德多数派是个极端保守的宗教与政治势力的联盟。它支持保守派政府，呼吁用传统的美国价值观来构建精神基础。道德多数派的出现，既是对后工业社会出现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的一种反应，也是保守的宗教界人士希望借宗教的特殊作用来反对由自由泛滥的性革命引发的婚姻、家庭危机。道德多数派利用大众传媒广为宣传推广自己的主张，它的创始人法维尔在电视上主持的“昔日福音”节目拥有 2100 万观众，可见其影响之大。

宗教与政治

根据宪法，美国实行政教分离。政教分离原则的确立有着特

① 转引自 R.G. 哈切森：《白宫中的上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年，第 1 版，第 116 页。

殊的历史原因。早期殖民地社会，宗教活动是最重要的社会活动之一。虽然大家都是新教徒，但是各个教派林立。由于各个教派都缺少神职人员，许多教堂没有自己的专职牧师。由于缺乏社交活动场所，教堂是人们惟一的活动中心。至于这个教堂到底属于哪个教派，人们并不十分关心。不过，有牧师主持礼拜的教堂总是受到人们的喜欢。这种情况最重要的结果就是到制定宪法时，没有哪个新教教派拥有绝对多数的发言权，于是，制宪者们索性把宗教排斥在政治制度之外。

从思想文化背景看，政教分离原则来源于美国的建国之父们自由主义的态度和对自然神论的信仰。因为这些领导人大多是在欧洲理性思潮启蒙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他们深刻地理解并接受《新约》中“凯撒的归于凯撒，上帝的归于上帝”这一政教分离原则。而且，早年在英国所受的宗教迫害也使他们心有余悸，特别担心一旦有了国教会产生诸多不安定因素，不利于 13 个州的团结。于是，从美国建国开始，宗教就成为私人的事，被客客气气地挡在国会、政府和法院之外。

但是政教分离并不是说国家和教会从此分道扬镳，教会人员也决不会超凡脱俗、不理政治。各种宗教、不同宗教团体，通过自由地从事社会活动，从方方面面影响着美国的政治生活。许多世俗活动都带有宗教的色彩，政与教的界限一直模模糊糊。美国的随军牧师就是较典型的例子。早在 1775 年的第二届大陆会议上，就通过了华盛顿将军创设随军牧师职位的建议。现在，美国军队中军、师各级都设有牧师处，每 700 个士兵中通常就有 1 名牧师。在美国，宗教的影响几乎是全方位的。在总统就职、国会会议开幕和闭幕式上都有牧师主持仪式，各种各样的社区活动以及慈善机构捐款、为普通百姓提供无偿服务时，都不乏牧师的身影。所以，虽然从政治制度的形式上看，美国实行政教分离政策，但在社会文化生活上，宗教和政治已经深深地融为一体，成为一种伙伴关系。

艾森豪威尔总统曾经说过,“我们的政治制度如果不是建立在一种深刻的宗教信念之上的话,它就失去了意义,至于是哪一种信念我倒不在乎。”①

宗教对美国政治的影响事实上是一种现实的需要。一个笃信宗教的国家,宗教比任何富有煽动性的政治言论都要有说服力和感召力。一旦人们认为是上帝的旨意,就会狂热地拥护。在60年代社会运动风起潮涌的时候,教堂和教会组织担当起一级组织的作用。黑人民权运动的领导人,大多是宗教界的领袖。这并非是一种巧合,而是因为人们都认识到宗教和宗教领袖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和影响。美国19世纪的西进运动和1898年美西战争后开始的海外扩张中,美国的政治家就藉“天定命运论”② 来为其扩张申辩,而普通百姓则为政治家们宗教式的政治煽动所鼓舞,以为每个美国人都“肩负着拯救美洲大陆和世界的神圣职责”。③ 于是,扩张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宗教精神又往往和爱国主义联系在一起。在重大活动场合,美国人总要高唱《神保佑美国》、《美丽的阿美利加》等脍炙人口的歌曲。美国的总统总是习惯于把他的支持者称之为“上帝的选民”,把自己称之为上帝的代言人。现在,每次总统演讲结束,结束语总是“上帝保佑你!”而总统作为上帝旨意的传达人,还有不拥护他的理由吗?正如尼克松在其回忆录中谈到,艾森豪威尔曾经建议他在总统竞选中多提些上帝,因为“美国毕竟是基督教国家,选民对于爱引用圣经里的箴言和以其他方式表现出同他们信仰一致

---

① 《美国的历程》,下册,第547页。

② 天定命运论(Manifest Destiny)是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流行的一种理论,认为美国将不可避免地占据整个北美是显而易见的天命。美国藉这一口号陆续占领和兼并了得克萨斯、俄勒冈、加利福尼亚、以及今天的新墨西哥州等地。后来这一口号则成了海外扩张的理由。

③ 雷雨天:《上帝与美国人:基督教与美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版,第56页。

的人,会感到亲切些"。[1] 1969 年,尼克松在就任总统的就职典礼上,虔诚地向全体美国人发表讲话,他说,"万能的、永恒的上帝,请你为一切当选者赐福,保佑我们的首脑。我们祷告万能的主赐给我们以智慧、理解、力量和勇气。在这个紧张和斗争的年代,决定命运的时刻,愿上帝为我们的总统指出荣誉和和平大道、自由正义之路,亲善和睦,使人类走上自由的康庄大道。"[2] 然而,也正是尼克松本人下令对印度支那狂轰乱炸,不断对越作战升级,并导演了导致整整一代美国人精神危机的水门事件。

克林顿总统也非常注重宗教的精神因素。还是在孩子的时候,他就深受外祖父母的影响,成为一位虔诚的浸礼派教徒,从上小学起就开始到教堂作礼拜,读圣经,参加唱诗班,为教会募捐,并向穷人分发救济品,至今从未间断。小时候,别人都以为他长大后会成为一名神父。如今,身为总统的克林顿经常和宗教界领导人举行早餐祈祷会,共同讨论道德和社会问题。1993 年,在白宫签署具有历史意义的《中东和平协议》的前夜,克林顿熬夜到凌晨 3 点,一边阅读《圣经·约书亚记》,一边修改他的讲话稿以使它更加鼓舞人心。克林顿对他的助手们说,一小片土地竟然孕育了那么多伟大的宗教,简直是不可思议,他希望有一天能够弄明白这是什么超人的精神因素在起作用。

美国几乎可以说是一个全民笃信宗教的国家。据 1994 年的统计,52.7% 的美国人都要定期去基督教堂参加活动,81% 的人信仰基督教,其中新教信仰者约有 56%,天主教徒有 25%。全美人口中,约有 2% 的人信仰犹太教,认为自己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仅有 11% 左右。[3]大大小小的教堂遍布美国不计其数。1990 年,全美约

---

① 理查德·尼克松:《角斗场上——尼克松回忆录》,新华出版社,1990 年 8 月第 1 版,第 87 页。

② L.H.维里科维奇:《美国的宗教与教会》,科学出版社,1978 年第 1 版,第 13 页。

③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S* , 1994, pp.70～72.

有各种教堂36万座，其中大部分是新教教堂，约有33万座，罗马天主教堂有2.4万座左右，犹太教堂约有3000多座。

市民宗教：政与教的纽带

在美国现实生活中，政与教一直若即若离。早在本世纪中叶，美国社会学家提出市民宗教的论点，指出美国其实早就存在一种称之为市民宗教的宗教形式，它从建国伊始就已经成为美国这个多元化社会的特殊的宗教模式，并在美国文化的独特土壤中生根开花。

1967年，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贝拉把“市民宗教”定义为一种宗教象征和信仰主体，它表现于一套信仰、符号和礼仪之中。[①] 事实上，这种市民宗教早已被国父们引用于国家基本文件中，成为美国政治生活中的一股中心力量。每次庆祝、纪念活动、总统就职等等重大时刻举行的仪式就是这种市民宗教的仪式。总统往往起着“象征性的大祭司的积极作用”。[②] 这种市民宗教来源于基督教，但是不等同于基督教，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涵。如今，这种市民宗教已成为每个美国公民共同拥有的宗教。它一方面“与政治社会发生关系”，另一方面它“又同私人宗教组织相联系”[③]，就像是“一座桥梁，其一端往往是分裂的教派社会，另一端则是单一的得到舆论支持的政府”[④]，成为维系政治与不同宗教之间的纽带。克林顿总统提到的“所有美国人的宗教”，其实就是这一特殊的宗教模式。

对贝拉所说的市民宗教是否存在，持肯定和否定观点的都大

---

① 《社会中的宗教》，第185页。

② 《白宫中的上帝》，第69页。

③ 罗伯特·贝拉：《美国的市民宗教》，《美国研究参考资料》（牟文华、舒逸节译），1989年第4期，第10页。

④ 《白宫中的上帝》，第264页。

有人在。反对者认为，这种观点是对基督教的歪曲。赞同者认为，美国是一个种族多元化的国家，其宗教形式也多种多样。这个国家和其他国家一样，也需要自己立国的价值观和精神基础。否则必然缺乏凝聚力，缺乏民族的同一性，在政治上就会陷入紊乱。美国宗教的多元主义特征表明，为了避免陷入宗教纠纷、宗教冲突，各个宗教信仰者必须求同存异，找到一种共同的精神支柱，其结果就是出现一种大家都能共同接受的宗教形式，在国家政治活动和文化生活中发挥其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种宗教应该是存在的。否则，美利坚民族不可能在建国后短短二三百年的时间一跃成为世界最强国。只不过，人们原来普遍不能意识到这种特殊宗教的存在。

在美国历史的大部分时间，新教为这种市民宗教提供了支柱，随着天主教徒和犹太教徒的到来，这种以新教为基础的市民宗教让位于犹太－基督教传统。事实上，各个教派间的联合说明了大家都在寻求共同点。1908 年成立的联邦基督教会联合会和 1928 年成立的全国基督教徒及犹太教教徒联合会，都是为了加强不同教派间的相互了解，消除不同信仰间的偏见和敌对情绪，促进彼此间的合作。艾森豪威尔总统说过，宗教活动其实是一种现实的需要。他曾经试图建立一种消除各种教派信仰分歧的全民宗教，也就是市民宗教。他并不关心具体的教义，也并非单一地指哪个教派的上帝，而是强调坚守自己的宗教信仰，强调深沉的宗教感情。正是在他任内，“我们信仰上帝”成了美国的座右铭。艾森豪威尔认为，宗教是美国自由的根基和力量的源泉。美国宪法虽然规定政教分离，但是政教分离“并没有否认政治王国中有一个宗教面向”，而且正是因为总统都是宗教的笃信者，使得每次仪式中的宗教行为合法化，它也“再次肯定了最高政权在宗教上的合法性。”[①]

① 《美国的市民宗教》，第 10 页。

这种市民宗教"有选择地借用宗教传统的成分，在不和教会发生剧烈冲突的情况下，建立起强有力的民族团结象征，从心灵深处激发人，以实现国家的目标。"它通过"在连续不断的政治变迁过程中提供一种强烈的道德意识，对美国人的合众国的维持起到强有力的作用。"①

市民宗教能够成为维系政制与宗教的纽带，正是因为它是一种通过不同教派间的共同点来支撑的精神力量，其本质是一种共同的美国生活方式，是美国人的一种共同信仰，它为美利坚民族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提供了同一的精神基础，是宗教大众化的再表现形式，是美国作为统一国家民族性的基础。由此可见，宗教日趋世俗化，并与现代主义相适应是时代趋势和美国政治的现实需要。此外，美国社会暴力事件不断升级，种族冲突依然是潜在的导火线，一触即发。此时，社会不仅需要各种各样能够解决社会危机的新计划，还需要重新重视精神因素，强调人们共同的价值观念，包括努力工作、自我约束以及对家庭的责任和义务。只有在人们心目中颇具分量的宗教能担起重任。美国的宗教"在连续不断的政治变迁过程中一直在提供一种强烈的道德意识"。② 因为几乎"所有伟大的宗教都教育人们要诚实、守信、负责，要宽厚和有同情心。"③ 正是这种共同的精神因素，成为美国人接受的基础。也使得市民宗教得以产生，并成为政与教的独特纽带和维系世俗社会的精神支柱。

① 《美国的市民宗教》，第 14 页。
② 同上。
③ 《希望与历史之间：迎接 21 世纪对美国的挑战》，第 96 页。

第六编

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与丰富多采的文化

原书空白页

第一章　不断进步的科学技术

美国不是在某时某地一跃而生的，而是此落彼起，在世人的睽视下不断成长的。独立后的美国人在辽阔的西部边疆拓殖新社会并改造旧社会。至19世纪末，美国已完成西部的开发，开始从一个地区性大国一跃成为世界大国并把20世纪演绎为美国世纪。这个现今只有200多年历史的北美国家，其强盛之本究竟是什么？美国强大的经济、军事等这些“硬力量”的支援背景又是什么？

在美国建国历程中，特别是在美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期中的19世纪中后期，科学技术作为最先进的生产力，大大地推动了美国工业文明的进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段时期，美国的科技活动发生了许多变化，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3个方面的变化：一是各级政府越来越意识到科学技术和教育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采取一系列措施参与到科学活动中来；二是随着大学中研究生院的设立，高等教育的发展突飞猛进，大学科学活动的性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三是随着工业生产规模不断扩大，水平不断提高，工业部门对科学技术的依赖与需求日益强烈，科学活动通过工业实验室与生产活动紧密结合起来。美国科学活动所发生的这些变化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确立起以政府、大学和工业界3方面结合为特色的美国科学研究、教育体制的基本格局。在这个格局中，政府对科学研究的宏观调控有力地促进了美国科学研究的大踏步前进。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的不断问世和科学研究的超前发展模式奠定了美国在国际社会竞争中的领先地位，它是美

国能够始终保持世界霸主地位的关键所在。

科技发展的历程

美国是在不断探索的道路上成长起来的。这个年轻的国家得以发展壮大，不因善于发现，而因勇于探索。它的繁荣发达，不是由于其尽善尽美的治世之道，而是由于其灵活多变的科学研究的方法。虽然在自然科学，特别是天文学和物理学这些基础学科中，北美殖民地时期人们没有什么光辉的成就，但独立后的美利坚合众国开始意识到科学研究对社会进步、国家昌盛的作用。无论是美国缔造者之一、物理学家富兰克林的各类电学发明，还是 19 世纪乃至 20 世纪各国移民科学家、发明家的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工作，无不展示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仍是美国的强盛之本。20 世纪美国科技发展历程及科学与技术研究成果的螺旋式上升模式更证明了这一点。

20 世纪初期，科学技术在美国已经成为工业发展的基础。工业研究实验室进一步增多，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较重要的工业实验室已发展到 365 个。[①]这些实验室从高校吸收了近万名科学家和工程师从事应用科学的研究和技术开发工作。联邦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集中化的措施，加强了对科学研究的干预。1915 年国家航空咨询委员会成立，其责任是负责管理和指导航空科学的研究工作。该委员会下设置了一些实验室，研究和解决军用和民用航空方面的问题。它的成立标志着美国航空研究工作的开端。国家航空咨询委员会集咨询机构与研究机构于一身，成为美国航空和宇宙航行局的前身。与此同时，海军部也成立了海军顾问委员会，指导海军的研究。1916 年在威尔逊总统的建议下，美国科学院成立了全国研究理事会，由联邦政府、大学、私人基金会和工业企业

① 李明德：《美国科学技术的政策、组织和管理》，轻工业出版社，1984 年版，第 8 页。

4方代表共同组成。从1916年至1933年，这一理事会成为联系和促进美国科学技术力量的重要机构。

联邦政府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增加了对科学研究资助。国家资助的研究经费平均每4年翻一番。私人基金会在20世纪也有了发展。卡内基基金会于1902年在华盛顿成立，主要资助物理学和生物学的调查、研究和发明。它既资助个人研究，又资助合作研究、出版物等。卡内基基金会的这一做法为后来的基金会所仿效。由于私人基金会特别强调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因此它对促进美国科学研究，特别是一些新兴学科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20世纪最初的十几年，蓬勃发展的美国经济吸引了大量的外国移民，特别是东南欧移民。他们的到来为美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充裕的人力资源，同时也促使美国引进欧洲的先进技术和设备来发展自己的工业。交流发电机和汽轮机等便是该时期从欧洲引进的。随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又对美国科学技术起了刺激作用。战争迫使研究工作变得更为紧张，同时也使科学研究与工业生产的联系更加紧密。跨学科的研究开始出现并日渐普遍，特别是这个时期的应用研究因战时需要发展尤为迅速。相对而言，基础研究仍处于初期阶段。以科学研究经费为例，20年代美国政府投入应用研究的经费总额约为2亿美元，而投入基础研究的只有1000多万美元，约3万名科学家和工程师从事应用科学，而从事基础研究的人不超过4000名。[①]

从1919年至1939年的20年期间，美国的科学技术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1919年至1929年，美国实现了农业机械化，工业实验室在1930年已发展到1600个，工作人员达7.2万人，其中3.5万人为科学家和工程师。著名的贝尔实验室就是在这一时期成立的。私人基金会也由20世纪初的18个发展到1930年的300个，

① 李明德:《美国科学技术的政策、组织和管理》，第9页。

其中33个以资助科学研究为主。此外,1930年美国政府投入基础研究的经费已达到7000万美元,相当于1915年的5倍。[①]

1929年至1939年这10年是美国历史上空前严重的萧条时期。经济萧条使工业企业的研究工作受到严重的打击,政府和工业企业的研究经费都被大幅度削减,只有高等院校的研究经费受到的影响不大。由于美国的科学和技术在30年代之前已经具有一定规模和实力,这对美国经济的恢复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1933年以后,罗斯福总统推行"新政",强调联邦政府对经济进行干预,并认为科学研究是国家资源,政府应加强对科学研究的支持。罗斯福的"干预"政策和主张导致1933年科学顾问委员会和国家计划委员会相继成立。1934年国家计划委员会被国家资源委员会所取代,科学顾问委员会不久也并入国家资源委员会。该委员会的性质表明美国政府正式将科学和技术列入国家资源。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科学研究在政府部门、工业企业和高等院校中已具有相当规模,全国已有近9.2万名科学家和工程师,其中有4万名在高等院校,3.5万人在工业企业的实验室,其余1.7万名在政府各部门。高校数目达1450多所,其中180所一年内得到联邦政府和其他来源的研究资助达5100多万美元,工业企业有3400多个实验室,雇佣了7万多名研究人员,其中约半数为科学家和工程师,用于研究的经费每年约为3亿美元。[②]

二战期间,美国政府把科学技术与教育活动连同其他各行各业都置于政府管制之下,从而把科学研究完全纳入了战争的轨道,使研究体制军事化。1940年6月,罗斯福批准国防委员会组建1个8人国防研究委员会,指导与战争进程和战争手段直接有关的研究工作。1941年总统下令成立科学与研究发展局并赋予它以

① 李明德:《美国科学技术的政策、组织和管理》,第11页。
② 同上,第13页。

广泛的职权。令人注目的是，发展局的4位主要领导人都是杰出的科学家和管理专家，他们分别担任过麻省理工学院正、副院长、卡内基学院院长、贝尔实验室主任、美国科学院院长、哈佛大学校长等职。

二战前，美国的整个科学研究力量主要由4个分散而独立的系统组成：即联邦政府实验室、工业企业实验室、高等院校实验室和私人基金会在内的非营利机构。二战爆发后，政府首先把这4个分散而独立的科学研究系统联合起来，由联邦政府的科学研究与发展局对全国的科学技术力量进行整合，使科学技术力量有力地为战争服务。为了研究原子弹，政府在新墨西哥州偏僻而荒漠的地区建立了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从1942年开始，政府动员了几千名研究人员，投入了20亿美元，在这个实验室进行了代号为"曼哈顿计划"的研究工作。联邦政府负责为规模巨大的国家实验室提供资金，分配研究任务，但在行政上却把管理的职责分别交给一些著名的高等院校或私人工业企业。联邦政府在战时对研究工作的加强导致了美国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发生了一系列的重大突破，推动美国科学和技术跃居世界领先地位，标志着美国科学开始正式进入"大科学"时代。

二战后，工业企业的研究与开发在原来的基础上又大为增加。战争期间的研究工作促使航空材料领域、电子领域和通讯设备领域产生了重要的成果。但1957年苏联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成功使美国人开始怀疑自己的科学和技术在世界所处的领先地位。国会和总统在这场"空间竞争"中采取了一系列的紧急措施。1957年到1967年10年间，美国科学技术政策一直力图在所有领域，特别是那些与国家安全和国家威望有密切关系的领域夺取和保持世界领先地位。为此，联邦政府研究与发展预算迅猛增加，到1967年已达171亿美元，用于基础研究和高等院校的研究经费在此期间也相对充裕，同时政府鼓励并资助对科学技术人才的大量培养。

不过,随着侵越战争的升级和国内民权运动、反主流文化运动、新左派运动及妇女权利运动的高涨,美国以"空间时代"作为象征的科学和技术高速发展时期很快结束了。从1968年到1977年,由于美国通货膨胀日益严重,经济下滑,美国科学和技术暂时处于"低潮"期。

到了80年代中期,美国开始意识到知识密集型产业对美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因而对一些仍有优势的产业注入新的知识和新的技术以保持其世界领先地位,同时集中力量研究开发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90年代,美国率先提出了建立"信息高速公路",将信息技术正式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在政策上扶持高新技术在军事领域、民用领域的大规模应用,帮助它迅速形成支柱产业。1996年底美国向全世界公布了一份名为《全球电子商务政策框架》的政府文件,提出网上交易零关税的国际贸易新规则。1997年7月1日,克林顿总统在白宫宣布了《全球网络贸易框架》,明确提出"网络自由贸易区"的观念。[①] 这一切表明美国将把高新技术为载体的国际贸易新形式的触角伸向世界各地。

在信息技术领域,美国在世界中处于绝对领先的地位。美国现有软件公司4万多家,芯片公司有300多家。1996年美国全年新增产值的2/3是由微软这样的企业创造的。1994年至1996年间,高新技术产业对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已达27%,远远高于房地产业的4%和汽车产业的4%。从1990年2月始,美国连续7年经济景气,并以3.9%的经济增长率进入了第9个好年头。1986年美国出口额排名第一的货物是飞机,1996年则为电脑芯片。目前美国出口额中近35%与高新技术产业有关。美国60%的办公室人员使用计算机,约有6000万成年人上网,占全球网络用户数的54.7%。50%的商用计算机是互联的。从1997

① 周大鸣:《高技术换了人间》,载《美国大观》1998年5月刊。

年起,美国海关的业务已完全实行电子数据交换化,1997 年有 1400 万美国人上网冲浪。[①]

从人力资源结构看,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和从事高智能职业的教授、科学家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尊重和重视,信息人才供不应求。目前美国前 30 位就职人口最多的职业中,高智能为第 12 位,而在十几年前,此类职业是在 30 位以外。尽管信息技术已发展了 20 多年,美国高校中计算机专业早已成为热门专业,但雇员在百人以上的美国高新技术公司中还有 36.4 万个计算机程序编制员和计算机系统分析员的位置空缺。据美国劳工部估计,从现在起到 2005 年,美国平均每年需要新增 9.5 万名计算机专家。由于人才走俏,美国信息技术产业从业人员的收入比其他产业高 70%。从财富转移看,如今排名前 10 位的一半以上是与信息技术等高技术有关的人物,如靠知识致富的比尔·盖茨已连续 4 年稳坐世界首富位置。1997 年美国前 6 位富豪中的 5 位是计算机软件人士。

从其他高技术的研究看,美国也超前一步。从 1990 年至 2005 年,美国政府计划用 15 年时间,投资 30 亿美元来测定人类遗传物质中大约 30 亿个脱氧核糖核酸的序列。IBM 公司和孟山都生物技术公司已在合作研究一些重要的植物和人类疾病的遗传结构,绘制出它们的基因组图谱,用以大量、迅速开发新的生物技术产品。美国国家航天局(NASA)也开始致力于生物学研究。据《自然》周刊最近报道,该局最近收到各种研究团体的大量倡议,希望能参与它新建的天体生物学研究所的工作,共同开展有关宇宙生命问题的跨学科研究。由此看来,美国的科技发展将在 21 世纪进入一个跨国界、超时空的“后科技”时代。

---

① 周大鸣:《高技术换了人间》,载《美国大观》1998 年 5 月刊。

独占鳌头的六大高技术产业[1]

通讯设备：通讯设备在美国7大技术发展产业中占居首位，其销售值达1750亿美元，占高技术产业销售总值的1/3，其就业人数达160万。光纤技术在美国已进入实用阶段，特别是在电讯、广播、电视、闭路电视、计算机网络、数据通讯等方面，光纤技术已广泛使用。据美国商务部统计，1985年美国光纤通讯系统和设备的年增长率达25%，1986年光纤总长度达150～200万千米。[2] 此后的10年，光纤技术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囊括了所有能涉及的领域。

航空与航天：航空与航天是美国最大的高技术产业制造部门，年销售值约为900亿美元，就业人员达34.5万。1980－1984年，美国的大型飞机占世界市场的77%，军用机和民用机的出口增长率分别为40.9%和60.2%。[3] 美国各大飞机公司十分重视技术研究与开发，近年来已研制出浆扇发动机和燃气涡轮风扇发动机。后者在1986年世界航展上十分引入注目，被誉为航空史上的一次革命。这两种发动机在90年代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如果说美国在60年代实现了“阿波罗”登月计划，70年代研制了航天飞机，80年代“挑战者”号失事则给美国航天事业蒙上阴影。然而90年代的“发现号”的发射成功，“探路者1号”在火星表面的成功登陆则使美国宇宙事业重放异彩。美国雄心勃勃的宇宙开发计划——“太空站”、“通向空间之路”、“星球间之路”——令世界同行侧目而视，美国甚至计划在2005年和2015年分别在月球和火球上建立居民点。

---

① 国内通常用高科技术的概念来指称高技术(High－Tech)。一般来说，科学本身无所谓高低，只有在应用到技术后才使技术的科学含量发生变化，因此确切的表述应为高技术。

② 孙克强：《世界高技术与高技术政策》，第37页。

③ 同上。。

计算机与软件：计算机在其他产品中所具有的渗透力和结合力使其成为美国高技术产业中的一个关键性组成部分。1985年，该项产业的产值近800亿元，从业人员约90万，开始成为美国获取大量贸易盈余的高技术产业之一。自1973年出现超级计算机以来，美国一直垄断着超级计算机的研究、生产和销售，其巨型机占国际市场的90%以上。1975年商业微机问世，美国微机产业迅速发展，连续9年不衰。1982年—1984年，其销售额约为世界总销售额的70%，出口收入占该产品销售总额的20%左右。[①]

医药：医药主要由生物产品、医学和植物产品、药物制造3个部分组成。70年代以来，美国生物技术逐渐从实验室阶段向商品化生产阶段发展。80年代美国约有220家生物技术公司，其中一半是60年代建立的。虽然该领域的商品化规模还不太大，但极有发展前途，2000年其产值可望达到100亿美元。[②]

科学仪器：科学仪器同电子原件产品一样，与其他高技术产业部门的依赖关系很大，在制造业的现代化进程中起着巨大的辅助作用。由于这种特殊的"角色"，科学仪器的发明和革新在美国一直受到科学家的重视，其发展与科学研究的齐头并进，使美国在这一领域中始终位于世界前列。

新型材料：新型材料是辅助高技术产业的物质基础，受到美国政府的高度重视。新型材料中最热门的产品为高级陶瓷。这种无机、非金属、高纯度材料对美国的国防的建设极为重要，也是国际市场竞争的焦点。从国际陶瓷材料的原件和应用方面来看，美国尚属领先地位。美国在陶瓷切削工具、电容器、气体传感器和温度传感器等方面均属世界领先地位。除此之外，美国在碳、金属复合材料的原件和生产方面亦居世界领先地位。

---

① 孙克强：《世界高技术与高技术政策》，第38页。

② 同上。

进入20世纪20年代后，美国科技开始起飞。从单纯的技术发明转化为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在科学方面，20年代至二战期间，对世界科学史产生重大影响的，有米立根（R.A. Millikan）对普朗克常数（h）和电荷基本单位（e）的测试，康普顿（A.H. Compton）提出的自由电子散射光学的量子理论，兰米尔（Lanmill）发现的电子反常散射现象，迈克尔逊（A. A. Michelsen）对光速（c）的测量；鲍林（C. C. Pauling）的化学共振论，劳伦斯（E. O. Lawrence）发明的回旋加速器，摩尔根（T. Morgan）的基因遗传论等等。此外还有关于恒星、太阳、行星的天文学成就。40年代以来，美国在控制论和信息论、粒子物理、原子核物理、低温物理、高压物理、凝聚态物理、光学、天体物理、化学热力学、超铀元素、结构化学、高分子化学、有机合成化学、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遗传学、生物化学、神经生物学、微生物学、免疫学、脑化学、感觉生物学等许多新兴领域的开拓与发展均居世界领先地位。1946年至1985年，美国科学家获诺贝尔科学奖的人数占总获奖人数的51％以上。美国科学家在世界主要科学刊物发表的论文总数约占全世界的35％以上，而被引用数则在科学文献总引用量的一半左右。[①] 这一些事实与数据充分说明在基础研究领域里美国在世界上拥有不容争辩的绝对优势。

在技术发明方面，20世纪的美国仍保持着绝对的优势。截至20世纪80年代末，据一些科学史家统计，纯属一个国家独立完成的重大发明共有29项，其中美国19项，英国、法国、德国共10项。在二战后实现的110项重大创新成果中，美国完成74项，英国完成18项，西德14项、法国2项、日本4项。1963年至1977年的15年间里，美国颁发技术发明和技术革新的专利118万件，其中

① 何亚平、张钢：《文化的基频：科技文化史论稿》，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04页。

美国人就获得了85万件,其他国家人共得33万件。[①] 虽然80年代和90年代,来自日本和西欧的科学研究成果开始挑战美国科技大国的地位,但美国在人才资源方面的优势并未受到任何损害,美国依然是世界上吸纳各国科学技术人才最多的国家,这一特殊的优势足以确保美国在技术发明方面的世界盟主地位。

宏观调控与微观自主

美国科学技术得以飞速发展的关键在于政府的有效宏观调控和研究机构所拥有的微观自主。这种科技发展模式既为科学研究提供了宽松的环境,同时也使科学研究免除了"无控"的灾难。政府、大学和企业"三位一体"的科技体制的建立,确保了科学研究"有秩序"地向前拓展。美国这种特殊的科学研究"机制"在20世纪美国科学发展史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重视科技与教育是美国建国初期就已形成的良好传统。尽管两党政治造成总统走马灯式的轮换格局,但在重视科技与教育方面,两党却毫无争议并形成共识。历史上的历届美国总统,无论来自哪个党派,亦无论其自身文化素质、科技观念如何,都很少偏离重视科技与教育的这个中心国策。美国这一社会政治传统的形成与200多年来科技文化在美国的广泛传播和全民意识的不断提高,特别是科技与教育的体制化密切相关,相辅相成。这一良好传统正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始终能保持其世界科学技术中心和世界头号科技强国地位的深层原因。美国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与美国高等学校的建设,政府的立法与管理是分不开的。早在1862年南北战争期间,林肯总统就签署了著名的《莫里尔法》。法令规定根据各州在国会参众两院的议员人数,联邦政府按人头拨给公共土地3万英亩。这些公共土地主要是用来资助工程和农业

① 何亚平、张钢:《文化的基频:科技文化史论稿》,第205页。

学院的建立。法令颁布后的一年中，有9个州建立了土地赠款学院。在美国教育发展史上，这些公立大学的建立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一方面由于它费用低廉而使高等教育更加普及和民主化；另一方面它们也很快地成为农业科学和工程技术的研究中心，为后来美国农业科学和工程技术的现代化作出了特别的贡献。1887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哈奇法》，要求各州建立农业实验站，以促使美国农业教育和科学研究进一步结合。这一法令使许多重大研究成果得以产生，美国农产品产值成亿美元地增长。政府的立法表明联邦政府已成为美国高等教育发展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此后，在政府的有效宏观调控下，美国大学成为美国科学研究的主要阵地。大学教授、副教授以及博士后研究人员和研究生们从政府、学校和其他来源中得到财政资助，积极地从事创造性的科学研究。这些新型的以研究生院为主体的研究型大学既是科学家活动的舞台，又是未来科学家的摇篮。

19世纪后半期，美国政府管理科学技术的体制逐步建立和完善起来，最终成为领导和进行科学研究的中心。1862年美国农业局成立，1869年升格为农业部。到20世纪初，这个部门已经成为1个拥有40个局和处的机构。1915年，国家航空咨询委员会成立，负责管理和指导航空的科学研究活动。1916年，全国研究理事会在全国科学院内成立。在30年代罗斯福“新政”时期，联邦政府提出了“科学研究是国家资源”的口号，[①] 并在1934年建立国家资源委员会，明确把科学和技术包含在国家整个资源这一范畴内。通过这一组织，政府加强了对科学技术活动的统一管理。

二战期间，政府进行了大量与军事相关的研究开发活动。1940年6月组建1个8人国防研究委员会，完全控制了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二战结束前夕，罗斯福总统要求联邦科学研究与发

---

① 何亚平、张钢：《文化的基频：科技文化史论稿》，第205页。

展局局长万尼瓦尔·布什根据战时的经验，对美国战后科研体制提出方案。布什组织了大批专家进行讨论，于1945年起草了《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的报告。布什写到："我们国家在实用科学研究和工艺技术方面的卓越性不应使我们看不到这样的事实，即美国在纯科学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科学原理的发现方面是居第二位的。在下一个10年里，技术进步和基础科学发现将是分不开的，而一个借助别的国家供应基础科学知识的国家，在革新的竞赛中将处于极端不利的地位。"①

为了加强国家对基础科学研究的资助，布什主张建立国家科学基金，这一主张引起了广泛的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否有必要建立一种以国家为主导的科研体制。这场争论持续了近5年，直到1950年5月10日杜鲁门总统签署《国家基金会法》才结束。该法授权成立国家科学基金会，并由它代表国家出面支持基础科学研究。此后，布什的《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的报告一直是政府大力支持和调控科学研究的发展蓝图。

20世纪美国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最重要，也是最直接的原因，是伴随美国现代化而来的科技体制的进一步完善。美国的科学体制在19世纪就已经基本确立起来，它是一种政府、大学和企业三位一体的模式。但由于政府干预和支持科技的渠道单一，科技活动资助来源有限，美国20世纪科学技术发展的规模受到制约。一战前，这种制约在政府加大了对科学的干预和支持下逐步缓解。政府组织了自然资源调查，产生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份全国自然资源清单及资源利用情况报告，这实际上就是政府组织的最早的一项大型的科研项目。

二战后建立的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标志着现代国家主导型的科技体制的确定，特别是1959年，政府颁布法令，建立联邦科学技

① 史蒂芬.F.梅林：《自然科学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555～556页。

术委员会。作为政府的部门，它由总统科学顾问担任该委员会主任，把科学规划、科学资源的分配、科研经费的调控以及科学国际的交流当作政府自己的特殊行政职能，从而最终完善了上个世纪末建立起来的美国科技体制。这一体制的最大特点就在于政府发挥了主导作用。二战前夕，工业界是美国科学和开发活动的主要资助者。1940 年，全国的研究发展经费为 3.45 亿美元，其中政府只提供 19%，而私营企业提供了 68%。[①] 1941 年全国用于科研的经费猛增到 9 亿美元，其中大部分还是来自私营企业和基金会。二战结束后，政府投资于研究与发展经费的增长速度比私营企业快 1.5 倍以上。从 60 年代开始，政府支出的科研经费占全国总费用的 50% 以上，1965 年达到 73%。80 年代中后期，特别是冷战结束后，企业投入比例开始回升，但政府的作用并没有削弱。在基础研究领域，政府的投入比例还是占绝对优势。

20 世纪逐步完善起来的美国科技体制由政府实验室、工业实验室、大学和包括私人基金会在内的非营利机构等 4 个部分组成。职业科学家主要集中在政府实验室、工业实验室和大学里。20 世纪早期，只有某些政府部门聘用少数科学家，而近 50 年，政府聘用科学家的人数成倍增长。二战结束时，已有 3 万名各类科学专家，包括物理学家、化学家、农学家和工程技术专家在政府部门工作。1962 年，美国登记的科学家总数为 21.5 万人，其中 40% 在工业，30% 在教育机构，20% 在国家机构。但在 90 年代，美国已拥有国家研究机构 750 所，雇佣科技人员 22 万人。国家机构所属的实验室与工业实验室在性质上有很大的区别。在这些实验室中工作的科学家不是私人企业的雇员，而是政府的工作人员。他们主要从事与国家利益相关的重大课题（如宇航）、具有全国意义但又有风险的重大项目（如核聚变实验）、具有深远科学意义的基础项目（如

---

① 格罗维卡：《美国的科学技术潜力》，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 年版，第 42 页。

高能物理实验)、政府有责任承担的项目(如农业、能源、军事技术)等。这使得国家直接管理的科学实验室在国家科技事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19 世纪末出现的工业实验室极具美国特色,是为满足美国工业生产的创新需要而产生,并成为推动科学技术发展的一股重要力量。19 世纪末,美国工业发展一泻千里,很难再依靠早先那种由科学家个人来解决生产中出现问题的方式。于是,在工业生产部门开始出现一种为一定目的而把科学研究人员组织起来的集体研究机构——工业实验室。1876 年发明家爱迪生在明洛公园首创了从事应用研究和开发工作的工业实验室,开创了工业研究的新时代。19 世纪 80 年代,钢铁大王卡内基倡导并创办了工业实验室。90 年代,贝尔电话公司建立了实验室。稍后,通用电器公司也建立了实验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杜邦公司、国际商用公司(IBM)及一些主要石油和橡胶公司等相继建立了实验室。工业实验室的建立使科学家和博士学位获得者有机会受雇于企业,但是他们并不直接生产工业产品,而是在企业的实验室中进行科学研究。工业实验室使科学家的社会角色具有了丰富的内涵,保证了科学研究成果迅速转化为可应用于生产的技术。因为工业实验室的科学家所研究的课题大都是与企业生产的产品与技术紧密相关,这就将科学技术与生产密切联系成一个统一体。工业实验室完成了科学体制向社会经济领域渗透扎根的过程,最终使得科学体制在现代社会中永久地建立起来,同时又确保了科技成果顺利转化为生产力。作为美国最早的工业实验室之一,贝尔电话公司实验室所雇的科学家人数的增长折射出美国科技发展的速度。1912 年贝尔实验室科学家人数为 50 人,1919 年为 200 人,1925 年为 350 人。在经济萧条期的 1934 年,科学家人数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到 500 人。至 1947 年时,科学家人数已增至到 5000 人。1956 年这个实验室雇佣的科学家的情况是:化学家 90 人,数学家 50 人,物理学家 475 人,金属学家 20 人,工程师

2300 人,其他技术人员 2400 人,附属人员 4000 人。1956 年,整个美国共有 4060 个公司设立了 483 个实验室。

非营利机构的存在和发展也是美国现代科技体制的重要特征。美国的非营利机构是一种特殊的科技机构,它虽属私人所有,但却不追求利润,也不把赢利分给股东,因而也被称作科研领域的“慈善机构”。科学院、研究所、私人基金会、博物馆、动物园、植物园、医院等均为非营利科研机构。在这各类机构中,影响最大的要数私人基金会,它已成为资助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补充力量。到 80 年代,美国的私人基金会已经发展到 3 万多个,百万美元级的基金会已有 3000 多个,其中有 900 多个基金会是资助科学研究,尤其是基础研究。美国的私人基金会对促进美国的科学、特别是一些新兴科学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它以自己独具的慧眼、灵活地资助并发现了大批美国年轻的科学人才。如高能加速器在其萌芽阶段因受私人基金会的资助而获得成功。当时劳伦斯(E.O. Lawrence)已经在直径 11 英寸的加速器中产生了 100 万电子伏特的高速粒子,但“大萧条”带来的经费紧张使他的研究濒临中止。在最困难的时候,科特雷尔私人研究基金会资助了劳伦斯 5000 美元,巴法姆化学基金会又资助他 2500 美元。在美国,年轻人的创造性设想只要具有可行性、科学性,总会找到资助。私人基金会为培养创造性人才,孕育新兴科学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二战后,美国形成了颇具特色的高技术开发区,主要有硅谷、波士顿 128 号公路地区、北卡罗莱纳三角地带研究园区和达拉斯高技术产业区等,其中尤以硅谷著称。硅谷是世界上第一个高新技术园区,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是一块被太平洋和旧金山湾环绕的 50 英里的狭长地带。从 50 年代创建至今才有 40 多年的历史,却已成为世界上高新技术产业区的典范,许多国家都将自己最著名、最成功的高新技术开发区称为“硅谷”。

在硅谷,有 7000 多家高新技术公司的总部。世界上最大的

100 家高新技术公司中，有 20% 在硅谷安家落户，如著名的电脑公司惠普、软件大王微软公司、芯片大王英特尔公司、网络巨子网景通讯公司、太阳微系统公司、西斯科公司等。在硅谷，每周都有 10 多家新企业诞生，平均每 5 天就有一家公司的股票上市，90 年代中期上市公司总价值已达 4500 亿美元。硅谷的失业率仅为 3.1%，而出口却以每年 30% 的速度增长，工资增长率为美国工资平均增长率的 5 倍。[①] 因此它被誉为美国经济发展的顶峰和商业界的典范。

硅谷长盛不衰的奥秘何在？专家们认为，硅谷的成功诀窍既不是芯片，也不是软件，更不是电脑，它是创新，一种永不停止的创新精神。硅谷聚集着一大批具有创新精神的人，形成了创新的观念和风气，建立了创新的制度和环境。在硅谷，人们衣着简单，举止随便，外表看不出谁是老板，谁是雇员。他们思想活跃，不墨守陈规，创意层出不穷。把创意迅速转化为新技术、新产品并占领新的市场是他们的奋斗目标。他们竭力找寻自家产品的弱点，不时拿出更好的产品来击败自己的原有的产品，达到不断更新换代。

硅谷雇员不论国籍、肤色、性别，重要的是要有创新精神和创造才能。这些雇员一有机会便自立门户，另辟蹊径，独闯天下。硅谷人深信只有想不到的事，没有做不到的事。英特尔公司总裁安迪·格罗夫结论："惟有执著者才能生存。"[②]

创新的人创造了创新的环境，创新的环境孕育了创新的人。在世界许多国家、地区，技术或决策上的失误是一种耻辱，会断送一个人的前程。而在硅谷，对失败却极为宽容，许多公司奖赏那些敢冒风险的人，而不是惩罚因冒风险而遭失败的人。他们认为"失败是成功之母"，是可以加以利用的积极因素。在硅谷的激烈竞争

---

① 金山：《硅谷长胜不衰的奥秘：勇于创新，敢冒风险》，载《科技与企业》，1998 年第 7 期，第 15 页。

② 金山：《硅谷长胜不衰的奥秘：勇于创新，敢冒风险》，第 15 页。

中，能获得成功的人仅占1/10，但失败者也因尝试而受到称赞。这种宽松的环境和机制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年轻的硅谷人，为获得成功而冒险。

硅谷人才荟萃，个个抱负很高，个性极强，有时还有点傲慢自大，但他们非常团结合作，尊重科学，重视技术，公平竞争，极少官场陋习和官场作风。硅谷鼓励人们都富裕起来，公司经常对作出贡献的人给予重奖，慷慨地给予公司股份，以充分的发挥这些人的才能。进入90年代，硅谷新一轮的增长浪潮是由因特网推动的，增长速度最快的产业是网络产业和相应的软件业，而不是传统的半导体和计算机硬件产业。硅谷的成功奥秘说明了这样一个简单但富有哲理的道理："风险与创新并行，宽容与成功同在。"

挑战与对策

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开始朝着多极化方向演进。在科学技术方面，美国也开始遇到来自日本和西欧的挑战。仅在电子信息技术方面，英国在1982年制定了"阿尔维"计划，欧洲共同体在1983年制定了"欧洲经济共同体信息技术战略计划"，日本于1981年提出了第5代计算机的研制计划，这一切都对美国的领先地位造成了一定的威胁。保持美国在高技术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无论是对提高美国工业的竞争能力，还是促进美国的经济发展都将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为此，90年代以来，美国国会、联邦政府、大学和工业部门都在积极运作，未雨绸缪，制定和实施一系列有效措施，力图保住和巩固美国在高技术领域里的"霸主"位置。

1997年底，共和党参议员菲尔·格兰姆向参议院提出一项法案：在10年内将美国的民用研究开发预算翻一番。他的提案得到了一些民主党人的支持。预算委员会主席、新墨西哥州共和党人彼特·多梅尼西也对此表示出热情。他所在的新墨西哥州已有的两个国家实验室每年的预算达数十亿美元。对国家卫生研究院

(NIH)拥有预算审核权的拨款小组主席、共和党人约翰·波特在这方面也不甘落后。他敦促生物医学的院外活动集团成员进行游说，争取 NIH 的预算在今后 5 年翻一番，并从 1999 年起提高到 300 亿美元。[①]

在 90 年代经济繁荣以及政府财政赤字迅速下降的鼓舞下，美国科学政策界 80 年代一度出现的悲观情绪一扫而光，开始转向讨论应将国家财政盈余的多大份额用于扩大科学投入。众议院议长纽特·金格里奇对这一讨论也表示出赞许。他提出应在减税的同时增加科学投入，并提高防务预算。众议院科学委员会主席詹姆斯·森森布伦纳也加入了关于应大大增加科学投入的呐喊行列。[②]

森森布伦纳还特地委派一个专门小组起草一份关于联邦科学政策的报告草案，以作为万尼瓦尔·布什在 1945 年提出《科学：无止境的前沿》的续篇。近年来，美国科学界一直在致力于更新布什在冷战时代所规划的科学发展蓝图。但以前的多次努力，包括 1995 年由科学院前院长费兰克·普雷所领导的那次研究结果都是无疾而终。那么，为什么近 10 年来联邦的研究开发不断失去支持？据森森布伦纳说，其部分原因是没有让科学的“明确而易懂的社会目标”牢牢地扎进公众的思想里。[③]

已习惯与共和党人要求削减科学预算，特别是应用研究预算进行斗争的克林顿政府，对于这次突发的支持科学研究的浪潮持审慎态度。总统科学顾问约翰·吉本斯虽然称这一受到两党一致拥护的参议院提案是“值得称赞的”，但他怀疑从何处得到这笔经费，并警告要防止在预测预算盈余时过于乐观。他指出：“对科学应向何处去的纸上谈兵使我感到忧虑。这听起来像是一种计划经

① 陈民：《美国国会提出要大大提高科学投入》载《科技政策·科研管理评论与报道》1998 年第 3 期，第 109 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

济，对于预先确定关键机会在哪里这一点我必须十分谨慎。”“您可以十分有把握地说科学会造福于社会，但如果要预测哪些科学领域能造福于社会就是一项相当困难的事。”[①]

应该承认，国会掀起的这一轮“科学投入”的浪潮对美国科技的发展，对美国保持世界科学“盟主”的地位具有积极的作用。无论是政府决策人员，还是科学界人士以及美国公众，都将在这场大讨论中看清世界科学发展的趋势和美国科技面临的挑战。这对于美国政府如何调整国内科技政策，加大国际竞争实力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参照数”。

1998 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在他提交给国会的 1999 年度的预算方案中，要求拿出 182 亿美元用于军用和民用科学技术研究。这一预算方案比 1998 年度的科研预算增加了约 20 亿美元，增幅将近 3%。[②] 许多研究机构或部门如国家卫生研究院、能源部和国家科学基金会 1999 年的预算都比上一年度增加。这一趋势说明医学、能源、气候和科学教育等领域已成为美国今后发展的重点。

国家卫生防疫研究院 1999 年总预算为 148 亿美元，比前一年增长 8%，是该院历史上预算增幅最大的一次。根据这项预算，科学家们将加强对癌症、糖尿病、大脑疾病、遗传医学等领域的研究。在今后 5 年里，美国政府对国家卫生防疫研究院的投入有可能再增加约 50%。[③]

国家科学基金会的预算为 38 亿美元，比前一年增加 10%，主要将用在计算机、信息技术、教育和基础研究等方面。能源部所属的研究与开发计划的预算比前一年增加 11%，总额为 72 亿美元。将用于重点研究提高能源效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并向一些联合

---

① 陈民：《美国国会提出要大大提高科学投入》，第 109 页。

② 《1999 年度美国科研预算增加》，载《科技政策·科研管理评论与报道》1998 年第 3 期，第 109 页。

③ 同上。

科研项目提供资金。预算方案还支持在提高机动车辆燃料使用效率方面实行跨部门、跨机构的联合研究。

从1999年美国科研预算的数字分析,美国已充分认识到美国科技发展正处于来自欧盟、日本、亚洲的强劲“科技之风”的漩涡之中。美国科技战略的调整和科技资金的大幅度投入表明,美国将致力巩固和发展美国在世界科学研究领域中的“领头羊”地位。1997年10月23日,美国国家科学院、国家工程院和医学科学院3院院长共同发表了题为《为21世纪作准备:新时代的科学技术政策》的联合声明。该声明较为全面地阐述了他们对21世纪美国科技政策的看法。他们认为,强大的科学和工程研究是提高经济生产力和竞争力,增强国家安全,改善人民健康和环境质量的重要因素。为维护强大的研究活动,确保美国科学和技术研究工作的世界前沿的地位,联合声明还向美国政府提出了指导21世纪科学技术发展应遵循的6项基本原则的政策建议:

第一,联邦政府在支持长期的、用途广泛的基础科学和技术研究方面的作用应是国家经济、国防、人民健康和社会福利赖以进步的基础。

第二,美国必须在所有主要研究领域成为世界领先者之一,并在某些关键研究领域保持明显的领先地位。

第三,在分析联邦政府支持的研究活动时,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科学和技术之间的差别常常模糊不清。“基础技术科学”是基础科学研究的一部分,不应当被当作“应用研究”。

第四,所有美国人必须具备坚实的科学、数学和技术教育基础,以便更好地了解人类所生存的复杂世界,从而在生活中作出明智的决策,为“现代”劳动力做好准备。

第五,国际合作远远不只是与其他国家合作投资于科学设施。美国可以通过其在科学技术上的领导作用,为提高全世界人民的生活水平作出贡献。

第六,在预算紧张的条件下,保持美国在科学技术上的领先地位需要在联邦投资的资源分配上坚持原则。项目的选择必须体现科学技术团体的最高水平。

上述"联合声明"表明美国将一如既往地把科学技术作为美国社会发展的基石。在扩大科学技术研究的同时,将把美国的科学研究纳入国际竞争与合作的大框架中,以谋求最大的利润回报。美国21世纪的科技政策体现了美国的一种"科技扩张"思想,同时也展示了美国对未来的一种超越精神。这种美国独特的超越精神不仅为美国科学研究的发展注入了活力,而且也为美国在未来的21世纪中保持其"科技霸主"地位提供了保障。因此,当我们在探索和研究美国成长为世界超级大国的动因和进程时,不应忽视"硬力量"的有效支援背景——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

第二章　绚丽多彩的人文学术流派

20世纪美国社会科学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巨大的演变中，文史哲一马当先，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跃进。大批新学科、新概念、新思潮、新流派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无论是传统的实用主义哲学流派，还是新兴的科学史学派，或五花八门的文学流派，他们都经历了改组、整合、兴盛和被取代的过程。这些标新立异的学术思想和多元化的流派格局拓宽了美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认知范围，构成了美国人自我认同的基本框架，并为美国成为20世纪世界文化霸主奠定了思想基础。

实用主义哲学

早在殖民地时期，实用主义的思想已经开始萌芽。相对清教哲学、启蒙主义这些舶来品，实用主义是真正植根于美国土壤、为美国所独创的新哲学。

1871美国哈佛大学出现了一个小型的学术团体“形而上学俱乐部”。此俱乐部的成员都倾向于达尔文的进化论，赞同“适者生存”，崇尚一切实用的便是有用的观点，以实际目的为根本目标。在这里，年轻的学者聚集一起，讨论各种各样的学术问题。[①]

美国人最初对哲学不感兴趣，但随着实用主义哲学的出现，人们对哲学开始发生兴趣。哲学杂志如雨后春笋，哲学团体也逐渐

① 罗志野：《美国文化和美国哲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41页。

增多,各个高校开始创办哲学系,实用主义进入了各个学科,渗透心理学、社会学、法学、教育学等。实用主义的发展也带动了各个社会和人文学科的进步。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美国传统的实用主义价值观在新形势下面临着新的挑战。哲学开始与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伦理学融合一起,转向分析人的内在的特性。于是,分析哲学占据了哈佛、普林斯顿、加州大学这类高等学府,现象学在耶鲁大学占了优势。这两种哲学流派都试图代替实用主义哲学的主流流派的地位。但不管新的哲学流派如何把实用主义哲学逼居二线,实用主义依然存在。它从主流转向暗流,其精神血液渗透每一种在美国流行的哲学思想中。

实用主义为当代西方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哲学流派之一。它产生于19世纪下半期的美国,盛行于20世纪前半期的整个西方世界。美国实用主义创始人为查尔斯·皮尔士(Charles Sanders Peirce),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是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和约翰·杜威(John Deway)。皮尔士是一位情趣雄浑的体系哲学家,他的著作几乎涉及到一切哲学领域,但他的实用主义只是意义上的理论。1878年他首次表述了实用主义的基本原则:任何一个概念的全部内容和意义在于它所能引起的效果。1901年他提出了"实用主义"这一术语。他趋向于把实用主义看作是一种科学定义的原理。他的兴趣是科学。因此,在学术界他被作为实用主义的建设者,而威廉·詹姆斯才真正发现实用主义并完善了实用主义。

詹姆斯认为实用主义方法是一个解决形而上学争端的方法,是一种确定方向的态度。[①] 他强调,作为一个实用主义者,应当坚决背弃职业哲学家根深蒂固的习惯,即避开抽象与不充分以及字面上的东西,避开僵死的原理和封闭的体系,避开那种假冒的绝

① 罗志野:《美国文化和美国哲学》,第141页。

对,而求助于具体、充分的事实,求助于行动与力量。詹姆斯崇尚“彻底经验主义”,认为“思想流、意识流、主观生活之流”是宇宙的本原,惟一的实在和认识的基础,宣称认识的主体和客体之分只是经验内部的区别。知识不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而只是行动的工具。真理不是与客观现实相符合,而是在应付环境的行动中有效。詹姆斯的实用主义真理观是:“有用就是真理。”在实用主义形成和发展中,如果说皮尔士为实用主义哲学的开山鼻祖,詹姆斯为集大成者,那么杜威则是实用主义哲学的推进者和发展者。

约翰·杜威集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批评家于一身。他早年受黑格尔思想的影响,具有福音式的精神。他对美国思想最主要贡献是他的工具主义。《纽约时报》在他逝世后曾发表社论说:“两位大学教授的超群出众给哲学注入了新生命,使哲学与这个科学时代有一种新的关系。他们是詹姆斯与杜威,两人都是实用主义者,但杜威对于美国哲学有更大影响。”

杜威比詹姆斯更为现实,可以称为“崇实”的实用主义者。他坚持把科学应用于人生的各个方面,认为如果人们要想改善人类条件,就必须了解社会过程的性质,以便对社会中不利于人类幸福的那些方面进行科学的控制。杜威声称,詹姆斯把实用主义方法引伸到真理性质的问题中去,而“我们已经把实用主义的方法看作一种可以决定词的意义以及哲学信仰的重要性的工具”。杜威的工具主义强调,认识是行动,知识是行动的工具。所以,“所有的概念、学说、系统,不管它们如何精致,如何坚实,都必须视为假设……它们都是工具。与其他一切工具一样,它们的价值不在于它们自身,而在于它们所造成的结果中显现出来的功效。”因此,杜威的实用主义真理观就是“真理就是效用”。此外,杜威在工具主义基础上提出来的 5 步法,对指导科学研究具有很大的价值。他的五 5 法是:感知困难、寻求对策、提出假设、选择正确的答案、对假设进行证实。杜威不仅是实用主义大师,还是美国自然主义的

奠基人。杜威排斥神学的灵魂论及概念存活论,不承认神秘主义。这种一切从实际出发,把“崇实”精神植入科学研究之中的方法培养了一大批崇尚“实用精神”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研究人员,造就了惟实用主义为行动范式的现代美国生活模式。

在美国,许多人把这3位实用主义哲学大师的实用主义哲学思想改编成通俗书籍,从极端狭隘的立场上对“有用就是真理”进行诠释。如戴尔·卡内基的《怎样赢得朋友及影响人》、福斯迪克《论作一个真正的人》、诺曼·文森特·皮尔的《积极思维的力量》。这些都是风行于世的大众实用主义读本。这些大众化的读本使实用主义哲学得以社会化并植根于美国普通读者的思维与行动之中。如今,在美国,“实用主义”作为一种自然法则已成为不言而喻的真理。为了这个真理,美国人不惜与旧世界决裂,不惜与家庭决裂,不惜与传统决裂。这种把一切抛开的思想使美国人很少保守,很少禁锢。费朗西丝·菲茨杰拉德在《湖中之火》这部阐述越战的书中写道:“在美国,获得自由与空间的渴求,进行征服与扩张的运动,从未受到过地域疆界或根深蒂固的传统的约束。”[①]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指出:“随便挑出一个美国人作为他的同胞的样本,他一定是这样的一个人:特别热衷于实现自己的愿望,进取心极强,喜欢冒险,尤其喜欢新奇。”美国人将历史发展视作一条直线,而他们自己则作为全人类的代表站在历史发展的最前列。他们的使命是探索、发现和开拓。从荒野到大海,从沙漠到山脉,从地球到宇宙,永无止境。这种独特的民族精神之所以与世界其他国家有所不同,主要归于美国辽阔的国土和得天独厚的移民社会,以及这种“例外”下产生的“实用主义”哲学。“实用主义”思想与美国民族精神构成了相互作用的关系,一方面实用主义孕育

① 转引自詹姆士·O·罗伯逊:《美国神话·美国现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页。

了美国民族精神，另一方面美国民族精神又反作用于实用主义，使之更加社会化。美国社会、文化、外交、科技等方面的加速度发展模式，给在实用主义思想指导下的美国民主的“实用性”，美国社会“我文化”的文化表征及其思想的畸形产物“美国中心论”作了最好的诠释。

寻求科学的历史学

1880 年以后，美国部分名牌大学和院校相继建立了历史系并开设了研究生课程。1884 年美国历史学者创立“美国历史协会”，标志着美国史学逐步走上一条正规化、专业化的道路。1895 年《美国历史评论》杂志的问世，宣告美国历史研究领域长期被业余史学家统治的局面结束，美国职业史学划时代的开始。[①]在美国史学史上，这一时期的一些历史学家因追求在史学领域建立一整套科学史学研究方法和科学教学标准而被后人冠之“科学史学家”。继科学史学派后，美国史学界流派纷呈。进步主义流派、一致论流派、社会科学流派等把美国史学带入了世界史学研究的最前沿。在众多的流派中，科学史学和社会科学流派是 20 世纪美国史学研究具有代表性的流派。

美国独立战争胜利后，一些有识之士萌生了在美国短暂历史中寻找民族象征的强烈愿望。政治家和史学研究爱好者梅森·威姆斯、威廉·沃特、贾尔德·斯帕克斯分别撰写了充满强烈爱国主义色彩的历史著作。如梅森的《乔治·华盛顿》、沃特的《爱国者亨利传》、斯帕克斯的《华盛顿生平和著作》及 25 卷本的《美国传记丛书》等。这些巨著的共同主题是“天定命运”，宣扬美国是上帝的子民，肩负上帝赋予的拯救全人类的使命。这些被后人称为“爱国主

---

① Deborah L. Haines, "Scientific History as a Teaching Method: The Formative Years,"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No.4. 1977), p.892

义学派”的历史撰稿人对“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使命观”的强调，使该时期的历史读本充满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族热情，同时也影响了他们对历史进行客观的审视。这种研究趋势一直延续到内战以后为止。内战后，欧洲自然科学的发展和美国社会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科学史学的形成。

首先，美国内战的爆发迫使美国人面对现实，讲求理性。美国内战是世界上第一场现代战争，工业化时代制造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使战争中的生命损失前所未有。美国人之间的这种相互残杀摧毁了爱国主义学派笔下美国历史的“罗曼蒂克”，许多普通美国人开始对一些历史读本表示怀疑。更有一些受过正规教育、在国外留过学的美国学者公开表示对爱国主义学派极度主观历史观的强烈不满。

其二，欧洲启蒙运动与自然科学的发展令美国学人耳目一新。17 世纪牛顿定律的发现和认可使欧洲自然科学家认为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都是有规律可循的。至 19 世纪，欧洲学术界已广泛流传达尔文和斯宾塞的科学思想。达尔文主义于 19 世纪传入美国，其进化论和“适者生存”的理论被美国人广为接受。达尔文主义强调“理性思考”是人类理解自然的必要前提，而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则套用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规律来解释社会发展规律。在欧洲启蒙思想家和这 2 位学者的思想冲击下，一些美国历史学家开始相信历史是有规律的，运用理性思维对历史事实进行不懈的研讨可以发现这些规律。

其三，内战后各学术团体、组织的相继成立使学术规范化成为一种潮流。1869 年美国哲学协会成立，进入 70 年代后，近 80 个学术协会组织建立。而到了 80 年代，则涌现出近 121 个学术组

织。[1]这种规范化、专业化的学术组织的出现也冲击了史学研究领域，为科学史学派创立“美国历史协会”奠定了舆论基础。

其四，留德美国学者的回国带动了科学史学的进程。19世纪现代科学历史学的创始人、德国历史学家兰克对史料考证的基本原则的确定，被史学界视作职业化史学的开端。[2]此时美国历史协会主要创始人赫伯特·亚当斯正在德国著名学府海德堡大学求学。在德期间，他深受德国历史研究的严谨风格和兰克客观史学观的影响。美国历史协会的其他创始人如赫曼·赫尔斯特、埃尔伯特·哈特、安德鲁·怀特等都在欧洲深造过，受到德国兰克学派的影响。

其五，19世纪下半叶美国教育界的变革使史学研究职业化成为可能。选修制的建立就是美国教育体制改革的一个侧面。1870年为数不少的院校在哈佛的带领下开始增加选修课程。70年代初亨利·亚当斯率先将“研究生制度”引入美国大学。“研究生制度”的推广促使美国历史教学从内战前仅作为大学辅助课的地位中走出来，使史学研究得以进入专业化、科学化的轨道。这场教学改革使美国一些主要大学在心理上完全作好了接受以亚当斯为首的第一代科学史学家的准备。至1884年，美国400所高校聘任了约20名专职历史教师，10年以后，专职教师已达100多名。

科学史学家认为历史研究就是一个反复运用史料的过程，因而史学研究者在研究历史时应遵循“科学考证史料”的史学纲领。为培育、弘扬“科学史观”，科学史学派对美国历史教学与历史研究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就普及公共教育、政治与历史研究紧密关系等问题，科学史学家提出了大量的理论依据。为了打破历史写作掌握在极少数文物工作者、杂志编纂人和个别有天赋的业余历史学家手中的严峻局面，1876年秋亚当斯在霍普金斯大学首开研

---

① John Higham, *History: Professional Scholarship in America* (Baltimore: Johns Hopins University Press, 1989), p.8

② Mark Block, *The Historian's Craft* (Manchester: 1954), p.165.

讨课(Senimar),将德国严谨的治学风格引入课堂,最终培养出一批受过良好专业训练,敢于追求真理,掌握历史研究方法的职业历史学者,为专业历史研究与业余历史学家脱钩创造了条件。亚当斯最为出色的业绩是在1884年创办了美国历史协会。协会第一次会议的参加者大部分是非职业历史学家,但制订协会章程的5人委员会成员都是职业历史学家。协会的主旨是:在历史研究领域,各院校教授应起主导作用并主张与地方史学协会保持联系,以期带动各地方史学正规化。

为推动科学史学,1895年美国历史协会创立了一个下属机构"历史手稿委员会",其任务是编辑、索引、收集一切与美国历史研究有关但尚未出版的史料、文件、记录等。1899年美国国家档案馆成立,以监督各州档案馆的管理。10年内,24个州制订了保存未发表的文件和纪录的条例。1907年美国历史学家组织前身密西西比河流域历史协会成立,它表明美国一些著名业余历史学者已开始融入美国职业史学的主流,而美国档案馆的建设和发展标志着美国历史研究专业化形成期已经结束,科学史学已完成历史研究专业化、职业化的历史使命。在极度爱国主义和浪漫主义雾霭笼罩着美国史学的背景下,科学史学以其"实事求是"的科学史学观取代了"天定命运"的神学观,把美国史学导入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科学史学在学术发展过程中的历史贡献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首先,科学史学带动了世界通史、欧洲史和国别史的研究。著名的《哈佛历史研究指南》在1896年宣布:"如果不经过通史的训练,不能将美国史与其他国别史进行比较研究,此人就不能称得上是美国史专家。"[1]这种跨国史的研究开拓了美国史学家的研究领域和视野,培养了一批精通他国历史与政治的学者和政治家,疏通

① Haines, p.910.

了美国与欧洲及世界各国在交流和交往的航道，为美国了解外部世界提供了大量的感性材料和理性思维模式，从史学角度促使美国从19世纪末开始摆脱“孤立主义”的束缚，逐步步入“全球主义”的时代。

其次，科学史学的客观历史观培养了一代学人。亚当斯是“生源学说”倡导者，强调欧洲文化的属性，但他并不墨守成规，相反，鼓励他们向传统历史研究挑战。在其严格训练下，弗雷德里克·特纳脱颖而出，其论文《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大意义》创立了“边疆论”，阐述了西部边疆在塑造美国文化与精神方面的巨大作用，成为美国历史研究的一个里程碑。

其三，科学史学“不偏不倚”的治史观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缓解了民族矛盾，推动了美国民主进程。

其四，科学史学对大众教育的关注及对大学扩建的追求无疑加速了新移民的同化进程。19世纪80年代，大量东南欧移民涌入美国。这些新移民来自贫困地区，其语言与宗教信仰及教育背景与老移民相去甚远，特别是这些新移民的苍白教育背景严重地阻碍了他们在新大陆的发展。美国大学的扩建带动了社区技术学院的兴起和中小学教育的普及，移民在没有围墙的教育体制中获得文化、技能、道德的训练，就业机会提高，移民对美国价值观的认同速率上升，最终有益于美国社会的稳定和繁荣。

其五，科学史学带动了美国图书馆的发展和档案机构的建立。在档案机构方面，早期美国政府对资助汇编出版历史文件、保存有价值的历史档案毫无兴趣，因而对图书馆的藏书量也没有要求。科学史学的兴起及对史料的强调使图书馆扩建和档案机构的健全成为事实，从而推动了美国史学和其他学科的发展。

不过，科学史学在获得巨大成功的同时，也存在着明显的内在弱点和时代局限。

第一，对“科学史学”界定模糊。1890年前后，美国史学界曾

对何为科学史学展开了辩论。一些学者认为科学史学就是要强调历史是一门可寻求规律的科学，另一些人则认为科学史学就是用科学方法确定史料，不作任何评论或解读地将它们罗列起来。这场辩论始终未能将科学史学家的思想统一。一些学者崇尚“史料+史料”的方法，因而读本枯燥无味，晦涩难懂，读者寥寥无几。

第二，科学史学的政治史观落后于社会发展。美国迅速开拓海外市场，对外经济扩张加速。此时科学史学派坚持用政治观来解释历史已明显力不从心。

第三，科学史学派的个人价值观在作品中的自然流露削弱了其推崇“真实历史”的影响力。由于该学派中大多数人来自东北部地区，生长在富裕的环境中，因而在史料甄别与著述中，他们不自觉地流露出对东北部道德价值观的赞词和盎格鲁－撒克逊优越论。这种偏见与个人价值观的痕迹一方面使科学史学派的“科学性”大打折扣，生命周期缩短，另一方面也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作为一个社会人，任何人都不可能完全超越他所生活的时代和价值观。二战后美国学术高度繁荣，大批欧洲学者移居美国，给美国学术界带来了新的活力，在这一背景下，美国史学流派纷呈，令人目不暇接。在这些流派中，社会科学新史学派通常被认为是与法国年鉴史学派、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鼎足而立的三大史学流派之一。美国社会科学新史学派这一学术地位的确定改变了美国史学界长期追随和套用欧洲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史学研究模式，把美国史学研究的理论及其方法第一次推向世界史学研究界，从而完成了美国史学研究本土化的历程，为美国史学研究在世界史学研究领域赢得了不可动摇的地位。美国史学研究与社会科学的紧密结合开始于40年代。1950年以后，社会科学为历史学家开拓的前景不仅极为丰富多彩，而且比以前更为明确，并出现社会科学和历史学一体化发展的趋势。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紧密结合是各自学科本身进一步发展的需要。从历史学来说，现代社会的发展使

历史学由于其自身理论与方法的落后和不足而不断产生危机。为了克服和解决这种危机，历史学家要求与其他学科结盟。从社会科学来说，一方面，二战后现代社会科学的长足发展所显示出来的优点对历史学形成了一种挑战，各门社会科学的理论经过较长时间发展和检验，日趋成熟。但另一方面，现代社会科学的发展也需要把史学研究作为自己的主要材料基础。美国社会科学新史学派正是在美国现代社会科学长足发展，会合欧洲史学的革新潮流中诞生和发展的。它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美国史学的陈旧面貌，推动了战后史学的进步。

美国社会科学新史学有两大明显特征：充分运用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广泛采用计量研究方法和数量资料。社会科学新史学派是一个庞杂的概念，它主要包括新经济史学、新政治史学和新社会史学等流派，致力于城市史、劳工史、黑人史、妇女史、家庭史、儿童史、人口史、社区史、企业史、族裔史等众多边缘学科的研究，它们在传统史学研究中根本没有一席之地。它以多元化史学研究的新格局，改变了传统史学研究只注重"精英人物"研究和"重大政治事件"研究的那种"由上至下"的单一史学研究模式，拓宽了历史学家的视野与历史学研究领域。在套用社会科学的理论模式、思维范式的前提下，使历史学由一门描述性的人文学转为一门分析性的社会科学。新史学研究对大量新技术手段的运用，改变了传统史学研究方法的落后面貌，并将学术研究的组织形式从个体研究转向群体合作，使史学研究也像现代化工业生产那样以"合作"为主，呈现出井然有序的研究格局。

美国社会科学新史学在发展进程中也遇到了困惑和挫折。该派学者在借鉴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中过于盲目，导致历史研究的碎化，特别是大量社会科学术语和数理模式的滥用使广大普通读者望而却步，使历史读本"束之高阁"，失去了教育读者的功能。同时由于过分强调计量史学研究方法，使历史研究忽略了综合性

和分析性的方法，陷入一种新的单一型研究方法，从而使史学研究在摆脱了传统史学危机的同时，又产生了新的史学研究危机。托马斯·杰佛逊曾说："使自由保持生机勃勃的因素是冲突，而不是绝对的一致。"美国史学研究领域所发生的种种挑战和危机证实了这一点。新危机的出现正是新起点的开始，它以螺旋式上升的速度不断地将史学研究从必然王国引入自由王国。

标新立异的文学流派

在20世纪美国文学发展史上，文学流派以其"怪异、多样"而令人眼花缭乱。这种"多元流派"的格局表明美国文学受到了美国多元社会结构的深刻影响。在20世纪众多的文学流派中，学院派、黑山诗派、垮掉派、黑色幽默派以其独特的文学创作手法丰富了美国文学。

学院派：1912年是美国新诗歌运动的起点。这个运动一开始就有两个中心和两种不同的主张。一群寓居国外的美国人，以T. S. 艾略特(T. S. Eliot)为龙头，以伦敦为中心，侧重写历史意识和文化传统与当代社会的对比，讲究雅致雕琢，旁征博引，具有浓郁的学究气。艾略特反映一战后知识分子消极悲观的长诗《荒原》可谓为学院派的"范本"。由于艾略特在创作和文学批评方面所具有的天赋和努力，这些诗人的主张为更多的人所接受，至40年代成为在美国诗坛居统治地位的"学院派"。

美国新诗歌运动的另一个中心在纽约，是一些居住在美国本土的诗人，以威廉·威廉斯(William Williams)为代表。他们强调用美国日常口语，包括粗话和下流话，摹写个人的生活感受，精细入微地观察周围的一切，力图把平凡的事物从僵硬刻板的状态提高到想象的水准，给人一种清新的美的享受。这两个中心和两种主张相互冲突的结果是后者倍受排挤和压制。威廉斯曾为此感叹到："《荒原》曾将我们赶出了世界……艾略特又把我们送回到书

斋。”

作为学院派的先驱，在二战刚结束后的一段时期，艾略特以不可动摇的大诗人的身份占领诗坛，没有任何新派诗人敢与他对峙、较量。在学院派的阵营中，约翰·兰塞姆(John Ransom)、艾伦·退特(Allen Tate)、W. H. 奥登(W. H. Auden)、以及稍后的罗伯特·洛厄尔(Robert Lowell)等也是学院派诗坛举足轻重的人物。学院派的最大特色是重视传统艺术形式，强调形式的重要性，追求外表的雅致、严谨、节制、平稳。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使他获得了194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学院派对美国文学的最大贡献是规范了美国文学创作，培育了一支高素质、高文学修养的文学创作队伍，为美国文学走向世界奠定了基础。

黑山诗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诗坛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战争使美国诗人渴望挣脱上流社会的虚假束缚，避开正统学院派的“神光”，摆脱“学院派”的巨大影响，更深刻地认识自己的社会及生活的世界。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美国诗坛出现了第一个反学院诗派——黑山诗派。这一派的主要领导人为美国著名诗人兼评论家查尔斯·奥尔森(Charles Olson)。奥尔森50年代执教北卡罗来纳州的一所艺术学院——黑山学院，后担任院长。该学院的创建目的就是要将诗神缪斯的统治权从学院派手中夺过来。为此，奥尔森利用职权，招揽了许多志同道合的诗人和追随者作为校方教员和工作人员，并创办了《黑山评论》和《起源》杂志，以对峙以艾略特为首的学院派。“黑山诗派”一词即源自於此。

在奥尔森的领导下，一批青年诗人开始向当时的英美诗坛盟主艾略特发难。奥尔森主张用自然呼吸的节奏代替传统的音乐，将节奏感与诗的内容结合起来，借助诗歌形式把物体的能量传达给读者。“黑山诗派”主张在形式上的全方位“开放”，反对僵化教条的诗律和格律，大胆运用日常口语，形式活泼。黑山诗派的崛起给暮气重重的美国诗坛带来了春天般的活力，使往日僵硬的诗歌

增添了生活的真实感。但黑山诗派对美国主流诗派“学院派”的冲击远不如“垮掉派诗歌”。艾伦·金斯堡的《嚎叫》有如惠特曼再生一般，深刻地揭示了美国社会中的病态现象，把美国文学发展推向一个全新的阶段。

垮掉派：20世纪50年代后期，部分诗人与小说家出于共同的观念组成了一个松散的集团。他们一致反对现存秩序，反对政治，反对理性，反对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文化与传统道德观念，主张无拘无束的自我实现和自我表现。这一风行于美国的新兴文学流派被简称为“垮掉派”。所谓“垮掉”有两层含义：一是“被击垮”，即被当代压抑性的文化所击垮；二是“自得其乐”，指很多垮掉派作家通过信奉犹太教、基督教和佛教来实现摆脱尘世或依靠吸毒引起幻觉，修炼成一种乐不可支的精神状态。该流派中的人物形形色色，其中有诗人艾伦·金斯堡（Allen Ginsburg）、格雷戈里·柯尔素（Gregory Corso）、劳伦斯·费林哥蒂（Lawrence Ferlinghetti）；小说家威廉·巴罗斯（William Burroughs）、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等。

垮掉的一代充满了反叛的精神。他们用病态的内向自我探索和放浪形骸的所谓“脱俗”来对抗社会。他们宣布：不追求事业的成功，不承担任何家庭和社会义务，而要用各种方式寻求生活的绝对自由。在此原则支配下，他们或以奇装异服，酗酒狂欢，吸毒斗殴，乞讨浪游，群居等放荡不羁的生活，来不断追求感官刺激；或以参禅拜佛进入超现实的幻觉，来寻找神秘主义的灵感，满足自我。为了表达和宣传这种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他们创造了一种与学院派“高雅”文化对立的“地下文化”，“垮掉派文学”由此形成。“垮掉派”文学的主要作家几乎全部来自美国东部，但当他们最初的文学尝试受到东部学院派势力压制时，他们便前往西部寻找知音和发展基地。1955年夏天，东、西部“垮掉派”的文人和其他反学院派诗人在旧金山联合举办诗歌朗诵会，金斯堡的长诗《嚎叫》以冲天的怒气向“飞黄腾达和饱食者”发出嚎叫，“哀嚎”一代精英的痛

苦和自暴自弃，为这个被击垮之辈，吸毒成性、不满现实、被迫流离的亚文化群体引吭高歌，同时又斥责军事化的官僚机器，描绘了社会的精神危机。《嚎叫》以"50年代的《荒原》"之誉称拉开了"垮掉派"文学的序幕。

1957年凯鲁亚克的长篇小说《在路上》用理想化的笔调，描写"垮掉的一代"青年在各地流浪生活，竭力宣扬所谓的"背包运动"，使大批精神苦闷的青年对此十分神往并将此小说奉为"生活的教科书"。"垮掉派"作家在政治上奉行无政府主义和虚无主义，自我标榜为"没有目标的反叛者"、"没有口号的鼓动者"、"没有纲领的革命者"。在艺术上，该派强调以全盘否定高雅文化为特点。由于商品化的宣传，感情上的共鸣，"垮掉派"文学在青年一代中迅速地扩大着自己的"地盘"，整个美国社会都响着它那癫狂、放荡的乐音。然而由于"垮掉派"自身放荡不羁的致命伤，这一文学流派在60年代中期便烟消云散。它从另一侧面反映了美国"个人主义"价值观终于从"麦卡锡时代"的"昏睡期"苏醒过来，促使美国社会走出50年代"一致性"的恶梦。

黑色幽默：黑色幽默是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一个文学流派。60年代中期，美国作家兼文学评论家费里德曼将12个作家的作品收编成集，定名为"黑色幽默"。一些批评家对黑色幽默定义为："所谓黑色幽默，就是用丑角的冷漠、逗笑的嘲讽来对待现实中的一切荒谬、丑恶、残酷、阴暗等黑色的东西，视荒谬为人生痛苦的玩笑，用喜剧的形式来表现悲剧的内容"。"黑色幽默"这一流派随着该派作家的作品的影响扩大，逐渐被社会所接受，成为这个文学流派的正式名称。"黑色幽默"在美国文坛从崛起到发展，从盛期到衰落的时段不长，60年代中后期达到全盛，至70年代高潮已逝，但仍不乏有好作品问世。一些西方文学评论家认为"黑色幽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小说惟一或重大的发展。公认的"黑色幽默"主要作家及其代表作为：约瑟夫·海勒（Joseph

Heller)的《第二十二条军规》(1961);库尔特·冯尼格特(Kurt Vonnegut)的《猫的摇篮》(1963)、《胜利的早餐》(1973);托马斯·品钦(Thomas Pynchon)的《V》(1963)、《万有引力之虹》(1973);约翰·巴斯(John Barth)的《烟草经纪人》等。

从文学史的角度看,辛辣的幽默最早出现在马克·吐温的文学创作中。和马克·吐温的幽默不同,“黑色幽默”则在笑声中表现出令人震惊的绝望、恐惧和冷漠。产生这种区别的主要原因在于60年代美国社会动荡和社会各族裔矛盾的总爆发。它改变了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对社会和自身的看法。他们对生活在这个混乱社会中既不满又无奈;既愤恨,又冷漠。“黑色幽默”这种特殊的艺术类型正适合于表现他们对人和整个社会的极端悲观主义的理解。从美学形式来看,“黑色幽默”属于一种带有悲剧色彩的变态喜剧,致力表现的是存在主义的主题。这一流派的小说家把生活理解为一种荒谬可怕的喜剧,在创作中把荒唐、梦魇般的事实,阴沉、绝望的情绪,玩世不恭的人生态度和愤世嫉俗的嘲讽糅为一体,突出描写人物周围世界的荒谬和自我的孤寂无依,痛苦万状,表现环境与个人的互不协调。他们尤其重视把这种不协调放在由各种独特的艺术手段组成的哈哈镜前加以放大、扭曲、延伸,让丑恶和荒诞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使人震惊、惶恐。在艺术手法上,“黑色幽默”作家并不完全一致,但却有其基本的共同点,往往塑造一些乖僻的“反英雄”人物,借其可笑言行影射社会现实,表达作家对社会问题的思考和看法。情节上多采用“反小说”形式,把片断的现实与荒诞的幻想,严肃的哲理和插科打诨相结合,时序颠倒,层次重叠,并运用漫画式的夸张和体系庞杂、意向奇特的比喻,显示出极尽讥讽、自嘲、阴沉、冷漠的语言风格。

纪实小说:70年代后,经过反主流文化运动和民权运动洗礼的美国小说界开始走出单纯的“黑色幽默”创作局面,进入一个小说流派多元化复苏、发展的阶段,其显著标志就是侧重于创新和实

验的流派日益增多。从反小说、超现实主义小说、心理现实主义小说到超小说、新小说、新"新小说"，形式多样，各流派互相竞争、渗透，形成了空前活跃的小说创作格局。在这一时期，一种新的小说体裁"非虚构小说"或称"纪实小说"，不仅在文学界获得了承认，而且成为最为流行、畅销的文学形式之一。从此，作家们纷纷选择令人震惊的真实故事，对之进行详尽的调查分析，以寻找当代美国生活中所存在的矛盾根源。纪实小说把美国社会带入了一个"反思"时期，特别是越战纪实小说，它使美国大众第一次对政府的外交决策产生了怀疑，美国舆论对政府监督的意识也随之得到强化。

第三章 现实主义文学与戏剧

美国文学的历史不长，它几乎是和美国自由资本主义同时出现，较少受到封建贵族文化的束缚。美国早期人口稀少，有大片未开发的土地，为个人理想的实现提供了很大的可能性。美国人民怀有强烈的民主自由精神，个人主义、个性解放的观念在文学中有突出的反映。美国又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源源不断的各国移民将各自的民族文化移植美国，在美国早期形成的“盎格鲁 - 撒克逊”主流文化格局中糅合，产生具有美国特色的美国本土文学。美国文学发展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吸收、融合各民族文学特点的过程。

在这种具有共性的美国本土文学存在的同时，各族裔文学也在这片“追求民主，崇尚自由”的国土上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个性自由与自我克制、清教主义与实用主义、激进与反动、反叛与顺从、高雅与庸俗、深刻与肤浅、积极进取与玩世不恭、明快与晦涩、讽刺与幽默、精心雕琢与粗制滥造、对人类命运的思考和探索与对性爱的病态追求等倾向，均可以共处并存。在美国文学史上从来没有一种潮流或倾向能够在一个时期内一统美国文学的天下。美国文学的多样化格局从一个层面展示美国是一个“多元”社会和文化的国家。

美国族裔文学

如果说 19 世纪是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世纪，那么 20 世纪初，美国文学在经历了欧洲浪漫主义思潮后却开始向现实主义和自然

主义文学的过渡。引起这场文学思潮转轨的社会因素是19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工业化所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日益尖锐化和突出。美国作家们开始对社会的前景感到忧郁和失望，一批新兴的进步主义作家大胆扬弃早期美国社会上流传的廉价乐观主义，走上一条揭示社会“黑幕”的道路。20世纪初，美国文学在“进步主义”运动中开始了其“族裔文学”的尝试。

黑人文学：美国黑人文学起源于黑人奴隶歌曲。这些歌曲，无论是悲歌还是民歌，都倾诉了黑人背井离乡、沦为奴隶的痛苦心情。黑人书写文学最早出现在18世纪，19世纪后逐渐增多，其表现形式先是诗歌，再是小说。作者多数是获得自由的黑人，他们的作品以控诉蓄奴制的罪恶为主。南北战争后，虽然奴隶制废除，但美国黑人仍然倍遭受种族歧视的迫害。这一时期的黑人文学继承过去的战斗传统，在更为广泛的社会背景上表现黑人的生活和斗争。20世纪20年代以后，黑人文学有了进一步发展，出现了兰斯顿·休斯这样著名的小说家、诗人。他的作品歌颂黑人民族的伟大、斥责种族主义的罪恶，具有感情豪放、格调清新的艺术风格，成为现代黑人文学的典范。在文艺界推崇“原始主义”的影响下，纽约的黑人区出现了“哈莱姆文艺复兴”。一些优秀黑人作家在描写异族情调的同时，注重发掘黑人的古老传统，树立民族自尊心。到30年代末，黑人文学的战斗性向更高的层面发展，出现了理查德·赖特的《土生子》(1940)这样优秀的文学作品。但二战后，受到萨特和加缪存在主义的影响，赖特对黑人的前途持悲观态度。

曾得到赖特指教和提携过的拉尔夫·艾里森(Ralph Ellison)，在如何看待黑人运动问题上与赖特争论不休。艾里森的长篇小说《看不见的人》(1952)对种族不平等的抗议采取了更细腻、更深刻的表达方式。在作品中，作者对各种黑人运动采取了冷眼旁观的超然态度，用超阶级和存在主义的观点看待黑人的处境。小说并不拘泥于只描写黑人遭受的苦难，抨击美国的种族歧视或发泄黑

人仇恨和怒火,它以一种充满象征意味的存在主义手法进行创作。该小说出版后即获得很高的评价并获得全国图书奖。[①]

同艾里森一样,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也是在赖特的指导和鼓励下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他既写小说,也创作剧本和散文。特别是他的散文,题材广泛,深刻反映了美国的黑白种族矛盾,透析了黑人运动所面临的各种问题。鲍德温最感兴趣的创作主题是种族、宗教、爱和寻找"自我"。他认为如果黑人和白人不彻底融合,美国自由、平等、民主的理想就会完全葬送,因为白人在奴役黑人的同时,也在压迫他们自己,毁灭他们的前途。和艾里森一样,他坚持认为,只有通过超阶级的人类之爱和相互理解才能消除种族仇恨,缓解种族矛盾,最终铲除种族歧视。

黑人女作家加盟黑人文学的创作使黑人文学增添了一道美丽的风景线。在众多黑人女作家中,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可谓佼佼者,她的小说充满了浓郁的女权主义的色彩。托尼的《最蓝的眼睛》(1970)是一部充满悲剧色彩的小说。她以一个黑人女孩盼望有一双蓝眼睛,使自己变得漂亮为小说主线,叙述了在白人为主的社会里,等待黑人女孩的只能是厄运。托尼的最佳小说为《所罗门之歌》(1977),这是一部具有强烈象征意义的黑人家史。作者在这部小说中对黑人方言和圣经典故的娴熟运用提高了小说的可读性、趣味性,因而受到包括白人在内的各阶层读者的青睐。此外,女剧作家洛伦·亨斯伯利的剧本《太阳下的葡萄干》(1959)曾首创黑人戏剧在百老汇上演的记录。

在所有黑人作家中,他们的一个共同希望就是希望世人都认识到黑人是具有全部人性的人。黑人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黑人愿望,抨击了美国的社会制度及美国社会的种族歧视,探索了黑

---

① 陈辽等著:《地球两面的文学——中美当代文学及其比较》,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 年版,第 161 页。

人在美国社会如何融合,如何保持"自我"的可行性。

犹太文学:美国当代作家中,犹太裔作家占相当大的比例,因而,犹太文学成为美国文化中一股极为重要的"文化支流"。犹太文学作品一般都具有古老的欧洲文化与现代美国文化的双重色彩,而这两种文化的冲突与交汇更使犹太文学增加了复杂性。犹太人的教义、俄国对犹太人的"集体迫害"(Pogrom)、希特勒的大屠杀(Genocide)使犹太作家产生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同时流浪感、飘泊感以及美国的异化社会使犹太人难以找到归宿。因此,寻找"身份"(self - identity)便成为他们作品中的一个突出的主题。

美国犹太文学发展至今已先后涌现出许多世界级的作家,如辛格、贝娄、梅勒等。40 年代以前,犹太文学家的作品着重描写犹太移民在美国大熔炉中的同化过程中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古老民族习俗的眷念。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希特勒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使犹太人问题引起美国公众的关注,因而战后犹太文学作为一种流派在美国受到了重视,出现了专门研究它的理论专著。50 年代后,犹太人与非犹太人的通婚使犹太文学又增加了新的题材,即"婚姻同化"。但由于第三代和第四代美国犹太人正在日益与基督教文化同化,犹太传统在美国已被大大削弱。因而,作为反映犹太人生活的犹太小说也受其影响,逐步衰弱。尽管如此,二战后犹太文学的繁荣在美国文学史上是有目共睹的。

当代最杰出的犹太小说家首推索尔·贝娄(Saul Bellow)。他是一位博学善思、见解精辟,、思维敏捷、异常勤奋的学者型作家。贝娄对人在现代社会的处境尤为关心。在贝娄看来,现代社会已被金钱、权力和幻想所败坏,理性奄奄一息,人无法掌握或改变自己的命运。因而在他的作品中,他主要描绘包括犹太人家庭在内的现代大都市的当代美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在创作手法上,贝娄在坚持以现实主义为主的同时,不拘一格,博采众长。在探索人物心理活动时,他大胆而娴熟地运用意识流技巧。

在叙述上,他大都用第一人称,给读者一种真实感。他的小说开门见山,情节展开迅速,吸引力很强。他的文字造诣很深,语言生动活泼,方言俚语荟萃,极富表现力。他的作品开头常给读者一种随便轻松的印象,但下文却往往潜伏着滑稽荒唐或其他始料未及的内容。

另一位与贝娄齐名的犹太作家为艾萨克·辛格(Isaac Singer)。辛格的创作与其他犹太作家不同,他坚持运用行将死亡的意第绪语言进行创作。他的作品主要描写生活在19世纪波兰和20世纪美国社会的犹太人。辛格是一位多面手,不仅擅长长短篇小说,而且写剧本、儿童故事和自传以及将一些德国名著译成英文。在辛格的所有作品中,短篇小说写得最成功。他所创作的短篇小说集反讽、机智、智慧为一体。《傻瓜吉姆佩尔》(1957)、《市场街的斯宾诺莎》(1961)和《短暂的星期五》(1964)为其短篇的杰作,深受读者的喜爱。辛格的文笔优美,轻松自如,语言朴素简洁。辛格一生创作的作品达30多部,作品的主人翁覆盖拉比、医生、教师、学生、作家及各类社会小人物。作者在其创作的作品中毫不掩饰他对犹太人的挚爱和同情。1978年辛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表彰他对世界文学的贡献。辛格对意第绪语言的继承和发展使这一古老而富有民族特色的文字得以流传。

犹太文学的存在与发展是对美国主流文学的一种补充。一方面它对犹太文化在美国社会赢得一席之地打开了通道;另一方面,它对犹太人如何融入美国主流社会起了一个路标性的作用。犹太文学的衰荣从一个层面展示了美国族裔文学发展的艰辛,证明了美国社会在融合各民族文化的同时也保留了各民族文化。这种"融合"与"多元"的并存正是美国文化的特色,它使美国人在遭遇文化冲突的同时也孕育和培养了"宽容"精神。

墨西哥裔文学:墨西哥裔美国文学的出现与19世纪40年代美墨战争密切相关。这次战争使美国得以占领今天的加利福尼

亚、内华达、亚利桑那、犹他、新墨西哥和半个科罗拉多等州。而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墨西哥人自愿留在原地，成为美国最早的墨西哥裔美国公民。后来墨西哥移民源源不断地移居这一地区。由于美墨两国唇齿相连，便利的地理优势使墨西哥人方便地穿梭于美墨边境，这为他们对母国保持强烈的民族认同，对美国主流文化持观望态度提供了条件。

在墨西哥人的社区里，西班牙语是社区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但随着墨西哥移民的第二、三、四代对美国社会主流文化的认同加速，他们在尽可能保留母国传统的同时也无法避免地接受了美国白人文化。墨西哥裔美国文学也同样受制这种"同化"与"反同化"思潮的影响，在创作中常常流露出这种"矛盾"的心态。

墨西哥裔美国文学发展的历程缓慢而又执着。至二战期间，墨西哥裔文学才真正被美国社会所认可。女作家何塞菲娜·尼格里(Josephina Niggli)的短篇小说《墨西哥乡村》(1945)以其丰满的浪漫主义情绪，自然主义的真情流露赢得了众多的白人读者。这位女作家借助墨西哥传说作为小说创作源泉，在写作中运用各种各样的谚语和大量的西班牙文中的句法和成语，生动而真实地描述了生活在北部山区的墨西哥人。《墨西哥山村》给美国广大读者打开了一扇了解墨西哥人的窗口，它是拥有美国白人读者最多的第一部墨西哥裔美国小说。[1] 继何塞菲娜之后，墨西哥裔美国小说开始从描写墨西哥境内的墨西哥人转向描写居住在美国境内说西班牙语的墨裔移民。1959 年何塞·维拉雷阿尔(Jose Villarreal)发表了长篇小说《美籍墨西哥人》，生动地追溯了胡安·鲁比奥一家的变迁史，叙述了胡安如何放弃墨西哥革命，迁居加利福尼亚，如何无可奈何地看到美国文化和生活方式在不经意中影响和同化他的家庭。作者借助小说主人翁之口，向读者诉说墨西哥裔美国人

① 陈辽等著：《地球两面的文学——中美当代文学及其比较》，第 165 页。

在美国的尴尬处境和墨西哥文化所面临的困境。

1967年,著名的第五太阳出版社成立,它为正在崛起的新一代墨西哥裔作家提供了创作条件。由该出版社推出的作品一改传统的文学公式化创作手法,追求美学趣味,同时又不脱离墨西哥民间传说和文学传统,努力探索符合美籍墨西哥人的政治、社会和文化需求的新艺术形式。以鲁多尔弗·阿纳亚(Rudolfo Anaya)的处女作《保佑我,乌尔蒂马》(1972)为例,它以墨西哥裔社区为背景,考察了二战后墨西哥裔美国人乡村文化变迁的内外原因,指出墨西哥裔美国人的当代文化是西班牙、印地安和白人文化的复合体,认为正是这3种文化的互融并不总是水乳交融,因而所产生的文化冲突是墨西哥裔美国文化"异化"的根本所在。

80年代的墨西哥裔美国作家开始从文化视角和塑造典型的创作向自我反省转轨,同时也加大了用英语写作的力度,读者群也因此大为扩展。但由于美国社会仍是一个以白人文化为主流文化的社会,因此,墨西哥裔美国文学作为美国支流文化中的一股涓涓溪流时刻面临着被白人文化同化的威胁。所幸的是美国双语教育的传统,西班牙语在美国的第二大语种的地位以及美墨的相邻,使墨西哥传统文化得以保存和发展。

美国族裔文学的存在和发展丰富了美国文学,开拓了美国人的视野,熔炼了美国人对异国文化的宽容精神,铸造了美国社会多元文化的格局,缓解了美国各族裔集团之间的矛盾,促进了各族裔之间的理解。它作为一种看不见的"软力量",为完善美国"民主、平等、自由"精神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和贡献。

南方文学的发展

在美国,用地方人物和背景作为严肃小说素材是20世纪30年代的事情。它把美国各地各阶层人民都列入小说题材,在美国小说中形成了一股积极的力量,玛格丽特·米切尔的《随风而逝》

(又译《飘》)就是最突出的典型。地方文学家们通过他们自己的笔向广大读者展示了美国多元化的社会及多元化社会下的多元文化与多元生活方式。在地方文学中,南方文学可谓是一支独秀。

在20世纪20年代末,美国南方产生了比美国任何其他地区更多和更好的作家,至少有12位作家享有国际声誉,其作品给人以思想启迪和娱乐消遣。虽然南方文学只是美国许多地区所产生的普遍性文艺复兴的一部分,但却有其独特性。南方作家认为他们的地位是定在区域性写作上,因为在等级制度森严的古老南方,作家是没有社会地位的。在20世纪的最初几年,南方文学复兴的领导人是在比较孤立的情况下进行他们的工作的。

南方文学以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为鼻祖,他享有地方文学"大手笔"的称誉。福克纳出生于密西西比州北部,一生大部分时间居住在他的家乡牛津镇。这位自然主义作家和地方文学作家把他的作品深深地扎根于他想象的密西西比州的泥土中。在他的创作作品中,他多以他居住的地方为写作背景,描写家史和地方传说。在对待黑人的态度上,福克纳比其他南方白人作家更公正。他的早期作品在描写黑人上避开了传统的感伤笔调,转向对黑人心理的描写,对奴隶制问题的思考。

福克纳是美国文学史上最了不起的一位文学实验家,一位具有令人眼花缭乱的精湛技巧的作家。他既拥有马克·吐温的那种粗野、反常的幽默技巧和特色,又具有艾略特的那种复杂的象征主义色彩。他对意识流、倒叙、内心独白、曲折句法和错杂时序等手法的运用则完全是他自己的独创。他一生共创作了19部长篇小说和42篇短篇小说。他的几乎所有作品都以他自己杜撰的"约克那帕塔法"县为背景,一部小说中的人物可以随时在其他小说中出现。所以,他的作品既可以独立成篇,又可作为系列来读。这种独特的手法使他的作品充分发挥了家族世系小说的作用,读者可以对南方历史的各个阶段、南方社会的各个层面拥有一个系统和详

尽的了解。而他的“约克那帕塔法世系”小说已成为南方文学的中流砥柱。鉴于他对地方文学的杰出贡献，1950 年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美国第一位桂冠诗人、散文家、批评家罗伯特·佩恩·沃伦(Robert Penn Warren)也是南方小说家中的一位佼佼者。他所创作的作品主要揭露南方的黑暗、邪恶和罪孽。他常采用哥特式小说那种恐怖古怪的形式，语言夸张，形象生动。他的作品大多以真实的历史故事为创作的原材料，探索历史、时间和人的罪孽与不完美，因而他的作品充满了浓郁的哲理和宗教色彩。他的著名小说《国王的全班人马》(1946)曾获普利策奖。它以南方一个州长的发迹到被杀为基本线索，描绘了美国政界勾心斗角、争权夺利、互相残杀的惊人情景。作者通过这部小说向世人证明人是不完美的，多少带有一些罪过，即使清白无暇的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加深也必然会染上邪恶，失去纯洁。

南方文学在二战后继续发展，老作家福克纳、波特等仍有重要作品问世，新作家也不断涌现。著名的有威廉·斯泰伦(William Styron)和杜鲁门·卡波特(Truman Capote)，他们不再从历史的传奇里寻找题材，而是将视角转向现实生活中南方人精神上的苦闷。斯泰伦是在福克纳这位大师的影响下成长的。他的小说侧重研究美国南方人在工业化进程中的心理变化，是典型的心理小说。1967 年，斯泰伦以 19 世纪美国黑奴领袖奈特·特纳为原形，创作了《奈特·特纳的自白》。作者的高超写作手法使该书问世后轰动一时并获得普利策奖。由于作品有鄙视、丑化黑人之嫌，因而引起了黑人知识分子的强烈愤慨和尖锐批评。此外，斯泰伦还是名著《索菲的选择》(1979)的作者。此书与存在主义哲学和荒诞派戏剧有异曲同工之处，认为世界已经疯狂，荒谬绝伦，毫无意义，惟一的选择就是死亡。

卡波特也是一位知名度很高的南方作家。他早期主要写南方

哥特式小说，作品弥漫着孤独、颓废和伤感。他的两部长篇小说《其他的声音，其他的房间》(1948)和《草竖琴》(1951)以南方为背景，人物古怪邪恶。50年代末，他移居纽约并对新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59年，他从《纽约时报》上读到一篇关于谋杀案的简短报道后，便萌生了将新闻写作真实具体的特点同小说创作的细腻刻划和任意虚构结合起来的愿望。他在案发后的第三天便赶往出事地点，进行认真而又详细的采访和实地调查。经过6年之久的不懈努力，他终于写出了类似新闻体裁的小说《残杀》(1966)。它用小说的形式将谋杀案的来龙去脉及法庭审讯准确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这一写作方法后来为不少作家所效仿，终于发展出一种新的小说流派"新闻体"小说。

20世纪美国南方文学的异军突起主要深受两种因素的影响。一是南方农民善讲故事的天赋。少年福克纳就深受其外祖母的故事的影响，以致他后来决心致力写作。二是南方的文学传统和特殊性。在工业化以前，南方在美国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很多奴隶主保持着原来在英国的贵族生活方式，如当时弗吉尼亚最有影响的绅士威廉·伯德家藏有近4000册从欧洲运来的图书。这些把自己的生活寄生在奴隶的痛苦之上的有闲阶层，有时间、金钱和精力去接受高层次的教育，专心致力于文学作品的研究。内战前夕的南方小说与20世纪的南方小说有其共同之处。作品大都以小城镇、乡村为故事背景，展示人与人、人与动物、普通人与政客之间的关系。作品还以轶事趣闻为写作主线，向读者展示了一幅幅南方生活的风俗画。内战后，"新南方"作家在继承前辈文学遗产的过程中，开始以一种新的眼光来审视南方以及整个美国的未来。其间，乔治·凯布尔(George Cable)开始意识到黑人问题的严重性。他的两部小说《寂寞的南方》和《黑人问题》对南方的黑人问题作了严肃的考察和叙述。如果说19世纪南方文学的基点是满足和反映一个正在开化的南方社会，那么20世纪

的南方文学在继承文学传统的同时则对传统文学中的虚构作风进行了批判。他们的写作手法大多以反讽、务实及积极向上的精神为主。在创作中,他们一方面眷念南方这片故土,另一方面又痛斥它是产生过蓄奴制的"受了诅咒的土地";一方面谴责老一辈庄园主的腐朽和道德沦丧,怨恨他们的恶习对子孙后代的有害影响,另一方面又渲染他们固执的个性所包含的威严。根深蒂固的基督教加尔文主义关于人类堕落与原罪说使南方作家的作品透视着一种身不由己的负罪感与恐惧感,给南方小说罩上一层压抑、恐怖、情节怪诞且充满暴力和邪恶的浓雾。正因为如此,南方文学给史学家、政治家研究南方历史、政治结构提供了宝贵的参考文献和史料,它对美国政府协调南北文化差异所引起的冲突也起到了路标性的作用。

美国戏剧

从1912年起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新一代作家给美国小说、诗歌、戏剧和文学批评等各个方面带来了非凡的繁荣,这是继美国19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美国文学史上的第一次文学繁荣后的第二次文学繁荣。它与第一次繁荣相比,范围更为广大。最为明显的是,在第一次繁荣的作家群里没有剧作家。如果说19世纪的美国作家库柏、马克·吐温、惠特曼、爱默生、梭罗开始在世界享有声誉,那么,20世纪的美国剧作家则使美国文学成为世界文学中的一个组成部分。1936年美国戏剧之父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l)获诺贝尔文学奖,把美国戏剧推向发展高潮。此外,以百老汇为代表的美国戏剧对美国戏剧的大众化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20世纪美国戏剧运动和戏剧高潮的发展中,以黑人戏剧为代表的族裔化和分裂化倾向是一个重要的现象。其中有代表性的戏剧群落如犹太戏剧、墨西哥裔戏剧、亚裔戏剧、西班牙语系戏剧

以及妇女戏剧等。这些戏剧群落是在二战后发展起来的。在所有的族裔戏剧群中，黑人戏剧的历史最为悠久，创作成就最高，对美国戏剧的多元发展贡献最大。

从1914年至1925年的10多年中，与美国诗歌和小说趋于成熟相结合，认真研究戏剧的兴趣也在美国形成了高潮。在20年代至30年代，优秀的戏剧剧本几乎把所有的社会、政治、哲学和伦理道德都加以讨论，年轻的美国人从这些戏剧中受到了教育。

20世纪最初的10年，观众看戏是为了消遣。他们需要的是精湛的演技和大团圆的收场而不想讨论思想。但那些一心要改革美国戏剧的狂热年轻人置戏剧界的垄断于不顾，创建了自由剧院和艺术剧院。截至1924年，全国共建立了这类剧院500多个，拥有观众50万之多。[①] 1918年底，华盛顿广场剧院的一些富有经验的人组织了戏剧协会，这是美国前所未有的最有影响的戏剧界组织，其创建的目的就是要以猛烈的声势占领百老汇，成为百老汇的强劲竞争者之一。协会资助成立了团体剧院，它是由演员、导演和剧作家紧密结合的组织，采用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方法，在演出之前不断进行排练，直到台词、姿势和动作的每一个细微差别都得到体现并协调一致为止。协会还采用灵活的措施，将售票制改为套票，每年以优惠的价格向老顾客一次出售6张戏票，以解决协会创建初期的筹款问题。协会的另一项明智措施就是在专业剧院中设立剧本阅读部，以收集欧洲上演的剧目为主要目的。[②]1919年，当英国剧作家肖伯纳想为他的《伤心之家》在大西洋两岸寻找上演机会而陷入困境时，协会排演了这部戏，结果在财政上和艺术上大获成功。1928年美国戏剧大师奥尼尔也带着他的《富商马可》加入了协会。

① 威勒德·索普：《二十世纪美国文学》，（濮阳翔、李成秀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75页。

② 威勒德·索普：《二十世纪美国文学》，第76～77页。

1935年联邦剧院建立，并成为美国最大的剧院。创立联邦剧院是罗斯福新政计划的一部分，目的是为失业演员和剧院技术人员提供工作的机会。该剧院最多的时候曾雇佣100万工作人员，在40个州经营剧院。[①]联邦剧院上演各种各样的戏剧，从古典剧到现代剧；从舞剧到音乐剧；从宗教剧到儿童剧。这些戏剧在经济萧条时期关闭的剧院、公园、公共礼堂、教堂和学校礼堂演出，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欢迎。《联邦剧院杂志》曾评论说："我们是公园里的大篷车剧院，山坡上的莎士比亚剧院，咸水湖边的吉尔伯特和沙利温剧院，帐篷下的马戏团，卡车上的托勒剧院。在加里钢厂，我们是为儿童演出的剧院；在俄克拉何马州，我们是为盲人演出的剧院。我们是巡回于民间护林保卫队的营地之间，巡回于洪泛区以及在学校、操场、监狱、感化院和医院里演出的戏班子、歌舞喜剧戏班子和傀儡剧戏班子。"[②]由此可见，联邦剧院对普及戏剧、促进戏剧大众化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但在30年代的美国社会病态的"恐外症"和"红色恐惧"的包围下，国会以联邦剧院涉嫌"共产主义"为名，于1939年解散了联邦剧院。尽管如此，在美国戏剧史上，30年代和40年代被公认为美国戏剧史上的鼎盛时期。

50年代之后，美国戏剧发展重镇——纽约百老汇戏剧中心在美国社会盛行的实用主义和消费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开始向商业化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麦卡锡的极右保守势力的病态恐外心理和对非美国主流文化的排斥行为对美国戏剧的正常发展影响巨大。60年代后，随着麦卡锡主义的消遁，民权运动兴起，戏剧界的年轻人开始对父辈灌输给他们的社会价值观提出质疑。期间，年轻人既不满足追求物质享受的生活方式，又担心某一天会被军队征募去越南战场，因而出现了一种背叛心理和反抗心理。在戏剧

① 威勒德·索普：《二十世纪美国文学》，第104页。
② 同上。

界，一时间荒诞剧和先锋剧风靡全美。这种置传统文化而不顾的反叛性戏剧一方面打破了自50年代开始的美国社会"和谐一致"的神话，复兴了美国核心文化"个人主义"，构建了美国戏剧界百花齐放的局面，但另一方面，这种极端的"个人主义"的复苏也导致了无政府主义的泛滥，使60年代和70年代的美国戏剧时而呈现出一种乌烟瘴气的局面。80年代后，这种局面有所好转，严肃剧开始在戏剧舞台上不断出现，但戏剧商业化的趋势却难以扭转。不过进入90年代，美国戏剧似乎大有回归之势，传统剧目和欧洲经典剧本不断在百老汇上演。

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是美国戏剧史上的鼎盛时期。在这一时期，尤金·奥尼尔的名字与美国戏剧发展史紧密相联并被公认为美国戏剧之父。奥尼尔是美国戏剧界最有才华的大师，他的第一部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剧本《天边外》在1920年上演时便获得巨大成功并为他赢得普利策奖。在20年代中期，评论家对他的评价是"随着尤金·奥尼尔的闻名于世，美国戏剧进入了成熟的年代。美国人再也不必向国外去寻求当代最优秀的作品了，本国的作品完全可以和欧洲所提供的最好作品媲美。"[①] 1936年奥尼尔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这一事实表明他的声誉在欧洲也得到了确认。

奥尼尔的独特之处是他很少借用别人的思想和写作技巧，他所写的剧本都是直接来自他对生活的观察。奥尼尔的父亲是一位有名的演员，奥尼尔在剧场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这一经历赋予他在调动观众情绪方面有不可思议的天赋。年轻的奥尼尔曾为逃避严父的管教离家出走，在海上做了几个月的水手。大海的神秘和残酷无情为他早期的戏剧创作提供了原动力。奥尼尔与他同时期的严肃作家一样，不满足于表面的现实主义，力图用非常规的方

① 转引自汪义群：《当代美国戏剧》，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8～10页。

式表现不寻常的现象和思想。但是，他的思想范围更广，所创造的方法更具有想象力。在现代戏剧的创造技巧方面，他是一位最坚持不懈的试验者。他的早期试验以《榆树下之恋》（1924）为始发点，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那些淳朴的、无家可归、没有根基的人物。对他们的苦难，奥尼尔进行了入木三分的刻划。作者的这种"由下而上"的戏剧创作手法改变了传统的"由上而下"的创作方向，因而得到了全社会的首肯和认同。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田纳西·威廉斯（Tennessee Williams）和阿瑟·密勒（Arthur Miller）两位美国现代大戏剧家开始问鼎戏剧。这两位创作风格迥异的戏剧家的崛起使美国戏剧界继奥尼尔时代后又出现了一个繁荣阶段。威廉斯的剧作和南方小说相似，常以南方为创作背景，着重描写美国社会中人的孤独和心理病态。在他的成名作《玻璃动物园》（1945）中，作者对一个居住在贫民窟的南方破落家庭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述。全剧弥漫着悲观、病态和不切实际的幻想。《欲望号街车》（1947）则对美国社会弱肉强食的现状进行了无情的揭露。由于这部作品的震撼力，好莱坞曾将其搬上了银幕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同威廉斯一样，密勒在戏剧手法上喜欢使用表现主义和象征主义技巧，但在对待世界的态度上，其立足点基本上是现实主义。密勒对社会现实问题特别关注，喜欢探索和表现人物的心理活动和人物同社会价值观之间的冲突。他的杰作《推销员之死》（1949）对美国社会道德准则的虚伪和欺骗性进行了无情地揭露。密勒通过对剧中主人翁推销员威利·洛曼悲惨结局的描写，说明了现代工业社会中人的生存困境和美国社会中普通人的悲剧。这部剧作在美国舞台上获得成功。80 年代初，密勒曾亲自来中国指导北京人艺排演该剧，获得了巨大成功。

作为一名犹太裔美国剧作家，密勒在麦卡锡主义时代曾受到国会非美委员会的传讯。在传讯中，他刚直不阿，大义凛然，拒绝

合作并为此蒙冤。1953 年,他以其自身受迫害的经历,创作了《严峻的考验》(又译《坩埚》),借揭露 17 世纪末美国殖民时代的宗教迫害暴行为由,影射麦卡锡主义的歇斯底里。在这部作品中,作者同时指出:美国的"熔炉时代"已失去其早期的"同化"功能。在美国戏剧界,密勒已成为继奥尼尔和威廉斯之后的剧界三巨擘之一

黑人戏剧是现代美国剧坛族裔化现象的重要代表。它主要有两个源头:其一,非洲传统的部落娱乐形式,它汇集民间故事、歌曲、音乐、舞蹈、滑稽摹仿等多种艺术形式,由黑人自己表演于小木屋、公堂和休闲广场等处。现存于新奥尔良的"刚果广场"就是黑人剧场的遗址。这些均是一种自娱性的戏剧雏形,后随着美国社会环境和文化生活的变迁逐渐丧失了原旨,沦落为帮衬白人庄园主寻欢作乐的工具。其二,对白人戏剧形式和内容的摹仿。最早将黑人题材搬上百老汇的是白人剧作家里奇利·托伦斯(Ridgely Torrence),他在 1917 年创作了《三部黑人戏剧》。该剧的演出效果因一战而受影响,但却鼓舞了其他白人作家创作黑人题材的戏剧。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黑人戏剧进入了一个"自觉时代",出现了表现民族个性、生活苦难、要求种族平等和人权解放的优秀作品,涌现出大量的黑人剧团和被主流社会认可的剧作家和演员。此外,作为一种象征,黑人戏剧、黑人演员开始进入百老汇,在美国最重要、最正规的戏剧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1927 年,由海沃德夫妇创作的黑人题材的民间戏剧《波吉》在百老汇公演时引起极大的轰动。剧作者用同情的笔调向观众——主要是白人——描述了他们视而不见的在星条旗下另一民族的生活画面,有力地揭露了种族歧视和资本主义制度所造成的罪恶。评论家认为它对黑人贫民窟生活的描写"不仅真实可信,而是那么丰富多采,那么辛辣动人,

那么充满震撼力。”[1]

美国现代黑人戏剧运动从20年代开始,汇入了以著名的黑人知识分子杜波依斯(W.E.B.DuBois)为首的种族解放启蒙者所掀起的声势浩大的“新黑人运动”中,它号召黑人兄弟勇敢地与白人价值观和思想决裂,以黑肤色为荣,用斗争去获得自己应有的人格尊严和社会地位。杜波依斯在他主编的《危机》杂志上撰文,呼吁在全国范围内推动小剧场的演出,上演那些“描写我们,由我们创作,为了我们,接近我们”的黑人剧作。[2]

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使一度繁荣的黑人音乐剧和黑人小剧场难以维持,许多黑人剧作家和艺术家被迫改行,这对刚刚起步的黑人戏剧打击甚大。1935年联邦剧院建立,特设了黑人部,并于1936年开办了黑人剧作家训练班,对提高黑人剧作家的素质,增加他们的族裔意识发挥了积极的作用。30年代中后期重要的黑人剧作家大都是由联邦剧院培养出来的。

霍尔·约翰逊(Hall Johnson)是30年代崭露头角的作家,1933年由他创作的《跑,小孩子们》在百老汇连续公演达3个月之久。该剧讲述了黑人文化与原始文化冲突的故事,剧中穿插了大量的黑人灵歌、民谣、音乐和宗教舞蹈,强烈地展示了黑白两种文化、两种神话之间的冲突和斗争。黑人戏剧运动活动家、30年代戏剧创作成就最高者兰斯顿·休斯(Langston Hughes)曾为促进黑人戏剧而努力,在纽约、洛杉矶和芝加哥建立了3个黑人剧场。休斯本人既是记者,又是诗人和小说家。1935年,他根据自己的小说《父与子》改编的《混血儿》在百老汇公演,一举成名。该剧通过混血儿两难窘况,反映了以血液为标志的黑白文化的冲突,再现了南方种植园生活图景,在百老汇连续演出373场,1950年还被改编为歌剧

① 转引自周维培:《现代美国剧坛上的黑人戏剧》,载《南京大学中文学报》1998年刊,第50页。

② 周维培:《现代美国剧坛上的黑人戏剧》,第52页。

《障碍》。休斯的其他作品如《你难道不要自由?》(1937)追述了黑人种族的苦难史,吹响了争取黑人民权的号角,为60年代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战后,美国黑人戏剧曾经历了短暂的沉寂。进入50年代,随着黑人民权运动的高涨,黑人戏剧创作和演出也进入了最活跃、最丰收的历史时期,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剧作家和作品并开始在许多方面,包括普利策戏剧奖的获得与白人作家分庭抗礼。黑人戏剧在促进美国戏剧大众化、多样化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它所取得的丰硕成果表明黑人亚文化是对美国主流文化的最好补充。

第四章 娱乐业的王国

美国历史虽短,但却为人类贡献了种类繁多、赏心悦目的娱乐形式。在早期殖民地时期,宗教上的清规戒律以及开拓的艰辛阻碍了群众性娱乐活动的发展,移民的业余生活只是在几个走乡串村的流动戏班的演出中度过。在整个18世纪,许多美国人坚持认为看戏就是沉溺于俗务,是有罪的。林肯夫人的好友、牧师菲力普·格里(Phillip Gerry)博士在林肯遇刺身亡后曾议论说:"我们哀悼的总统竟倒在一家戏院里,真是令人遗憾。......他的朋友最不愿意想到他会死在戏院......这罪恶的渊薮、腐败的温床,那里成千上万的人不断染上恶习,寻欢作乐,愚蠢放荡,纵情声色,低级下流,声名败坏,道德沦丧。"[①] 格里博士的言论让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19世纪美国人对娱乐业的极端偏见和美国娱乐业落后状况的根源。但这一局面进入20世纪以后有了根本的改观。美国发明和创造的工业时代的娱乐形式——电影、电视和流行乐风靡全球,牢牢确立了美国作为世界娱乐王国的地位。

电影与大众文化

在世界电影史上,"法国是电影故乡"的这种说法广为流传。但美国却认为早在1889年,大发明家爱迪生及其助手狄克逊就已

① 卢瑟·S·利德基主编:《美国特征探索》,(龙冶芳、唐建文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84页。

成功地试制成功了初具现代摄影机雏形的设备，并在 1893 年芝加哥万国博览会上向观众展示了一套名为“电影视镜”的放映装置。由于这种电影视镜仅能供个别观众单独观看，因而与法国卢米埃尔兄弟于 1895 年 12 月 28 日展示的经银幕投射、供一批观众集体观看的电影存有一定的差距。但爱迪生公司很快便研制出经过改良的“维太放映机”，并于 1896 年在纽约一家杂耍剧场举行首映，从此电影开始成为美国精神的一种表现方式，美国人民生活的一部分。

20 世纪初大量新移民涌入美国为电影观众市场提供了发展潜力，极大地刺激了美国电影业的兴盛。20 世纪初无声电影因其廉价性、通俗性而一跃成为新移民和劳工阶层喜闻乐见的大众性消费文化。1905 年《火车大劫案》开创了无声电影的时代。同年，匹茨堡市出现了一家由杂货铺改建的美国首家“镍币影院”，因其一张门票仅需 5 分钱，美国人便将此类电影称为“5 分钱电影”。

川流不息的观众，业主鼓胀的钱包使这一新兴的娱乐行业在短时间内犹如星火燎原，遍布全国各地。到 1907 年，国内已有 5000 家镍币影院。为什么镍币影院有此神速的发展势头？其原因有 3：第一，同化新移民的需要。20 世纪来自东南欧落后国家和地区的新移民苍白的教育背景，窘迫的经济状况及不同的宗教信仰阻碍了他们在美国向上流动和对美国认同的速率。为加速这些新移民的同化步伐，向他们灌输美国社会传统价值观，美国的主流社会积极支持“5 分钱电影”的发展。第二，廉价性、通俗性、大众性。5 分钱电影以其通俗、简练、易懂的方式取悦观众，获得新移民的好感和认同，观众如织。第三，丰厚的收入。观众的支持，市场的可拓性使商人对“一本万利”的 5 分钱电影产生浓厚的投资兴致，开发 5 分钱电影市场一时间成为一些精明商人的一种时尚。5 分钱电影的发展一方面展示了美国娱乐业大众化的走势，另一方面也加速了新移民的同化速率，对美国社会的稳定起了不可估量

的作用。因而，在20世纪上半叶，5分钱电影被视作“穷人散心的地方，文盲受教育的场所，普及宗教信仰的厅堂”。

20世纪初，美国电影业主要被爱迪生、比沃格拉夫、维太格拉夫3大电影公司所垄断。1910年前后，大批俄国的犹太人涌入美国。这些犹太大小商人对电影的利润窥视已久，不满于这种“电影垄断”的局面。为抗衡“电影专利公司”，他们以独立制片商身份涉足电影界，客观上给美国电影造成一种充满活力的竞争格局。从1908年到1914年，资金的大量投入、剧烈的竞争、技术上的重大革命使美国电影进入急剧发展而又混乱的时期。在这无序的竞争格局中，有3件事对日后美国电影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一，电影制作中心的西移。在美国电影发展初期，纽约是前述3大电影公司的大本营。1909年1月，9家重要制片厂家、发行商和影片进口商以这3家电影公司为龙头，成立了“电影专利公司”，以控制和垄断所有美国电影的生产。这种电影托拉斯遭到全国各地的激烈反对。为摆脱垄断的控制，独立制片商将制片基地从东部移往加州洛杉矶郊区的一个小镇。该小镇傍山面海，阳光充足，多种多样的自然景观为美国早期电影依赖日光拍摄的局限性提供了天然的便利条件。另一鲜为人知的原因是该小镇离墨西哥边陲仅一箭之遥，法院的传票和禁令来了可一走了之。因此，到1913年时，洛杉矶郊区已发展成为初具规模的电影摄影基地并从洛杉矶市划分出来，拥有“好莱坞”这个法定的名字。东西电影制片中心的对峙格局随着好莱坞的崛起、兴盛，终以“西风压倒东风”而结束，“好莱坞”一词成为美国电影的代名词。

第二，“明星制”的建立。美国早期电影演员的社会地位低下，常受制于传统的偏见及老板的控制，因而在银幕上常常以假名出现。1910年，“明星制”始作俑者，环球公司老板卡尔·莱姆尔发现一位名叫范兰·迪的演员在死后却有许多人为他送葬，卡尔由此获得灵感。为打开影片销路，他不惜以高薪聘请原属比沃格拉夫公

司名下的女演员费洛伦斯·劳伦斯。卡尔在1910年3月推出劳伦斯主演的新片之前,精心策划"劳伦斯车祸丧生"的假新闻,然后以"辟谣"方式将劳伦斯主演的影片推向观众,成功地捧出了一位供影迷崇拜的明星偶像,使票房收入爆增,"明星制"也由此产生。

在"明星制"下,影片制作、编导、摄影均环绕明星转。制片人以各种宣传手段捧红明星、制造明星,在明星周围形成一个固定的影视群,使观众最终到影院的目的是为了看明星,因此明星决定了影片的票房价值。"明星制"的建立使电影成为一种艺术,它不仅改变了美国社会传统的偏见,提高了演员的社会地位,改进了美国电影的质量,同时也带动了各类电影杂志的发行。"明星制"在日后的运作中逐渐演变成为电影生产的正规制度。即使在今天,"明星制"仍然作为美国电影事业的主要因素之一而存在。

第三,多本故事片的投产。在东部电影垄断时期,他们长期只致力于拍摄长度仅为10分钟的单本短片,使美国电影的叙事容量与艺术探索深受束缚。这种保守僵化的电影格局遭到富有开拓精神的独立商的挑战。他们除了转向欧洲国家引进高质量的艺术影片外,还计划摄影多本长故事片。短片与长故事片的竞争局面标志着电影制片新世纪的来临。大规模的电影业随着好莱坞、明星制、长故事片的发展、完善而欣欣向荣。至1914年,电影事业为托拉斯争夺战和大众对故事片的新狂热所刺激,在电影制作、发行和放映领域有了前所未有的扩张。1915年10月,美国最高法院根据《反托拉斯法案》宣告解散"电影专利公司",这场由独立制片商与"电影专利公司"展开的竞争以前者的胜利而告终。在更为公平的市场竞争中,美国电影业进一步繁荣与成熟。到30－40年代,美国电影进入了黄金时代,著名的8大公司雄踞好莱坞,控制了美国电影发行量的95%,其中派拉蒙、华纳、米高梅、20世纪福克斯、雷电华5大公司直接掌握70%以上的首轮影片播放权。

在这个由原来独立制造商组成的强有力的新托拉斯中,一批

称作“外籍军团”的重要导演令人刮目相看。这些祖籍欧洲的移民一部分是早期美洲拓荒者的后代，一部分为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先后从欧洲各国流亡到北美的艺术家。导演来源的多元化带来了多种民族文化的交汇互补。这种人才优势使好莱坞产品避免了“近亲繁殖”的弊端，而其影片再现的各国风格则使美国电影很能适应全世界观众的口味，为好莱坞影片走向世界奠定了基础。在这批“外籍军团”中，最负盛名的要数德国的刘别谦，他以善拍男女生活题材的“雅致喜剧”而赢得了美国中产阶级观众的青睐。《一夜风流》的导演、意大利人卡普拉；《卡萨布兰卡》的导演、祖籍匈牙利的寇蒂芝；《蝴蝶梦》的导演、祖籍英国的希区柯克，他们的盛名至今仍被人们所传颂。

1914 年，美国电影导演之父 D. W. 格里菲斯(D. W. Griffith)拍摄了第一部史诗片《一个国家的诞生》，该片为电影这种艺术形式奠定了基础。1928 年华纳兄弟影业公司发行了第一部足本纯正有声片《纽约之光》，它的成功给电影业带来了一场革命。从 20 世纪初的默片到 20 年代的有声影片，美国电影的类型也开始由简单的喜剧单片向内容充实、情节复杂、类型多样化的长故事片过渡。促使这场转变的重要因素是 30 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在大萧条期间，为遭受经济危机煎熬的美国观众提供片刻的愉悦，缓和其对社会现状的不满，在制片人的操作下，各制片厂像工厂流水线一样高速运转，源源不断地制造出适应各类观众口味的类型影片，好莱坞也因此有了“梦幻工厂”之名。这一时期好莱坞出品的类型片主要有喜剧片、西部片、强盗片、音乐片。

喜剧片也被称作“疯颠喜剧”或爱情喜剧。由费兰克·卡普拉拍摄的《一夜风流》(1934)是这一时期的喜剧影片的最初范本。它确定了一种新的风格，其的主题也成为 30 年代上百部爱情喜剧片的样本。这类作品更多关心的是人物性格的完整性，它把故事置入一个不确定的虚构空间，剧情和人物开始以对抗性的叙事布局

展开，将滑稽戏和社会讽刺结合起来，最终达到主题的效果和目的。在美国喜剧发展史上，独立于好莱坞商业片主潮之外的卓别林以“含泪的笑”这一独特的美学风格，奠定了其喜剧大师的地位，同时也提高了喜剧片的品位，使喜剧成为世界电影宝库中不可多得的雅俗共赏的精品。

西部片即牛仔片，它是土生土长的美国货。场面多以西部的荒茫原野为背景，人物多选择具有传奇色彩的牛仔，摄影定格在牛仔跃马驰骋、持枪格斗的场面，以展示美国人开发西部的那种史诗般的神话。这类影片的题材多取自于西部文学和民间传说，以神话的手法再现历史，创造了一种理想的道德规范，展示了美国人的民族风格和民族精神。1905 年拍摄的《火车大劫案》便是最早的西部片。西部片的发展分两个阶段：一个是“马戏”阶段，这一阶段拍摄的影片故事情节仍十分粗糙。另一阶段是较为细腻的阶段，这一时期的影片情节以迎合观众的口味为主，辅之以对主人公的心理描写。约翰·福特的《驿车》(1938)被公认为西部片的代表作。这部影片既即表现了个人英雄主义，也展示了美国人的伦理和道德规范，同时又宣扬了一种美国式的社团精神。

强盗片与西部片有相同之处，片中也穿插强烈的追逐与持枪格斗的暴力场面，剧中主角大多是类式西部片牛仔那样具有复仇心理、强悍而又孤独的男人，以借助“硬汉”形象展示了一种“力量”。但与西部片所不同的是，西部片强调的是大自然与文化的关系，而强盗片则突出了社会秩序的冲突。30 年代强盗片最为突出的代表作为茂文·洛埃导演的《小凯撒》(1930)、威廉·威尔曼导演的《人民公敌》(1931)和霍华德·霍克斯导演的《疤眼大盗》(1932)等。这类影片的最大特色是人物原形大多来自当时报纸的头条新闻。在摄影风格上，影片常采用半记录片式的手法来加以表现，因此人们常将强盗片的历史视作美国社会的犯罪史。

音乐片的诞生与有声影片的问世同步，因而它在有声影片的

初期最为盛行。最早银幕上的音乐片就是照搬百老汇的东西，后来则发展为一种特殊形式的类型片并在40～50年代走向顶峰。音乐片把音乐与叙事相结合，借助歌舞展开故事情节，以一种特殊的演出形式体现影片的内容，颂扬美的东西，痛斥丑恶的行为。这种音乐电影的叙事方式迎合了大众的口味，为美国电影成为大众化娱乐作出了贡献。美国第一部有声片《爵士歌手》(1927)就是一部音乐片。从《雨中曲》(1952)到《俄克拉荷马州》(1955)，再到《卡巴莱》(1972)，音乐片不断涌现出来。以1959年在纽约百老汇上演的同名歌剧为母本，1965年拍摄的《音乐之声》则把音乐片推向顶峰，该片获得同年美国奥斯卡最佳影片奖，并多年高居票房收入榜首。

美国当代电影题材主要分为3大类，一类是宣传个人奋斗和英雄主义的影片，它代表一种美国精神。在这类影片中，《洛奇》(1976)是一例典型的小人物通过自我奋斗而登上拳王宝座的浪漫故事，歌颂美利坚是一个充满机会的国度，反映了千百万美国人的真实欲望。“硬派明星”史泰龙、施瓦辛格正是凭借此类影片成为全球亿万观众崇拜的偶像，为70年代的美国走出越战的阴影间接出力。另一部代表性影片是1997年出品的《空军1号》，它以美国总统座机被恐怖分子劫持，总统留守座机与恐怖分子展开斗智斗勇的故事为线索，向人们展示“个人英雄主义”是美国上至总统、下至庶民的民族精神。

第二类影片题材以科幻手法宣传“惩恶扬善”的现代神话。这类影片常以高技术合成的手段，展示人类无穷的想象力。《星球大战》(1977)开创了科幻片的历史先河。此后《超人》、《蝙蝠侠》、《侏罗纪公园》、《龙卷风》、《大白鲨》等豪华型科技娱乐片风靡全美，它不仅给制片商带来了巨额的收入，还展示了高技术时代的美国人的一种“超现实主义”的生活态度。

第三类影片是70年代后期制作的以时事为创造源泉的写实

片。在这类写实片中，最热门题材首推越战片。《现代启事录》、《归来》、《猎鹿人》、《生逢7月4日》等，把美国人对这场战争的反思推向一个新高度。另一类写实片的热门话题主要涉及家庭伦理、两性关系、离婚、代沟等日常生活领域，如《克来默夫妇》、《廊桥遗梦》等。这类洋溢着亲情与温馨、伦理与道德的情节剧贴近生活，既赢得了观众的认同，又促使观众思考、探究现代人在情感归宿和伦理道德的两难生存处境。这类影片的出品表明美国社会在经历了60年代与70年代的风风雨雨后，在价值观取向上开始有向传统回归的趋势。

1998年20世纪福克斯公司耗资近3亿美元拍摄的本世纪末大片《泰坦尼克号》，凭着基于一个历史事件而杜撰出来的激情荡漾的爱情故事为主线，唱出了一曲爱的挽歌，赢得了亿万观众的青睐，成为这代人心目中的《飘》。影片上映后的票房收入突破十几亿美元，创下了历史最高记录。影片着力用真情呼唤道德回归，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美国《新闻周刊》记者夸张地说："如果把观众看《泰坦尼克号》流下的眼泪汇集起来，形成云雨，厄尔尼诺现象中的云雨也难以与之相比"。《泰坦尼克号》就像当年格里菲斯的无声影片一样，把人们带入了一个新的境界，向青少年发出了感情回归的呼唤。《泰坦尼克号》现象反映了一种新的文化动向：把反映正确的道德感情放在首位，以适应目前公众的心理要求和欣赏口味。影片对道德的重视超过对感情的重视，它向玩世不恭的花哨俗气行为提出了挑战。该影片获得11项奥斯卡大奖。这一现象表明奥斯卡奖与好莱坞电影，商业文化与美国大众心态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美国电影的发展与电影审查制度的确立有着密切的关联。20年代初，美国电影充满声色犬马的诱惑以及若干明星的桃色新闻，遭到宗教势力的指责。为平息这种指责，1931年，一位虔诚的清教徒、共和党议员威廉·海斯与耶稣会神父埃尔·劳德草拟了《伦理

法典》，即后来的《海斯法》。《海斯法》严格规定电影不准表现床上镜头；不准有暴力、残废镜头；影片内容应表现上等阶级生活；法律不应被嘲弄；必须维护婚姻与家庭制度的神圣性；不可丑化任何宗教信仰；决不同情违法者等12大类内容。从表面来看，《海斯法》起了限制低级、色情影片的作用，而实际上"对于海斯本人来说，《海斯法》既是一种目的，也是一种手段，它把电影变成一种颂扬美国生活方式及其主要工业产品的工具"。

与《海斯法》的负面制约相对的是"奥斯卡金像奖"的设立，这一正确的导向激励了电影创造工作者的功利欲望。1927年1月，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创立，1929年首届奥斯卡金像奖颁奖仪式在纽约举行。此后，评奖条例的日臻完善以及颁奖晚会转播方式的不断更新使奥斯卡奖的名声越出美国本土。尽管在角逐奥斯卡奖的过程中不乏商业动机及政治因素的渗透，这种评奖毕竟体现了竞争精神，促进了美国影片艺术质量的提高。

到60年代中期，随着美国社会的发展，《海斯法》已不能适应电影观众对影片的要求。1968年11月，美国电影协会主席杰克·瓦伦蒂主持并制定了"电影分级制"，将电影分为G级（老少皆宜）、PG级（需家长陪看、指导）、R级（18岁以下不宜）、X级（色情片），以便制片人及各阶层观众在拍片、购票时各得其所。"电影分级制"一方面继承了《海斯法》对性禁忌、暴力禁忌、政治禁忌的干涉权，另一方面则又灵活多变，使影片内容更能满足各类各层次各年龄段观众的欣赏和需要。

美国好莱坞电影发展一向是挑战与机遇并存。历史上对电影的第一轮重大打击来自美国最高法院。1948年5月，最高法院依据《反托拉斯法》对拖延20多年的"派拉蒙案"作出裁决，判定派拉蒙公司实行的制片、发行、放映垄断体制非法。这一裁决对好莱坞早已形成的8大公司垄断经营的格局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从此，各家电影制片公司不得再兼并发行、放映业务。好莱坞大亨自营

影院的票房财源被切断，各大公司不得不压缩影片产量并采用与其他娱乐业合并或开拓各种副业收入等应变措施，使电影制片业内部的经济结构出现了新的变化和改组。1955年迪斯尼影片公司率先在洛杉矶建成了一座规模巨大的迪斯尼乐园，每年招徕了数百万海内外游客，使濒临倒闭的公司增添了一大笔制片外的稳定收入。

第二轮打击来自冷战初期的麦卡锡极右势力。美国极右势力在反共旗手麦卡锡的蛊惑下，形成了一场对一切进步主义者实行政治迫害的全国性运动。在这场运动中，美国电影界的进步电影艺术家也难以幸免。1947年秋，参议院的"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就曾秘密传讯了一大批有亲共嫌疑的电影编导，"好莱坞十君子案"就是当时轰动全国的一桩电影界迫害案。50年代初，当"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大权落入麦卡锡魔掌后，电影界被列入"黑名单"受审查与监控的人士达到数百人。一时间，好莱坞处在白色恐怖笼罩下，一些著名人士如卓别林等纷纷被迫流亡海外。政治迫害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影片的内容脱离了现实生活，充满政治宣传。

第三轮打击来自电视的冲击。二战后，在城郊地区营建新住宅成为美国中产阶级的一种潮流。"市郊化"给电影业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市区电影院观众大量流失。尽管聪明的电影商迅速建立了"汽车电影院"来吸引观众，但城郊居民的消闲方式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们不再把消闲方式与娱乐兴趣仅局限在电影。此时，电视的便利性、家庭性使消费者的兴趣转向购买电视机。据统计，1946年美国拥有电视机仅有8000户，而1949年则已急增到94万户。这一发展势头引起了5000家电影院相继倒闭。

面对电视的挑战，好莱坞老板试图用高成本拍摄电视中难以表现的豪华壮观场面，以此来挽回观众。他们投入大量资金开发宽银幕、立体电影和70毫米巨片等新品种，如《八十天环游地球》(1956)、《埃及艳后》(1962)等等。然而这些巨片也无法抗衡电视

日趋稳定的商业地位。好莱坞在百般无奈的情况下,逐步走上"影视合流"的道路,将片库中积压的旧影片提供给电视台有偿播放,各家电影公司也开始参预电视节目的制作。

1974—1984 这 10 年是美国电影自二战以来走出低谷的复兴时期。1974 年票房收入高达 19 亿美元。70 年代至 80 年代初,美国又一次遭受严重的经济危机。在忧郁中,人们为了解除忧虑而"泡影院"。好莱坞制片商及时迎合观众的心理,制作了十分走俏的灾难片、恐怖片。当观众从银幕上目睹地震海啸、摩天大楼失火、大白鲨食人、吸血僵尸作祟等恐怖景况之后,对自己侥幸活在世上感到几分欣慰。这时期的影片与 30 年代好莱坞"梦幻工厂"有异曲同工之用。

为满足各类观众的需求,好莱坞还拍摄了迎合青少年观众兴趣的摇滚乐歌舞片,同女权主义运动相呼应的女性电影,黑人明星主演的黑人电影,取材于内幕新闻的政治电影以及喜剧片和科幻片等。由于好莱坞电影制片商的精心制作,电影广告的宣传攻势,这 10 年中观众人数年平均在 10 亿人次左右,1984 年票房收入增长到 40 亿美元。

随着美国经济的好转,80 年代的美国进入了录像带革命的时代。至 1988 年底,62%的美国家庭拥有录像机,而"家庭影院"的兴起更改变了人们接触电影的习惯渠道。但随着人们对录像带的需求,好莱坞电影制片商及时捕捉住这一票房之外的重要财源,制作大批的录像带以满足市场的需求。1991 年,在世界各地电影业普遍不景气的大环境下,美国电影总收入接近 50 亿,堪称"风景这边独好"。然而好景不长,财大气粗的日本电子企业"索尼公司"、"松下公司"先后分别购买了美国两家老牌电影公司"哥伦比亚影片公司"和"环球影片公司"。祸不单行,意大利金融家和澳大利亚新闻集团也不甘落后,分别盘下了"米高梅影片公司"和"20 世纪福克斯公司"。好莱坞 8 大影片公司竟有一半落入他国财团之手

的事实令好莱坞上下一片震惊，电影界人士束手无策。美国好莱坞何去何从，世人正拭目以待。

电视的魅力

在美国新闻媒体与大众娱乐中，电视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它以快速、便捷、节目繁多、功能齐全而倍受青睐。它汇集了电影的娱乐功能，又集广播、报刊、新闻媒体为一体，向公众展示了高技术下美国新型的大众娱乐形式。

电视问世于本世纪20年代。1925年，美国开始试验发射一些电视图象。在试验初期，图像不仅小，而且模糊不清。1927年，纽约州的一家无线电台开始每周三次试验性广播。1930年，全国广播公司在纽约市试播电视。一年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也着手这项工作。

美国最早的电视机荧光屏是圆形的，只有5～9英寸大，差不多要坐在电视机跟前才能看得清，但它毕竟是一项重大的革命。它使人们能够安然地坐在客厅里欣赏电影、戏剧，了解外界的风云变幻。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电视的发展曾一度陷入停顿。1947年美国家庭中约有1.4万台电视机，1949年达到近100万台。1955年达3000万台，1960年达6000万台，仅5年时间，家庭电视机就翻一番。如今，随之美国经济的昌盛，人民生活质量大幅度提高，美国人对娱乐的质量要求也随之提高。特别是1951年问世的彩色电视机以及大屏幕电视机，不仅把美国人从较老的娱乐模式中解放出来，而且也把世界带入了美国人的家庭，使美国人足不出户就可以了解世界各个角落每天发生的事。

自50年代大量投入消费市场后，电视不仅给美国人的业余生活带来了令人眼花缭乱、丰富多采的节目，同时它也为新移民打开了一扇认识美国文化的窗口。电视使美国人对历史、艺术、现代科学的新发现和宇宙奥秘有了新的更深切的了解，并起到了沟通美

国人民与美国政府之间联系的作用。电视节目“芝麻街”、“电器公司”等帮助了一代又一代新移民和普通美国人学会了读书、写字。美国“没有围墙的教育体制”因得益于电视的辅助而不断完善，而电视所开辟的适合各种年龄段、各种阶层的不同的欣赏栏目则使美国人拥有广泛的选择权。新词汇“电视保姆”和“电视之子”形象地描述了美国人对电视的依赖。1998 年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的性丑闻也是通过电视传遍全球。但美国电视新闻的快捷性、自由性、和透明度在不经意中将美国式的“民主、平等、自由”精神播撒。美国人正是在这种耳濡目染、年复一年的“电视文化”中培育了法治观念。遵法、守法、用法律保护自己的权利的意识深入人心。特别是美国电视对“克氏弹劾案”的及时而广泛的报道更使美国人懂得“总统违法与庶民同罪”的道理，对美国民主的内涵作了一个最好的诠释。

大众音乐

美国音乐五花八门，缤纷各异。各类民间、宗教、古典音乐在美国都十分流行。在 20 世纪西方流行音乐中，美国占了主导地位。以黑人音乐家为主的美国音乐家使南方黑奴的民间音乐转变为一种新的音乐形式：爵士乐。这种新颖的音乐融合了欧洲和非洲的传统，节奏感强，情绪激昂，充满活力。它可由大小乐队演奏或独奏，更主要的是可以伴舞。

1890—1917 年间，一种名为拉格泰姆(ragtime)的新型音乐在美国圣路易斯出现。此后又出现了第二种风格独立的爵士乐，古典爵士乐。1910 年左右，拉格泰姆的切分特色同布鲁斯(Blues)喊叫式的旋律特点相结合，为下一个 10 年内爵士乐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爵士乐的中心新奥尔良，当时至少有 30 支乐队经常以进行曲和庄重悲哀的曲子为基础进行即兴表演。爵士乐发展到 20 年代，出现了交响爵士乐，也称甜蜜爵士乐或“热爵士乐”。这种以黑

人乐师阿姆斯特朗为代表的“热爵士乐”30 年代又发展成摇摆爵士乐。40 年代，比鲍普或鲍普问世。这是一种由年轻黑人乐师推出的较为高深的爵士乐。与此同时，布鲁斯也在不断发展，并作为吉它独奏的基础被演员用来演奏强劲的民间布鲁斯音乐和乡村布鲁斯音乐。

从拉格泰姆到布鲁斯，从爵士乐到摇滚乐，黑人音乐家在这块他们被掳至而来的新大陆上对源于欧洲的美国音乐传统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们创造出来的具有“非洲”风格的音乐弥补了美国本土音乐的空白，为美国娱乐业捧出了震撼人性的多样化美国音乐。

拉格泰姆：拉格泰姆是黑人作曲家创造出的一种符合自己需要、反应自己性格的独特的轻音乐。拉格泰姆曲有时也称吉格钢琴曲，前身是黑人中流行的舞蹈音乐。南北战争前，人们经常可以看见奴隶们在小提琴和班卓琴的伴奏下跳舞，乐师顿脚，观众拍手。拉格泰姆曲的早期弹奏者中很少有人识谱。这种带有舞曲和说唱音乐常用的切分节奏的新体裁在 19 世纪下半叶开始为美国白人所察觉、欣赏。于是，多年来仅在黑人中间流行的拉格泰姆曲一下子便冲出原先的黑人社区，进入国民舞台的中心，为白人社会所广泛采用。1900 年 1 月，世界拉格泰姆音乐比赛会在纽约塔曼尼音乐厅举行，决赛的规定曲目便是由黑人喜剧演员和歌曲作者恩内斯特·荷根写的《所有黑人我觉得都一样》。这次比赛虽没有给作者带来好运，但黑人音乐却借此机会在白人统治的美国社会深深地扎下了根并被众多的白人和黑人所接受，它标志着黑人亚文化开始对美国主流文化渗透、补充和完善。

布鲁斯（亦称蓝调）：和拉格泰姆音乐相比，布鲁斯音乐则是十足的 20 世纪的产物。它基本上是一种赏听音乐，每首歌的形式和风格均是在演唱过程中形成。它的前身是码头工人凄凉的歌曲、奴隶在田间干活时的低吟以及表达内心痛苦的灵歌。1902 年，白人职业歌唱雷内女士在密西西比州随团巡回演出时听见一位乡村

姑娘在哀声低唱,歌声凄凉欲绝。雷内深受感动,立刻学唱,并纳入自己的演出节目中,结果听众反应十分热烈,到处是掌声、赞扬声。于是,雷内改为专唱布鲁斯。当观众问她唱的是什么体裁的歌曲时,雷内一时灵感激发,脱口说道"布鲁斯",从此"布鲁斯"一词就成了悲恸凄楚歌曲的称号。

布鲁斯从诞生的那天起就和下层阶级紧密相连。它的早期演唱者大部分是江湖艺人、盲艺人。他们唱着哀伤的歌曲,从一个黑人村庄到另一个村庄,沿着铁路线徒步行走。虽然上流社会对布鲁斯不屑一听,但布鲁斯那哀婉的旋律,如泣如诉的演唱风格赢得了许多白人下层阶级对黑人的同情。布鲁斯同时也被在美国工业化转型期中的美国工人、流离失所的农民所认同,从而成为美国主流音乐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正是拉格泰姆和布鲁斯音乐的早期成功使后来的爵士音乐得以产生并促使整个美国社会在 20 世纪 20 年代进入了一个"爵士时代"。

爵士音乐:"爵士"(jazz)一词起源何处,至今仍众说纷纭。一些权威专家考证"爵士"是密西西比河流域一位家喻户晓的黑人江湖艺人的名字,他的全名叫"爵士波·布朗"。传说他常在黑人居住区的咖啡馆里演奏,听众在演奏中常常喝彩叫好。他们叫嚷"再来一个!爵士波!再来一个,爵士!"另一说法认为这个词是一位海报画家首先使用的。1910 年左右,他为黑人音乐家波赛·爵姆斯及其乐队画了一张海报,上面写着:"爵斯的乐队登台表演,节目精彩。"爵姆斯擅长演奏"热音乐",特别精于"热布鲁斯",听众常常亲昵地称他为"老爵斯",称他演奏的曲子为"爵斯音乐",最后,"爵斯"演变为"爵士"。"爵士音乐"便由此而来。

首先向听众演奏爵士音乐的是新奥尔良市的白人乐队。1915 年,芝加哥"羔羊俱乐部"聘雇了一支白人乐队,以演奏爵士音乐为主。1917 年,一支"真正南方爵士乐队"在纽约举行首场演出并于同年灌制了第一张爵士音乐唱片,在美国音乐史上写下了具有历

史意义的一页。但1915年到1920年间的两次社会变动从根本上改变了爵士乐的发展过程。一是经济危机袭击南方，1915年起黑人开始大规模移居北部和西部各城市。二是1917年美国海军部下令封闭新奥尔良市的一个黑人居住区，大批黑人音乐家被迫与其他黑人一起离乡背井，移居他方。被撵出的音乐家顺河而上，迁居芝加哥等北方城市。黑人的国内大徒迁将“黑人音乐”也传播到东北部和西部地区，从此“爵士音乐”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章。

爵士音乐从诞生的那天起在文化上和种族上几经更迭，但在促进美国各种族之间的相互理解和相互尊重方面，它作出了很多无形的贡献。在20年代，爵士音乐就有了一个崭新的的面貌。初进乐队的青年黑人爵士音乐家大部分是大学或音乐学院科班出身，一改昔日那种无师自通，求教他人的爵士音乐圈的格局。这种局面提高了爵士音乐家的社会地位，极大地改变了美国主流社会对“黑人音乐”的歧视态度，促进了“黑、白”民族之间的了解，推动了爵士音乐的发展。对许多人来说，举行专门的音乐会已成为职业性活动和得到丰裕的收入以及在社会上成名立足的一种途径。进入50年代，大型乐队演奏爵士乐的时代已经过去，和声复杂的“新现代爵士乐”或称“进步爵士乐”经常由一些小型乐队演奏，而新崛起的“现代爵士乐四重奏演奏小组”则致力发展一种更为古典的爵士乐。

乡村音乐：在爵士乐形成并开始流行的时候，另一种美国特色的大众音乐也出现在美国东南部的农村山区，这就是美国的乡村音乐。这一地区的人们没有受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冲击，仍然过着俭朴甚至是贫困的生活。民间艺人们继承和发展了祖辈从英国带来的各种民谣和舞曲，用自制的乐器弹唱贴近生活的歌曲，曲调自然流畅，充满了乡村泥土的气息，其主题大多是贫困、上帝、丰收和家庭。

20～30年代，由于美国农业的不景气以及随后全国性的经济

大萧条,乡村音乐的主题引起了越来越多听众的共鸣。先是通过留声机,后来又是通过无线广播,乡村音乐得以在美国南部和中西部广泛流传,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尔成为乡村音乐的制作中心。二战后,著名的乡村音乐家汉克·威廉斯以其精湛的技艺和朴实的风格把乡村音乐带出了南方和中西部,推广到全美国。

经历了60年代的喧嚣和狂乱之后,平和温情的乡村音乐又开始受到听众的欢迎。在70—80年代,乡村音乐歌手约翰·丹弗以其健康清新的舞台形象和自然流畅的演唱风格风靡全美,大受欢迎。作为一种音乐形式,乡村音乐一方面仍然有相当多的听众,另一方面它为战后美国最流行的摇滚乐的形成作出了重大贡献。战后美国的青年文化将乡村音乐中的和谐风格与布鲁斯摇摆乐中强劲、咄咄逼人的风格及纯正通俗乐中的通俗风格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摇摆乐"。1954年,白人歌手比尔·哈利以夸张的、仿黑人音乐的节拍演唱并录下了《抖、摇、滚》一曲,摇滚乐正式诞生。

摇滚乐(Rock and Roll):摇滚乐是美国人娱乐生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早期与爵士乐融合一体,被称作"摇摆爵士乐"。"摇滚乐"作为独立的音乐分支产生于50年代中期。当时美国社会处在麦卡锡的反共潮流中,"红色恐惧"弥漫全国。一些青年消沉苦闷,心灰意冷。为了发泄这种情绪,摇滚乐便应运而生。摇滚乐实际上是美国青年表示叛逆的一种音乐,由爵士乐派生而来,曲调变化较小,歌声粗犷,伴有节奏强烈的敲击,音乐风格热情奔放,肆意发泄个人情感,富有强烈的感染力,使观众和演员融为一体,达到如痴如醉的境界。

最初的摇滚乐小组由青年人自发组成,常以3人一组,5人一群,手持吉它,四处流浪。表演时,他们边唱边喊,情绪激昂。每逢这些长发披肩,形同嬉皮士的歌星登台表演,场内灯光四射,光怪陆离,崇拜者近乎疯狂,演出场地一片"魔鬼的欢腾"。

摇滚乐是一种无拘无束、自由表达情感的艺术表现形式。演

唱者大多自编自唱，其主题以表达青年的迷惘与孤独为主，伴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反应美国人的心理状态和感情变化，但摇滚乐也不乏糟粕，其暴力、色情的内容遭到公众舆论的抨击。随着60年代的到来，50年代相当简单的摇滚乐与披头士乐队（Beatles，又称甲壳虫乐队）一起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披头士乐队在改编乐曲时开创了使用复杂电子音响效果的先河，他们的影响和冲击可谓家喻户晓。特别是摇滚乐歌手"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他在摇滚乐方面的天赋使他成为美国一代"歌王"。这位1935年出生在密西西比州的"天皇巨星"从小爱唱教堂歌曲，也爱听黑人的摇摆舞曲，1954年录制了第一盘磁带。此后两年，他在经纪人帕克的提携下开始走红。1958年发行《伤心旅社》唱片，首次突破百万张。同年拍摄第一部影片《温柔地爱我吧》并由此走上银幕。他以其超凡的魅力，性感的臀部摇摆，鸭尾式的发式以及永恒的嘲弄姿态结合脆弱的神情使年轻人对他狂慕不已。"猫王"普雷斯利被公认为50～60年代美国最富有生气、最有成就的通俗歌唱家。他一生录制的唱片难以计数，其中销量逾百万的就有45张。他一生还拍摄了33部影视片，声名传遍全美乃至全世界。1977年8月，一代"猫王"在孟菲斯去世。在他死后的5天中，他的唱片销售量达800万张。

虽然60年代和70年代初的其他乐队如滚石乐队（Rolling Stones）等，以其苦心创作的怪异舞台表演吸引了无数观众，但可悲的是许多乐队在60年代反主流文化运动中深受"吸毒文化"的影响，极为重视迷幻式的灯光效果和喧嚣狂热的音响效果，结果事与愿违，观众渐渐地对这种摇滚乐失去兴趣，转向节拍强劲但不失礼仪的迪斯科乐曲。70年代后，随着越战的结束，美国社会进入了历史上的反思时期。音乐，这个富有强烈时代感的"文化传感器"，也随同美国社会价值观的回归转向"阳春白雪"的古典音乐和纯朴抒情的乡村音乐。

第五章 酷爱体育与旅行的美国人

在美国发展史上，体育与旅行作为一种大众文化而广为流传还是在20世纪。随着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人们开始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每周40小时工作制的建立使人们拥有足够的时间进行户外运动和旅行。为此，19世纪被社会精英集团垄断的各种运动项目和度假旅行开始转向大众化。无论是“贵族化”的高尔夫球，还是“富人”独享的网球，大众化的趋势日渐深入。黑人问津体坛的事迹不断震撼全美，他们的体育“天才”得到了世人的公认。由体育竞赛产生的“运动员文化”成了“勇敢、奋进、公平、竞争”的新美国伦理。许多美国“小人物”正是通过这种竞争来实现自己的“美国梦”。整个20世纪，体育和旅行是美国生活变化的一面镜子，折射出美国人试图将体育运动和旅行作为一种大众文化来建设美国民主和文明的意识。

大众化的体育

美国是一个流动性极强的移民国家，“运动”与“流动”自古以来就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关系。移民的徒迁、流动把世界各地的“运动”项目移植美国，但早期艰苦的拓殖生活遏制了体育活动的开展。清教主义者将体育运动视作游手好闲者的选择，甚至一些新兴中产阶级者也对一些传统的体育项目抱有偏见。然而“流动”社会却造就了美国人“好动”的性格，这种美国人特有的性格最终在体育运动中找到了“归宿”。从19世纪下半叶起，美国人开始热

心从事各种各样的体育运动。到20世纪中期，美国体育运动发展达到了顶峰。

在美国，人们把体育运动分为观看项目和群众性项目两大类。棒球、篮球、美式足球（橄榄球）为观看类，滑雪、游泳、自行车等为群众性项目。美国最流行的体育活动为棒球，可谓美国的“国球”。

棒球：关于棒球的起源说法不一，但大多数人认为它发端于美国。1839年，美国纽约州一个名叫阿什拉·塔普基迪的人把这种运动定名为棒球。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早期的棒球俱乐部，其成员皆为有身份之士，彬彬有礼，社会地位意识强烈。1846年6月19日，第一次棒球比赛在纽约举行。1869年，美国出现了第一批职业棒球队，此后，棒球发展迅猛。1910年，美国总统威廉·塔夫特亲自批准棒球为美国的国球。同年4月14日，他在成千上万的观众面前亲手投出了第一个球，揭开了棒球季节首场比赛的序幕。棒球大众化的另一鲜为人知的原因是美国社会上的种族歧视政策。这种歧视政策使棒球大赛成了“美国是白人的国家”的具体示范。因此，黑人只好组织自己的棒球队，形成了全国棒球“黑、白”双联合会格局。这种“对峙而平行”的格局表明棒球已成为美国社会各阶层人民最喜爱的一项运动。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年代里，棒球成为美国首要的运动文化，甚至两次世界大战的炮火也未能阻止美国的棒球比赛。在美国，两个主要棒球协会构成甲级联赛：国家棒球联合会和美国棒球联合会，共有26支美国队，2支加拿大队。每一协会冠军每年在世界棒球锦标赛上决赛。棒球还在小联赛职业俱乐部、半职业俱乐部、业余队、大学和中学队开展，成为美国男女老幼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美国小学生中流传着这样一首棒球歌：“爸爸，带我去棒球场，妈妈，给我买一个棒球。”甚至在美国总统竞选中，为了博得选民的好感，竞选者常在众人面前打上几下棒球。目前美国打棒球的人数已突破1000万，青少年棒球队有8.5万多

个。棒球运动场星罗棋布,其中最大的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体育运动场能容纳7万多名观众。棒球的大众化趋势甚至在美国许多习语中也体现出来。例如:美国人用棒球比赛中的“打了就跑”(hit - and - run)喻指那些从车祸现场溜走的肇事司机;用“我们被罚出局了”(We were struck out before we got started.)表示“失败”等。

橄榄球:橄榄球是美国最流行的运动之一。这项运动起源于英国,但经过美国大学生的改进和创新,已成为一种校园运动的项目,几乎所有的大学、学校都有橄榄球队,而各主要城市的职业橄榄球队的队员差不多全是原大专院校球队的主力。

1869年11月6日美国举行了第一次校际橄榄球比赛。哈佛大学对橄榄球运动的发展贡献卓著。1874年春季,哈佛大学橄榄球队与加拿大学生队在马萨诸塞州进行了两场表演赛。第一场比赛采用哈佛大学队修定的“波士顿”规则,结果哈佛大学队以3:0获胜。第二场比赛采用的规则是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的规则,结果双方以0:0言和。赛后,哈佛大学对加拿大学生玩的这种完全不同于美国橄榄球的游戏规则产生了巨大的兴趣。这种游戏所用的球是椭圆的,早先流传于英国,与足球几乎没有相似之处。哈佛大学率先开展了这种游戏,其他院校也紧随其后。1876年,美国大学校队橄榄球协会成立,采用的是英式橄榄球的规则。几年后,耶鲁大学的一名学生对这些规则提出了许多富有想象力的建议。由于修改和增加的新规则非常多,早先的英式橄榄球事实上已经变为一种全新的游戏。这项经过彻底改革的运动在各大院校、军队中迅速开展起来,尤为耶鲁大学与哈佛大学之间进行的比赛最为著名。

美国许多大专院校非常重视发展橄榄球运动,常常用提供奖学金和免学费的办法吸引中学生中的优秀橄榄球队员入校。一些大专院校的体育经费仅靠出售橄榄球票就可赚回来。橄榄球的赛

绩牵动着每一位在校学生及校友的心,各院校均为本校的橄榄球比赛成绩感到骄傲和自豪。在美国,橄榄球已成为一种校园文化,一种校园精神,一种无形的校园凝聚力。

高尔夫球、网球:高尔夫球源自新阿姆斯特丹(今纽约)的荷兰移民所发明的一种称作"het kolve"(荷兰语发音为"高尔夫")的游戏,后融合了从苏格兰传入美国的现代高尔夫球的打法,形成了现今高尔夫球运动的雏形。1887 年,美国首次成立常设性高尔夫球俱乐部。1894 年来自全国 5 个主要俱乐部的代表集会,成立了美国高尔夫球协会,统一了高尔夫球运动,并于 1895 年举办了首届全国业余男、女高尔夫球比赛和首届美国高尔夫球公开赛。

在高尔夫球运动的早期,由于场地的要求和运动规则的讲究而被视为一项典型的贵族运动,因而未能得以普及。1913 年,一位年仅 20 岁、曾为波士顿高尔夫球场背球棒的青年在美国高尔夫球公开赛上一举击败美国一流职业高尔夫球选手哈利·瓦顿和德泰·雷,荣获公开赛冠军。这位名叫费朗西斯·欧麦特的年轻人的胜利像一磅重型炸弹,在美国公众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它促使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这项"贵族运动"。欧麦特的成功表明高尔夫球不仅仅只是富人的运动,它也可以成为大众的运动。

高尔夫球真正走向大众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经济的繁荣昌盛使大多美国人进入中产阶级行列。工作时间的缩短,业余时间的增多,经济的宽松使许多美国人开始转向高质量的娱乐活动,而高尔夫球运动正迎合了这种需求。近年来,美国高尔夫球场增长的速度较快,已成为大部分人都可以参加的运动。

网球和高尔夫球一样,在早期美国娱乐运动中被视作"贵族"的消遣。最优秀的运动员大都来自美国的东部地区,西部和南部则寥寥无几,这种势态延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莫里斯·麦克洛克林,这位来自西海岸旧金山的年轻人,凭借在柏油铺设的公共网球场练就出的伶俐、凶猛、快速的网上技术,把对手打得落花流水。

这颗加州的“彗星”在1912年和1913年的全国网球单打锦标赛上横扫一切对手，出尽风头。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电视机的普及及电视对大赛的转播，职业网球运动又兴盛起来。温布尔顿和纽约斯特希尔斯业余网球比赛开始接纳职业网球运动员参加，并于1968年举行了公开赛，从而完全消除了业余和职业运动员之间的最后一点差别。70年代后，网球运动的发展速度惊人。郊外网球场地的数目以每年4600个多的速度增加，平均每天就要出现13个新场地。据统计，美国的网球爱好者已超过1000万人。

显示力量——黑人与体育

在美国体育运动史上，黑人对美国体育运动的发展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特别是在篮球、拳击、田径领域，其超人的天赋，无与伦比的绝技令世人侧目而视。拳王阿里、“空中飞人”乔丹、“百米飞人”刘易斯等，他们的英名在美国乃至全世界到处传播。黑人以其独特的体育才能向世人展示他们的内在魅力。

在美国所有的主要运动项目中，惟有篮球真正起源于美国。1891年，马萨诸塞州一个基督教青年会的国际训练学校教师詹姆斯·史密斯用一个足球和两只跳栏设计出一种在室内进行的、无身体接触的运动，以弥补冬季运动缺乏的遗憾。这项运动一经开展，便受到该校学生的喜爱。此后，“篮球热”随着基督教青年会国际学校毕业生的“足迹”传遍全美大中学校及世界上许多国家。1908年美国制定了全国统一的篮球规则，并用多种文字出版，在全世界发行。1936年篮球运动成为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来自22个国家的篮球队参加了比赛。至1939年，已有75个以上的国家开展了篮球运动。

1949年美国职业篮球联盟(NBA)成立，1967年美国篮球协会(ABA)又告成立，两协会形成的竞争格局进一步扩大了篮球运

动的影响力。特别是NBA的梦幻队在1992年巴塞罗纳奥运会上横扫千军，所向披靡，享誉全球。其技艺之精湛，速度之敏捷，配合之默契，投球之准确使NBA被公认为世界篮坛的最高殿堂。

NBA下辖27支队伍，依地理界限划分为东西两个大区，大区下划为4个分区。东区辖大西洋区和中央区，各辖7个队。西区辖中西区和太平洋区，分别辖6个队和7个队。每个球队设有会长、总经理、总教练、专职教练、人事、训练、管理、攻关等部门，各司其职，各负其责。每队球员12人，27个队共324人，约80%以上的球员是黑人。"3大中锋"、"2大后卫"、"5大前锋"全是黑人。他们个个技艺超群，汇集了美国乃至全世界篮坛的精英。

NBA不仅在本土，还向海外开拓市场，派出劲旅征战各国，与164个国家和地区签有电视转播合约。在瑞士、香港、澳州、日本等地设有办事处。近年又吸收了加拿大2个外籍球队入盟，把美国"篮球文明"与"篮球文化"传遍世界。

NBA更是美国黑人成功的基地，社会多元化的缩影。27个球队中的队员来自黑人、印第安人、犹太人、凯尔特人、非洲人等公牛队"空中飞人"乔丹是NBA历史上一位伟大的球星，也是世界篮球爱好者心中的偶像。他在职业篮球生涯中14次被评为联赛、5次被评为总决赛的"最有价值球员"，3次荣获"最受欢迎的运动明星"称号，9次荣登最佳得分手宝座。新闻媒体称他是NBA的象征，球迷称赞他"是神，不是人"。由于他的存在，NBA在商业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

除在篮球和田径项目上表现出非凡的业绩外，黑人在拳击运动项目的"垄断"地位也是无人能与之匹敌。拳击运动最早是在独立战争前由英国传入美国的。在南方，奴隶主把这项运动当作一种赌博的方式。他们逼迫强壮的黑奴互相打斗，以进行巨额赌博。19世纪后，拳击运动开始受到美国运动员的赏识，许多自封的美国冠军与英国一流拳击手进行比赛。但在19世纪中期，职业拳击

在美国的大部分地区仍被认为是非法，因此，所有比赛只能秘密进行。1882年，波士顿拳击手约翰·沙利文在密西西比州市一举击败拳击冠军帕迪·瑞安，登上世界重量级冠军宝座，为美国拳击手在美国社会中赢得了令人尊重的地位，推动了拳击运动的发展。

黑人重量级拳击运动员崭露头角是在20世纪初。由于"种族隔离制"在南方的实施，黑人拳击手参加冠军争夺赛的权力被剥夺。1908年，德克萨斯州的黑人拳击手杰克·约翰逊在澳大利亚击败久负盛名的冠军保持者托米·伯恩斯，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世界重量级冠军。在此后的28年拳击生涯中，他共比赛114场，仅失利7场[①]。约翰逊的成功为黑人突破拳击运动的肤色障碍扫清了道路，从此黑人拳击手不断问津拳王宝座，把拳击运动演化为展示"黑色力量"的战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群众性的拳击运动曾一度跌入低谷，许多二流的拳击俱乐部比赛失去了观众。一些地方竞技场和体育馆也相继闭馆，有些大学甚至把这项曾经十分普及的大学运动项目取消，惟有拳击冠军赛仍拥有大批的观众。1960年，富有传奇色彩的美国黑人穆罕默德·阿里荣获奥运会次重量级拳击金牌。

阿里1942年生于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12岁开始练习拳击，1960年9月转入职业拳击。1964年阿里击败世界重量级拳王索尼·利斯顿，获世界重量级拳击冠军。此后他转战美国、日本、菲律宾等地，屡战屡胜，在世界拳坛逞雄10余年之久。1967年因反对侵越战争，拒服兵役而受联邦大陪审团起诉并被判5年徒刑，罚款1万美元，世界拳击协会也取消了其世界冠军称号。1970年联邦最高法院重新作出裁决，撤销对他的原判。1974年他重返拳坛，在扎伊尔首都金沙萨一举击败乔治·福尔曼，再度获世界重量级拳击冠军。1978年2月败于新秀斯平克斯，但半年后东山再起，击

---

① 卡罗尔·卡尔金斯：《美国文化教育史话》，第194页。

败斯平克斯，荣登拳王宝座。1979 年 6 月阿里正式挂拳退休，从事公益事业、慈善事业以及国际拳击交流。他曾于 1979 年和 1985 年两度访问中国，对增进中美体育交流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如今，拳王阿里已成为美国“自强不息”的象征，他的成功向世人展示了黑人的力量及美国拳击运动“不可战胜”的神话。

争取平等权利：妇女与体育

在西方传统文化中，妇女一直处于从属于男人的地位。她们生儿育女，辅夫哺子，社会地位低下。直至 19 世纪，多数国家的妇女仍没有选举权和执政权。女权主义者费朗西丝·科伦在 1870 年写道：妇女在参加有意义的社会工作之前根本就没权利参加体育运动和文化娱乐活动。她说：“恐怕 500 位已婚妇女中也没有一位会关心体育比赛，因为这是男人的事。”[①] 19 世纪后期，随着工业化的进程，妇女开始有机会参加社会工作，广大妇女被工业文明的浪潮卷入到美国社会的经济生活中。她们受雇为打字员、图书管理员、电话接线员，也有的成为记者、护士、医生、律师和作家。妇女的就业标志着妇女走出家门，赢得了自我独立权。妇女的这种独立性意味着她们参与一直由男人统治的体育活动的条件已经成熟。

著名作家安尼·奥哈格恩在 20 世纪初说：“随着妇女在法律上争取地位的进展，妇女开始能够进入体育领域。这是过去的那个世纪中最令人振奋的事。”[②] 由于传统旧俗的根深蒂固，妇女真正赢得参与体育运动的自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 20 世纪 20 年代，对妇女参加剧烈的体育活动，公众仍持强烈的反对态度。反对妇女参加体育运动者一般都认为运动会损伤妇女的生殖系

① 转引自约翰·卢卡斯、罗纳德·史密斯：《从紧身衣到宽松裤：美国妇女与体育》，载《体育文史》1991 年，第 4 期，第 61 页。

② 转引自《从紧身衣到宽松裤：美国妇女与体育》，第 62 页。

统，对胎儿产生不良影响，这使许多妇女不敢参加体育运动。另一些持性别歧视观点的人认为体育是男性的运动，只适合男人参加，女人参与男人的活动将导致性别差异的消失。更有一些流行的观点，如女性生来体质较弱，感情上、心理上也相对脆弱，不能适应体力角逐的强度，更不能参加竞赛。这些反对妇女参加体育运动的偏见既有社会原因也有历史原因。但是，美国妇女参加非竞赛性、以娱乐为主的体育活动则从 19 世纪下半叶就开始了。

1866 年，槌球游戏风靡全美，无论是小乡村还是西部荒原，人们都纷纷加入这种游戏运动，城市里人们甚至组织球队进行比赛。正是这个小小的槌球使美国妇女第一次可以和男人同场打球。当然，妇女参加这项运动之所以被社会接受，原因之一是妇女可以穿着镶边的拖地长裙从事这项运动，因而不失妇女的优雅。尽管妇女参与体育运动仍受制于种种传统习俗，但她们毕竟迈开了可喜的第一步。

1860 年至 1900 年间，妇女也开始参加射箭运动和草地网球。在 60～70 年代，最初参与射箭运动的是一些富有的上层妇女。在她们的要求和推广下，女子射箭运动被社会承认。1874 年玛莉·奥托布姬将草地网球引进美国。这是一项优雅的运动，人们站在网的两边，用球拍温和地来回向对方击球。妇女在从事这项运动时，要一手提着拖地的长裙，一手挥动球拍击球，很不方便。在户外进行这项运动时，她们则要戴上帽子，披上面纱，以防太阳光晒黑她们洁白的皮肤。在 19 世纪的最后 10 年里，妇女比以前更加频繁地参加诸如骑马、骑自行车、滚木球、帆船、划艇、滑旱冰以及游泳运动等。在所有这些项目中，惟有自行车运动对妇女的吸引力最大，参与的人最多。它不仅推动了妇女参与体育运动的进程，而且还给妇女带来了一场服装革命。

像其他体育运动一样，最初参加自行车运动的是男人而不是女人。但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开放，妇女也参与到这项运动中，并得

到社会的默认。美国内战后掀起了一股自行车热。然而这一时期的高轮自行车对穿着既宽大又不方便的妇女来说极不方便，甚至会威胁到她们的生命。因此妇女大都推崇骑三轮脚踏车并得到社会的承认。1884 年纽约成立了女子三轮脚踏车俱乐部。直到 19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低轮自行车发明后，自行车运动才真正普及到广大妇女之中。自行车运动的兴起成为促进越来越多的妇女在 19 世纪末加入到体育行列的因素之一。随着妇女参加自行车运动人数的增多，她们在一定程度上也得到了更多的自由。这不仅引发了妇女们自由和独立的观念，同时也引发了妇女服装改革，因此人们把妇女参加自行车运动看成是对旧习俗的一种挑战。

19 世纪的妇女穿的仍是传统、朴素、端庄、保守的衣服，那些敢于反传统服装的妇女常被视作是不道德、幼稚、不安分的女人。随着妇女学骑自行车人数的增加，她们越来越难以忍受妇女传统服装的束缚。首先是拖地的长裙使她们想跨上自行车都十分困难，更重要的是她们的内衣，尤其是紧身内衣，更是给她们从事体育运动带来诸多不便。她们的内衣通常是从胸部到臀部把身体紧紧裹住，以试图保持纤细的腰肢，因为如果一个妇女的腰围达到 15～18 英寸便会遭到人们的嘲笑。由于紧身衣的挤压，妇女呼吸的范围大大缩小，在参加运动时就会常常因缺氧而昏厥。在这种状况下，妇女们若要骑自行车，就必须先松开或脱去这种胸衣。女子服装改革在 19 世纪早期就已经开始，只因为它遭到了很多的非议和反对而收效甚微。但是到了 90 年代，随着自行车运动的推广，妇女们开始大量穿上短裙、灯笼裤和宽松裤。女作家纳德·凯文认为，如果没有自行车运动的出现，这种服装及其社会旧俗的革新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她写到："对男人们来说（无论是富有者还是贫民），自行车的出现是上帝的赐福，但对女人们来说，则是一场社会变革和自身的解放。"当时一家刊物的作者也预言，到 1894 年或 1895 年，自行车运动一定会风靡一时，它"会使美国妇女广泛

地获得穿着上的自由，这也是改革者们渴望了几代的大事。"[①] 几乎所有热衷于服装改革的人们都把它归功于自行车的诞生。但这种服装改革也遭到了非议，特别是那些持性别歧视者。他们对妇女在服装和运动上所获得的自由品头论足。一位老派人物称"大多数从事自行车运动的女性所穿的裙子超过了礼仪和道德范围……"[②] 这一说法代表了当时美国多数人的看法。在这场变革中，妇女得到的不仅仅只是服装上的解放，更重要的是妇女开始意识到自我价值实现的意义，争取男女平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在19世纪90年代，妇女从事自行车运动的要求与她们要求上大学的愿望一样强烈。在19世纪，妇女很少能够和男人一样拥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在50年代，上大学的妇女仅占妇女总人口的1%。但正是这1%的女性对妇女参与体育运动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对她们来说，要想在学业上取得成绩，要完成大学里十分繁重的功课，首先就必须克服她们在生理及情感上的弱点，即身体素质较差和感情容易冲动。为此，几乎凡有妇女的学校都开设了体能训练课，以增强她们的身体素质。到19世纪90年代，几乎所有美国大学的课程表上都有了体育课。这些有幸进入大学的女子都积极参加学校的各种体育锻炼，以改变人们认为女子形象仅是"葱指柳腰，脸色苍白"的传统看法。她们参加包括射箭、滚木球、划船、棒球、田径、骑马、滑冰、游泳、冰球、高尔夫、网球及篮球等多项体育活动。高等院校的体育课程和体育活动不仅增强了女学生的身体素质和体质，也为妇女参与体育活动树立了榜样。

20世纪初，高校女子体育出现了一个重大的转变。如果说槌球游戏使19世纪60年代的妇女从室内走向室外，网球和自行车运动使90年代的妇女独立意识觉醒，那么起源于美国本土的篮球

---

① 转引自约翰·卢卡斯 罗纳德·史密斯：《从紧身衣到宽松裤：美国妇女与体育》，第64页。
② 转引自约翰·卢卡斯、罗纳德·史密斯：《从紧身衣到宽松裤：美国妇女与体育》，第64页。

运动则使妇女从简单地参与体育运动转向问津正规比赛，并开始在体育竞赛领域与男子平分秋色。最早开始篮球运动的是著名的史密斯女子学院。在一次由于争球致使一位女学生肩骨脱臼后，女裁判赛达·伯尔森对该运动的一些规则作了修改。她认为原规则中允许一方从对方手中抢球势必会导致粗暴行为的发生。因此，她要求运动员持球不得超过3秒，一个运动员不得连续3次击球。她还把整个球场分为3大部分，要求运动员占据在一定区域里。这种女子篮球运动新规则一直延续至20世纪60年代。在60年代民权运动和女权运动中，女子篮球比赛规则也恢复同男子一样的规则，以证明男女的性别之差不应是男女不平等、性别歧视的原因。

女子篮球运动还使广大妇女开始意识到体育运动与她们争取妇女解放和个人解放有着密切的关系。许多女权主义者认为，只有证明女性在男性控制的体育禁区里也能够叱咤风云，性别歧视的观点才会不攻而破。尽管这种观点不乏过激之处，但它毕竟提高了女性参与体育运动的热情，推动了妇女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

妇女冲击传统习俗，从事体育活动的事实清楚地表明，虽然在一战后，妇女争取选举权的斗争达到了顶峰，但这一切大都局限在城市和一些教育发达的地区。在农村及一些小城镇里，妇女从事体育运动的天地仍十分狭小，传统习俗还十分强大。直到20世纪60年代后，妇女才在体育等方面获得真正的自由。在这场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妇女争取平等、自由的运动中，高等院校的女子体育活动和职业、业余女子运动员一直起着一种无形但却有力的推动作用。这种无形的“软力量”对美国消除性别歧视、完善美国“民主、自由、平等”的民族精神的建设和完善起了一个不可忽视的作用。

行万里路：美国的旅游文化

美国是一个移民之邦，从1607年至今已融合了100多个民族。外来移民的流入与美国内陆的流动，特别是19世纪开始的西部拓荒运动，不仅把东部的文化和文明传播到西部，同时也培育了美国人爱流动的性格。这种爱流动的性格随着美国工业化文明的不断完善演绎为一种“酷爱旅行”的民族性格。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丹尼尔·布尔斯廷把美国人喜爱流动和旅游的特征作为美国大众化民主的一个层面来进行考察，他指出“美国是历史上头一个国家，有那样多的公民出国作万里远行只不过是为了追求乐趣和对外国文化的认识。”[1]美国旅游的大众化态势一方面表明美国整体经济水准稳定，中产阶级队伍庞大，社会各阶层差异不明显；另方面也表明正是在这种“缓慢但执着”的旅游文化的带动下，美国文化得以传播并渗透到全世界。

在19世纪，出外旅游是有钱、有闲阶层的“特权”。但19世纪末美国实现工业化以后，中产阶级队伍迅猛壮大，有闲阶层也随着美国物质财富的不断积累而扩大。以前，出国旅游的美国人几乎毫无例外都是有钱和有特权的人。如1895年曾有10万美国人和加拿大人乘船去欧洲旅游，但他们中有2/3的人是乘头等舱，随身带有许多仆人和随从。20世纪初，随着美国经济的繁荣，出国旅游的人开始逐渐增多，旅游的费用也相应下调。到20年代，出国旅游开始在美国普通大众中流行开来。仅1929年出国旅游的美国人就超过了50万。特别是飞机的兴起使远渡重洋的旅行在时间上和费用上都大为减少，旅游人数直线上升。1939年6月28日泛美航空公司首次开办飞往欧洲的商业航班，一架名为“迪克西

---

① 丹尼尔·布尔斯廷：《美国人：民主历程》（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93年版，第586页。

飞剪号"的波音公司4引擎飞机载着从500名候机者中挑选的22名旅客从纽约起飞。先在亚速尔群岛停留加油，然后降落于里斯本让旅客过夜，最后飞抵马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飞机设计有了改善，旅客乘飞机旅行也成了常事。1950年美国出国人数达67万多人，而乘飞机旅行的人数超过了乘船的人数。1955年出国人数超过百万，乘飞机的人数为乘船人数的两倍。1970年时，每年出国的人数接近500万，而乘船的只占3%。这种大规模的全球旅游第一次把美国人从早期的"逃亡者"形象中解构出来，并从旅游大众化的这个侧面向世人展示了美国社会民主、平等的历程。

美国是世界旅游史上第一个有那样多公民出国作万里远行的国家。由此形成的国际旅游业也成为世界贸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美国人的国际旅游热潮对美国经济和美国国际收支平衡都构成了新的问题，但对旅游目的地国家来说，则是创造了新的外汇收入机会。1970年，美国商务部估计美国人在外国旅行的开支每年已达到20亿美元。度假旅行成了有大批旅客参加并且演变为美国人追求"平等和自由"的一种方式。

现代的旅游者大都是参加旅行社安排的旅行团，它为旅游者提供了高效、低廉和快捷的服务。最早开办团体旅游业务的并不是美国人，而是一个名叫托马斯·库克的英国人。19世纪40年代，库克第一次组织了600人的短途旅行，由于车票优惠而获得巨大成功。1851年他组织了几千名旅游者参观伦敦的水晶宫展览，同年他首次组织英国人去欧洲大陆周游。库克认为"旅行团是为促进人类进步"，"名胜地只能让社会精英去享用，普通老百姓连望都不能望一眼，这实在是太愚蠢可笑了。"库克的这种民主思想在19世纪的最后10几年中，通过美国人参加由库克父子公司组织的欧洲旅游，传到了美国。这种旅游大众化的思潮在美国这块崇尚"平等、民主、自由"的土地上得到了极致的发挥，并带动了美国旅游业的发展。1895年，美国运通公司开设了第一个欧洲办事

处，给美国旅行者提供邮件服务，代购火车票，代订旅馆房间，并协助旅客寻找遗失的行李。1919 年 10 月，运通公司举办战后第一次赴欧导游旅行，3 年后又举办了第一次环球水陆游乐旅行。该公司也举办全程代理的旅行，以消除旅游者的种种担忧。他们推出的服务使美国中产阶级能按照预先准确核算的费用出国旅游，大大地方便了那些想出国旅游而又无旅行经验的旅行者，特别是该公司推行的旅游支票解除了普通旅游者缺乏外语能力的顾虑，使海外旅游更加大众化。从 1891 年美国运通公司获准发行第一批旅游支票，到 1960 年时，该公司每年售出的旅行支票约 20 亿美元。1970 年，美国运通公司已在世界各地设立了上千个办事处，为各地旅游者提供服务。这种大众化的旅游不仅仅为美国普通老百姓观摩异国风情、了解异国文化、沟通国与国之间的理解提供了机会，同时也为美国文化的传播提供了广阔的媒介，为那些无法前往美国的各国普通民众提供了一个观摩美国的窗口。

汽车旅游是美国旅游大众化中最富有美国特色的一种旅游方式。在美国，以公路和航空构成的立体交通体系为外出旅游提供了最便利的条件。由于美国公路系统管理的完善，汽车的普及，美国人节假日首选的外出旅游方式便是驾车旅游。在工作和学习之余，他们开车到附近或较远的风景区去领略一番大自然的景色，借以消除工作或学习带来的紧张和压力。这种汽车旅行的休闲方式随着汽车旅馆服务业的开展，汽车旅游方式的不断改善和普及已形成了一种美国特有的汽车旅游文化。

为了方便汽车旅游者，美国全国各地的公路沿线都开设了汽车旅馆。这种旅馆与一般旅馆不同，它可以为每一位来住宿的旅客提供停车的地方。因此，汽车旅馆一般都是 3 层以下的长条建筑，建筑的前面是停车场，为每间客房提供一个固定的停车位。汽车旅馆的服务不如普通旅馆的服务那样周到，但其费用相对较低，普通美国人完全可以支付，因此受到大众的欢迎。

为汽车旅游提供住宿的除了汽车旅馆外，还有高速公路沿线的公用野营点。随着都市生活节奏的加快，摩天大楼的建造，生活在城市中的美国人远离自然，因而渴求投身大自然环抱的愿望使外出旅游者更愿意晚上在野外露营。为确保旅游者的安全，美国政府特地为那些希望享受在穹苍下夜宿的乐趣，或是为了节省开支而自带旅行帐篷和睡袋的旅行者们在高速公路沿线开辟了许多公用宿营点。在这些宿营点内，有齐全的卫生淋浴设备、烧烤鸡腿牛肉的炉子和燃烧野营篝火的场地并配备专人管理和负责安全。在此宿营的费用很低，一般只需几美元就可以拥有一个搭支帐篷的位置。为了便于旅行者找到这些公用宿营点，各地的汽车俱乐部还为开车外出旅游的人免费提供交通图，上面标明沿途宿营点的准确位置。这些便利的旅行服务设施使汽车旅行成为一种大众化的旅行时尚。

对于那些特别热衷汽车旅游的人来说，还有一种比汽车旅馆和野外宿营更为便宜、更为方便的旅行方式，那就是乘坐家庭旅游车外出旅游。在这种家庭旅游车内，卧室、厨房、卫生间、电视、通讯设备、办公设备应有尽有。这种旅行车使旅游者既可享受大自然的美妙感觉，又可避免外出旅游的辛劳，还能让旅游者及时处理重要的事物。有些旅游地的停车场还为家庭旅游车提供电源和水源。家庭旅游车的种种便利受到了美国社会各阶层人们的喜爱，它使那些热爱自然，渴望旅游但又受制金钱、时间的贫乏而无法实施旅行计划的商人和贫民提供了最佳的旅行方式。甚至一些退休的老人都迷恋上了这种旅游方式，以公路为家。

由于提前退休的人有所增加，而医学的进步使更多的老人健康长寿，也由于现在有了像老人公寓一样舒适的旅游汽车，以公路为家变成了一种比较容易适应的生活。许多人买掉房子，把家当存放起来，把终身的储蓄变成现金，然后告别旧有的生活方式。他们乘坐各式各样的车辆，冬季穿行于西部广袤的沙漠，夏季漫游于

太平洋西北沿岸茂密的森林。然后转动方向盘，开始新的游历。这样的老人有多少，没有精确的统计数字。但是研究这种现象的学者相信他们的人数在100万以上，而且他们的队伍还在迅速扩大。现在已经有了专为以公路为家的老年人服务的医疗保险计划、电脑网络和宿营地。

尽管汽车旅行风靡全美并演绎为一种大众化的旅游文化，但为了节省时间，美国人也常常乘飞机旅行，或为了省钱去坐长途汽车。至于火车，则越来越少有人问津。这个美国西部开发的最佳交通工具随着美国后工业文明的来临而悄然逝去。但美国人在充分享受后现代文明的同时，一种回归传统的运动也悄然兴起。如今在美国，随处可见骑自行车旅行者及步行旅行者。他们一方面是出于环境保护的目的，另一方面，他们也希望通过这种旅行方式来锻炼自己的意志，从而使自己在竞争的社会中获得生存。美国民族这种热爱旅游的个性也使美国民族中的"竞争、创新、乐观"精神在这种不断"流动"的文化中得到强化，它使美国普通人在"旅游文化"中感受到了美国"民主、平等、自由"的真正的内涵。